中大五十年

下冊

中大五十年 下

中大五十年（下冊）

出版：	中大五十年編輯委員會	
編輯：	王邦華	陳嘉銘
	何敬熹	湯映彤
	吳嘉倫	楊穎仁
	李敏剛	劉子僑
	杜振豪	鄧權偉
	洪曉嫻	羅奕媚
	陳秉鳳	譚焜
作者：	王靖婷	張雋熙
	吉秋爽	陳日東
	吳倩婷	陳平原
	吳銘基	陳正恒
	李峻嶸	陸明敏
	周松齡	彭梽棡
	阿三	劉偉琪
	胡雪婷	戴遠雄
	胡蘇	簡浩德
	馬嶽	譚棨禧
	區諾軒	
插圖及設計：	陳素珊	湯映彤
承印：	星達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日期：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ISBN：	978-988-14266-1-1	
網頁：	http://www.cuhk50.org/	

目 錄

理想 · 傳統

前言 / 李敏剛、陳嘉銘 2

新書院之創立

新書院事件時序簡表 6

中文大學校董會為成立新書院制訂指引 / 中大新聞稿 8

中大牽起惡性競爭　學界進入黑暗年代

——對中大校長（兼個別校董）的批評 / 中大學生會 10

「新」書院院監會，或曰政治花瓶 / 陳嘉銘 14

你的Admin 如何，你的文化也必…… / 李敏剛 16

水塔景致風波

不止於水塔景觀：再思新亞第五宿 / 李昆澤 21

新亞水塔的人文教育 / 陳日東 25

兩任校長

破壞王劉遵義破壞事件簿 27

劉遵義，一個怎麼樣的校長 / 杜振豪 30

浪漫的邊界：訪校長沈祖堯 / 李昆澤 33

一樣的軌跡，不同的治術——論兩任中大校長異同 / 陳日東　李敏剛 37

大學理念

大學應以文理為中心 / 陳平原 44

大學的魔咒與解咒 / 戴遠雄 47

社會 · 教育

前言 / 吳嘉倫 56

「校譽」與錢途——中大發跡簡史 / 楊穎仁 58

大學作為社會制度的四個趨勢 / 吳嘉倫 62

不可忽視的有形之手：UGC 如何改變中大 / 李敏剛 66

教資會，一葉障目向何方？ / 劉笑敢 73

追求卓越？大學排名評分初探 / 吳嘉倫 81

四年制下學科及學生的轉變 / 鄧權偉 85

與狼共舞的遊戲——嶺南大學現況與策略 / 鄧權偉 87
知識轉移在中大 /鄧權偉 90
象牙塔與群眾——傳媒作為知識轉移橋樑的可能……不可能？ / 劉偉琪 91
改變世界的不完美——訪問社會學系教授趙永佳 / 陳秉鳳 94
教職以外的教與研——訪何佩然教授 / 胡蘇 98
大學教育與專業資格 / 吳嘉倫 101
2003-2012 本科一年級收生人數 103
2003-2004/2012-2013 主修課程要求比較 / 吳嘉倫 106

中國・香港

前言 / 陳嘉銘 110

南來北往

走不進本地，離不開內地——一位內地本科生的校園生活 / 劉子僑 113
香港只是其中一站——訪問內地研究生 / 劉子僑 115
如果可以的話，算我做一份子吧 / 陳嘉銘 118
假如這只是內地生的問題 / 陳嘉銘 122
這麼近，那麼遠——機會結構之轉變與期望的落差 / 呂大樂 125
本地大學生北上就業意願調查 / 何敬熹 130

深圳分校

鳥籠內的鳳凰——深圳分校點評 / 陳嘉銘 131

反攻大陸

新北進精神 / 陳健民 137
香港正能量：中國 NGO 的黃埔軍校 / 梁正燁 140
中港公民社會如何交流——訪青年公民社會 / 胡蘇 143
始於一個承諾——訪問 Francine / 陳秉鳳 146
中港關係的另一面——殺人的資本與掙扎中的工運 / 陳秉鳳 150

八九六四

中大與八九民運雜談 / 莊耀洸 153
當15萬變成基本盤 / 馬嶽 156
淺談《中大學生報》六四特刊之轉變與不變 / 陳嘉銘 158

教學．師生

前言 / 何敬熹 164
四年制：中大的理想和身份 / 馬嶽 166
大類招生實施的影響與困難——訪問陳竟明教授 / 陳秉鳳 170
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的使命和實踐 / 梁美儀 174
重「研究」、輕「教學」是迷思？——專訪吳樹培 / 何敬熹 178
中大的教學改進——訪中大「學能提升研究中心」主任潘偉賢教授 / 吳嘉倫 181
大學的「老師」 / 吳嘉倫 184
不認不認還需認——導師正名（節錄） / White Wood 186
大學教育，在語言迷宮中摸索前行（節錄） / 蔡寶瓊 188
走進生命的學問 / 周保松 193
教學專訪——尹翠琪教授專訪 / Gemini 197
我只能給他們一個概念——張彧暋 / 何敬熹 201
如何改變，改變甚麼？——訪問領袖課程統籌梁啟智 / 何敬熹 203
學而 / 守仁 206
「真係想做，就唔係莊務！」——專訪上莊狂人 Javier / 何敬熹 209
Internship——學習？打雜？ / 何敬熹 211
週會，去來做乜？ / 小學咪 215
外地生看中大（節錄） 217
大學生自白 / 周松齡 221

校園．日常

前言 / 譚焜 226
看見校園與藝術——校園藝術小輯前言 / 洪曉嫻 227
看似公共的文化中大 / 阿三 228
抗議行動藝術拾遺——記另一種中大藝術史 / K 233
校園藝文地圖 / 湯映彤 238
頹飯粗略考 / henryporter 240
眾志堂頹飯的沉淪 / henryporter 243

中大體育：大學教育 / 李峻嶸 246
唔講都唔知——網上學習平台改革 / 松 249
好彩有CUTS——訪問開發者Benson / 奧奇特 253
數碼化的中途——記中大圖書館十年發展 / Czior 255

道德・身份

前言 / 杜振豪 260

從迎新營到性騷擾

求助無援的校園性騷擾——2002年迎新營事件 / 洪曉嫻 262
那年之後，當媒體遇上迎新營…… / 陸明敏 264
還生者公道，讓死者安息
——中大性騷擾事件聯署聲明（節錄）/ 中大性別平等關注組 267
黃燕雲事件時序表 / 周松齡 269
莊耀洸專訪：評中大性騷擾政策 / 周松齡 271
防止性騷擾委員會歷年大事 / 周松齡 275

奪回宿舍性空間

回應《大學線》報導：宿生放肆食榴槤　難為了同房 / 洪曉嫻、陳玉峰 277
回應《大學線》報導：宿生自治　唔關性事 / 洪曉嫻、陳玉峰 279
輕石激漣漪——中大生「蒯湯石」行動（節錄）/ 李雨夢 281

講粗口的學生報

寫在粗口・十年後 / 王邦華 284
道德高地的虛妄——答一眾對學生報粗口標題的詰難 / 中大學生報 287
對道德的兩種區分——借楊國榮及鄧小樺的觀點談學生報刊登粗口事件 / 曾瑞明 295
困難的話（節錄）/ 鄧小樺 298

健康生活・上進青年

我的吸煙大學生活 / 覃俊基 305
哀痛之難 / 李智良 308
對唔住，我想…… / 子僑 311
笑甚麼？你也是頹學生！ / 梁靜友 315

運動・角力

前言 / 陳秉鳳 318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中大十年抗爭史 / 鄧權偉、陳秉鳳 320

基層勞工血與汗 / 陸明敏 331

也許只是冰山一角——十年來勞工抗爭事件簿 / 陸明敏 334

任重而道遠——訪問員工總會理事吳曉真 / 陳秉鳳 338

中大女工合作社紀事 / 陳正恆 343

中大學生會：十年評點 / 李敏剛 347

中大學生報十年浮沉 / 劉子僑、羅奕媚 357

四代電台人——記中大校園電台十五年歷史 / 區諾軒 361

中大學生會代表會的制度問題——由零八年修章說起 / 吳銘基 369

從八樓之爭到退聯 / 吳嘉倫 372

地方・規劃

前言 / 羅奕媚 378

十年校園規劃事件簿 / 彭梽樃、羅奕媚 381

中大校園發展計劃簡介 / 周松齡、吳嘉倫 387

中大2012驚爆內幕（節錄） / 怕你西條毛 390

談空間規劃——關於我地的規劃 / 譚焜 393

那些我今天才知道已經變成這個模樣的中大路邊風景 / 德 398

校園地方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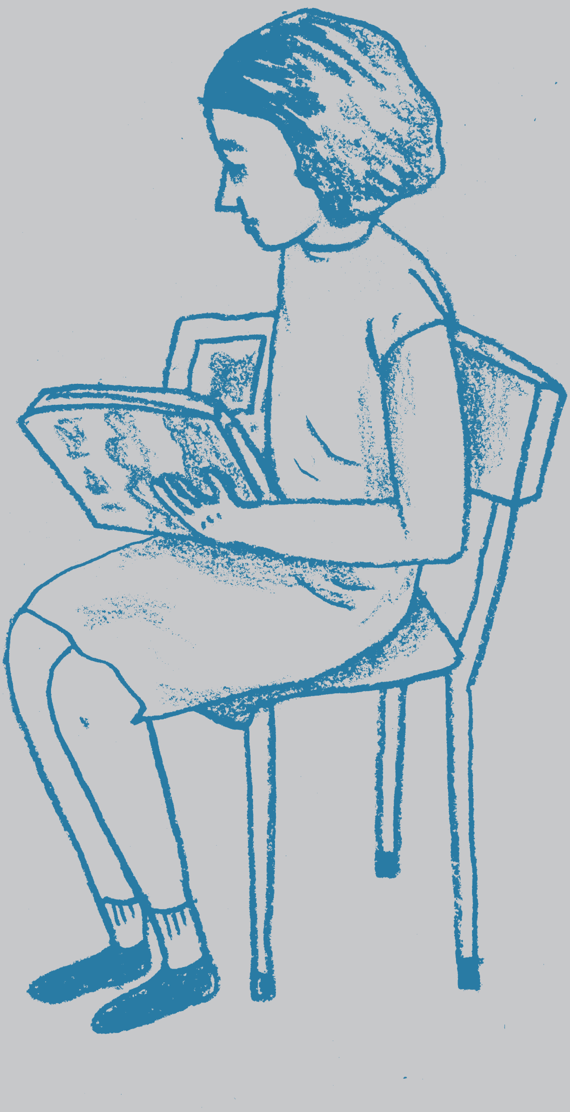
- 過客、抑或歸人——中大行路誌 / 謝欣然 402
- 築動人心——綜合教學大樓 / 吳倩婷 403
- 隔絕——UC草地 / 熊貓仔 404
- 一路之隔——白石角 / Glen 404
- 結緣——珍can / 胡雪婷 405
- 二、三事——范克廉樓3樓 / V某 406
- 依靠——許讓成樓 / 王靖婷 407
- 為了有生命的土地——UC小農社區 / 吉秋爽 408

如果我們能連結——訪問中大不同的持份者 / 陸明敏 409

人像．群體

前言 / 陳秉鳳 416
追憶我和阿輝的交往 / 雷競璇 418
校園的流浪學人：中大怪婆婆 / 莊耀洸、譚啓禧 422
宅男的怒吼 / 陳秉鳳 424
不為威風 / 湯映彤 429
其實我地欠左佢地——訪關綜聯組織幹事歐陽達初 / Kelvin 433
抱著問題　成為自己 / 湯映彤 437
藝術不藝術 / 湯映彤 442
CU始終有你 / 天同巨門 448

理想・傳統



前言

◆ 李敏剛、陳嘉銘

過去十年，不少在中大發生的爭議，各方往往都會動用理想和傳統這一套語言，來為自己的主張護航，或至少證明那些主張不至於跟理想和傳統有所抵觸。在這部份，我們會檢視部份近十年涉及大學或中大理想傳統的爭論。

書院

除了中文教育之外（這部份在卷一及卷二「國際化事件」有梳理），其中一個環繞中大理想的重大爭議就是書院制或書院精神。中大另加五所新書院的決定，無疑是引發爭議的主因之一。究竟在面對大學由三年制改為四年制，學生人數進一步膨脹之下，成立新書院到底意味著甚麼？由是，我們簡單整理了事件的時間表，同時轉載了校方籌辦新書院的理據，以及中大學生會的反對聲明。其中學生會的聲明除了針對校方「假諮詢」之外，亦同時對新書院理念空洞化表示擔憂。他們認為，新書院主要提供住宿和全宿共膳的計劃，沒有明確的思想指導和特定氛圍，最後只會徒具形式。這些批評，至今仍然適用。

另外，我們亦收錄了兩篇新書院成立後的評論。陳嘉銘的文章〈「新」書院院監會，或曰政治花瓶〉是從制度的角度出發，點出新書院的自主性將遠遠不如原有書院，變相削弱了書院制強調書院獨有的精神。至於李敏剛的文章〈你的Admin如何，你的文化也必……〉則對此觀點提出了異議，指新書院的自主性不見得比原有書院少。不過，他卻認為新書院的自主性本身未必是好，理由是即使書院有自主性，也得看由誰來把持書院的發展方向。若然這班掌權的人懶理書院的發展和學生的人格培育，自主性也難以催生到我們渴望的書院精神。

水塔

除了新書院成立外，另一個叫中大人重新思考書院精神的事件，則是舊書院的擴展工程。其中相對具代表性的，莫過於新亞書院建造第五宿舍的決定。自2006年起，新亞書院已開始籌劃興建第五舍堂，而在2013年4月，院方表示會以新亞網球場作為選址，其後引起了不少反對聲音。當時《中大學生報》李昆

澤的文章〈不止於水塔景觀：再思新亞第五宿〉就清晰地交待了籌劃興建第五舍堂的主要爭議，同時嘗試分析網球場以外其他方案的利弊。

事實上，當時一個反對院方在網球場建宿舍的重要理據，是擔心建築會阻礙新亞水塔的景觀，其中有近300個中大師生聯署的《請珍惜新亞水塔》聲明就是用此一觀點。更甚者，反對者還會將水塔之景觀跟新亞精神緊扣一起來理解，而陳日東的〈新亞水塔的人文教育〉就正好印證這一邏輯。可是，文中卻鮮有闡述維護水塔的景觀如何跟新儒家的教學理想拉上關係。例如當年新亞創校初期，書院沒有甚麼資源，新亞先賢日間在桂林街校舍教授中國文化，晚上就在校舍與大陸流亡的學生拼桌而寢，這絕對稱得上是新亞精神的寫照。但到底水塔的景觀如何體現「誠明」、「艱險我奮進」、守護中國傳統優良文化等種種新亞人珍視的價值？作者都沒有清楚回答這些問題，他彷彿已假定讀者會明白新亞精神和水塔景觀的關係。何謂「新亞精神」的內容，作者也沒有作細緻的說明，他只是表示水塔是代表新亞精神的價值觀。這不禁叫人疑惑，所謂的書院精神會不會已成為一個相當空洞的符號，而他們所守護的只是一個無甚意義的圖騰。儘管如此，此文也的確體現了上一輩的校友，會挪用書院精神這個圖騰，來對抗校方擴展工程的思維。

有趣的是，在水塔事件發生前不久，2012年10月爆出工友宿舍迫遷事件，（見卷三「運動．角力」，〈也許只是冰山一角——十年勞工抗爭事件簿〉）因校園發展需要，校方將職工宿舍改建為學生宿舍，工友因而被迫遷。其時有過千人聯署聲援工友，卻沒法改變校方的決定。但值得留意的是，聲援被迫遷工友的主要是在學學生；反之水塔事件的聯署發起人大都為擁有社會地位及影響力較高的校友，而他們的名字並沒有出現於宿舍迫遷事件的網上聯署名單之中。換言之，這班校友集中關注舊書院的圖騰，卻沒有同時關注迫遷事件、為工友發聲。這是否代表了他們厚此薄彼，關注所謂書院精神之餘，卻缺乏對校園勞工議題的了解和關心？兩件事相隔不足一年，引起的回響卻大相逕庭，這樣的結果，值得我們深思。

校長

除了上述所講的書院制與書院精神外，校長的理念和施政同樣是近十年有關理想論爭的重要戰場。儘管當今大學的施政不能完全由校長控制，而且受先前的政策所影響，但校長的大學理念多少也能左右政策的方向。因而，我們認為有必要分析這十年的兩任校長——劉遵義及沈祖堯——之大學理念。

首先，我們轉載了2008年《守衛烽火台特刊》的〈破壞王劉遵義破壞事件簿〉。劉之所以有「破壞王」的稱號，是因為他在任時的「政績」跟中大人所堅持的理念有所違背。這些「政績」幾乎充斥於整本《中大五十年》，暫且不贅。在這裡，我們更希望處理劉的大學理念，因而我

們輯錄了杜振豪的〈劉遵義，一個怎麼樣的校長〉。此文基本上交待了劉的行事作風，一是庸俗的相對主義。例如在頒授榮譽博士予董建華一事上，劉表示董建華是否對社會有貢獻是見仁見智，但杜的評論正好點出劉氏這種庸俗相對主義的底蘊，不過是赤裸裸的權力。另一種作風則是 Problem solving 的心態，只講用甚麼辦法解決問題。可是，這種看似不講意識形態的想法，本身就包含了意識形態，因為如何界定問題和解決問題，其實牽涉權力鬥爭。

繼任劉的沈祖堯，則予人一種截然不同的處事風格，但事實是否如此？〈浪漫的邊界〉寫於沈續任前夕的2013年，文中檢視了他任內的一些重要政策。總括而言，沈所做的都是小修小補——語文政策只集中推廣中文學術期刊，至於中文教學就沿用舊有的系統；深圳分校他又坦言學術和表達自由有極大的限制，儘管他表明會捍衛當地學生發聲。另一點值得留意的是，文章指他任內的校園民主程度仍然強差人意。例如校園規劃、校園發展方向、校長遴選等等，中大校方都不過是採取舊有的諮詢模式。這不得不叫我們反思，劉跟沈的大學理念是不是真的有天淵之別。

陳日東和李敏剛的文章〈一樣的軌跡，不同的治術〉就正好回應了上述的問題。他們指，劉和沈在處事方式上確實有一定分別：劉總愛霸王硬上弓，讓商業邏輯全面進佔中大，結果造成中大社群撕裂；反之，沈則較重視他人的評價，考慮對外的形象，能緩和校方v.s.中大人的矛盾局面。但即便如此，沈祖堯卻絕非開明的改革者。與前一篇文章觀點一樣，陳李都指出他極其量可以小修小補。更重要的是，作者指出沈管治下的中大，人治色彩轉濃：當中大人不滿某項政策時，他不時會利用校長的權力去回應中大人的訴求，完全繞過制度。他只不過是因應時勢去滿足各方的要求，務求暫時將問題壓下，而這種做法其實完全無助於改變既有的有問題的制度。

大學理念

最後，我們回到有關大學理念的思考。之所以回溯大學理念的爭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要回應劉校長將大學比喻為茶餐廳的想法：大學和學生難道真是商店和顧客的關係？因而，我們找了兩位學者去梳理有關大學理想的討論。中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的文章〈大學應以文理為中心〉就開宗明義，反對大學把經濟管理一類的學科看得比傳統文理學科為重，認為大學偏重商業科系的做法，是偏離了大學理應重視人文教育的理想。這大概是最常聽到有關大學應體現「人文精神」的論述。

至於戴遠雄的文章〈大學的魔咒與解咒〉則由歷史和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回應當下大學理想的兩套主流論述，而陳教授的文章當然是其中一個對象。戴文指出，即使大學是培養人文精神、給予

學生思想自由去追求真理的地方，我們也不能將這些理念獨立於當地的政治和經濟網絡來理解，因為這些網絡在在會影響這些理念的落實。另一方面，作者又指，把大學純粹視為企業僱員的培訓所，只會繼續讓新自由主義主導，扼殺了他心目中的大學理念——大學作為異議空間的可能。他認為大學理應是連結社會不同的抗爭力量，反抗不公義和霸權的場域。

在未來的日子，中共、特區政府以及商業邏輯會如何影響校園的格局，這還有待觀察。但筆者相信這部份會為讀者提供資源，去思考和應對中大日後的發展。

新書院事件時序簡表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10年1月號

2005年

10月

中大校方發出《策略計劃草案大綱》，首次公開表示探討成立新書院。

11月

校友評議會提出「大學應重新檢視現時的書院制所面對的問題，以期鞏固書院精神以及中大精神，凸顯中大的特色」，以及「倘若再籌建第五間書院，必須先確立該書院的立院精神、教育理念及其特色，並注意如何與中大精神及辦學宗旨結合」。

2006年

2月

《策略計劃》公佈後兩星期，「新書院研究小組」發出《六所美國和英國大學／學院的書院教育考察報告》，小組唯一的學生成員陳思樺由大學高層私下邀請，普羅學生毫不知情。

中大校方公佈《策略計劃》的最後版本，確認成立新書院時應確立其教育理念，並指大學「應立即成立工作小組，成員至少有行政人員、教師、校友和學生各一位」，擬定新書院的願景和可能模式。

4月

中大校董會於4月25日通過新書院研究小組的最後報告，計劃成立一至兩間300-600人的全宿共膳新書院，及一至兩間約1,200人，非全宿共膳的中型書院。

5月

報告公佈後不足一個月，中大校董會於5月23日通過成立晨興書院（300人）及善衡書院（600人）。

8月

莫理斯及辛世文分別被委任為晨興書院及善衡書院的院長。

2007年

5月

中大校董會於5月22日通過成立敬文書院（300人）及伍宜孫書院（1,200人）。

7月

立法會二讀通過修改《香港中文大學條例》，宣佈晨興書院及善衡書院為中大成員書院，動議草案的張文光議員發言時表示「中大承諾一定會用一個公平和合理的原則，來處理8或9所書院如何選擇代表進入校董會的問題」。

10月

中大校董會通過成立和聲書院（1,200人）。

2008年

1月

立法會二讀通過修改《香港中文大學條例》，宣佈敬文書院、伍宜孫書院及和聲書院為中大成員書院。

6月

劉允怡被委任為和聲書院院長。

7月

晨興書院及善衡書院動工，預計於2010年建成。

中文大學校董會為成立新書院制訂指引

原為中大傳訊及公共關係處網上新聞稿，2006年4月25日

香港中文大學計劃成立新書院，以容納因本科課程恢復四年制而增加的本科生，進一步發揚書院制優點，保持書院親切融和的學習環境，為本科生提供優質的非形式教育和關顧輔導。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今日審議新書院研究小組的最後考察報告，並為成立新書院制訂指引。

大學本科生課程將於2012年恢復四年制，中大的本科生將增加約3,000人，如果不成立新書院，則每間現有書院的學生人數將由目前的2,500人增加至超過3,200人，這樣將影響書院親切互動的師生關係。況且，並非全部現有書院皆預備在未來數年繼續擴展，因此成立新書院以容納新增的學生，實有迫切的需要。

根據中大校董會於2006年1月通過的《策略計劃》，中大將成立一間或多間新書院，而由校長委任的新書院研究小組在一月中訪問六間英美成功推行書院制的大學，並於2月16日在網上發佈整份考察報告，隨即進行廣泛諮詢。期間小組主動安排了18次簡報會、論壇及諮詢會，小組的主席及成員曾與約5,000位教職員、學生及校友會面及聽取意見，也曾與四間書院校董及大學校董交換意見，並收到19份意見書。大學師生普遍同意成立新書院。由於籌劃及興建新書院需時數年，籌備工作須盡早開展。小組綜合各方面的意見，並向大學校董會提交最後報告。

中大校董會今天舉行會議，審議新書院研究小組報告，並制訂成立新書院的指引，要點如下：

1. 新書院的使命及願景必須符合中大教育使命

大學重申書院的共同理念是建立一個關係密切、互相交流學習的師生群體；提供關顧輔導、全人教育，及一個親切融和的書院生活和學習環境。以這個理念為基礎，新書院應有其使命和願景，作為書院發展的導向和重心。新書院的使命及願景必須符合中大的教育使命，並以學生的教育和福祉為依歸。

2. 成立不同模式的新書院讓學生有多種選擇

大學認同小規模、全宿及一起用膳的書院模式，是建立及培養親切互動與和睦關懷的師生群體的要素。大學計劃成立一至兩間小規模（如300至600人）的新書院，新書院將為所有同學提供在四年肄業期內的住宿，所有同學須參加書院的膳食計劃，在書院飯堂進膳。大學明白並非所有同學都接受全宿及一起用膳的模式，亦計劃成立一至兩間中型規模（如1,200人）、非全宿的新書院。

中文大學非常重視書院制，並肯定現有四間書院的重要性，剛成立的大學與書院協作小組將研究如何加強大學與書院及書院之間的良好協作關係，優化書院制。成立新書院是中文大學長遠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大對發揚書院制的承擔，大學會繼續聽取如何優化書院發展的具體建議，讓大學成員共同為建設和發展中文大學作出努力。

2006年4月25日

中大牽起惡性競爭　學界進入黑暗年代
——對中大校長（兼個別校董）的批評

◆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原為中大學生會於2006年6月6日發出的公開信

對於劉校長以中環價值治校，扼殺人文精神，為發展而發展，妄建兩所新書院；又大耍公關伎倆，發動輿論攻勢，取代理性思辯，放棄教育工作者以身作則的基本情操，我們感到非常痛心和遺憾。

中大籌建新書院，並非個別院校的事，我們相信，它標誌著香港高等教育界進入一個惡性競爭的黑暗年代。而劉遵義校長，作為本地龍頭大學的大旗手，在催生新書院過程中的拙劣表現，以及牽連甚廣的負面影響，都值得關心下一代的市民深思，是故，我們特撰此文，冀能引起更多的關注和討論。

玩弄數字，誇張失實

校方一直強調，三改四會令中大一下子增加三千名本科生，所以新書院的興建，刻不容緩。但有學者指出，由於出生率低企，根據統計處及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資料，我們有理由相信，大學三改四，並不如校方所言，會出現新生飆升的情況。

事實上，在3月18日的諮詢會上，一群來自教育界的校友就質疑，不少中學正受著縮班殺校之苦，三改四即使導致收生增加，也是三數載的事，高峰期一過，增建的校舍和設施很可能使用不足，造成資源浪費。廖柏偉副校長起初支吾以對，但經不起洶湧群情，最終透露了玄機：「未來，其他院校所收的副學士將會越來越多。」

我們認為，此話有兩種含意：第一，三改四只是幌子，興建新書院，旨在擴充，以掠奪其他院校的本科生；第二，三千人之數，有很大水分，它的出現，並非著眼於怎樣和其他院校互相配合，共同承擔社會責任，而是本著生意越大越好、哪管他人死活的商業原則，肆意擴大自己的力量，漠視其他院校的生存空間。

事實上，劉校長曾多次表示，現有書院的規模，不宜擴充；但一轉頭，校方又答應了新亞校董會，撥款六千萬支持新亞書院增收學生800人，輕易打倒昨日的我。這便足以證明，興建新書院的主

要理據，並不成立，只是煙幕。校方的如意算盤是，藉機擴充，以規模取勝，雄霸高等教育界。只要令公眾——特別是捐款者——認同，給予支持，理由是否屬實，已不重要。

花言巧語，蠱惑公眾

書院制，是中大特色，校方經常吹噓。可悲的是，對於現時書院制的缺失，校方一直視若無睹，妄顧現時四間書院同學的權益，關於新書院的創校精神和理念，亦含混其辭，推搪說在書院成立以後自會形成。這種不負責任的做法，顯示校方並非有心辦好書院制。因為，一間書院，須有整全的治校理念，融匯於日常教學和宿舍生活中，才模塑得出有識見、有個性的學生來，像校方提倡的小型書院住宿和膳食計劃，沒有明確的指導思想和特定氛圍，只會流於空洞化和形式化，最終尾大不掉。

事實上，中大僅花兩三個月，便將有名無實的新書院計劃推上馬，如此輕率，如此反智，絕非一所優秀大學所為，究其原因，除了急需一個賣點，以書院的冠名權換取遠比興建單幢宿舍更多的捐款，實在想不出其他理由。有了錢，規模得以大大擴充，一方面可吸引更多好學生，以其優良成績贏取更多的資源和威望，另一方面又更有條件增收非本地生，廣開財路，背後的邏輯，與大推偽國際化，同出一轍，都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背棄教育工作的基本信念，逢迎市場至上，推行盲目改革，一心以增加收入為目標。這種本末倒置的企管方針，在中大積極提倡之下，必引來其他大學仿效，造成惡性循環。

中大校方把「人影響人」的良心事業，當一盤生意去營運，還用美麗言詞去包裝。蠱惑公眾，莫此為甚。

粗製濫造，掌控結論

新書院計劃，乃建基於「新書院研究小組」的考察報告之上。新書院研究小組於一月成立，往英美旋風式取經，那時候，中大十年策略計劃尚未定稿，是否興建新書院，理應沒有定論，小組的做法明顯偷步。更匪夷所思的是，短短一個月，小組便考察完六所大學，並且寫好報告，交給校方，它的粗製濫造，可想而知。

事實上，報告內容非常單薄、貧乏，而且極不中肯，就著收生增加的問題，它沒有提供不同解決方案，加以分析利弊，深入比較，而是充滿引導性的指向一個結論——興建一間或多間新書院。在一次諮詢會中，小組主席廖柏偉副校長更親口承認，報告並無 insight（真知灼見）可言。對於與會者批評報告先有結論，再堆砌理據，而這些片面理據只須上網搜尋，毋需勞師動眾、大耍金錢，前赴外國索取，廖教授只是一臉無奈，未有回應。

貴為本港知名的經濟學者、政府智囊，何以會如此失職，向校方提交一份糟透

的報告，我們實在無法理解，希望廖教授向本港市民解釋一下。但不論如何，「新書院研究小組」的差劣表現和不負責任的態度，我們實在無法苟同，不得不加以譴責。

門面功夫，浪費公帑

這次考察之旅，得出一致劣評的結果，不論是小組無能，抑或無心做好一份報告，都證明浪費公帑，問題是浪費得多不多。

然而，校方一直沒有交代，這個集副校長、書院院長、教授、評議會主席及一名所謂學生代表而成的考察團，總共花費多少？

另外，校方進行了十八場諮詢，聲稱和近5,000名教職員、學生和校友會過面及聽取意見，但所謂諮詢，不少是諸如書院周會、校友聚會這類校內常規活動，參與者事先並不知情及毫無準備，所佔時間少至十多二十分鐘，諮詢的誠意和效果成疑。更值得批評的是，所謂收集意見，只是校方用來表現開明的門面功夫，並非真心誠意的舉動。一大群校友，基於新書院計劃大而無當，要求延長諮詢期，被校方堅決拒絕，而諮詢後所出的報告，基本上與初版無異，便是最有力的證明。

花費如此多人力物力，所做的盡是假諮詢、假考察，不單浪費公帑，更加愚弄了所有真心關注中大發展的持份者。

黑箱作業，自把自為

在籌建新書院的過程中，有很多重要的具體細節，至今仍不為中大持份人所知，例如，新書院的選址和挑選原則、對自然環境和活動空間受影響的評估、校方的工作計劃及進度表、財政及人事安排等等。事實上，不單中大員生及校友蒙在鼓裡，連新亞校董會副主席梁英偉校友，也是於3月5日，即諮詢期過了超過三份一的時候，才在一次校友活動中，得悉校方正籌建多間新書院，可見中大黑箱作業的程度，已達至何等嚴重的地步。

對於中大興建新書院，政府沒有表態支持。但問題不是如此簡單。廖柏偉教授透露的玄機「未來，其他院校所收的副學士將會越來越多」使我們懷疑，校方和政府之間，可能有某種檯底交易。若然，是怎樣的交易？會不會是為教統局鋪路，中大先擴充規模，準備吸納其他院校的優秀學生及資助學士學額，以便將來把本地大學硬性規定為研究型或教學型，把資源集中在前者，後者主力開辦自資副學士課程，而中大就早佔先機，成為研究型大學之首，從中得益？若不然，沒有政府或明或暗的資助，中大如何長期獨力應付因過度膨脹而增加的龐大開支？會不會加劇教學的商品化和市場化，更無節制地招收大量非本地生（以內地生為主）來開源，損害本地學生的基本權益，又或大幅削減中下層員工的薪津來節流——我們收到消息，很多工作多年的員工，在不久將來，將

不再獲分配校內宿舍，變相削減福利，而大量宿舍即將拆卸，重建為高樓大廈──違反社會公義？

無論是哪一種可能，中大都是打算以三改四為幌子，把個別大學（高層）有形或無形的利益──例如香樹輝校董以辛翠時之名於5月22日《星島日報》所寫的文章，充分表露校方高層貪慕虛榮的個性──凌駕於公眾利益之上，而不是透過高等教育界的內部商議，以公平及公開的方法，分工合作，解決通盤問題。這種作風，絕不光明磊落，而且可以想像，其他院校面對中大不按牌章的挑戰，一定不會坐以待斃，大家鬥「走精面」，產生惡性競爭。最近，有大學推出一系列名師補習社似的廣告，正是大學淪為學店的訊號。

劉遵義校長在5月16日的公開信中，提到要為香港培養品格高尚的新一代。中大學生會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而要不空口說白話，刻下正是一個好時機，先讓我們重新審視中大現有的問題，特別是種種書院制的缺陷，大家從長計議，再籌劃將來。千萬不要急於求成，以為辦新書院只是籌款、建校舍及招生的總和這般簡單。

因此，中大學生會盼望劉校長，能以身作則，展示一個學者的氣量和胸襟，暫緩新書院計劃，重新認真和深入地諮詢，並腳踏實地，先處理好中大千瘡百孔的管治問題──例如《齊來保護我們的山城》（http://www.cusu.hk/cecg/sign.php）有多達2,500人聯署支持，反映校方的環境保育工作徹底失敗。希望劉校長明白，中文大學，不是個別人士攫取功績和名聲的踏腳石，亦不是侍奉商界和大財團的俱樂部。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2006年6月6日

「新」書院院監會，或曰政治花瓶

◆ 陳嘉銘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10年1月號

大學行政架構乃決定書院及中央政策的一個重要核心，而五間新書院的行政結構是否獨立，對日後它們各自的發展方向實在影響深遠。相信同學大都以為新書院跟原有四書院在行政架構上沒有太大分別，不過我想列出以下三點，務求令同學明白新書院在某意義下，不過是在扮演中大校方的政治花瓶。

一、新書院本身沒有自己獨立的校董會

新亞、崇基和聯合書院都各自有自己的校董會，隨後逸夫院書成立，校方批准逸夫院書設立獨立的書院校董會，原因不過是「蕭規曹隨」，不願於逸夫書院另行一個獨立的行政體制。不過今次籌組的五間新書院校方再沒有「蕭規曹隨」，變相用功能上看似對等的院監會去取代校董會的功能，而這個轉向就令新書院無法持有獨立的捐款。

院監會的功能大致可分為三項，分別是推動書院發展、籌募經費及審批財政預算，跟書院校董會其實分別不大。不過要指出一點，書院校董會作為法團，可以擁有獨立資產，繼而可以自主地決定將資產投放於哪些學生活動及工程上；再者，書院校董會可以拒絕中大校方於書院範圍內建設任何影響其書院環境的工程。

如果五間新書院實行了院監會的制度，上述的實權將完全失去，它們的獨立性自然不能與書院校董會同日而語。筆者當然不知道院監會的實際操作會否跟書院校董差天共地，不過就現時的情況推斷，新書院在資源分配上完全任由中大校方擺佈，再進一步去推演，很多書院行政工作也受中大校方的官僚制肘。如斯「肉隨砧板上」的院監會行政制度不正是跟中大推廣的書院模式背道而馳嗎？

問及校方為何作出這樣的決定，程副校長竟然辯稱是經過深入的討論研究，以及於校內亦有廣泛的討論，才將這個方案呈交予校董會，因應的是「實質操作需要」，這「實質操作需要」不就是進一步鞏固中央校方的權力嗎？

二、新書院在中央校董沒有席位

新書院除了沒有自己獨立的校董會外，中央校董會亦沒有為每一間書院各設一

席位，取而代之的是五個新書院互選一人做代表出任中央校董會。而這位代表是否具「代表性」，真的值得商権，即使五個書院是一個群體，但五間書院的利益各異，這個代表能否表達五書院不同的聲音實成疑問。何況在對談中，這代表會於甚麼時候產生，程副校長表示方案還有待立法會討論，換言之，這代表於新書院成立時是否存在仍是未知之數。現在我們只知道於2010年，即晨興、善衡兩所書院開始收生期間，這個代表一定不會存在，那麼新書院還有甚麼決策權。

誠然新的校董會方案，將會有一席位是由九個書院院長互選一位入校董會，不過按照剛才的說法，這一位院長真的可以反映九間書院各異的需求嗎？校方選擇了互選機制，是因為學校有太多重要的會議，書院的代表沒有可能參與那麼多的會議。不過校董會的性質實與其他會議不同，校董會在法律上是中文大學的管治團體，而決策的實質影響是十分大的，諸如來年中大開支、增設更多新書院的意向、聘請主管人員的資格等等。校董會是主宰整間中文大學發展方向的行政組織，校方利用「九代一」的方案恐怕難以服眾。

三、還是老掉牙的答覆：《宋達能報告書》

校方指出每一間書院其實沒有需要各設一席，原因是要提高其他代表的代表性，「其他人」是指校方代表，抑或是學生代表？答案顯而易見。校方在訪談中往往以《宋達能報告書》為大前提，主導新書院發展的行政結構。

校方的論述其實是選擇地閱讀《宋達能報告書》，《宋達能報告書》指出要改組校董會及教務會是要提高效率，要縮減行政決議單位的席位，沒有指明要減少學生及教師代表。然而現時校方的策略是縮減校董會和教務會的席位同時，不單保留，甚至增加委任的主管人員的比例，且同時剔除了其他書院、學院、學生的代表，這叫均衡參與嗎？

總結

大學堅持以上中央集權的行政架構，對九間書院的均衡發展當然十分有害。而且我們在在見證五間新書院與現在的四書院的權力分配其實十分之不平等。這不平等的權力分配的確會令新書院的獎學金、書通設計、宿舍資源大受制肘。如果根據程副校長所言，所有的決定都交回新書院「自行決定」，恐怕只不過是中央逃避書院問題的又一伎倆。

你的Admin如何，你的文化也必……

李敏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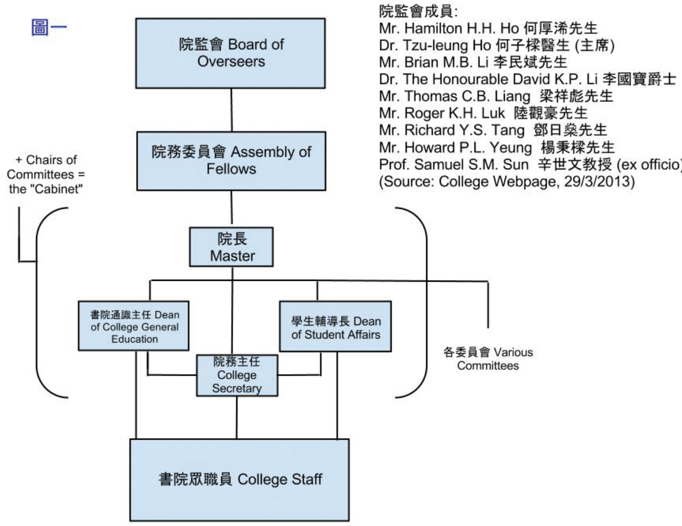
每逢談起中大的書院制，我們往往很快跳到書院精神應該是甚麼的討論。但書院精神或書院文化，大部分都是由其日常的政策，以及所籌辦的活動所定義。這樣一來，負責策劃這些政策和活動的書院院方，很大程度上便是書院文化的塑造者。對新書院來說，因為沒有學生自身的文化和組織傳承，書院官方在定義書院性格方面的角色便更為吃重。到底「書院官方」是一些甚麼人？是甚麼東西左右著他們的決定和行事方式？這方面的分析是新書院相關評論忽略的一環。筆者在善衡書院當了兩年研究助理，算是曾在書院架構的邊緣工作，有一點第一身的經歷和觀察，希望為中大史補回這欠缺的一塊。當然，書院之間的體制人事都有差異，但筆者相信，善衡的種種，其實頗能反映新書院普遍面對的處境。

新書院：獨立於甚麼、不獨立於甚麼？

在新書院爭議之中，有論者擔心新書院的院長的英文名稱由原四所書院的Head變成Master，而且也不是如原來四所書院一樣是校董會的當然成員，中央因此對書院有更大的控制權，這是把新書院降格，乃至矮化書院制度[1]。這樣新書院的文化和傳統的形成，將很受大學中央意志的左右，但現實卻並非如此。

這並不容易三言兩語說清楚，讓我們先由書院的權力架構說起。圖一是善衡書院的管治架構圖：

圖一



善衡書院的院監會是書院的最高權力機關[2]。對比起大學中央和四所舊書院的校董會，善衡的院監會幾乎清一色是書院的捐款人，比例遠比舊有四間書院多。事實上，如果我們細看新成立的幾所書院的院監會，其成員架構都近似善衡書院的院監會，而非像原來的四所書院，學者、教員和不同持份者比例較多（如新亞有耶魯協會和香港大學的推舉校董、院務委員會推舉的代表，崇基則有香港各教會團體的代表，逸夫則有近半為教職員）。由此可見，書院的行政系統，其實是向捐款者而不是大學中央問責。

事實上，新書院相對於大學中央的獨立性也在實際運作中反映出來。首先，書院的各種重要軟硬基建幾乎不必經大學中央批准；書院通識的課程內容，亦不受制於大學通識部；而一般學生活動，都是書院院方自己規劃和舉辦。收生方面，書院以甚麼方式、甚麼準則收生，也是書院自決，中央亦不過問。因此在獨立於中央這一方面來看，新書院和舊書院其實並沒有太多分別。善衡書院選擇美心集團承辦書院的餐廳，以及選擇星巴克在書院辦咖啡閣，過程並不涉及大學中央。善衡書院選擇為學生提供全宿共膳，以及以高桌晚宴取代一般書院的周會，也並不需要特別得到中央批准，至於高桌晚宴請的是甚麼嘉賓，更是書院的內部決定。

那麼，這是不是表示書院的方針和決策，其實就是捐款者的意思，因此新書院就猶如中大拱手把部分教育學生的權力送予一班有錢人，也就是「割地」？這並不容易回答。

善衡書院捐款者的確在書院留下不少刺眼的痕跡：善衡書院的禮堂（同時也是餐廳）命名為何善衡館，牆壁上鑿上了「養育劬勞」四隻大字，下面則是一列何氏子孫的名字，把中大的建築逕自向私人致意（見圖二）。有一陣子，則由於何子樑的夫人突然迷上書法，善衡書院就無端決定請來書法老師開書法班，「與學生同樂」，而院監會主席何子樑則例必每月到書院一次，約見學生，書院高桌晚宴也近乎每次出席。

圖二：何善衡館的牆壁上鑿上了「養育劬勞」四隻大字。



但一如我們不會認為中大校董會可以鉅細無遺地決定中大的政策，書院的院監會也一樣。善衡書院的院監會開會並不頻密，只是約數月一次，這樣院監會雖然是最高權力機關，對政策落實的影響其實有限。更多的情況，是由書院的官僚系統具體規劃書院的政策，院監會只是作審批。這樣的權力架構下，書院行政方面提出的政策建議，雖多半主動迎合捐款者意見和口味，但同時也有相當大的主導權和自由度。因此，影響新書

院文化和身份成形的最重要因素，固然不是大學中央的要求，但也不只是新書院的院監會。書院的官僚系統自身，也有重要的影響力。

官僚主政的書院

學生輔導長、書院通識主任和院務主任在書院系統中排名第二、三、四。其中，前兩者由教師（一般是教授）出任，是不受薪的兼任，正職仍是自己的學系或學院。院務主任則是全職的受薪大學高級行政人員。因為是長期且全職在書院工作，掌實權的往往是院務主任。以善衡書院為例，書院通識主任大約一星期才到書院和職員開會一次，輔導長則較多，亦不過一星期兩三次；而學生輔導處的大量運作都是由院務主任統籌，如宿舍管理、高桌晚宴的安排、海外交流和社會服務等。就以書院早前發生的星巴克風波為例。善衡書院在2012年底宣佈引入星巴克承辦咖啡閣，引起一些中大學生的反對，善衡書院學生會因此舉辦全民投票，表決是否支持星巴克在善衡出售咖啡。[3]在事件期間，和學生開會、書院對外的口徑，都是由院務主任與學生輔導處職員統籌制定。

也就是說，新書院其實擁有一套獨立於中央的官僚系統。因此問題就是：這樣的架構，會對書院政策乃至文化的形成，構成甚麼限制？再進一步的問題是：原來四所書院也有相同的官僚架構，其中官僚人數甚至更多，只是它們的校董會並不見得由捐款者主導而已。這樣一來，原來的四書院，是否也和新書院情況相若？

官僚系統與教育理念的張力

如果以善衡的情況來看，這樣的一個官僚系統帶來的，就是過度的管制和偏重門面工作。就以書院的空間管理為例，善衡書院以「家」為理念，如果真的視書院上下老師同學都是一家人的話，那麼書院起碼應該有很多公共空間——我們何從需要在自己家中填form book房間用？再者，給同學多一點公共空間也是對同學的一種信任——信任同學有自我管理和在空間發揮創意的能力。但現實卻是，善衡書院內幾乎每一寸空間都是有人「管」的，同學或團體使用時也有很多限制，而且有程序繁瑣，動輒都會犯規。

例如書院的所有戶外空間，幾乎都是由書院管理，其中有些空間的劃分相當荒謬，如書院草坪可以借出，但卻只限淺色階磚地而不包括草地（見圖三）。書院也聲稱重視對同學的心靈輔導，因此特別有一間輔導室（名為心靈加油站）供同學用以靜思，舒緩情緒，卻竟然要預先預約，表格上還要簽署免責聲明，保證不會損毀內裡的設施，否則書院有權罰款。從這兩個例子，可見書院的空間管理如何嚴厲得過份。



圖三：善衡書院的草坪。

為甚麼「家」要有這麼多的程序和罰則？這正正顯示，對善衡的官僚系統而言，有效管理空間的重要性壓倒了書院的理念。對學生的信任並沒有績效可以量度，反而萬一出了甚麼閃失，職員更隨時要承擔責任。因此，他們實在沒有誘因去放鬆對空間的管理。

管理嚴厲以外，還有大量的門面工夫：書院的高桌晚宴，嘉賓大多都是達官貴人[4]；書院的各種設施，都追求美侖美奐；書院的各種要求和品味，也以中上流階層的想像為主。這當然有應付捐款者意思和口味的因素（這些捐款者在法理上和財政結構上，都是他們的「老闆」），但更重要的是，這些建設都是在追逐社會主流容易認可的標準，認為給學生最多最好最高級的物質，就是對學生好；認為成功的商人，就是社會賢達，就是學生值得認識、值得學習的楷模。

由這些例子可見，除非高層（譬如說院務主任，或學生輔導長／院長）對理念有相當的認識和堅持，把書院那些堂皇的抽象理念具體化成政策，否則最後主導官僚系統決策的，只會是門面的成績和管理的方便。這樣一來，一方面管理會趨向嚴厲，而另一方面就是趨向門面工作「交數」，過程中失落的是價值思考。書院上下追求的都是可見於紙面上、可以量化的績效，而不是價值的實踐。當初訂立的所謂書院理念、院訓變成一紙空文，並沒有仔細的反思，也沒有考慮結合實際、落實到具體實踐的問題，而書院最終追逐的，仍然是學生的滿意度，和更多的物質資源。

事實上，這樣的異化趨勢並不只見於善衡書院，也不只限於新書院，原來的四所書院其實亦不能避免，譬如說逸夫書院早已在周會引入高桌晚宴。如果真的有甚麼分別的話，筆者認為，也不過是異化的速度之別。善衡官僚性格的問題，並不見得只是因為善衡的特殊條件才出現。善衡書院面對的問題，其實是整個高等教育欠缺價值思考、由工具理性主宰的一個反映。

神聖的書院自治？

書院制向來被視為中大的一個重要傳統或理念，但由善衡書院這個實例可見，即使書院可以得到相對於大學中央的獨立自主，仍然很容易受官僚思維和社會主流的價值觀所左右。那麼，到底我們所珍視的所謂中大的書院傳統，應該還有甚麼內容？同樣重要的是，如果要落實這些內容，我們到底需要些甚麼制度上和物質上的條件？這都是我們談中大理想、傳統，或所謂人文精神時，不得不面對的重要問題。

1 譬如說，本部份前一篇文章〈「新」書院院監會，或曰政治花瓶〉，就是其中一個十分典型的對新書院的批評。

2 善衡書院的最主要捐款者為何善衡慈善基金會，而院監會的現任也是首任主席何子樑醫生是何善衡慈善基金會董事，基金會主席何子焯博士已年過八十，何子樑則是他的弟弟，二人都是何善衡（恆生銀行創辦人）的兒子。另外兩個主要捐款者則為何添基金會、偉倫基金會（由利國偉創立，梁祥彪為行政總裁），以及陳震夏慈善信託基金會（信託人為何厚浠，亦為院監會成員、何添之子）。其他成員：李民斌為李國寶之子、東亞銀行總經理；鄧日燊為恆生銀行董事、美麗華酒店董事、何添基金會董事；楊秉樑和梁祥彪亦同為美麗華的董事。因此其實整個院監會和幾個捐款基金會，主事人都高度重疊。資料見善衡書院院長報告2013。

3 星巴克風波始末，可見＜星巴克入中大全紀錄＞，《中大學生報》2012年11月號。

4 善衡書院高桌晚宴演講嘉賓：

<u>2010年</u>

辛世文教授（善衡書院院長）
何子樑醫生（院監會主席）
沈祖堯教授（中大校長）

<u>2011年</u>

Mrs. Judy Leissner （President of Grace Vineyard）
Mr. Lau Chi-sun （Wine Journalist）
李歐梵教授
冼為堅（中國文化講座教授）
李少南教授（社會科學院院長）
辛世文教授
何子樑醫生
鄭海泉博士（中大校董會主席）
劉遵義教授（前中大校長）

<u>2012年</u>

Vivek Mahbubani（棟篤笑演員）
麥嘉軒（畢馬威中國香港辦事處稅務主管合夥人）
陳德霖（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
辛世文教授
何子樑醫生
劉明康教授（前中國銀監會主席）

<u>2013年</u>

唐俊業醫生（確進醫療中心總監）
蔡元雲醫生（香港突破機構榮譽總幹事）
黃仁龍先生（前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司長）
林超英先生（前香港天文台台長）

對比2013年崇基學院周會演講嘉賓：
劉大成教授（崇基學院服務學習計劃主任）
黃健瑜女士（中大音樂系管風琴導師）
龐一鳴先生（「一年唔幫襯大地產商行動」發起人）
曾志朗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及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王劍凡博士（中大學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翻譯系兼任講師）
區晞旻小姐（馬寶寶社區農場成員）
蔡子強先生（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陳倩瑩小姐（民間人權陣線副召集人）
林超英教授（中大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客座教授）
麥志豪先生（非牟利獸醫服務協會執行主席）
王維基先生（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主席）

不止於水塔景觀：再思新亞第五宿

李昆澤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13年9月號

自2006年始，新亞書院便開始籌劃興建第五宿，2011年9月，院方已計劃於新亞網球場作為選址。直至今年4月尾的交通及校園發展會上，馮通副校長展示一幅現已被否決的構想圖，當中一棟高達七八層的宿舍拔地而起，令新亞水塔從遠處望去宛如被攔腰截斷。此後不少師生校友發起聯署，更有大量相關報導、評論繼而出現。院方隨之於5月16日與校友、學生代表會面。其後在校友評議會上，一眾學生校友亦就此議題作激烈討論。筆者分別與新亞書院校董會主席梁英偉、新亞書院學生會幹事會會長麥浩然作一訪問，以求梳理整件事的爭議點、宿舍最新進度、闡述與閱讀此文的各位有何關係。

被掩蓋的君子塔？

在各方的爭議中，對新亞水塔與人文精神之理解常被談及，校友們尤其關注從百萬大道望向新亞水塔之景。究竟一座建築的景觀被遮與不遮又有何要緊？建築或空間與人要扣連起來不是易事，若然在建造時傾注了心血，或參與了規劃固然能使人與建築有緊密關係。大部分時候，我們與建築、景觀的關係僅限於使用，以及隨之伴隨的日常記憶。可是一些地標式建築，卻往往因其象徵意義，其景觀所附帶之精神意志而變得不容妄顧。

不少校友同學便對水塔景觀尤有感受，他們在《請珍惜新亞水塔》聯署聲明中寫道：「在新亞生活過的人，大抵都會對水塔有一份深厚感情。水塔高大巍峨，剛直方正，立於中大之巔，有君子塔之譽，隱隱然承載了新亞的教育理念。水塔更會隨著朝暮光影，呈現迷人景緻——吐露晨曦中的水塔，藍天白雲下的水塔，夕陽斜照的水塔，節日亮燈的水塔，各有風景，過目難忘。」[1]

而在百萬大道處望去水塔，是最完整與震撼的角度；在大埔向中大處遠眺，水塔則是中大的辨識與地標。試想像，若然美國的自由女神像、巴西的基督像從遠處望去並非無遮無擋，其氣勢精神想必大受影響，新亞水塔亦正如是。

其實校董會主席梁英偉在訪問中提及了水塔景觀問題，他坦言：「集體回憶呢，就好似以前天星碼頭咁，成個搬走

左，係無左，咁你就會覺得話真係以後見唔到，宜家唔係呀，個水塔係度噶！」「宜家通常集體回憶只係（適用於）成棟野無左噶！」但是否同意此說，讀者大可自行判斷。

景觀與宿位的假對立

或許在外界看來，這又是一場「保育 vs 發展」的對立，但事實並非如此。在水塔聯署中已有以下文字：

「我們關心水塔，並不表示我們反對興建新宿舍。我們深明新宿舍對同學的重要，也感謝書院多年來為此努力籌謀。我們所祈求者，只是希望書院從歷史從人文從景觀著眼，考慮其他選址的可能。故此聯署者實際上由始至終並無反對建新宿舍解決宿位問題，而是祈求從設計、選址入手，盡量避免宿舍落成可能會對水塔景觀造成的永久破壞。至於院方在爭議中亦重申，並非不重視新亞水塔景觀，遂向圖則師要求在最終方案中，宿舍最高點需低於水塔最低點。」

無從逃脫的資金問題

那麼，重新選址不就一了百了嗎？直至目前的討論被提出的選址大約包括：

（1）學思樓與會友樓中間斜坡
（2）新亞停車場處
（3）山村徑芝苑重建或原職工宿舍改建
（4）網球場靠近新亞梯的斜坡

新亞停車場處的選址早於2009年時已曾提交計劃，但因被指影響書院內部景觀而不獲通過，現已少有討論此方案。至於（1）與（4）卻由於造價太貴而無法落實。大學的宿舍建築費大部分來自UGC，即「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由包括上市公司主席等多位「社會人士」組成，負責決定各大學的資源分配。據校董會梁英偉主席解釋，UGC只能提供約1億2千萬的撥款，新設計所需的1億6千萬將有4千萬需要向校友籌款。（1）與（4）的方案因建於斜坡，不會對水塔景觀造成任何影響，但同時亦因其位置，（1）的方案光是打樁已需要1億5千萬，更遑論建成整座大型宿舍。在7月成立的第五宿舍關注小組曾與沈祖堯校長會面，沈校長明言，由於建築成本昂貴，故應盡量避免選址在斜坡位置，而且為了書院之間資源盡量平均分配，校方亦不會有特別資金援助。由是觀之，資金已成解決第五宿問題的一大障礙。

我們還能選擇

在資金問題短時間無法解決的情況下，新亞第五宿的方案是否無太大可改變的餘地？非也！方案（3）是位於山村徑，即蒙民偉樓旁用作由紫霞樓通往本部的路徑，兩棟原職工宿舍坐落於此。這理應是可值得考慮的一個選項。原因大致有二，首先，在改建前兩棟建築已可容納百多戶員工，以每戶二人計起碼有兩百多宿位，如今已經改建為學生宿舍，據消息稱部分宿位會提供予研究生。旁邊亦有國際生舍堂第三座，提供180個宿位，與第五宿計劃中的300人相若。第二，亦為最重要的是，相比起碼2016年才能落成的第五宿，以改建方式解決宿位問題能立馬讓同學入住，對

已在學的走讀生而言無疑更能受惠。可惜，我們卻從未看見，新亞院方在積極提供不同方案予同學時有作多大努力。

或者不少人會對此方案猶豫，因為山村徑並不靠近新亞主宿舍群，擔心書院宿舍生活會因而受影響。但事實上崇基的文林堂，亦是遠離崇基宿舍群外，甚至在中大校門外，文林宿生仍以團結著稱，可見離主宿舍群較遠的方案並非不能成為選項。山村徑雖然屬中央校園範圍，但卻遠不代表新亞院方可以完全不作與校方談判的嘗試。再退一步，即使此兩棟原職工宿舍現部分供研究生使用，又是否代表院方不能在行政上與校方商討？當初崇基「五高」「五低」亦是研究生宿舍，經港九五旬節會捐款改建才成今日模樣。而真正的要點是，院方並沒有積極開放這些選項讓師生選擇。若非如此，在信廣來院長宴請大O籌委輔員於雲起軒討論第五宿時，為何並無提出過改建或網球場選址以外的可能性？

資訊流通不足?

不少同學表示，關於第五宿的資訊流通與觀點整理並不足夠。雖然新亞院方與學生會曾於5月21日在知行大廳舉行公開論壇，但相關的資訊，一直以來大多只在學生會facebook上公佈。大部分相關文件，筆者都需從一個約300人的新亞學生會facebok group中搜索。而且由始至終，均未見書院方有盡提供相關資料供討論的責任，亦不見有整理有關第五宿討論的小冊子出現，方便師生關注或跟進，更遑論在週會派發了。在資訊流通如此不足的情況下，一般學生實難以進入討論，一直以來的參與人數寥寥可數亦不足為奇了。[2]

結語：從固定軌跡走到今日

在5月16日院方與校友及學生的會議上，院方曾明言會研究其他方案，讓將來諮詢時，能讓各師生校友作出選擇。校董會主席梁英偉卻在訪問中對筆者坦言，九月將會供師生校友諮詢的方案已基本有定案，亦不會提供其他方案。

事實上，工程畢竟還需要通過立法會才能決定會否正式上馬，但新亞第五宿除了關乎現在走讀生能否短時間便有宿位與長遠的宿位問題，其影響的水塔景觀亦毫無疑問是中大重要的資產與地標。希望同學在九月份的諮詢會上積極參與，才有機會讓我們的聲音得到聆聽、重視。

第五宿Q&A

1.現時新亞入宿率如何？第五宿又預計於何時建成？

答：據新亞學生會幹事長麥浩然提供，新亞書院現有宿位1,186個，上一個學年本地本科生入宿率為29.6%。至於根據梁英偉主席說法，若能於本立法年度通過撥款並上馬，新宿舍便可在2017年建成。

2. 九月份公佈的最新方案大約如何？

答：根據梁生描述，大致有數項要點，首先新宿舍樓高四層，最高點會大致低於水塔最低點，但由於從某些角度宿舍將在樹林前，所以從百萬大道處望去，原來與樹林融合的景觀將被破開，水塔將如有一底座。另外，相信新方案亦會有一個容納上百人的多用途空間。當然，最確切最真實的方案與資訊，要待院方九月中旬公佈才能作準。

3.第五宿若然影響水塔景觀，新亞學生會幹事會的立場取態將會如何？

答：新亞學生會幹事長麥浩然的說法是：「現時可觀察的共識是，如果新亞水塔被完全遮蓋是絕對不能接受的。」而面對「遮少少會否收貨」的問題，她並無正面回答。

1 〈聯署：請珍惜新亞水塔〉：https://www.facebook.com/savewatertower

2 由新亞學生會幹事會麥浩然提供的資料所見，第五宿舍關注小組於七月成立。正正是為了令一班對於新宿舍建設有意見、有熱誠的同學參與整個計劃的籌備。其組成包括學生會幹事會代表、現有四宿代表、走讀生舍堂代表及所有有興趣參與整個項目的同學。該小組的工作是希望透過集中的資源收集及參與所有有關第五宿舍的事務（如與建築師會面參與設計、召開會議商討新宿舍之安排、撰寫設計及未來管理計劃書等）。同時亦會更積極、集中的發放有關第五宿舍的資訊，希望令每一名有心了解新宿舍進度的同學都能夠接收到有關資料。

新亞水塔的人文教育

陳日東

原刊於《明報》，2013年5月27日

新亞水塔



新亞書院籌建宿舍，資料顯示會遮擋中大的獨特標誌——新亞水塔的景觀，千人聯署反對。新亞校方舉辦諮詢會，交代事件，報章亦有報道。

筆者出席兩次會議，歸納出要點：以校園發展處為代表，關注的是宿舍頂和水塔底相距多少，所以前年選址時，沒全方位考量對完好水塔景觀造成的永久破壞。守護水塔人士心目中的景觀，不能化約做數字問題。水塔這地標，關乎中大人的身分認同，集美感、情意、歷史文化，以至代表新亞精神的價值觀和象徵意義於一身。不全盤考量這些人文要素，只從經濟效益角度看宿位問題，難免取行政之便而捨保育之難。

捕捉天人合一精髓

要考量又從何說起？筆者當日請教了新亞書院院長信廣來教授。信教授專門研究儒家思想，對新亞精神如何融入校園生活，滲透景物作教化之用，自有真知灼見。果然，信教授借唐君毅像，闡釋這位先賢的廣闊胸襟和遠大目光。筆者受到啟發，將這種超越一時利害關係的眼界放諸水塔上。正如不少與會者所言，宿舍不是沒有其他選址。現在亡羊補牢，雖拖慢工程進度，但為了盡早竣工，令中大的重要象徵永久受損，不是更大犧牲嗎？

水塔獨據一方，巍然矗立，挺拔不群的架勢，象徵着中大人特立獨行的精神面貌。其坐落的山頭，綠樹環抱；背靠那一片開闊的天，意象無限。人在山腳往上望，用心細賞，無不傾倒於水塔的非

凡氣派。人和水塔，水塔和自然，連成一體。水塔的設計師，無疑要用具靈性的建築語言——筆直而剛毅之線條，突顯中間燈芯部分如無可屈曲的脊骨——打造絲絲入扣的佈局來捕捉天人合一的精髓。中大人每天經過，多多少少受感染，慢慢氣質會轉變過來。人固然渺小，但只要融入自然，便化為無限。人正是要學懂和大自然融洽相處，學懂順應大自然規律，而非征服大自然，違反天道，最終自食惡果。這套抽象的哲學觀念，一直用最具體又最不着痕迹的方式滲進中大人的記憶裡。人們常說中大校園地靈人傑，絕非胡謅。

教化學子　非保護不可

正因為新亞水塔不是普通一個景點，而是呼應天地來教化學子的藝術生命，當其完整性在不必要的情況下受傷害，才有那麼多中大人感痛心，感到非保護她不可。前院長梁秉中認為這些人是「環保派，很敏感，很注重symbol（象徵）」，新亞校董香樹輝就揶揄他們想法浪漫。言下之意，是他們不切實際，沒考慮過同學的住宿需求。但兩位新亞元老有所不知，守護水塔人士從來沒輕視過宿位緊張的問題。反而兩位的講法暴露了他們對新亞水塔的感情很有限，對新亞精神的具體展現和教化作用相當無知，連宿舍遮去水塔下半身都可接受。發展很難避免，但發展不僅僅等於硬件的增加和改良，而無法量化的景觀和非形式教育的元素總要被犧牲。中大過去受過太多無可挽回的傷害，本部圖書館新翼便是最叫人痛心的例子。現在我們不能再退，新亞水塔便是重視人文精神者的底線。希望新亞校方認真聆聽反對者的聲音，致力尋求兩全其美的解決方案，不要糟蹋前人的心血結晶。

破壞王劉遵義破壞事件簿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破壞王劉遵義特刊》，2008年12月

「破壞王」這個稱呼，對於中大校長劉遵義來說，確實是當之無愧，自從2005年「國際化」事件起，劉生每年必會定期進行至少一項破壞，上至中大的理念、精神，下至校園的景觀，甚至交通，無一不被劉生看中，大肆破壞，茲列小表如下供大家參考！



「國際化」事件（2005）

校方於2005年公佈「國際化」政策，推行核心課程英語化政策，中文不再是中文大學主要授課語言。校內師生強烈反對，批評校方背棄「漢語作育」及「把中文國際化」的創校理想，並侵害教學語言的自主性。學生會隨即發表〈哭中大〉，予以強烈批評，並得到近千名中大持份者聯署支持。另外，不少師生投稿報章，分析母語教學之必要，痛陳英語化之禍害。其後，數百員生於文化廣場集會，校長劉遵義應邀出席，惟在席上並無回應師生的問題，並堅持逐步推行「國際化」政策。

保護山城（2006）

校方大興土木，嚴重破壞校園環境及原有建築特色，學生會在網上發起〈齊來保護我們的山城〉的聯署，有2,500名持份者加入聲討校方劣行。

保樹立人（2006）

中大以維修斜坡為藉口，向當局誇大斜坡的危險度，意欲得到更多的工程撥款進行擴闊道路工程，以增加通向崇基學院的交通流量。工程計劃斬去崇基池旁路多棵老樟樹。師生及校友得悉事件後發起保樹運動，踢爆校方誇大數據及漠視樹木生態，校方最後擱置計劃。

新書院（2006）

在無全面對書院制作出檢討的情況下，突然宣佈中大將增設新書院。兩年之間，在接受數千萬至一億元不等的捐款下，增設了五間新書院。每設立一間新書院時，所有員生都只能從報章處

得知。不少新書院均以受助人的名字冠名，書院的設施及計劃亦與一般宿舍無異，書院的建院理念成疑。

教院風波（2007）

年初政府召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時任教統局局長李國章等，有否迫令教院與中大合併。劉遵義出席調查時，總共以十七次「不記得」回應委員會的提問，明顯地推諉責任。

院長改委任制（2007）

中文大學內的各院院長，原本均由院內的成員推選產生，惟去年劉遵義校長卻取消推選制，改由校長委任，嚴重損害學院的自主性，與校園民主化的原則背道而馳。

情色版事件（2007）

中大學生報出版的刊物，被部份輿論指為不符社會道德。中大校方在缺席聆訊、淫審處未作裁決之前，率先發出警告信予12位中大學生報編委，在受到輿論指責之後，又改口稱之為「勸戒信」。學生報在面對淫審處的覆審以及後來的司法覆核中，均沒有得到校方半點的支援。學生報在高院獲勝後，校方仍然拒絕撤回該警告信。

董建華獲頒榮譽博士（2007）

中大校方決定將榮譽博士頒予董建華，事件引起中大人抗議，近二千人聯署反對有關頒授。劉遵義則於2008年獲委任為全國政協委員，被質疑為「政治交易」。

校園發展計劃（2007）

於去年9月，大學表示已邀得四間設計公司，就校園未來15年的發展進行計劃，並諮詢一個月。校內人士批評諮詢期過短，副校長程伯中當時在一公開論壇上，表示將於2008年內舉行更詳細的諮詢。但是，實情為中大將新建築物拆件逐一向立法會財政委員會申請撥款，另一方面卻繼續進行偽諮詢，諮問員生對校園新建築的意見。今年4月，校方更公開表明只會就2012年後的項目諮詢持份者，相反港大早於2007年已完成由目前至2012年的校園發展諮詢。

校巴收費事件（2008）

校方於本年突然要求校巴乘客出示證件，並對非教職員及學生收取車費，被指為漠視中大外判員工、校友及公眾使用服務的權利。後被踢爆校巴屬無牌收費，校方遂撤回有關的收費。

教務會改組（2008）

今年教資會公佈中大質檢報告，校方選擇性地表示，將大幅削減校董會及教務會人數，以及更改選舉的辦法。新建議卻提議裁減非行政機構成員，反而原本應被監察的大學行政機構成員，卻獲全數保留，意在加強高層權力。

教務會取消學生代表議席（2008）

大開民主倒車，令人匪夷所思。



烽火台事件（2008）

11月《蘋果日報》報導中大因擴建圖書館而計劃拆卸烽火台及「仲門」，中大師生及校友才首次得悉事件。關注烽火台聯席「烽煙四起」及中大學生會於翌週舉辦論壇，近三百人出席，三千人聯署反對清拆。

禁放民主女神像（2010年）

中大校方於6月2日深夜發出公開信，以「大學必須堅守政治中立的原則」為由，拒絕中大學生會將新民主女神像及有關展品永久擺放於中大校園。然而，有份決定的劉遵義，當時既是中共的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也是特區經濟機遇委員會委員及行政會議成員，任內亦曾頒發榮譽學位予董建華、唐英年等政治人物。劉遵義身任多個政治職位，與權貴來往甚密，卻能身任校長，這就是校方所強調的「政治中立」。

劉遵義，一個怎麼樣的校長

杜振豪

原刊於「劉遵義施政監察」出版的《遵義快訊》，2008年4月

在新一期《大學線》（2008年3月）的訪問中，校長劉遵義分別就近年頒授榮譽博士予董建華、校園發展、情色版風波等爭議發表意見。[1]劉遵義在是次訪問中清楚地表明的立場和想法，不僅為思考近年的校政爭議留下不少線索，也令我們進一步認識到他，劉遵義，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校長。

「見仁見智」的邏輯

董建華令香港成功落實一國兩制，並大力支持教育改革（三改四），劉遵義認為這就是頒授他榮譽博士學位的充分理由。此言乍聽有理，但細想之下卻甚為不妥——為甚麼「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會變成了董建華的功勞？三改四固然人人讚好，但其他呢？

事實上，董建華在任期間，先為港人內地所生子女的居港權問題，主動尋求人大釋法，推翻終審法院判決；後為政制問題，再次提請人大釋法，否決零七零八雙普選。將人大釋法變成慣例，令高度自治淪為空談，破壞一國兩制精神的，正正是董建華。如今，是非黑白扭轉過來，「成功落實一國兩制」竟變成董建華的功勞了。

其次，縱使我們認同三改四是德政，也不代表董建華在教育方面功大於過。董建華在2001年訂下十年內達成六成適齡青年能接受大專教育的目標，2005年便宣布提早超額完成，造成的卻是副學士學額急劇增長，院校間惡性競爭，學歷認受性成疑。這個人稱「教育界八萬五」的政策，近年惡果漸漸顯露，不單課程質素參差，部份未能銜接學士課程，部份欠缺專業認可（近月科專的護理副學士課程不受專業認可就是一例），而且由於學費未能申請低息貸款，造成大量副學士生債台高築，此現象已成為社會關注的問題。此外，還有令教師疲於奔命的教改、加劇標籤效應的母語政策、扼殺多元教學的校本條例……為甚麼劉遵義只提三改四？

然而，只需要一兩項疑似功勞就足以蓋過這些事實了，因為「評審程序嚴謹並具代表性」（雖然我們從來無法得知評審的準則，也無法參與討論），因為「一個人對社會有沒有貢獻，見仁見智」。平常我們說「見仁見智」，就是指事情沒有定論，如今劉遵義所指的「見



請與睡夢中的劉遵義齊上太空。「劉遵義施政監察」製，2008年。

仁見智」，卻是指事情沒有定論，所以不妨以頒授博士學位來定論。這種邏輯的荒謬性在於，頒授博士學位此決定本身造成了「見仁見智」的既定事實，「見仁見智」又反過來証明了頒授博士學位的合理性。不難看出，「見仁見智」不過是拒絕討論的藉口。如果略去動聽的修辭，劉遵義的意思其實就是：因為我有權，所以我可以界定甚麼是「見仁見智」，可以借頒授榮譽博士為權勢塗脂抹粉。你們沒有權，我不接納你們的意見，你們就要包容我。[2]

不講意識形態的大學校長

眾所周知，意識形態一直是文化理論、社會學、政治學的關鍵詞。為這個關鍵詞在近代人文學科奠下重要地位的馬克思，認為意識形態（ideology）就是統治階級蒙蔽大眾的觀念武器，用以合理化和自然化前者的既得利益，使大眾產生一種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以為不平等資源分配、剝削、奴役都是無庸置疑的。

劉遵義自述處理校政時採取的是「Problem-solving」的心態，而且「Problem-solving」的好處是不講意識形態，而是講用甚麼辦法圓滿解決問題」。可是，姑且不論為甚麼 Problem-solving 可以避開意識形態，Problem 如何 sort out 本身，其實已經體現了意識形態的具體運作：統治階級的 Problem 往往被優先考慮——因此，我們才會聽到這樣的怪論：院長委任制的好處是，校方高層可以下放更大的權力予所委任的院長。[3]

於是，所謂「不講意識形態」的意思其實並非可以避開——他真的僅僅是「不講」而已！將意識形態視作透明的結果，就是Problem-solving變成了只為統治階級服務。因此，我們可以說，以為可以「不講意識形態」這種想法，本身就是一種極強的意識形態。這種不問價值只問實際效果的意識形態——稍有涉獵社會學的都會知道——就是法蘭克福學派所深痛惡絕的現代性問題：盲目崇拜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而忽視價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令理性由解放人類的工具，變成宰制和奴役人類的工具。

作為一名大學校長，對社會學和文化研究缺乏基本認識也就算了，還竟然將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已被徹底批判的意識形態視為治校真理，沾沾自喜地宣揚——不但自己貽笑大方，這種治校態度又置我們一眾師生校友於何地？大學的理念如果是「不講意識形態」的Problem-solving，大學只會淪落為幫助大企業生產螺絲的工廠或販賣學位的學店。令我們感到深切難過的是，劉遵義絕非止於口發謬論，而是貫徹始終地實行：在他帶領下的中大，正在這條歧路上愈走愈遠。

---

1 本文主要回應該訪問中「頒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予董建華」和「我是工程師」兩節。至於校園發展和情色版風波，校友關注組、中大校園發展小組、中大學生報等團體已有不同文章仔細論述，不贅。

2 「反對人士可以批評，但意見沒有被接納的時候，劉遵義認為他們必須學懂包容：『全世界都是這樣，不喜歡（美國總統）喬治布殊只能批評，也要等再選總統（才可以改變狀況)。』」，見《大學線》訪問原文。

3 「身為校長，我一直希望下放權責，改善分層管理……最終獲委任的院長，將有較大的空間，去做其應做的決定，為學院以至大學的整體利益謀福祉」，見劉遵義於2007年2月5日發給各教學部門同人的信件。

浪漫的邊界：訪校長沈祖堯

李昆澤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13年11月號

近月來，由港大馬斐森與嶺大鄭國漢引起的有關校長的爭議越趨激烈，大眾焦點卻多局限在校長本身，未有回省校長背後的制度問題。中大校長沈祖堯，是外界形象極佳的公眾人物，但亦少有公開談論校政問題，故此我們便到了校長室，訪問這位已上任三年的校長，由校政入手，探討校長的可能與局限，聽聽他對現有制度的看法，探問未來的方向。

語文政策：逆流而上

中大建校初衷之一，是讓中文中學學生能擁有接受中文高等教育之機會，並弘揚中國文化。校方一直未能好好實踐這願景，尤其自劉遵義出任校長後，校方盲目追逐國際排名的思維下，許多沒有「競爭力」的人文學科便面臨削資的壓力，又亂改教學語言。定下英語教學為主，粵語為副，甚或全英語授課的語文政策，一味迎合西方學術樹蔭，不重視本土研究。

沈祖堯校長上任後，卻似乎逆流而上，不斷撰文批評大學過度追求國際排名，應重視人文價值、中文教學。於是訪問一開始，我們四人就追問中大的實際情況。他這樣解釋：「我地無set一個比率規定學系既教學語言，亦無用資源分配來比壓力，而係比老師有選擇權，亦希望同學中英文兼善。」

現時教資會（UGC）掌控著各院校六成收入，這些資源其中一個分配準則就是研究文章發表數量。可是研究的標準又大多跟從西方學術界指標，為了資源，院校只能發表英語文章，考慮西方學界興趣，本土研究往往因難獲認可而不被重視。沈校長卻有一個計劃去試圖改變這現狀：「我聯絡緊兩岸四地既大學，希望編制到一個在內地、台灣、澳門都認可既 publication list，讓大家都可以按此判定咩叫高水平既中文文章。做一個中文的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以此判定邊啲中文期刊係優秀高水平……做呢啲野，可能同國際大潮流背道而馳，但我唔想忽略區域研究的重要，否則唔會再有人做本土或者中國研究。」他更直言校內升遷亦會考慮中文文章與本土研究，「從而影響返UGC，影響返國際。話比佢地知，請你承認返中文既學術文章。」雖然這仍不脫量化競爭的機

制，但亦確實為中大近年語文政策上的突破。

深圳分校：「如果話你聽喺裡面咩都做得，你都唔信我啦！」

另一邊廂，中大最快明年便會在深圳分校招生，然而內地卻有《中外合作辦學條例》，規定從外地來的辦學機構要「符合中國的公共道德，不得損害中國的國家主權、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中大一直珍視的學術、政治表達自由如何得到保障，分校校園會否被滅聲，都亟待解答。

分校容許的界線去到哪裡，沈校長無法具體說清楚，但他承諾在可控制的範圍內會盡力捍衛這些自由，「我可以盡量容許同學發放聲音，當有學生犯左事，我盡量幫佢地辯護……學術論壇，我地都盡量做，睇佢批邊啲咪做邊啲。」不過在國家規定面前，他坦白承認可做到的十分有限，也講明自己無法改變國家政策和法律，「佢裡面啲法律點執行我不能阻止佢。」所以，沈校長雖然有所承諾，但他亦刺穿了最後的一層薄紙，讓眾人放下無謂幻想，他說：「如果話你聽喺裡面咩都做得，你都唔信我啦！」

回省：從決策最初開始

相信沈校長確是位有心人。尤其在語文政策上，串連兩岸四地院校建立華語學術標準的計劃，絕非易事。現時UGC會抽起院校研究經費，再按院校排名和收生量作為分配研究經費多寡的準則，經濟「競爭力」不足的人文學科，仍然要為經費不足和隨之而來的裁員而煩惱。沈校長的努力固然可嘉，但能否更進一步，嘗試脫離這競爭遊戲，令師生都能專注於教學？因為投入競爭而成為最大受害者的學生和教師，被逼以排名為先，教學表現與人文價值為後，他們當初在決策過程裡，其實又能參與多少？

在深圳分校問題上，他亦明確表態會支持學生。可是，中國的政治壓力緊逼局促，大量境外網站被封之餘，只要公開發表稍微反動言論者，動輒便會收監。身為分校的最高負責人，他亦無法撼動這些鐵一般的現實。沈校長一直以來鼓勵學生參與社會，要有人文精神，無奈這次他自己也承認同學表達空間勢必受影響。要求校長公然違反中國法律當然有困難，但同樣地，為何同學當初就不能決定是否建分校？哪怕再細微的決策都可能令結果截然不同，校方為何就可在無人過問的情況下作決定，導致今天「人文價值」可能受破壞的困局？

制度的囚徒：誰的校園？

歸根究柢，究竟中大的方向要如何決定？誰又有權決定？校長表明看來雖是一校之內的領導者，其實也並非全由他來決策。他可以處理有限的校內事務，可以在有同學反映校內缺乏清真餐廳時，拋下一句 “give us 12 months, we will meet your request.” 解決問題，但校長亦囿於官僚行政制度中。沈校長明確地表示，他權力有限：「一個好的管治除了校長，要有好的 governance structure，事實上喺校園內，就算我話要做某啲

野，我都有好多 check and balance，我唔可以隻手遮天，所以我們應該思考整個制度如何建構。」沈校長是中大最高權力機關——校董會的一員；亦是處理教學事務之機構——教務會的負責人，但不代表各學系完全聽命於他，而是各有各做：「學系搞一啲課程，其實唔係我要搞，我唔要佢搞，佢都要搞，我甚至要花氣力時間，勸佢地唔好為資源而搞呢啲課程。好多教師都唔會出聲，但佢地心裡面未必同意。」

不過，相比校長是否隻手遮天，更重要的問題是，實情他們本質上就無法代表校園大部分持分者的聲音，包括學生、工友。因為中大校長由遴選委員會所推舉，其民意授權，直接地說，就是零，比梁振英更少。當我們憤恨香港雙普選還未實現，為此奮鬥多年；當我們呼喊689不代表我，因而遊行示威，在這所校園，我們又何嘗有過自己的一票？沈校長同意制度應該往增加學生參與的方向走，卻對民主直選校長有所保留：「如果你問我一人一票選校長是否最好，我都覺得未必係。因為一人一票時，投票人是否能真正了解，具足夠視野，分辨誰對學校最好，我覺得未必。我覺得需要有經驗，對教育有睇法的人。係唔係每人一人一票最好，我對這個說法存疑。」

事實上，校長遴選只是縮影，反映了行政領導層缺乏民意基礎。再加上各學系各機關又非方向一致，面對這些局限，他卻只能做到溝通和嘗試了解，但真正能參與決策的，從來沒有那些備受影響的持分者們——學生和工友。對學生，他承認不足亦願意去聽：「我承認公平公義這些價值，雖然我們心裡這樣想，但實際做出來很多 loopholes，我只可以話我會攞出我啲誠意去傾。去聽你講，去接受你地質詢。同學參與好重要，我無法一下子將所有野 rectify，保證唔會有其他情況出現，但我們可以透過不同溝通，唔需要對立。」對工友，這個會受大部分政策影響的群體，沈校長亦有嘗試和他們交流，在中秋時節共享月餅。然而，早前職工被逼遷[1]時，工友和學生卻在此事上毫無決定權，只能任由校方處置。沈校長鼓勵同學參與，堅信有溝通了解就無需對立，但聆聽卻不代表有實質決策權，亦正正是在現今制度下，我們才會如此無力，只能期望領導層採納意見，而不是真正參與在決策過程當中。

後記：我們如何看待自己？

我們從訪問中，看到了沈校長確實與以往數任有所不同，他希望校園變得更好，也承認現在的制度有問題。可是，不論學生還是職工，兩者身為大學極其重要的持分者，在現今的行政制度下依然是極之無力。

或許大家會認為有「諮詢」已是有民主。每有新的規劃、發展，校方會有或多或少的諮詢，同學可以發聲，但只能停留於此。只有諮詢意味甚麼？沈校長在訪問中不斷強調的溝通和了解，就是最好的註腳——我們可以說，他們會

聽，但實際上是他們決定怎去做。就如劉遵義任校長時欲拆除烽火台，四千人聯署反對，劉校長仍一意孤行，終只是因社會迴響太大而擱置；又如金耀基校長在2003年曾承諾中大「永不外判物業管理服務」，但去年仍發生圖書館外判事件，年底更有職工被逼遷。這些事例所反映的，是一個鐵錚錚的事實：我們根本沒有實際影響力。

當校長遴選依然沒有讓民意選擇的權力，我們怎能寄望每次都有「好」校長上任，然後由他指引這所大學走向所謂一流國際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就算出現一個比沈祖堯更好的校長，我們在現有精英管治下，仍然只能表達，並「祈求」他們聆聽，但實際上根本無法進入決策過程，也沒有決定這所大學路向的力量。當每一人都能真正參與後，並不代表這所大學所有的問題都能迎刃而解，只是讓這所大學每一種聲音都可獲得真正的尊重。在前進的路上，也終於有了每一個人真實的意志和腳步。

---

1 職工逼遷：2012年10月，一批工友因宿舍改建而被逼遷，他們朝八晚五，遇著突發事件往往需要搭的士回校處理，有基本宿位需要。但校方卻拒絕安置，可謂沈校長治下一個污點。

一樣的軌跡，不同的治術
——論兩任中大校長異同

陳日東、李敏剛

劉遵義於2004年上任中大校長，以後見之明來看，無疑是中大校史劃時代的一刻。他六年任內的種種作為，包括推動國際化（核心課程英語化）、成立五所新書院、在校園大興土木，根本地改變了整個中大社群。2010年接任校長的沈祖堯，則似乎在短短幾年間，為中大帶來一番新氣象。劉遵義為中大留下了甚麼，沈祖堯又為中大帶來了甚麼，都有待整理和認識。本文嘗試指出兩任校長在管治上的變與不變，反映了商業邏輯如何主導大學教育，限制大學改革的可能性，並為大學社群帶來了甚麼傷害。廣義而言，這不妨視為所謂「大學理想」與現實的張力的註腳。

劉遵義的「傲慢」背後

以政策來說，劉遵義在中大推動的事其實並不新鮮。大學市場化、國際化的做法和趨勢，早已存在。譬如說，金耀基掌政時已有削資和殺系事件，李國章掌政時也已開始推動課程英語化，不過那時是用利誘——即如果學系開辦英文科目，就會有獎金或額外資助。批評中大是只求追逐名氣和資源的「學術工廠」這類聲音，翻翻《中大三十年》，甚至更早一點的刊物，都不難見到。

劉遵義和之前的中大校長的真正分別，是他推動政策的手法比較大刀闊斧、雷厲風行，甚至是獨斷。他心中已經有一套對大學應該怎樣辦的想像，也深信那是對的，或至少並沒有其他有意義的選擇。所以反對者的意見、批評、感受，他不會認真對待，更不打算為此修改管治的方針。他所謂的會見同學、校友，其實只是交代立場，而不是為了真正的對話。

可是，這樣獨斷的管治方式，慢慢就令不同的人開始有怨言。其中最有象徵意義的，要數校友關注組的出現。學生組織經常批評校方，不滿劉遵義獨斷假諮詢是司空見慣，但校友關注組核心成員，如已故的周錫輝師兄，其實是一直和校方關係相當融洽的一班老校友，甚至曾與校方合辦《中大人家》話劇。這群老校友在國際化事件時開始批評校方，最後在2007年新書院爭議時，正式和劉遵義決裂。最初，他們曾盡力接觸劉遵義，希望他不要辦新書院，至少從長計議，不要一時間就變成九書院。但



劉遵義明顯不屑理會他們的意見。最後這班老校友唯有選擇登報批評，成立校友關注組，與學生組織和年輕校友走在一起批評校方。

這種「我覺得對的就要做」、「我做的事就是對、為你好」，完全不考慮學生、老師、老校友、書院的感情的傲慢，一般人都會認為這是劉個人性格的問題。但我們認為，這和他的個人性格未必有關——或者說，他的性格如何，在這裡無關宏旨。

主導這種管治方式的，其實是由教資會外加到各院校頭上的「硬指標」思路[1]。劉遵義的想法很簡單：核心課程英語化有助吸納非本地生（大部份是內地生）[2]，也能提升大學國際化的指標，對大學排名很有幫助，可以追趕港大，也可以為大學在競爭中爭取更多資源。教資會既定的遊戲規則和目標，他自覺跟從；各種量化指標評核和那些目標之間的關係，他不予質疑，也拒絕和異議聲音討論，甚至全面迎合，以爭取到更多資源而自豪。劉遵義曾說，辦大學就如辦茶餐廳，正正說明了他的思維，其實就是在教資會的那些指標之下，追求利益（資源）最大化的發展邏輯——這和香港主流論述那種追求GDP、經濟競爭力至上的發展思維如出一轍。

但劉遵義時代的不少反對者，卻認為辦大學追求業績和指標之餘，不能放棄傳統、大學使命、理想。以教學語言為例，提升中文為受尊重的教學語言，是中大的創校理想。即使你一時三刻不能逆世界潮流而行，也該盡力使這個理想實現的機會不至於萎縮，而非主動迎合潮流、拋棄理想。

然而，奉行上述發展邏輯的劉遵義，無意考慮其他價值及他人的感受。漸漸地，很多持份者的利益和感情都受到傷害，一些本來和校方接近的人，都被推向了對立面，造成中大社群很大的撕裂。最後劉遵義於2010年宣佈「退休」卸任校長，由才做了兩年逸夫書院院長的沈祖堯接任校長。

從沈祖堯的無心無力看改革之難

沈祖堯選擇的管治方式或手法很可能吸收了劉遵義的經驗。劉遵義一味強推教資會硬指標的管治，最後帶來社群持份者之間的撕裂和內耗；和劉遵義相比，沈祖堯表面上比較重視他人的評價，或者說較重視他人的感受和意見。這種形象背後固然有公關計算的成份，事實上沈祖堯也沒有為中大帶來結構上和政策上的重大轉變。譬如說，教資會的指標依然沒有改變，他亦沒有挑戰教資會既有遊戲規則的意思。面對難解的結構性

問題，沈祖堯無心也無力處理，但嘗試盡量減少社群之間的張力，維持一定的內部穩定與和諧。我們認為，這正是沈祖堯親民形象的政治意義。

簡單來說，他就是用個人的魅力或意志力強行介入程序，緩解只看硬指標而少談價值反思的官僚邏輯。譬如說早陣子Snack Bar 續約不果[3]，但學生和校友有很大的聲音希望保留Snack Bar，沈祖堯於是出面要求商務組重新考慮，最終Snack Bar重新獲得續約。這種超出程序的舉動，固然為沈祖堯贏到不少掌聲，但卻破壞了「按規則辦事」的工作文化。如果所有爭議都可以由校長介入解決，那些低一層的職員或主事者會想，反正都是校長決定，反正最後結果都不是跟規矩來產生，我還這麼認真做來幹嘛？超制度舉動帶來了彷彿尊重人和價值的結果，卻迴避了真正改革不尊重人和價值的制度本身。

我們認為這正正說明了沈祖堯管治手腕的本質：既能以一件半件的個人干預回應體制外的異議聲音，但又不至於開罪太多既得利益者，成功緩和了劉遵義時代以來各方的撕裂。然而，成本則是很多的行政規矩變成虛文、工作人員無所適從，人治色彩轉強。值得注意的是大格局和制度沒有改變，即是分配利益的遊戲規則從來沒有改變。從何見得沈祖堯無意推動更為根本、更為重要的制度改革呢？我們只要仔細看看制度改革是如何複雜、需要如何細緻和長久的準備，再對照沈祖堯上任以來做過的種



種，就不難看出來他從來沒有推動真正改革的意志。

制度改革一定要有仔細的研究支持，不能輕率從事，因為打亂現行制度的後果，隨時令更多人受害。所以首先得著手做可行性研究，然後要有一個改革團隊來整理這些研究。舉個例子，若要改革中大校內的教學和研究，你就一定要追問：甚麼研究值得支持？應該如何撥款、撥去哪個領域、哪些政策範疇？這涉及到整個學科知識的發展脈絡，而且都是很具爭議性，沒有簡單的答案。

中大還要有這麼多學院，最上面還有教資會在財政上的牽制，還要面對其他院校的潛在競爭、博奕。你有自己的改革議程，不玩這個遊戲，競爭者可能就會搶走更多資源，直接影響教職員的生計和教學質素。譬如說改革在高等教育英語霸權的情況——聽說沈祖堯有意辦中文的學術期刊，推動學界承認中文做的學術研究，但還未有具體東西出台。[4]即使是這個這麼初階的改革，也會受到教資會的制肘。因為教資會已經決定了各種研究撥款的指標，而衡量大學排名

的外國權威，也多半只是參考用英文發表的研究成果。[5]於是改革一推行，可以預見中大的排名隨時會大跌，又或者撥款少了很多。這些改革的可能後果，應該如何應付？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

另一方面，就算有改革決心，也需要有不同知識範疇裡的頂尖人物來做改革的班底。但這些人往往就是現存制度的最大得益者，也就是改革時最有利益衝突的一班人。要他們去評價自己整個學科、整個專業正在做的事對社會有何貢獻，指出它有何問題，還要改革，這本身就十分困難。現有制度下的精英，要麼是這個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沒有太多動機推動改革，要麼就是忙於應付學術遊戲的要求，已經被制度壓得透不過氣，空不出手來幫你改革。

逆世界潮流而行，改革從來不易。我們不能空想制度累積下來的利益、慣性，甚至人的知識結構，可以一口氣全部扔掉。改革只能循序漸進，要有足夠的知識和人才，才能慢慢推進。大學學制三改四固然千瘡百孔，我們也常批評它操之過急，但它由研究到實行，已經足足十年。認真對待各種可能面對的可行性和利益問題，有時間表，有做研究，如果真的要談改革，就至少得取這種改革路徑。

「改革」制度牽連的利益、理念、政策，可以說是牽一髮而動全身。改革牽涉到那麼複雜的理念和利益計算，我們卻不見得沈祖堯有做相應的部署和行動，其實也許他一開始就沒有想過要改變甚麼，或覺得自己可以改變甚麼。沈祖堯並沒有大刀闊斧改革的能力，也沒有那種意志——至少我們看不到他有這種意志的明顯跡象。這樣，我們大可以這樣說：沈祖堯彷彿從善如流的個人形象，其實代表了一種不挑戰既有制度的管治手腕，而非說明他是「改革者」。這正和沈祖堯上台後好像動作多多，但卻不見中大有甚麼真正深刻的制度和政策改變的現實吻合。

改革以外：沈祖堯的「公關秀」

沈祖堯能夠帶來的改變，不過是一些公關和制度外的工作，如講所謂「人文精神」、辦博群計劃，或寫文章、口頭上支持學生參與社會抗爭。我們大可以認為這些是形象工程，塗脂抹粉的成份一定有。但不能忽略的是，這些形象工程背後，其實體現了好老師／好家長的教化意識和自我理解——即嘗試刺激學生透過個人的良好品格和善行，去所謂關懷社會，而推動社會制度上的變革，自然不在這種視野之內。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這些種良心工程，能鼓勵或感召普通人，盡量在自己崗位上減輕（甚至對抗）社會不公義。不過這種改變恐怕只能是零散及難以持續的善行，而非眾志成城、有策略、有方向、系統性的變革。幸運的話，如果在不同的位置都有人做這些事，多少會令大局有一些改變，但這當然只是一種小修小補——如果不是裝飾。

另一方面，有些人會說，搞了博群、這麼多人文精神啦、中大有這麼好的校長啦，其實會掩蓋很多結構性問題。這會不會變了一種「遮醜布」，令人不再正視那些重要的問題？

雖然沈祖堯處事手法比劉遵義圓滑多了，但異議或反對力量也不見得鬆散了。譬如說，一向強烈批判校方的學生會和學生報，在沈祖堯任內，不見得少了批評校方。另一方面，其實沈祖堯的出現，也令其他儘管並沒有直接挑戰當權者，但卻至少跟當權者不同並相對進步的聲音，多了一點精神上甚至物質上的支持。譬如說，博群的骨幹份子，如傳理系的朱順慈教授、政政系的周保松教授這些有心人，就有了上場的空間。一方面他們未必會完全按照沈祖堯一開始的想法去做，一方面這個新平台也成為一個聚焦點，讓中大社群的不同持份者嘗試把他們的價值觀、他們對美好中大的詮釋放進去，和他人有良性的碰撞。若是這些成果受很多人歡迎──博群的經驗就是如此──沈祖堯也犯不著去反對，甚至會主動地去認同。沈祖堯做事說話固然有公關成份，但也不見得他會僅僅為了討好他人，便說或做一些自己不相信的東西。這點是十分重要，也值得給他一個肯定。

當然，這種互動再良性，最終也觸碰不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就以2012年的博群花節為例，搞了很多強調中大的自然景觀的東西，譬如說在未圓湖辦音樂會；又拍了一段短片，訪問校巴司機、訪問餐廳的阿姐。這些都是在劉遵義時代被消音的事和人，現在將他們建構為中大精神的部份內涵，他們便可在主流話語中得到更多重視。但是這些活動無法改變制度上的問題，中大依然沒有妥善保障基層員工的權益。

沈祖堯治術的限制

沈祖堯的「教化」或「和諧」手段，畢竟只是一種管治術，因此有其內在邏輯和限制，而沈祖堯本人是否有良好意願，有時是無關宏旨的。凡事採取避免衝突、息事寧人、追求團結的取態，其反面就是往往當衝突或壓迫真的鬧大了，他才會介入。一旦爭議敏感，則不免會低調或含糊處理。

譬如說，2012年中大爆出了兩起大學高層涉嫌性騷擾下屬案，中大校方對相關的投訴和調查均低調處理。其中一案的當事人自殺身故後，家屬要求調查，竟為沈祖堯拒絕，只願意私下查問該高層，最後以該高層提早離職了事（請參見本卷「道德・身份」中的，「從迎新營到性騷擾」部份）。同年六月，校方宣佈圖書館清潔工於七月起將全面外判，並由一間在勞工待遇上劣跡斑斑的外判公司承包。2003年校方曾承諾大學物業管理工作永不外判，校方此舉引起學生組織嘩然並組織抗爭，沈祖堯卻在網誌暗批學生「自以為站在道德高地」，呼籲要「理性溝通」、「和而不同」、「把團體的利益放在個人意見之上」，無視校方管理層本身的錯誤。此外，校方至今仍是一如既往，對六四採取所

謂「中立」的立場。這條「沈祖堯路線」固然為反對者和有心人開拓了一些空間，但不足之處也是明顯的。

劉去沈來的中大經驗，說明了劉沈的分別，只是在同樣的制度軌跡和限制下兩種不同的管治手法。劉遵義之所以是「破壞王」，最大的因素在於他盲目跟隨教資會硬指標；沈祖堯也不是「改革者」或「賢君」，他不過是嘗試在不觸動制度改革（也就是不觸動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緩和各方利益衝突（因此得以維持良好形象），副作用則有好有壞：一方面無意中為反對者和有心人開拓了不少本來在劉遵義時代不存在的言論和行動空間，一方面則因為以超制度手段而非制度改革解決衝突，而令行政規則程序變成虛文，人治色彩轉重。

也許短期之內，尤其在沒有認清改革的難度、限制，以及有相應的部署和策略之前，我們實際上能夠想像到最好的結果，也不過是找一個沈祖堯去做一些小修小補，令大家感覺好一點。但最重要而且最有問題的東西，卻不能因為這種治術而改變。他若真的是一位改革者，他需要做的，比現在他著手做的多太多了。

總結由劉遵義到沈祖堯的中大管治經驗，我們認為，除了現實上改革面對的種種困難，也透視了「如何改革」這個問題的迫切性。我們對改革所面對的難度、種種可行性的問題，沒有充足的討論資源。討論資源不是一日就可以爆出來，或隨便把外國已有的經驗或前人既有的分析框架拿來生搬硬套就足夠，而是需要長時間累積以及和在地的經驗有機地互動。譬如說梳理制度上的限制、制度上的慣性、既得利益的結構、如何打破這些結構、如何消化和結連外國相關知識和經驗——這些討論資源才可以化成切實可行、能連結各方追求改革的力量、足以抵抗既得利益的改革論述。我們認為，整全的改革論述還未出現。從這個角度看，沈祖堯那常掛在咀邊的沒有具體所指、沒有挑戰任何既定利益結構的「人文精神」，雖然響徹中大，卻根本難講得上是甚麼有意義的變革綱領。

那是不是說，在商業邏輯的重重衝擊之下，制度乃至人性的扭曲已經根深柢固，大學理想已離我們愈來愈遠？我們認為恰恰相反。認識制度改革之難、認清我們要推動改革將面對甚麼阻力、需要甚麼資源、應該有甚麼步驟，其實正是推動變革的必要條件。更重要的是，我們也希望這篇文章能夠帶出，期望一位好校長或「賢君」出來便能帶來改革，正是我們需要丟掉的幻想：經營改革的論述、考究改革觸及的利益和相應的策略、集合和消化改革的理論資源、連結不同的力量建立良性互動，這些才是改革推進的關鍵，而我們沒有理由把這些工作都假手和寄望於一個「賢君」。把中大的未來，真正的重新把握在中大社群的手裡，本身便是實現任何大學的理想的前提，甚至可以說，這才是真正地實踐我們的理想。

1　教資會的具體政策和影響，可參考本書卷三「社會·教育」部分的兩篇文章：〈不可忽視的有形之手：UGC 如何改變中大〉，以及〈教資會，一葉障目向何方？〉。

2　2010年在校本科生國籍分佈

國家/地區	人數	國家/地區	人數
毛里裘斯	1（0.8%）	美國	2（1.5%）
加拿大	1（0.8%）	南韓	8（6.1%）
立陶宛	1（0.8%）	馬來西亞	10（7.6%）
台灣	5（3.8%）	荷蘭	1（0.8%）
印尼	1（0.8%）	意大利	1（0.8%）
印度	1（0.8%）	新加坡	1（0.8%）
伯利茲	1（0.8%）	葡萄牙	21（16.0%）
波蘭	1（0.8%）	德國	2（1.5%）
委內瑞拉	1（0.8%）	澳門	71（54.4%）
津巴布韋	1（0.8%）		
總數			131

內地：1106

（資料來源：中大《概覽及統計資料》2010）

3　范克廉樓地庫餐廳（又稱 Snack Bar 或玻璃屋），自1992年起由德佳飲食承辦。2012年德佳一度續約失敗，有學生校友等聯署要求重新審議招標，沈祖堯介入，德佳再次續約。2014年因經營困難，餐廳結業。

4　請參見本部份文章〈浪漫的邊界——訪校長沈祖堯〉。

5　參見註一。

大學應以文理為中心

◆ 陳平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

二十年前，在日本訪學，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談及院系設置，東京大學是法學部、文學部、經濟學部、教育學部、醫學部、理學部、工學部、藥學部、農學部；京都大學則是文學部、教育學部、法學部、經濟學部、理學部、醫學部、藥學部、工學部、農學部。問為何排列次序不同？答曰：誰的力量大，誰就排在前面。這當然是玩笑話，可仔細想想，如此「慣例」，其實不無深意。

查中國教育史料，1902年頒發的《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稱大學分科「略仿日本例」，政治科第一，文學科第二，格致科第三，農業科第四，工藝科第五，商務科第六，醫術科第七。1912年10月教育部頒佈的《大學令》則規定：「大學分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醫科、農科、工科」，且「大學以文理科為主」。這第二、第三條，比起「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才、應國家需要為宗旨」的第一條來，更能體現主持制定此法令的蔡元培總長的學術立場。此後的北京大學，或文、理、法，或理、文、法，或「本大學現設理、文、法、醫、農、工六學院」（1947），或廢除學院，改成數學力學系為首的12學系33專業（1952），不管如何變化，歷史上的北京大學，從沒像東京大學那樣，把法學院放在文學院或理學院之前。

最近二十年，中國大學風起雲湧，院系的排列方式千差萬別。校長們都說，本大學每個院系都很重要，可真到了切蛋糕、分資源的時候，你就明白學校發展的重心所在。所謂「一碗水端平」，那是說給小孩子聽的——不只做不到，而且也不合理。我關心的是，各大學在推介自己形象時，最想突出的是甚麼。

與半個多世紀前的老北大略有不同，如今的北京大學排出如下陣勢：理學部、資訊與工程科學部、人文學部、社會科學部、醫學部。工學被提到了人文學前面，好在打頭的還是理學，而不是管理學。再看清華大學的官網，其學院分左右兩邊排列，左邊是建築學院、土木水利學院、環境學院、機械工程學院、航太航空學院、資訊科學技術學院、理學院、材料學院；右邊有經濟管理學院、公共管理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人文

學院、社會科學院、法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五道口金融學院、美術學院。大概圖表不太好表達，本屬理科的生命科學院以及醫學院，最後被甩到了右邊，顯得有點不倫不類。理工科怎麼排列，我沒有發言權；但將「經管」排在文科院系的首位，總讓人感覺不太舒服。

清華的排列方式並非偶然，甚至可以說，此舉無意中透露了今日中國大學的主流趣味。若考慮到政府鼎力支持的「常春藤大學」（俗稱 2+7），其中傳統的「綜合大學」只有北大、復旦、南大三所，其餘的，或以工科為主幹（清華、浙大），或基本上就是工科大學（中國科技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你就明白今天的中國大學是如何「面向經濟建設主戰場」，以及為何普遍講求「實用」而蔑視「玄虛」、看重「經費」而忽略「精神」。

談論大學的重心何在，首先看工作目標。若以培養人為主（知識、道德、情懷），則文理優先；若以課題經費或科技發明論英雄，則商科或工科更為長袖善舞。具體到院系排列，到底是文學院在前，還是理學院優先，這都沒關係；只是不該將商學院或工學院置於整個大學的中心位置——除非你擺明辦的就是「財經大學」或「工業大學」。

院系排列只是表象，關鍵是辦學的理念，以及所謂的「大學精神」。我當然不會愚蠢到一看浙江大學的架構裡「人文學部」在前，就斷言其比北大更重視人文學；也不會一聽臺灣大學以文學院、理學院打頭，就認定其比港中大更有人文情懷。但我明顯感覺到，在學科目錄調整，以及「梁山泊英雄」重新「排座次」的過程中，文學院及理學院的位置在逐漸退後——只不過有的明說，有的暗示，有的則是曲裡拐彎傳達出來。

此乃一時風氣使然，作為校長、作為教授、作為學生，你都很難完全置身度外。那天查《香港中文大學概況》，發現中大以「文學院」打頭，而不像香港大學那樣讓「建築學院」領軍，很是欣喜，以為是「博文約禮」的校訓在起作用。仔細一看，不對，是我多情了。港大、中大排列院系的方式，是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名不分先後」，如此苦心孤詣，自然是為了回避矛盾。

不說辦學理念了，就說「虛名」吧——讓文學院、理學院重新抖擻精神，站在隊伍的前排，又有何不妥？多年來，我不斷寫文章，批評的正是「目前的中國大學太實際了，沒有超越職業訓練的想像力」。我當然明白，重回19世紀紐曼（John Henry Newman）的「大學的理想」，已是不可能的了；但請記得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的提醒：大學「生存在永無止境的精神追求」中，而「不成功的教育管理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一直要影響幾十年」（《甚麼是教育》中譯本140頁、143頁，北京：三聯書店，1991）。

甚麼叫「不成功的教育管理」，在我看來，就是眼下這種只見數字不見人、只講市場不談文化、只求效益不問精神，努力將「大學」改造成「跨國企業」的管理模式。在這個過程中，很多學科都受傷害；而受傷最嚴重的，非人文學莫屬（參見陳平原《人文學之「三十年河東」》，《讀書》2012年2期）。

作為人文學者，眼看無力回天，只好乘「中大五十年」之機，不識時務地獻上一句祝詞：無論天翻地覆，大學還是要「以文理為中心」。

2013年3月20日於京北圓明園花園

大學的魔咒與解咒

◆ 戴遠雄（2005新亞校友）

高等學府，不應視學問為經已圓滿解答的問題，而應以永不停步的研究，令人類在追求學問的過程裡，成為自由的人。這是德國柏林大學的創始人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在1809年寫下的大學精神。[1]洪堡特當時已經充份意識到，高等學府跟國家和社會關係密切，其能否孕育人民自由的精神，有賴國家維持學府的自主，同時學人藉公開講學，建立跟學生平等求學的精神，精益求精。兩百年前的大學藍圖，預告了日後大學總離不開當下的社會政治制度，象牙塔的形象純屬幻想。可以說，大學自主從來都被政治經濟的魔咒所籠罩，而只有大學成員反抗的勇氣才可為之解咒。

大學的政治經濟格局

讓我們把公營和私營大學放在本地特定的政治經濟格局裡，來看清楚這個魔咒是怎樣形成的。一般認為，董建華於2000年施政報告提出擴充專上教育，導致2003至2013年，香港的大專教育經歷了急速的市場化過程。市場化首先給我們的印象，自然是教資會資助的大學（下稱公營）增設自負盈虧的社區學院，加上私營專上學院陸續成立，舊有的專上學院則升格為私立大學（如樹仁大學），開辦副學位、四年制學位和兩年制銜接學位課程。結果大專院校在十年間大幅增加，私立專上學院從2001年共有12間增加至2011年的19間，而公營大學卻沒有增加，只有原來的8所。[2]

十年來，市場化成為了大學教育的主要趨勢，問題日漸顯。一方面越來越多學生可以享受專處教育，就讀全日制專上教育課程的人口，由2001年的115,115人倍增至2011年的240,529人[3]。當中自資副學士、高級文憑、學士學位和銜接學位課程的增幅最為驚人，上述自資課程的全日制學生人數由2001年的9,163人增至2011年的70,976人，十年間佔香港全日制專上學生人數百分比由5.9%激增至29.5%。[4]（見下表）

自資課程全日制學生人數	2001/02	2006/07	2011/12	十年增幅（倍）
副學士	3, 732	18, 787	27, 822	6. 45
高級文憑	5, 163	19, 302	23, 974	3. 64
學士學位	268	5, 127	12, 003	43. 79
銜接學位	–	–	7, 177	
總數	9, 163	43, 216	70, 976	6. 75
整體全日制專上學生人口	155, 155	193, 483	240, 529	
佔香港全日制學生人數百分比	5. 9%	22. 3%	29. 5%	4. 00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及2011年人口普查網站。

由此可見政府全面放棄承擔副學士和高級文憑課程，全力推動前所未見的市場化步伐。其惡果是，越來越多學生需付出高昂學費完成大專課程，高等教育變成個人投資，以致學生負債情況日趨普遍，政府不需負責培訓專上人材的形象日漸在形成。針對這個局面，意大利學者拉薩理圖（Maurizio Lazzarato）指出，當前資本主義的工作就是不斷把人變成負債的人（l'homme endetté），還債是負債的人理應履行的道德責任。[5]

就課程內容而言，大規模擴充的專上教育，令大學更加向直接滿足社會經濟需要的商科課程傾斜。從2001至2011年，曾修讀商科課程（Business and commercial studies）的人口，由263,783人增至560,287人；相較而言，曾修讀文學和社會科學科（Arts and social science）的人口，則由172,275人增至284,300人。十年之間的專上教育人口共增加了約78萬人，當中近四成都是來自商科課程。[6]（見下表）

修讀科目	2001	2011	十年增長	佔總增長百分比
商科課程	263, 783	560, 287	296, 504	38%
文學及社會科學	172, 275	284, 300	112, 025	14%
機械、電機、電子及輪機工程	81, 919	145, 506	63, 587	8%
建築及營造工程	66, 276	130, 429	64, 153	8%
電腦課程	76, 615	128, 095	51, 480	7%
醫療衛生課程	59, 092	102, 622	43, 530	6%
純科學	64, 227	90, 287	26, 060	3%
教育	48, 968	82, 262	33, 294	4%
紡織、設計及其他工業技術	12, 757	34, 054	21, 297	3%
其他科目	72, 588	145, 189	72, 601	9%
總計	918, 500	1, 703031	784, 531	100%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2011人口普查簡要報告》，2012年2月。

從整體受專上教育的人口來看，文科人口由2001年佔整體人口18.8%下跌至2011年16.7%，而商科人口則由28.7%上升至32.9%。[7]由此可見，專上教育更趨向培訓人才為本港的工商界服務。市場化策略令企業培訓人才的成本，幾乎完全轉嫁了給學生和家長，社會的階級差異同樣在大學教育裡產生其效應，貧窮的家庭自然比富裕的家庭負擔更重。[8]

市場化的惡果究其根源，不僅來自董建華大張旗鼓的政策。早在上世紀90年代已有學者批評，殖民地政府運用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來管理大學，注重「成

本效益」（cost-effectiveness）的發展藍圖，將危害專上教育的真正使命[9]，今天看來，絕非危言聳聽。擴充專上教育的政策，來自殖民地政府設法穩定過渡期社會的一系列措施。早在1988年，殖民地政府原本預期至2000年擴充專上教育人口至14.5%。然而，1989年北京天安門民主運動令政府急速地提升學額，以挽留人材，於是突然改為在1994年擴充專上教育人口至同齡人口的18%。[10]可以想像，五年間急速膨脹，有賴由上而下強而有力的計劃和執行才得以達成目標。1994年起，研究資助和研究表現掛鈎，奠定日後評核學者成就的外在指標。早在1995年，已有學者感嘆「要不出版，要不消失」（publish or perish）。由此可見，專上教育任由政府擺佈以配合管治，是為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講求可計算的教學和研究質量，嚴格控制成本效益，以企業邏輯經營（entrepreneurialism），合起來就是新自由主義箝制教育的意識形態，這正是二十多年來專上教育的魔咒，也是全球高等教育的處境。[11]至2003年，政府減少資助公營大學的同時，開始推出十億元配對補助金，政府按大學籌款多寡加以資助，結果加劇大學間的競爭，令本來的公營教育體系加入了更多的市場化成分，同時令政府日後有理據減少資助籌款能力弱的學系，可以想像人文學科將會相較醫學、工程和商學院等更形弱勢。置身市場化和管理主義的魔咒裡，我們可否義無反顧地堅守大學理念，或者全盤放棄，融入效率至上和官僚架構的網絡之中？

不存在的大學理念

我們可以把近年流行的兩種大學論述：理念型和功能型，視為回應大學魔咒的辦法。理念型主張大學是追求公民價值的場所，大學不應以追求利潤或親近政治權力為目標，更不應受它們所干預，因為大學是獨立的領域，學生可以自由地探索人生的意義，追求真理，甚至付諸行動來改變社會。[12]功能型主張大學教育培養社會需要的人材，學生所學習的知識、技能和態度，應該配合社會經濟的需要，甚至宣揚大學課程有利學生就業。理念型論述高舉價值，輕易地把大學抽離於政治經濟脈絡，容易給人留下這種印象：大學生應該浪漫，而畢業後走入社會，則要接受現實艱難，因為社會並不是大學。功能型論述視大學為企業僱員的培訓所，畢業生受僱主歡迎，就變成了大學的成就，可以說大學完全受制於社會經濟。

這兩種大學論述的缺失在於沒有道出本地專上教育真實的困境——受政治管理主義和企業邏輯至上的制度所宰制。應該說，大學從來都不能擺脫這個困境，所謂學術自由恆在政治經濟的權力網絡中掙扎求存，中西皆然。不正視這個處境，所謂大學理念不過是空中樓閣。在中國歷史裡，皇權、官員和士人之間的黨爭幾乎從沒消失。以宋代為例，士人即使在黨爭中落敗，仍然可以在官場外自由表達意見，有所謂「不成屋下合說底話亦不敢說也」[13]。脫離官場猶可自由說話的氣氛，到了明代就幾乎窒息，激烈的黨爭令知識份子隨時可以惹上殺

身之禍。即便如此，仍然有不少知識份子不懼政治逼害而批評朝政，政治壓逼並沒有消弭反抗，這方面也無分中西。西方大學制度起源於十三世紀，法國的巴黎大學由皇帝和教宗成立，培訓皇家行政人材、教會神職人員、圖書館、醫務和法律人材等。在十八世紀的歐洲，言論審查盛行，著名的哲學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1762年出版的《愛彌兒——論教育》和《社會契約論》，挑戰當權者的統治合法性和教育制度，被當時的法國國會裁定為禁書，同時在法國、荷蘭和日內瓦等地禁止出版，盧梭只好逃亡。在德國，知識份子言論自由的空間同樣侷促。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後，為捍衛法國大革命的正當性，反駁指責革命為暴亂的學者，哲學家費希特（J. G. Fichte）於1793年發表《糾正公眾對法國大革命的判斷》，同時反對普魯士腓特烈・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II）的開明專制和遏制言論，後又發表《向歐洲的統治者討回一直以來被遏制的思想自由》，反對以宗教約束人類的思想自由，指出人類的權利在於自由和無限制地思考任何事情，成為後世人權價值的先聲。

至十九世紀初，拿破崙大帝成立教育部（ministè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改革高考（Baccalauréat），選拔人材入大學，為後世公立大學入學篩選之濫觴。自十九世紀中後期，西方專上教育大規模擴張，特別是技術學科，開啟了此後百多年來，大學屈從於經濟發展的需要。由此可見，統治者和大學知識份子的關係，從來不是河水不犯井水。長期以來，統治者運用大學教育來幫助其統治，知識份子偶有本著良知公開反抗統治者的權威，卻隨時要為真理而犧牲。當代捷克最重要的哲學家帕托什卡（Jan Patočka）因為反對捷克共產黨遏制人權，在1972年被遞奪大學職務，其後在1977年發起《七七憲章》運動，聯同民眾公開要求政府履行國際公約保障人權，結果被警察拘捕，長時間審訊導致腦出血死亡。當代法國哲學家利科（Paul Ricœur）稱帕托什卡為「哲學家——反抗者」（philosophe-resistant），他作為異議者明顯地是被權力所殺害的。

因此，大學不是象牙塔，而是政治和社會經濟權力滲透其中的場所，吊詭的是，它同時孕育了反抗政治經濟權力宰制的人們。這樣說並不是要把大學貶低為純粹權力和利益角力的鬥獸場，而是要打破視大學為塵世以外一片淨土的想像，以為大學奉為神聖的學術自由是理所當然的事實。面對這個複雜的處境，當代法國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曾說：「無條件的大學並不存在。」[14]所謂無條件的大學，是指不受政治和經濟權力所干擾的大學，自古以來秉持學術自由的理念的大學，在中西大學的歷史裡，實屬子虛烏有。準確地說，大學總是受一定的政治和經濟條件所制約的。理念型和功能型的大學論述，要不就是浪漫化大學，無視大學所受的箝制，要不就是完全撤銷了大學知識份子所能營造的異議空間，令大學變

成一家公司。我們應該承認大學無可避免身處於屈服與反抗的張力之間，大學總是備受壓逼。在本港90年代大幅增加資助學額時，出於成本效益的考慮，大學資助同時被削減，2003年時當時的財政司司長唐英年曾要求2004-2005年間，一年內公營大學支出必須削減一成，引發廣泛反對。這樣，國家權力直接導致中大重組學系和削減員工薪酬。

然而，大學又不乏憤起反抗國家權力的成員，基層員工、學生和教員曾經站在同一戰線上，反對大學高層強硬推行不合理的行政措施。在2004年初，中大管理層因應政府資助減少，要求所有員工減薪，當中中低層員工比高層減幅大，達12%至16%或更多，合約員工需要比長約工多承擔10%的減幅。[15] 2004年3月5日超過三百名教職員和學生，在烽火台集會反對「肥上瘦下」的減薪方案，相信這是中大創校以來，首次主要由穿著制服的基層職工團結起來爭取權益的集會。同年4月30日主要由中低層員工自發組成的「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成立，標誌著員工籌組獨立工會的力量，有別於大學管理層認可的「香港中文大學職員協會」。另外，同樣劃時代的是學生領導的反抗力量活躍起來。2005年1月學生發起「反對偽國際化」的聯署，2012年9月11日，來自各大專院校共八千多名師生參與中大烽火台的罷課集會，反對政府施行國民教育，響應在中環政府總部外絕食和集會的中學生和社會人士。表面上看，這些員工和學生的反抗運動跟大學追求學術的使命無關，但是當我們考慮到大學內外的政治和經濟壓力時，這些反抗運動和學術研究的精神如出一轍——實現無條件的大學理想，不向政治和經濟的壓逼妥協。

龐大的私營教育市場，造就了大量不穩定的教育職位和缺乏機會參與校政的學生。未來政府還會繼續扶持新的私立大學，令大專教育向市場傾斜，積重難返。因此，與其標榜重建大學理念，不如承認每次反抗，只能力求以有限條件來實現無條件的大學。在私營教育市場裡，能否開拓更大的自主空間，提供具社會批判視野的課程？能否背負市場化的壓力，同時結合非政府機構和社區生活，凝聚本土的學術社群，令教育成為促進社區民主規劃和管理的動力，令本土議題順理成章地融入學術研究？隨著社會日漸關注私營教育的管理，公立和私營的大學師生，能否連結為促進監察大學的社會力量？課程能否更顧及社會人士彈性的學習需要，學費調整能否更顧及學生和家長的承擔能力，同時負起大學教育的社會功能，平等地照顧不同階層人士？我們應該及早為未來思考，大專教育市場能否轉為由國家持有和由社會共同管理，令符合市場的壓力有所舒緩？在不明朗的未來，我們目前應該做的，不是重建浪漫的大學生活，也不是接受暗淡的現實，而是提出異乎常規的大學圖像，反抗政府和市場的預先規劃。

大學之道就是異議

「無條件的大學並不存在。」德里達不

是叫人放棄大學的理念，更不是單純主張重提大學本有卻被遺忘了的理念。事實上，大學從來都在政治和社會經濟的壓力裡掙扎求存，學術自由不是陳述某一既定事實的命題（constatif），大學首先是個眾人可以「公開宣稱」（to profess）的空間，這是一種態度，是運用（performatif）公共理性的表現。公開宣稱，引發思考，要求他人回應。宣稱是否合理，回應是否得當，通通看在公眾的眼裡。正如德里達所指：「無條件的大學並不存在，事實上，我們非常明白。但是，按其原則和依於它所宣稱的使命，通過它公開明示的本質，它應當處於批判性的抵抗之中——較之於批判——更多地反抗一切獨斷和不公正的佔有的權力。」[16]學術自由不是由順從共識來保障，反而是鼓吹異議。異議不是凡事反對，而是敢於為求真相而提出己見。當遏制異議的企圖出現時，大學裡每一個成員都要面臨道德的考驗，學術自由存在於我們會否為利益而妥協，還是敢於為宣示真理而反抗。面對權力隨時消弭異議的關頭，所有職員、學生、校友，都要考慮會否勇於公開宣稱自己的信念，在道德的考驗面前，所有成員都是平等的。然而，這不是說大學裡各成員很容易會組成聯盟，反抗來自大學以外的壓逼。現實是大學內部的不同職級、部門和成員也經常有不同的考慮，社會的階級差異同時存在於大學。2004年反對「肥上瘦下」的運動；2010年學生發起在中大校園樹立民主女神像的行動，反抗校長以「政治中立」為由而拒絕學生擺放神像的申請，在在反映大學裡職員的分歧。功能型和理念型的大學論述均假定大學為同質的整體，可是歷史的經驗卻告訴我們，分歧是恆常的現實。表達異議和反抗壓逼的行動，比起校長學者宣揚大學先天的使命，更能體現捍衛學術自由的決心。異議並不能保證共識，更不能像市場化和管理主義般保證成本效益，但更能體現永無止境的大學之道。

1 Wilhelm von Humboldt. (1979). "Sur l'organisation interne et externe des établissements scientifiques supérieures à Berlin" (1809-1810), in *Philosophies de l'université: l'idéalisme allemand et la question de l'université – textes de Schelling*. Fichte, Schleiermacher, Humboldt, Hegel, ed. par Luc Ferry et autres, Paris: Payot, pp.321-329.

2 香港統計年刊2012年版，頁336。

3 2011年人口普查自製普查統計表，http://www.census2011.gov.hk/tc/build-your-census-tables.html

4 香港特別行政局政府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自資全日制經評審專上課程畢業生人數」，取自http://www.ipass.gov.hk/edb/index.php/ch/home/statheader/stat/stat_gd_index ，下載日期為2013年12月14日。

5 Maurizio Lazzarato. (2011). *La Fabrique de l'homme endetté : Essai sur la condition néolibérale*. Amsterdam: Éditions Amsterdam.

6 香港統計處《2011人口普查簡要報告》，2012年2月，頁49，取自http://www.census2011.gov.hk/pdf/summary-results.pdf

7 同上。

8 政府逐步增加市民為自己的教育負擔所需費用，始於90年代大幅增加大專學額。以中大為例，1989-1990年度中大全日制本科生一年的學費為7,500元，1994-1995年度為24,000元，五年間增加了3.2倍。雖然全日制本科生一年的學費自1997-1998年度起，一直沒有增加，維持在42,100元，但是公營或私營大學人口自2001年起大幅增加，這樣等如說更多人要繳交學費入學，為自己未來的職業而準備。換句話說，企業培訓人才的成本現在全面由政府和個人承擔，在私營大學裡，更全由個人承擔，可見新自由主義把公共服務的成本盡量轉嫁到個人身上，在香港並非危言聳聽。中大學費數字，見香港中文大學每年出版的《香港中文大學概況》。

9 Cheng, K.M. (1996). "Efficiency, Equity and 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in a Time of Expansion", in: M.K. Nyan and S.M. Li (Eds.)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 1996*.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轉引自Mok Ka-ho. (1997). *The Cost of Managerialism: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McDonaldis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Dept. of Public and Social Administ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0 Mok Ka-ho. (1997). *The Cost of Managerialism: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McDonaldis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 Dept. of Public and Social Administ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1 William Yat-Wai Lo. "Entrepreneurialism in Higher Education: A Comparison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Changes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in Mok, K. H.(ed.), *The Search for New Govern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p.103-123. Ka Ho Mok. (2011). "Liberalization of the Privatenes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Public Vices, Private Virtues?* Rotterdam: SensePublishers. pp.19-43.

12 陳平原，〈「兼容並包」的大學理念—蔡元培與老北大〉，載於《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頁23-36。金耀基，《大學之理念》（香港：牛津出版社，2000）。周保松，《走進生命的學問》（北京：三聯出版社，2012），〈大學的價值〉一章。

13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北京：三聯，2004），頁386。

14 Jacques Derrida. (2001). *L'université sans condition*. Paris: Galilée.

15 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致校董會的信，2004年8月10日，取自http://www.cuhk.edu.hk/cuegu/declaration/040810_councile.pdf

16 Jacques Derrida. (2001). *L'Université sans condition*, Paris: Galilée, pp.14-15.

社會・教育



前言

◆ 吳嘉倫

大學與整體社會的關係，從來都是如影隨形。香港大學是港英殖民政府為吸納本土精英而成立，第二所成立的中文大學則是國內大量移民來港的結果。80至90年代大學教育的大幅擴張則與香港經濟轉型以及維持過渡期的社會穩定密不可分。從這觀點看，中大的歷史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香港以至鄰近地區的歷史。

本部分正正希望透過社會的角度回顧近十多年的中大以及香港高等教育的歷史，一方面探討外在環境對本地大學發展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希望略窺大學對社會可以帶來的影響。

〈校譽與前途——中大發跡簡史〉指出中大在高等教育擴張潮中從七十年代的「二流大學」躍升至今成為「亞洲首屈一指的大學」之一，但在不平等的社會經濟結構下，大學畢業生的生活卻難言有所改善。〈大學作為社會制度的四個趨勢〉則從宏觀角度出發，整理大學制度近數十年的四個改變趨勢，「普及化」、「分層化」、「趨同化」及「市場化」，勾勒這一社會制度的全球性轉變。

從社會對大學的影響方面看，香港以公立院校為主體，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作為政府管理大學的代理人，角色尤為重要。〈不可忽視的有形之手：UGC如何改變中大〉闡述了教資會在大學管治及教學資源兩方面的角色，指出教資會是令大學管治專權化及教育市場化的幕後推手；我們亦輯錄了劉笑敢教授刊於《明報》的〈教資會，一葉障目向何方？〉，文章補充了教資會在研究資助方面推動競爭的角色，並指出這趨勢將不利學術發展。

國際大學排名的興起是大學加強競爭的另一體現。〈追求卓越？大學排名評分初探〉一文簡述了國際大學排名的背景並分析了排名的內容，並指出大學排名與教資會推動的改革，皆是受到全球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因而強調資源競爭、國際化等元素。

中大近年的另一大改革則是由於香港學

制改革而重新推行四年制。高中課程內容的改革對理工科目的影響尤甚，〈四年制下學科及學生的轉變〉一文便整理了我們向校內各理工學系查詢的結果，略為總結「三三四」學制對學系課程帶來的具體影響。

在本地院校當中，中大算是較為強勢的院校。較弱勢的院校情況又是如何？我們在〈與狼共舞的遊戲——嶺南大學現況與策略〉訪問了嶺南大學的文學院院長陳清僑教授，講述嶺大如何面對近年大學教育版圖的變化。

本部分探討的最後一個問題，則倒過來探討大學對社會的影響，即大學在知識轉移方面的角色。「知識轉移」是指把大學創造的知識轉移到社會中運用，意念雖是舊有，卻成了近年高等教育界的熱門名詞之一。「知識轉移」一般被視為醫學、工程等科技發明的專利，鮮見於人文學科。〈象牙塔與群眾——傳媒作為知識轉移橋樑的可能……不可能？〉、〈改變世界的不完美——訪問社會學系教授趙永佳〉及〈教職以外的教與研——訪何佩然教授〉三篇文章分別訪問了新聞及傳播系、社會學系及歷史系的教授，窺探一下這些學科在知識轉移方面的角色。

此外，我們整理了一些與本部份相關的資料，包括「大學教育與專業資格」、「2003–2012本科一年級收生人數」及「2003–04/2012–13主修課程要求比較」。

「校譽」與錢途——中大發跡簡史

楊穎仁

在所謂的「社會流動」想像當中，讀書就是踩在一層疊一層的人頭上面，爬上去。曾幾何時，香港的大學只有港大與中大。儘管有機會升讀本地大學的人不及適齡人口百分之二，尖無可尖，中大的二流大學形象卻烙印人心，校徽上面的鳳凰彷如野雞。1967年，新聞系同學出版的《沙田新聞》揭發八十七名中大畢業生投考政務官全軍盡墨，時任銓敘司的施恪致信中大高層表示失望，高層嚇得特地開設專責委員會查找不足。事件曝光，高層面目無光，為保「校譽」不惜敕令《沙田新聞》停刊。[1]

「校譽」是甚麼，畢業生前途從來是一大衡量指標。沈祖堯校長早前宣佈禁止公開中大畢業生就業數據，坊間讚美他清高不功利，但這畢竟是發了財才有資格立的品——中大的二流大學形象已成過去。換了在四十年前，同樣舉措多半被視為掩耳盜鈴粉飾太平，殊無公信。由野雞到鳳凰，中大的世俗品位步步高陞，到底意味著大學教育在社會經濟結構裡面佔了甚麼位置？

兩波教育擴張　學費七級跳

香港的大專教育，在這二十多年來經歷了兩次擴張潮。第一次發生於九十年代，以科大（超支之下）成立，理工、浸會、城市理工升格為標記，餘波為嶺南、樹仁稍後升格，以及教院嘗試升格，大學教育由適齡人口驟升至18%；第二次發生於廿一世紀，以前特首董建華號令「六成適齡人口讀大專」為標記，陸續開設副學士課程，隨後衍生的升學需求又導致自資銜接學位（top-up degree）課程紛紛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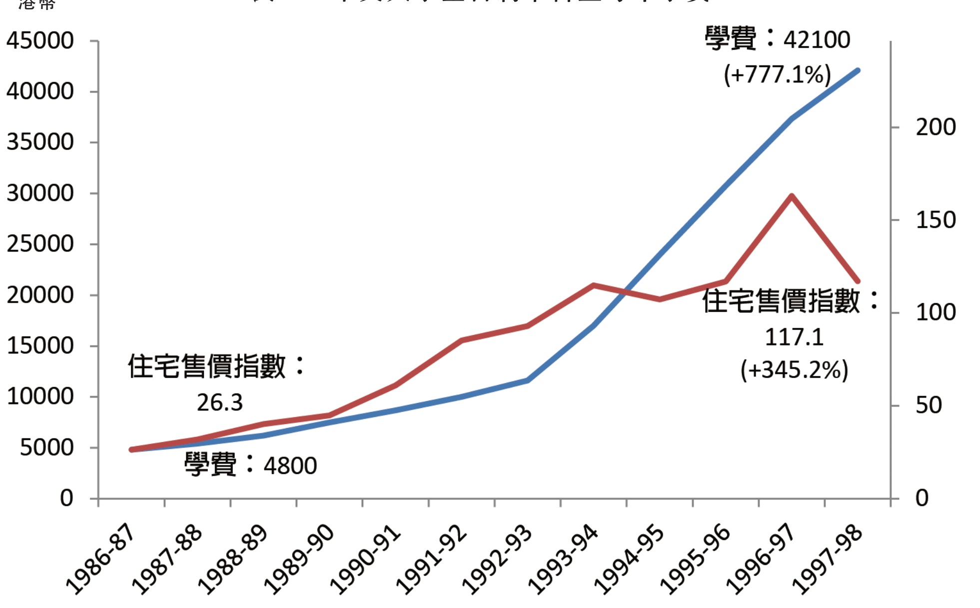
大專教育擴張帶來了金字塔生態。第一波擴張增加了政府資助的大學學位數量，在不同大學之間以資源差異劃分層級高低；第二波擴張又在大學學位下面加插了一層副學士學位，把金字塔疊得更高。中大變得「精英」，除了因為佔地廣資源多有發展潛力，又一早獲准開設醫學院吸納尖子，另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是政策把處於更不利位置的院校和學生塞到下面為它墊底。

擴張不是請客吃飯，政府要學額生產得快，卻又不願付帳付得多，於

是政府資助越來越不可靠，以中大為例，政府資助佔它收入來源的比率就由九十年代初的七成以下跌至廿一世紀的五成左右。剩下來不夠的經費怎麼辦？拼命尋求捐款、找商界合作研究固然不在話下，更直接的財源自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向羊牯們加收學費。由八十年代下旬直至九七回歸，全日制本科生學費暴漲777.1%，升幅竟是同期過熱狂飆的樓價雙倍以上（見表一），甚至足以拋離今時今日的樓價。急驟加價惹人反感，及至李國章於董建華年代執掌教統局，企圖推出「分科收費」製造繁複加價機制以分化不同院系學生的反對聲音，最終雖未能得逞，然則「加價」與「分化」兩大目標卻以另一種面貌落地生根——前所未聞的各級自資學位遍地開花，從碩士到副學士樣樣俱備，質素參差，收費高昂。自資學位的觸手不僅纏繞學士和副學士課程，在學士後課程亦擴展神速，1999年中大3,716位研究生裡只有790人（21.3%）來自自資課程，到2011年，11,173位研究生裡修讀自資課程的竟多達8,113人（72.6%），反過來佔據主流。簡言之，受教資會資助的學位課程自1997年後終於擺脫加價浩劫，皆因加價魔掌可伸至教資會資助以外的範圍予取予攜。受資助課程中止加價之後學額停滯在適齡人口的18%，多年未有寸進，自資課程光是全日制課程的收生自2001年之後膨脹近七倍[2]，若把兼讀課程也計算在內增幅肯定遠不止此。

在大專教育擴張的歷史格局底下，當今大學生被置於某個微妙的位置。一方面，他們的學債負擔遠超八十年代的師兄師姐，求職賺錢的壓力無疑沉重得多；另一方面，唸自資課程的學生代替他們頂住了加價壓力，大學生貌似保住

表一：中文大學全日制本科生每年學費



（資料來源：歷年《香港中文大學概況》、差餉物業估價署網頁）

了相對幸福的境遇，但「政府資助的學生」和「自資課程的學生」兩邊並不存在無可逾越的分隔，今日的大學生可以揹著昨日自資副學士的學債，亦可以擔憂明日報MSc/MA的學費。這是大學越來越像職業訓練所（或，不稱職的職業訓練所）的背景，不管沈祖堯校長是否拒絕公開中大畢業生就業數據，是否意欲伸張大學理想，終究無法繞過此一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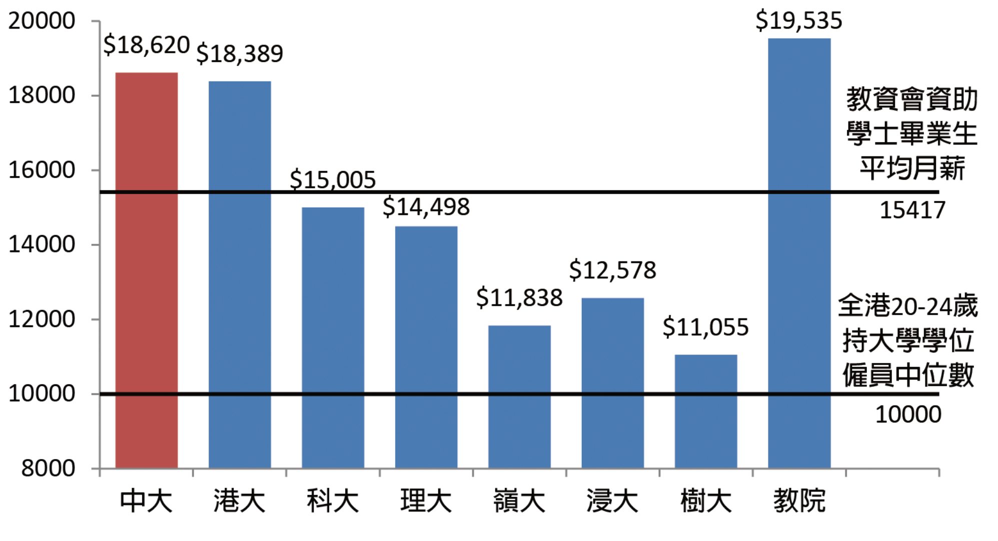
於是，大學能否確保「向上流動」至關重要。可能比七十年代的政務官風波時更加重要。

畢業薪酬傲同儕　終歸徒勞

誠然，家財萬貫的同學未必要理會這個事實，老子有的是錢，加價又如何。不過這不像是中大同學的普遍情況。觀乎2011至2012年度的「新生狀況問卷調查」，本科生大多家境平平，住戶入息中位數不超出全港平均值，家住公屋的比例亦跟全港比例相差無幾，算是「平民大學」[3]。家境不特別寬裕，學費的十字架遠比前人沉重，唯一的盼望是畢業後的回報。觀乎2011年數字，中大畢業生的「錢途」比同輩光明，剛剛夠把港大比下去，在一眾院校當中只遜專攻教師專業的教育學院（見表二）。

平均月入一萬八千有餘，力壓群校，中大人薪水高於一般教資會資助學位畢業生，勝過連同自資學位在內的全港普遍大學生更不在話下。儘管嚴格來說平均數和中位數不能直接比較，醫科和法律系畢業生會拉高平均值也是常識[4]，即

表二：2011年香港各大學畢業生平均月薪*



（資料來源：各院校學生事務處、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政府統計處2011年人口普查）

* 城大並未公開相關資料，故從略。

便如此唸中大的「投資回報」還是相當不俗的。入學平民，畢業中產，中大作為一個「社會流動」的機器，可謂稱職了。

果真如此？先別高興，拿收入跟其他大學生比絕無意義，虛榮不能當飯吃，比不過自己生活所需的話只是一場空。中大校友評議會曾調查校友住屋狀況，受訪者泰半為廿一世紀畢業的青年，結果發現近四分之一校友並無置業，有三成居住面積小於五百呎[5]。姑勿論成為推高樓市的幫兇算甚麼人生成就，連樓也買不起的「中產」，在香港主流輿論裡只是笑話一則。撫今追昔，馬時亨1973年在港大以三級榮譽的劣等成績畢業，一畢業立即在美國大通銀行取得高薪厚職平步青雲，恐怕從來不必為住屋發愁，現在的畢業生就算成績驕人履歷閃亮也難得有這種肥缺。

更值得追問的是，收入較優厚的中大畢業生尚且難敵生活壓力，其餘市民遭遇如何？教育制度自幼告訴我們同儕都是競爭對手，在競爭裡勝出自己就是贏家，大團圓結局——結局之後呢？人與人是命運相連的，大學生在就業市場競爭裡擊敗自己沒讀過大學、年華漸老的父母，到頭來還是要支付家用供養他們，隨著人口老化這個負擔將日益沉重，而屆時很多人都不能指望有兄弟姊妹可以分擔。學債，樓債，父母債，有正視過自身前景的年輕人難免變得功利計較。有功利計較的人，就有功利計較的學科學系大受歡迎，反過來影響大學的生態平衡。相對的，就業前景看起來似乎不太有保障的學系往往淪為弱勢學系，收生不易，加上大學排名與教資會評核裡面的種種偏頗，分到的資源買少見少，甚至面臨殺系危機。有名有利的中大表面風光，裡面始終存在各種不平等。

小結

大學曾提供「教育脫貧」的想像，讀大學更像是軍備競賽，你不增加教育開銷，飯碗就被旁人搶走了——這種恐懼是否反映現實是另一回事。五十年前，小學畢業在工廠加班也能儲錢成小康，中學畢業更已是相當吃香，大學是雲端之上的奢侈品，弔詭的是這份奢侈品價錢便宜。五十年後，大學是隨處可見的大眾消費，價錢卻反倒更難負擔。當中大不用再為「校譽」操心，我們的日子不一定好過了。

1 詳見〈舊聞補遺：《沙田新聞》事件〉，《明報》，2013年6月23日。

2 根據「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2001/2002學年自資全日制專上課程學生共有9,163人，到2011/2012學年則升至70,976人。

3 見〈新生狀況問卷調查2011-12〉，香港中文大學學生事務處。新生住戶月入中位數不到港幣二萬元，家住公屋的比例為28%。

4 撇除醫科生之後，2011年中大本科畢業生平均月薪跌至16,299元。

5 見〈三成中大校友居所小於500呎〉，《明報》，2011年6月30日。

大學作為社會制度的四個趨勢

◆ 吳嘉倫

對於大學，最常見的比喻莫過於「象牙塔」。「象牙塔」一詞源於基督教《聖經》雅歌 7：4，形容新娘的頸項。此後被引申為純潔、超塵脫俗之意。這個意象在中世紀時或許尚且有三分真實，到了現代則肯定是天方夜譚。

事實上，大學已廣泛被社會學家認為現代社會最重要的制度之一。社會學家經過多年實證社會研究，認為教育一方面是認可個人職業資歷的重要機制[1]，某程度上容許社會流動，另一方面精英階層卻利用排拒（例如昂貴的學費）以及適應（例如以補習等手段催谷子女的成績）兩種手段，確保下一代在學業成就的優勢[2]。換言之，他們認為比起各階層可以共同爬升的社會階梯，大學教育更象是進行篩選的社會筲箕[3]。

大學亦在培養社會精英方面有重要的作用——不過，培養的方法並非傳授知識和技能。研究顯示扣除背景因素後，大學學業成績（GPA）相差1.0，對將來收入的影響只有9%[4]。可見學科的知識技能，在培養精英的過程影響甚微。相反，學者更認為大學的培養功能在讓他們建立社交網絡、培養精英文化[5]。來自中上階層的家庭，對大學抱有較明顯的社交傾向[5]。他們的父母已教會他們在大學擴大社交圈子的重要性[6]。

雖然大學這種社會制度歷史悠久，近數十年卻經歷了相當大的變化。筆者試以下述四點概括之。

一、普及化

近數十年來大學最重大的變化是大學教育的急速擴張。過去100年，全球大學生人口比率增長數十倍，不論國家的經濟發展、國際化程度、民主化程度如何，世界各國的大學教育都有顯著的增長[7]。

大學教育急速擴張的主要原因是公眾對大學教育的理解有所轉變。以往公眾普遍認為大學用以訓練少數的社會精英，近年卻轉而認可大學能讓所有人提升人力資本，「自我增值」。因此，戰前對大學擴張可能造成「過度教育」的質疑消失，也極少人會考慮為何要增加大學教育的問題[8]。即使沒有確實的證據表明擴張大學學額能幫助經濟發展，各國仍

對投資增加學額樂此不疲[9]。

香港的普及化則始於80年代，從當時兩所大學以培訓2%適齡人口為目標，普及至現時九所大學加上十餘所可授予學位的高等院校，適齡入學率已超過20%，若算上入讀副學位課程後升讀銜接課程的學生，百分比則更高。

二、分層化

大學教育普及化還帶來了兩個相關的趨勢，其中之一是分層化。分層化的意思是社會組織擴張時，一般會伴隨著內部層級的產生[10]。以大學為例，歷史較久的大學基本上都是綜合研究型大學，而在大學普及化後，便產生了如技術大學和教學型大學等不同取向的大學。

這種趨勢亦見於香港的大專院校。明顯定位成綜合研究型大學的只有中大、港大兩所，城大和理大亦在爭取成為其中一員；科大則是較獨特的專科研究型大學；餘下的院校便較傾向為教學型大學，正籌備的數所私立大學亦料如是。

三、趨同化

另一重要的趨勢是趨同化。正如上文提到，大學是建構現代社會的重要社會制度之一。而近數十年全球一體化的過程，則使全球的大學亦走向趨同。一如大學為其他社會組織提供了行為的規範，近數十年大學之間（以及大學的管理者之間）的國際交流增加，亦使他們愈來愈以對方作為參照的對象。換言之，大學越來越成為一種單一的制度。

例如，在歐洲大部分國家都參與了博洛尼亞進程（Bologna process），逐步統一大學教育制度，全面引進學分制及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的等級[11]。另一例子是商學院採用案例研習：雖然案例研習已有逾百年歷史，卻是直至近二、三十年才被全球主要的商學院爭相採用。現時，每年有超過一千萬份案例被購買作案例研習[12]。

而這種趨同化的傾向，同時亦意味著大學愈來愈少考慮目前社區的獨特情況，而是服膺於單一的準則。比如說，工商管理學位在各地大學都急速增長，以及無論研究型還是教學型大學都會要求教員發表研究論文。

四、市場化

最後一個重要的轉變是大學教育的市場化。最直接可見的是大學本科和高等學位學費迅速提高。學費不但在英、美、澳等教育服務輸出大國以倍數提升，也波及了不少國家。以香港為例，本科學費在80年代至1997年間足提升了七倍多（見前文〈「校譽」與錢途——中大發跡簡史〉），而碩士學位的學費亦在近十餘年由四、五萬元飆升至十萬到五、六十萬元不等。

與此同時，很多地方的大學教育漸漸走向私營化。以台灣為例，在90年代以前大學教育以公立大學為主，私立為副。近二十多年卻私立院校林立，院校數目增至過百所，佔全台本科學位超過八成[13]。即使是以公營大學為主

的地方如香港，亦逃不過私營化的趨勢。目前香港仍僅有樹仁一間私立大學，但一眾公營大學亦爭相開設自資課程。以中大為例，自資的研究院課程有近150個[14]，扣除政府資助，學費已佔大學收入約三份之二[15]。

此外，即使在傳統上不屬於市場的範疇，例如政府資助撥款等，也被加入了各種競爭機制。以香港為例，教資會便在近年推行了與私人捐款配對的補助基金、研究資助撥款競爭、學額回撥等措施[16]，試圖以「市場原則」促使大學以「更有效率」的方式運作。

上述的轉變可歸因於全球新自由化的風潮。「新自由主義」是指自80年代起各國高舉市場至上，試圖徹底放任私營企業營運公共領域的風潮[17]。在這場風潮下，眾多國家推行了包括削減社會福利、公營服務私有化、用者自付、在公共事業引入競爭等政策。即使在未被私營化的部分，公營機構也推行了被稱為「新公共管理」的營運原則[18]，模仿商業機構的運作模式試圖提高營運效益。

結語

筆者在此概括大學教育的四個趨勢，目的在於讓讀者稍為了解近年中大轉變的社會脈絡。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四個趨勢或多或少是互為因果，而並非獨立的轉變。比如說，開放私營高等教育市場某程度上帶來了大學教育的普及化，而大學教育的普及化亦與其分層化脫不了關係。

1 Meyer, J. W., Ramirez, F. O., Frank, D. J. & Schofer, E. (2006). "Higher Education as an Institution". CDDRL Working Papers, May 2006.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2 Alon, S. (2009). “The evolution of class ine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competition, exclusion, and adapt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4:731-755.

3 Stevens, M. L., Armstrong, E. A. & Arum, R. (2008). “Sieve, incubator, temple, hub: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advances in the sociolog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4:127-151.4

4 James, E., Alsalam, N., Conaty, J. C., & To, D-L. (1989). "College quality and future earnings: Where should you send your child to colleg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9:247–52.

5 Stuber, J. (2006). "Talk of class and discursive repertoires of white working and upper-middle class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5:285–318.

6 Corsaro, W. A., & Molinari, L. (2000). Priming events and Italian children’s transition from preschool to elementary school: representations in action.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3:16–33.

7 Schofer E. & Meyer, J. W. (2005). The World-Wide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0:898-920.

8 同上。

9 Meyer, J.W., Ramirez, F.O., Frank, D.J., & Schofer, E. (2007). Higher education as an institution. In *Sociology of Higher Education: Contributions and Their Contexts*, ed. P. J. Gumport, pp. 187–221.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0 Blau, P. M. (1970). A Formal Theory of Differentiation in Organiz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5(2):201-218.

11 可參見http://ec.europa.eu/education/higher-education/bologna_en.htm

12 “The Business of Case Studies”,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 2012.

13 見楊瑩(2008)：〈台灣高等教育政策改革與發展〉，《教育人力與專業發展》25:6，頁21-56。http://study.naer.edu.tw/UploadFilePath/dissertation/l025_06_05vol025_06_05.pdf

14 見《香港中文大學概況2013-2014》，http://www.iso.cuhk.edu.hk/chinese/publications/calendar/

15 見《香港中文大學年報2011-2012》，http://www.iso.cuhk.edu.hk/images/publication/annual-report/2011-2012/pdf/2011-2012.pdf

16 詳見教資會網站，http://www.ugc.edu.hk/eng/ugc/index.htm

17 Harvey, 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 Hood, C. (1991). "A Public Management for All Seas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69 (Spring), 3-19.

不可忽視的有形之手：UGC如何改變中大

李敏剛

過去這十年，中大有不少影響深遠的改變，當中或多或少都是應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下稱「教資會」）的要求而做成。這不難理解：中大有逾一半（有時甚至近七成）的開支都由教資會分配的政府撥款支持。

年度	政府資助佔大學總開支比例
2008-2009	66.10%
2009-2010	49.80%
2010-2011	51.60%
2011-2012	57.90%

教資會在研究資助和學術考核方面如何偏頗，可見本部份劉笑敢教授的文章〈教資會，一葉障目向何方？〉。本文則旨在記錄這十年來，在研究以外，教資會的要求如何在其他方面也對中大影響深遠。

劉教授在文章中批評教資會的競爭機制、標準化、市場化和數字化的管理原則，以及追求國際排名與經濟效益，如何扼殺了人文學科和學術發展。這些原則和制度其實也一樣正在扭曲大學的管治和教學。

緊箍咒：《宋達能報告書》

把這些邏輯體現得最淋漓盡致、也最為關鍵的一份報告書，是2002年的《宋達能報告書》。當中對大學教育資助的理論框架，在往後的教資會報告書中都一直沿用（如之後2004年的兩份報告書和2009年的高等教育檢討報告），也事實上成為了往後幾輪撥款的指導方針。因此，在討論中大如何被教資會改變之先，我們有必要先看看這份報告書。

2002年，教統局委託了教資會成員、愛丁堡大學校長宋達能勳爵對本港的專上教育進行檢討，並寫成了《香港高等教育第五號報告書》，即俗稱的《宋達能報告書》。《宋達能報告書》行文累贅，因此要重組其論點並不容易。簡單來說，報告書強調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定位就是適應和推動香港的經濟轉型和發展，並以之為大學和社會的關係中重要的一環。[1]在這種理解下，大學或高等教育的角色，在教育方面就是培訓香港的勞動力，在研究方面就是為了建立領先的研究領域，為香港掌握經濟機遇。前者尤其可以在報告書對教學成果的審視只以僱主的滿意程度為標準可以見到。[2]

報告書對經濟成果的重視，可以以其對學術自由的說法為例：儘管報告書中強調政治不應干預學術，但卻同時警告學者，不要為了學術自由而不向公帑問責[3]。觀乎報告書偏重強調香港的經濟發展的重要，所謂向社會負責其實即等同於向經濟發展負責：大學有沒有確保可以用最少的公帑，而對經濟發展（即GDP 增長）有最多的貢獻？換句話說，學術自由以不阻礙大學促進經濟發展、培訓有助經濟發展的人才的任務為限。

而《宋達能報告書》的最大動作，則是批評香港的院校缺乏行政管治效率，要求院校檢討：報告書本身雖然沒有明確的結論，但在「院校管治」一章（第三章）中明顯強調等級制度對管治和財政管理的好處，而對諸如體制中民主監督、學者學院在學術和教務上的自主等均輕輕帶過，對大學管理層、學院院長的角色也只強調其管理的一面[4]。原因自然也在於「向公帑／社會負責」，也就是向經濟效益即GDP問責：要加強院校的決策和行政效率，加入量化的指標衡量教學和研究的成就；同時各種體現代表性、民主等價值的討論和溝通程序，既花錢花時間又不見得有助推動經濟發展，自然得盡量減少。

以效率之名：校園民主大倒退

隨著《宋達能報告書》的發表，一連串的改革紛至沓來的在中大上馬。首先是2005年的國際化事件，當時新上任的校長劉遵義指中大所有希望招收外地生的科系，核心課程均應該以英語教授，引起師生校友嘩然。國際化事件有另文申述，這裡不擬重複，而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中大已開始依據教資會訂立的撥款標準，來制定政策。推動國際化的最大動因，是希望為中大爭取更多的國際學生，以及聘任外國知名學者、催谷以英文發表學術論文，這些都是教資會重視的考核指標之一。國際化因此正是一連串因應教資會要求的改變的前奏。

之後便是2006年末的院長委任制。以往，中大的各學院院長（Faculty Dean）都是由學院內的全職教員互選產生，校方在2006年底即明確以接納《宋達能報告書》建議，著手改善管理效率為由，宣佈將院長改為校董會委任，由原來的兼任變成全職的行政人員，也由原來由學院支薪改為由大學中央支薪。這樣一來，學院院長便由學院以及學院各學系的代表，變為大學中央派駐院系的領導，大大削弱學院的自治。

再進一步的改革是2008年起的教務會和校董會改組。當年五月，中大教務會的一次特別會議議決成立一個特別的專責小組，研究大幅削減大學教務會的成員人數，由原來包括各學院代表和中大學生會、各書院學生會會長合共約二百人，減至約五十人。當年的建議，就是認為大學應接納《宋達能報告書》的建議，縮小教務會規模，以增加決策效率[5]。

2010年中大學生會舉行全民投票，議案為要求校方保留教務會內中大學生會代表的席位，及書院學生會代表可以列

席。最終議案獲得通過。及後幾屆學生會接連向校方施壓，教務會改組才終於擱置。

另外，中大校董會亦在2009年提出改組，經各方爭取後校方願意增加學生會會長為當然代表，但其餘成員全為校外人士及校方高層，沒有中低層教職員代表，方案仍待立法會審議。

除了在管治上犧牲學系代表性和學生參與來促進所謂「效率」之外，中大回應教資會要求的另一面向，則是將市場化、量化指標和競爭引入大學資源分配機制之中。

市場化：大學是一盤要廣開財路的生意

推動大學市場化的最大動作有二：教資會在2003年開始「配對補助金計劃」，以及配合政府推高高等教育普及率而鼓勵大專院校開辦自資課程。

所謂的配對補助金，即是指各院校每年各自籌得的首四千五百萬港元私人捐款，都能得到政府以一元配對一元的等額方式，在經常性撥款以外額外撥出補助金；而其餘籌得的款項，政府則以二元對一元的方式撥出補助，每所院校所能得到的額外補助金，以每年二億五千萬港元為上限[6]。這些捐款和補助金各院校都能自由運用。教資會此舉是希望鼓勵大專院校更積極尋求私人捐款。根據政府數據，在過去五輪的撥款中，中大共籌得逾二十七億私人捐款，連政府的補助金則近四十億，幾乎等於中大一年的開支[7]。因此，雖然政府資助依然是大學的主要收入來源，但考慮到捐款的使用自由度遠比政府撥款高，面向商界的私人捐款對中大而言已愈見重要。

在教資會的政策鼓勵下，中大校方也愈來愈看重高層管理人員（如校長）乃至各部門的籌款能力：中大內部的資源分配，也跟從教資會的遊戲規則。書院、學院和學系自己籌得的捐款，都一律由他們自行支配，不甚過問捐款用途；捐款於是成為了部門能自行掌握的資源，部門自然有很大的誘因去增強籌款能力。問題是，鼓勵自行籌款的風氣一開，便難免分散了這些教學部門應有的對教務的關注，各種教務安排難免受到籌款的考慮——譬如說一些公關工作，尤其是針對商界或各式成功商人設立的基金會的公關工作——所左右。

但更進一步的市場化則在於自資專上課程的興起。在教資會鼓勵市場化的策略之下，這十年來由各大專院校開辦的各種各樣所謂「自負盈虧」的專上文憑課程數量急速膨脹，頒發的文憑程度由高級文憑、副學士到學士乃至碩士學位都有。中大開辦的則主要為修課式碩士學位，由學院或學系自行安排資源開辦，收入則由學院或學系自主支配。根據立法會的資料，中大在2010至2011學年，由自資課程而來的收入達七億三千萬，佔中大所有學費收入的一半以上，其中自資碩士課程的收入則近五億[8]。

簡而言之，自資修課式碩士課程已經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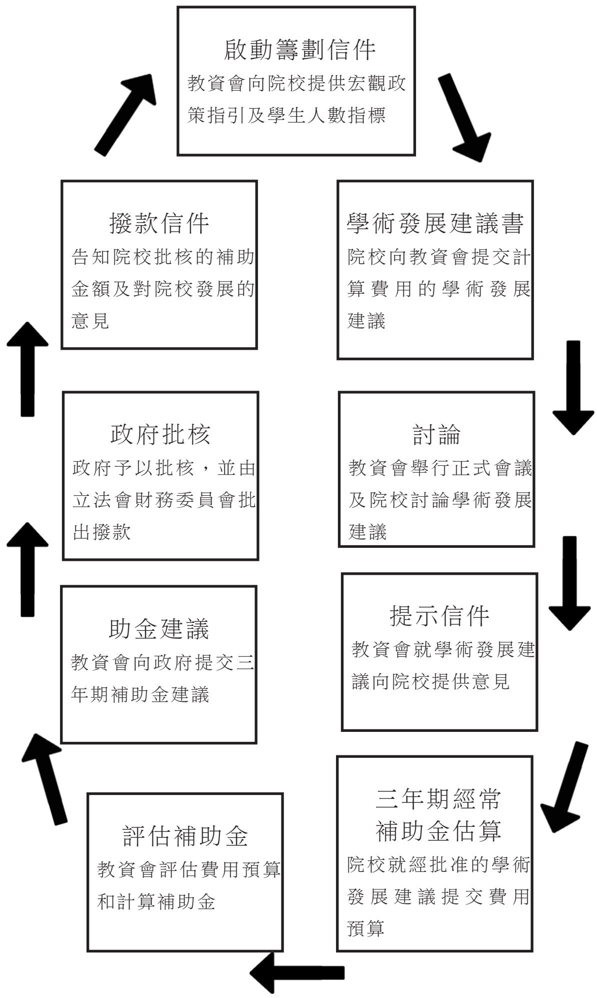
了不少院系重要的收入來源。問題是：院系又投放了多少資源在這些學費遠較一般教資會資助學位昂貴的課程？自資課程因為一直欠缺有效監管，這幾年來常為人垢病，指這些課程質素參差，同時學費過於高昂、濫收費用、賬目混亂[9]。何以堂堂大學，辦課程竟然也無法交出令人信服的監管和賬目？無他，利之所在，就是得過且過馬虎了事的誘因。

教學：殘酷的資源爭逐戰

在引入競爭方面，最大的動作莫過於「優配學額制度」。教資會對大學的撥款以三年為一周期（圖一）。自2010年至2012年的三年期撥款開始，教資會引入了「優配學額」的制度，簡而言之，就是每所大學撥出數個百分比的非專業（即非如醫學、社工等另有配額的專業科系）學額，交由教資會分配，即所謂的「競爭學額」。所有院校之後需要提供新的「學術發展建議書」，由教資會審批，決定撥給各大學的競爭學額，用意是以競爭機制激勵大專院校的創新。

教資會之中商界人士和學者約各佔一半，誠然其中的確有專家，但各院校院系的專業學術領域千差萬別，這些專家是不是有充分的學術知識去評斷不同建議書的優劣？不同學科計劃是否真的有客觀的比較基礎？最後是否變成只以教資會內成員的偏好，去分配學額？還是以前面提過的《宋達能報告書》只看重經濟發展的原則？這樣越俎代庖去插手分配大學各學科的學額，又會否有損學術自由？這些都是關鍵的問題，教資會

圖一：
年度政府資助佔大學總開支比例



的解釋卻付之厥如。

但殘酷的資源爭奪戰，卻已一觸即發，而中大就是這個遊戲的大贏家。2010年，教資會公佈2012至2015年度的學位分配結果，中大全數取回上繳的百分之六的學位；而理大、浸大卻成輸家（圖二），有些學系被削近一成學位，浸大物理系更被殺系。作為既得利益者，中大管理層對教資會這樣安排自無反對之理。

可是，中大雖然贏得競爭，成本卻可能

圖二：八大學額得失

院校	提交學額數目	獲分配學額數目	增減數目
香港中文大學	153	261	+108
香港大學	138	236	+98
香港科技大學	112	139	+27
香港城市大學	122	122	0
香港嶺南大學	22	22	0
香港教育學院	0	0	0
香港浸會大學	68	34	-34
香港理工大學	109	0	-109

資料來源：教資會

是自身重要的歷史傳統，以及教學質素。

在2010年末，校方便要求各學院統一使用「大類招生」制度，在2012年後循三三四新制入學的四年制學生，不再以學系招生，新生一開始均為學院（Faculty）的學生，第一年不設主修，第二年開始才由學生選定主修。這是一個明顯方便校方適應「優配學額」競爭制度的安排：推行大類招生以後，學系的完整性大減，而第一年因為學生並未選定主修，學院各系遂要協調學生第一年的修課方式，學院的協調角色加重了，因而也方便了學院進一步重組各學系的資源和課程以推出新課程。也有說這是希望和港大的收生制度看齊，以和港大在收生上競爭，以及推高收生成績。無論背後的動機確實為何，「大類招生」是大學的一著競爭招數，卻是明顯的。

可是，因為中大的書院制歷史，不少學系都和書院有獨特關係，如音樂系全為崇基的學生，藝術系和人類學系則全為新亞學生；一旦採大類招生，這些學系和書院的連繫勢被拆散。後經音樂系和藝術系的師生全力反抗，中大全面採用大類招生之議才告吹。現在僅有部分生命科學院和社會科學院的學生改為大類招生，學系總的來說仍保留自主的收生權利。

而優配學額、大類招生標榜靈活回應學生選擇，但一旦加上把學生數目和資源掛勾的「市場化」制度，卻會影響教學的穩定性，進而有損教學質素。中大校內各院系的資源分配，奉行的是「錢跟學生走」的原則：院系的資源分配和收生人數掛勾，學生愈多，分得的資源就愈多。然而，在優配學額和大類招生制之下，院系難以長遠估計可以收到多少學生，也就是難以估計未來將有多少教學資源。我們訪問的一位生命科學院的教授就指出，這影響到院系決定應開甚麼科目，譬如說如果開辦一些太艱深的科目，便會怕太「趕客」而令院系得到的資源減少。另外，資源不穩定和浮動大，也令到院系不敢請長約的教席（Tenure-track academic posts），轉而多用合約制聘用講師和兼職教席，這

些合約和兼職老師往往難以累積教學經驗，教學質素自難免下降。

結語：抗爭之必要

以上的政策討論，難免繁瑣沉悶。但各位如有耐性讀完，當不難感到教資會那一套管理原則對中大的管治和教學各個範疇的影響和改變既深且廣，令人怵目驚心。這些政策的改變，對一般學生來說，也許無聲無息，但卻是最切身的影響到教學的質素乃至校園的文化氛圍：在教資會的一套「競爭機制、標準化、市場化、數字化」的管理原則，以追求國際排名與經濟效益掛帥之下，教學的質素被市場利益左右而下降、管治日益輕視院系自主和學生聲音、中大自身的歷史記憶和傳統有被犧牲的危險。因此這些正是我們最應該關注的問題。

這些改變並非沒有引來反抗：由前面可見，中大學生會對教務會改組的持續抗爭，還有音樂系藝術系的師生校友起而反對大類招生，最終都有效推翻，或至少拖延校方改變的步伐。除此以外，中大員工總會曾發動「導師正名」運動，成功迫使校方修改政策，將導師（instructor）正名為講師（lecturer），並納入為教師（Teacher）類別之中，正式被確認為教學人員，也因此獲得出席院務會和系務會的資格，一反校方強調效率、漠視代表性的潮流，也是近年難得的小勝[10]。

因此，如果我們意識到一些我們珍視的價值正因為教資會的壓力而被蠶食，我們便有起而抗爭的必要。這自然並不容易：如果放眼世界，教資會所跟從的，不過是近年世界各地高等教育商品化的大趨勢，中大面對的問題其實在大專院校之中相當普遍。但與其坐以待斃，抗爭可能是開拓出路的一個更為可靠的選擇。

---

1 報告書第1.17段：「[……]香港的經濟發展取決於眾多不同的因素，而其中大部分均與本地大學和學院的未來角色有關。大學的主要功能 —— 教學和研究 —— 是創造經濟機遇的動力[……]」

2 報告書第1.5段：「本港的大學在過去數十年間飛躍發展。我們的學者在教學和研究方面均有卓越成就[……]教統局在2001年就本地大學畢業生的表現向僱主進行了一項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在受訪僱主中，94%認為本地畢業生的表現達到滿意或中等水平，而13%表示很滿意畢業生表現。」

3 報告書第3.23和3.24段：「我們不應只顧強調研究人員的學術自主，因為只有『付出』才有學術自主[……]（需要）在大量公帑和私人資助的研究項目上所承擔的一般義務[……]研究人員仍享有學術自由，但這是一種不能不顧其他因素（例如向公眾問責）的自由。大學管理層必須審慎考慮研究人員的需求與公眾的期望。」

4 報告書第3.39段：「[……]管理則是校長及其管理班子的主要職責。所以，高級領導人員應由校長任命。至於學院院長和其他負責學系財政的人士，按照國際上的做法，應按照特定的委任程序任命，而不是以選舉方式選出[……]」

5 校方改組的詳情和師生校友的抗爭經過，可參考本書卷三，「運動．角力」部份的文章：〈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 中大十年抗爭史〉。

6 2012年後的第六輪配對補助金，則以兩年為一計算期，一元對一元的限額增加至六千萬，同時每所院校的補助金上限也增加至六億。

7 見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2012年5月14日會議討論文件《為專上教育界別設立第六輪配對補助金計劃》。

8 資料來自2011年12月7日教育局答覆立法會議員提問所提供的數據，網址為：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1112/07/P201112070178_0178_87629.pdf

9 如明報這一則報導：〈資助自資混合難監察〉，《明報》，2011年9月21日。中大的自資課程，去年的學費加幅則最為驚人，詳見《文匯報》去年的一則報導:〈自資碩士百課程 狂加價中大最狼〉，《文匯報》，2012年1月8日。類似的自資課程失當的報導，隨便上網尋找都俯拾即是。

10 見《中文大學員工總會會訊》，2012年8月。

教資會，一葉障目向何方？

◆ 劉笑敢

編按：劉笑敢教授曾在北京大學、哈佛大學、密歇根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從事教學及研究工作，自2001年起任中大哲學系教授，並於2012年退休。本文另一版本曾在2013年5月27–30日於《明報》世紀版連載，感謝劉教授應允在此刊載。

多餘的引言：筆者相信，目前為止，香港的大學教育整體水平和周邊很多大學相比，還是很好的。本人在港任教十餘年，升級、申請研究項目、獲獎、延聘都夠順利，現已欣然退休。此文乃自願分擔在職同事的壓力和憂慮，不涉及、不針對任何個人。

一

近年來，一種緊張與不安的氛圍瀰漫在很多大學的科系和教授心頭。根源在於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UGC）推出以扣留、競爭、重撥的方法重新分配教育資源。對教資會的具體做法有不同解釋和理解，但清楚的是：教資會將佔大學總預算四分之一的研究經費抽起，再根據競爭結果的數字重新分配。競爭標準有二：一是RAEs（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s研究評審工作）的評分，二是競爭RGC（Research Grants Council 研究資助局）研究項目的結果。第一個標準從英國搬來，雖然弊端不少，但還不如教資會所發明的第二個標準影響惡劣。但教資會恰恰要減少第一個標準的份額，加大第二個標準的份額，直到各佔一半。

看起來教資會要重新回撥的只是教育經費中的研究經費，不涉及教學經費，但大學系一級的預算主要就是教職員的工資，一些科系無法將抽走的可觀比例的經費爭回來，那就不得不裁員，直接受威脅的正是教育部份。因此很多系主任、院長面對隱隱逼來的削經費、裁教授的威脅一籌莫展。這就直接干涉和干擾著各大學的正常的研究工作和教學工作的比重和方向，並將進一步壓縮各大學面向學生、面向香港社會服務的空間和資源投入。

這是比古代「二桃殺三士」更「高明」的現代計謀：政府不提供「桃子」作獎品，就將所有大學、院系關入無法逃脫

的自相殘殺的角鬥場。這是「將別人碗裡的飯搶過來吃」的低等遊戲，讓教授們本應專注於教學與研究本身的精力不得不轉向如何搶飯吃。申請研究經費又多了一重非學術的干擾和壓力。此競爭的輸贏標準是在研究項目和經費等方面的數字化標準，完全不考慮學科研究性質、方法的不同，以及研究人員的研究和教學的實際需要、態度、能力和特殊貢獻，與學生和社會的需要有沒有關係。這將嚴重破壞香港大學教育的生態環境，對廣大師生以及香港社會有百害而無一利。

第一，這種競爭是完全不必要的，請問，史丹福、柏克萊、普林斯頓，哪個國際一流大學是靠這種模式競爭出來的？第二，這種競爭的標準是先天不合理、不公平的；第三，這種競爭將大學管理層和教授的精力轉向研究經費數量的競爭，而不是研究本身的需要和價值；第四，這種決策反映了香港教育在根本方向和根本目的上的偏差。

二

辯曰：「教資會的決策是為了通過競爭更有效地分配和使用公帑資源。」此說貌似合理，其計算公式也可謂複雜而細密。技術上的圓熟似乎可以掩蓋和美化主事者管狀視野的偏狹和在根本方向上的盲點。這種市場化、標準化管理模式讓我們想到曾在二十世紀前期美國工廠大行其道的泰羅制。泰羅（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是發明「科學式管理」的鼻祖，其管理的首要目標是提高生產效率，方法是標準化。這種管理模式的確為工業發展帶來過高速增長，但是也將工人推到了極端緊張乏味的工作之中，工人不再是一個個獨特的活著的生命，而是創造利潤過程中的「標準件」。這種模式在工業界已經過時，但卻被西方教育界某些人當作法寶。香港教資會之實際決策者更趨之若鶩，一味追求市場效益和量化標準。潮流之下，大學教師承受的壓力與日俱增，師生關係日益淡化，教授越來越像流水線上的工人，學生越來越像流水線上的產品。在管理者心目中，人不見了，只剩下數字和名次。

市場化和標準化管理原則的前提和歸宿都在於將教師和學生當作「物」而不當做人，將崇高的教育事業當作一盤生意，將大學當作一個公司來衡量，完全不考慮青年一代全面成長所需要的健康的社會環境和人文環境，將大學校園變成一個只知計算成敗得失而冷漠無情的名利場。要知道，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生產有消費價值的商品，而是培養一代代心靈健全、有責任感、有人文精神、能獨立思考、創造的人。這樣的人，才是香港的人才，才是香港無可替代的財富，才能一代代地促進香港社會向著健康、富足而祥和的方向發展，避免香港走向只有輸贏爭鬥、沒有人情溫暖的冷酷社會。

三

或曰：「教資會的決策不過是引入了當今發達國家先進的教育管理模式。」這

是似是而非之論。這種對教育的量化管理模式才開始流行不過二十年左右，但牛津、劍橋，哈佛、耶魯已經建成數百年，這些名校的成功難道是靠今天才流行的量化管理模式達成的嗎？芝加哥大學一個教授可以為一個本科生開《金瓶梅》的課，牛津大學一個老師可以和三兩個學生邊喝咖啡邊上課，這符合教資會奉為圭臬的量化管理模式嗎？我們當然知道，在精英教育走入普及教育的時代，由政府主導的大學不可能有這種奢侈的教育模式，但我們至少應該頭腦清醒地看到，所謂量化管理模式絕不是各地名校的成功經驗，更不是在香港複製世界名校的魔術棒。

在所謂的潮流面前，教資會沒有基本的反思能力，不僅隨波逐流，而且變本加厲。教資會的決定在幾年前就已經開始吹風，已經引起大學校、院、系之管理層及普通教師普遍的憂慮和緊張。公開批評已經見於報端和網絡，但教資會一意孤行。多年來，筆者感受不到教資會對大學師生的關心、支持和幫助，感受到的只有壓力、逼迫帶來的經常的、無謂的繁忙和不安，好像一根無形的皮鞭在大家頭上甩來甩去，不得不根據教資會行政指令做很多明知耗時多、益處少的事。比如，教資會要求大學推行新的規範和各種評鑑，即使各種評鑑以及國際排名對中大哲學系評價都很高，但新的撥款標準一來，歷次評鑑結果和排名都煙消雲散。各種評鑑佔用教授教學和研究的大量寶貴時間，卻不敵一次評估後電腦幾秒鐘算出來的一個數字，既然如此，教資會連續推動的勞民傷財的各種你來我往的評鑑意義何在？

當今大學教育，美國平均水平最高，而美國各級政府對大學，包括政府撥款的公立大學，都極少發號施令，更沒有不分院校、科系的統一評鑑。如果向先進國家學習，是否應該參照美國政府對公立大學的管理原則呢？

四

或曰：「研資局之項目審批過程嚴格公正，因此得到研究經費的項目量及金額可以反映各院校和科系的學術水平。」這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不錯，研究項目申請成功的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些學科之學術水準和研究實力，但這只是對某些學科更適用的一項標準而已，而這項標準本身也不完全可靠。第一，申請研究項目的關鍵之一是撰寫研究計劃和填報表格的技巧，這不能代表申請人全面的研究能力和該項目的學術價值，而申請表格對很多學科來說完全是削足適履的設計。第二，這種審查制度可以有效淘汰低劣的計劃，但也會否定突破性的探索，因為匿名審查的同行未必理解最新的突破性研究的意圖和意義，於是最終通過的可能是四平八穩、稍有新意的研究項目。已經有學者在網上抱怨說，他精心準備的研究項目不獲批准，馬虎湊數的計劃卻順利通過。第三，花錢多的項目不一定學術價值高，還有可能浪費公帑，而花錢少的項目未必學術水平低。第四，以研究計劃獲得資助數額為標準等於以研究經費的投

入而不是以研究的成果為科研水平的量度，這顯然是荒謬的。

事實上，當今世界著名哲學家沒有誰是靠競爭研究經費而寫出優秀著作的。Isaiah Berlin 不是，John Rawls 不是，Donald Davidson 也不是，勞思光、唐君毅、牟宗三都不是。顯然，一項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和學術能力並不與所花經費成正比。不花公帑一分錢，卻寫出優秀著作，不但得不到鼓勵，反而要受到懲罰，這是對誰有利的政策？對大學來說，總體來說，研究經費當然越多越好，但顯而易見的是：經費充足只是研究成果的必要條件，絕非充分條件。不要經費，少要經費，但做出研究成績更應該獲得獎勵。

香港之某些大學對教授的評核不以學刊分類和論文數量為主要標準，而是以專家評審代表作為依據，這在日常升遷、實任制等分散評審的運作中堪稱最佳方案。但是教資會要定期在全港各校作全面評估（RAEs），情況就不同了。一是各地來的專家數量和時間有限，要在短時間內看完所有科目領域的代表作，不可能細心周到。二是少量代表性專家要審查所有學科領域的作品，因此每個專家都可能要為自己並不熟悉的領域作審判。比如，五個專家可以很好地代表二十個領域，但他們可能要評鑑四十甚至八十個領域的著作，這對某些領域的教師就很不公平。三是這種評判結果是保密的，即使專家之評分因學派不同、或有個人成見而有偏頗，被評鑑者也無從得知，更無從申辯，但它會影響某些科系的總體得分和經費分配。

如上所述，教資會所要計算的原始數據不可能做到公平、公正、客觀、準確，在這些不可靠的數據上進行的細密複雜的「科學」計算也就徒有「嚴謹」和「公正」的時尚標簽。這種對數字公式的崇拜體現了政府對各大學管理層和教授的無端的不信任。教資會的決策有如聰明人相信自己可以發明一個對籃球、足球、排球、水球、棒球、桌球、羽毛球、乒乓球、欖球都一律適用的競賽標準。其實，政府和商界完全可以大張旗鼓地支持那些有望為香港拿金牌的體育項目，但為了香港民眾的根本利益，政府也要義不容辭地撥款支持不能拿金牌、但民眾喜歡、需要的體育項目和設施。民眾的健康就是回報，就是效益，即使無法量化評估也要投資，這是政府的責任、義務和公德。

總之，從幼兒園到大學的教育都是造福社會的事業，都首先應該考慮學生與社會的需要和利益，不能處處用數字來評估教育與研究的效益與回報。

五

或曰：「教資會不想排斥任何學科，只是付之於公平競爭、獎優汰劣而已。」這是掩耳盜鈴。教資會所設計的競爭的計算公式是有明顯的傾斜方向的。第一，科技類院校和面向市場的院系比較有優勢；第二，需要大量昂貴設備的科系有優勢；第三，需要團隊合作的研究

項目有優勢；第四；需要長期重複操作的實驗項目有優勢，因為研究助理可以代替教授承擔大量實驗操作，而以理論研究為主的學科主要需要教授本人的認真閱讀、思考和寫作，用經費請的助理幫不上很多忙，用經費請人代課則很難找到合適人選，吃虧的還是學生，傷害的還是教育。

此外，複雜的計算公式似乎是兼顧考慮了很多方面，但是卻忽略或者掩蓋了一個重要事實：即這些方面往往是不可比的，而決策者主觀設定的權重往往事先決定了最後的結果。比如，大象比猴子體力好，猴子比大象靈活，如果要用一個「全面」的公式評估猴子和大象的綜合性優劣指標，那就要設定權重。如果體力佔總數百分之六十，那麼大象綜合指數就高；如果靈活性權重高，猴子就會勝出。引入更多的權重設定會幫助掩蓋設計者的主觀意向，但並不會增加公式的客觀性和公正性。這種複雜的計算公式的唯一好處是教資會不需要直接面對惡性競爭帶來的不良後果和批評，一切不利後果都可以推給「科學」管理，沒有人需要承擔任何後果和責任。

事實上，教資會的計算公式是在有意挑動大學之間、院系之間的惡性競爭，先天不利的院校或科系為保住原來的百分比不被別人搶走而憂心忡忡，雄心勃勃者則力求奪得他校、他系的那一份，勝者喜，輸者憂，強者越強，弱者越弱，決無和諧或雙贏的可能，與奧林匹克式的體育競爭根本不同。本來繁忙的大學教授又平添了壓力和緊張。

在很多情況下，良性的、必要的競爭的確可以激發人的熱情和創造力，但是人為設計的、起點不公、非自願參加、以鄰為壑的競爭則是弊端明顯，隱患無窮。不僅會刺激重數量、輕品質的不良傾向，更會令廣大有責任感的老師過度操勞，或不得不減少對學生和教育的關注，或犧牲個人健康和正常生活。院長、系主任及擔任各種職務的教授更為辛苦操勞，但他們的特殊努力和付出在對研究的量化評鑑中得不到承認。少數生性豁達、有更高追求的老師在重壓下只能選擇另一種生活目標，個別不負責任的老師也可能安於應付，得過且過。

關於惡性競爭之弊，哈佛商學院百年校慶時一學生在一場討論中說過「商學院是不悅之人的工廠（the factory for unhappy people）」。我們從中看到的一個關鍵因素就在於很多學生競爭成性，在無所謂失敗的項目中也極力競爭。在校與同學爭，畢業後與同事爭，當了老闆與同行爭，終生不得安寧，何來幸福快樂？大學不斷培養這樣的人，社會能祥和嗎？值得注意的是，哈佛之為哈佛的一個偉大之處正在於他們自己的教授和學生中有人對自身的「偉大」始終保持著一種反思精神，而不都是自得自滿，自以為是。

六

或曰：「文科學者擔心人文學科在競爭中走向萎縮，但公平競爭不考慮個人

得失，讓人文學科在競爭中『自然』流失又有何妨？」的確，在經濟發展大潮中，有些技能會過時，有些專業人士會失業，這是無可奈何的。如果從少數人或少數專業的角度考慮，筆者根本無須寫此文。如果從狹義的經濟效益（cost-effectiveness）來看，從直接的、有形的、可見的角度來看，人文學科或許可謂無用。如果我們的關切主要就在於大學的國際排名和經濟效益，那麼母語教學、中文論文、人文學科都可謂無用或拖累，砍掉最好。如果一切用英文，當然有利於提高國際排名，但代價可能是失去文化之根和民族之根。所以，新加坡政府在以英文為工作語言的同時，不放棄中小學的母語課程。

不錯，在量化管理的潮流中，在大學國際排名中，保護和發展人文學科「無利可圖」，無法彰顯教資會之「業績」。但是，如果香港人要想在經濟發展的同時維繫一個祥和、溫馨的社會，想要繼續過一個有尊嚴、有親情、講道德、有公義的生活，人文關懷、人文精神就如空氣和陽光一樣必不可少。的確，生產煤油燈的早就失業了，打算盤的技術無用了，鐵匠被淘汰了，但是，人類還是人類，現代人和未來的年輕人都還要面對生死順逆、盛衰榮辱，都還需要愛情、親情、友情，都希望獲得尊重和尊嚴，都不希望生活在冷漠和殘酷之中，這就是人文學科永遠不會、不應過時的根本原因。

顯然，各個學校各個科系都有老師關心學生的成長，但就專業分工來說，機械系不必教學生如何理解複雜的人生，商學院不必教學生如何關愛不幸群體，醫學院不必教學生如何促進社會祥和，電腦系不必教學生為何要誠而有信，化學系不必教學生如何交友如何愛，而這些都是十七八歲的少年成長為二十二三歲的青年的過程中所非常需要的精神滋養。人文學科雖然未必直接回答這些具體問題，但是卻為這些問題的回答提供了直接的思考的空間和智慧的啓迪。這也是為甚麼獲得諾貝爾獎的物理學論文很快就會被人忘掉，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兩千年後還是知識精英必讀、想讀的經典。在香港，唐君毅、牟宗三、勞思光的書幾十年、上百年之後也還會有人讀。

教資局的思路來自英國，來自西方，但全盤接受，視若法寶，毫無西方精英分子的自我反思的能力。哈佛大學教授 Harry Lewis 當過八年哈佛學院的院長。他寫了一本書：*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沒有靈魂的卓越：一個名牌大學如何忘記了教育的根本》）。他說在哈佛三十年，從來沒有聽到過教授們討論如何幫助學生成長，學生有了情緒問題，馬上向學校報告，交由心理醫生負責。教書育人的大學蛻化為單純創造、儲存、傳播知識的機構，忘記了大學教育的根本目的和目標。香港多所大學請他來作演講。一次，一位大學校長聽他演講之後問道：我們贊同你講的原則，可是政府讓我們做的卻是另外一回事，我

們應該怎麼辦？我非常同情這位校長，他心目中有真正的大學理念，但是政府管理模式的束縛使他很難施展抱負。在量化管理系統中需要的不過是自命不凡又俯首聽命的官僚，而不是關心社會和未來的教育家。請想一下，如果大學校長都感到不能自主，怎麼能指望僵化統一的大學體制能夠培養出有創新能力的自主人格呢？

曾經有一位校長，積極在中大推動英文教學。當時我對教西方哲學的同事說，對香港學生教中國哲學，還是中文效果好，你們教西方哲學的就用英文吧。沒想到他們說：如果西方哲學只能用英文教，那麼西方的思想精華永遠無法成為香港文化的一部分。一句話讓我心中暗起敬意。在校長的壓力下，他們不想苟且應付，而是要為香港的人文教育、精神資源承擔一份歷史責任。這種文化遠見、這種社會擔當，讓我由衷欽佩。這些同事是不是遠比毫無社會關懷的校長、局長更值得全體香港人敬重和支持？那些只見數字化業績而不見人生人心的官員們是否應該捫心反思？珍惜吧，香港人，珍惜那些值得我們驕傲的精神財富！

七

最後，我們也可以想到，教資會或許也有難言之隱，因為香港政府對教育和研究的撥款是吝嗇和沒有遠見的，香港政府對教育和研究的撥款在GDP中所佔比例不僅低於世界發達國家，而且低於周邊一些不很發達的國家，如馬來西亞和泰國。但是，我們直接面對、不得不執行的破壞性政策畢竟是來自教資會的，所以我們的批評首先要指向教資會，對香港的教育政策當有另文討論。實際上，教資會作為既無法定權力、也無行政權力的諮詢機構（見教資會官方網站），本來就不應該充當八間大學太上皇的角色，不應該巧借撥款為指揮棒，直接干預各大學、院系在教學與研究方面的主動權。要監督經費的使用，重要的是考核教學效果如何，研究成果如何，行政開支和研究教學開支的比例如何，有無貪污與浪費，不應該將焦點集中於誰得到和花掉了更多的研究經費。要修訂撥款方針也絕不應該挑動各大學、院系之間無謂的競爭。如果要在不同院校間進行評鑑，應該是醫學院與醫學院相比，理學院與理學院相比，工學院與工學院相比，不能讓醫學院與文學院比效益，讓理學院與商學院比需要。教資會如果真要提升香港大學的總體水平，應該研究各地一流大學豐富的成功的教學經驗、研究經驗，以及管理經驗，不能執迷於一個適合所有院校、科系的量化公式 。

兩件事值得一提。我在加州柏克萊大學見到一位大型實驗室的主任，談到他們的經費主要來自於美國國防部。我試探地問，你們是不是每一兩年要向國防部報告各項研究之進展。他說：完全沒有，國防部甚麼都不問。後來在一期《信報》上看到，國防部給史丹福大學很多經費，有人問國防部的技術官員，你們如何管理他們經費的使用？那位官

員說：不用管，最好的人是不用管的。這時我才完全相信柏克萊那位主任所說是真。這大概就是柏克萊之所以是柏克萊，史丹福之所以是史丹福的原因。或曰，我們的制度和他們不同，不能相提並論。如果真是這樣，為甚麼還要驅趕所有學校和科系的老師去追逐統一的量化指標和以名校為龍頭的國際標準？

由此我想到，如果政府相信大學所請的校長、院長、教授是合格的，那麼就不必對他們不停地揮舞行政的和預算的指揮棒，鞭策施壓；如果他們不合格，就去找更好的校長、院長和教授，何須殫精竭慮，不斷發號施令？難道一個從來沒有教過書的人一旦坐到了教資會的椅子上就比大學校長、院長、教授更懂得教育和研究？難道大學的成功不在於全體老師安心教書，專心研究，而在於服從政府機構的指揮棒？如果教資會真的覺得這種量化考核和評分的辦法普遍適用，是否可以讓大學校長、院長、系主任以及香港特首辦公室設定一個「科學的」計算公式來評判教資會及秘書處官員的專業水準和業績，由此重新分配他們的人事編制、預算經費以及下屬部門的分配方案，以便更有效使用公帑？

曾任美國總統的列根講過一句名言：「政府本身就是問題所在。」蔣經國說過：「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甚麼時候不去用它。」《經濟學人》（*Economist*）的一位知名主編 Walter Bagehot 曾經說過：「政府施政如果單調乏味，那是一個好的象徵。」說來令人痛心，教資會一系列「折騰」各大學的決策正是校園中不平、不寧、不祥之氣的根源。請教資會的實際決策者想一下，你們的權力，是只為了彰顯你們短期可量化的業績，還是也要關心一下香港學子的全面發展和香港社會的長遠需要？如果教資會真的關心香港的高等教育，真的關心香港社會未來的健康發展，是否可以組織各界對高等教育的目標、任務、方向進行一個深入全面的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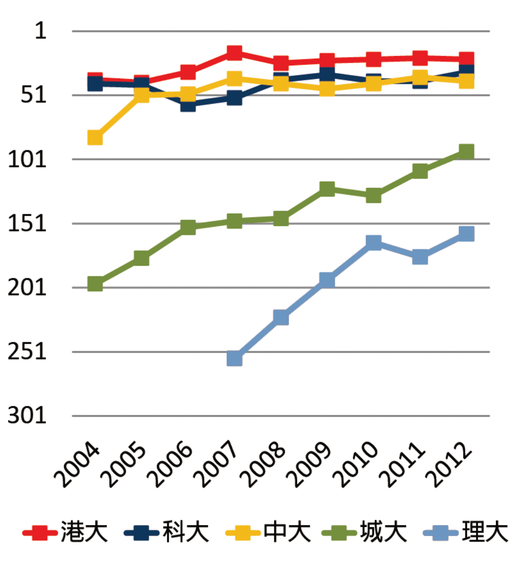
（閱讀過本文不同初稿的教授、朋友貢獻良多，在此誠致謝意。）

追求卓越？大學排名評分初探

吳嘉倫

談到近年高等教育的改變，總有人提出大學為了「爭逐排名」而忘卻或放棄了某些大學應有的追求。各院校不時大肆宣傳自家的國際排名變化，也彷彿為這種說法提供了佐證。的確，香港小小一個城市有五間大學全球排名在二百名內，大學只顧爭逐排名之說，似乎不難讓人入信。

五間本地大學
在THE-QS及QS的排名[1]



然而，國際大學排名是近十餘年的產物，在此之前，具權威性的世界大學排名並不存在。2004年，Times Higher Education與教育及職業顧問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s合辦世界大學排名（下稱THE-QS），才首度成為備受注目的世界大學排名。後來兩者在2009年拆夥，Times Higher Educations改與湯森路透合作（下稱THE），而Quacquarelli Symonds則獨力繼續推出世界大學排名（下稱QS）。加上上海交大自2003年起公佈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下稱ARWU），三者並為最具影響力的三個世界學術排名。

大學排名在排甚麼？

國際排名歷史尚短，把近數十年來世界各地大學的改變說成是為了「爭逐排名」固然不盡妥當，卻也不無道理。為甚麼？因為排名的準則並非憑空而來，而正是反映大學被各界評品其優劣的條件。我們且看上述三大排名的評分準則。

三個排名最大的共同點，是對研究產出的著重。當中最重要的兩個指標，是研

究論文的數目和被引用的次數。ARWU全部指標都與研究相關，與研究論文產出直接相關的有67%，QS和THE亦分別有20%和36%的評分比重來自研究論文產出。ARWU餘下的33%，則是與諾貝爾獎和菲爾茲獎得獎者的校友和職員數目相關。THE亦另有教員人均研究收入及研究聲譽兩個與研究相關的指標，共24%。

研究以外，佔排名評分比重最高的是院校的聲譽。學者和僱主對大學的評價分別佔QS和THE評分的50%及33%。其次是教學資源：QS單純以教員／學生比例量度，佔20%；THE則有教員／學生比例、博士／本科比例、博士／教員比例及教員人均院校收入四項指標，共15%。最後一項則是國際化的程度，分別佔QS和THE的10%和7.5%；主要的指標是非本地教員和學生的比例。

量化評核：化不可能為可能？

一家大學的優劣，必然涉及多個面向，包括教學、研究、社區聯繫以至校園環境等等。以一個數字綜合並轉化成排名，必然會過份簡化其中一些環節。比如說，ARWU設立的目的在於比較中國和海外知名大學的科研成績，自然不大考慮教學方面的因素，對人文和社科的科系也不太重視。THE和QS則是始於入學指南，相當側重於名氣、聲譽等沒有客觀準則的指標。歐洲大學聯會的報告更指出[2]，主要的國際大學排名大都只適用於精英研究型大學，以之評斷地區性大學或以普及大學教育為目標的大學並不公允。

除了側重點不同，大學排名的另一大問題是如何把大學各個面向的成績量化。總體而言，大學排名較能準確反映研究水平而非教學水平[3]。即使只考慮研究指標，大學排名亦有不足之處。舉例來說，有批評指ARWU看重獲獎數目：諾貝爾獎有提名機制而並非客觀的評價[4]之餘，和平獎和文學獎更被排除在外；菲爾茲獎更開宗明義年齡歧視，只頒發給四十歲以下的數學家。此外，不同學科的論文引用數目差異極大，例如分子生物研究論文動輒引用數十篇論文，數學論文則絕少引用超過一、兩篇論文[5]。ARWU只按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分野調整，並未平衡學科之間差異；至於人文學科，更被完全忽略。ARWU亦被批評計算方式優待規模較大、涵蓋較多研究學科的綜合研究型大學。

由於教學的指標沒有公認的客觀量度準則作可靠的跨院校比較，各個排名都只能以簡單的數字間接量度。比如ARWU採用畢業生獲獎數目，QS和THE採用師生比例，THE採用的博士生比例和人均院校收入等，都不能確切反映教學的質素。另外，院校聲譽雖然在主要排名佔相當比重，資料卻一般來自設計粗疏、回應率低、代表性成疑的問卷調查；同時，聲譽是較為主觀指標，容易被操控，也容易向早已知名的院校傾斜，不利新成立或是歐美之外地區的院校。

國際化程度的指標亦有潛在問題。THE

和QS指出非本地教員和學生比例可反映院校能否吸引海外學者和學生的指標，卻只以國界作為劃分本地生與非本地的界線。換言之，指標有利香港、新加坡等城邦（city-state）和瑞士、比利時等小國的院校。舉例而言，香港中文大學的「國際生」有近九成都是來自中國內地，當中不乏只一水之隔的廣東省學生，常被批評者指責是為「偽國際化」充數；相反，即使內地學生由大西北穿州過省到廣州中山大學讀書，亦要被算作「本地生」。

上述這些問題固然是這些排名的缺失，我們卻不必因而摒棄大學排名。事實上，所有比較優次的情況都需要面對相同的問題——總有一些重要的特質難以量化，總有一些重要資料難以收集準確的數據，總有一些面向在某些情況下較為重要而在另一些情況較為次要。筆者以為，只要緊記排名的設計有既定目的，並留意排名如何把指標量化，把它們作為概略的參考並沒有問題；只要不是盲目追求排名而忘記其背後的目的，也不見得大學以之作為招徠有何不妥。

大學追逐的，是排名還是……

諸君讀到此處，不難發現上述的準則看起來相當眼熟——事實上，大部分指標正是教資會對各院校的要求。提高論文產出、國際化、爭取業界／社區資金，通通可見於教資會報告書之中。相對於一紙虛名的大學排名，與院校撥款息息相關的教資會指標，無疑更被大學管理層所重視。難不成其實是教資會在背後推動各院校爭逐排名？

答案是：「是，也不是」。正如前文所指，無論是教資會還是個別院校，都受到全球性的新自由主義的潮流波及。國際大學排名的前設，亦是在這些全球趨勢的模塑下形成。兩者的準則趨同，殊非意外。究其根本，教資會和大學所追求，以及大學排名所量度的，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新自由主義下社會對大學的期望。

各界對大學「爭逐排名」的批評，其實也並不針對「排名」本身——倒不如說，是他們對大學的期望與排名準則反映的要求有所分歧。最終爭辯所在，仍是在於大學的理念和追求應是甚麼。

1　資料來源：THE-QS及QS網站。

2　Rauhvargers, A. (2011). *EUA Report on Rankings 2011: Global University Rankings and Their Impact*. Brussels: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asbl.

3　同上。

4　Marginson, S. (2007). "Global University Rankings: Implications in general and for Australia".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 29(2):131-142.

5　Adam, D. 14 Feb 2002. Citation analysis. The counting house. Nature, 415:726-729.

大學排名評分準則：

THE

準則	比重(%)	來源／註解
教學	30	
學術聲譽	15	湯森路透學術聲譽調查
教員／學生比例	4.5	
博士／本科比例	2.25	
博士／教員比例	6	
教員人均院校收入	2.25	經購買力平價調整
研究	30	
研究聲譽	18	湯森路透學術聲譽調查
教員人均研究收入	6	經購買力平價調整
教員人均研究論文產出	6	湯森路透資料庫，按學科調整
研究引用	30	
論文被引用次數	30	湯森路透Web of Science論文庫，按學科調整
業界收入	2.5	
來自業界的收入	2.5	經購買力平價調整
國際化	7.5	
國際／本地學生生比例	2.5	
國際／本地職員比例	2.5	
與國際作者聯名出版的論文	2.5	

THE-QS及QS

準則	比重(%)	來源／註解
學術聲譽	40	QS學者問卷調查
僱主聲譽	10	QS僱主問卷調查
教員／學生比例	20	
教員人均引用數（Citation）	20	Scopus資料庫
國際教員比例	5	
國際學生比例	5	

ARWU

準則	比重(%)	來源／註解
校友諾貝爾獎或菲爾茲獎得主	10	比重按年代遞減 （2000年代100%，1990年代90%，餘此類推）
教員諾貝爾獎或菲爾茲獎得主	20	比重按年代遞減 （2010年代100%，2000年代90%，餘此類推）
高度被引用作者	20	
出版在《自然》或《科學》期刊的論文	20	近五年出版
論文數目	20	湯森路透SCIE及SSCI資料庫，社會科學比重為2倍
教員人均學術表現	10	上五項準則除以教員人數

四年制下學科及學生的轉變

◆ 鄧權偉

自2012年開始，香港學制改為三三四制。為了解三三四對學系的課程和學生的影響，我們向理學院、醫學院、工程學院和部份社會科學學系查詢[1]。結果得到以下四系：藥劑系、經濟系、生命科學系和護理系回覆。

其實四個學系的課程與以往大同小異，如經濟系多了兩個導修科目讓同學在第一年和第四年修讀；生命科學系、藥劑系和護理系都為新制學生提供基礎課程，補充一些基礎知識。另外，生命科學系、藥劑系和護理系都認為新制課程時間較多，所以課程安排能夠輕鬆一點。學生能有更多時間參與課外活動和選讀主修科以外的課程。

課程上的轉變：

經濟學系	學分要求由62增加至63。
生命科學院	以往主科科目佔學分七成左右（99分讀大約60分）， 現在（120分讀66分），多了的學分多是分配於通識課程。
藥劑系	學生需額外修讀大學核心課程及學院課程。
護理系	學生首年必須修讀中大醫學院的學院課程

1 我們曾向以下學系發電郵查詢。我們認為三改四對於理科課程的影響較大，所以選擇了這些學系。
工程學院：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電子工程學系、信息工程學系、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醫學院：藥劑學院、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
生命科學院：化學系、數學系、物理系、統計學系
社會科學院：建築課程、地資課程

新舊制學生的比較：

經濟學系	由於新制同學於上學期只修讀了一科數學基礎課程及一科導修，在此階段尚未有充份數據及資料作出新舊制之比較。
生命科學院	– 與以往相比較難掌握如何教，因為許多以為學生會識的東西，其實他們不懂。 – 新制學生較主動，會積極發問、一年級時想報讀二年級的課。 – 新制學生的程度分別可以很大。有些學生很聰明，但有些仍要用spoon feeding（填鴨式）的方法來讀書。 – 新制學生語文能力較好。
藥劑系	– 新制學生的化學基礎知識較弱，但在補充了相關背景資料情況下，他們的表現與高考的學生不相伯仲。 – 新制學生對於資料整理的技巧稍弱。 – 三年制的學生在一年級的成積與四年制的學生相比較差，可能因為舊制課程和工作量較繁重。
護理系	– 新制學生的學習態度較為主動及積極，喜歡互動學習，熱切投入討論。而舊制學生則較為被動，較重視學習成績及考試分數。 – 新制學生的理科基礎較弱。 – 學習成績及表現仍需要進一步觀察，故此難以比較新舊制學生在成績方面的差別。

有關收錄新生：

護理系	新學制下護理課程亦會收錄文科生，學生入學後可通過修讀學院課程，獲取所需的基礎理科知識。
生命科學院	舊生要讀三科理科，理科佔計分的比重較高，所以中英D或E都能過關。但新制學生只讀兩科理科，所以要重新考慮比例問題。

與狼共舞的遊戲——嶺南大學現況與策略

鄧權偉

若要說這十年內，高等教育的重大改變，就不得不提教資會撥款制度的改變。自從2003年起，教資會開始在撥款機制中引入競爭模式分配資源，港大、中大等名牌大學不論在研究或教學的競爭中也大獲全勝，獲取極多資源。

除了在學術方面，教資會的配對補助金亦反映了院校間的強弱排名。例如第五輪配對補助金的分配結果，港大、中大獨佔鰲頭，其他院校與之相比黯然失色[1]。

雖則各間大學有自己的角色（如研究型大學和教學型大學），但競爭帶來的結果是強者越強、弱者越弱。坊間亦有傳教資會增加以競爭方式分配的金額，加強院校之間的競爭。在這情況下，究竟較為弱勢的大學如何面對這個處境呢？我們訪問了嶺南大學文學院院長陳清僑教授，講述嶺南大學現今的處境和未來的策略。

現在的撥款制度

在了解嶺南大學的處境前，我們首先要對教資會（UGC）的撥款制度有基本了解。UGC每年資助八校的整體撥款約為110億元，分為經常性與非經常性：

經常補助金	1. 整體補助金 — 教學用途撥款（約75%） — 研究用途撥款（約23%） — 專業動用途撥款（約佔2%） 2. 指定用途補助金 —研究用途補助金 — 知識轉移補助金 — 卓越學科領域計劃補助金 — 中央撥款項目補助金
非經常補助金	院校每年透過「基本工程計劃」和「改建、加建、維修及改善工程計劃」，向政府申請的補助金。

陳教授指出75%的教育開支撥款是按學生人數、進修程度、課程模式和學科等因素計算。由於這幾個部份的變化不大，而今次嶺南大學能拿回全數學額，所以嶺南大學的收入變化不大。

嶺南面對的問題

陳教授指出雖然嶺南大學在研究方面不夠其他院校爭，但由於教學撥款相對較為穩定，所以競爭學額政策對嶺南大學的影響並不算很嚴重。

不過陳教授表示現在的撥款制度其實有利某些需要大量研究資源的科目，例如醫科、工程等科目。由於需要昂貴的研究器材和研究成果容易顯現，所以這些科目容易從教資會取得更多資源。而文科、商科和社會科學等科目的研究並不需要許多資源，分得的資源亦較為少。所以港大、中大等「綜合型大學」有開設這類容易獲得資源的科目，能夠從這些學科中分撥一些資源給弱勢的科目，這樣拉上補下較弱勢的科目仍能穩健發展[2]。不過嶺南大學這種「教學型」大學只開設了文學院、人文學院和商學院，無法做到拉上補下。

雖然嶺南大學處於劣勢，在成為大專院校後，雖然各學系的資源緊絀，不過系的數目一直都在增加，並沒有因資源不足而殺系。

不鼓勵提高教學質素的撥款制度

「我們就算如何努力，也不夠其他大學爭。」陳教授承認在這場資源爭奪遊戲中，他們是難以獲勝。但是陳教授對嶺南大學的教學質素充滿信心。「嶺南大學的教學質素絕對是好的，若十分為滿分，我相信嶺南大學能拿到八、九分。」不過，陳教授指出現在的撥款制度並不鼓勵教師關注教學質素。由於教學撥款是按學生數目、科目類別而分配，即使老師多花心機於提高教學質素，亦不會改變撥款額。學校並沒有動力提高教學質素，他們寧願多花資源於提升研究，起碼有機會拿取更多資源。

陳教授指UGC近年來亦有作出改善，覺得教學質素也很重要，在未來十年將會落手進行教育撥款的改革，改變只從人數考慮分配額，將教學質素視為一個重要因素。UGC底下有研究資助局（RGC）和質素保證局（QAC）。前者對院校的研究工作評核，影響每間院校研究方面的撥款額。而後者則監察院校的教學質素，向UGC作出報告。以往QAC進行評核後，即使發現教學質素有待改善，最多只是警告，對撥款額沒有任何影響，但是未來教學撥款將會受到教學質素影響。

QAC過往的評核方式令高教界怨聲載道，指評核只是文件紀錄的堆砌、通過標準化的大綱去規限課程設計，令教師的工作量大增，是外行人管內行人的表現。「改革評核方式的確是個大工程。教育質素難以評估，很難設計一個令人信服的評核準則，許多同事都覺得評核很麻煩。」陳教授說。「但若有助嶺南爭取更多資源，我亦會支持。但是評核準則不應該從單一原則考慮，因為這會壓縮其他教學的可能性。」他希望UGC能夠考慮不同院校、學科的處境，令各院校能夠保持自己的特色。

從體制上改變

在資源競逐的情況下，嶺南大學選取的策略是選擇以教學質素為發展目標。這會否令嶺南大學提高競爭力還是未知之數。不過陳教授表示校方仍會堅持博雅教育和細校的辦學模式，因為這是嶺南大學的特色。雖然細校要面對重重困難，但這樣堅持是值得的，「否則嶺南大學將會與其他院校沒有差別，只不過是較細而已。」

1 各院校在第五輪配對補助金計劃中所籌得的首4,500萬元「最低款額」，以每1元配1元的等額方式，獲發放配對補助金，而其餘所籌得的捐款，則以每2元捐款配1元補助金的方式發放。每所院校獲發放的補助金上限為2.2億元，以「先到先得」的原則處理。在計劃開始接受申請直至2011年2月28日的首階段，每所院校均獲預留「最低款額」，以確保可獲得最低的保證款額作配對。而在首階段完結後，為各院校預留而未獲配對的「最低款額」亦開放予所有院校以「先到先　得」的原則申請。

第五輪配對補助金的分配結果

院校	捐款額（百萬元）	補助金（百萬元）
香港城市大學	156	47
香港浸會大學	142	81
嶺南大學	42	42
香港中文大學	709	220
香港教育學院	35	35
香港理工大學	114	66
香港科技大學	223	129
香港大學	666	220
香港公開大學	49	46
香港樹仁大學	14	4
香港演藝學院	32	32
珠海學院	110	77
總數	2, 292	1, 000

（以整百萬的約整數計）
資料來源：教資會網頁

2 只要院校的改動不需要教資會批撥額外資源，院校便可以自行調配資源，但需要書面通知教資會有關改動，以作紀錄。

知識轉移在中大

◆ 鄧權偉

教資會自2009年起，每年撥5千萬元給八大院校作知識轉移之用。中文大學亦在同年開設知識轉移辦公室，直到2011年才正式成立知識轉移處。在這短短幾年內，知識轉移帶來的成果非凡，根據教資會《2011/12學年知識轉移報告》，超過200項專利授權成功批出，帶來近10.5億元收入（中文大學佔2億元），利潤極之豐厚。

其實知識轉移並不是新的概念。早在19世紀的歐洲，亦曾有大學教授與化學工業合作。不過當時合作的規模仍很細，大學並未參與其中。但自80年代開始，大量名為「知識轉移機構」的中介者出現，知識轉移開始在大學制度化。大學亦樂於推行，因為能從中取得大量研究經費。

有些科目能帶來具體的經濟收益，例如工程系、醫學系容易將它們的技術作為商品出售。而有些相對較難商品化的學科，究竟他們用甚麼方法來進行知識轉移呢？我們訪問了三位分別來自歷史系、新傳系和社會系的教授，看看他們如何將知識帶到社會中。

象牙塔與群眾
——傳媒作為知識轉移橋樑的可能……不可能？

◆ 劉偉琪

知識轉移是教資會視為高等教育在教學和研究外的「第三使命」，希望大學把研究成果與專業知識應用於社會之中，以提升社會的經濟和民生效益為最終目的。其常見的途徑有：科技研發與應用、學者發表學術文章、透過媒體發言和刊登文章等。前述兩項未必為普羅大眾日常接觸，但媒體作為向大眾傳播資訊最具影響力的渠道，亦是一般大眾接收信息的當然橋樑，其在知識轉移上扮演的角色理應重要。

然而，曾任職傳媒人、現身兼大學教員和傳媒生態研究學者的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蘇鑰機教授卻不甚認同。他指出，由於傳媒渠道存在太多限制，故相較起其他方式，對大學知識轉移至社會的作用不大，而大學校方在當中可扮演的角色亦有限。

傳媒 x 學者　各有考慮

媒體遇到受爭議的議題時，很多時都會找不同大學的教授就其專長範疇對議題發表意見。蘇教授指出，此乃因為其教育程度較高及具知名度，加上身份與事件沒直接衝突，故評論一般比較可信，增加可讀性。

至於從大學教員自身的角度看，經常接受傳媒訪問的蘇教授指出，很多時大學教員會把媒體訪問看成一種服務社會的方式，故樂意借媒體就某些議題發表意見。因此，若時間允許而議題又合適的話，一般都會接受訪問。

然而，蘇教授指接受媒體邀請時會有原則考慮。除了題目要適合自己外，不同媒體的立場本身亦是考慮因素之一。「一些報章、媒體本身有一定的立場的話，便難免會令人懷疑，而我們亦會份外小心。」蘇教授舉例道，曾經有個自稱是其學生的報章記者要求他發表與政治議題有關的意見，但「傾傾下發覺好唔對路」，因為對方的問題極具引導性，明顯只想借他之口去宣揚報章本身的立場和主張，「如果我說的話不中聽就不會採用，那便無謂浪費大家的時間！」

講得兩句，又要啱聽！

但是，對於接受報章或電子媒體的訪問，蘇教授認為向社會傳達資訊的作用

不大。原因在於很多時只能「講兩句」，難以作深入論述，根本未能傳達足夠訊息和深入看法。而記者決定找甚麼人做訪問，亦很視乎其知名度及其與媒體的關係，「最重要是就手、方便和即食！」因此，除非學者本身與傳媒有良好關係、具一定知名度，而且「講野又幾啱聽」，才會經常受到訪問邀請。

相比接受訪問，蘇教授認為在報章上發表文章是較佳的論述方法。「自己寫文章的話起碼有一、兩千字，能說得比較多，譬如蔡子強定期在《明報》寫文章，這亦是一種知識轉移。」但是，寫文章亦同樣受到與傳媒機構的關係和立場影響，「不是每個人都有這個機會，又要和傳媒較有聯絡，佢（傳媒）又要喜歡你寫的東西、覺得你寫的東西『有人睇』。」

傳媒學界關係愈疏　記者太快轉換

蘇教授坦言與媒體和記者的關係深淺會影響訪談內容，「如果和那位記者比較熟絡的話，那麼願意接受訪問的機會便會較大；又例如校友，一般是『講得就講』。」訪談開始前，碰巧有一電台記者致電欲作訪問，但被蘇教授即時回絕，「我直接告訴他我正在忙，叫佢問其他人，如果是我的學生的話就不同！」

然而，蘇教授指出，近年學者與傳媒機構的關係較以前疏離得多。「以前有些記者做得比較久，譬如他走政治線或教育線，他便知道要和學界或其他界別人士保持一定關係，因此間中會有來往。」但由於近年行內記者轉換得太快，雙方難以建立長久緊密的合作關係。「相熟的話會盡量幫忙，但是有些沒有交情並且立場令人懷疑的，坦白說如果我沒有時間的話就招呼不了。」

期望不同　好多時情願專心學術

蘇教授特別指出，事實上傳媒機構與學界期望上的衝突，往往是造成兩者難有深刻合作的重要原因。因為接受傳媒訪問、在報章上發表文章、受委託做社會調查等，對學者而言都只是一種服務社會的方式，對學術研究並沒有很大幫助。

故此，不少學者並不願意花時間在媒體身上，情願選擇專心做學術研究，對於傳媒機構的邀訪或是調查委託，很多時並不具太大興趣。前者尚可理解，但後者重數據收集，不正有助學術研究嗎？「那些調查只是『工具性的工作』，有現實意義但沒學術意義，而且所花需時。」蘇教授指因為傳媒或政府委託的調查多是從「fact finding」的目的出發，並不尋求深入的剖析。「例如『傳媒公信力』，我們想問的是『公信力有甚麼元素？』、『不同年齡層的人怎看？』等問題，但傳媒機構或政府未必很有興趣知道這些事，他們覺得不應花資源去問這些問題。」

那麼為何之前又幫無線做特首選舉民意調查？蘇教授回應道原因有二，一是因為可以發掘到新事物，「例如『零分比率』，以前沒人說過，而在梁振英和唐

英年的case中是很有趣的，到底你要多討厭一個人才能給他零分？」二則是從服務社會的動機出發，希望幫助大眾了解選舉形勢，尤其當民意走向有可能影響結果時，便可配合傳媒把資訊廣泛發放。以上原因，再加上無線允許他使用調查結果作學術出版，因而樂在其中，後來更編成《特首選戰・傳媒・民意》一書。

校方鼓勵　但不是top priority！

大學校方對於利用媒體實現知識轉移的態度又如何呢？本港受教資會資助的八大院校皆設有傳媒中心或「公關部」，網頁上亦設「媒體」一欄，載列新聞資訊、媒體採訪邀請、聯絡方法等，以加強與傳媒的聯繫。

而於中大本身而言，蘇教授指出校方對校內學者接受傳媒訪問一直相當贊成，主要因為可以增加大學的知名度和曝光率，校方亦早已有意輯錄一個專家名錄供傳媒聯繫。記者向中大公關處查詢，發現本校自2010年起上載名錄至校網並定期更新，詳列校內七百餘名專家的學系、職銜、專業範疇和聯絡方法。

中大公關處指設立名錄是「為了讓傳媒可以更便捷地尋找各個專業範疇的學者」，然而細看後發現名單並不完全包括所有中大學者，例如一些在媒體曝光率甚高的社科系學者並不在名單之內，亦沒有蘇教授的名字。就此蘇教授指出，其實名單載列的多數是一些較少與傳媒打交道的專家，例如從事法律、天文學等專門範疇，反而一些知名的、經常見報的學者則少見，「譬如蔡子強，洗乜擺係度？報章有事便一定能找到他。」至於自己亦常和傳媒打交道，故並不需要靠大學聯繫。

事實上，資料提供乃自願性質，大學只不時作提醒。蘇教授認為校方只能作促進者角色，「最重要的因為不是top priority，而且有相當多的同事是不喜歡接受訪問的。所以你喜歡做我（大學）便幫你link up一下，不喜歡便算數。」然而，雖然幫助未必很大，但是「總好過乜都唔做！」

傳媒作為連結大學與大眾的可能

訪問最後，問到大學可否藉著傳媒向公眾發放訊息直接面向和連結社會，從而達成知識的傳遞。蘇教授對此卻不以為然，他認為始終「象牙塔」才是大學的本質，應以學術研究為本，當然不反對要面向社會大眾，但終歸不是本業。

而且，他認為平日接受傳媒訪問所傳遞的都是一些較短暫的資訊，「價值有時間性，即時而言可能很有用，例如透過調查可以了解到市民對候選人的看法，幫大家做決定。」但這些資訊未及深入，一時三刻並未能達到「知識」的層次，作用有限。他亦強調傳媒角色的限制，「傳媒的角色不是知識轉移，而是傳達資訊、提供平台讓大家討論」，因此不應苛求媒體在這方面的表現。

改變世界的不完美
——訪問社會學系教授趙永佳

陳秉鳳

趙永佳教授（Stephen）在中大社會學系任教多年，現時是學系副主任。除了教學及研究工作外，系務佔了他工作大部份時間，包括教職員的升遷、工作待遇、學生的成長問題等等。同時他亦關心香港社會發展，經常於報章撰文以社會學角度評論時事，亦有參與扶貧委員會的工作。光是上述這些，已難以想像一人如何能分飾多角，但過去十多年來，他還積極跟進及協助中學通識科的課程發展及教師培訓。到底當初趙教授為何會開始關注通識科的發展，在各種繁重的工作負擔下，為何仍能一直堅持推進通識科的發展？筆者嘗試透過這次訪問稍作理解。

開始的契機與過程

Stephen坦言，一開始是為了收生的考慮，而接觸中學通識科。社會學系在中學沒有橋樑和窗戶，不同於很多人也有修讀的科目（例如地理科），要讓中學生有機會認識，就想到和中學通識接軌。那時通識科仍是高中高級補充程度（AS Level）的科目，修讀人數約3,000人，只有幾十間學校開辦。社會學系本身難以出資，Stephen申請教育統籌局資助，做教師培訓，學系本身就辦一些不太需要花費資源的活動，例如社會研究入門講座及社會專題研究比賽等，讓通識科的師生參與。

後來開始蘊釀將通識科轉為必修科，Stephen就認為要開始組織教師，以免讓官僚主導整個過程。2000年，他申請了優質教育基金，籌備及成立了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後來每年的會員大會，都在中大辦，社會學系和聯會之間的關係一直很密切。

同時間，Stephen也加入了課程委員會，開始時是成員。做了三年後，由於他的政治立場較隨和，能盡量平衡各方意見，社會學系本身亦沒有做教師培訓，沒有利益衝突，這些條件讓他當上了委員會主席。一路下來，訂立通識作為必修科的課程內涵，及後向各方解釋課程，討論如何執行等問題。到現在，通識必修科推行了一個週期，委員會開始做短期檢討，包括課程本身的檢討，以及考評相關的問題。

參與通識課程的重要性

雖說是因收生考慮開始，但Stephen往後付出之多，明顯已超出當初動機所需，那到底是為甚麼？

Stephen說他現在對大學一年班的同學，會這樣說：「社會是不完美，世界是不完美，讀社會學是幫助你在這個不完美的世界生存。」對社會上不同的現象及問題，提供研究方法及分析角度，是社會學理解世界的方式。Stephen一直參與制訂的通識科課程，其理念重在讓學生透過探究各種議題，提升他們的社會觸覺，讓他們成為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培養他們批判思考及自我學習的能力[1]。這與他對大一學生所說的話，頗有相近之處。

改制前的高中課程，連培養學生讀報的機會都沒有，更不要說讓學生有分析及討論社會議題的能力。Stephen的中學經驗已在二三十年前，接觸了通識科後，了解了現時中學的情況及其中的問題，使他感到改進及完善通識課程的重要。「起碼現在每個同學都讀了幾年報紙，老師也可以有位置在課堂上講六四，以前是沒有學科會講的。其實這些都是學生理應接觸的東西。」

通識科內的專題研習報告，更是接觸到社會學專門知識的部份。Stephen很重視通識科探究問題的方法，師生之間會有種誤解，認為研究就一定要做問卷調查，又或者一定要有多於一種研究方法。後來他們就開辦工作坊，解釋何謂社會研究，講解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及訪談，同時也會教授做問卷調查的正確方法。

「這些是社會研究的建立，是科普工作（public science），我們有責任去解釋這些東西，有些學生以為做民意調查就是社會研究，譬如問支不支持三色回收桶，而不是研究三色回收桶是否有效，作為一份報告，作為一種社會研究類型，我們有這個專業知識及責任去幫中學的老師，我們就做了很多這些東西。」

其後的發展與轉變

通識科行了幾年，到現在社會上開始有不同聲音。例如建制派在2012年反對國民教育科一役後，就開始推動「反通識運動」，更有立法會議員提出「為甚麼左派學校都有學民思潮」這種問題，質疑通識科的教學及考核方法。到底是不是因為通識科的開設，而讓學生趨向政治化？

Stephen提到，有一些是當初在設計課程時的問題。課程一開始時就有一個方向，是要涵蓋公民教育的部份。在香港議題裡，一個是法治與政治參與，另一個是身份認同，本來就很有政治性，課程又要涉及中國。那時候已加入中國傳統文化在課程裡，但這科始終不是以往的中化科，所以後來建議講一個社會組織，就建議講家庭。可是講家庭又有意見覺得太狹窄，不能盡說孝悌忠信五倫等等，於是又說要講傳統節日。以上舉例只是想指出，通識課程在一開始就盛

載了太多期望，有些亦是建制派一開始覺得要這樣做的。

「本來是可以討論的，太政治化的議題對同學來說本來就較難掌握，原本可以考慮兩個議題減一個，因為現在課程本來就太多，但就是建制派將事情政治化起來，現在問題變得很難傾。」現在如果他提出減去一些內容，例如是減去一些較政治化的部份，又會被批評與梁美芬等是同一陣線，事情頓時複雜起來。

Stephen說早幾年他已經說通識的新一代會很不同，但在他心中，讀過通識的不一定是本土派或泛民，應該是更開放、更敏感、對社會有更多關注。早前他有幫中央政策組做過研究，結論是社會矛盾多，一定會有一班年青人激進化。他覺得不能夠以為可以遮蔽年青人的視野，即使課堂不教，他都會在社交網絡看到，但你不教他去分析問題，就會產生偏見，如「蝗蟲」那種歧視性用語才會應運而生。

通識科就是這樣，老師可以有立場，但他上課時要持平，要把雙方面的主張所有論據拿出來討論，再進行思考和批判。當初有進步人士怕學生不能寫太進步的東西，現在又到建制派覺得評核人員太「進步」。「其實通識不是這樣的，現在的評核制度是做得幾好，每份卷都有兩個人改，只有通識是這樣，就是因為他的開放性，沒有人應該因為他的立場被處罰。」

教學、研究、通識

Stephen在通識科上的參與，全都是在公餘的時間去做的，並沒有得到額外的支援。他總是說，現在在社會上做這些公共事務是沒有獎的，甚至教統局給他的七十元交通資助，他都要報稅。無個人回報的工作，能持續下去，是他對學科的堅持。這兩年收生見學生，他都覺得學生有明顯不同，以往社會學系的收生成績也不差，但很多同學來到面試都是你問一句他答一句，現在的學生感覺上靈活了，在溝通、闡述自己看法，甚至英語水平，他覺得都有好轉，他認為這都是修讀通識科帶來的轉變。

在各種工作裡面，Stephen花最多時間的其實是處理系內行政工作。他早幾年也做過社科院副院長，但在中大做這些吃重的行政工作，連學科減免都沒有。更不要說研究，在同行去美國歐洲開會時，他就在見本科生學生、去中學開會。他曾因為種種工作壓力備受困擾，心理不是很平衡，半夜醒來沒法再入睡。

現在他盡量減少各種公職，對外只剩下比較重視的通識科顧問和扶貧委員會，在校內只處理學科事務。未來他希望能夠多做一些研究工作。他主要的研究方向都是不平等（inequality）問題，尤其是年青人的。例如副學士和高級文憑之間的差別，青年人社會流動性的問題，他在做一個研究，跟進一班中六同學，在中學畢業後一年的路向。這些東西香港沒有資料。另一個是通識和階級的問

題，他要知道是否中產的成績會好些，基層會差一些，如果研究結果是這樣，就要爭取政策改變，投放資源去協助他們，他不希望自己有份開設的學科，最後是會減低低下階層孩子入大學的機會。他認為這些研究對社會是有用的，雖然未必可以做到世界級的研究，上不到國際級的journal，但是他仍希望透過這些研究，用他的方法去改變這個不完美的社會。

1　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通識教育科　課程及評估指引》，2007。香港：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教職以外的教與研——訪何佩然教授

胡蘇

恆常以來，我們對教授在教研以外的工作都所知甚少。對於教授，我們的印象往往都只止於課堂上的短短兩三小時，以及要求他們延遲限期的一陣子。到底教授在日常教研工作以外還會有甚麼學術活動，當中又有甚麼難處？這天，筆者邀請了歷史系副教授何佩然作一訪談。

教研以外的組織

筆者一直以來跟各位同學一樣，對教授工作崗位以外的事情一無所知。在訪問前，搜集過一些資料，才發現何生在教研以外原來還負責著兩個推廣民間歷史的組織——李和聲香港歷史資源中心和梁保全香港歷史及人文研究中心。

何生指出這兩個組織都在推廣公眾歷史上肩負著不同的功能，李和聲香港歷史資源中心的主要功能是保存和儲藏歷史資料，鼓勵民間各界將不同種類的史料交到中心，以供老師、同學及各界人士共用作研究用途。

而梁保全香港歷史及人文研究中心（後稱「梁保全中心」）則主要研究香港歷史，由本土歷史出發，邁向中國，亞太地區以至全球，比較本土與外地歷史發展的異同。

與民間組織的合作

梁保全中心除了研究以外，更積極與民間各團體合作舉辦活動，就像2012年舉辦的「歷史留聲」便是與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合作，以中學生為目標的歷史推廣活動，推廣研究本土歷史的計劃。例如真光中學的研究題目是「香港紙紮業的轉變與傳承」，中華基督教基智中學的是「從益力多看觀塘工業的興衰」。這些便是實實在在的跨出象牙塔，向民間，向社會推廣研究本土歷史的重要，更提供機會讓他們親身參與和學習，是少數向民間推廣歷史的成功例子。

除了這些較大型的活動以外，梁保全中心亦辦了不少較「學術」的活動，例如「中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歷史與回憶」國際研討會，便探討了香港於內地上山下鄉的作用。何生更點出現在研究的方向已經不再是單系獨立研究其主題，研究方向日漸走向科際整合，講求跨學科的研究，涵蓋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問題，好像中國知青的講座便包

含了傳統政治史以外的研究方向，還包含了中港關係、社會學以至文化研究等領域的探討。

發展至今的成效

當問及這些組織的成效，何生強調組織的目的固然是要推動及普及香港歷史，保存歷史文物，而更重要的是作為傳播資訊和教育的中介作用。當其他的大專院校、民間組織和社福機構打算做推廣研究歷史的計劃，都馬上會想起中大的相關機構。「好多組織沒有經驗，好多野都唔識，我哋就負責傳授相關經驗、提供人手甚至教導學員，喺唔同方面協助。」何生提到一些典型的例子便是擔任講座講者、做比賽的評判。至於公眾的反應也相當熱烈，例如在博物館定期辦的歷史講座便經常滿座。那麼在中大以外，還有沒有類似的組織呢？何生便打趣道：「其他院校都可能有，但我哋係唯一一個有咁嘅規模嘅組織，仲係免費，提供到義工囉。」

錢從何來？

所有組織都需要營運資金，這些推廣民間歷史組織的資金又從何而來的呢？尤其是需要一定資金支持的活動和研究。何生便指出兩個組織的營運資金都是財政獨立，不是由中大或教資會（UGC）而來，而是依靠一些有心的善長捐助所支持，配合良好的財政計劃，因應收入而限制提款，使組織能夠持久的運作。

中大於推廣本土歷史的態度

既然營運資金和所辦活動的次數與大小有這麼大的關係，何不向中大要求資助？何生慨嘆「嗰時（本土歷史研究還沒有得到大學認可時）做本土研究，唔罰你已經偷笑喇，仲想要資助？」由於中大的資金來源主要來自UGC，而UGC下放資金的評核側重各院校研究的國際性，以爭取美國學者的認同，提高國際排名，因此並不重視本土研究。就算學者想要推廣民間歷史、教中學生、辦公眾展覽和講座，學校亦不會鼓勵。

「近年黎，沈校長上台，知識轉移處成立，呢種風氣先稍為好轉。」何生指出知識轉移處的出現，起碼肯定了本土研究的工作。但何生點出中大從來沒有向她的研究施壓，學術自由相當大。她指出做國際研究固然容易得到大學的肯定，有助升職加薪，但做本土研究最差的情況亦只是不能升職，學校從來不會干涉他們的研究，這個空間是相當重要的。

本土研究和民間歷史的前景

既然在大學在民間推廣學術吃力不討好，為何何生要繼續堅持下去呢？「現在的學術與民間脫晒節，一班學者喺大學寫左一大堆嘢出黎，但係出唔到社會嘅，咁有咩用呢？」何生說民間推廣正正是學者應該做的，加上這些研究及推廣正正是她教學的興趣和熱情，即使沒有任何支援，大不了多花一些時間、一些精力，她都會堅持做下去。

當看見民間推廣組織發展日漸成熟，校方又開始認同民間推廣的重要性，筆者

本以為其發展會愈來愈好。豈料何生一盤冷水潑來：「喺香港的大氣候下，要發展本土研究有相當大的困難。」

何生指公眾一向對學術研究沒有多大興趣，甚至認為本土歷史沒有研究價值。「以前嘅人直情認為香港歷史兩句就可以讀完。」另一方面，政府和學界只重視學術成就，一直忽略學術普及化，只願投放極少的資源。何生指出只要學術界一天要爭國際排名，忽視本土研究的風氣便一天不能改善。「你諗下，研究香港大排檔點上國際學術期刊？」何生一句可謂點破了本土研究悲哀的現況。

大學教育與專業資格

吳嘉倫

一直以來，大學的其中一項主要工作是培訓專業人材。近二十年來，各行業專業化和學位化的趨勢尤為明顯。事實上，中大每年約3,500名收生當中，有37.8%屬專業學位，若連尚未完全專業化的教師計算，更達41.2%。

這些學位大部分都需要通過有關政府部門或是行業公會的評審，而醫學和護理學的學位通過評審，更可豁免專業考試；法律學位亦可豁免入讀PCLL（法學專業證書）的轉換考試。對學位有所評審，固然某程度上讓公眾對該專業較有信心，但課程評審亦有其局限——首先，課程評審意味著各院校需要投放資源配合評審當局的準則，因此課程難免趨同，減低了院校課程設計的自主性；若專業課程有國際互認的安排，趨同化更會在全球的層面出現。其次，評審當局不必然是客觀、持平的第三者，反而可能是傾向保護自身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以會計為例，香港會計師公會在2004年中止承認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ACCA）的資格，便被批評是為了限制未來的會計師人數而對ACCA「過橋抽板」。因此，專業學位的評審也不一定能保障公眾的利益。

下表概括了中大開辦可申請專業資格的學位課程及課程評審概況，立此存照。

大學教育與專業資格

學科	2012年中大收生數目（四年制）	專業資格	評審單位	入行要求[1]	其他入行方法	評審概況
醫學	204	註冊西醫	香港醫務委員會	本地學位	海外學位+執業試	醫務委員會自1998年起每五年評核一次兩大醫科課程，最後一次評核在2008年完成並出版課程指引。
藥劑學	58	註冊藥劑師	香港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	本地學位+執業試	海外學位+執業試	局方沒有公開評審程序或準則。
護理學	198	註冊護士	香港護士管理局	本地學位	海外學位+執業試	護士管理局在1999年成立，並在2002年把護理教育全面過渡至大專程度。所有本地護士培訓課程都須符合護士管理局的課程綱要。最新的普通科註冊護士培訓課程綱要在2013年出版。
中醫學	25	註冊中醫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本地學位+執業試	海外學位+執業試	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在1999年成立，轄下「中醫組」訂立中醫學位課程的基本要求，並設「中醫學位課程評審小組」負責評審事宜。委員會在每年執業試接受申請時公佈合資格課程名單。
法律學	72	事務律師／大律師	香港律師會／香港大律師公會	本地學位+PCLL[2]	海外學位+轉換考試+PCLL	兩個行業公會沒有進行評審，由三間開辦PCLL的大學共同決定。
專業會計學	128	會計師	香港會計師公會	本地學位+QP[3]	海外學位+QP／非會計學位+轉換課程+QP	公會的「資格及考試委員會」在2009年成立，所有本地學位和轉換課程都須評審，評審有效期一般為五年。最新的評審指引在2013年出版。
工程學	557	工程師	香港工程師學會	本地學位	海外學位	工程師學會共有二十個不同專業，所有認可課程都須經學會評審，評審有效期一般為五年。最新評審準則在2011年出版，並引入了目標為本的評審原則。
建築學	32	建築師	香港建築師學會及建築師註冊管理局	本地學位+執業試	海外學位+執業試	課程評審和由學會及管理局共同進行，惟兩者均沒有公開評審的程序或準則。
社會工作	48	註冊社工	社會工作者註冊局	本地學位／副學位	海外學位／副學位	註冊局在1998年成立，社工課程須經局方評審，並每不少於六年再次評審。最新的評審準則在2012年出版。

（該年中大收生總人數為**3,493**人。）

1 各專業都有其實習要求，在此從略。

2 PCLL即法學專業證書，為一年制的後學士文憑。

3 QP全名為Qualification Programme，是香港會計師公會設計的專業資格課程。

2003-2012本科一年級生收生人數

課程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三年制）	2012（四年制）
人類學	20	23	22	22	20	21	22	20	21	21	20
中國語言及文學	90	88	88	88	89	90	86	76	87	91	85
文化管理											25
文化研究		19	19	17	17	19	18	15	22	20	21
英文	65	66	63	66	68	61	59	63	62	62	62
藝術	25	22	21	21	22	22	22	22	22	22	18
歷史	57	56	54	55	55	55	55	50	50	51	52
日本研究	23	26	25	26	25	23	26	25	25	26	26
語言學		17	20	17	20	15	19	21	22	17	19
現代語言及文化	35										
音樂	25	24	22	31	34	34	32	31	31	31	30
哲學	24	28	22	24	29	24	23	25	23	26	22
宗教研究	22	21	21	19	20	20	22	19	20	20	22
神學		1	1	2				1		1	
翻譯	41	33	29	33	34	36	36	35	36	36	35
學院總計（文學院）	427	424	407	421	433	420	420	403	421	424	437
工商管理學士綜合	343	350	303	292	266	315	308	321	340	224	274
工商管理學士 —— 法律博士					10	11	11	9	11	8	
環球商業學			15	16	15	16	14	15	18	14	10
酒店及旅遊管理學	60	54	73	68	72	73	71	68	72	67	69
保險、金融與精算學	31	37	45	56	47	59	63	43	43	37	
保險、金融與精算學／計量金融學											72
國際貿易與中國企業								20	18	14	5
專業會計學	143	156	165	178	174	148	132	128	144	131	128
計量金融學	35	32	45	54	88	73	47	49	48	34	
商科類				1							131
學院總計（工商管理學院）	612	629	646	665	672	695	646	653	694	529	689
語文教育	36	37	46	45	47						
中文及中文教育						22	22	20	29	27	26
英文及英文教育						25	22	25	26	24	26
英國語文研究及教育				33	46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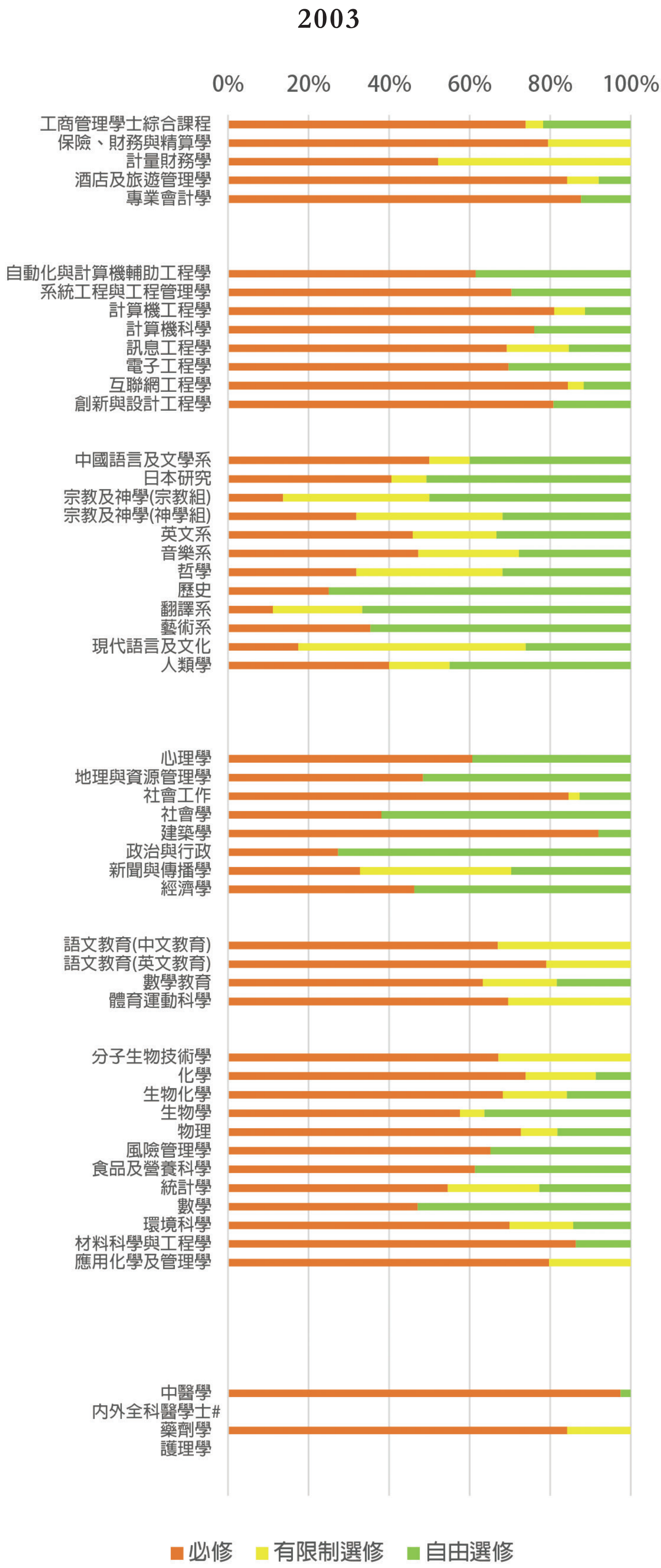
課程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三年制）	2012（四年制）
通識教育							22	33	29	20	20
數學及數學教育										17	24
健康與體育運動科學	25	20	20	19	21	20	20	18	21	22	21
學院總計（教育學院）	61	57	66	97	114	107	86	96	105	110	117
工程學											557
生物醫學工程學							2	54	53	56	
計算機工程學	46	50	38	43	29	22	22	27	34	49	
計算機科學	64	89	102	86	109	112	109	95	96	70	
電子工程學	96	85	82	98	82	100	86	78	75	73	
信息工程學	81	112	139	93	111	121	109	96	82	80	
創新與設計工程學	23										
互聯網工程學	51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	43	60	48	53	72	65	59	68	61	60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	80	86	101	86	86	71	87	86	89	70	
工科類					1				1		
學院總計（工程學院）	484	482	510	459	490	491	474	504	491	458	557
法律學				55	64	64	68	65	68	66	72
學院總計（法律學）				55	64	64	68	65	68	66	72
醫學	142	141	126	128	130	125	163	161	166	199	204
護理學	135	158	173	178	172	190	197	194	201	199	198
藥劑學	34	29	30	30	31	29	34	32	36	53	58
公共衛生							35	36	37	32	36
學院總計（醫學院）	311	328	329	336	333	344	429	423	440	483	496
理學院											474
生物化學	46	45	47	45	35	41					
生物學	57	64	50	55	50	57					
化學	52	65	64	66	68	71	65	60	69	64	
應用化學與管理學	20										
細胞及分子生物學						1					
中醫學	23	23	29	25	25	26	26	27	26	25	25
環境科學	32	30	30	30	27	31					
食品及營養科學	32	32	33	35	32	30					
生命科學							230	202	225	212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	22										
數學	47	56	58	62	70	65	58	60	71	51	
數學精研											28
分子生物技術學	38	33	39	29	33	37					
物理學	54	70	59	62	73	71	71	67	65	68	
風險管理學	22	23	33	27	28	30	37	52	37	20	17
統計學	58	53	58	54	46	51	54	53	51	47	
學院總計（理學院）	503	494	500	490	487	511	541	521	544	487	544
社會科學											139
建築學	51	50	50	53	52	54	50	52	49	43	32
經濟學	98	105	115	102	100	109	103	104	106	78	65
地理及資源管理學	52	54	52	54	54	59	53	46	53	51	39
政治與行政學	56	55	52	55	53	51	52	55	51	50	45

課程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三年制）	2012（四年制）
新聞與傳播學	71	79	78	73	74	67	76	74	69	67	59
心理學	73	69	68	65	70	67	72	74	72	59	44
社會工作	49	47	49	46	49	48	48	48	49	50	48
社會學	58	54	60	58	58	64	59	45	58	56	46
城市研究											20
學院總計（社會科學院）	508	513	524	506	510	519	513	498	507	454	537
中國研究				4	9	9	20	19	16	14	8
環球經濟與金融											22
計量金融學及風險管理學						5	17	27	34	13	14
數學與信息工程學				25	17	19	13	21	18	10	
文科類			1	1					3		
理科類			1						1		
總計	2906	2927	2984	3059	3129	3184	3227	3230	3342	3048	34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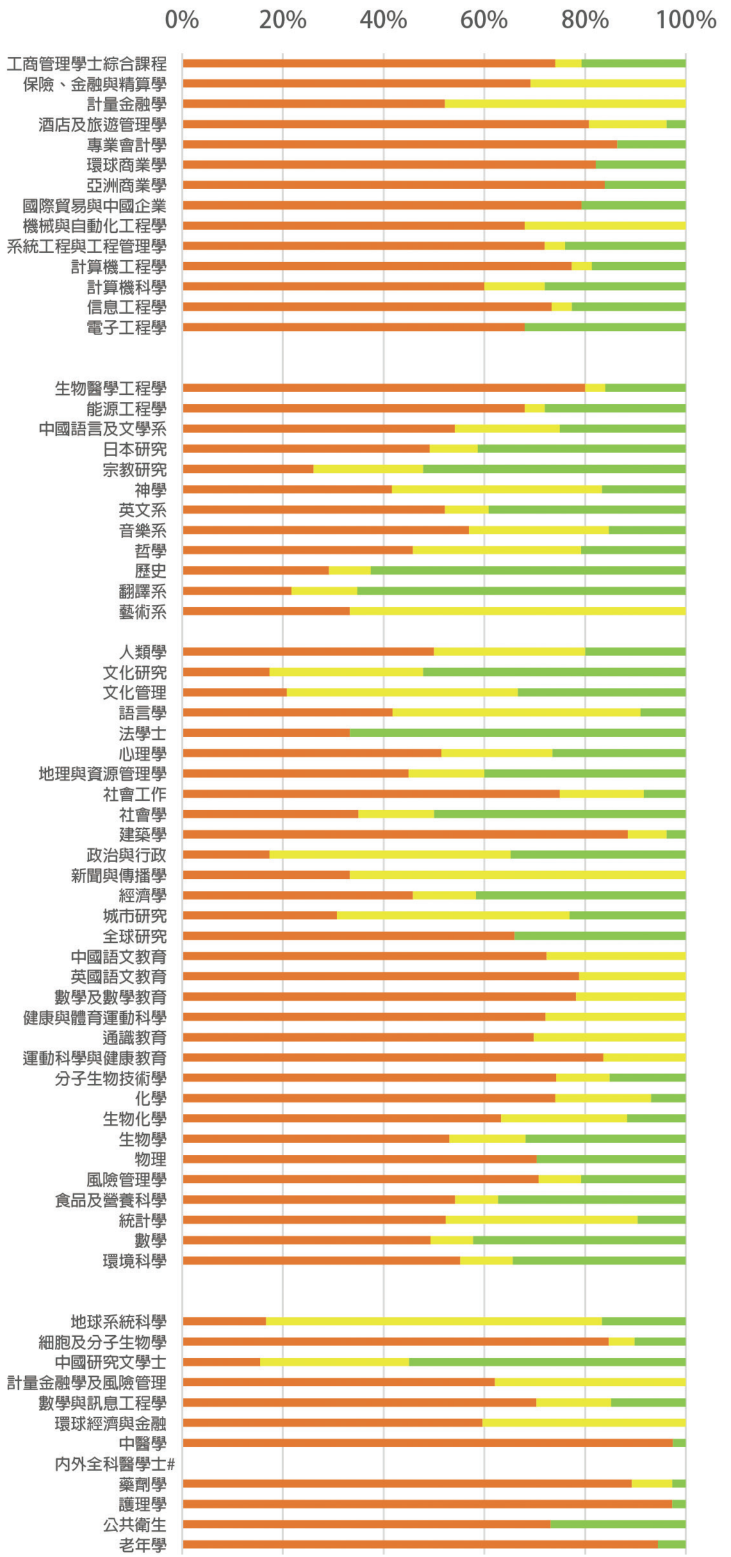
資料由香港中文大學傳訊及公關處提供。

2003-2004/ 2012-2013 主修課程要求比較

◆ 整理：吳嘉倫



2012



1 不論官方課程要求內如何命名，必修、有限制選修及自由選修學分定義如下：必修——必須修讀才能符合課程要求的學分。有限制選修——有多於一個選擇可符合課程要求，但並非自由選修的學分（例：三科選讀兩科、在指定選修範圍選擇）。自由選修——在主修科內自由選修的學分。

2 如課程要求可選擇多於一個大綱相同或相近而程度不同的課程以滿足課程要求，歸類為必修學分。（例：計量金融學要求必須修讀「FINA2010財務管理」或「FINA2110財務管理：基礎及分析」，算作必修學分）

3 選修名單內必須包括學科絕大部分的選修課程，才算作自由選修。如選修名單內包括其他學科的課程，而課程要求指定不可修讀少於若干主修科目，或不可修讀多於若干其他學科科目，仍全數視為自由選修。如課程要求對選修學分程度有限制（例：至少6學分是3000以上），亦全數視作自由選修。

4 組別和專修範圍：不論官方課程要求內如何命名，如課程有兩個或以上滿足主修要求的方式，而要求互有衝突者，視為不同的組別；如課程有一個較寬鬆的滿足主修要求的方式，以及一個或多個較嚴格但與主修沒有或只有輕微衝突（不多於6學分）的方式，視為專修範圍。

5 可申請豁免者一概作沒有豁免計算。

6 如選修科有學分不同的科目可選，概以最低學分的科目計算所需學分。

7 2012年學院課程計算在主修課程內；如有指定修讀科目，列為必修，餘下列為有限制選修。

8 工程學院ELITE stream及各科雙學位課程不在此列出。

9 # 非學分制。

2003-2004/2012-2013主修課程要求比較

上表比較了中大2003-04年度及2012-13年度（四年制課程）中各主修課程的必修及選修學分變動。

從表格可見，中大現存69個課程中有48個課程在兩個時期皆存在，唯醫學院的內外全科醫學士不採用學分制，護理學課程在2003-04學年亦未採用學分制，故實際可比較的課程數目為46個。

大學學制由三年制改為四年制，畢業學分要求由99學分升至123學分。新增的24學分當中要分配通識教育6分，中文3、英文6分，還有資訊科技1分，尚餘8學分的空間可讓學系增加。然而主修學分（包括學院課程在內）平均僅增加1.6分；當中大部分為必修學分，增加了1.2分，而選修學分只增加了0.4分。主修學分增加最多的是教育學院，平均增加了12.3學分；而工商管理學院、工程學院及醫學院更是不升反跌。

我們把選修學分分成了「有限制的選修」和「自由選修」兩類；當中，大部分學科都增加了有限制的選修學分而減少了自由選修學分。這在社會科學院和文學院尤為明顯，其中一個原因是學院課程的設計——四年制新課程要求學生修讀三個由學院和學系選定，來自同一學院的基礎科目。理學、工程學、工商管理、醫學和教育學院都把其中兩科甚至全部三科列為必修科目，而社會科學院和文學院則傾向只把一科列為必修，甚至三科全是選修。自由選修學分在大部分學院都大幅減少則是不爭事實；與此同時，共有15個課程增加了組別或專修範圍，減少或取消了組別或專修範圍的只有7個。

此外，不少課程都有按範疇把選修科目分類，並以規定每個範疇最少修讀若干學分的方式限制選修。例如政治與行政學的選修科目，便被分成比較政治、大中華研究、國際關係、政治理論和公共行政及政策五個專業範疇，學生須在其中選三項修最少兩科。這種限制選修的方式，在文化管理、環球經濟與金融等跨學系的主修課程，尤為常見。

這十年來的學分結構改變，部分來自學制改變，部分可能是源於各學科的學術發展走向（例如大量跨學科課程的設立），也可能是由於教學方針的轉變。諸多原因孰輕孰重，筆者未敢妄言。然而十年來課程的轉變確實不小，我們在此姑且留個紀錄，望有心人日後解答。



中國・香港

前言

◆ 陳嘉銘

回歸後，中共對香港的干預加劇，港人對中共的不滿有增無減，加上媒體不斷報導中港之間的差別——不論是文化、經濟、政制——使得中港關係越趨為大家無法迴避的議題。即使在中大的校園裡，我們都不難見到兩地之間的交往，當中包括：內地生來中大就讀、中大決定北上開辦分校、內地NGO及知識份子來中大交流等等。由是，我們設立了這一部份，梳理中大如何受中國影響、中大校方進軍內地教育市場的情況，以及中大人如何嘗試反過來影響中國。

南來北往

在這十年來，中大校園最大的變化之一，顯然是內地生急增的趨勢。一般而言，本地生都知道內地生的社群存在，但卻較少跟內地生深入溝通。語言障礙、文化差異，大概是我們與他們疏離的原因。事實上，我們對內地生的了解真的十分淺薄：究竟他們為何要南下來中大讀書？他們對中大的印象是怎樣的呢？他們與本地生的交流是怎樣的呢？在中港矛盾日漸升溫的情況下，他們又有甚麼感覺？在啟首的三個訪問中，我們找了兩位內地本科生及一位研究生去回答這些問題，從中可看到內地生對上述問題的想法，嘗試打破香港學生對內地生的刻板想像。當中最有意思的莫過於是新亞學生會幹事孫賢亮的訪問：從這篇訪談，我們看到中大的環境如何為內地生帶來政治啟蒙，令他們對中國政制有所反思，而不是如坊間所言，內地人就是命定被中共洗腦。

〈假如這只是內地生的問題〉則從數據和制度入手，分析內地生學額急增的因由。文中指出，教資會之所以提高非本地本科生的收生限額，並且取消對研究生課程非本地學生人數的限制，其實是按照《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報告書》的指引去做。換句話說，引發學位資源問題的很多時都是制度，故此我們應將矛頭指向政府調撥資源，而非在內地生身上。

正當越來越多內地生來港就讀的時候，我們聽到不少香港人說，青年人要北望神州，把握北上的機遇。但實際情況又是怎樣的呢？呂大樂的〈這麼近，那麼遠——機會結構之轉變與期望的落差〉一文顯示，香港的年青人北上工作的百

分比自九十年代便一直下跌。而且，香港的青年人很多時都難以單人匹馬投身內地的人才市場，而是需要透過香港的公司來提供機會。然則，所謂的「中國機會」主要是向有一定經驗及資歷的人士開放，而非年輕人。那麼，對青年人要把握北上機遇此一說法，我們是否要有所反思呢？此外，我們輯錄了一個由中大傳理學院碩士生做的研究，展示香港學生北上工作的考慮和擔憂。

深圳分校

正當不少年青人猶豫應否北上發展，中大校方已急不及待北上跟中共政權合作，把握它的「中國機會」。這裡所講的，自然是中大在這十年來最重要的工程之一——深圳分校。〈鳥籠內的鳳凰——深圳分校點評〉一文就嘗試分析中大北上發展的動機，與中共需要香港高教機構在內地建校的原由。另外，文中點出了分校的學科去政治化的問題，並且提出對分校缺乏學術自主的擔憂。縱然有人期望深圳分校會成為改變內地學子政治意識的契機，將香港一些較進步的思想帶入分校，但觀乎各種制肘，作者對深圳分校的判斷是，它只屬一項配合中共經濟發展需要的工程。

反攻大陸

當然，北上內地不一定是為了賺錢，它還可以有改變內地公民社會、對抗中共政權和挑戰權貴資本的面向。事實上，好些中大人眼見內地的人權和勞工權益受中共和資本家踐踏，都選擇北進去改變現狀。陳健民的〈新北進精神〉便首先點出，在過去十年香港的大學和民間組織都在推動中國的公民社會，為內地的民間組織提供資源、理念和人才培訓。這種具有政治意味的北進想像，對改變內地的社會和制度絕對有積極的意義。

就影響內地公民社會而言，中大都肩負了一定的角色。〈香港正能量：中國NGO的黃埔軍校〉描述了中大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如何利用香港這個相對有公民自由的地方，讓內地知識份子來港分享內地的社會狀況，跟香港的學生交流，同時讓他們了解香港的政經狀況。另一方面，研究中心又會為內地公民社會的社運人士提供課程，讓他們學習香港的社區組織和抗爭經驗。〈中港公民社會如何交流——訪青年公民社會〉這篇訪談，是從中大學生團體出發，理解他們去大中華地區（包括台灣）的民間團體實習的情況。

〈始於一個承諾——訪問Francine〉及〈中港關係的另一面——殺人的資本與掙扎中的工運〉兩篇文章，則訪問了兩位在內地勞工權益團體工作的中大人。從這兩篇訪問，我們除了看到她們的堅持和組織經驗外，亦了解到中國改革開放後，香港的資本家北上內地剝削內地工人階級的狀況。她們對中國政經格局的分析，的確為我們提供了思考中港關係的資源。

八九六四

「中國・香港」最後的部份是處理官方校史裡永遠避而不談的禁忌——六四。莊耀洸的〈中大與八九民運雜談〉寫於1994年，輯錄此文的原因不單是讓讀者了解到中大人在八九民運的位置，更重要的是思考作者提出的疑難：究竟我們應該怎樣看待中國的民主運動？至於馬嶽的〈當15萬變成基本盤〉就寫在六四廿一周年，點出年青一代已開始認識到八九民運，成為民主運動新一波的推動力。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支持平反六四已成為香港人理所當然的普遍價值，使得逃避表達立場的建制往往在道德上變得很矮小。最後〈淺談《中大學生報》六四特刊之轉變與不變〉嘗試歸納過去十年中大學生報做六四特刊的異同。近十年六四特刊的重心，都是希望讀者不要只將六四事件的焦點放在鎮壓當晚的畫面，並且反思支聯會五大綱領的不足。而近幾年六四特刊的趨勢，更嘗試用宏觀的政經分析來理解六四運動的前因後果，開拓一個新的角度讓讀者思考日後的中港關係應該如何走下去。

結語

這幾年來，一種主張中港區隔的本土主義思想在香港相當盛行。先不論中港兩地切割是否可行，但這種高舉族群政治的想法，顯然是忽略了更根本的階級矛盾。事實上，以族群為分析單位來看中港關係，是看不到香港的資本家除了剝削本地的工人階級之外，亦同時大肆壓榨內地的工人。另一方面，這種思路也很容易無視兩地的權貴階層如何合作去鞏固他們自己的利益。更重要的是，這種本土主義想法是會窒礙兩地底層人民聯合對抗中共、特區政府和兩地資本家的可能。究竟我們是否渴求這種「河水不犯井水」的中港關係想像？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話，我們又會渴望一種怎樣的中港關係？最後，中大人又可以在當中扮演甚麼角色？我相信，這一系列的文章對回答這些問題會有所啟示。

走不進本地，離不開內地
——一位內地本科生的校園生活

◆ 劉子僑

小明，三年前從西安遠赴香港讀書。與他同一年從陝西來中大留學的一共有九人，當中六人是自費的，而小明是成績比較好，能拿到獎學金的那三人之一。

問：當初為甚麼會選擇來中大升讀大學呢？

答：其實我也沒覺得哪兒比哪兒好，（香港）不會（比內地）好多少，也不會差多少。只是父親覺得香港的政治和經濟都比較好，所以便選擇來香港了。

問：你對中大的印象怎麼樣？

答：我覺得中大的人還是挺友善的。住了宿舍以後，宿生會的同學都會主動敲門叫我參加糖水會，又會用普通話跟我聊天。而且在入宿的時候，宿舍的工友又會幫忙搬行李。可是我感覺香港人與人的關係太淡了，上同一節課的、住同一個宿舍樓的大多不認識，認識的人交流也很少。

問：剛來中大讀書，生活上遇到甚麼問題嗎？

答：第一年的時候，由於還在學廣東話，感覺很多活動都很難參加。記得 Year 1 的時候，我參加了棋牌學會，曾去過好幾次他們的聚會，可是卻從來沒有人跟我講解玩法，他們只叫我去看說明書。過了幾次以後，我也不去他們的聚會了。

問：除了棋牌學會，你還有沒有參加甚麼活動？

答：之前還參加過一個叫「校園保健大使」的活動，是保健處辦的，為期一年。前半年每週末去聽一次課；後半年分書院自行舉辦促進校園健康的活動，由各自的書院資助。我們聯合的小組共八九個人，一半是內地生。我們總共舉辦了五六個活動，包括帶領十幾個人去西貢行山、在 UC Can 門口免費派水果杯、辦瑜伽班等等。

問：不會廣東話對學業會不會影響很大？

答：IBBA大部分課程都是用英語授課的，所以不懂廣東話問題也不大。唯一不太習慣的是present時要穿西服，總覺得這樣很「裝逼」（扮酷）。

問：你覺得內地同學在求學方面，和本地同學有沒有甚麼不同的地方？

答：我感覺大家都是比較在乎成績的，課堂參與其實也跟本地生差不多——就是基本沒有啦，除非參與算分。不過內地生基本都不會走堂，還有我們不會付錢請人輔導功課啦。

問：香港現在有不少人對內地人都很反感，你遇到過類似的情況嗎？

答：有一次，一些基督徒朋友邀請了我跟一個朋友——他是本地同學來的——去他們家裡吃飯，還煮了頓飯招待了我們。離開的時候，由於我們都不熟路，而那裡離中大比較近，便一起坐出租車回宿舍。在車上，我的朋友跟那個出租車士司機談起內地人，那司機說內地人坐車不給錢，好像是有一次他載過一個內地同學去中大的宿舍，誰知那內地同學一到宿舍，便下車跑了進去，車錢也沒付，所以他才這麼覺得。後來他還說內地人進升降機不等人就關門。其實我也不太明白，當他胡說算了。

問：畢業以後有甚麼打算，會留在香港還是回內地？

答：假如找到收入理想的工作的話，我也會留在香港發展。不過其實我不太清楚香港的物價，我只知道吃和住都很貴，但有多貴我其實是沒甚麼概念的。假如儲到的錢和在內地工作差不多的話，我想我應該會回內地。

問：在香港工作的話，你擔心別人說你搶香港人的飯碗嗎？

答：其實我不太擔心，我幫老闆賺了100塊，他最多也不過給我50塊，不管怎麼說，我也是在幫香港人賺錢呀。

問：最後，想問問你，據你所知，中大的內地同學有沒有甚麼共同點？

答：我想我們很多都會覺得坐車去中大以外的地方比較困難；感覺大家多一些去圖書館、夜讀室學習，大多比較專注讀書。還有，雖然香港有些食物我們都覺得不錯，譬如說壽司、火鍋，可是我們都覺得始終都不如自己家鄉的食物好吃。

香港只是其中一站
—— 訪問內地研究生

◆ 劉子僑

Angela的家鄉在甘肅省，在北京大學本科畢業。兩年前成為政政系的研究生，研究國際關係。平日會在中大跑步，做瑜伽、練空手道。偶爾也會到紅館去聽音樂會、演唱會。問到將來有甚麼是很想做到時，她稍稍思考了一會，要說出口時，更是頓了一頓（其他的問題她都是很快便答了出來，也答得很流暢），最後給了一個不知算是特別還是普通的答案——「World Peace」。大概是覺得這麼說可能有點「行」，卻又實在沒甚麼更貼切的說法了吧。

問：為甚麼選擇來香港讀書？

答：當時是有三個目的地，歐洲、美國，還有香港，最後還是選了香港。很主要是因為香港是很特殊的地方，一方面很國際化，一方面又跟內地連繫緊密。像我這樣在內地讀社會科學的，如果以後要發展的話，我覺得還是要在內地或是大中華這樣一個範圍裡。去美國或是歐洲是可以學習一段時間的，但如果很多年都要在一個地方待著，我覺得香港是一個比較適合的地方。

問：那為甚麼妳不在內地讀呢？

答：內地的本科雖然很好，但研究生就不是很好了，教授對本科生講的那些東西，和給研究生講的都差不了很多。研究生也有很多的課程，每天大家都上課，感覺讀研究生和本科生是一樣的，不像香港，真的是以研究為主。很多像我們（內地）一樣的同學，讀完本科之後基本都去外面讀了。

問：帶導修時接觸了不少本地的本科生，妳覺得香港和內地的本科同學，在學習上有甚麼不同的地方呢？

答：首先我覺得香港同學和內地同學都特別刻苦，學習非常認真，而且會覺得學習這個事情是很重要的，對成績也很看重，這一點很像。如果說不同的話，香港的同學會多參與一些關於社群的活動，而且他們對社會的關注，比起內地學生也會更多一點。我們在內地的時候，就真的只是學習，是你自己的發展比較多。我們從來就沒有那些上莊，沒有很多人一齊的那種感覺。剛開始只是覺得很新奇，因為沒見過，到後來我

覺得這其實也很有意思，有的同學平時看來非常的害羞，像不說話那種，但加入某個團隊之後，馬上就變得非常熱情了。大家也會做一些很有意義的事情，比如說推廣素食，不同書院之間也會有一些比賽。總的來說，集體活動會比內地更多一點。

問：香港的同學在上課的時候會不會比較少說話？

答：我覺得我的還好，因為我跟同學的關係比較好。他們不會覺得你是老師，不會說你很悶，反正大家就是會聊天，他們也很活躍，討論的氣氛也很好。我覺得這是取決於tutor吧，因為有的人就會覺得你是講課的，你是老師嘛，不願意發言。如果都是很輕鬆，大家一定肯說話了。

問：從妳剛來的時候不會廣東話，到現在妳能聽能說不少廣東話，妳覺得這分別對妳的導修課有甚麼影響？比如上課時會不會偶爾說些廣東話？

答：我在上課的時候都是用英文的，同學討論也是講英文。因為很多概念和理論都是英文寫的，用英文講更加順暢。不過我還是允許同學們向我單獨提問的時候用廣東話，因為這樣有助於他們表達自己的觀點或是問題。下課的時候，本地的同學會給我講廣東話，我都能聽得懂。一些簡單的問候，我也試著用越來越多的廣東話給他們回答，這樣使得我和本地同學更加親近。他們也知道我原來不太懂得講廣東話，所以即使我會講的話不多，他們還是挺開心的，也能體會到我對廣東話以及香港文化的喜愛。

問：近幾年，從內地來的研究生比以前增加了很多，現時政政系的情況怎麼樣？

答：現在在政政系，內地和香港研究生的比例大約是2：1。至於研究對象方面，內地研究生會多研究內地問題，香港研究生亦會多研究香港問題，當然無論是香港或內地，都有一部分研究生是研究國際問題的。

問：有些人會抱怨，研究的人是內地的，可是研究的又不是香港的東西，又或者香港提供了這些錢，但又不研究香港。妳自己是怎樣看這個問題的呢？

答：我知道是有這些討論的。當然我們要倡議越來越多的研究生去關注香港，但另一方面，一個研究機構其實不應該拘泥於我應該／必須研究這個地方，譬如美國一個學校，它會研究中東，它會研究中國，它會研究很多的地方，並不是說一定要研究我這個社群或者是本地的一些事情。我覺得是應該有一個更開放的心態，因為最後所有這些研究的成果都是香港，或者是中大的成果來的，而這個成果如果更加的豐富，比如說政政系有研究國際問題的、有研究中國問題、有研究歐洲問題、有研究香港問題的。這樣的話，這個系或者是中大的學

術就比較強嘛。但如果說提到中大，大家說它只是研究香港的，它就沒有甚麼競爭力了，對香港發展長遠來說不是很有利。

問：現時不少香港人對內地人都很反感，妳遇到過類似的情況嗎？

答：在香港，其實在大學裡還好了。譬如說去有些地方買東西，或者吃東西呀，尤其是更加傳統的香港的一些地方，他會覺得你廣東話講的不是很好，會知道你是內地人，他就會覺得好煩了，或者怎麼樣。這種感情會讓你覺得很難過的，其實我是很努力在融入這個社會，但是呢，會讓你覺得這有一種刻板的印象，你懂嗎？就是你是內地人，你就是那樣子呀。

問：未來會有甚麼很想做到的？

答：很多吧，很多，我覺得。這個問到大的一個夢想了，我覺得還是要make a difference吧，至於這個不同是甚麼呢？我要找一個能實現它的地方，這個地方我覺得很有可能就是在中國，因為中國它有很多問題，但它又是一個很有機會的地方，因為它有很多地方是空白的，需要去建立，所以我覺得如果說我的夢想的話，就很可能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地方實現。然後，唔……如果說很大一個夢想，因為我學國際關係的嘛，我是很想在world peace這方面做一些努力，比如說聯合國在戰亂或貧困的地方會有一些項目。未來的話，我還是想做一些確實很有意義的事情。

問：畢業以後妳打算留在香港嗎？

答：我現在沒有決定，如果有剛好的機會的話，我覺得留在香港是很好的。剛畢業的幾年，我還是想去更多的地方去體驗。過了四、五年之後，要在一個地方落戶下來，要在一個地方生活的話，那個地方就很可能是香港，或者是內地了。

如果可以的話，算我做一份子吧

◆ 訪問、整理：陳嘉銘

孫賢亮，在上海出生長大的90後，就讀商學院，副修歷史學與政治學。大二時，上了新亞學生會。大四時在《陽光時務》做實習，現在正在台灣的國立清華大學作交流生。

問：當初為甚麼會選擇來中大升讀大學呢？

答：說起來最誠實的理由，或許純粹是因為考到了，學校又給了我總共50萬港元的獎學金，何樂而不為？加上香港的院校在上海很有吸引力，所以一聽到中大給予我獎學金，就二話不說做了這個決定。在那一刻，對中大真的是毫無印象。

問：你現在對中大的印象怎麼樣？

答：如果說現在對中大有甚麼印象，那一定是社會關懷。不僅僅是因為我自己曾任學生會幹事，認識很多有抱負的朋友，還因為中大一群有理想的教授，因為博群大講堂，因為各式各樣浪漫的講座和活動，而且香港任何社會運動，中大都從不缺席，我為此感到驕傲，我很樂意說，看，那是我的母校。

問：我跟你一起上課的時候，很驚訝你可以說這麼流利的廣東話。你當初為甚麼會選擇學廣東話的呢？

答：剛進中大時，有個粵語豁免的測試，不能通過的內地生必須要上初級粵語課程。可以說，中大的內地生起碼能聽和講廣東話是因為強制的規定。但要說得流利地道，還是要靠多說多練。

我覺得中國傳統文化裡頭有兩個道理很對，入鄉隨俗和客隨主便。來了香港就得學習香港的文化，而廣東話（甚至是與廣府話各自獨立發展的香港話）本身承載非常多文化意涵，很多語境、心態、認同都被包含了在語言裡頭。我想要融入本地生的生活，我覺得如果一個內地生身邊大部份朋友都是內地生，是個很古怪的現象。還有就是我想瞭解香港的歷史、政治、文化和社會心態，因此粵語是必須的。

六四作為政治啟蒙

問：我知道你有上新亞學生會，可說說原因嗎？

答：在大一時，一個好友邀請我去看了六四舞臺的舞台劇《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那次我哭得很難受。加上大一讀完的龍應台《大江大海》，我覺得世界觀與歷史觀被顛覆，18年都生活在欺騙與謊言之中，連思考的維度和常識都或多或少被扭曲了，那感覺很糟糕。之後也就不斷給自己補中國近代史的課，去看牆內沒有的資訊與評論。

大二見到學生會傾莊，雖然我真的不知道香港的大學學生會要做些甚麼，但從很多偏見裡頭——「學生會激進、為反而反、理想、整天抗議」——反而看到了我想要的大學生活。加上我從小就一直是學生團體的骨幹，搞活動一直是我的興趣所在，也就和那位邀請我看六四舞台劇的朋友一起去傾莊。後來我們那支莊就有三個上海人，九個香港人，我也因此被中聯辦關照了。

問：你在做新亞學生會幹事時，做了哪樣活動是最深刻的呢？

答：紀念六四吧。在四五月的時候，我們開始在小百萬大道上面力圖重現當時天安門的情景，包括寫著標語的T-shirt，做「媽媽我餓但我吃不下」的橫額之類。我們也在地上散放一些假的斷指斷腳，並貼了很多歷史的老照片。整個展覽做了差不多有一個月，那個地方是去校巴站的必經之路，每天都有很多人看到，我也看到有人會駐足，甚至有人拍照。這個展覽曾上過新聞。

問：你有去過六四晚會嗎？你的感覺是怎樣？

答：有。初來到的第一年（2010年），因為有事情耽擱所以沒去，那時候對社會事務的熱情和敏銳度當然是不夠的，後來就很後悔，因為那年中大學生會把民主女神迎進了中大。之後的三年我全都去了，大二去的時候完全被震撼，人在志同道合的集體裡頭是很容易亢奮的，我那時候就是，聽到《自由花》眼淚就滑下來了。「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著吧，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這句歌詞道出一代又一代人前仆後繼的追求，我感覺某些精神上的東西從中播種到了自己心裡。

第二年去晚會的時候，我已經當這是一個承諾，我有去中央圖書館前面的天橋上往下看，看到燭光依然很感動。第三年有主辦方的朋友帶我進去，坐得比較靠前，也是第一次看清舞臺和大螢幕。當日雨下好大，燭海變傘海，還是很多人堅守，我全身濕透但心裡還是很暖。我覺得不必去探討中國人身份認同、大中華派民主路徑之類的東西，純粹是人道主義精神和關懷本身就足以令人動容和堅守。

2011年六四前夕，《蘋果日報》找我做了個專訪，我還不敢出真名和正面照

片，只敢給背面照片，我當時說，23年前學生用生命去追求的價值，要由我們這新一代人去承擔。我到今天還是這麼想，而且我越來越不擔心、不恐懼，所以今年《明報》找我，我答應是用真名和正面照片。我知道我沒做錯甚麼，我相信我所追求的自由與人權，是正確的。我覺得我這樣做是實實在在的反抗，因為極權存續最需要的是恐懼，克服恐懼本身就是對抗極權。

關於中港矛盾，我想說的是

問：香港現在有不少人對內地人都很反感，你遇過類似的情況嗎？

答：直接、正面的我沒遇到過，不知道算是幸運，還是我比較不計較。聽就聽到很多次，宿舍少東西了，廁所弄髒了，大家好像在做偵探，但有時候有意無意地就將矛頭直指內地生，哪怕沒半點證據。出生在中國，有時候確實是原罪。而且香港人普遍對中國瞭解薄弱，我的家鄉上海很多次被歸到了北方，也有很多人很吃驚我的母語居然不是北京話。香港人好像普遍覺得京腔才是正宗的普通話，這一點跟大陸的實際情況很不同。以上種種對大陸的認知薄弱，其實恰恰反映長久分離造成的隔膜真實存在。有部份香港人其實已經不再在大中華的共同體想像裡頭了，生活共感不復存在，我猜也是最近本土認同興起的一個因素吧。

另外一方面我還是蠻批判內地生的。有些內地生不願意學粵語，可能並不是一開始就抗拒或者果真覺得粵語沒用，而是因為學的過程中覺得難學，或者發音不準確被本地同學善意地笑了，就受打擊而不再學下去。另外就是心裡始終抱著大中華的文化認同與想像，而不願意真正融入這個文化做瞭解和體認。眼見到內地生反客為主的心態，以及現今流行的「恩主論」，再加上內地人對香港普遍抱有主權想像，我實在不難理解為何有些香港人會覺得正在被中國殖民了。我在2013年元旦遊行的隊伍裡頭，就見到有個小學生舉著「不要中國殖民」的牌子。

當下的中港矛盾，也會影響校園，中港學生一定會把自己套進那個情感結構甚至把它內化。但很多時候，「以偏概全」是我們都要學會去避免的。媒體每次都喜歡拍一兩個自由行旅客神經質地對著鏡頭說，如果沒有自由行香港早垮了，大陸不斷在恩惠香港等等，然後不停播，並將這些言論變成所有內地人的意見。這有甚麼意義呢？只關心奪人眼球的言論，如此以偏概全的行為是不理性、違背邏輯的，我覺得根本就是自討苦吃，是找個突破口宣洩某種情緒上的不滿。模糊焦點，掩蓋罪責，讓真正該負責的人背地裡偷笑，何必呢？

問：畢業以後有甚麼打算，會留在香港還是回內地？

答：台灣交流結束後，先回香港吧。還是想換護照，很實際的考慮是我很愛旅遊，幾次和香港朋友一起旅行，護照都

成了我的麻煩。另外一方面是出於政治安全考慮，畢竟我做了很多政府討厭的事，被公安和市政府人員請喝茶都成了習慣。中央的人可以很準確地掌握你的一舉一動，包括我在《陽光時務》實習的事，我的電話、住址，甚至包括我哪天過關去《南方週末》門口做採訪之類的細節，他們都知道。這的確是一種威脅。對我而言，安全也是很重要的考量，雖然香港護照也不算好的護身符。

而且，我熱愛香港。《陽光時務》辦佔中論壇那天，我在現場，看著踩上桌子的愛港力量像瘋狗一樣狂吠，我回去就哭了。我不知道香港為甚麼會變成這樣。之後看到香港甚囂塵上的本土派連普世價值和法治都可以不顧的時候，我知道我代表不了中國人給香港人道個歉，但我還是很愧疚，也很遺憾。但我還是擇善固執，我相信善良的香港人會有一天用良善的力量獲勝，生活在美好包容多元的香港。如果可以的話，我也會把自己算做一份子。

假如這只是內地生的問題

◆ 陳嘉銘（政治與行政學系研究生）

近年中港矛盾日漸升溫，大學學額無疑是這場論爭中一個重要的議題。有輿論指，內地生畢業後留港工作，可增加香港的勞動力。另一方面有人則擔心，繼續大量錄取內地生只會深化中港矛盾，當中更不乏反對大學濫收內地生的聲音。但實際上，內地生人數急升是我們因著媒體渲染而產生的印象，抑或是真有其事？如果是真確，那內地生急升的理由是甚麼？本文希望疏理這些問題，拋磚引玉，讓大家有更好的討論基礎。

內地生在中大

翻查教資會的數據，在這十年裡（2003-2013），中大的學士及研究生中，內地生的總人數及比例都有所提升（見表一），而當中內地研究生的升幅卻明顯比內地學士來得誇張。有鑑於此，當我們辯論搶學位的問題時，應分清楚學士課程和研究院研究課程來討論。

搶學位的迷思

就學士課程而言，教資會現時給予非本地生的資助學額，是每間院校核准學額的4%[1]。但除了這4%的核准學額，各大

表一：

	內地生總人數	內地生佔全中大的比例
學士課程（2003-2004）	238	2.9%
學士課程（2012-2013）	1,317	8.9%
研究院研究課程（2003-2004）	472	31.4%
研究院研究課程（2012-2013）	1,208	67.2%

院校仍然可以錄取非本地生，這是由於它們已按2003年《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報告書》的提議，將非本地生收生限額放寬至20%。換句話說，非本地生可讀的學位有兩種，一是政府的資助學額，另一種是自資學額，而後者的學費就比前者的高昂得多[2]。

可能有人會指，內地生是搶了不少本地年青人的資助學額，但這個說法其實是很難站得住腳的。事實上，在2012/2013年度，該學年八大院校的第一年學士資助學額有15,000個[3]，當中非本地生的資助學額只有600個[4]。而根據考評局的數字，該年度合資格升讀大學的學生有26,552人[5]。故此，即使將非本地生的資助學額全數撥做本地生的學位，也遠遠不能補足本地學生升讀大學的需求。

本地青年學額之所以不足，其問題的根源無疑是在政府身上。若然我們回顧近幾年政府資助學額的數字，其增長可謂寥寥無幾：在2009/2010學年，第一年學士資助學額有14,500個，但到了2012/2013學年，這個數字竟只有剛才提及的15,000個，只增加了3.45%[6]。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不少中學生唯有選擇入讀私營的專上學院，報讀它們的副學士或學士課程。由此可見，政府現在是將它原本應該肩負的責任推給自由市場，要莘莘學子負擔高昂的學費，畢業後揹一身學債。所以，本地青年人被內地生搶學位其實只是幻象，真正的問題是政府不願意增撥資源去大學教育，增加大學的資助學額。

研究院收生內地化之趨勢

那麼，全數為政府資助的全日制研究院研究課程（包括哲學碩士和博士課程，即我們平常稱呼的MPhil和PhD）的情況又是怎樣呢？根據立法會的文件顯示，院校在2012/2013學年共收到2,040份本地生申請，最終有531位本地學生能獲取錄。同一學年，非本地生的申請則共有18,600宗，其中有1,876人能夠入讀研究院[7]。

從上述的數字，我們不難推想研究院之所以收錄了這麼多內地生，是源自兩地人口之差別：由於內地適齡就讀研究院的人口比香港的高出很多，結果香港學生在諸多申請中就難以脫穎而出。但更根本的是制度性的原因。須知道在2003年，教資會已取消對研究院研究課程非本地學生人數的限制。結果，現在不少學系的研究課程都可以見到內地生的身影。

至於有如雨後春筍的自資碩士課程，由於各大院校都沒有公佈數據，筆者不能確切地計算出當中的內地生人數。但據筆者觀察，內地生就讀自資碩士課程的人數，也隨著課程越開越多而與日俱增。

懸而未決的問題

可以想像，在往後的日子，不論是本科生還是研究生，內地生的數目都只會有增無減。以下筆者想提出一些問題，讓讀者思考內地生對大學教育和香港社會帶來的影響：

1.教資會提高非本地的本科生收生限額，並且取消對研究生課程非本地學生人數的限制，是按照《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報告書》的指引去做。當時，政府的原意是提升香港勞動人口的素質[8]。十年過去，勞動人口素質有否提升卻尚未檢討。不過可以想像，內地生留港工作的人數持續上升，會大大加劇本地學生所面對的競爭，影響他們的飯碗。面對如此情況，政府是否有需要檢討收生名額？

2.另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是有關本地生難以入讀研究院的情況。事實上，有不少想從事學術工作的本地生都希望能入讀研究院，而且成績不俗，但卻因為大量內地生報讀研究院而落第。事實上，香港特區政府作為地區政府，是否有責任為本地研究生的收生額設下限？

3.不過，要回答第一和第二條問題，都不能迴避一個很根本的問題：政府為各大學提供研究院研究課程學額，背後的邏輯究竟是甚麼？政府至今都沒有一個清晰的說法。如果目標是要培訓研究人才以配合經濟發展，那麼政府如何避免人才流失，確保內地生可以長時間留港工作，而不是一畢業就離開香港？

4.另一點要留意的是，內地生大量湧入研究院對教學也會有一定影響——須知道研究生是要肩負起教學的工作。按筆者聽回來的意見，內地生負責的導修質素都相對差（誠然，本地研究生也不一定教得特別好），原因主要有二：內地生來港後未能立即學懂廣東話，結果唯有用英文上課，頗影響師生之間的溝通。此外，本地的研究生通常都是由該學系直升上去，對課程和老師的授課方法較為熟悉，對學系的歸屬感也較強，願意花更多時間去教導師弟妹。然則，政府在規劃研究院研究課程的學額時，是否要考慮上述的因素？

5.最後，筆者認識不少成績十分優異的師兄弟姊妹，他們都出國讀碩士或博士學位，而不是留在香港讀研究院。理由很簡單：我們都知道香港的大學是甚少聘用由它們「出品」的研究生。但出國讀碩士或博士，很多時是要家境相對富裕才可以。結果留下來讀研究院的，很多時都是家境不太富裕的學生。大學是否應反思這趨勢是否健康？如果是否定的話，它們是不是應訂下一些政策留住這班優秀的學生？

從上述的問題，我們可看到內地生增加會為香港社會和大學教育產生一定程度上的問題。但與此同時，「港漂」之所以會成為社會問題，其實跟人口政策、研究院收生限額、中港融合等議題息息相關。故此，當我們討論內地生來港就讀的問題時，都不應將討論的焦點放在內地生這個群組身上，這樣很多時只會加深族群間的矛盾和偏見，而忽視了更深層次的制度問題。

---

1 左翼廢青，〈誰搶了你的學位？是所謂「蝗蟲」還是右翼政府？〉，《香港獨立媒體網》，擷取於2013年12月20日。

2 就以中大為例，在2012-2013年度中大最多可有569個非本地生是就讀資助學額，當中包括國際生和內地生。而入讀自資學額的學生，就須每年繳付$120,000學費。香港中文大學，「費用、獎學金及經濟援助（2013年）」，http://www.cuhk.edu.hk/adm/handbook/fees_c.pdf，擷取於2014年1月20日。

3 在這一年度，收錄DSE和A-Level學生的第一年學士資助學額皆為15,000。

4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院校主要統計數字（2013年）〉，http://cdcf.ugc.edu.hk/cdcf/searchStatSiteReport.do#，擷取於2014年3月20日。

5 這個數字是該年度合資格升讀大學的DSE考生，而非AL考生。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2 Double-cohort Results Statistics」，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Progress_promote_HKDSE/Local_Education_Agencies_2012_7_24_PPT.pdf，擷取於2014年4月20日。

6 同4。

7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學士學位及研究院研究課程的收生安排〉，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ed/papers/ed0210cb4-362-3-c.pdf，擷取於2014年1月11日。

8 人口政策專責小組，《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報告書》，第5章，第32節。

這麼近，那麼遠
—— 機會結構之轉變與期望的落差

◆ 呂大樂（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新力量網絡主席）

原刊於《明報》觀點版 ，2013年9月20日

在香港，特區政府經常提到「國家好，香港好」。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而且跟內地聯繫密切，這句說話的意思是毋須懷疑的。但問題是，這句說話通常並非只限於在一般層面上描寫內地與香港的關係，而是同時附上很多其他的意思。而當中十分重要的一面，是有關經濟快速發展的內地，能為香港及港人帶來很多機會。有不少人甚至會在這個基礎之上，認為年輕一代應該以內地的機遇為個人奮鬥的目標，於是大力宣傳「中國機會」的說法，以為這樣便可以加強年輕人對國家的認同，鞏固他們對未來的信心。可是，在客觀效果上卻似乎是剛好相反。年輕人對有關的說法、口號不為所動，有時甚至會因為論者總是喋喋不休而有點反感。面對這樣的反應，「中國機會」論者通常會嘗試改變討論的焦點，因見到自己的說法不為受落，而轉為批評年輕一代缺乏勇氣、遠見，不敢離開自己熟悉的環境，面向未來的挑戰等等。他們總是覺得大好機會正擺在年輕人面前，哪有不充分利用的道理；他們很少會認真檢視，究竟在過去二三十年裡，所謂「中國機會」是怎麼一回事。他們更少會反思，為何在年輕人眼中，自己的那一套會如此缺乏說服力。

年輕人應以內地機遇為奮鬥目標？

本文的目標不是在於否定內地經濟發展能為香港創造機會。在一般的意義上，「中國機會」肯定存在。問題是：那些機會是以哪些人為對象呢？它們的分配或者沒有甚麼不平等或不合理（也就是說沒有甚麼人為的障礙），但卻又不是每一類人都會覺得自己可以參與其中。如何將內地社會經濟發展所開創的機會轉化為港人於個人層面上可以把握的可能，是一個很值得了解的問題。以下的分析和討論，以政府統計處所發表有關「在中國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調查資料為基礎，嘗試了解一下「中國機會」有何特色，並從中剖析為何年輕一代對此所抱的態度，並無期望中的樂觀。

從1988年開始，香港的政府統計處以不定期的方式，通過「綜合住戶統計調查」來搜集有關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社會背景及特徵資料。該調查透過科學方法抽出住戶樣本，而受訪住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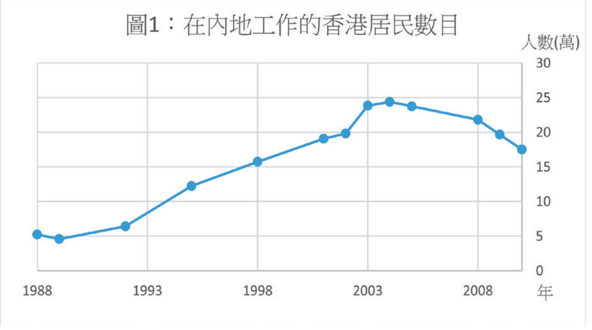
中所有年齡達15歲或以上的人士，均會被問及於進行調查之前的12個月之內，是否曾經在內地工作。按政府統計處所採用的定義，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乃指屬於居港人口而於統計前12個月內曾在內地工作（不論在該12個月期間往內地工作次數及每次逗留期間為何）的人士。但若只到內地洽談生意、巡視業務、及／或出席貿易展銷會、會議和業務應酬，則不被視作『在內地工作』。此外，來往中港兩地的從事運輸業人士及在內地海域作業的漁民或海員，亦不包括在內」。經過十多年的資料蒐集，相關的統計數據給我們呈現出一個圖像，說明於內地走向開放改革的過程中，香港及港人如何從中找到工作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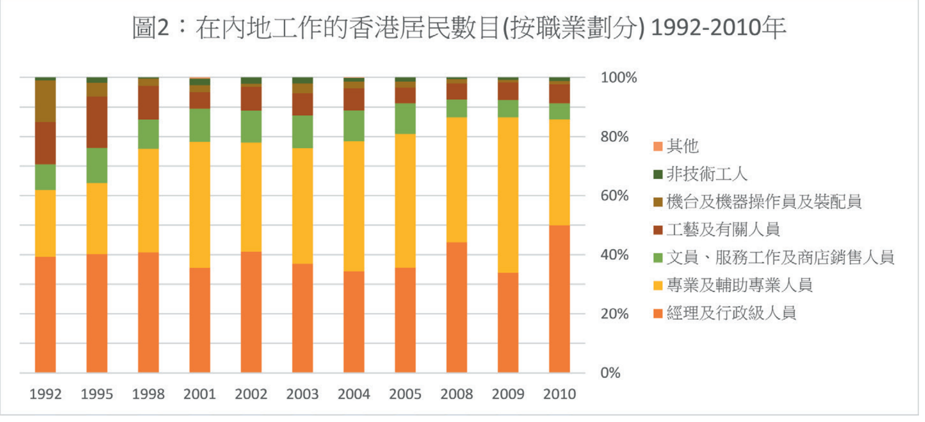
當然，在過去35年裡內地與香港的經濟關係的轉變，表現在多個層面及不同方面，而香港居民在內地工作只是其中的一面而已。不過，話雖如此，這仍是相當重要的方面——對一般市民而言，他們對「中國機會」的想像，很大程度上是指香港人在內地所能夠開拓的機會，為香港及港人帶來新增的活動空間。雖然這個角度或許有略嫌未夠全面的地方，但卻可視為一種普遍為港人所採用以衡量「中國機會」能否兌現的重要指標。

在閱讀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統計數據之時，我們需要明白，上面提到的調查方法，有其限制。關於這一點，政府統計處已有所交代：「在統計前的6個月內在香港逗留少於1個月，及在統計後的6個月內在香港逗留少於1個月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不論他們在統計時是否身在香港，亦不會包括在是項專題訪問的涵蓋範圍內（因他們不屬於居港人口內的人士）。」這也就是說，該調查並未有將那些因為工作的需要而早已長期遷居到內地的香港居民包括在內。所以，假如愈來愈多香港居民會因工作上的需要而移居內地的話，則有關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統計數據的參考價值會降低。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未有見到這種情況：據政府統計處的估算，居住或長期逗留在內地的香港居民的數目，由2004年底至2005年初期間的47.2萬人，增長至2007年7至9月期間的50萬多。暫時未有資料顯示，內地為香港居民所提供的工作機會，逐漸已變得會要求港人移居，以配合公司的需要和要求。所以，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統計數據，仍可視為評估「中國機會」的指標。

在內地工作香港居民由高峰逐年下滑

從政府統計處的資料所見，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數字，由1988年年底的52,000人左右，發展至2010年第三季的175,100人，中間以2004年為高峰，數目達244,000人（見圖1）。近年香港居民在內地工作的數字，是由2004年的高峰逐年下滑，至今減少了差不多7萬人。跟上面所提到香港居民在內地居住或長期逗留的數目比較（增加兩萬多人），似乎未見前者的減少是因為已經轉為以後一種形式替代。這也就是說，單純在





量的方面，我們不單止未見持續增長，而且反過來有下降的趨勢。

至於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社會背景和特徵，則有以下觀察：

（1）從1980年代發展至今，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行業及職業分佈，早已發生了相當明顯的變化。其中由製造業作為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主要行業（於1992年佔60.8%），到近年已改由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2009年佔43.7%）和其他第三產業所替代。與此同時，其職業結構亦經歷了轉變：由早期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工藝及有關人員佔上一定比例（例如到了1992年仍佔近三成），到了2005年則從事藍領工作的人士，只佔全部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一成而已。現在，以2010年計算，超過八成屬經理及行政級人員和專業及輔助專業人員（見圖2）。上述轉變反映香港在內地經濟的角色的變化，但這同時也表示原來那個可以兼容不同職業的系統，逐漸變為專攻服務業，而且以較高層的職位為主。

（2）呼應上述轉變，擁有專上教育水平的在內地工作港人，由1980年代末20%左右，到2005年已超過四成。學歷成為爭取到內地工作的重要條件（見圖3）。

（3）而在年齡方面，在1980年代末的時候，有接近四分之一在內地工作港人

圖3：在內地工作之港人的教育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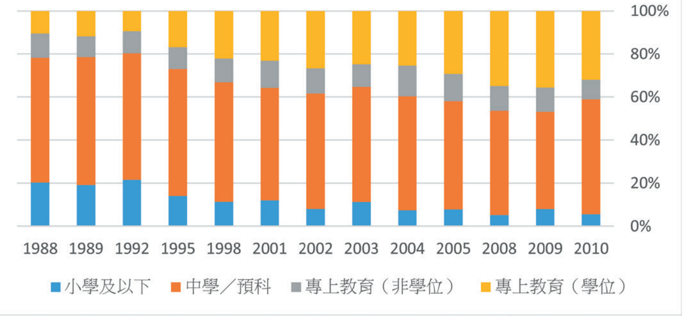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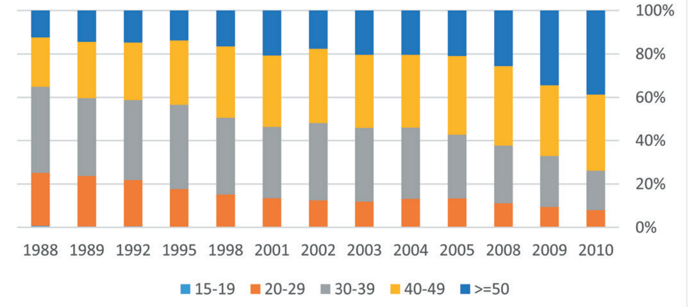


圖4：在內地工作之港人的年齡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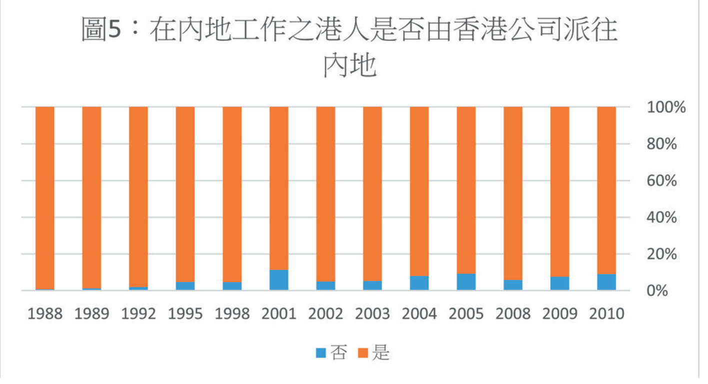


的年齡在20至29歲之間，但該年齡群的百分比自從踏入1990年代便一直下跌，到了2009年更是不夠一成。而在2010年，近四成在內地工作港人，年齡在50歲或以上（見圖4）。若從年齡中位數來看，則由1998年的39歲上升至2010年的49歲。明顯地，港人到內地工作，多屬有一定經驗及資歷的人士。

（4）而僱用那些港人的企業或機構，絕大多數是香港公司，派遣他們到內地工作。並非由香港公司僱用者，從未超過一成（見圖5）。這也就是說，港人從來未有真正融合內地的勞動市場；他們始終主要是通過香港公司而派駐內地。

「中國機會」非人人有份亦非特別向年輕人開放

以上數據恐怕並不會令本地年輕人感到興奮。很多人口邊經常掛著的「中國機會」，其實既非人人有份（從事體力勞動、低技術工作及低學歷人士，基本上沒有甚麼辦法可以跟它扣上關係），同時亦非特別向年輕人開放。所謂內地經濟高速發展，到處都是機會，其實未有轉化為真實的經驗。經政府統計處蒐集「在中國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調查資料所呈現出來的圖像，是就算年輕人有多大的決心，願意北闖找尋機會，他們仍然是要通過香港的公司來提供機會，絕大部分都不可能靠個人主觀意志，隻身投入內地的人才市場，來開拓和把握機會。當然，我聽過很多社會賢



達、才俊所分享的寶貴經驗，說他們如何在1980年代，憑著一股幹勁，在內地闖出一番事業。又或者經獵頭公司接觸，毅然放棄在港的高薪厚職，以一種企業家的冒險精神，開創個人事業另一個巔峰。那都是真人真事，絕無半點誇張。問題是：今天2013年，又是另一個環境。內地對香港人才的需求，亦會隨著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而有所轉變。究竟今時今日對香港的年輕人來說，「中國機會」是怎樣的一個機會，其實有待具體說明。同時，對只是剛開始職場生涯，缺乏資歷（因此，恐怕也不會是——至少暫不會是——大企業通過獵頭公司主動招攬的對象）的年輕人來說，內地對他們又有何需求？是需求有限？還是年輕人沒有北闖神州的勇氣呢？

特區政府經常提到「國家好，香港好」，這可以理解。但這也不應停留為口號，而是需要實實在在的將它轉化為個人所能掌握的機會。「中國機會」不應該是超宏觀的、虛的東西，而是微觀的、具體的、人人均有可能觸到的。本文嘗試通過整理有關的統計數據，只想說明一點：特區政府在實現「中國機會」這一重要課題上，其實交不出有說服力的成績來。而如果對「中國機會」、中港融合打不開一種新的整合模式來，情況相信亦不會有甚麼改變。憑這樣的成果來嘗試說服年輕一代應胸懷祖國，放眼未來，效果欠佳是完全可以想像的。

本地大學生北上就業意願調查

整理：何敬熹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生在2010年4月就北上就業的問題隨機訪問了326名本地大學生，以下為該研究的結果。

北上就業與否

39.8% 的受訪者表示大學畢業後可能到內地就業；有三成表示畢業後不會考慮到內地工作。

最理想的北上就業城市

第一位	上海
第二位	北京
第三位	廣州

希望可以去內地從事的行業

金融業	35.3%
教育培訓	23.9%
影視文化機構	23.6%

不考慮到內地工作的原因

內地言論自由受限制	73.9%
政治體制不夠民主	72.4%
治安欠佳	72.4%
內地醫療服務不足	70.3%
與在港親友聚少離多	66.6%

資料來源：楊靜、鄒家琳、魯敏敏，〈北上就業，你想好了嗎？〉，《香港經濟日報》，2010年5月22日。

鳥籠內的鳳凰
—— 深圳分校點評

◆ 陳嘉銘

事實上，要從非官方的角度去記錄、梳理和評價中大深圳分校實在不是易事，因為這個議題的確是極為零碎和漫長。一方面，學生主要是透過一塊塊主流傳媒報導的碎片，才能重組整個深圳分校計劃的圖像。另一方面，這個計劃為時已好幾年，學生組織要持續跟進，實在十分困難。直至現在，中大深圳分校這塊版圖仍在不斷發展，報紙仍會零零星星報導深圳分校的消息。

深圳分校的前世今生

無可否認，香港大專教育近幾年來其中一個重要方向，便是在內地建立院校，以迎合「中港融合」的大環境。要理解這個北上趨勢，我們就不得不從2003年說起。十年前，中國國務院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表明要利用土地和資源來吸引境外學府與內地院校合辦大學，目的是要培養更多人才。到了2009年，廣東省政府再下一城，公佈《珠江三角洲地區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綱要其中一個重點是鼓勵香港大專院校北上辦學。這兩份文件出台後，香港的大學就陸續進佔內地的高等教育市場。譬如說，浸會大學早就在2005年跟北京師範大學在珠海合辦了聯合國際學院，是第一間兩地合辦的大學，而理工大學則在2009年與東莞市簽訂合作辦學意向書[1]。

中大亦不甘後人，成為其中一位旗手。筆者透過以下的表格，嘗試勾勒出中大北上辦學的時間表：

2004年	中大與清華大學在深圳開始合辦MBA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2006年	中大與中國科學院和深圳市政府合作，成立了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先進院）。成立後三年，中央政府批准先進院成為國家級研究所，給予長期僱員名額達500人，同時亦撥款相應經費作營運之用。
2009年	中大又獲深圳市政府的支持，開始興建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研究院，作為為中大教職員進行研究、開發、培訓和技術轉移的重要基地[2]。

表一：中大在深圳辦學的時間線
（資料來源：整合自中大深圳分校的報導及中大官方網頁）

至於深圳分校的計劃（官方名為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下稱「深圳分校」），則是始於2010年2月6日。當時深圳市政府與香港中文大學簽署了教育合作辦學備忘錄，確定了雙方合辦「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學院」的意向[3]。簽訂了辦學備

忘錄後，中大就開始和內地不同機構有持續的協作：

2011年3月12日	中大與深圳市人民政府簽訂框架協議。
2011年7月4日	中大與深圳大學簽署合作協議，擬按合作辦學形式，籌建深圳分校。
2012年10月11日	國家教育部於深圳龍崗區選址舉行的儀式上宣佈正式批准籌建深圳分校。
2013年3月	中大分別與深圳市人民政府及深圳大學簽訂了詳細辦學協議，以開展深圳分校的各項建校工作。

表二：中大與內地部門合作推行深圳分校的時間表（資料來源：中大官方網頁）

中港合作建校背後的算盤

無可否認，北上建校對中共政府跟香港大專院校而言都十分有利。宏觀來說，中國自改革開放至今，她與各國的交易已越趨頻繁。隨著中國與全球市場的關係日益加深，當下內地對高教育水平的人才需求亦不斷上升。而香港大專教育在國際上的優勢，正好能被中共政權利用來提升廣東省人才的教育質素，藉此吸引更多外地的資本流入當地。

內地傳媒也甚為關注中大興辦分校一事，其中《南方日報》一個專訪就正好反映上述的邏輯。文中寫道，當深圳分校建成之後，龍崗的企業就可利用中大在生物醫藥、信息科學、可持續發展等領域的研發實力，來為整個龍崗區的產業轉型升級。另外，作者甚至說，深圳分校入駐龍崗是可以發展成「矽谷——史丹福」的模式，培訓學生的技術以配合新興企業的需要。深圳先進院院長樊建平也在訪問表示，為了提高深圳產業的技術和營造創新的環境，有必要引入真正有實力的科研院所及大學，來為研究打下扎實的基礎[4]。由此可見，深圳分校在珠三角經濟發展的戰略位置實在舉足輕重。

另一邊廂，在香港各間大專院校而言，北上建校無疑是為了在中國尚未開發的教育市場分一杯羹。以中大為例，在三年前的一次訪問，當時的副校長華雲生教授坦言，興建分校是要令中大能夠從內地得到更多的資源[5]。另外，在深圳分校的官方網站，內文亦寫道：「中大必須發掘香港以外的資源，以提高研究水平，達致卓越標準。」[6]可以想像，透過獲取資源來增加研究項目、提高學術文章發表量及提升國際評價，顯然是中大北上辦學的重要誘因。

非一般的大學學費

當然，中大設立深圳分校不獨是向中共拿取人民幣，它亦同時從內地學生手上獲取了不少鈔票。根據中大對外的最新情報，深圳分校的學費暫定為約9萬5千元人民幣一年[7]，預計每名學生每年可獲2萬元人民幣資助[8]。屈指一算，深圳分校的學生每年也得付約7萬5千元人民幣，這個金額大約是內地一線大學學費的10倍有多[9]。對一般內地人來說，7萬5千元人民幣絕不是小數目，那試問深圳分校取錄的學生又會來自甚麼階層？校方設立如此高昂的學費門檻，不啻是要排除出身寒門的學生。



深圳分校新生開學禮。

我們常聽說，教育是讓低下階層脫貧的工具，是促使貧苦學生晉升上流社會的階梯。可惜這個說法卻完全不適用於中大深圳分校。儘管分校並非牟利機構，而且收取昂貴的學費是用來填補分校的成本，但到最後分校還是得向錢看。即使莘莘學子寒窗十多年，通過全國統一高考，但沒有7萬5千大元，分校還是只好將他們拒諸門外。或許分校會有獎學金資助有天份和努力的貧苦學生，不過直至現時為止，校方仍然沒有公佈有多少個資助學位。

按照上述的分析，我們可歸納出以下的觀察：深圳分校實際上是協助廣東省鑲嵌入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的國族教育工程——中共借香港在英殖時期遺留下來的優勢，以提升國民的競爭力和生產力，從而令特定地區的經濟地位提高。與此同時，中大北上建校，就是要協助廣東省培訓能吸引資本的專才，並從中吸取資源來增加研究項目，提升國際評價。因此，校方北上建校的首要辦學理念，根本就不是傳揚或傳承中國文化，而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換。從一開始，中大到內地辦學就是一場投資，是一盤與中共政權合作的生意。

半桶水的人文社科學院

或者有人會指，以上的批評過於武斷。他們會認為，宣揚中大理念也可以從學科架構入手。若果深圳分校開辦人文社科學院，那傳承中大理想的可能性就可大大提升。然而，就校方至今發放的消息來看，他們大概會略為失望。

按中大校方在2011年的說法，深圳分校成立初期將主要開辦理工及經管類學科[10]。即使在2013年3月的新聞稿中，校方亦只是說「開設的學科及課程設計將根據國際趨勢，以及內地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循序開設理工、經濟管理和

人文社會科學等方面的課程。」[11]在這段期間，校方都沒有為人文社科院定下清晰的時間表。這自然惹來不少中大學生和校友的質疑：為甚麼理工及經管類的學科就有優先性，而文學院和社會科學院卻相對次要？難道開辦人文學科就不符合國際趨勢？究竟為何開辦深圳分校，就必須要配合內地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面對這一連串的問題，校方都沒有給一個讓中大人信服的解釋。

直至筆者主動翻查深圳分校的官網，才發現原來中大教務會在2013年6月已審議通過深圳分校的課程是包括了人文社科學院的課程[12]。

不過，將分校的人文社科學院跟其他的學院對照，卻發現經管和理工學院的學科都相對整全，唯獨是人文社科學院的規模是嚴重「縮水」。（見表三）更重要的是，這些科目驟眼看實用性都十分強。即是說，分校是完全摒棄了一些人文社科學院的重要分支，例如哲學、中文、政治學、傳播學、社會學系等等。

但細想一層，上述有關學科架構的政策，其實很符合剛才提及的國族教育工程之需要。若然中國要在國際舞台提升其地位，理工和經商類的人材必不可少。換句話說，若然深圳分校是以廣東省區的經濟發展為大前提，偏重理工經管而輕人文社科是順理成章不過的事。即使開辦人文社科，中大也只是開辦一些實用性十分強的學科，去迎合該區的經濟發展。

具中國特式的學術自主

但即使日後人文社科學院能會開辦一些實用性沒有那麼強的學科，我們就可保證深圳分校可傳揚中大的理念了嗎？不要忘記，傳播理念是需要一個自由的學術環境為基礎的。連香港院校的學術自由都岌岌可危之時，深圳河另一邊的分校又是否能夠擔保有自主的學術環境呢？

在這一點上，恐怕大家又要失望了，因為在中大與深圳市政府簽訂辦學框架協議的時候，已規定深圳分校的教學、運

經管學院	理工學院	交叉學科	人文社科學院
市場營銷 國際商務 經濟學 金融學 物流管理 金融工程 會計學 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	材料科學與工程 設計與製造工程 計算機與信息工程 物理學 數學 生物醫學工程 基因組與生物醫學信息學 能源科學與工程	風險、精算與保險學 創新媒體科技 環境科學與工程	翻譯 全球研究 全球可持續發展 城市學

表三：深圳分校將會開辦的課程（資料來源：中大官方網頁）

作及人事安排都必須依循《中外合作辦學條例》[13]。細看《條例》的內文，院校的學術自主可謂低無可低。首先，它規定校長及行政負責人要熱愛祖國。此外，所有分校開設的課程和引進的教材亦要向審批機關備案。再者，《條例》也勸導分校要開設有關國情的課程[14]。面對這些制肘，筆者真的不知道中大校長沈祖堯——深圳分校的理事長——當初為何能夠擔保課程不會被「染紅」，而且說深圳分校會尊重學術自由[15]。

有人可能會反駁，在「習李」管治的時代，中央只會推行經濟改革，不會干涉太多政治議題，包括收緊學術自由。然而，事實卻勝於雄辯：在2013年5月，德國傳媒《德國之聲》得到內地學者和教授證實，中央已下達「七不講」的禁令予所有高等院校。所謂的「七不講」，是指教師不要與學生討論「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這七大話題。看到這「七不講」的要求，真的不能不叫人替深圳分校心寒。按照筆者一位內地朋友的說法，即使「七不講」未出現之前，內地的大學早已對政治敏感的研究（例如調查豆腐渣工程）作出諸多制肘，譬如說很難發文章或者出書，科研經費很難申請。當然，日後分校的學術自由狀況會否如斯惡劣，我們還得拭目以待。

辦學規模	初定為11,000人左右，其中本科生6,000人，碩士及博士研究生5,000人
收生來源	三成會從深圳招收，同時會開放一小部份學位給香港學生申請。分校會通過「全國普通高校統一招生計劃」在全國31省、市、自治區招收本科生。
畢業認證	深圳分校的學生將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的正式學生。在他們畢業的時候，除了會獲授予中大學位外，他們亦會跟國內其他大學的畢業生一樣，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獲發畢業證書。
理事會架構	深圳分校最高的權力機構是理事會，由中大與深圳大學各委任8人組成。理事長一職將由香港中文大學的校長出任，他／她擁有最終決策權。
財政狀況	財政是完全獨立於中大沙田校園，不會互相補貼。分校的經費來源主要源自學費、捐款、深圳市政府補貼及各類科研資助。

表四：中大深圳分校資料表（資料來源：整合自中大深圳分校的報導及中大官方網頁）

1 何薇，〈港校北上謹慎磨合〉，《南方都市報》（深圳版），2012年7月13日。

2 儘管它被稱為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研究院，它的工作卻並非完全集中在研發項目上。在這研究院裡，其實有一個專業進修中心，可提供中大商學院EMBA（中文班）課程。該課程的全期學費為港幣465,760元，對一般內地市民來說，這銀碼近乎是天文數字。〈貴族課程〉，《新報》，2012年12月23日。

3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概覽」，2010年，http://www.szdo.cuhk.edu.hk/zh-TW/cuhk-shenzhen-planning/overview，擷取於2013年12月13日。

4 鳳飛偉，〈港中大的龍崗猜想〉，《南方日報》（深圳版），2012年10月17日。

5 嘉寶，〈劉遵義點菜，沈祖堯埋單？中大深圳分校一石擊起千重浪〉，《中大學生報》，2010年3月號。

6 同3。

7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常見問題」，2014年，http://www.cuhk.edu.cn/trad/download/FAQ.pdf，擷取於2014年1月26日。至於非內地生的學費則是每年150,000元人民幣。

8 同2。

9 按2013年的數據，北大和清華學生每年要交的學費一般而言僅為5,000-6,000元人民幣左右，當中包括大部份醫科和理工等科目。只有個別專業科目的學費就會比較昂貴，譬如說藝術設計和造型藝術專業，學生每年學費則約為10,000元人民幣。

10 香港中文大學傳媒及公共關係處，http://www.cpr.cuhk.edu.hk/tc/press_detail.php?1=1&id=1509，擷取於2013年12月13日。這些學科包括信息工程、能源工程、先進製造、環境科學與工程、生物科學、材料科學、金融服務、工商管理及經濟學等。

11 香港中文大學傳媒及公共關係處，「中大與深圳市人民政府及深圳大學簽訂詳細協議落實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的籌建」，2013年，http://www.cpr.cuhk.edu.hk/tc/press_detail.php?id=1060，擷取於2013年12月13日。

12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本科課程」，2014年，http://www.cuhk.edu.cn/trad/ug.htm#programme，擷取於2014年1月26日。事實上，深圳分校在2014年開學時仍是會先開辦經管學院，到2015年才會招收理工學院和人文社科學院學生。

13 麥志榮，〈校長要愛國　須辦國情課　教材要審批　深圳分校　中大精神勢染紅〉，《蘋果日報》，擷取於2013年，9月2日。

14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2014年，http://www.crs.jsj.edu.cn/index.php/default/news/index/2，擷取於2014年1月26日。

15 〈深圳分校動工　中大不怕「染紅」〉，《香港經濟日報》，擷取於2012年10月12日。

新北進精神

◆ 陳健民（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原刊於《明報》觀點版，2011年8月14日

上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改革伊始，港人昂首北上，杯酒釋官僚，談笑間，圈地設廠，以港式管理改造毛式勞動，啟動了廣東這列改革開放的火車頭。即使港商或多或少成就了一個貪腐大國，又長時間虧待了默默耕耘的農民工，港人仍是感覺良好，一面發財，一面貢獻祖國。

今天港人感覺可不一樣。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雖然人均收入偏低，但只要集中資源，幹起大事來都令港人目瞪口呆。奧運、世博、航天科技展示國力之餘，內地同胞到香港炒樓、掃名牌、搶奶粉都叫港人明白到「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的道理。被CEPA、「自由行」打救之後的港人，衣帶漸寬，面容憔悴。

忽略了對國家的社會文化貢獻

香港是完成了協助中國現代化的歷史任務嗎？當年中央對港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戰略是否可以放棄了？我看在經濟方面，香港在協助內地企業進行國際融資和內地資本走向國際方面仍有角色。上海一天沒有司法獨立、廉潔政府和足夠的專業人才，難以取代香港。問題是中國即使不與國際接軌，單靠本土融資和內需拉動，都夠支撐局面；有時甚至慶幸人民幣未能自由兌換，反能避開全球金融風暴。如此看來，保住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亦毋須沾沾自喜。

香港的NGO模式

香港所忽略的，反而是我們對國家的社會與文化的貢獻。以公民社會為例，過去十多年來，香港的大學和公民社會組織在資源、理念、工作模式和人才培養方面都促進了中國公益領域的發展。樂施會、宣明會、苗圃行動、智行等基金會和服務組織一直投入大量資源在內地服務貧困和弱勢群體，有些更支持內地非政府組織（NGO）的工作。這些NGO在環保、教育、公共衛生、婦女、勞工等方面都做出重大貢獻，但礙於中國法律的限制，往往難於登記為合法組織。沒有合法身分，這些組織亦無法在銀行設立獨立帳號，更不用說進行募捐。由於政府不向這類NGO（在中國統稱為草根組織）提供資源，他們唯有靠私人關係向朋友和義工募集一些經費維持生存。稍為有規模的NGO，都要靠海

外的基金會和公益組織撥款支持。我觀察到香港一些公益組織由於比較理解內地的法律情況，願意較靈活地處理內地NGO的帳號問題，令不少草根組織可以獲得資源開展工作。

內地許多民眾對慈善工作有所認識，都源於在電視上看到港人捐款賑災和支持一些醫療、教育和社會服務。很多內地來港訪客都被在街上賣旗的義工所感動，覺得香港是真正實踐「平民慈善、人人公益」的地方。如果他們細心留意，會發現香港大部分中小學都是由慈善組織成立和管理，在社區中的老人和青少年服務都是NGO提供。這種由政府提供經費、NGO提供服務的伙伴關係，慢慢亦被內地各級政府所認同。深圳、上海、北京、廣州等市政府都開始以向NGO「購買服務」作為一種社會管理的創新。

即使在共產黨管理的領域，我亦看見「香港模式」如何發揮影響。譬如說共青團管理的各地志願者協會，由於經常到香港參訪志願組織（包括義務工作發展局），令其對志願者的管理模式產生深刻的變化。內地的志願服務往往是從上而下的動員，志願者在政府或官方組織發動下，在大型活動中從事一兩天的糾察、衛生工作，但香港的志願服務強調義工的成長，鼓勵從下而上的參與和對義工的系統培訓。一些內地沿海地區的志願組織學習了這套香港模式後，連名稱都改為「義務工作者」而不用官方慣用的「志願者」稱號，可見這種參與式理念的影響力。

理念的傳播與公益專業人才培養息息相關。隨著「購買服務」概念的出台，中國不少社區亦開始設立「社區公共服務站」或「社工站」，令社工忽然成為新興行業。而香港的大學（如理大社工系）在協助建立內地的社工系和培育中國第一批專業社工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每年亦邀請近百名中國NGO領袖到香港聽課、參訪社會服務組織和了解公民社會的發展。樂施會和社區伙伴等機構更直接在內地支持一些NGO的短期培訓課程，培育了大批NGO義工和領導。這些課程在訓練組織、財務、義工管理以外，更強調公民參與的理念。

事實上，不少國際和本土NGO都運用香港的制度和地理優勢試圖促進中國成為一個更文明、開放、以人為本和可持續發展的國家。綠色和平、無國界醫生、國際特赦組織等都在香港設立辦事處，支援其組織在中國的工作或關注中國事態的發展。中國南部許多勞工組織和中國的維權律師亦得到香港相關團體的支援。近來廣州的「撐粵語運動」和保育運動其實都有香港的身影。他們或者為弱勢群體提供服務，或者從事倡議活動，為的是推動一種更平衡的發展方式。

在3D肉蒲團之外

這些年來，我接待過以百計的內地學者和NGO領袖，他們都從香港最平常的

生活中受到啓發：在地鐵、銀行有秩序地排隊、全面禁煙、廁所清潔、背囊毋須放在胸前、報章罵政府、大學生罵校長、遊行集會和平有序、在香港辦事「省心」（凡事有規矩，不花心力走後門）等等。退，香港對內地是一個示範。進，香港可直接參與到中國的社會發展去。上面談的公民社會只是一面，譬如在教育領域，我們有沒有志氣為中國培育新的領導人才？在文化創意方面，香港作為全國最自由的城市，在3D肉蒲團之外，還可以創作怎樣的電影、舞台劇、棟篤笑吸引到自由行的人潮？

香港年輕一代面對中國的崛起實在有點手足無措。在大處，他們痛恨中國政府對內地維權分子的打壓和對香港民主化的諸多阻撓，在小處，他們埋怨內地學生搶走了他們的宿位、獎學金和研究院的學額。在反高鐵和反政改的運動中，我們可窺見年輕人那種不惜與內地割斷的衝動。這種「守城心態」當然不難理解，亦對保衛「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有其意義，但如能採取新的北進思維，自信香港對內地的社會和制度建設有積極促進作用，港人生活在此時此地，會有更深遠的意義。

香港正能量：中國NGO的黃埔軍校

◆ 梁正燁

原文刊於《陽光時務》第二十二期，2012年6月28日

近年來，內地來港讀書的學生越來越多，香港中文大學校園裡，普通話成為了校園裡面隨處可聽到的語言，香港的學生、市民早已熟悉這個現象。但他們未必知道，在這些內地來到香港大學校園學習的人群中，除了本科、碩士課程的學生，還有NGO職業負責人、負責社會工作的政府人員、熱心參與公益工作的商人和傳媒人。每年都有這樣一批人來到中文大學的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下稱「公民中心」），參與為期數週的訪問計劃。

中大公民中心2008年創立，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推動內地公民社會的全面發展。中心做大量公民社會發展研究項目的同時，也專注培訓方面的工作，據中心介紹，每年平均有超過50個訪問學人到中心交流。

公民社會大講堂

對訪問學者來說，第一個重要的活動是「公民社會大講堂」。這些在社會工作已久的人，透過訪問學人計劃，重返校園，像大學生一樣聽課。對公民社會素有研究的公民中心主任陳健民會向他們介紹公民社會先進的公民社會理念，中文大學政治系的馬嶽給訪問學人講解香港基本的政治架構，讓學人能夠了解香港的立法會、區議會以及市政府架構的情況。

中心執行長王泳特別提到關於NGO治理、理事會權力分配的技術性課程。她說在技術層面，訪問計劃希望可以向學人傳達NGO要公開透明運作和分權治理兩個重要的理念。王泳說：「NGO作為第三部門的重要組成部分，平時倡導政府要公開、透明，要服務於公眾利益，但是如果NGO自己沒有權力制衡、運作不公開透明，這樣的做法和理念是相違背的。所以我們希望NGO往規範化的方向去邁進，一方面是通過理事會運作，另一方面通過公開透明的內部管理來提高NGO在社會中的公信力，這是我們在技術上最看重的兩個方面。」

與此同時，訪問學人計劃並不是單純技術上的培訓，「我們項目的宗旨是希望來訪者能夠來我們這裡換思維。」項目更希望參與者能來到香港，帶走一種新的思維方式，「訪問計劃的參與者在內

地都非常忙，每天面對機構日常運作問題要疲於奔命地去解決，很難得有時間靜下來去想公民社會這條路未來要怎麼走，長遠的計劃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路向。香港的公民社會或者社會建設，可以說比大陸領先三十年左右，所以我們希望他們看看香港如何走到今天，現在是一個怎樣的狀態，再回去看大陸是一個怎麼樣的狀態。這個體驗可以給他們在決定自己的方向的時候，帶來很不一樣的啟發。」王泳說。

廣州盧思歆長期投入在NGO服務工作上，也是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前期訪問計劃的參與者，她指參與訪問計劃對她最大影響未必是專業上的東西，更重要的是有機會放下工作，回到校園，聽課聽講座，到圖書館看書，校園的生活讓她有放鬆、思考的空間。在廣州的盧思歆以往雖然也有機會可以到香港，但她認為真實地生活在香港，對於深層次認識香港很有幫助。

關注青年性教育問題的廣州同城社區的負責人陳杜在訪問的時候，正好看到中文大學學生會選舉的過程，學生自動自主地參與公共事務的意識和做法都讓他有很大的感觸。同時也讓他意識到，他自己做的青年教育，給青年人的不應該只是服務提供，同時應該帶給他們更多獨立思考機會。

社區組織經驗傳道

深入香港社區體驗，也是這些學人來到香港的「必修課程」。近期來香港的內地學人就到天水圍了解「天光墟」的情況。

天水圍社區NGO「天水圍發展陣線」近年一直幫助小販們爭取天光墟合法化，他們希望政府能規劃出一個地方，讓天光墟可以合法存在。訪問學人來到這裡了解這些紮根社區的NGO為居民向政府爭取權益的策略經驗。

「負責替居民向政府爭取天光墟合法化的社工黃姑娘，向我們介紹了推動『天光墟』合法化的事情上用了甚麼方法。例如跟媒體保持聯繫，邀請議員支持他們等等。最近香港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公開對天光墟合法化的事情表示支持，王國興是親政府的建制派議員，就連親政府議員也有可能對這樣的事情表示關懷，我們是希望學員通過實地參觀這些案例，能夠感知到社會發展比較成熟的香港的運作模式。」王泳說。

陳杜在參觀天水圍和深水埗的社區組織的時候，發現面對社區的問題，政府會牽頭成立針對解決具體問題的委員會，委員組成包括政府的人員、社區NGO的負責人、學者、專業人士。陳杜認為各界組成小組委員會的溝通機制，很值得內地借鑒。他回到內地後，在與政府民政部門溝通時，曾建議與政府建立這樣的溝通機制。「與我接觸的官員個人很有興趣了解這些香港經驗，但是在內地，政府政策往往都不是基層官員個人能夠決定。」

跨界平台

陳杜認為公民中心還擔當了一個交流平台的作用。「我們最近四月份到香港這次交流當中，一共有16位訪問學人，有各個領域NGO的負責人、政府工作人員、媒體記者等等，這給我們提供了很多跨界合作的機會，當時在訪問歷程當中認識的一位媒體朋友，現在也成為了我們組織一個很好的合作夥伴。」

也因為廣州到香港便利的交通，現在陳杜常常到香港，找到這些之前拜訪過的NGO組織朋友作定期的交流。

一直關注青年性健康和性教育的陳杜在香港拜訪「新來港移民婦女互助會」，發現新來港移民的群體同樣會遇到很多關於「性權」所帶來的問題。「不同組織表面上看起來關注的問題截然不同，但是其實可能大家都有深層次的共同權利訴求，例如性權，這就是公民權或者是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他認為，不同領域的組織應該要主動去尋找這些深層的共同權利訴求，尋求更多合作的機會。

陳杜也看到了香港社會意識形態的分歧，讓社會撕裂的現象，同時也影響到NGO之間的合作，即使是關注同樣問題的NGO，意識形態差異卻讓他們的分歧卻越來越大。陳杜在內地也曾遇到同類情況，也正在思考解決的方法。

張棟（化名）在2010年以媒體人的身份參與了訪問學人計劃，在這之前張棟是《南方都市報》深度版的調查記者。在公民中心了解到公益發展的情況後，他轉向開始投入到公益報道當中。而後來張棟到了另一個南方系媒體工作，開始專職負責環保領域的報道工作。

現在這位記者已經離開了媒體一線，進入基層政府工作。但是他仍然支持NGO組織的發展。他在廣州參與發起「歡言沙龍」，每一兩個月舉辦一次，主要聚合一些媒體人、企業家和NGO工作者進行跨界對話。王泳說，「歡言沙龍」舉辦活動的時候，她也盡量會去到廣州參與交流。不少參與者都是曾經到公民中心交流的學人，王泳認為這也算是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交流平台的一個延續。

長期致力於推動華南地區的NGO發展的朱健剛，他在廣州任職的機構「公民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亦被譽為「華南地區NGO的黃埔軍校」。朱健剛自言他之所以投身到NGO培育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香港中大公民中心負責人陳健民的影響。他認為公民中心推動NGO相關人士來到香港學習探訪，實實在在地讓香港經驗影響著來自全國各地的NGO青年領導人。

「『香港』這個概念，在內地某種程度上代表著一種正能量，甚至可以說香港是整個南中國的公民社會的發動機。」朱健剛說。他認為對於香港來說，推動內地的社會發展是一種歷史使命，他希望香港能把這種使命延續下去。

中港公民社會如何交流
——訪青年公民社會

◆ 胡蘇

香港多年來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已然千絲萬縷。從民國成立到抗日戰爭，到中共成立直至九七回歸，香港於中國大陸一直擔當重要角色。香港中文大學就是在戰後內地學者南流來港，以保存中國文化為時代背景下得以成立。因此一直以來，從中大成立到火紅年代直至今天，中文大學的學生組織一直都有不同的與內地有關的活動。本文望藉著訪問青年公民社會的Eliz，了解其屬會為何和如何在內地組織工作。

青年公民社會（下簡稱「青公社」）是中大學生會的其中一個屬會，成立於2010年，與公民社會研究中心[1]有緊密聯繫，是中大屬會當中較為年輕的一個。青公社的理念是推動年青人多關注社會，鼓勵公民意識的培育，其活動範圍不僅限於香港，亦包括內地、台灣以至全球，但一直以來的活動多集中在大中華區域。

博群實習計劃

以2012和2013年為例，青公社和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合辦了博群大中華實習計劃，提供機會讓中大同學到內地及台灣的NGO實習。青公社於計劃的主要角色是協調同學與其他組織的交流，還有宣傳、課程設計，以及培訓上對同學的支援，例如是實習過程中同學於新環境的適應、與NGO的關係、甚至組員之間的磨合。

Eliz指選擇大中華地區的原因在於其距離與中大較近，文化及語言對於同學來說亦較熟悉，容易適應和花費較低當然亦是相當重要的考慮因素。以2012年為例，便有二十個同學到內地五個不同省份的NGO實習，包括內蒙古、北京、西安、貴州及廣州進行實習工作；關注的議題也非常多元化，包括有婦女權益、少數民族的文化保育、小額貸款及扶貧、有機耕作、老人服務、痲瘋病康復者的照顧及反歧視工作。今年的實習範圍更擴展到台灣及其他內地城市，關注議題亦不斷豐富起來。

公民社會交流中的協力與得著

Eliz指出這些實習不斷加深中港台三地的交流，讓同學藉著對比三地公民社會的發展狀況，加強對各種議題的思考，不論對香港還是內地的公民社會發展也

互有裨益，這些交流能促進NGO的發展，提高社區的民主和公民參與度。尤其對於內地來說，由於內地公民社會的發展較香港遲，不少議題的發展亦較為緩慢。借鑑香港的經驗，則可以為當地社會提供新的活力和想法，供他們參考。以去年內蒙古實習為例，實習同學便參考了香港救世軍的二手衣服回收計劃及香港聖雅各福群會實行「時分券」的例子於當地社區試行愛心超市計劃，以推進當地的公益慈善事業。

除此以外，同學於實習過程亦加深了對內地NGO和社會發展的認識，對於NGO在內地社會發展乃至生存的壓力有進一步了解，明白到其組織在狹縫中發展的限制。此外，同學亦接觸到一些香港較少接觸的議題，例如少數民族的發展，其中一個實習同學便需要於貴州學習保存當地少數民族文化的方法，諸如是如何保存其歌謠及服飾等等。另一方面，生活在城市的香港學生鮮少接觸到農村的生活方式，在內地農村服務的過程中，同學便藉此體驗另一種生活模式的可能性。

Eliz補充說，不少同學在實習完畢後對實習機構有著相當的感情，實習完結一兩年後亦會與機構保持連繫，有的更會回到當地探望機構職員與村民，甚至相約於其他公民社會活動見面，例如早前於深圳的NGO展覽。其中一位同學於服務痲瘋病康復者後，瞭解到其所受到的歧視，回港後成為了國際特赦組織的義工，向公眾倡導人權的訊息。

除了博群大中華實習計劃以外，青公社還有不少聯繫兩岸三地的活動，例如中港台三地的大學生領袖訓練營和每年於12月尾到1月頭的廣州公民社會交流團，一眾中大學生便會到廣州與當地的NGO，例如關注環保、文化保育和重建議題的組織交流學習，互相借鏡。同學於交流中獲得的重要經驗，便是反思兩地的公民社會的發展，大至言論自由，小至街道上的城市導賞。青公社認為香港社會上理所當然存在的，於內地都不是這樣一回事。廣州事實上已經是內地較開明的市政府，對公民社會的限制相對較少，但仍然會出現監控和隨意取消市民活動集會的情況。

公民社會的教學相長

另一方面，內地政府的打壓雖大，但公民社會組織的發展卻有增無減。其中非常值得香港借鏡的就是其創意手法與繞過不合理規定應付官方的方法，例如提倡男女平權的組織 Sinaer B 便以行為藝術等手法表達其訴求。由於男女廁於廣州的比例極度不均，他們便以「佔領男廁」來向公眾表示不滿和女性的需要。而香港帶去的書籍和紀錄片亦把香港抗爭的手法和經驗傳達給當地NGO。廣州的一個文化保育組織「街坊情」一直以來都在進行街名和廣東話的保育，參考了從香港帶去的書籍和紀錄片，了解到香港舊城保育和保衛菜園村的經驗，他們借鑒這些經驗，加強和改善對廣州舊區歷史和建築特色的保育，為居民重構起共同的社區記憶，藉此組織起來，吸引更多人對抗政府為了發展城市的強拆

行動。

平台與交流

Eliz表示青公社作為學生組織，主要的作用是提供一個平台讓中大學生接觸和了解兩岸三地公民社會的發展，尤其是青公社發展之初，中大更缺乏供同學認識和討論社會的平台，青公社便是為此功能而創立。讓參與同學知道除了社會服務和遊行外，應該更深入了解各種社會議題，以謀求更多解決問題的可能性。

公民社會更不是一個個獨立的個體，而是互相影響的整體，尤其是兩岸三地交流影響日益頻繁的今天，這些交流就更見重要。把公民社會發展的目光放遠至香港以外的中華地區，將有助香港公民社會發展得更成熟，同學的眼光和認識也更深入。

1　有關中大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的資料，可見前文〈香港正能量：中國NGO的黃埔軍校〉一文。

始於一個承諾
——訪問Francine

◆ 訪問／整理：陳秉鳳

Francine，中大英文系畢業，後修讀教育文憑，在中學教了幾年英文。四年前（2009年）辭去教職，前往英國修讀發展研究碩士課程一年，回來後加入中國勞工團體工作。

與中國結緣

Francine在中學時，遇到一位很好的老師，除了授課外，還會與他們討論社會議題。那時看過六四紀錄片《天安門》，認識八九民運，是第一次令她有了國家的概念，和對國家的感情。那些學生為了民主發動一場運動，犧牲自己，甚至絕食，在全中國引起廣泛支持，令她有感那充滿苦難的國家，其實也是自己的國家。對於只懂讀書考試，為了所謂的美好前途而努力的她，有很大衝擊。

到大一時，她上了崇基扶輪莊。暑假去了連南山區體驗團（位於粵北，屬於瑤族），那次探訪大概四五天，去到和孩子玩遊戲、教英文、做家訪……當地居民帶他們去看窰寨，表演少數民族舞蹈等。對她來說最深刻的是，走的時候，那裡的年青人問她：「你會不會回來？」她那時覺得，如果答應了回去卻做不到，就會變成消費了他們的生活。

後來有幾個同去的朋友，很想再回去，同年暑假就已再去了一次。那時認識的學生多是初中二三年班，她覺得那些學生很特別，有些喜歡音樂，有些喜歡自己的民族文化，聊天時也會談彼此的夢想。當時那邊的農村文化及瑤族民族文化正慢慢流失，受主流經濟發展衝擊，年輕的很多都出去打工，未必會留在農村。但那班學生很喜歡自己的文化，他們就開始嘗試一起做一些保留當地文化的活動，他們開始去找老一輩的村民，去學瑤歌、瑤鼓、傳統舞蹈等。

「我們這班香港人去到，帶了一些外面世界的東西給他們，我們去到又見識到他們的文化，對雙方來說帶來了很多文化和思想上的衝擊。」Francine被他們的農村生活和人際關係感染，覺得他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真誠純樸，很喜歡那種自然的感覺。

拐一個彎再回去

在連南的經驗，影響了Francine對整個人生的想法。她說其實當時很想一畢業

就找非牟利團體工作，最理想的是與內地農村發展有關，但因家庭經濟關係，需要有較高的收入，就選擇了做教師。但她並沒有停止回去連南與那些學生接觸，及繼續協助他們保留民族文化的工作。她任教第二間學校時，更曾帶過一團交流團回去連南。「那個地方令我改變很大，我常想如果我有自己的學生，希望也帶他們去。」

她說那幾年回去連南，除了因為與那裡的學生成為了朋友，希望維持關係外，傳統農村文化被城市發展破壞，她也很想做一些事去改變。可是那時她對如何可以更根本地解決一些農村面對的問題茫無頭緒，只能支持學生讀書、陪伴他們成長、和他們一起思考怎樣保存文化。這也是為何她會在教師事業相對穩定時，決定辭職去唸碩士（她去唸的發展研究，正是專門以綜合各種社會科學方法，去思考、分析及回應發展中國家所面對的問題），希望能透過這踏板，重回她所希望投身的志業中。

中國勞工，苦難的另一面

碩士畢業後回港找工作時，Francine最初是希望找一些能和內地農村或農業有關的工作，但並沒有遇上相關的機會，反而成為了內地勞工權益團體的職員，一做就是兩年多。

該機構主要目標是提升工人的階級意識、使工人團結起來、以集體力量維護大家的權益，長遠來說希望能改善整個勞動狀況。她主要負責協調機構於深圳中心的運作，培訓內地同事如何與工人討論不同議題、協助制定工作計劃、籌備相關活動等。另外她有時也會落工廠區派傳單做調查、跟進工人個案，及請有維權經驗的工人分享等等。仔細來說，機構關注的範疇包括分析工人所在的處境、認識工人身份、政治經濟狀況分析、全球化對他們工作環境的影響、他們正受著怎樣的剝削，以及如何可以改善狀況。

不同時間也會有特定的議題，例如最近是關注最低工資水平，希望能提高最低工資至平均工資的百份之四十至六十。「要真正影響內地政府改變是很難，但我們都希望鼓勵工人表達意見及自己的想法。之前中心做了調查報告，總結工人生活水平，以及過一個有尊嚴的生活的實際所需工資。現時他們的工資都遠不夠在城市的生活所需，只能照顧到自己，沒辦法照顧家人。」

後來工人們覺得要寫信給市政府表達訴求，並希望了解最低工資制定的準則。他們一起收集簽名，遞交去各部門，要求回應。政府部門通常都是敷衍了事，但Francine說，這些行動，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想工人去體驗。「例如有個工人原本覺得政府是為人民服務，很多工人被剝削，是資本家的錯。後來他決定一起去上訪，希望政府回應工人訴求。除了替資本家說話外，政府拒絕提供其他訊息，令他大為失望。後來他也會說：『政府為何會這樣，不是為人民服務嗎？』」這些過程裡，工人們雖未

必能直接影響政策，但可以提高他們表達意見的信心和釐清希望爭取的目標，並作為行動的主體，把工人的聲音帶進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工人的充權亦意味著一步一步地建構由下而上的改變。

在兩年多的工作裡，挫敗也不少，除了要由零開始苦讀中國勞工法例外，工人的流動性高，群體鬆散亦是一大問題。有時難得培訓了一個核心工友，他卻要離開到別處打工，無法繼續組織工作。更大的挑戰當然是政治壓力，去年（2012年）機構的勞工中心被房東逼遷，工作地點變得不穩定，這些動作明顯是想收窄勞工團體的生存空間（同期亦有其他勞工團體面對同樣問題）。Francine說，慶幸的是機構紮根社區多年，深得工友支持，工友更和他們一起集體上訪政府部門，要求給予勞工團體生存空間。「那時最深刻是工人會與我們一起去抗爭。其實他們可以不用企得那麼前，但他們覺得要一起去抗爭，對他們來說其實是很危險，可能會有警察出動。但他們真的企硬，拿著牌站一整天，落雨都繼續站，那種決心令我很感動。」

香港人在內地

問及Francine香港團體在內地勞工權益問題上的角色，她說，外國團體在內地多數關注扶貧、環保等問題，很少介入勞工運動。中央對這個問題特別敏感，即便是港人辦的團體，也會被定性為「境外勢力」，但香港憑著其較為有利的位置，仍能在這個議題上出力。尤其是在工廠北移，港資於內地設廠後、嚴重剝削內地勞工權益，香港團體遂開始揭露內地工人狀況，譴責無良僱主及督促他們改善勞動狀況。這些事情在內地不能明言，但透過香港這個平台，就可以把勞工慘況傳播到國際媒體。

Francine提到另外一個港人重要的角色，是提供由下而上的工人組織的經驗，以及爭取勞工權益的方式。這些東西帶到內地後，經過本地化，成為了珠三角工人的抗爭模式。她說珠三角的工人抗爭相對來說比較活躍，工人在維權方面亦走得比較前，會透過打官司及集體抗爭等不同途徑去爭取勞動權利。另一方面香港團體發揮的重要角色是一些價值觀的交流，例如讓內地組織者及工人體現民主參與模式，一起討論各種勞]工權利，以及在機構運作及管理上提倡更有透明度和公平的原則。

作為香港人，在內地支援工人維權，總不免反思現在中港矛盾的狀況。Francine說：「從前沒有想太多香港人和中國人之間的分別，或者身份差異之類，雖然我和別人講述時，可能也會說自己是香港人，但我也覺得自己是屬於中國的一部份。但當然我對政權認不認受是另一回事。我想回內地為國家做一些事是很理所當然的。」

她說，其實在內地工作，都要面對文化差異，又或者自己作為一個「外地人」的身份。「但人與人之間，如果可以互相尊重，交流溝通，是可以做到朋友。

現在那種『蝗蟲』，『支那人』、『強國人』的稱呼令人很難受。其實港人在大陸經常剝削工人，那又有尊重人嗎？」

連南的孩子並不很遠

Francine談到，中國民主化的過程，仍很漫長。工人的力量，在這之中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但她也知道，民主並非靈丹妙藥，並不能解決勞工面對的問題，就如現在很多已發展的歐美國家一樣。「至少，在民主的國度下，人民可以享受公民權利，不會再出現劉曉波、劉霞、陳光誠、胡佳等等這些為了公義而失去自由的人。」雖然不知道重大的改變甚麼時候到來，但她仍是想繼續做勞工充權的工作，無論影響是多是少。

有一些她在連南認識的孩子，也長大了到廣州打工，在她開始涉足勞工問題以後再與她相見。青年往城市打工、農村衰落，她雖然稍稍遠離了最初引起她關注的地方，卻一步一步地，接觸到更多由《天安門》那時開始，仍不斷縈繞中國的苦難。

中港關係的另一面
——殺人的資本與掙扎中的工運

◆ 訪問／整理：陳秉鳳

S，為保障工作安全，隱去姓名及組織名稱，中大現代語言及文化系畢業，畢業至今於中國內地工作，進行與勞工問題有關的調查及權益普及工作。

S到高中前，一直與母親及兩個弟弟在廣東農村居住，父親和祖母及叔叔等一起在香港工作生活。父母比較純樸，不懂得打關係，幾母子排隊十多年都申請不到來港，最終可以忽然加快程序，是因為父親患癌。長期分隔使她和父親關係疏離，父親每次回鄉就是賭博，卻是逢賭必輸，她相當害怕父親。直至來港才知道父親幫忙祖母經營小販檔，是並不富裕的基層勞動者。到父親癌病末期，因為不想成為家人負累，自殺離世。S說，後來到她開始理解基層和階級，才能思考到底是在怎樣的經濟環境或生活壓力之下，致使父親成為一個這樣的人。而亦是因此，她對於基層問題的關注和投入，基本上是不難理解。

來港．求學階段

S來港時入讀中四，雖然是新移民，但校園生活與我們一般人沒有太大分別。最讓她難以適應的是居住環境，到香港後五個人住在相當狹小的一房一廳，與在廣東農村時簡單但空間寬裕的生活完全不同。五個人緊緊地擠在一起，當然也易生磨擦。生活環境的轉變，亦令她意覺到自己的家庭比其他同學的貧乏。

S開始關心社會，是跟朋友去中大學生報傾莊，發現有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傾社會議題、傾理想，開始建立一些自己的想法。她後來回想其實有些價值觀是在大陸生活時建立的，例如他們要上思想政治科、要讀馬克思。雖然是很教條地讀，但當中也有價值觀，例如反壓迫、和平等，在小時已慢慢建立了。

報社落莊後她參與了基層關注組的工作，幫手搞女工合作社。那時還參與落區探訪清潔工，去到一棟公屋的垃圾房，看到那裡工作環境極為惡劣，人工又少。香港作為一個相對富裕的地方，竟然有人要在這樣的環境工作。那時她被嚇倒了。

進入中國勞工的世界

畢業後一年，S去了一個內地勞工工作坊，由於自己廣東農村出身，很多小學同學都是去了城市打工，於是對那些問題很容易感到關心。小時候不會有人解釋工廠內的情況是怎樣，但在工作坊裡她知道，原來情況是不堪入目的。後來，她加入一個中國勞工團體，從事中國工人勞動狀況調查及權益教育工作，一做便是六七年。

她說在香港的中國勞工權益關注團體[1]，都會特別留意港資工廠工人的勞動狀況。在工作中接觸到的工人，經常會說台灣老闆最惡劣，「不把工人當人看」，其次是香港老闆「摳門（刻薄）」。香港老闆對中國工人的壓榨，比比皆是。其中一個例子是力奇珠寶廠，廠房在香港搬去大陸，珠寶業本是香港的重要產業，發展多年，老闆明知道工種的職業病風險很高，但為了節省金錢，不願意做好抽風等安全措施，亦沒有告訴工人有患塵肺病的可能，有些工人做了十幾年後，開始有肺病，工廠還要對員工說是他患了肺結核，讓他辭工回去把病醫好才回來。到工人發現自己根本不是患有肺結核而是塵肺病時，已錯過了治療的時機。工人事後維權，香港老闆拒絕承認責任，工人要多番示威，打官司，經歷漫長而痛苦的過程才得到少量賠償。這些工人多是同鄉，她曾到廣西農村探訪，那裡幾乎成了塵肺鄉，很多家庭都有塵肺病患者，有個家庭四兄弟裡有三人因此病逝，有些人已失去工作能力，在村內等死。治病使他們再度陷入貧窮，賠償用光，還要欠債。死亡籠罩著每個家庭，幾歲到十來歲的小孩，失去了父親。

「我真的覺得這個世界是出了甚麼問題，（老闆）可以合法殺人而無罪。其實你和在街上拿刀殺人是沒分別的，因為你是蓄意的，但這個制度就容許這種事。有些人命就是這樣沒有價值。」香港團體早期回大陸做工傷職業病個案最多，因為情況最慘，很多工人亦不懂得爭取賠償。老闆賺了利潤就走，所有對環境、工人健康造成的問題，都留給當地人自己解決。

幫助，改善？

S坦言，香港人回內地搞的勞工團體是能提供協助，但都是小修小補。這些團體的作用不是不重要，沒有這些團體的推動，勞動權益的意識在工人層面的普及甚至在社會層面的普及，其實都可能會慢些。勞工團體過去十多年主要工作包括：基本勞工法律權益的普及和爭取、完善工人法律權益的落實、法律保障的條例和規定的倡導工作，這些都取得一定的成果，工人法律意識提升，深圳勞動行政部門也相對來說開放了一些。沒有這些團體，香港、國際社會甚至內地人民本身，都很難知道大陸工人的處境和問題。

長遠來說，工人要改變其地位和處境，或者走向一個更加公平的保障制度，S覺得都是要靠工人的團結和組織化去爭取。但勞工團體在這個位置上可以發揮

多大影響力，暫時是個未知數。之後的影響還是很難講，政府對這些勞工團體有很大的戒備，但他們是否有這麼大威脅性？她自己覺得其實也未必，因為勞工團體人數太少，要達到聚合工人的目標實在距離太遠。

中港問題　必須看階級關係

S說她的工作令視野開闊很多，因為那不純粹是大陸裡一個工廠，因為它是整個世界的工廠，和全球資本主義問題其實環環相扣。中國工人狀況差當然是與大陸政府的保障制度有問題，但同時也是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生產鏈的問題，當資本主義全球化，將生產線移去第三世界國家，消費保留在自己國家，銷售佔大部份利潤，生產只佔很少部份的利潤，這種生產結構，令下面的工人在這個情況下處於一個劣勢位置。有些跨國NGO做的研究，指生產一對波鞋，在大陸的利潤只有百份之三至五。加上大陸政府為招商引資，以低成本吸引作招徠，勞工福利及保障極差，造成大陸工受雙重壓迫的處境。換句話說，要改變工人狀況，除了改變大陸政府的福利和保障，還要指向整個全球化經濟發展的結構問題。

S認為看中港關係，很難不看階級問題。現在大家好恐懼，覺得中資要入侵香港。其實問題源於大陸整個社會貧富兩極化，資本階級暴富的情況下都要尋找出路，以香港做橋樑，和國際接軌。而其實對上三十年，香港資本家靠剝削中國工人賺取利潤，而香港作為貿易中轉站，也在全球化的貿易鏈條上分了一杯羹。「香港整體生活的穩定和經濟相對平穩，是靠第三世界國家的低工資、不平等、無工會[2]來支撐的，並非因為獅子山精神」。「看中港關係時，如只用大陸人／香港人去區分，或政治上的從屬關係去看，其實你是看不到這些東西。政治上的問題當然是有，但在關係上是否純綷的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如果不看經濟層面，就看不到這些複雜的問題。」S認為不能當這些東西不存在，若說「香港人」是被壓迫者，那麼那些壓榨工人的老闆，包括李嘉誠，也變成了被壓迫者，她表示絕不能接受，那將無法向那被壓榨剝削的中國工人交代。

問到她會否繼續做下去，她說可以繼續做的話，都會做下去，然後笑了起來。在看見那麼多的苦難後仍能堅持下去，相信就是她對於對抗壓迫的堅持。

1　1993年，位於深圳的港資致麗玩具廠發生嚴重大火，造成87死51傷，引起香港勞工團體廣泛關注，後來不少關注內地工人權益的非牟利機構在香港註冊成立。

2　中國現時也有工會，不過是由官方成立，向官方及資方傾斜的。工人不能組織獨立工會，是對工人維權的一大障礙。

中大與八九民運雜談

莊耀洸律師
（八九民運期間為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香港教育學院專任導師）

編按：2014年6月，中大學生會出版《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們在北京》，收入多篇見證文章，記錄了中大同學於八九民運期間在北京和上海的見聞和經歷，旨在抗衡官方的洗腦國情教育。這篇文章原載於《港支聯通訊》第二十四期（1994年1月），署名山中人。從這篇文章，我們不難看到中大學生參與八九民運的位置。作者在文中所流露的民族認同感，在今天看來可能會覺得恍如隔世，但這的而且確反映出當時學生組織認為中港是一家的民族主義想像。這一想法無疑是當下思考中港關係的一個重要參考點。即使撇除當中的民族情懷不談，作者仍提出一個值得我們留意的觀點，就是他們當時對中國的無知以及對中國民運缺乏準備。因為儘管一部份香港人已沒有民族情意結，但我們仍不得不面對中共壟斷了在香港行使主權的權力。然則，內地的政治和社會格局無論如何都會牽動到香港的政治和經濟發展。因而，理解當下內地政治及社經狀況，對我們思考香港民主運動和社會運動絕對有一定的幫助。

「九唔搭八」與八九民運

平日「亂噏一遍」，「廢話」連篇，說來這與八九民運不無關係。中大學生會的電話被監聽可謂人盡皆知。自5月1日起，我在學生會幾乎每天都收到來自北京的長途電話，我便與某位上京同學預先協定一些暗號。也許我們的系統太複雜，莫說竊聽的人不明白，連我們也越談越疑惑，最終只用了幾句暗語而已，當時設想，假如我們有一套本身的小圈子語言，則無往而不利。自此，暗語、鄉音和句子重組往往是我們的語言特色，或許這正反映八九民運後的世界秩序。須知道語言反映世界，「無厘頭」的語言恰好反映末世的荒謬。

民運缺乏準備的厄運

其實要緊的，並非我們的語言缺乏準備，而是我們對中國民運缺乏準備，對中國的認識和關注不夠，使我們起初對中國學運的介入有點遲疑，兼且不懂如何介入，最終只有被動地見招拆招，例如學聯於4月20日的上京團只命名為觀察團，沒有旗幟鮮明地聲援，反而被中方傳媒所利用。4月25日，中大學生會才首次公開表態支持學運，在會見人大

副委員長王漢斌時表示，當局切勿以西安騷動為藉口鎮壓學運，至於當時的社運界「大哥大」民促會，遲至5月17日才表態支持學運。假如1982年反對日本篡改侵華歷史一役後，學界能保持對中國事務的關注，我們在八九年的回應會快一點、好一點。然而，現在仍無法記取歷史的教訓。一旦民運再度爆發，我們將自責對民運何不早作準備。似乎香港學運和社運難逃事件導向的厄運。誠如黃永玉所言：「牙痛，就忘了全世界；牙一好，就忘了牙醫。」

中港呼應的五四遊行

5月3日深夜，中大學生會駐京代表致電給我，報告了北京學生所選擇的綱領，我們認為合用，一於照抄，連夜趕製橫額，使京港兩地喊著相同的口號，宣揚著中港一體的意識。

5月4日早上八時半，我們與北京學生同步離開校園。中大一行約五十四人（寥寥數十人因中大處於考試時期），由烽火台向遮打花園進發，伴隨我們一起走的還有一大群記者、採訪車，以至直升機！從高空拍攝幾十人的遊行隊伍，實在是「搞笑」新聞中的經典！到達馬騮山附近的柏立基師範學院，遊行隊伍闖進飯堂大唱民族歌曲，場面動人得很，一生難忘！我們好像弔民伐罪的義師，熱血沸騰，暢論國家大是大非，「愛國」、「爭民主」、「反腐敗」都掛在口邊，當時大家都是這樣的高談闊論。自「六四」後，不知從何月何日開始，我們又覺得談「愛國」、「爭民主」很刺耳、很老套，我現在知道原來壯志的語言要在大時代才聽得進耳、才覺得自然，連穿上民運衫也覺自己越來越礙眼，渾身不自在，情況恰如民運時期的黑白分明不復見，反而是非越來越模糊不清，甚至要向兒童解釋何以下令屠城者仍然在位時，也日益倍感艱難。

學生校長誰最克制？

5月16日，我們跟北京學生一同發出「救命書」，整天上午派傳單，呼籲政府回應絕食學生的要求。同時，我們提議學聯舉辦維園集會，以聲援中國學運，並希望藉此促使新華社門外的絕食行動隨集會而結束。但不知甚麼原因，絕食行動沒有結束。在北京方面，一名中大代表，正打算在新華社門外下跪，冀望政府答應學生的絕食要求，我透過電話反對那位同學的計劃，認為政府不為所動，學生雖寧死不屈，但尊嚴誓不可奪。但他目睹國內同胞在垂死邊緣，不忍心如此下去。後來，絕食同學費了一番唇舌才說服那位同學放棄他的計劃。其實學生當時絕食和靜坐，是一直給予政府改過的機會，是相當克制的，從沒有搗亂等越軌行為，連北京的扒手也張貼告示「罷偷」！可是更形克制的，倒是我們的大學校長！

新華社門外的絕食學生以中大最多，多間大專院校校長，以至新華社社長也親自慰問絕食學生（連李鵬和趙紫陽也到天安門慰問絕食學生），中大卻只見學生事務主任和輔導長到場。

5月20日凌晨的「李鵬講話」後，三百多名中大學生，包括幾十名在中大進修的國內學生，於凌晨三時齊集烽火台。在電台呼籲下，部分的士更義載，助同學們趕往新華社示威，而5月20日正值學位試考期，可是校方不允延遲學位考試。考試開始前，校長高錕問，有無需要延期考試，但考生既已到場，便沒將考試改期。「六四」期間，很多大專院校讓學生延期考試，中大卻依然故我，既然中大校長如此政治冷感或敏感，又何苦當起港事顧問來？

李鵬下台非民運勝利

5月20日下午，幾十名中大學生冒著八號風球的狂風暴雨，上街呼籲群眾參加當日下午五時的維園集會。我至今曾參與的遊行數以十計，但從沒參與過如此慷慨激昂的遊行，「打倒李鵬」是每個人發自內心的怒吼。再經過百萬人大遊行的洗禮，學運已發展成全民動員的民運，而數以百計的中大同學也趕回校園，積極投身民運，計有國內支援、突破新聞封鎖及民宣工作等。

5月23日晚傳出李鵬下台的消息，支聯會隨即宣佈舉行慶祝李鵬下台遊行，我們又趕製單張，以抗衡李鵬下台即民運勝利的輿論，申明即使李鵬下台，在專制的政體下可以有第二個李鵬。但5月24日的形勢急轉直下，慶祝李鵬下台的遊行突然改為打倒李鵬遊行。過了幾天，中大愛國民主聯會成立，並發起師生大集會，中大學生會贊同成立北京物資聯絡站和民主大學；籌備工作在港進行得如火如荼，豈料鎮壓竟真的迫在眉睫，更想不到鎮壓後，我們的基礎是何等薄弱。民運的工作會如斯迅速的沉寂下來！箇中原由，多少人能深切反思呢？

六四後有甚麼作為

6月3日晚形勢危急，我特地致電北京飯店的中大同學，得悉他們吃晚飯時，聽到天安門情況吃緊，差不多立即全部跑到天安門廣場，只剩下兩名同學在飯店。我一方面替他們擔心，另一方面又深深佩服他們的勇敢。自絕食以來，一些中大同學一旦聽到鎮壓的消息，總跑到糾察線以內，與國內學生共同進退。

「六四」凌晨，那批中大同學一直沒有返回飯店，我們只從電視機聽見天安門的槍聲隆隆，我們呆坐到天亮，也想不出有甚麼事可做。直到今天，有多少人能想出何事可為呢？

1989年5月25日
維園「打倒李鵬」集會



當15萬變成基本盤

◆ 馬嶽（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2010年6月8日

我相信今年很多人都沒想到六四晚會可以和去年一樣有15萬人，包括支聯會在內。去年是20周年，支聯會用了很多資源作各方面的推廣，傳媒的報道和討論也多很多。今年21周年同樣有15萬人，我想六四悼念在香港已產生了幾項質變。從今年起，15萬人參與六四燭光晚會，已成了新的參考數字指標。

第一項質變，是像大會所說的：「薪火相傳已經完成」，或者說我們已有一整代大量的年輕參與者。八九年還沒出生或只是小童的年輕人，透過不同渠道認識了六四。他們對六四的感受可能和我們這一代不同，但都認識到紀念六四的重大意義，這是重要的「補充力量」。

對我們這些1989年時已成年，從20年前開始參與的人來說，每年都堅持參與集會遊行是一種自己給自己的責任，有時會偷懶怠惰，當然不去不代表不支持。兒子生病、放工太晚太疲倦、明早有工作，都可以給自己一個藉口，少去一年的集會或遊行，反正大家都知道一定是自由花、中國夢和血染的風采。如果參與者的基本來源不變，「塘水滾塘魚」，每年的參與人數便視乎「外圍因素」、政治氣氛或「逢五逢十」，難有突破。

「平反六四」已成香港核心價值

但廿年過去，我們這代人會有下一代，當老師的會有學生，我會有學生當上老師，而他們又再有學生，一代傳一代，可以透過不同的途徑認識六四史實。去年六四20周年的大規模社會討論和參與相信是重要突破點。這些年輕人仍然會有相當熱情，透過參與燭光晚會以及其他創新形式表達對六四的意見，成為新一波的參與推動力。「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另一項質變是，從年前馬力「坦克碌豬」的言論、和去年曾蔭權「代表香港人」的說法廣受批評後，「平反六四」已經成為香港的核心價值和道德底線。

自6月2日深夜開始，我思考「政治中立」和「平反六四」的問題。我想說的是：兩者可以是不相干的。反對六四鎮壓是良知問題，不是政治意識形態或觀點的問題。你可以不支持民主、不相信

任何政治的意識形態，但政府的責任是保護人民，一個政府殺害和平表達意見的人民，是任何現代文明人都不能接受的。這已是現代人良知的底線，根本不需要看作是政治問題。

維園燭光已變成香港地標

我認識不少傳媒朋友，可以接受從政者反對普選、維護功能組別、反對最低工資，或者也不喜歡民主派或者公投，但是不能接受有人為六四鎮壓塗脂抹粉。到了今天，支持平反六四變成港人理所當然的普遍價值，不同意者往往不敢公開吭聲，這對年輕一代有很重要的道德教化意義。這令到叫我們向前看的特首、每年立法會「平反六四」辯論時躲起來不敢發言的議員、聲稱要「政治中立」的大學高層，道德上變得很矮小。當整個建制不敢在「平反六四」這個基本道德問題上站在人民的一方，或者逃避表達立場，他們的道德水平和基礎便負上了「原罪」，構成了整個建制要面對的道德危機。

21年以降，維園燭光已經變成香港的地標。年輕一代成長期間認識的香港，是每年都有至少數萬人會到維園點蠟燭悼念六四的，是抹不去的成長印記和集體回憶，和我們這代領略的意義略有不同。這可能是最重要的質變。這是一國兩制的標誌，標誌了香港人是關心祖國的發展和民主的中國人，也標誌了港人繼續享有爭取中國民主和表達意見的自由。這是每年都必定會上CNN的香港盛事，已經成為香港性格和港人人格的一個主要組成成分，反映了港人的核心價值，是港人身分認同和本土意識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沒有了維園的六四燭光集會，就不是香港。

淺談《中大學生報》六四特刊之轉變與不變

◆ 陳嘉銘

每年六四，中大學生會編輯委員會（下稱「報社」）都會出版六四特刊[1]。這個現象看似尋常，但其實不然。較諸於其他院校的編委會，只有中大會恆常出版與六四相關的刊物，這反映了中大學生組織對八九民運的重視。究竟中大報社重視六四的原因是甚麼？這就不得不從六四特刊的內容說起：事實上，每年六四特刊的出發點都不完全一致，本文希望分析這十年的六四特刊（第15周年至24周年），從而歸納出一些異同。透過這些歸納，我們一方面可以觀察到學生組織理解六四的變化；另一方面，我們亦可看到中港政經格局的急速轉變。

時間線——從天安門到香港，從1989回到1978

首先，就讓我們從特刊的時間線說起。在這十年的特刊，幾乎每年都有時序表，去紀錄六四事件。而描述的方法，無疑反映了該屆報社對六四事件的理解。第15-16周年特刊的時序表，都是由胡耀邦逝世開始，然後寫學生罷課、絕食，敘述廣場上學生與當權者的角力，結尾則是六四鎮壓清場和當權者對這場運動的定性。在這種描述下，八九民運只由1989年4月15日開始6月尾終結，學生則是整場運動的主體，而八九民運則可概括為在這段時間於北京天安門廣場所發生的事。

之後在第17-18周年的特刊，時序表的時間維度依舊是那一個半月。不過，所描述的東西則不再局限於北京所發生的事，它還引入了中國其他地方以至香港的向度。譬如說，它會記錄學運蔓延全國的狀況、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打壓言論自由，以及香港市民對這場運動的聲援。這種敘述，顯然是將八九民運提升至全國的層面去理解，指出它對中港的影響。

第19周年的特刊，無疑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時序分為兩部份。一部份是從小人物的角度出發，模擬北京市民在那四十多天的心聲。另一部份則是大歷史。首先，時序的開首是1978年，終結是1997年——時間維度比1989年春夏之交長得多。其次，在內容上，則主要是描述中國由改革開放到八九後的經濟發展、中港資本如何隨著改革開放而南下北上、香港於過渡期的民主化進程、中

港流行文化的互動。而重要的是，在之後的六四特刊，絕大部份情況都會沿用這個思路去做時序：有時會刪去小歷史的環節，有時會偏重於某個面向[2]，有時則加長時間維度至回歸後，但基本上都不再採納第15-18周年的敍述方式。

六四事件重新定位

這種敍述方式的轉變，當然跟學生報對事件的分析不無關係。分析框架的轉變，在第22周年的特刊尤其明顯。在這一年的特刊，終於有文章從宏觀的角度分析八九民運的成因，將八九民運跟中共改革開放的政策緊扣一起來理解。這些文章都嘗試分析，群眾在八九年的不滿是有其經濟根源，而這根源就是中共由規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所引起的民生問題，諸如官員以權換錢及通貨膨脹[3]。在繼後兩年的特刊，都不乏這類宏觀分析的文章[4]。

在第23及24周年的特刊，編輯更探討了以往沒有處理的面向。譬如說，有文章試圖質疑六四事件是一場學運的說法，重新發掘工人階級在整場運動的角色[5]。當中作者更梳理出工人階級與知識份子的矛盾：前者要求保衛公有財產制，後者則期望徹底推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此外亦有文章引入國際關係的面向，點出中國的抗爭者借鑒東歐民主化的經驗及抗爭模式，並引證東歐民主化後的經濟改革與中國改革開放有其相似之處[6]。

其實，近幾年特刊會如此關注八九後中國的經濟狀況，是因為當下不少內地的民生問題，很大程度是六四鎮壓後中共繼續「走資」的結果。種種中國的民生問題，諸如血汗工場[7]、戶籍制度[8]、全國高鐵引起的債務危機[9]、醫療制度[10]、農民工的生活狀況[11]、學生工所受的壓迫[12]、房地產泡沫[13]等等，都不過是改革開放遺禍的延續。

本土的六四

除了將八九民運置放在中共走資的脈絡外，近年的另一個重心則是嘗試將八九民運的焦點轉移去香港。例如有文章就指出當我們談論六四時，我們不應將之視為一段只屬於北京的歷史，否則會令香港人遺忘一段屬於自己的六四經驗[14]。這些記憶包括：參與八九年的大遊行、觀看民主歌聲獻中華，以及通宵看解放軍清場的新聞片段[15]。然則，八九民運的實際範圍遠遠不限於天安門，香港人亦絕不只是這場運動的旁觀者。八九六四，其實是一場香港人有份參與的民主運動。

另一方面，因著司徒華於2011年過身，他的回憶錄《大江東去》亦隨之出版，而第22周年的特刊亦藉著這個機會，重提當年以他為首的支聯會的聲援行動。文章批評，他於六四事件發生後撤銷三罷（罷工、罷市、罷課）的決定，其實極有商榷的餘地，因為它絕對是削減了當時不少香港人的政治能量。作者提出司徒華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思維來抗爭之局限，希望讀者反思日後民主運動應該走的路線[16]。

有鑑於近年陳雲牽起的「自治派」——一種主張中港區隔，仇視內地人的論述—— 日益壯大，第24周年六四特刊亦花了一定的篇幅去回應這個現象。其中一篇文章主要是梳理香港人對內地人的偏見，以及回應自治派指責內地人來港搶資源的說法[17]。另一篇則是分析自治派主張不要支援中國民主的迷思，指出這種排拒中國的說法，很多時都是基於恐懼。而這種「河水不犯井水」的想法，對內地民主運動不作理會，正是當權者最樂意見到的[18]。筆者相信，在中港矛盾日漸升溫下，日後的六四特刊似乎也不可能迴避自治派的論述及中港關係的變化。

兩種民主想像

以上筆者基本上勾勒了近十年六四特刊分析框架的轉變，但與此同時有些議題卻持續在特刊出現，例如內地維權人士的狀況、新聞和網絡自由、中學的六四教育等等。最為顯眼的，則莫過於對支聯會舉辦六四晚會的反思：維園的燭光晚會應該是純粹悼念性質，還是應該變成政治運動？集會形式是否過於單一？除了晚會之外，我們又可以做些甚麼去解決八九以後的政治經濟問題[19]？

這些對六四晚會的反思，明顯是跟報社一直以來的民主想像有關：民主並不是如香港主流的民主觀所想，單單需要一個民選議會，以選票選出一班代議士，讓他們來替我們決定大部份生活上的事情。恰好相反，民主不應約化為投票和代議民主，而是應該植根於日常生活之中，由我們決定自己的命運[20]。這種民主想像正有別於支聯會對八九民運的理解—— 將八九民運聚焦於鎮壓一幕，抹去當年工人、農民、學生的政治和經濟訴求，一味強調要建設代議民主的聲音。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不少期特刊都借八九民運，談論我們在當下能夠如何實踐民主。事實上，實踐民主的議題因該年的局勢而定，而歷屆特刊所做的議題可謂包羅萬象：校園規劃[21]、反迫遷運動[22]、居民運動[23]、烏崁村的自治經驗[24]、基層民主[25]……總括來說，編輯都希望藉著這些議題，來提出重奪我們生活的「話事權」之重要性。

六四與藝術

除了上述硬橋硬馬的政經分析，這十年的特刊亦經常會處理與六四相關的藝術議題。你可能會覺得六四和藝術，是風馬牛不相及。然而，實際上卻並非如此：在1989年5月30日，正當民運進入低潮之際，學生將民主女神像豎立於天安門廣場，正正是希望以這個雕塑來表達對民主的期盼，以之提升士氣[26]。另外，在六四事件發生過後直到今天，我們亦可從不少香港與中國的流行文化及藝術創作看到六四的意象，而不少期六四特刊就嘗試分析作品的意義[27]。

當然，六四與藝術的關係，並不只流於六四事件對流行文化和藝術創作的影響，其中還牽涉藝術家如何面對當下中國缺乏公民自由的處境。就例如在2011

年的春天，當艾未未被軟禁，一班藝術工作者就組織了「藝術公民」這個平台，來捍衛創作和言論自由，並聲援艾未未。該屆的六四特刊亦有就此事訪問了組織者，談論他們利用藝術介入政治的想法。這事件在在反映，香港人仍會利用香港這片相對自由的空間來聲援內地人，以及中港兩地公民社會互動的狀況。

總結

以上筆者嘗試勾勒出近十年報社對六四事件分析的演變，以及特刊中恆常關心的主題。總的來說，報社對八九民運的理解與主流對事件的想法有著極大的差距，包括著眼於八九民運的歷史脈絡、將八九民運扣連當下中國和香港的政經狀況、引入八九民運對香港的意義，以及擴闊民主的想像。無可否認，特刊比支聯會對八九民運的詮釋都更為複雜而且深入，這絕對值得稱許。事實上，報社近年到維園派發特刊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試圖扭轉晚會參與者對事件的既有想法，令他們知道回應六四的方式，不單只是到維園哀悼一晚這麼簡單，而且還包括實踐當時中國和香港普羅大眾的未竟之志。

1 事實上，自21周年開始，報社開始把特刊命名為「八九民運特刊」，而不再用「六四XX周年特刊」。原因是編輯認為對八九民運的重視不只於六四當天，這一點會在文中詳述。而為方便起見，本文將近十年的特刊均稱為「六四特刊」。

2 譬如說，22周年特刊的時序則主要是用香港本位的方式做時序表，敍述八九民運對香港的影響，以及香港的民主化進程。

3 蕭，〈支聯會的九八，或者，我們的八九〉，22周年特刊，頁10-11；〈成果背後的犧牲──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22周年特刊，頁20-21。

4 小，〈逃呵，又逃回這中國、模式〉，23周年特刊，頁12-13；黃漢彤，〈自由民主的厭敵：獨裁政府和新自由主義〉，24周年特刊，頁14-18。

5 石七刀，〈廣場染過的紅色　工人的振臂與失落〉，23周年特刊，頁39-41。

6 Henry，〈談六四，不能不提「蘇東波」〉，24周年特刊，頁12。

7 張婆婆，〈「玖龍血汗門」與中國社會對資本的批判〉，19周年特刊，頁26-27。

8 鄺頌婷，〈戶口決定命運──中國戶籍制度〉，21周年特刊，頁11-13；六十蚊，〈不是靠個人努力就可以了──淺談戶籍制度〉，22周年特刊，頁24-25。

9 寶，〈建高鐵與保八之間不能說的秘密〉，21周年特刊，頁14-15。

10 紀，〈大國崛起，連中產都病唔起〉，21周年特刊，頁26-27。

11 嬲支槍，〈農民・工人・農民工〉，22周年特刊，頁22-23。

12 W.A.L.K.，〈青春，暑無天日──當學生變成工人〉，23周年特刊，頁9-11。

13 李昆澤，〈躁動的國度──十八大後的政經危機〉，24周年特刊，頁40-41。

14 陳劍青，〈哪裡有六四　哪裡就有抵抗〉，20周年特刊，頁29。

15 陳浩倫，〈忘掉（偽）客觀，做返個人〉，20周年特刊，頁27。

16 羅，〈沖浪──司徒華的回憶錄以外〉，22周年特刊，頁12-13。

17 倪德健，〈中港矛盾，矛盾甚麼〉，22周年特刊，頁30-31。

18 覃俊基，〈排拒中國的情緒政治〉，24周年特刊，頁32。

19 Sin，〈填白的必要──如果六四燭光悼念晚會只為悼念〉，22周年特刊，頁6-7；嬲支槍，〈夢想真的可成真嗎？──支聯會六四晚會以外〉，22周年特刊，頁8-9。

20 筆芯，〈還六四一個清白　給民主一個真義〉，18周年特刊，頁15-16；致中和，〈民主的匱乏〉，24周年特刊，頁20-21。

21 校園民主規劃小組，〈要求校園發展督導委員會加入學生代表建議書〉，19周年特刊，頁36-37。

22 梁文道，〈深水埗重建區，最後的街坊〉，20周年特刊，頁13。

23 翡翠，〈你相不相信人民的力量？〉，22周年特刊，頁38-39。

24 熙，〈改變從草根做起——內地基層民主的實踐和想像〉，23周年特刊，頁44-46。

25 古，〈基層與民主運動的路向，在516之後〉，21周年特刊，頁54-55。

26 見本書卷二「民主女神像事件」：何慶基，〈要擺民主女神，但不是這個〉。

27 光，〈中國搖滾，還在路上〉，19周年特刊，頁48；「文化——香港／音樂／電影／六四」，16周年特刊，頁27-35；「六四詩與歌」，20周年特刊，頁20-23；熙，〈隱喻作為針線—— 直面六四創傷的《動詞變位》〉，23周年特刊，頁32-33。

教學·師生



前言

◆ 何敬熹

社會的要求變，大學學制也跟著變，近十年有幾個改變特別明顯，值得一記。

現今社會變遷迅速，需要僱員有更好的適應力，所以教學除了傳授學科的專業知識外，更強調培養學生跨界／跨學科的能力。於是高中推行通識科，大專亦開辦愈來愈多的通識課程。不難發現，大學改為四年制後的種種變更，深受這個大改變影響：所以多出一年，課程所新增的學分，主要是加在語言和通識課程上，而不是用來強化主修課程；大學紛紛改為大類招生，亦更多地要求同學除了自己就讀的學系的知識外，也要涉獵所屬學院其他學系的知識（Faculty Package）；除了學院內的跨學系學習外，大學亦推動學生跨學院的學習，開設大量新的跨學院課程，港大的醫科法律雙學位便是令人注目的一例。

開辦愈來愈多課程，長遠來說可以令學生讀到更貼合他們興趣的學科，某程度上是件好事，關鍵問題是，百花齊放的大專課程，質素會否有所下降？除了副學士課程的質素近年常為人詬病，各大學過去十年亦被不少教授批評是「重研究輕教學」。當「教學」的成效遠遠不如「研究」那麼容易量化，究竟公眾如何能確保學額大增後大專課程的質素？除了國際排名、畢業生薪酬和語文能力外，我們是否有其他更好的指標？

以上勾勒的是我們所觀察到近十年大專界所面對的大環境，而中大作為大專學界中較為資深的一員，有很多資源去讓我們思考大專學界應該怎樣面對這些挑戰。例如中大早年曾是四年制、很早已經強調通識教育等。另一方面，中大在面對這些變動時，應對的方法跟其他大專院校也不盡相同，例如中大雖然有推行大類招生，但推行力度遠遠不及港大、科大等院校；又例如中大雖然也逃不了被批評「重研究輕教學」，但在教資會的報告中，中大的教學在各大專中還是相對備受肯定。

可惜的是，當我們在準備「教學．師生」這個部份時，發現近十年學生組織在這方面的紀錄和討論甚少。所以，我們決定從最基本的東西出發，由零開始組織近十年中大教學的情況。我們分成「改

變」、「老師」、「學習經驗」三個部份去探討中大教學的情況。

第一部份「改變」探討學制上的大變更，例如四年制、大類招生、通識教育、教學質素等，主要以訪問跟邀稿的方式進行。近十年來，因著教資會撥款方法的變更，不少人批評大專院校「重研究輕教學」，我們亦訪問了教務長吳樹培，問他對這些批評的看法。第二部份是「老師」，收錄了五位老師的訪問／自白，一方面希望勾勒近十年的教學環境，另一方面亦希望呈現這些老師理解教學到底所為何事？又選擇採取怎樣的教學策略？這些老師關注的東西各有不同，有的關注教學語言、有的關注同學是否可以成為更好的公民；他們眼中的同學形象亦截然不同，甚至互相駁斥。第三部份是「學習經驗」，收錄同學對眾多學習體驗（讀書、上莊、實習、上週會、課外活動）的感言。現在的學生有了這麼多的「學習機會」，他們又學到了甚麼？他們眼中的這些活動，跟學校和老師眼中的又有多大的不同？特別推薦由日本來中大就讀的小林輝的訪問，校方常宣稱不斷增收非本地同學，是希望令本地同學可以跟不同文化的人增加交流，但在小林輝眼中，校方的種種措施，不但沒有鼓勵交流，反而是將雙方分隔開。這個訪問正正提醒我們，除了關注結構上的改變（例如學制、教學方法）外，也要關注看似離散、主觀的同學學習體驗，才能全面地了解到教學的實況。

四年制：中大的理想和身份

馬嶽

2012年，中大回到四年制。

在九十年代前，四年制是中大身份認同的一個重要部份。香港有大約四份一世紀時間，是只有兩所大學的。中文大學之有別於港大，一大部份和它的創校理想有關：包括中大是中國人的大學、可用中文教學的大學、給予華人子弟接受大學教育機會的大學、以至中大推行通識教育等。這些自行選取的特色和身份認同，很多體現在學制上，和四年制密不可分。

中文教學的門徑

在未有聯招制度之前，中文大學是有自己的考試取錄學生的，即為高等程度會考（Higher Level Examination），難度一般介乎中學會考與高級程度會考（Advanced Level Examination）之間，而一般中文中學都採六年制，即五年會考後加一年預科，唸的是準備高等程度會考的課程（而這些學生完全不會考慮報考高級程度會考），入中大變成本地中中學生唯一升讀大學的機會。

當年中文中學最頂尖的有金文泰和培正，八十年代時一年總有七、八十人進中大（當年中大每年只取錄千多人），校園內最大的會社包括培正同學會和金文泰同學會，會員人數可達三百之譜。那些年我們總說不能在校巴上說這兩間學校的壞話，因為前後左右總有一兩個舊生在左近。此外當然還有一眾愛國學校的精英。這些學校的特點，是學校基於辦學理想或民族立場選擇用中文教學、大多家長基於理念或民族感情才選擇中中，不像今天的「無可奈何」下被貶為二等中學。而我們都知道這些中中畢業生，除了英文水平可能平均稍遜外，一般學術能力絕不吃虧，國學基礎通常優勝。中文大學提供的這個「六年中學、四年大學」的學制通道，遂成保存華文教育這點血脈的特有安排，是體現「中國人大學」和「中文教學」這些創校理想的重要門徑。

中大理想之體現

中文大學有很多理想主義和意識形態的傳統，而很多這些傳統，都和四年制有關。我1983年進中大，醫學院事件仍在很多師兄師姐的記憶中。醫學院事件的重要爭論點之一為「中七不等於大

一」，不少反對校方政策的學生覺得校方為了爭學生和提升學校地位，而讓高級程度會考進醫學院的學生可以少唸一年大學，是違背中大理想的，因為中七那年的預科教育，沒有可能取代大學一年的通識教育或各層面的人格培養。從今天的人看來，這種想法當然是理想主義得不可救藥。

四年制和通識教育相輔相成，某程度上是因為當年中大人總會把港大的三年制看成是英式制度，重點是專業科系的訓練，有著殖民地色彩，但中大的學分制（當年港大不用學分制）下容許學生彈性選修，四年制既是世界大學制度的主流，亦容許更多選修的空間，加上中大特有提供的通識課程，於是四年制和通識教育理想一體兩面，是中大學制的必然成份。

筆者成長於八十年代，當年中大學生組織競選政綱，差不多指定的政綱架構是「校園」、「香港」、「中國」三部份，而校園部份免不了討論大學學制，而堅守四年制和通識教育，以及「四不改三」、「五必改六」，變成了不加思索的指定動作，總覺得大學四年制才是「王道」，要談香港社會的教育改革就應該把整個香港改成六年中學、四年大學的學制，雖然我記憶中似乎當年沒有哪個學生組織真的為此做過甚麼行動。

學術自主之標誌

當年中大既然可以有自己的學制、自己的考試、自行決定收生，中大維持四年制便成為大學的學術自主與收生自主的象徵。1977–1978 年和 1988 年兩次抗拒政府要求中大改為三年制的運動，標誌了反抗殖民地政治暴力、捍衛學術自主和大學自主的歷史。當年的中大人總覺得港英政府覺得港大才是「嫡系」，英式制度才是正宗，於是希望把學制統一為「五二三」學制，但這必然與中大的重要身份衝突。中大的保衛四年制，因而一定是帶著反殖的色彩的。

1988 年教統會三號報告書提出統一學制為五二三學制。當年的反對運動其實應該比十年前的更龐大，並且團結了大專學界（因為本來當年港大正在提出考慮改為四年制），曾有數千人遊行上政府總部，而在輿論上差不多完全擊倒了政府提出的各項論據，但偏偏功敗垂成。政府執意要統一中學七年大學三年的制度，中大不敵財政壓力，最後自行將畢業學分要求降低，令學生可以在三年內畢業。後來有江湖傳聞說中大屈服，以換取政府支持撥款開設工學院。是真是假，無從稽考。

「二奶大學」的魔咒

多年來中大一直在「發展」的需要和維持創校理想之間掙扎，而歷來在重大事件上，通常堅持創校理想的是師生校友，看重發展的是校方。中大多年來一個重要的情意結是「相對於港大，中大是否次一等的大學」？八十年代中大學生報曾經做過專題「中大是『二奶大學』嗎？」當年名校生考得中大入學資格而過門不入，誓死要入港大者不在少數。

從校方的角度看，一些專業科系如醫學院和工學院，是本校畢業生晉身專業階層的保証，是吸引成績好的學生入中大的重要鑰匙，當然也是提升中大地位和競爭力的重要途徑，於是中大三十多年來的發展方略，便包括要在這些專業科系上逐一向港大看齊：醫學院、工學院、法律學院陸續成立，目的不離要「超越」港大。到了今天，競爭是主旋律，通識教育、中文教學、中國人的大學等創校理想，逐漸靠邊站。

三十年來的滄海桑田

到了今天中大回復四年制，物換星移滄海桑田，四年制對中大的意義已大不相同。三十年前，大學市場化還未真正開始，於是校內的學制和課程設計都可能比較單純的出於學術和教學的考量。三十年後，「錢跟學生走」是大學撥款的主導方程式，「三改四」下新增學分如何分配，便變成大規模的資源分配遊戲了。以前中大真的比較獨立自主，但今天教資會操控各大學遊戲規制和資源調配，結果是資源考慮和教資會的框架主導了很多課程設計和學制安排，效果和以前的四年制大異其趣。

中大四改三時，各主修學科為了確保主修質素，將主修的要求濃縮至三年讀完，沒有按比例的減少學分要求。三改四後，資源遊戲的邏輯令主修要求減少不多，但新加了各類指定的通識、語文、指定選修課程，學生選修的空間比以前少了。舊四年制下，學生是比現在空閒很多的，因為每個學科的考核比較少，今天在評估主導的文化下，每個課程的功課都會比以前多了不少。選修空間多，課程比較悠閒，我覺得其實是當年落實通識教育的重點之一，因為同學有比較多的空間去選修「唔關事」的科目、投身課外活動以及胡思亂想。以前總有人到了四年級有學分剩時，去拿一兩分藝術系的素描或者書法，或者體育系的兩學分足球或網球，今天的文化下，相信不復如此閒情了。

逝去的理想和身份

政府將全港學制改革為「六四」，而且在中學階段引入「通識教育」課程，似乎是中大多年堅持的理想取得了上風，但卻沒有人覺得這是中大的勝利，也沒有人再把四年制連結到中大理想、通識教育和中大身份。這本來難怪：全香港的大學都是四年制，四年制再不是中大身份的象徵。通識教育變了潮語和商機，也不是中大獨家宣揚。中文中學在九十年代學制統一後，影響力和吸引力已經快速下降，並且吊詭的在回歸後因政府推行「母語教學」而被標籤為二等學校。中大四年制和中文教學不再有任何關係。更重要的是：在種種回歸四年制的討論、籌備和相應改動中，中大的理想和身份，似乎沒有任何重要的角色。

就以所謂較高資格（Advanced standing）的學分減免來說吧。在四年制下，所有拿著高於中學文憑試資格入讀中大者（包括各種 AL 資格、擁有副學士者，或其他七年中學的資格如 IB 等），一律被視為較高資格（Advanced standing），

可獲學分減免而不用修123學分才畢業（通常是99分）。這以今天的標準（即不是醫學院事件時的中大學生的標準），也可算是合理罷。但這還不夠，大學有下達文件說由於某大學（有接觸校方文件的經驗的人都知道，中大校方心目中從來只得一所「其他大學」）給予更多的學分減免，於是鼓勵各學系減免更多學分，以資競爭。例如如果某同學中學念過某學科，可以考慮豁免某些主修的學科。這真的是「中七等於大一」的超級加強版，當年醫學院事件的前輩知道這事，不知會作何感想。從個人感受層面，為搶學生而置學術水平於不顧，令人扼腕；而如果說中學讀過某科GPA便可以免掉我的「政治學初基」，則已是對我個人學術水平的侮辱了。

三十年河東河西，四改三後三改四，彷彿一場春夢。香港教育、大學教育、中文大學經歷多少變化，四年制被還原為一個年期。中大理想的消亡，有多少是全球大趨勢使然、有多少是香港教育發展之惡果、有多少是校方的責任、有多少是我們堅持不夠，筆者也訥訥說不上來，大概值得五十年來各世代關注中大發展的仝人共同思考。

大類招生實施的影響與困難
——訪問陳竟明教授

◆ 整理：陳秉鳳

三三四改制前，除個別科系（如 BBA 及 Life Science）外，中大絕大部份科系的收生都是以學系為本的。2010 年，常務副校長華雲生連同由校方委任的學院院長們強推大類招生，要求除醫學院、法律學院、教育學院外的學院改為大類招生。除文學院因藝術系及音樂系等科系大力反對沒有推行，社會科學學院、理學院及工程學院均在收生制度內加入統一收生元素[1]。

收生辦法的轉變，曾於 2010 年引起一番討論，反對大類招生的意見指這種制度會陰乾較小規模的學系、減低學生與學系之間的關聯，降低教學質素、使學生於一年級時要面對另一輪爭取入讀心儀學系的競爭等。本書另一文章[2]則認為，大類招生的推行是為了配合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的「優配學額」政策，方便學院統一學系及資源管理，亦能由此推高收生分數，增加中大的競爭力。換言之即把資源搶奪的考慮置於教學質素之上。

大類招生推行兩年，實質對各學系的影響是怎樣？當初的憂慮又是否屬實？本書編輯訪問了負責設計生命科學學院課程的陳竟明教授，分享他的觀察。

收生人數不穩　數年後或有殺系危機

陳教授說，參考了港大理學院大類招生的經驗，該學院將所有科目納入大類招生，熱門科目收生人數爆棚，其他科目收生人數大幅減少。故此，中大理學院在一開始，就沒有把最多人競爭的科目，如風險管理，或收生要求較特殊的科目，如中醫及數學精研，納入大類招生之內。生命科學學院在 2009 年已開始統一六個科系招生，而在 2012 年即與另外五個學系共十一個學系組成「理學」收生[3]。陳教授說，收生人數不平均的情況已有出現，例如食品及營養學系（FNS）較受歡迎，以往只有四十個學額，大類招生後最多試過收到七十人。「他們以為畢業就做營養師，個個都以為可以去外國考個牌，做瘦身教練。」而有些科系，如細胞及分子生物學（CMB），課程定位是收學院裡精英學生，讀完就可往外國有名大學如麻省理工、劍橋等做研究，「但又有多少同學有這個目標？大多數都只是想拿個 general degree」，試過一年只得九個學生。為了適應頭幾年大類

招生的收生不穩情況，大學答應頭幾年不改撥款，但若幾年後，有個別學系只剩幾個學生，可能會產生殺系危機。

學系應變面對困難

其實以儀器及人手計，食品及營養學最多只能容納四十人左右，現在多收了學生，課程也要有相應調整，例如帶畢業專題（FYP）的老師人手不足，只能將FYP改為非必修課程。陳教授常強調，香港的大專院校資源不像外國大學般豐富，以往一直是錢跟學生走，學系收生人數與學系有多少資源直接掛勾。學系都要想辦法自救，如之前提到的CMB收生人數下降，學系就標榜小班教學及高質素教學，之後一年人數回升至20人。

他說，長遠下去，如果食品及營養學收生人數一直高企，學院要考慮將這科從大類招生中剔除，設立上限，解決太多學生湧向同一科系的問題。我們問到，那麼是否其實應將收生人數少的從大類招生中拿走？希望入讀中大的學生那麼多，總會收到足夠的學生。陳教授回應，學院是不會這樣做，因為大類招生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推高收生分數，與其他院校競爭，他們能做的只是超收學生，例如生命科學院本應收最多200人，但他們會收多20-30人，透過這種方法去幫少人的學系。

收生亦直接影響學系的人手招聘問題，收生人數少，學系自然不敢多請終身教席（tenure-track academic teacher）。但即使收生人數少， 都要開辦相應科目「例如教生物不能只教植物，也要有動物，不能只教魚，都要教熊貓，還有Biodiversity（生物多樣性）、保育、分類等等」。學系可能變相只能多請合約講師（lecturer），這對教學質素和長遠學系發展都會有壞影響。

這幾年UGC推行的優配學額政策，其實也在影響學系招聘人手的鬆緊度。政策要求學院撥出5%學額在各大專院校中競爭，學院需要配合社會需要推出新課程，得UGC審批後，才能拿回那些競爭學額[4]。5%看似影響不大，但陳教授指：「平時運作，100元有70元花在人工上，扣起5%就入肉，剩下25元。真正被扣除的不是5%，而是30元裡的5元。」學系面對這個壓力，亦不敢輕易增聘人手。

至於學生如何能保持與學系間的關係，陳教授就說，他們都會鼓勵學生盡早選擇可能入讀科目（potential major），學系就會透過電郵和學生聯絡，讓學生知道學系有甚麼活動，加入系會等等，暫時也能維持各學系的氣氛，但相比以前是難做了。

難敵功利主義

陳教授說， 學生會一窩蜂去選一個科目，這也直接反映香港教育界的悲哀。「很功利主義，以為讀甚麼就做甚麼，然後就會飛黃騰達。」他認為同學不能以為哪科有前途，就去讀哪一科。好像早兩年有樹木倒下壓死一個學生，他說就令很多同學修讀植物生理學（Plant

Physiology），考樹藝師牌，樹藝師牌由200個升到3,000個，但這樣也不代表，將來你就可以進入那個行業，行業也會飽和。

他覺得不同學生，應該對未來有不同想像，「我們Environmental Science（環境科學）有些人想去考督察，有些去做物業管理，有些做NGO，有些想去環保署做，有不同想法。」

他雖認為大學教育不是職業訓練所，但還是需要配合大學要求與市場現實：在課程設計時，都要加入務實的部份，例如實習及就業講座，讓同學探索發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社會轉變快，潮流變動急速，也不像從前一樣有多種傳統行業，一做可以做五十年。他認為高中課程的改變，也是為了社會變遷作出適應，學生在中學時讀的科目不用太專，而是訓練各種基本能力，讓他們能掌握如何有效學習。

入到大學也是一樣，如果要點出大類招生的好處，他認為是能讓學生多涉獵不同科目，尤其是現在DSE同學在高中修讀的課程和以前AL同學很不同，選修科較少，也不一定修讀過生物、化學及物理，學院基礎課程就變得很重要，讓同學先對不同的基本知識有了解，再在第三四年專攻選修科目。不過，陳教授也指，他的觀察中，暫時覺得DSE的同學在選科時比較難去拿捏，不太知道自己想選擇甚麼。

制度的制肘

陳教授說到，與其他政策改變比較，大類招生對學系的影響不算最大，大學管治方式的轉變引起的資源分配問題更嚴重。他認為2007年學院院長改行委任制，是一個大問題。學院院長在改制前，是由各學系教師一人一票選舉產生，能反映各學系所需，公平處理資源分配問題。但現在院長由學校中央委任，而很多和學系有關的決定，都由院長會議（Dean's meeting）商討，決策變成由上而下，有時會與學系的意願相違背。陳教授指，大學高層裡不乏迷信大學排名的人，追求大學排名，變相是要著重研究，或從外國請明星教授坐陣。這些考慮，會凌駕於學系實質需要，影響各學系發展。

回到大類招生的問題上，他認為最大的問題，始終是收生不穩那一點。若學校可以有公平的制度，令每個部門百花齊放努力去做，應該不是壞事。可惜現況是管治方面，很多前線的教職員並不認同。陳教授總結他所感到的問題：「當大學想加強管治，反而管死了大學，令大學這幾年的排名、知名度及影響力不斷下降，我對未來是擔心的。」

總括而言，就大類招生在中大的實施，陳教授帶出了幾點需要留意的問題：第一，必須要留意是否有科目收取了過多新生，資源不敷應用；第二，會否因大類招生導致某些科系收生太少，面臨殺系危機；第三，大類招生導致的學生人數不穩，會否影響學系調配資源、聘請

人手以及影響教育與研究質素；第四，如何維繫各學系的內聚力及加深師生間的關係。大類招生在中大實施年期尚短，仍需靠往後各方繼續監察，上述的問題會否持續出現及惡化。

1 2012年「三三四」第一年收生，社會科學學院八個學科各撥出15%收生人數作大類收生；理學院除數學精研、風險管理科學、中醫及計量金融學及風險管理科學外均採取大類招生；工程學院全部科系採大類招生。

2 見本書卷三「社會・教育」，李敏剛〈不可忽視的有形之手：UGC如何改變中大〉。

3 生命科學學院包括生物化學、生物、細胞及分子生物學、環境科學、食品及營養科學、分子生物技術學六科；「理學」收生分類中還包括化學、地球系統科學、數學、物理及統計學五科。

4 新課程要回應社會所需人材，如理學院新推出的地球系統科學，就是這種課程。構想課程時要思考社會需要甚麼人材，地球系統科學其中一個要點就是研究全球暖化、溫室效應等問題。

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的使命和實踐

◆ 梁美儀

原刊於《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概覽》2007 年增訂版，後經作者修訂。

香港中文大學自創校以來，即致力培育學有專精，具有堅實的中華文化背景，同時視野廣闊，能融會中西，聯繫今古的領袖人才。因此，通識教育一直是本科課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華人地區，中大的通識教育扮演著先行者的角色，「中大模式」亦成為一個具參考價值的範例。然而，實際上並沒有一個一成不變的「中大模式」。在相對確定的教育目標和理想下，香港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體制，亦隨著香港社會的變遷、文化的轉變和大學本身的發展需要而不斷演變。

書院、文化理想與通識教育（1963–1976）

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是由崇基、新亞和聯合三間成員書院以聯邦制形式結合而成。其中崇基學院以發揚基督精神，引進西方文化，促進中國現代化為己任；新亞書院懷抱振興中國傳統文化、為中華民族尋求新出路的壯志；聯合書院則以推動中西文化交流，適應世界潮流變遷為宗旨。這些書院規模有限，師生人數不多，然而關係密切，學府上下容易產生認同感。因此，此時各書院雖無「通識教育」之名，但其教育抱負卻對學生人格有一定的感染，激勵他們作道義追求。當時新亞書院以「中國通史」為全校學生的共同課程，崇基學院則設「人生哲學」等必修科，成為日後通識課程的濫觴。

至 1963 年中文大學成立，各書院就其原有的教育理念與課程安排，自行規劃通識教育。書院聯邦制固然可保留各成員的傳統特色，亦有利於師生感情培養。然而就學系的發展而言，因資源分散於不同書院中，規模有限，較難提供全面而均衡的課程，為進一步發展大學的教學與研究，大學改制不能避免。

單一制大學下的書院通識（1976–1986）

1976 年中文大學改聯邦制為單一制，各書院相重疊的學系合併，由大學中央管轄，發展學科為本的課程；通識教育以發展學生才智視野為目標，屬學生為本，仍歸書院負責。經歷改制之後，學生人數日增，學系對主修課程需求日切，由於分配教師工作的權力屬於學系，書院雖然仍負有設計和管理通識教育的任務，但人力的安排和統籌日益困難。

系統化的「七範圍」通識教育

（1986–1991）

1986 年開始，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踏入了新階段。經全面改革後，通識教育佔中大本科生課業的 15%，較改革前的 10–11% 顯著增加。在尊重書院傳統和維持學生為本教學的前提下，新課程仍然保留各書院的通識科目，但最多不超過六學分。其餘的通識科目改為全校統一課程，由各學系提供，並由通識教育主任統籌。統一課程共劃分為七個不同的知識範圍，包括「邏輯思考與定量技巧」、「中國文明」、「其他文明」、「電子計算學」、「藝術與人文」、「自然科學與醫學」、「社會科學與管理學」。其中「邏輯思考與定量技巧」與「中國文明」為必修範圍，學生須在範圍內選修各一門學科；其餘學分則從其他範圍選修。

改革後的通識教育，在書院和學系的權責方面有較合理的分工。統一課程的設計，亦比較系統和全面。然而不同的學院、學系對通識教育的認識和熱心程度有所不同，人力和心力的投入極不均等。整體而言，教師人手不足，新課程開展緩慢，是此時期通識教育發展的最大障礙。此外，部分書院和學系亦對不同學年的學生設立各種修課規定，對通識選課構成繁複的限制，使通識教育在運作上出現困難。

靈活學分制與「三範圍」通識課程

（1991–1997）

1989 年初，香港政府要求所有受資助大學改為三年制。中文大學為堅持本身的教育目標，拒絕硬性地將大學課程由四年改為三年，遂於 1991 年實施本科課程靈活學分制，使學生可各依其學習能力，只要修滿規定的學分，即可以四年、三年或甚至更短的年期畢業。通識課程因應大學學制結構的改變，將學生修讀的通識學分減至十五學分，仍佔最低學分要求的百分之十五，其中書院通識佔三至五學分不等。課程範圍亦簡化為三個，包括「中國文明」、「分科課程」和「跨科課程」，「中國文明」仍為必修範圍，其餘學分可在兩範圍內自由選修。選課的自由度增加，與靈活學分制更易配合。

課程重整與學院通識的設立

（1997–2002）

自 1995 年開始，大學實施「單線撥款預算」（one-line budget），對通識教育有深遠的影響。在新的撥款制度下，學系所獲的經費與所教授的學生人數直接掛鉤，成為各系提供通識課程的誘因，通識科目的數量大增。九十年代初通識科目不足一百科，到 1996 至 1997 年度科目名單上已共有 150 餘科，而在 2000 至 2001 年更超過 230 科。

通識課程選科限制減少，科目數量激增，從刺激學生擴闊視野的角度來看，固然是正面的發展。然而眾多的科目，在簡化了的課程範圍下，容易變得散漫無序；加上靈活學分制雖非三年制，但大部分同學都選擇在三年內畢業，本科課程變得十分緊迫，通識教育便往往被同學視為額外負擔，敷衍了事。

有見及此，大學通識課程自 1997 年開始，在保留「中國文明」為必修範圍之餘，取消了「分科課程」和「跨科課程」的劃分。所有科目根據其性質和難易程度，分編作選修範圍一、二或三，供不同年級學生選修。書院負責的通識課則由 1998 年起，恢復為最多六學分。

由於選修範圍一、二、三的劃分並未能很有效地指導學生選課，而修課的年限亦引起行政安排的不便，至 2000 年，通識教育委員會便推出「學院通識範圍」（Faculty General Education）試行。其方法是由各學院組織院內學系，檢討學生需要，從而定出學院學生應修讀的通識範圍，學生必須在此範圍內選修最少一科。新制度施行後，不同學院的學生反應不一，主要因為各學院對通識教育範圍劃定的標準各異，對學生選課自由構成的限制亦有所不同，引起爭議。因此，在試行兩年後，「學院通識教育範圍」改為建議性質，學生不一定要依從。

課程檢討與「四範圍」通識教育（2002–2012）

踏入廿一世紀，大學通識課程架構經歷幾次改革，理念變得模糊；而科目數量大增，參與學系眾多，教學素質保證的機制亦需要重新調整。2002 年，校長委任「通識教育課程檢討委員會」全面檢討大學通識教育，2003 年中委員會提交檢討報告，就釐清中大通識教育的目標與要求、整體課程規劃，以及有效管理與素質保證等三大範圍提出建議。報告清楚界定通識教育有拓展廣闊的知識視野、提升對人類共同關心問題的觸覺、建立判斷力與價值觀、理解不同學科間的關聯以及發掘學生終生學習潛力等五個目標；又確立了通識學科要著重知識內涵而非技巧，鼓勵學生自我表達，與學術水平和深度與其他大學學科相當等要求。在課程規劃方面，報告建議從人的智性關懷出發，定出四個知識範疇，分別為「中華文化傳承」、「自然、科技與環境」、「社會與文化」、「自我與人文」；並規定所有本科生（特許專業課程主修生除外），必須在每個範圍內選修最少一科。最後，為加強教學素質保證，報告書建議成立專責委員會，負責全面審視大學通識學科的設計與教學質素是否符合通識教育目標與學術要求，所有科目最少每三年檢討一次。報告書的建議為教務會接納，2004 年起全面施行。改革為通識科目課程提供了清晰的目標，建設合理的課程框架，同時確立了質素保證的機制，使通識教育的展開更為暢順，更在 2008 年教資會質素保證局的第一輪質素核證中獲得表揚。

新學制、新挑戰：經典閱讀與大學理想（2012– ）

以四個學習範圍為框架的通識教育課程，基本上能做到較系統地擴闊同學視野，但由於選修科目數量很多，同學未必能獲得共同的學習經驗，亦未有機會透過通識教育互相砥礪，共同思考人類面對的恆久而重要的問題。然而根據美國教育學者長期研究結果顯示，教育效果最好的通識教育課程，正正是包含了

某些全校學生必修，提供學生共同學習經驗，刺激他們在課堂內外討論重要議題的核心課程。因此，當教育局宣佈要求香港所有大學於 2012 年改為四年制，而中文大學決定新學制中通識教育將增加六個學分後，大學通識教育部即著手建設一門六個學分的基礎課程，供所有一至二年級同學修讀。

通識基礎課程包含跨文化、跨學科的兩個科目：「與人文對話」和「與自然對話」。課程內容以問題貫穿，透過選讀中外不同文化傳統和學科的經典，展現人類面對一些歷久彌新的人生與知識的大問題時，怎樣去思考和尋求解答。「與人文對話」問的是「甚麼是理想的人生？」「甚麼是理想的社會？」兩大問題；「與自然對話」的核心是「人對自然有怎樣的認識？」和「人對自然的理解有甚麼限制？」兩科選讀經典共二十餘篇，教學以小班研討方式為主，大班講課和網上學習為輔，學生須主動投入，課前閱讀，課堂中討論，課後寫作，透過與同儕和老師互動答問和深入反思，去認識和理解經典所包含的智慧，對現代人的啟示，和它們的限制。

基礎課程選讀的經典涵蓋了人文與科學，橫跨中、西、伊斯蘭等不同文化，上下二千年，課程內容編排緊密，課堂節奏異常緊迫，對老師的教學和同學的學習都是大挑戰。但如果拓寬視野是通識教育的首要考慮，而中文大學要貫徹溝通中西，跨越古今的辦學理念，則基礎課程可以說是中大辦學理念與通識教育理想的真正體現。兩科「對話」鼓勵大學生思考嚴肅問題，建立良好閱讀習慣，勇於發問和與他人溝通討論，打好學習基礎，對培育他們成為有深度、有識見的知識份子，無疑是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重「研究」、輕「教學」是迷思？
——專訪吳樹培

◆ 何敬熹

近年不少學者都批評教資會的撥款方法，令大專院校日漸重研究輕教學[1]。我們特此訪問了中大教務長吳樹培，了解在學校的角度，他們如何理解「重研究、輕教學」的批評。

論教學地位

問：不少教授批評大學在考慮升遷和續約重研究輕教學。這是否事實？

答：在中文大學，這是不可以成立的。沈校長在公開場合都說了很多次，教授是否升遷和續約，會考慮研究、教學和服務三方面[2]。（問：有沒有硬性的比例？）沒有，因為教授間的分工不同，但我們會要求教授在三方面都要有一定的水平。教學方面，他們要寫一份個人教學概覽，寫他們在課程上做了甚麼設計、又用了甚麼方法幫助學生學習，提高他們的興趣等。（問：老師是否知道教學好可以升遷？）我覺得訊息幾清晰，當然可能有個別教授不清楚。但在不同的場合我們都有重申這點，讓大家知道教書教得好會得到肯定。

問：但因教學和研究表現優異而升遷的比例分別佔多少？

答：兩樣都有。我相信兩者沒有一個很大的差別，但具體的數據我不清楚，因為我沒有參與在那些委員會的決策。（問：但不少教授說教學對升職遠遠沒有研究那麼重要。有沒有一些數據可以證明有多少老師真的因教學表現優異而獲得升遷？）不容易，因為升遷會考慮整體表現，很難量化究竟是因為研究表現優異，還是因為教學做得好。

問：剛才問的是部份老師教學表現優秀是否可以獲得獎勵。現在想問的是，如果部份老師教學表現不理想，大學是否有監察？

答：我們每兩三年會做一次課程檢討。如果部份學系的課程，同學課檢給予的評分過低，教務會的教與學事務委員會會在報告中反映，該學系就需要跟進。如果表現持續太不理想，學校有機會不再容許學系開某一些課堂。教授方面，學系會各自監察。如果教學表現持續表現不好，是有機會不再續約的。

論教資會撥款

問：教資會有甚麼方法去衡量教學質素？

答：2007年教資會成立了質素保證局（QAC），它會每四五年去不同大專院校做教學質素審計。2008年的審計，中大的表現差不多是全香港大專院校中最好。（問：審計具體做的是？）我們在他們來審計前兩三個月要提交一份很厚的報告，介紹中大做了甚麼措施去提升我們的教學質素。然後他們就會來參觀，跟二百多個教職員、學生、高層去傾，去檢查報告上所寫的措施是否真的在中大進行。他們回去就會在報告中指出各大專院校有甚麼優點或不足。這些在網上都可以看到[3]。

問：對於「重研究、輕教學」的批評，教資會在2010年的高等教學報告亦指「院校一般認為實際教學表現不會影響教學撥款金額，但研究撥款卻不然[4]。」你是否同意這觀察？

答：我不是很記得報告有這樣寫。不過我覺得這單純是一個觀感問題。可能因為研究每年都要寫很多計劃書去爭取經費，但教學可能三五年才會決定一次，所以感覺上，教學的撥款相對不用特別做甚麼去爭取。現在的教學撥款主要取決於收生人數，如果你平日的教學做得不好，收生的人數是會受影響的。教資會回撥學額機制情況類似，如果平日的教學質素不佳，撥款的數量是會受影響的。

後記

訪問完結了，筆者對「重研究、輕教學」是否事實卻益發困惑。在大學的層面，中大確實是做了不少東西去確保教學質素。但我們又如何去解釋部份前線老師們的對大學「重研究、輕教學」的觀感和批評？我想，這至少可分作兩部份去思考。

研究是教授十分重要的工作，他們面對激烈的研究競爭時，為了確保可以獲得足夠的資金去進行研究項目，犧牲教學時間去做研究、準備研究報告書等，實在不足為奇。這情況在需要比較多資金去進行研究的學院（例如醫學院、理學院和工程學院等），恐怕更為普遍。相反，教學一方面沒有直接競爭，二來表現亦較難評定，所以教授投放在研究的時間和心力比教學多，相信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但話說回頭，老師在研究和教學上分別應該投放多少時間才算合適亦是人言人殊。所以，要衡量一所大學是否「重研究、輕教學」，應該考慮的是學校是否有足夠的機制和措施去確保教學質素，和大學在教授的升遷續約方面有否帶頭輕視教學。

中大如何確保和提升教學質素，讀者可參閱本部份另一篇文章：〈中大的教學改進——訪中大「學能提升研究中心」主任潘偉賢教授〉。總的來說，中大做得不錯，但教授的升遷續約方面，教資會2010高等教學報告指：「很多教資

會資助院校向教學人員表示，他們預期的工作比重是：教學佔 40%；研究佔 40%；社會／其他服務佔 20%。但我們知道個別教學人員根本不相信教學工作在評核中佔 40%，而實際經驗似乎證實了這一點。」[5] 這跟我們的觀察十分接近。正如我們在訪問中一再指出，個別老師仍然覺得中大在評核時，重研究輕教學。我們衷心希望學校的「重視教學」真的可以落實到評核中，用一個又一個的真實例子，去說服中大的教授們，「重研究、輕教學」在中大真的只是迷思。

1 例如呂大樂，〈大學這一行〉，《明報》，2014年2月9日；關焯照，〈谷研究　輕教學　大學教育質量退步〉，《蘋果日報》，2013年7月4日；亦可參見梁文道，〈與周保松對談——大學的價值〉，《讀書好》2010年7月號。

2 本文的教授一詞不包括「研究教授」。中大教授的不同分工，詳見本部份另一篇文章：〈大學的「老師」〉。

3 質素保證局2008中大審計報告，連結見http://goo.gl/UGv5Sn。

4 教資會2010高等教學報告，第6.8段，連結見http://goo.gl/vBHQNX。

5 教資會2010高等教學報告，第6.16段，連結見http://goo.gl/oFgYeo。

中大的教學改進
——訪中大「學能提升研究中心」主任潘偉賢教授

◆ 訪問、整理：吳嘉倫

大學教育的普及化只是近數十年間的事情，全球大部份的大學在研究教學效能和進行改進方面，都只在起步階段。這在香港亦不例外，即使是教資會，亦承認香港的院校重視研究表現而輕忽教學的效能[1]。在教資會提出於體制層面推動院校重新加強教育工作的同時，原來中大已在校內推行不少提升教學效能的措施，包括嚴謹的課程檢討、教師發展和同儕評鑑等等。推行這些政策的大學在全球也不多見，雖然中大說不上是如哈佛、西安大略般的改革先鋒，也算是走在大學教學改進的前沿。

中大設立「學能提升研究中心」(下稱CLEAR)已超過十年，負責在校內提供教與學研究、教學支援、教師專業發展等服務。領導CLEAR的是統計系的潘偉賢教授，她1987年起在中大教學，前線經驗豐富，曾兩度獲頒理學院模範教學獎、兩度獲頒中大亞太工商研究所傑出教學獎、以及首屆「教資會傑出教學獎」。她亦於2004年起出任理學院副院長(教育)。潘教授可說對前線、學系學院、和學校層面的教學都有豐富認知。是次訪問就藉向潘教授了解CLEAR的工作，一窺整個中大課程設計和教學質素控制的措施。

師資課程和持續進修

提供新教師的培訓和現任教師的持續進修是CLEAR其中一個重要成立目的。中大的教師培訓課程分為三部份，首四小時為「任務和價值」，講解中大的教學任務和教學環境，並讓教師探討教學的意義。接下來的四小時為「教學技巧」，介紹基本的教學工具和技巧，並由資深教員分享經驗。最後的二至四個小時為「實用知識」，教員可從「教學分析」、「教學理念陳述」或「工作坊」三者選其一。

「教學分析」邀請校內有經驗的教師作為學員的個人導師(Mentor)，在觀課後與學員討論以改進教學技巧；「教學理念陳述」則由CLEAR的導師與學員討論，協助學員整理自己的教學方針和理念，並寫成文字聲明。「工作坊」方面，內容從教學理念、技巧到工具都有，而且更有不少教學年資較深的教師參加。執筆時CLEAR在網站上列出的工作坊有「同儕及小組評核」、「課堂中

的角色與建立信任」、「『維誠』的新功能」、「在課堂外以流動通訊工具學習的機會」等。

評估學習成效

課程設計要成功，有賴不同方法去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中大在整個大學、學系的層面，已經持續多年進行問卷調查，分別會在第一年、最後一年，畢業後一年，畢業後五年，問中大學生對自己不同範疇能力的自我評估和對中大教學的評價[2]。例如其中一項發現是，很多同學認為課業負荷過重，所以四年制他們亦有相應減輕這方面的要求。

在科目的層面，每個學期同學都要填寫課檢。而課檢的設計亦有參考國際學術期刊的最新發展，務求以更有效的方式檢測課程質素。這些不同的評估協助教師和大學不同的教學單位，讓他們更知道自己要如何改進。

目標為本的課程設計

在中大，各個課程的改善機制主要由學院和學系負責。每個學院和學系會有評估委員會，監察同學的成績和教學的質素；亦會有諮詢委員會和學生討論教與學上的問題。不論發現的問題，是小是大，所有課程定期都要做詳細的課程檢討。潘教授指在2005–2010年全部課程已經做了一次檢討，預備四年制。四年制之後，這些檢討都會繼續進行，CLEAR亦有出了很多指引，鼓勵其他老師就課程給予意見。她舉例，統計系課程檢討時，先是統計系的老師作自我評估，然後會有四個不同學系的教授去分享經驗、給予意見，最後整個小組需要交報告。這既是一個互相監察，亦是一個互相幫助的過程。

中大在教與學方面近十年其中一大轉變是實施了成果為本教學（Outcome-based Approach，下稱OBA）。潘教授憶述，教資會在2005–2006年左右成立了一個「成果為本工作小組」，在大專院校推動OBA，當時她還未成為CLEAR的主任，但作為理學院的副院長參與推行OBA的工作。當時大家都還未清楚甚麼是OBA，對OBA的理解有不少差異。校方於是決定讓各學院自己思考如何解讀OBA，決定有甚麼東西想做。在理學院，院方先讓各個學系思考自己想做的事，自行設定學系的學習目標，然後將它們放入OBA的大框架。至於CLEAR，潘教授形容他們在推行OBA的過程中的角色是UGC、大學和教師之間的橋樑。

潘教授指OBA最重要的是想清楚希望學生有甚麼學習成果，因此在科目、課程以至大學層面都會訂立學習目標。這些目標包含知識、能力、態度三方面。以她任教的統計系為例[3]，學系的學習目標在知識方面有「概率之基本概念及應用」、「管理及分析數據統計軟件之運用」、「對數據作出批判性之分析」等；技能方面有「有效匯報分析結果」、「制訂統計問題」等；價值觀則有「認識統計在日常生活之重要」和「避免錯誤運用統計」等。而在有了目標後，才可以按目標設計課程、學習活動，並訂立相

應的評估方法審視是否做到當初訂下的目標。

潘教授形容落實 OBA 是一個很大的改變。「我們會想，現在的學生有甚麼問題和需要呢？以前可能要老師做好多指導，教學生看哪一本參考書比較好，但現在上網已經搵到好多東西。所以現在要做的已經不單是單向的資訊傳輸，而是多用不同方法，希望如何讓學生去內化這些知識。」

教學支援和教學工具

中大教與學的另一個大改變，就是資訊科技教學的流行。

潘教授指，資訊科技教學可分成兩種，一方面可以是用一些多媒體技術提升課堂的效率和互動，另一方面是開設網上課堂，令同學可以在任何時間和地方上課。中大在利用資訊科技提升課堂互動方面下了不少工夫，但網上課程目前則不是中大的發展方向。雖然如此，開設網上課堂是全球的大趨勢，中大亦與知名網上學習平台 Coursera 成為了合作伙伴[4]，預計九月會開始第一個課程。但潘教授補充，這些課程的對象會是整個世界，而不是現有的學生。對本地生的教學而言，課堂面對面的學習還是有很大的重要性。

除了協助教師有效運用中大提供的工具，例如以 Powerpoint 演講、使用「維誠」檢查學生有否抄襲和使用其他電子學習平台等，CLEAR 亦鼓勵教師申請教資會提供的「教學發展基金」，用以發展新的教學方法和工具。近年不同學院都利用基金引入了不少新的教學工具，例如教育學院教授申請了七十萬建立一個視像教學資料庫、工程學院的教授則用三十萬建立了一個互動網頁作設計和製造的教學、在整個大學的層面，則花了一百五十萬元提升現有的電子學習平台。潘教授本身也申請了基金來進行不少教學改進的計劃[5]，例如研究理科科目如何設計 OBA 評估工具（2009–2012），以及利用遙感點擊器（clicker）進行理科的教學的試驗（2008–2009）等。

小結

以筆者看來，中大在教學改進方面的確花費了不少心思。縱然我們難以否認由於研究經費競爭激烈，中大也難免比較看重研究，但觀乎 CLEAR 在教學方面的諸多工作，說中大輕視教學，似乎也是過於輕率。

---

1 可見教資會2010年報告《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系》第六章，連結見http://goo.gl/IcVq1b。

2 個人自我能力指標包括：批判思考的能力、自學能力、解難能力、溝通能力及團體協助能力；學習環境指標包括：主動學習、為理解而教學、教學回饋輔助學習、評估、合作學習。

3 中大統計系課程介紹，連結見http://goo.gl/OHnrh2。

4 其他合作伙伴包括北京大學、耶魯大學、史丹福大學、杜克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東京大學、芝加哥大學等。

5 詳見學能提升研究中心網頁，連結見http://goo.gl/Vpwjz2。

大學的「老師」

◆ 吳嘉倫

說起大學的「老師」，大家一般便只會想起教授職系（即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和講座教授）。事實上，中文大學的教員系統卻並不簡單，單論全職教員已至少可分為四個職系，見表一：

教授職系	臨床教授職系	研究教授職系	講師職系	其他
教授 Professor （$91,290-116,480）	教授（臨床） Professor（Clinical） （$111,110-177,605）	研究教授 Research Professor （未有列明）	高級講師 Senior Lecturer （$48,695-68,645）	專業顧問 Professional Consultant （未有列明）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72,275-92,175）	副教授（臨床） Associate Professor（Clinical） （$76,690-111,110）	研究副教授 Research Associate Professor （$61,370-72,275）	講師 Lecturer （$31,200-56,810）	特任講師 Teaching Fellow （未有列明）
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56,330-72,275）	助理教授（臨床） Assistant Professor（Clinical） （$91,290-116,480）	研究助理教授 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 （$41,020-57,710）	助理講師 Assistant Lecturer （$25,685-34,315）	

表一：大學全職教員職系（2013 年 9 月薪金範圍）

較為人熟知的教授職系，兼負教學和研究的責任。從入職為助理教授起，一般需至少六年升任為副教授，同時獲得終身聘任（tenure）資格。大多職位都有「升職或離職」（up or out）的規定，如助理教授未能在六、七年內升職，大學便不會與他們續約。升職的主要考慮條件有三方面，包括教學、研究及對校內校外的服務。從副教授升任教授則需動輒以十年計，不少副教授甚至終身不能升任教授。教授之上尚有講座教授、榮譽教授等，人事編制上視同教授，在此不贅。

臨床教授職系和研究教授職系的職位與教授職系對應，薪酬較高，但一般不設終身聘任制。臨床教授職系一般較著重專業實踐經驗而非研究經驗。在中大，這職系主要見於醫學院，但亦有院校會聘用如法律、工程等學科的臨床教授。研究教授職系則多以研究為主要甚至全部工作內容，較少擔任教學工作，但亦被視為全職的大學教員，研究教授更可參與學務決策。

講師職系是全職教學人員，不需負責研究，地位在各教授職系之下。雖然講師職系人數只佔全部教學人員約三份之一（見表二），但由於他們只負責教學，因此全校約有一半科目是由講師職系任教。除了講師職系外，大學亦會聘任專業顧問和特任講師等職位為全職教學人員。

全職教員之外，大學還有兼任教授職系和訪問學人等兼任或臨時性質的教學人員。其中兼任教授職系人員多是行業專家，在正職以外兼任大學教師，在商學院和教育學院等較為多見。

職位	人數	百分比
教授	448	29.6%
副教授	226	14.9%
助理教授	304	20.1%
高級講師、講師及其他	536	35.4%

表二：各教學職位的人數和百分比，以 2012 年 6 月 30 日計算

不認不認還需認——導師正名（節錄）

◆ White Wood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11 年迎新特刊

「現時約 400 位導師負責全校約一半的教學工作，教學工作量比教授多一倍，卻一直被大學視為次等教學人員，在《大學條例》裡甚至不是教師。」社工系的導師 Jane 道。

「我們覺得校方並不尊重我們這班導師，歸根究柢也就是不重視教學。」負責語文課程的導師 Vivian 說。「因此我們這班導師聯合起來，成立了導師關注小組，爭取為導師正名，向校方表達我們對大學教育質素的關注。」

Vivian 與 Jane 都是導師正名運動的核心成員，積極參與與校方談判。在整個訪問過程中，我們都是一面吃午餐、一面進行訪問，氣氛相當和諧。但在這和諧的氣氛下，Vivian 與 Jane 卻道出了導師辛酸的一面。

中大導師近年數量大增，這與學校政策發展不無關係。我們不難發現，校方的心態越來越重視成本效益，希望能夠以最少的資源，換到最大的效益。Jane 表示：「我與教授同樣是博士，我也要教一些高年級甚至研究生課。」其實近年中大導師的學歷與以往相比高出許多，現在不少導師都有博士學位，所以許多導師的學歷並不比教授低。但是請一名教授的薪金能夠請兩位甚至更多導師，所以校方以低成本聘請導師負責主要的教學工作。

升遷、續約

大部分導師是合約員工，必須逐年或每兩年簽約。Vivian 表示有導師在學校任教十多年，校方仍不願意與他們簽長約。合約制讓校方在管理與財政安排上更有彈性，可是對教學人員而言卻毫無保障，對需作長線規劃的教育工作更無法保證質素。「這會打擊導師們的士氣，令教育質素下降，最終受害的是學生。」Jane 說。

投票

導師的主要職責為教學，無論課堂內外，接觸學生的時間都比較多。他們的意見對改善教學質素應該很重要，但原來導師在系務、院務或大學教務等會議，均無出席或投票權。許多教學上的重要決定，他們根本無法參與，只能「有口無言」。

高層如何看導師

「在與管理層會面時高層談判其間，我說我負責教 postgraduate 課程。」Jane 繼續說：「他們感到很驚訝，問為何導師能夠教 postgraduate 的學生。」

導師教本科生，也教研究生，而且負責課程管理等重要的行政工作，可是校方管理層卻毫不知情，那他們對大學的具體教學工作到底知道多少？難怪校方高層不重視導師的訴求，因為他們認為導師的工作不重要，不必花費更多的資源改善導師的待遇。然而，我們不禁要問：即使導師只負責教授基礎課程，就不必有合理待遇？大學基礎課程就不重要？

大學教育，在語言迷宮中摸索前行（節錄）

蔡寶瓊

原刊於《我很蠢，但我教書》，2007年。

編按：蔡寶瓊教授1988年開始在中大教育學院教書，見證了中大教學研究環境的不少變化。她在2007年曾出版《我很蠢，但我教書》一書，整理她對這麼多年教學經歷的反思和觀察，編輯委員會決定節錄其中一章。在這一章中，蔡寶瓊教授寫她如何由用英文教書轉變為「中文教學的死硬派」，將教材由熟悉的英文翻譯成中文，除了關乎如何跟學生溝通外，亦是將外國的思潮概念和學術理論本土化的嘗試。所以，中大過往堅守以中文為主要教學語言的傳統，會否在高度商業化和大學教育工業化的環境下淪喪，影響的不單是學生的語言能力，而是大學是否還可以堅持為學生作思想上的提升、價值的轉化。

我從牛津回港，第一份工作是在港大社會系（我畢業的「母系」）做導師，一年後，我到嶺南學院（當時還未升格為大學）社會科學系任教兩年，第三年申請到無薪假期，完成延宕日久的博士論文。到了這年的下半年，論文完成，我應邀到港大社會系和教育學院任短暫的代課講師。所以，在這三年裡，我前後在兩所高等院校任教。

先說在嶺南任教的兩年。今天嶺南大學厲行英語教學（教與中國或香港文化有關的科目也要申請「豁免」），但當年卻沒有這個規定。回想起來自己也赧顏的，是我竟然「獨樹一幟」地用英語教學。學生當然不習慣，而且這樣做也毫無教育意義。自己向學生的解釋（可說是藉口），是社會學源於西方（其實我懂的只是英語國家的社會學），用英語教會好一點。真正的原因，是我懶於翻譯我通過英語學習得來的社會學，亦即是說，我還未構思我所學過的社會學理論，和我所處的實際環境，或觀察到的社會狀況之間的關係，因為所謂翻譯就是一個理論與實際之間的對話。換言之，我還未開展這個重要的對話，因此我對社會學理論的掌握還是相當膚淺的。

1988年，我申請了兩份工作。一份是港大社會學系講師，而另一份就是中大教育學院講師。很自然地，我希望能到自己本科的學系執教，因此教育學院只是我的副選。結果港大社會學系另聘高明，我唯有帶著一點失望到中大任教。想不到任教中大至今十九年的經歷，除更實在地應驗了看塔羅牌的吉普賽女子的預

言外，更重要的是，使我深刻地體驗和了解到語言和知識之間的關係。

個人的「社會學本土化」經歷

中大教育學院的學生大部份是在職老師，小部份是準老師。由於這兒是教育學院而不是社會學系，學生對社會學理論本身的興趣不大，相反，他們著眼於較「應用」層面的知識，而我也因此要作出一些適應。這個適應的過程是不短的，大概用了好幾年的時間，我才由一種「居高臨下」的心態，去到與本身當老師的學生取得一種認同。最能說明這個改變的，是我還在嶺南任教時，我為一份報紙寫專欄，欄名曰「教育新語」。我記得當時我是從一個近乎馬克思主義階級批判的角度去寫教育的，而教師往往會成為這個宏觀理論架構下的被批判對象。其實那時我並沒有切切實實的去認識個別的老師——他們只是我從上而下所看到的、一群抽象地存在的人而已。到了中大教書，每天面對這個本來只是抽象概念的老師群體，教師變成了一個一個有血有肉的生命，於是，我對於教師，對於教育社會學的認識也不再是抽象而單向的了，而是實在地感受到他們每日在學校課堂這條「火線」上的疑惑和掙扎、努力和成就。過了大概五六年左右，我已有一種與教師「並肩作戰」的感覺。

對社會學的仝人來說，也許會覺得我遠離了精深博大的社會學論述，但我卻自覺已培育出一個「在地」(grounded)的視角。今天我認為理論本身並沒有任何作用，它的價值在於能否，或多大程度替我們解釋複雜多變的現實。偉大的理論可以用來嚇唬人，但真正的作用，應發揮於對現實的解釋，再進一步，就是作為個人和社會行動的指導了。

以上這個了解，是經多年慢慢形成的，對我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影響。不過，我想回到教學語言的問題上。我在講究「應用」的教育學院教學，當然再沒有藉口說社會學要用英文教、用英文學。用大家熟悉的廣東話教學，師生的距離又拉近了，但對我來說，新的挑戰就在於如何把以前我的英文著作，或英語講座上得來的理論翻譯成中文。我終於了解到，原來「翻譯」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機械的過程。所謂「翻譯」，是一種對話：理論與現實的對話，由外國社會經驗提煉出來的概念與理論框架，與本土社會的生活之間的一種對話；以至書本、課堂的學問，與現實處境的對話。大概八九年前的一個暑假，我花了一些時間，把各個任教課程的大綱，由原來的英文改寫成中文（今天學院同事大多仍慣性用英文大綱）。當然，囿於自己的學習背景和其他更宏觀的歷史社會因素——主要是華語和本土社會的教育社會學研究還未成熟，很多參考資料還是要用英文的。

這種對話的要求，也不單來自大學的教學工作。在大學教書，或多或少都會接受報紙、電台、機構或民間團體的邀請去作評定或演說。這些場合當然要用一般市民聽得懂的中文，以至社會上常用

的句語，而非艱澀難明的專門詞彙。

[……]

九十年代我開始用中文寫學術文章時，那種快樂是難以形容的。因為我不僅是做分析、寫報告而已，而是拿著一些外國的概念和歷史，與自己的生活體驗、個人歷史和身份進行對話。這就是上述創意的來源，其中的過程，當然也有很大的滿足感。我想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年輕的費考通從英國唸完文化人類學回來後，基於他在江南的成長經歷和觀察，寫成《鄉土中國》，他那時的心情大概也如此罷。

九十年代初，我很天真地想，香港很快就會成為一個在華語世界中，社會及人文學科的重鎮。隨著更多的留學年輕學者回港，再加上這裡一貫言論自由的氛圍，只要我們參考西方的經驗，做好立足本土的研究，那麼假以時日，我們就能建立一套豐富而精闢的中文學術語言，再進而發展獨特的、建基於本土的社會科學研究了。誰知好景不常，九十年代中期，銀行家梁錦松當上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主席後不久，大學中人就感受到很大改變，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大學引入商界企業的管理文化，大學教員年年要呈交業績，包括學術期刊文章以及獲批的研究經費數目。而其中學術期刊文章又以刊登在「國際學術期刊」（英文）的才算——中文的並非不算，而是「叫價甚低」。這樣一來，中文寫作的意欲大大減少，大家都只努力經營迎合英美期刊的文章了。

環顧左右，在香港的八大政府資助院校中，只有中文大學的「官方指定語言」是「中英雙語」，即包括中文。看來中大是中文教學的（最後）堡壘。不過，這情況也會隨著上述的業績計算制度，和在教資會的一聲令下、各大學爭相「國際化」（落實來說，即是多收英語國家的學生）的趨勢而迅速改變。

2005年中大管理層企圖通過行政手段迫使各學系改用英語授課，遭到學生和校友的強烈反對。有好一段日子，大學的「文化廣場」拉起一張用白色麻布綵上「哭中大」三個字、如報喪幡似的橫額，隨後論壇和文章相繼出現，都是重提中大的傳統使命、強調中文教學和出版的重要，以至《中大條例》有關教學語文部份的詮釋等。最後，校方唯有暫時讓步，成立了一個「雙語教育政策委員會」，進行諮詢。本書執筆時，諮詢期早已完結，但下一步如何，仍未有定案。

我在這場爭取保留中文教學的運動中，始終是站在維護中文教學的位置上的。作為一個從小接受英文教育的人來說，我有點「曾經滄海難為水」的感覺。我堅持中文教學，不純粹是為求「母語教學」的便利而已，而是因為我了解到學術立足本土的重要性。起碼在人文和社會科學的範疇裡，大學的研究和發展，必需要能滲透社會生活的各層面，才能提升社會文化素養的水平。反過來說，複雜多變的社會生活，亦會滋潤大學文

化精英層的思考，使之更為豐富、更有洞見。在這個雙向的交流中，大學一定要有容讓本地語文使用的較寬闊的空間。如果學者只管用外語教學和寫文章，只迎合外國學術界的思想框架，不與本土社群對話，那麼到頭來香港的學術，只會困於「光榮孤立」的境地，最後落地蒼白無力，漂流無根，附人驥尾而已。香港學術處於這樣的狀況，當然也不會對全球學術的發展有任何貢獻。

中文教學的死硬派

有了以上的想法，我在中大就甘於做中文教學的死硬派。幾年前，校方以「回扣」非本地生教學津貼為威脅，迫令我們在研究生課程中放棄廣東話。校方規定是這樣的：班上只要有一位聽不懂廣東話的學生，我們就要轉用英語。我其中一個班上有數位內地研究生，於是我就用普通話而不用英語。其實，跟很多本地同事一樣，我用英語教學會比較用普通話流暢得多，但是我卻堅持不用英語。我並非對英語存有甚麼偏見——事實上我參加海內外的會議很多時候都會用英語，但在英語作為一個「權力語言」power language 的情境下，如果教學語言是英文的話，很多同學都會被迫緘默，他們會因為覺得自己的英文「不夠好」而羞於啟齒，最終就只有教師和少數自覺英語流利的同學會說話。我很重視課堂上師生間的自由討論，所以在內地同學的課裡，我情願用普通話，反正我會向同學說：「本地同學一定能聽懂我的普通話，因為聽起來很像廣東話！」至於外省同學，他們多聽一兩課，就會習慣我的口音。況且他們都樂意教我一些外省詞彙，提升我的普通話水平！

此外，我覺得學習應該是一個理智與情感皆要投入的活動，因為真正的教育應該是一種轉化。在一個用外語的教學情景裡，學生很容易在精神上「曠課」，意思是他們的軀殼雖在課室，精神和情感卻飛到九霄雲外。相反，如果教學語言是他們熟悉的第一語言的話，教師就可以較容易接觸他們的心靈和情感。我對某些課程會尤為強調這點，例如性態教育（sexuality education）、性別學等，因為這些科目的課題，會牽涉到深入而隱蔽的意識和文化習慣，或觸及社會深刻的禁忌。例如，我上性態教育課堅持不用 menstruation 來代替「月經」，或 vaginal intercourse 來代替「陽具陰道交」。最初的幾課，學生會覺得很不習慣，甚至震驚，但在課程後的檢討中，不少學生都會表示這些課堂體驗，能讓他們面對和超越深植於社會文化以及自己意識中的禁區，而隨著這種超越而來的，就是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在他們不知不覺中，學生經歷了重要的轉化，那就是說，他們體驗到真正的教育。

我有一位朋友在嶺南大學教中國哲學和生死學。上面說過，嶺大近日厲行英語教學，所以我這位朋友要特別申請豁免，才能用中文教這兩科。我聽後異常感歎。從前香港還只有一所大學時，大學資格是一個清晰的身份標誌，能進大學的就成為接近統治階級的精英，今天有八所公費資助的大學（2007 年初增加

了私立的樹仁大學），大學資格遂變成價目表上排列的銀碼：不同大學和不同院系要各出奇謀，企圖在價目表上爭位置。正如有關基金投資的政府廣告謂：「價格可升可跌」，這場價目表上的「位置之戰」是不斷進行的，各大學當局不能稍有鬆懈。君不見每年港、中、科三大要比賽「拔尖」人數，各大學又要在各種各樣的國際排名榜上爭位置。在世界英語霸權的大環境下，再加上商界的煽動，大學生的英文水平很自然也成為「價格指標」之一。於是，大學就爭相厲行「英語教學」，並以此為「貴價」的標記。大學教育的主要目標就變為教英文，並不牽涉到思想上的提升、價值上的轉化。

[……]

今天，我環顧左右，竟還有大學同事在高度商業化的環境中不走大學教育工業化的道路，艱苦地堅持為學生作思想上的提升、價值的轉化，這些同事都給我極大的鼓舞。不過，隨著大學權力日益集中，傳統的「教授治校」制度崩潰，個別教授還有多大自主的空間？

走進生命的學問

◆ 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原刊於《明報》，2011 年 1 月 19 日

各位同學：

我們這門政治哲學課，去到這裡，已近尾聲。這三個月，我們一起研讀了當代最主要的政治理論，包括效益主義、自由平等主義、放任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社群主義。這是一段不易走的知性之旅。在課堂，在小組導修，在原典夜讀，在網上論壇，都留下大家努力思考熱烈討論的痕跡。我希望，這些痕跡，會為你們的大學生活添上濃濃一筆，並長留於記憶當中。每年去到此刻，我總是如釋重負，卻也依依不捨。在這最後一課，我想多說幾句。

一門學問，如果能讓你茶飯不思，教你輾轉反側，並改變你看世界看人生的方式，那它一定已走進你的生命。它不是你要應付的功課，不是無可無不可的一堆術語，而是成了你生命的真正關懷。政治哲學，能夠走進各位的生命嗎？我們課上討論過的自由平等人權公義，能夠激起你們的知性熱情，並繼續引領大家的思考嗎？抑或你會反問，在這樣的時代，我們如此認真探究道德和政治，真的有意義嗎？

一

讓我們回到第一課。世間之所以有政治，是因為我們希望好好活在一起。在一個資源適度匱乏而各人有不同利益的社會，要好好活在一起，就必須建立起公平合作的制度。這套制度，將界定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決定社會財富的合理分配，並公正地解決人與人的紛爭。也就是說，我們希望它不是建基於暴力恐怖欺詐，而是建基於我們能夠合理接受的理由。

這是政治哲學思考的起點。我們不要小看這個起點，因為它告訴我們，沒有制度是命定不變的，沒有壓迫是非如此不可的。所有制度皆人為之物，並以這樣那樣的方式限制我們的自由和決定我們的命運。因此，作為具有理性能力和正義感的個體，我們有最基本的權利，要求這些制度必須是公正的。自啟蒙運動以來，現代政治最深的信念，是權力源於自由平等的人民，所有權力的行使，必須得到人民的認同接受。政治哲學不是關心權力如何操作，而是關心權力如何才有正當性。換言之，我們不將社會當作自然狀態式的鬥獸場，人們無時無

刻活在貪婪恐懼當中，彼此奴役互相壓迫。不是不會如此，而是不應如此。現實政治當然有暴力醜陋的一面，但我們不願意接受這個實然就是應然，也不願永遠停留在這個狀態，而總是希望通過制度變革和社會轉型，克服和超越這種狀態。

因此，政治哲學的任務，是認真探究基於甚麼道德原則，實踐甚麼價值，公義社會才有可能。我們千萬不要輕省的說，所有制度都是人吃人的東西，本質上沒有任何分別。畢竟從奴役到自由，從專制到民主，從歧視到尊重，人類走了很長的路，無數人為此犧牲，而這中間是有極為根本的分別。

這個分別體現在哪裡？體現在制度如何對待人。這裡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實實在在有血有肉會受苦會恐懼會屈辱，擁有自己的人生計劃並渴望得到他人承認的個體。這些個體，脆弱但獨立，微小卻完整。判斷一個制度的好壞，最重要的基點，是看它能否給予這些個體平等的尊重和關懷，能否令這些個體感受到活得像個人。所有對制度的思考，都離不開人，離不開對個體生存處境和命運福祉的關懷。不是說民族國家宗教階級政黨這些「大我」不重要，而是這些「大我」的存在如果不是要解放人實現人，而是壓迫人異化人，我們就有理由改革甚至放棄這些制度。

這不是甚麼艱澀難懂的東西。只要我們用心，我們就會看見那些老弱無依的人，那些受到殘暴對待卻有冤無處訴的人，那些因為思想而失去自由的人，那些因為貧窮而失去機會和尊嚴的人。這些人就在我們身邊，不起眼地默默活著。只要我們看見，就能體會他們承受著多大的不幸苦楚。這些不幸苦楚，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不公造成的。如果我們渴求公義，就必須改革制度。

二

不少同學聽到這裡，或會馬上說，你說的都有道理，但一離開課室，這些全是烏托邦。第一，真實世界充斥爾虞我詐，現實政治儘是爭權奪利。在一個不公正的世界追求公正，猶如螳臂擋車，毫無作用。第二，當你身邊所有人都蔑視道德，並善於利用既有遊戲規則為自己謀得巨大好處時，你不僅不參與還要提出挑戰，這是傻瓜所為。我們為甚麼不做旁觀者，為甚麼不坐順風車，為甚麼不融入體制，卻要選擇另一條艱難得多的路？！

這兩個問題，不僅關乎個人的生命安頓，更關乎我們為之嚮往的政治理想能否有實現的可能。道理不難理解。我們的社會，離正義還很遠。我們每天睜開眼睛，見到的往往就是強權當道貪污横行權利不彰弱者受壓。有的時候，我們甚至必須蒙起眼睛捂起耳朵，內心才得片刻安寧。我們很清楚，這個世界沒有救世主，也不可能寄望既得利益者會主動放棄特權。要改變這種情況，必須靠人的努力，必須要有很多很多人站出來，一起去推動社會轉變。但從個人利益的觀點看，

「我」真有站出來的理由嗎？借用村上春樹的說法，我們真的有理由站在雞蛋的一邊，而不是站在象徵體制的高牆的一邊嗎？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大部份人都會選擇高牆。而我們今天的大學，基本上也成了高牆的一部份，並以為既有體制提供「人力資源」為務，而非以培養出具價值意識和反思意識的公民為本。大學離高牆愈近，愈失去她的靈魂。正因如此，我想你們真正的困惑是：「如果我真的看到他人的不幸，感受到世界的不義，那麼面對如山的高牆，我仍然有理由選擇做雞蛋嗎？我這樣做，注定徒勞和注定活得不好嗎？」

這是求己而非責人的切身之問。理想與現實之間，好像有著永遠無法踰越的鴻溝。個體身在其中，遂面對無盡拉扯。怎麼辦呢？我實在不能隨意的說，往高牆靠吧，這樣輕鬆自在得多。但我也不能輕省的道，做雞蛋吧，就算跌個粉身碎骨也是值得。畢竟，那是你的生命，而每個人都有自己生命的軌跡，任何選擇都會受到一己的個性能力出身家庭際遇等影響。因此，對於「我該如何活」這一實存問題，不可能有簡單劃一的道德方程式為我們提供答案。

三

儘管如此，在這最後一課，我還是希望和大家分享一點體會。這點體會，雖然平常，卻是多年來我從生活中領悟到的一點道理。

我的想法是，既然我們只能活一次，我們就應該認真對待自己認真對待價值，並盡可能要求自己依信念而活。我們不是在世界之外，而是在世界之中。我們改變，世界就會跟著改變。我們快樂，世界就少一分苦；我們做了對的事，世界就少一分惡；我們幫了一個人，世界就少一分不幸；我們站起來，那堵看似堅不可摧的高牆就少一分力量。

這個道理很簡單，卻是真的。我們常常感到無力，因為我們自覺太卑微，以為甚麼也改變不了。既然甚麼都改變不了，也就不必堅持甚麼；既然沒甚麼好堅持，是非對錯遂不必在意。這樣一直向下滑，盡頭往往就是妥協犬儒虛無。

但甚麼是改變呢？當然，我們不必要求自己隨時犧牲小我完成大我，那是不必要的嚴苛；我們也不應期望僅憑一人之力便可於旦夕之間搖動體制，那是過度的自負。但我們可以改變自己，改變我們的信念和行動。因為我們在世界之中，只要我們做對的事，過好的生活，世界就會不同。這包括活得真誠正直，尊重自己尊重他人，拒絕謊言拒絕墮落，關心身邊的人，珍惜美好的事物，參與公共事務。當愈來愈多人以這樣的方式生活，愈來愈多人見到這種生活的好，新的文化就會形成，公民社會就有生機，舊的不合理的制度就有崩塌的可能。退一萬步，即使這一切都沒發生，我們自己還是改變了——我們活出了自己想過同時值得過的人生。

我知道，說易做難，尤其在巨大的不公體制面前要求自己做個公正的人，需要極大的自信和勇氣，同時必須承受無數不可知的風險。但我們還記得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如何論愛嗎？「人一旦愛，遂極脆弱：世間沒有所謂愛戀之中卻同時思量應否去愛之事。就是如此。傷得最少的愛，不是最好的愛。當我們愛，就須承受傷害和失去之險。」羅爾斯是說，決心做個公正的人，就像投入愛情一樣，路途中總有可能會受傷。但我們不會因為愛的風險太大而放棄去愛。為甚麼？因為公正和愛，是我們生命中重要的價值。實現這些價值，生命才會美好。

也就是說，活得正當和活得幸福，不是兩回事。公正不是一種強加於己的外在戒條，而是我們理應欲求的寶貴德性。公正這種德性，關乎我們如何合理地對待彼此。活在一個極度不公的社會，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我們或許是體制的受害者，或許是體制的直接或間接得益者。受害者固然沒有幸福可言，但得益者如果只懂得利用體制為自己謀取好處，將他人當作工具，終日汲汲於權力名利，對他人沒有關愛沒有尊重沒有信任，這樣的人生如何談得上幸福？！

所以，我始終相信，建立公正的制度，培養正直的人格，保守良善的心靈，是美好人生不可或缺的條件。如果我們都有這樣的信念，都願意在生活中一點一滴去做，社會就有機會變好。

四

這就回到我最初的問題：政治哲學能夠走進各位的生命嗎？這裡的「走進」，不只是指知性的投入，更指政治哲學中對人的關懷和對正義的追求，能否啟迪觸動指引大家的生命。我這學期最深刻的體會，是意識到教育最高的目標，是使人學會瞭解自己善待自己，學會看到他人的苦難，學會愛。如果大學教育沒有這些，那麼讀多少理論修多少學分掌握多少技能，都沒有觸及教育的根本。這是一種人性的教育。我們透過「教」來「育成」人，使人理解和感受到人之為人最重要的價值所在。有了這些，我們才能開始談如何追求美好人生和建設公正社會。

各位，原諒我在這最後一課，還要如此嘮叨。修完這門課，很多同學即將畢業。我是多麼希望我們可以這樣一起一直的探索下去。我最懷念的，是原典夜讀。當所有人散去，只有我們的課室亮著燈，我們打開書，安安靜靜，一字一句，細細咀嚼羅爾斯馬克思。我們很幸運，有機會接觸這些偉大思想。我們因此責任重大。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歌，有「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句。那是錢穆先生對新亞人中大人的期許。我願以此和大家共勉。

教學專訪——尹翠琪教授專訪

◆ Gemini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11 年 4 月號

中大教務會之下有個通識教育委員會，委員會之下有個「通識教育模範教學獎」。今年頒獎禮於 3 月初在新亞的樂群館舉行，得主是任教「藝術欣賞」、「中國藝術欣賞」等書院通識課程的藝術系尹翠琪教授（Maggie）。除了教通識科，Maggie 教的本科還包括古代藝術如「中國古代陶瓷史」等的科目。其實，藝術從不是那麼容易被界定的事物。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是藝術，杜象的男性小便兜（名叫「噴泉」的博物館展品）又是藝術；而「藝術欣賞」則常予人「在藝術品間遊花園」的感覺，身為教者，Maggie 自己會如何看待藝術教育？教甚麼，怎樣教？

更多的想像　更闊的世界

Maggie 先舉一個例子，讀宗教藝術會讀到秦始皇陵兵馬俑，他的墓葬規模、方式與概念都跟現在的大相逕庭。一方面是因為現在的生活模式較科學化，認為人死後便甚麼都沒有了，自然不需（或實際上做不到）為死亡準備很多物質和大興土木；另一方面，有信仰的人又會有各自一套神的存在及死後靈魂歸宿的解讀，同樣再不要求「視死如視生」的喪葬禮儀。

當人們的世界觀改變了的時候，行為便又不同了。於是可以想像，將有一天，我們今天的生活模式也會像秦始皇的想法一樣，沒人信、沒人用。「就如學校會鼓勵學生參加交換生計劃一樣，我們的生活方式只是 one of the many，是地方性的一種生活方式，而 life 是有 alternative 的，對於世界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看法的。看作品對學習藝術固然重要，但作品就係喺度 reflect 好多唔同嘅想法，看作品其實就是看它們所反映不同人是怎樣想同一件事，有幾多可能性在裡面，然後你便可以去做比較，想想自己的生活模式為甚麼不同，有甚麼不好。」

其實，不只對於死後世界的想法，世界上不同的人群對社會運作的想像，對人的行為模式的想像，對兩性角色的想像，甚至對一隻蕉應該怎樣吃的想像，都有萬千種相異的想法。「多看不同的世界，可以擴闊對不同生活模式的看法，也就更清楚現有文化中不好之處，並嘗試去作改變。」而所謂多看不同的世界，除

了地域的不同外，也包括同一地域時間上的不同，甚至不同族群及文化之間的不同。藝術是一個工具，借助它可以看到這個世界更廣闊的一面。

唔一定要有用先學嘅

「擴闊想像」固然算是某種藝術的「用處」，但 Maggie 對學習藝術還有更多看法。「坦白講，我又唔會覺得一定要同當下有關聯的事物才要學。我覺得知識本身已經係有趣的。例如在看博物館時，可以看到當時人們曾經有過的 achievement，讚嘆佢地當時嘅 concepts 同 techniques。雖然這些學習未必一定可以立即 relate 到當下，但都是一個對古代文化的欣賞和認識。」

知識不必然要有顯見的用處，研究也不定要立即能賺錢的吧，陷於有「價值」的研究才能做，有「用處」的知識才要學的迷思下，將會大大局限了新知識的發生和前進。而且，「價值」和「用處」，又有誰能說得準呢？

藝術教育的概念說得很宏大，可是當落實下來，又是否真能在教學中達到讓學生擴闊對不同生活方式的想像？而且，在這些藝術史或藝術欣賞課程中的 mid-term 或 final 又常涉及一些需要硬記硬背關於作品的資料，短短十二至十五節課的時間，該如何達致「啟迪思考」、「擴闊想像」的目的？

這就關於要教甚麼的問題了。

教學內容的取捨

Maggie 試過在教藝術欣賞的課時講到中山裝和旗袍，卻聽到一些交換生指課堂不應預設他們會懂得這些服裝的涵意和相關背景，於是才發覺在不同背景的學生面前要注意提點一些我們以為是常識的知識，照顧文化背景間的差異。情況就像我們看一個法國裙上的花紋時，不會知道是哪個時代、哪個家族的產物及它承載有怎樣的暗示。這些因為不同文化背景而生的阻隔是需要教學去克服的。「沒有一件作品能夠擺脫其文化背景，對我們不熟悉的文化中的美和符號的意義，都需要『教』來讓不（能）理解變成（可以）理解。」

然而，這些「文化背景」和「符號的意義」在另一方面又是極大量地存在著的，課堂上不可能把一切都講盡，因此又需要一個選取材料的過程，揀出具代表性的，然後在課堂中圍繞一個主題來教，如一個時代或一種獨特的創作手法之類。

Maggie 覺得這個選取的過程需要十分小心處理，因為一旦主題確立下來，某些特點就會被放大地論述和教授。例如當講過一系列強調其用色大膽的畫後，便容易令學生只記得它們用色大膽而忘記其各自的特點；另外，有情況是權威說法太根深柢固，如教到達文西的《最後晚餐》時，總會談它如何將耶穌置於中心或神光如何被窗框取代等等，一切都似乎早有定案、不可挑戰；而每當既定的說法引用得愈多，就愈容易讓學生滿

足於這些具體的知識而不能從中整理出詮釋的方法和更批判地看更多不同的作品。

知識需要主動追尋

更批判地看更多不同作品，就是說藝術教育除了該讓學生懂得欣賞藝術品外，更應該讓他們嘗試重新評價一件藝術品的意義和價值。如講四川三星堆的青銅「面具」的產生和用途時，或杜象的「噴泉」是否藝術品時，因現在都難以給它們一個確實的答案，於是討論便能開展，新想法便容易提出。

結果，引起學生的興趣，讓他們學懂自己去追尋更多知識並慢慢建立起自己的看法成了教學的真正任務。「通識教育的 constraint 在於要在很短，唔 continue，冇結構的情況下在一個 course 中盡量打開多一點你可能有興趣的面向。要兼顧廣度與深度好困難。這不是說可以安於這種 constraints，而是就通識教育本身而言，很難做到兩者兼顧。」

理論上，通識教育只是一個學生在該個面向中僅有讀到的一個課程，實在難以盛載太多內容，對於真正對某特定題目有興趣的學生，他們可以再往那個學系中讀更專門的科目，於是，通識教育便類似一個轉介的機會，讓學生能得到入門的知識，然後再追尋更深入的了解。

時間太少　內容太多

「其實，不只通識，major 的課也一樣，很多時候時間太少，內容太多。」Maggie 覺得這可能是因為香港的生活節奏習慣如此，人們總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得到最多（最雜）的知識。而就學習經歷來說，本科生擁有一個比較廣博的基礎也可能是好的，因為如此可以確保學生有足夠的知識底子，能夠在修讀更高學歷時更進一步研究特定題目。而且，在同一個大題目下，同學感興趣的面向也會有所不同，就教學效果而言，在同一個主題下有多些不同的面向，可以更好地照顧和涵蓋不同學生的興趣和知識需要。

然而，就通識教育（甚至主科課程）而言，內容太廣，時間太少，是否我們可以安於的狀況？通識教育面對的時間限制是否不可動搖的規限？中大的通識教育是在一堆課程列表中讓學生在每個範疇中擇一而讀的，這設定只能確保學生在四個範疇皆能修讀其中極少一撮的知識，這又是否便可稱之為「通識」了？而當博而不精的情況出現在主修課時，縱使以「本科生程度」之名暫且可以解釋，是否學生的學習便真的一定要推遲到碩士學位的修讀時才能專注在更細更專的題目上？另外，如果是因為科目的內容太多，使本科的三年真的不足以作太深入的探討學習，那麼在學制三改四之後，情況又會如何轉變？問題是改善還是惡化？

常聽 Maggie 說學習是一個主動的過程，想補充的是，在個人努力以外，還必須考慮上述制度中的安排是否得當。否則，試想當你在課程的十四個主題中幸

運地找到自己想深入探討的課題時，卻發現在你能親近自己想讀的書本和鑽研自己想探究的主題前，還得先為了考試而把時間花在應付其他十三個不想讀的題目、不想理的 reading 上，而且它們往往已花去你大部份的精力和時間。明顯地，這樣一點也不適合燃起學習興趣，主動學習還能如何談起？

我只能給他們一個概念——張彧暋

◆ 何敬熹

張彧暋，1997 年中大哲學系畢業，人類學碩士，2003 年回中大讀社會學博士，之後回中大社會學系任教。他現在除了在社會學系任教「都市社會學」、「日本社會」等，亦有教「日本社會、漫畫與動畫」、「日本、社會、想像」等通識課程。

問他對現在的同學有甚麼觀感，張形容他接觸的同學，有不少都會風聞某老師「好 grade」就選修，而不是按照自己的興趣來選科。甚至，同學會特地上一些自己已經學過的課，以求可以少少付出就獲得理想成績。張說這實在是很愚蠢的行為，花那麼多的學費，卻接觸不到新的東西。上課求成績而不求學習，於是就有千奇百怪的學生。張說他教過的其中一科是逸夫書院的通識，是選修科，談日本動漫，理論上同學一般比較有興趣才會選修，有一年的課程檢討，同學說這一科好的地方是「上堂有片睇」、要改善的地方是「家課太多片睇」。張彧暋略帶火氣地問我們又像問他自己：「即係又唔想上堂，又唔想做功課，咁呢啲學生黎究竟想做咩呢？呢種感覺，好強烈。」

張憶述自己本科的學習經驗跟現時的同學實在不同：「我的學習生活，第一就是，有堂就上……有咩有興趣想讀就讀。」張唯一知道自己喜歡讀日文（因為方便打遊戲機），順理成章地選了不少日文課，這隨心的機緣，奠下了他日後對日本研究之基礎。對張來說，也許大學教育其中一樣目的就是讓學生找到他們感興趣的東西。對此他說了一個故事：「以前有個同學，讀左三年心理學，原來先知自己唔鍾意心理學，佢搵我師傅，我師傅就同佢講，咁咪幾好，有個得著囉。至少知道自己唔鍾意咩，都算唔錯了。」

考慮到以上提到的種種背景，也許不難猜想張彧暋為何要這樣設計他的課堂：上課的 reading list 不是經典理論，而是動漫小說短文；課堂強調同學的參與和老師即興的聯想。有同學會覺得張的課堂好玩，具啟發性。有同學則認為張的課堂太吹水，令人摸不著頭腦，難以進入。

張形容，對大部分本科的同學來說，那些太深入、沉悶的理論，放下一陣子可能就會忘記。他猶記得他讀本科時上李天命老師的課，李天命老師曾說過到日

後沒有人記得他教過任何東西，但就只會記得他教語理分析這科的一個核心問題：問別人說那話究竟是甚麼意思。張彧暋強調自己不是一本教科書：「我嘗試做的，是 recreate（重現）我接觸這個 field 的時候的經驗，我覺得怎樣是有趣的，那現在就 show 給你看我條路是怎樣行過去。」

如何改變，改變甚麼？——訪問領袖課程統籌梁啟智

◆ 何敬熹

中大除了學院開辦的主修和副修課程外，還設有一些特別課程供同學選修，其中一個就是「通識教育部」開設的博群領袖課程（原稱「領袖培育課程」，下稱「領袖課程」）。

「領袖課程」於 2001 年，時任中大校長李國章提議下開辦，原意是希望可以培訓學生當商界領袖和政府高官。2011 年梁啟智博士接任，新的口號是「世界城市，人文領袖」，強調不是想訓練政務主任（AO），要訓練的是人文領袖。

訓練 AO 有甚麼不好？又為甚麼要培育人文領袖？「領袖課程」又要如何變更以達到這個目的？

招收對社會有想法的同學

「人文領袖」——梁啟智解釋「人文」一詞意指中大向來的人文傳統、「領袖」簡單來說就是要為社會帶來改變。這個說法當然過於空泛，如果「人文」指的是人文主義中「以人為本，對人的個性的關懷、注重強調維護人性尊嚴、提倡寬容、反對暴力、主張自由平等和自我價值體現」（出自百度百科），中大的人文傳統又跟這些價值有甚麼關係和分別？「人文領袖」帶來的又是甚麼樣子的改變？梁啟智在訪問中表示他對人文領袖要帶來甚麼改變，不想說得太仔細，因為他認為每一個同學都可以有自我發揮的空間。

現在社會上不少人投考 AO，因為薪高糧準。梁啟智說如果心態這麼追求穩定的同學，未必是他們課程的目標。梁啟智笑言，他們的目標是盡收各學系的「傻人」，他們在自己的學系裡可能跟其他同學格格不入，但在這兒，就可以跟其他「傻人」一起夢想。梁啟智補充，傻的意思是對社會要有想法，具體的想法是甚麼沒有所謂，梁啟智強調：「我們不是要做政治審查」。所以，他們課程中的同學政治觀可以十分不同。

不管成績，只理熱情

「領袖課程」一年只收數十個學生，他們要如何挑選學生？筆者入學時，常聽說要成績很好才可入讀「領袖課程」，梁啟智承認過往「領袖課程」還有不少精英心態，但自 2012 年開始，他們收學生已經全不過問學業成績。他們灑脫

的背後要承受龐大的行政工作，梁啟智說除了會有一個筆試篩走約四分一人外，其餘的人都要逐一面試，工程浩大。面試雖然需時長，但也有好處。梁啟智說剛進大學的同學，未必每一個都有「社會參與」的經驗可以供他們參考，但「有無心，面試傾下就好易分到」。

課程如何培育「人文領袖」？

梁啟智說他 2011 年上任時基本上是整個課程重新設計（詳見表一）。改革前，課程中不少學分都投放在「領導才能工作坊」。這一個工作坊由前公務員培訓局局長執教，對當年投考 AO 的學生大有幫助。梁啟智形容，工作坊中教導當領袖的技巧，他認為是有價值的，但「skill 取代不了 mindset」，技巧是否需要教這麼多呢？於是，相關的學分略為減少。

另外，同是教導藝術，課程就由「藝術欣賞」變成「藝術體驗」，梁啟智解釋，這個改動代表「藝術」指向的不再一定是 high art（例如歌劇、油畫等），而是可以包含更多廣義的藝術（例如街舞、獨立電影等），而且同學需要去「體驗」、去嘗試，課程的想像多了很多。

時代不同，學分減少

除了因為課程目標不同外，同學的期望亦會令到課程有所變更。現在同學有很多活動可以選擇，所以紛紛要求「領袖課程」的工作量要求不要那麼高。於是，梁啟智他們在 2012 年就將「領袖課程」由佔 24 學分大幅減至 12 學分，希望可以降低同學修讀的門檻。學分大幅減少當然會影響課程可以包括的內容，梁啟智說他們會在一些不計算學分的活動，例如「領袖課程」的交流團和迎新營中，嘗試補回部份被減去的範疇。

刪減過後的課程，當然有所限制，但課程結構還算清晰。課程口號是「世界城市，人文領袖」。對全球視野的培育應該是集中在「全球化與文化多元主義」一科和每年的海外交流團處理；領袖才能的培育則有「領導才能工作坊」和「領袖實踐」兩科；學科知識方面，刪減後只剩下「倫理學與政治學」和「公共政策分析」兩科，相信是希望學生可以由此作為起點，建立他們的價值體系。

領袖需要互相學習和實踐

梁啟智亦多番強調，課程十分重視同學間的溝通和學習，他們之間一定要互相認識。所以，雖然過往校方常問他是否可以多收學生（因為想同一筆錢有更多學生受惠），但梁啟智認為課程設計上實在做不到。「之前 30 個人其實比較理想，現在 50 個人已經變得好難管理，再多件事就會變質。」另外，「領袖課程」的學生作為學生領袖，梁啟智亦期望每一年的學生可以學以致用，在中大影響更多的同學。

後記

訪問過後，思索良久。究竟甚麼是人文領袖？可以想像，課程在招生方面和課程設計方面，都必須思考這個問題。他們想要收怎樣的學生？想要教他們甚麼

樣的東西？

先論招生，有人可能會說再開放的課程都必定需要有一條底線，例如種族歧視、法西斯的思想不應該被容許，某意義下的政治審查必定存在，而且「關心社會」四隻字太空泛，難道四處派發種族歧視的蝗蟲論單張的同學，就很「關心社會」嗎？難道認為窮人懶都是自己問題，所以熱心提倡要取消所有福利的同學，也很「關心社會」嗎？

這些質疑都是合理的，但另一方面，我亦可以想像，很多同學現有的價值觀都只是十分初步、十分不確定的，如果單以這一刻的政治觀去判定他們，也不太公平。如果有同學在入學前，真的如此「關心社會」走遍十八區宣傳一些錯誤的價值觀，也難保他們在參與領袖課程後不會改弦易轍，覺今是而昨非，同樣走遍十八區為社會帶來一些「好」的改變。

但又話說回頭，要扭轉同學一些錯誤的看法相信比由零開始教起更為困難和需要更多的時間。既然課程只有短短 12 學分，而且強調要培訓的是「領袖」。究竟收生方面，是收有熱情，但價值觀錯誤的同學，嘗試扭轉他們的看法？還是將有限的資源，投放在既有熱情，亦有基本的人文關懷的學生上，令他們更上一層樓，影響更多的同學？

表一：歷年領袖培育課程

2001-2010（24 學分）

領導才能單元

GEL211A 領導才能工作坊（一）（3 學分）

GEL212A 領導才能工作坊（二）（3 學分）

GEL221A 外地考察課程（1 學分）

GEL311A 領導才能工作坊（三）（2 學分）

GEL331A 領導哲學研討（1 學分）

公民教育單元

GEL211B 政策工作坊（一）（3 學分）

GEL311B 政策工作坊（二）（3 學分）

倫理及美育單元

GEL211C 倫理學與政治學：基本理論及課題（3 學分）

GEL221C 藝術欣賞及審美經驗（一）（1 學分）

GEL311C 全球化與文化多元論（3 學分）

GEL321C 藝術欣賞及審美經驗（二）（1 學分）

－－－－－－－

2011-2012（24 學分）

人文思維

GELD 2311 Ethics and Politics（3 學分）

GELD 2341 Art and Creative Experience I（1 學分）

GELD 2341 Art and Creative Experience II（1 學分）

決策方法

GELD 2221 Approaches to Social Problems（3 學分）

GELD 2231 Public Policymaking（3 學分）

領袖才能

GELD 2121 Non-local Studies（1 學分）

GELD 2131 Narrating Hong Kong（2 學分）

GELD 3121 Globaliz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3 學分）

GELD 3131 Leadership Philosophy（1 學分）

GELD 3141 Leadership Skills（2 學分）

GELD 3151 Effective Communication（2 學分）

公民參與

GELD 3411 Practicing Leadership（2 學分）

－－－－－－

2012-2013（12 學分）

拓闊知識層面

GELD 2311 倫理學與政治學（3 學分）

知識的獲取

GELD 2241 公共政策分析（3 學分）

GELD 3121 全球化與文化多元主義（2 學分）

磨鍊技巧

GELD 3142 領導才能工作坊（2 學分）

實際運用

GELD 3412/3413 領袖實踐 I/II（各 1 學分）

表二：

博群領袖課程宗旨：

課程的設計是為了培育學生成為俱備下列能力的未來領袖：

- 顯示出對社會和公眾利益的關注，和承諾以誠信行事
- 從廣闊的角度觀察問題，並對本土與全球的觀察提出疑問
- 擁有理解政策問題和尋找完善解決方案的能力
- 示範必要的領導能力，和對現實積極改變的責任感
- 展示出敏銳的道德意識，和對生活的問題有政治觸覺
- 擁有終生學習的能力和期盼

學而

◆ 守仁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13 年迎新特刊，本文為〈上下求索— 讀書心態分享二則〉之一。

誠然，比起中學那「現代八股文」的教學模式，大學教育意味著一種劇變（至少是形式上的）。

不再有硬性規定的時間表，甚至上不上課都沒關係；偶有一兩門課要用上教科書，但更多的是無涯學海中的其他文章或參考書；隨便衝進其他學系的課室聽課是閒事……面對這種種轉變，抱持怎樣的態度去學習，居然成了我們要重新思考的問題。

儘管我們都聽過「入左大學有排你玩」之類的話，我自己也深知哲學系是「中大四大頹系」中的經典，到頭來我還是比較享受讀書。

從來，讀書就少不了令人厭倦或痛苦的時候，而它也往往是我們最先接觸到的。

記得第一個學期到了大半的時候，其中一門必修科我幾乎每堂睡覺，參考資料也從沒碰過。最後為了快將到來的考試，我好不容易提起心肝認真讀其中兩三課的參考資料。雖然在高考修歷史科，令自己在處理大堆英文資料時不算難受，但沒料到那深夜一點半開始讀幾小時書的經驗，換來只是讀到些完全沒幫助的入門級講法，一時間覺得好不沒趣。

第二個學期，考慮到第一個學期沒好好善用時間去旁聽自己喜歡的課，加上參與報社及其他社會運動都需要大量知識，於是編排了緊密的時間表。結果，更自由的學習和更加的投入，換來更大的學習樂趣。

而儘管這些課中，以鄭宗義教授的「中國哲學史」最為吸引，我還是比較想分享上周保松教授的「政治哲學」中許多愉快的學習經驗。

課堂往往由講課、導修、交功課組成。想要所有部份都有趣，似乎很看運氣，政治哲學這門課是其中的代表。

周生的講課總是很受歡迎。「哲學」這兩隻看似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字，他居然可以每堂吸引百多二百人去聽課，大家也完全不介意人多得需要坐在地上。

更誇張的，甚至有從嶺南大學跑來旁聽的同學。

周生的課跟絕大多數的哲學課相似，教師總是喜歡不時探探同學的想法。

最印象深刻的一課是關於「公義」的討論。

那時我們早已討論過「國家」、「自由」等概念，周生便要我們想像全班出海旅行，結果落難荒島。為求生存，必須組成「國家」，並想像大家覺得合理的分配制度。

「最重要的，是有一定的中央分配制度，確保每個同學拿到合理的最低保障，餓不死。」一個同學打破沉默。

大家似乎覺得提議合理，開始放鬆地討論：「其他時候，各人依自己的才幹工作，除了分配給大家的基本保障，其他可以自己保管。」

「我只會釣魚，但又想吃你的蕃薯，我們可以互相交換。」

周生本來一直讓我們自己講下去，說到這裡，忽然問：「如何決定交換的比例？由我決定？由大家列出普通人的品味並以之決定？還是讓同學的需求決定，比如魚肉比粟米受歡迎，釣魚出色的同學就可以換異常多的粟米？」

「這個提議挺好的呀！」大批同學舉手支持，卻不知是陷阱。

「那香港的不公平是否也挺好的？怎麼大家的想像力都如此狹隘？我們由零開始，毫無束縛，最後卻居然得出香港的制度就是公義這個荒謬的結論？」

周生這才將思想實驗的其中一個目的說出。

那時正值碼頭工潮，同學們一邊批評制度不公，不時組隊給工友送物資，另一邊卻認同了人吃人的剝削制度。

一下子，那些彷彿抽離的思辯，又全部回應著日常生活的悲慘。

而對比第一個學期比較「平淡無味」的導修，所謂的「Intellectual Solitude」和那伴隨而來的喜悅，自己也在「政治哲學」課中親身經歷到。

那次是晚上預備政治哲學課的導修，要讀幾個哲學家關於「國家的誕生」的說法。霍布斯跟洛克的都很出色，但總覺不如意：人類怎麼會一開始就相互競爭，一心要把對方置於死地呢？他們怎麼會以自私自利的個人滿足為理想，甚至不惜以其他人的痛苦為代價呢？

最後讀到盧梭的論點。他寫到人類如何富有同情心，如何懂得珍愛別人，直到物質的困窘令我們以為出路就在人之間的競爭。

嘩！這個法國佬太浪漫了！

我居然情不自禁地為他的論證拍掌，口中更自動配上一聲「勁呀！」

幾個鐘頭的夜讀，以一個精彩的論證作結，苦中帶樂，美好得很。

當然，也少不了和同學切磋砥礪。

那是政治哲學的導修，那時我們一班人爭論怎樣的財富分配制度才算合理，大家為著諾齊克和羅爾斯等學者的講法爭論得面紅耳熱，到導修結束仍然僵持。結果，回到家才發現助教打了八千多字的長文，回應我們課堂上提出的種種疑問，甚至給我們提供了幾種更精彩的討論方向，確確實實地有種「求學問」的感覺。

幾千年前莊子給一眾學生哥留下了這樣的話：「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也許他沒錯，但當我們真正體會到學習的樂趣時，管他呢！

「真係想做，就唔係莊務！」
—— 專訪上莊狂人 Javier

何敬熹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11 年 11 月號

當一般同學上一支莊都擔心工作量太大時，Javier 在這三年間，大大話話上了八次莊（計有青年公民社會、崇基攝影學會、新亞國樂會、崇基社會學系系會、學生會、學生報）。當中青年公民社會（青公社）更是他由 Year1 開始，跟其他同學一起創立的。如此豐富的資歷，稱他為狂人也實不為過。學生報今期特地跟他進行了一個專訪，讓他分享一下他的上莊心得，權供各同學參考。為何要上莊？應該選擇甚麼莊？又應否自己創辦一支新莊？

為甚麼是「上莊」？

選擇上咁多莊，而不是專心讀書，除了一向百足咁多爪外，Javier 解釋原來亦同佢系內的氛圍有關。他表示系內同學參與社會事務的氣氛冷漠，雖然同為讀與社會相關的東西，卻明顯被政政系、社工系比下去。不少同學讀書好好，平時好似好認識社會問題，但一到要參與其中時，則紛紛表示這些問題解決不了，或推搪自己有事忙。他覺得雖然社會學用一個比較抽離、客觀的位置研究社會，但不應只解釋而不參與其中，因為參與亦是社會組成好重要的一部份「如果讀社會學只為考試，跟讀其他任何一個學科有甚麼分別？」

上莊影響成績？

問及上莊跟 GPA 的關係，Javier 表示兩者未必有關，在一些 chur 莊做 P 的人，亦可以有很好的成績。相反，他指上莊可以是對現時將學術等同 GPA 的主流看法的反抗。他以自身為例，因為英文水平不太好，所以英文 course 要比中文 course 低了不只一兩個 sub-grade。但除去教學語言這些制度性的阻礙，難道他不可好好認識社會、做好社會研究嗎？上莊，就是他的其中一個渠道去抗衡這種單一的價值。

「青春就是勇敢」

有這麼多莊上，又為甚麼要自己創辦一個新組織（青公社）呢？Javier 指第一個原因，當然是現在沒有可以 fulfill 他們要求的組織。學生會、學生報積極參與社會事務，但立場鮮明，會趕走部份同學。而其他學會，關心社會的最多都是社會服務，真正可以討論／參與社會的空間不多。第二個原因，則是創辦新 Soc 好「新奇」。他引用林懷民在講座中

所講的「青春就是勇敢」，認為要把握現時年青的活力，咩都要試下。

學會是怎樣煉成的？

創辦青公社的意念，萌生於保護菜園村運動正烈之時，Javier 在參與護菜園活動時撞到另外幾位社會學系的同學，他們看到系內來的人人丁單薄，不禁談到系內關心社會、參與社會運動的風氣薄弱，於是起了創立青公社的念頭。後來曾聚過一班有心同學傾過一兩次，但不久就被系會和其他學會拉走大半。拖拖下，去到 Year2 頭才開始正式註冊。問及有甚麼得著，Javier 表示當初無想過自己會咁投入，但在這個過程中，搞過交流團、沙龍、研討會……看到不同的人都可以被改變，好有滿足感。

「學會迎新活動其實呃人。」

既然講到上莊咁好，咁同學應該點選擇？ Javier 回憶他 Year1 時，有好多 Soc 都有興趣，但因撞時間，只能盡量去了約十個學會的迎新活動、傾莊。結論卻是，去這些迎新活動無用。因為他們只能幫助你了解該學會的架構、有甚麼活動，但當中的風氣、文化你不會知道。「而且，支莊既人實會講到好好，但唔好人講咩你就信。」

「謹慎上莊，唔好讓自己後悔。」

Javier 雖然上好多莊，但他亦提醒大家要想清楚自己真正想在莊入面做到甚麼、學到甚麼。「想清楚一整年自己點 keep 住 passion 好重要。」要不然有不少同學，唔清楚自己上莊為咩，當搞活動搞得唔好，或被老鬼、莊員鬧時，就會一走了之。再唔係都會變成為做莊務而做莊務。但其實，如果同學真正同意那支莊的理念，那支莊就會成為你生命的一部份，那些亦不再是莊務，上再多的 Soc 亦唔會覺得工作量大！

那些年 Javier 上過的莊，及他認為學到甚麼：	
中大學生報	接觸到不同的社會思想，最具挑戰性的地方莫過於跟不同人士做訪問（院長、藝術家、性工作者等等），最難忘莫過於 20 歲生日當天七一遊行結束後第一次瞓喺當時的（政府山）政府總部。
中大學生會	提升行政效率、與傳媒打交道等是個人認為上呢支莊最大的得著，同時由於與不同校內部門接觸，因而開始熟習「行政構架」及內裡的「規則」等事宜。
中大青年公民社會	回想起都覺得有點像變魔法，把一個組織由無到有建立起來，少點魄力都不行。同學生會一樣，如何在有限的時間裡處理大量的事情，少一點腦力及分配都不行，前陣子與接任的主席整理資料，發現第一年我們足足舉辦了超過 80 項活動（包括內部活動）。
新亞國樂會	入國樂會前全無樂團經驗，做莊員時曾經嘗試過樂團不同的位置，最大得著是得到一班學系、宿舍以外的好朋友，畢業快將一年，但大家感情依舊，仍然會一起玩音樂，一起傻笑 XD。
崇基社會學系會	其實呢支莊主要真係俾自己一個放鬆空間，同我親愛的六位莊員（我是唯一的男丁 LOL）一齊嘻嘻哈哈，為生活加點歡樂。
崇基攝影學會	認真，真係一大堆攝影技巧以及晒相技巧，呢啲出面好難學到。

Internship —— 學習？打雜？

◆ 整理：何敬熹

編按：Case1,2,4 原刊於 《中大學生報》2008 年迎新特刊，〈Internship—— 填塞 CV 以外〉。

近十年來，同學實習的機會大大增加，中大校方安排的寰宇暑期實習計劃的名額在 2012 年亦大增至 508 人，再加上其他同學自己找、學系安排的實習，可以說，實習已經不再是一少部份精英同學的專利。隨著大學重回四年制、再加上大學學位貶值，未來實習在整個大學教育中所擔當的角色將會愈來愈重要，成為大部份同學共同擁有的經驗。但實習究竟是寶貴的學習機會，還是浪費光陰的廉價勞工？這些同學的經驗也許可以作一參考。

Case 1

學系：建築系

機構類型：則師樓

幾錢人工：7,500 蚊一個月

實習時間：2 個月 full time

參與實習動機：

本著對學系的熱誠，覺得可以經驗「爆多野做狂開 OT」的建築師生活一定超爽，雖然知道公司一定不會讓實習生做太重要的事情，但都想體驗一下。

實際工作內容：

「入則」，即是畫則，偶然地可以做 design 的工作，但只限畫下櫃之類的細件野。

感想：

同之前的想像大相逕庭，只做入則都算，但問題係連則都唔夠俾我畫，做完一件 job 諗住問下同事仲有咩可以做，同事竟然話：「下，咁快就做完？！你再做下先啦。」天啊，都話做完咯，仲有咩好做呢？效率高變成缺點，因為無人得閒理會實習生。

不過，在觀察同事工作的時候，發現學科教導的，例如建築是藝術品或建築應以人的生活為考慮中心之類的說法，在現實完全不可行，尤其在香港。香港本來就地少，加上商業主導，最緊要在一塊地上賺最多的錢，甚麼藝術不藝術，商家從不理會，連一般大眾都覺得這樣無甚不妥，建築師因此受到相當大的限制。（問：咁呢個觀察會唔會令你考慮

放棄從事建築業？）咁又唔會，反而覺得自己畢業之後應該參與或籌辦一些令大眾認識建築的活動，可以是展覽之類吧，希望令大家知道建築設計的意義和價值。這些實習帶動的思考，倒是相當有用。

Case 2

學系：文化研究

機構類型：社福機構的社區發展部門

幾錢人工：1,000 蚊車馬費一個月

實習時間：2 個月半職

參與實習動機：

實習機構從高大空藝術機構到窮苦基層團體都有，揀社福機構主要因為想知道行業的狀況，諗下入唔入行。畢竟文化研究都係啲出路無限闊既學科。

實際工作內容：

原定是跟進一個推廣地區文化的計劃，做做下就變成七成做隔籬左右 team 的工作，包括翻譯、排版、訪問、擺街站，之類。

感想：

做乜野都係其次，雖然算不上完全是手板眼見功夫，如果只是想 fulfill 要求，似乎不須受任何學術訓練。

親眼見證社會工作被收編為幫助政府安撫民間不滿的機構為虎作倀。實習機構於行內已算比較進步，但因為財政等問題都掌握於政府手中，處處受制於人。也不是沒有真心為人的社工，不過撥款給他們開 project 的機構（例如區議會）諸多要求，要在滿足他們要求的前提下，可以做到的不多。加上機構的工作量超重，有位同事上工數個月已經儲到一個禮拜假。想靠社福機構參與改變社會，好難咯。

Case 3

學系：法律系

機構類型：本地細 firm，跨國大 firm

幾錢人工：細 firm 咩都無，無交通津貼；大 firm $5,000–12,000

實習時間：多為一個月

參與實習動機：希望知道律師真的在做甚麼、知道更多律師樓如何運作。入大 firm 同時為了 CV 靚。

實際工作內容：細 firm 沒有甚麼制度，得五個律師，一 team 三到四人，你跟的律師想你做甚麼，你就做甚麼，check bill 又有，文書工作又有。有一次為了幫個客做不在場證明，睇 CCTV 睇了幾日，又因為 office 冇碎紙機，要做埋人肉碎紙。在細 firm 有時也會搵 case，也試過跟律師見客。大 firm 分部門，工作辛苦程度因部門而異， 如 IPO 就勁夜放。因為大 firm 有自己 trainee，所以做的工作比在細 firm 瑣碎，無得見客，多是文書工作、資料整理，偶然也會搵 case。有些大 firm 基本上個個都可以叫你做嘢，要學識拒絕，不然就做死自己。有些大 firm 則帶你不停去 visit， 做義工，基本上沒有時間做嘢。

感想：都算見下世面，接觸多些文件對之後學習的科目如民事程序也有用。不過做細 firm 時就發現做律師不如以前想像風光，office 好細間，好亂、working hours 好長，但細 firm 識到所有人，有人情味，同埋工作不如大 firm 嚴謹，都幾有趣。大 firm 有啲好嚴，唔俾嚮走廊講嘢，同埋無法子識哂咁多人，感覺自己只是芸芸眾 intern 的一個，但人工非常好，office 很漂亮工作起來也很開心，福利也好，文具豐富可以任拎，也因為待遇好，基本上都會做得較夜。

Case 4

學系：宗教研究

機構類型：道教祠

幾錢人工：無，連交通津貼都無

實習時間：100 小時

參與實習動機：

主要是好奇和貪新鮮吧，之前從未想過投身宗教界，感覺這實習機會可一不可再。又由於一直對自己的學科心存浪漫幻想，總覺得到宗教團體裡工作一定不會做 routine office work，又覺得能與道教徒甚至道長接觸的機會難得，加上曾寫過關於實習機構的 paper，於是不顧暑假爆多野做，也照衝上去了。

實際工作內容：

抄寫藏書閣內的藏書資料，然後輸入電腦、編寫一隻關於道教科儀的影碟的劇本、隨經生到安老院宣道，齋坐同睇。

感想：

「入宗教團體工作很有趣」的幻想破滅，因為自己的工作內容有三分二是 routine work，領薪的同事是 100% routine office work。得著係有嘅，例如可以與道長交流，或在宣教活動中將觀察與之前的基督教傳道經驗作比較，對道教有較之前深刻的認識。但嚮 100 個鐘黎講，得著真係太少太少，大佬，100 粒鐘我可以做多幾多野呀？又由於實在太浪費時間，department 同實習機構連車費都無津貼呢個本來不算太過分的問題就令怨氣再多幾錢了。再講落去，問題就會引申到學系之間的資源不平均。比較其他學系的議價能力（實習生的人工）及投放的資源（實習機構的種類、實習負責人的數量），宗教系實在差人幾皮，這已稍稍顯示敝系在大學的邊緣位置。

Case 5

學系：會計系

機構類型：稅務局

幾錢人工：7,000 蚊一個月

實習時間：3 個月 full time

參與實習動機：

好多入左 PAC 的同學仔，畢業之後都係去左 BIG 4，每一日的生活就係返工同返工。自從 Year 1 之後就知道自己唔係想過呢種生活，所以 Year 2 時，無好似其他同學仔咁申請 BIG 4 的實習，而係報政府。

實際工作內容：

Check 報稅表，幫手做 Case，見納稅人，都係以比較簡單的為主。

感想：

讀得呢科，都預左將來做嘅野唔會特別有趣，而呢份算係我第一份正式坐 Office 的工作，所以都有點期待。其他同事都係幾肯教人嘅，同埋除左做一些手板眼見工夫之外，都可以做到一部份正式既 Cases，而唔係淨係幫手影下印呀、入電腦等等，都叫做學到野架。而因為都要見下唔同嘅人，唔洗淨係坐係位度做野，無想像之中咁單調。

Year 3 同 Year 4 的時候，都做過另外兩份私人機構的 Intern，就講其中一份，銀行會計部啦。工作性質其實係幫手做下同會計有關的日常工作，包括入數、做 Reconciliation、Generate Report 等等。平時見到同事都做到無停手，差不多到月結或季結，就更加趕。

感覺政府同私人機構，無論係工作環境，同埋文化都係好唔同。要諗下邊面較適合自己喇，因為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追求咩野。從最實際嘅角度睇，起碼呢度唔洗做到天昏地暗，會有收工嘅時間。

因為畢業之後考到入稅務局，無再做其他私人公司，所以無得比較，但總會覺得香港嘅所謂商業主導，其實從無考慮過人嘅價值，只係將人當做用來生產的機器。或者有人會覺得揀呢一科嘅時候，就知道呢個行業係工時特別長。但一個咁唔合理嘅工作文化，點解大多數人都可以逆來順受，會覺得係無問題？



週會，去來做乜？

◆ 小學咪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11 年 1 月號

唔知同學有無諗過 quit 書院週會？

畢竟大家都係成年人可以有所選擇，「肥」左週會又點啫，成績表上 Assembly 一欄寫著「FF」又唔會令你搵唔到工，甚至唔會影響你攞船嘅機會。諗真啲，「肥」左又真係唔使死架喎，仲慳返啲時間，唔使下下趕頭趕命落堂入 Shaw 或者落山。

話時話，書院究竟點解要有週會？你又去來做乜？

聚首一堂等落堂

目前來講實在好難考究「週會」係點來嘅，因為佢幾乎係自有永有，亦無乜文獻講過中大各書院幾時開始有週會。不過，週會其實係每個書院嘅通識項目之一（即係書通），雖然不佔學分亦不設考試，不過聽講一定要及格先係書院畢到業。

週會既為書院通識教育課程一部份，好歹係中大書院特色之一。傳統四間書院都希望同學可以透過週會擴闊視野，同埋凝聚書院氣氛。譬如聯合書院嘅網頁就話想「加強同學和書院的聯繫」，新亞則希望「增加（同學）對書院之歸屬感。」

不過咪玩啦，幾個星期坐埋一次仲要個場面咁多人，點凝聚歸屬感？呢個目標似乎行貨左啲喎。唯一比較可能發生嘅反而係，完左週會之後同學自己次次都有大小組聚啲？咁就反而真係比到同學機會定期見返同書院既師兄師姐或者朋友勒。

咁扣左「聚下」、「見下朋友」，書院週會仲有咩意義？

有受訪同學分享，既然週會唔計分又唔考試，咁即係書院方面其實都唔要求同學記得或者知道週會嘅內容架啦？咁同學入到去玩手機、訓覺、睇雜誌，或者衝擊台上嘅嘉賓……你都好難怪人啫？崇基嘅同學仲特別有小學雞感受：傾偈要收學生証？！

不過講番轉頭，又係咪下下都要考試計分先去做先？雖則大學嘅氣氛基本上都係保守反動，做學生嘅都可以有獨立

思考啩？書院一片好心，設計左好多題目比大家揀，有啲書院例如逸夫，更提供替代選擇。目前逸夫同學可以選擇去 High Table（每次約一百人）或者 High Tea（每次約五十人）代替其中一兩次週會，如果你又真係唔中意著晒 suit 去食餐高桌晚宴的話，亦可以去足三次週會，唔算無選擇，不過就要鬥快登記到——咁變相証明：呢啲替代嘅飯局，又幾受同學歡迎喎。出年逸夫仲會以藝術為題，主打請藝術家做分享，講下佢地選擇從事呢個「非主流行業」嘅心路歷程，希望比到同學一啲另類睇法咁話。

自主小學雞

咁頹去週會殺時間 take attendance 係一種選擇，「肥」左 quit 左週會亦係另一種選擇，第三種亦都可以係珍惜書院花左嘅資源，比啲心機聽下嘉賓講咩。網上查得番崇基過去幾年嘅週會題目，唔少都幾爆吓，例如請過程翔來講中國、阿虫講來畫、My Little Airport 嘅阿 P 來講音樂等等。而且你又未必要好認同啲嘉賓嘅意見家嘛——比如最近就有崇基同學比週會嘉賓激親，當場出去問完佢問題返到去仲係頂住條氣，結果兩位同學寫左篇文講下自己不滿。不過老實講，啲同學都幾有心機嗜；老師亦有聯署回應同學意見。

講到底，其實係大家心目中，中大書院嘅非形式教育係咩野一回事？在彈性與選擇、自主與小學雞之間，相信大家會搵到自己嘅答案。

書院點樣定週會題目？

其實都幾民主。書院一般會有個委員會，會員包括教授、同學等等，一齊傾下出年書院有咩題目、搵邊個來做嘉賓咁。

唔少書院都有問卷比同學填，問下你覺得週會點搞，不過就唔多有人知書院係點處理或者理解問卷嘅數據。譬如話聽講崇基同學成日都係問卷入面抱怨週會次數太多喎，但係崇基都係無減少到週會嘅次數。算唔算意見接受行動照舊？好難講，因為又無理由啲問卷問到乜就乜架？書院作為教育機構，都要幫手判斷下點做係為學生好，可能佢地覺得前四後三去足七次先至做到週會既教育目標？小記無資料、唔判斷。

外地生看中大（節錄）

Selina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06 年 11 月號。

編者按：中大的非本地生人數雖然在近十年大幅增加，但當中絕大部份都是內地生。僅餘的外地生就處於一個十分邊緣的位置，被同學、校方有意無意忽略。這篇就訪問了一位已是第二年在中大就讀的外地生，談談他眼中的中大、又認為外地生這個族群有著跟本地生如何截然不同的需要。由於是次訪問部份以英語進行，本篇訪問稿經小林輝過目，以確保其意見不會被錯誤詮釋和理解。原版標題為〈外地生點睇中大國際化？〉

有著外國人臉孔的小林輝，在日本出生和長大，十三歲時到美國讀了四年寄宿學校，他的家人其後也移居美國。他對香港的文化很有興趣，想學習並在將來教授廣東話，於是孤身來香港讀大學。「我對中國文化感興趣，但對香港的文化更感興趣，因此我選擇來香港而不選擇去北京。以前曾經來過香港兩、三次，也看過不少香港電影和關於香港的書，也會上網看香港的東西。」來港前，小林輝已懂多國語言，包括日語、英語、德語、普通話和廣東話，其中普通話和廣東話在聽方面沒困難，說方面仍不太可以，很多時候需要書寫中文字溝通。現在他用廣東話溝通大致上也沒問題，只是有時候有些字會突然想不起來。

授課語言

對於中大的授課語言，他坦言比較喜歡用廣東話和普通話上課。「主修科除了一個課程是用普通話教授之外，其餘都用英語。而三個大通課程、書通和 Assembly 則全是廣東話授課。但要選擇廣東話的課程也不容易，我要在選科前和教授談上一小時，才能說服教授我可以用廣東話上課。」但他也說，他另外一些外地生朋友會抱怨可以選擇的大通課程很少。「一位來自韓國的外地生，因為家人需要來港工作而 transfer 來中大。另一位來自意大利的外地生，因為之前在美國讀書時認識了台灣的女友，想和她 close 一點，所以來了香港。他們都是 Full-time foreign，會在香港完成整個本科課程。他們本身都不懂廣東話，選擇自然少了許多。」

質疑一：「Separate us from locals」

現在中大的文化交流似乎不甚理想，經常是內地生和內地生很熟稔，外地生和外地生也經常待在一起，本地生和外地

生之間的交流倒是比較少。小林輝亦留意到此現象。「一來例如兩個說法文的交流生認識了，大家同聲同氣，很自然會經常待在一起。而且，校方也經常「separate us from locals」。在我入學前，本想參加學系的 O Camp，在開課前可以認識同系的本地生，但校方以迎新營會用廣東話進行為理由 reject 了我的要求，並安排了我參加專為外地生而設的迎新營。又例如我的房間由大學編排，第一年入學時同房的香港人自小在澳洲居住，雖然懂廣東話，但他平常也和交流生相處較多；到今年我特別要求，才安排了本地生的同房。此外，有很多課程也是特別為 international students 而設；又進一步設了 I-House 把外地生和本地生分開，如此，外地生要和本地生有文化交流便更難。我有一位外地生朋友，去年住書院宿舍，今年住 I-House，他也說相較起來不喜歡住 I-House。而且 I-House 比普通宿舍貴，像是特別『掠』international students 的錢，既然現在本地生的宿位也十分緊張，我認為將 I-House 改為普通書院宿舍會更好。」

「本身不懂中文的 full-time foreign students 需要修讀 9 個學分的普通話或廣東話課程。我那來自韓國和意大利的外地生朋友第一學期都選普通話，是認為對將來工作會有幫助；但他們在第二學期都決定改選廣東話，因為他們覺得要融入香港的環境才是最重要，而能夠用本地語言溝通是融入環境的不二法門。若然只是交流生，不懂廣東話也沒甚麼關係，但對讀四年的 full-time foreign students 來說，不懂廣東話就會十分沉悶。」

促進文化交流的意見

小林輝認為，要更好的促進本地生與外地生的交流，首先，校方應盡量把外地生和本地生多聚在一起，而不是把他們分開。而且，小林輝亦認為理想的文化交流環境是本地生懂英語，而外地生至少懂少許廣東話。他認為校方應在入學前的暑假，為外地生尤其是 full-time foreign students 提供廣東話的口語課程，好讓他們能更快融入香港的環境。「校方可考慮針對廣東話的口語訓練。現時的廣東話課教的是兩文三語中的中文和廣東話，但由於廣東話跟中文的書寫系統有很大差別，同時中文的文字亦比較複雜，外地生學起來十分費勁。而對外地生來說，最實用的是可以用廣東話作口語的交談。」

質疑二：學校準備不周、支援不足

對於劉遵義在 2005 年 2 月的「中大家書」[1] 曾指出以非本地生佔總收生人數的 25% 作為長期目標，小林輝認為在他的印象中，中大根本未完全準備好招收外地生，支援也十分不足。「例如剛才提及那專為外地生而設的迎新營，我去年入學的時候只有六、七名外地生（2004 年中大尚未有招收外地生的程序，他曾於 2004 年查詢而遭拒絕），人數太少，校方便把我們「硬塞」去和交流生一同參與迎新營。但該營基本上是專為交流生而設，在營中既沒有介紹校園，也沒有提供任何選科的程序介紹等，數

天的活動全都是聽校長演講、dinner、party 之類，十分無聊。結果，外地生在選科時遇上很多困難，例如我有一個朋友不知道 add/drop 期時改選主修科目應在學系辦理，而誤以為如選修科般可在網上處理。又例如新亞書院於上年學期末透過電郵通知學生申請下一學年的宿舍，但那電郵只以中文發出，結果那不懂中文的朋友對此事毫不知情，要後來才補回申請。」

質疑三：招收外地生為好睇　雙重標準

小林輝認為若中大希望做到「國際化」，實在有需要提高外地生和交流生的入學門檻。「中大收許多內地生，似乎只是為了有多些外地生比較好看，外地生的水平反而是其次。例如我有一個朋友，拿的是澳洲護照，自小在港居住，到高中時才到美國，而他的姓名則很像韓國人的名字。他以外地生的身份申請並已成功獲得錄取，但後來學系發覺他自幼在港居住，與本地生無異，感到大為失望，並聲稱不肯定是否可讓他入讀中大，要一個月後再給予答覆。最後，因為他確實持有澳洲護照，最終亦可以外地生身份入讀中大，而其實他的成績也不錯。此外，現在有一種說法，就是中大對外地生，尤其是交流生用 low maintenance 的態度，他們來香港主要是 have fun，然後就離開。」（筆者也有一位朋友，他去年的同房是交流生。他說基本上不可能和那交流生有甚麼交流，因為永遠在宿舍見到他，他都在睡覺。就他所知，那交流生每天的生活都是入夜便外出「落吧」，日間時間全用來睡覺，而且天天也走堂。）

質疑四：鄙視廣東話

對於中大整個雙語政策的發展方向，小林輝認為校方似是想 eliminate 廣東話，故此才要求「涉及中國文化、社會及歷史的科目」增加普通話的授課比例，他直言對此感到失望。「大家都把廣東話視作次等語言（low language），都『重英輕中』。我有一個本地生朋友，我和他單獨交談時他喜歡用廣東話，但當離開中大走到街上，他便寧願用英文交談，因為和外國人在一起而不用英語交談，別人便會認為他的英語很不濟。」「校方似乎想透過增加英語比例去 modernize 大學，想大家在中大的日常生活也用英文溝通，但如此這般，只會變成 A Big I-House，而並非真實地反映香港。若然要追求國際上的排名，也不一定要有更多外地生、要更英語化，例如東京大學是日本全國最著名的大學，但她只著眼於教育本地生，大部份課程亦以日語授課。」

結語

外地生作為中大學生的一份子，其意見理應被尊重。校方聲稱期望透過招收外地生，促進國際文化交流，但面對出自外地生口中：「校方的政策是把外地生和本地生分隔開」的指控，校方可以如何回應？

1　招收非本地學生是一個發展的大方向，我們以總收生人數的25%作為長期願景，循序漸進，估計需時十年以上才能完全實現。」



大學生自白

◆ 周松齡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13 年迎新特刊

1）所謂大學生

當我還是個懵懵懂懂的小學生，不知道世界是甚麼樣子時，那時爸媽已有意無意的在我耳邊嘮叨：「你要這樣讀上去，如祖父母般升讀大學，那我們就老懷安慰了。」

大學生儼如一個神秘階級，人人趨之若鶩。彷彿只須我過關斬將，入到大學，就能成為社會的王者。新聞報導中，人家父母苦苦經營，為子女「增值」，只求子女入到名校，為入讀名牌大學鋪路。大學裡，人人身穿西裝、操流利英語，在商業場合打混，閒時則流連於金光閃閃的宴會舞會之中。那大學之後呢？晉身中產階級，不愁柴米，從而過個舒適安穩的生活——這都是我入大學前對大學生的想像。

我所讀的中小學雖非家傳戶曉的傳統名校，但我仍能平平穩穩、安然無恙的入到自己喜歡的中大經濟學系。打算努力讀書，亦希望在三年後繼續讀書，入讀研究院。一來，我喜歡經濟學理論與歷史。二來，是為了所謂的「裝備自己」，以便自己在競爭激烈的勞動力市場中佔一上風，繼續我平凡安穩的生活（具體來說，即是供養父母，養活自己，建立美滿幸福的家庭）。

怎料，才開學沒多久，隨即發現當初我實在太無知了。大學生不過是個普通人嘛，即便是名校出身的，讀環管還是醫科的，他們的專科成績也許是比較好，但言行舉止也和別人差不多。或許是中大的樸素風使然，我們平日不須穿西裝、說英語，不須談吐得體、儀態端莊。在這個小小的社區裡，學生們只是普通人，不分（明顯的）階級。雖然與想像中有頗大的落差，反倒活得更輕鬆自在。

不過，在我不再感覺到強烈的競爭意識之後，我又有點回到起始的感覺，迫使我開始進行更多有關大學生活的思考。

2）好奇

自小，媽就跟我說大學是個寶藏，圖書館裡有很多很多的書；我在寶貴的三、四年大學生涯裡，時間、空間都多得很，理應去尋覓無窮的知識，漫遊於學海之中。她很愛看書，讀書時也十分勤力，可惜當年年輕有為的爸媽在國內讀書時

遇上文革，書沒得讀，大家都得上山下鄉。他們不知道大學裡是怎樣的，然而這些空白全被美好的憧憬填得滿滿的，同時亦換來了對我這獨生女的期許。他們雖向我施加了一定的壓力，但在我的心裡頭，亦埋下了要尋覓更多知識的念頭。

迎新日那天，我排隊吃飯時從某男生手中，接過了一份《2011 年迎新特刊》，以及《中大清潔工友抗爭號外》。他相貌極為平凡，猶與我們無異，手上卻派著不太平凡的清潔工號外。普通學生不應對這些事情感到興趣啊，不是嗎？然後，當他簡介這件事時，他那七情上面、時而激動的樣子，令我特別印象深刻。而他那股激情或許感染了我，我用心聆聽他的話，開始慢慢瞭解一直被忽略的工友不合情理的遭遇，這使我心裡也有種莫名的暗湧。隨之而來的，是因為自己對這社會的無知而導致的懊惱與慚愧。我不甘願繼續做井底之蛙，我想知道更多、更多。

後來，因為《迎新特刊》的關係，我知道了報社迎新營可以「傾下偈，咩都傾下」，單純的我便因此衝上了范克廉 307 報名。怎想到傾傾下，竟傾出個大頭佛。

3）尋覓

雖然的確係傾偈，但那是我當時有史以來經歷過最 hardcore、動得最多腦筋的三日兩夜。有個環節要求我們研究及討論房屋議題，探討房屋的價值和歷史等等，連帶到房屋在社會裡扮演的角色。在他人興高采烈的高談闊論時，靜坐一角的我則陷墮於無窮盡的深淵——我覺得自己真的很失敗。

很失敗。我從小就生活在香港，住過公屋、居屋及私樓，以前在課堂上學過各類房屋在市場競爭下的定價情況，也曾學過麥理浩「黃金十年」的房屋政策，但對於那些比較根本的問題，我卻想不到答案。過去十八年學習的，好像只是書本上的知識，而它只體現在考試成績當中。

我想脫離中學時期的填鴨式教學。我想趁著現在還有時間和資源時，在寶藏森林裡搜覓更多知識；透過書本或課堂以外的途徑，進一步認識這個世界。接著，我便入了基關組（基層關注組）與報社。我想，我應該去學習的，不是學院內學習到的數式與模式，而是更應該從日常人民的生活、各種時事議題中去發掘與探討更多社會矛盾。後來我支援過兩次小工潮，分別是蒂森電梯工人罷工以及利興清潔工人抗議遊行。

我遂發現，在這繁華的都市，貧富懸殊不只是冷冰冰的堅尼系數，而事實上，悲劇就在人間啊。誰知道，每一滴血汗背後，隱含著怎樣的無奈和辛酸；而它又暗示著怎麼樣的社會制度、怎樣的政經結構，以至於整個意識形態問題呢？然而，為何這些重要的思考在學院裡好像不值一提似的？

每當向外走出一步，對世界的認知愈明晰，就愈發現自己內裡的空洞。雖自慚形穢，卻又有點不忿，我和自己說：在往後的幾年裡，我要洗心革面，重新思考自己是誰，自己的目標是甚麼，以及自己可以做些甚麼。

4）惘然

於是乎我便密集式地出席每星期一次的報社傾莊，傾莊議題很廣泛，包括選舉、醫療、教育、性別、社運、資本主義及大學生文化等等，這些議題我都不熟悉卻又很感興趣，亦覺得它們理應被瞭解。但那時候我總難以進入討論，只好埋首做傾莊紀錄。我想，雖然我與他人起步點不同，暫時我未能夠如其他人般見識廣博、分析獨到，但不要緊，我會努力。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有個朋友給了這樣的一個忠告。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老實說，那時我確實太過下巴輕輕了。人的時間和心力是有限的，它們總有飽和的一刻。花了太多時間來傾莊和看自己感興趣的書，代價是沒有精力早起上課，而且課堂知識遠遠不是我想要的，我漸漸質疑自己曾堅持的抉擇。

晚上又缺少了與朋友相聚的時刻，眾多組聚頻頻缺席；沒時間回家，初時每星期回家一次，後來慢慢變成兩、三個星期才會回家。我不是不愛他們，只是我認為我應該做更有意義的事。

我以為我是明白的，但我也會想家，也會想輕鬆一下，也想和朋友遊山玩水，將江山拋諸腦後。我也以為他們會明白，而我卻不懂得應付父母偶爾洩露的憂心和埋怨，不懂得去適應與朋友漸行漸遠的距離感……與男友的若即若離，或小或大的矛盾衝突，又不其然抽走很大部分的心力去苦惱沮喪。看著面書和電話裡的茫茫人海，我卻不知道能找誰來傾訴。我不是向來討厭有事鍾無豔的人嗎？怎麼到頭來我反倒做了那些人呢？成績出了，GPA 比想像中低了好一大截；我不知道我該用怎樣的秤來量度成績，但此刻我總有點介懷：縱使我不滿意那些課程及考試的設計安排，認為這些科目不值得我去賣靈魂來換取不知所云的 GPA，但它畢竟影響我畢業的 HON（honor），以此分做不同的學位等級），影響我能否讀上研究院。

日積月累地，我看到自己的渺小，感到自己的不可為。在迷霧裡，我常聽見這樣的一句話：「事不關己，己不勞心。自己都未管好自己，你仲有乜資格去理其他人？」

5）我，我……

都已經「洗濕左個頭」，我不想走回頭路，唯有抱著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心態繼續走下去。

然後，機緣巧合下我參加了草媒（民間團體合辦的草根媒體計劃），須留在某個團體實習，其間我遇上一個影響我很深的人。

「當時得好少人讀大學，幾乎只要你一升到上大學，就已經係個中產階級。無論你讀咩系，基本上都唔愁往後嘅財路。好多同年紀嘅人已經非富則貴啦，但係我知道我唔係想要果啲。」

他是該實習團體的負責人，亦是八十年代末上莊的報社老鬼，畢業後沒有走，反而轉折地在不同的民間團體做組織基層的工作，例如組織某條村的居民去抗議政府獨裁的市區重建計劃。他的明眸彷彿表露著「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堅定決心。

面對著懵懂的我，他常說：「入大學就睇多啲書學多啲野啦，慢慢嚟啦，你仲後生。」「諗清楚自己想要啲咩，想做啲咩，想為個社會付出啲咩。」

偶爾我看著他中年發福的背影，在夕陽的映照下，其實就像普通男人一個。但談吐間流露出他淵博的學識（他常自嘲「我唔係讀書人黎架，我睇得好少書架咋，淨係識用書姐」），轉個頭來有街坊走上來，他又隨即變成與之無異的街坊鄰里。他們時說時笑，一時傾下屋企仲有幾多隻粽剩，一時又傾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我看著看著，心裡好生羨慕。我也想做這樣的人。

6）我，我，我……

花了多少個晚上，我在床上輾轉反側，思考以後的去路應何去何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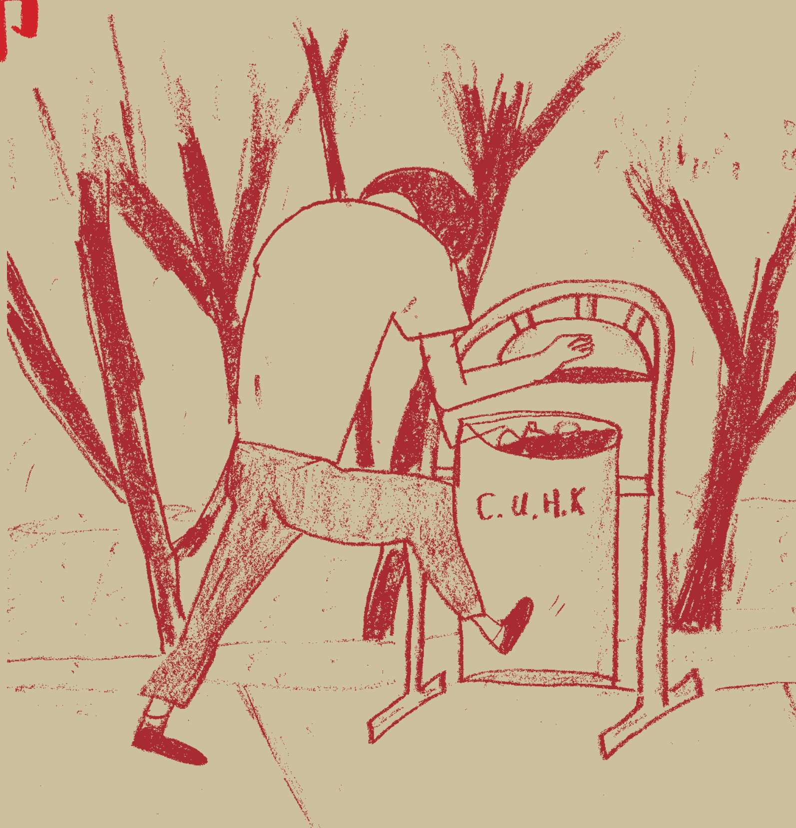
坦白說，我現在仍然未能完全解決那些矛盾困惑。在現代社會，有點矛盾的確難以解決：例如讀哲學的人好像冇咩工可以搵，又例如搞民間團體或社會運動的人，難免遭到打壓，總會食得屎；冇乜人會瞭解你，只會覺得你喺度搞搞震。但係，咁代表我地要因此而退縮？

我唔制。

我不甘願自己生存的意義只限於自己的圈子。養活自己及家人當然重要，但在這之上，還有更多事值得我們去堅持及行動，而我相信我們總能在隙縫之間，擠多一點空間去履行我們的理想、理念。我不想，死了就一了百了，不留下一物的離去，然後社會始終沒有改變過，社會底層繼續被壓迫，不公義的事仍不斷的送上舞台……

我唔制。

校園·日常



前言

◆ 譚焜

「校園」是我們經常使用的詞語。它可以是一個地方、一個圈子、一段記憶，或是一種生活模式。關於校園的日常面貌，可能在每個人心中都有不盡相同的演繹，而校園多姿多采的生活，亦無法在此完整地呈現出來。編輯唯寄望抽取這些零碎文章中的事件和經驗，希望有助我們聚焦校園其中一些「改變」出現的歷史原因，以補充我們對中大校園改變的理解。

因此，本部份嘗試輯錄或撰寫一些不受注目的視角，一連三篇文章從藝文角度概覽中大的文化觀，如〈看似公共的文化中大〉討論中大日漸重視文化藝術，不時新增校園中的公共藝術品，最後反而似是打造了徒有其表的「藝術貨倉」。〈抗議行動藝術拾遺——記另一種中大藝術史〉則指出近年來的校內抗爭行動與藝術其實有著密切關係。最後〈校園藝文地圖〉則詳細記載藝文相關的場所。

另外，校園飲食方面，有幸校友寫下〈頹飯粗略考〉以及〈眾志堂頹飯的沉淪〉，幽默地記載了「頹飯」誕生的緣由。而學術相關的文章，譬如〈中大體育：大學教育〉，訪問前體育部主管，談論到體育在大學體系中的邊緣化和自處。也有〈好彩有CUTS——訪問開發者Benson〉和〈唔講都唔知——網上學習平台改革〉，記錄校園資訊平台的發展與變遷。亦有〈數碼化的中途——記中大圖書館十年發展〉，借訪問圖書館職員及官方資料，記錄了圖書館邁向數碼化的十年發展。

看見校園與藝術
——校園藝術小輯前言

洪曉嫻

中大人每日經過的新民主女神像、烽火台上佇立的《仲門》，皆是藝術作品；新亞小百萬上的六四藝術裝置、池旁路上「保樹立人」的塗鴉、反國際化的「哭中大」橫額，也是藝術的反抗；還有無數在邵逸夫堂、文物館、圖書館、誠明館裡的表演和展覽，也是藝術的一部分。中大校園內的藝術拈手可見，但我們總是匆匆路過，未有停下來細看，或是，未有細意藝術於校園的意義。

近十年校園依然熾熱與寂寞，畢業於中大藝術系的阿三寫〈看似公共的文化中大〉，細談十年間校園裡湧現的「公共藝術」，人像與壁畫處處，卻如中大愈見畸零喧嘩的新教學樓一樣，與空間斷裂連繫，令草坪與喘息空間成為「藝術暫停貨倉」，所謂的公共藝術作品沒有加深校園裡的藝術氣息。而K的〈抗議行動藝術拾遺——記另一種中大藝術史〉反其道而行，由抗爭出發，列舉近年以藝術行動作為抗爭方法的例子，反對校巴收費、保護烽火台及反對劉遵義等由下而上的民主抗爭，不約而同地運用藝術媒介作回應及反抗校政之用，當中既見創意亦見藝術的力量——對話與延伸，在傳統示威手段以外，我們還有更多表達異議的方法。

〈中大校園藝文地圖〉嘗試找尋這座山城大學裡的藝文空間和活動、組織和發生（happenings），展開一幅官民並存的藝文地圖，從小型音樂會讀書會到博群書節，藝文人事的點與線，在校園裡交織結聚。當中必然有紕漏之處，但集結成圖，是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我們有更多的力氣去開啟中大裡的藝文空間，共同構建更繽紛的校園藝術氛圍。

在校園日常裡編一個關於校園藝術的小輯，不談及專業的藝術訓練，倒是談及抗爭與雕塑，因為藝術就在日常之中，不單是上而下的建構和意志反映，也是身處其中的每個人，可共同改變、創造和爭奪的場域。

看似公共的文化中大

阿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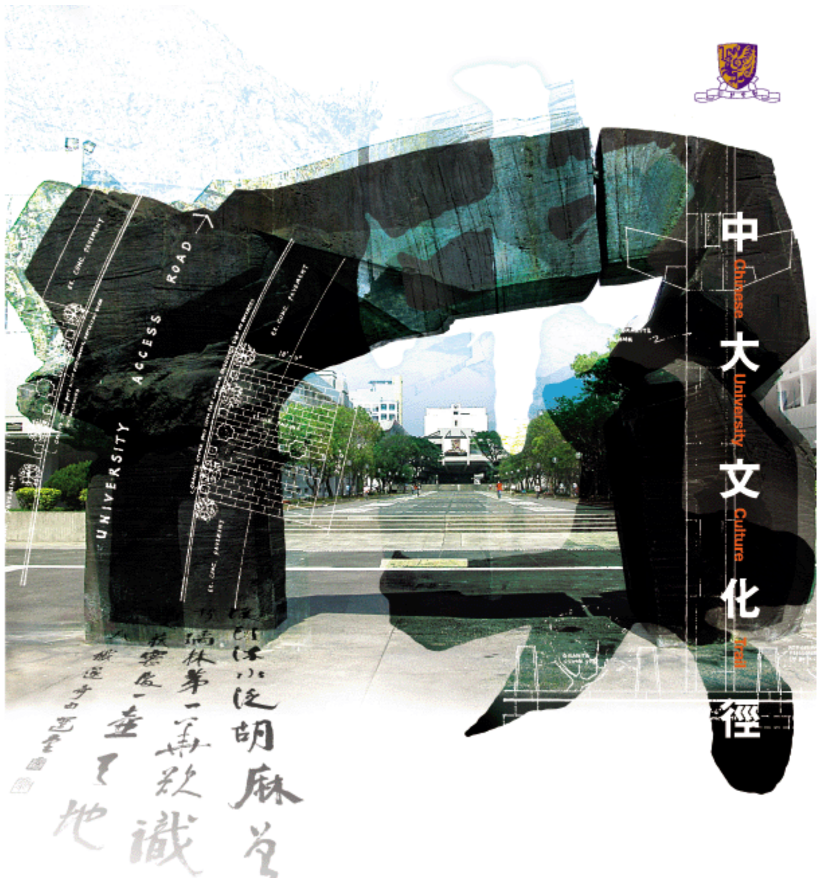
時移世易，轉變的確比我們想像快。九十年代我們在新亞書院水塔下學習，舊式校巴膠製不分座位的綠長櫈常被烈日煎如熱鍋，身懷CALL機的師生不算太多。藝術系老師給我們當藝術家的憧憬，但藝壇在哪裡我們看不見，怎樣才可成為全職創作人我們又不知道。自千禧前後，大量藝術學院畢業生散駐工廈，即使各自艱苦打造自己的藝術事業，香港藝術終於是個觸摸到的概念，個別新生代藝術家更蜚聲國際。七、八十年代畢業的師兄師姐，不禁覺得年輕人十分幸福，他們那個時代，多選擇任職教師或設計一類工作。

我城到校園，忽然文化

或是西九效應，或是回歸後香港意識的普遍醒覺，又或是香港經歷一次又一次的經濟挫敗，我們開始學會反問，除了金錢拼搏，生活還應該有甚麼？公營機構及商業財團開始向藝術創作人招手，東涌公共屋村、政府公營機構大樓、地鐵沿線各站，及大小商場紛紛樹立藝術作品，計劃此起彼落，報章雜誌電視網絡不時出現我們朋友熟悉的臉孔。我城忽然文化，儘管公眾仍懷疑從事藝術工作的生計問題，另一邊藝術文化連小學生都懂得說了。中大校園不經不覺亦起了巨變，不論建築地貌或公共藝術作品的設置，越來越多。雕塑、造像或公共藝術作品過半於千禧之後樹立，甚至，我們擁有《中大文化徑》這本「香港唯一的大學文化景點手冊」。我們不能否定整理資料編定路線的用心，或者當代建築設計的輝煌獨特，然而，重回母校似乎迷路般穿梭新舊交雜的大樓，我們總有點不能疏解眼前滿佈衝突的環境。未有文化徑的概念，中大本好好的已遍地文化；而按圖索驥追尋中大文化之路，中大學生又是否浸淫在歷史的沉澱與文化素養的學習環境之中？

意義，從不是空降植入

藝術作品離開藝術館或畫廊等特定場域，現身於公眾地方，已不能純以行內術語開展話語。美化，是原始不過的藝術功能。古往今來鑽進人群裡的藝術作品，取決條件是吸引眼球，及街坊小市民的認同。作品採用的藝術形式，除展現專業手藝，亦是作品內在意義的一部分。質樸粗獷的原校園建築，與朱銘以發泡膠製模的《仲門》同出一轍，不



2011年中大文化徑導遊團海報

得不承認，位處鄉郊山頭的中大出名從頭到尾一個「土」字。作品融入日常生活，是環境、社區、地域、城市以至國家文化中不能分割的部分；作品陪伴人們成長，見證世代輪替，它才能與文化身份認同產生關係。意義，從不是空降植入，它需要在地人們的參與，及時間的發酵。「公共藝術」這概念所指的大概如此，不過此命名是後來的事了。

山城，尚有空間的藝術貨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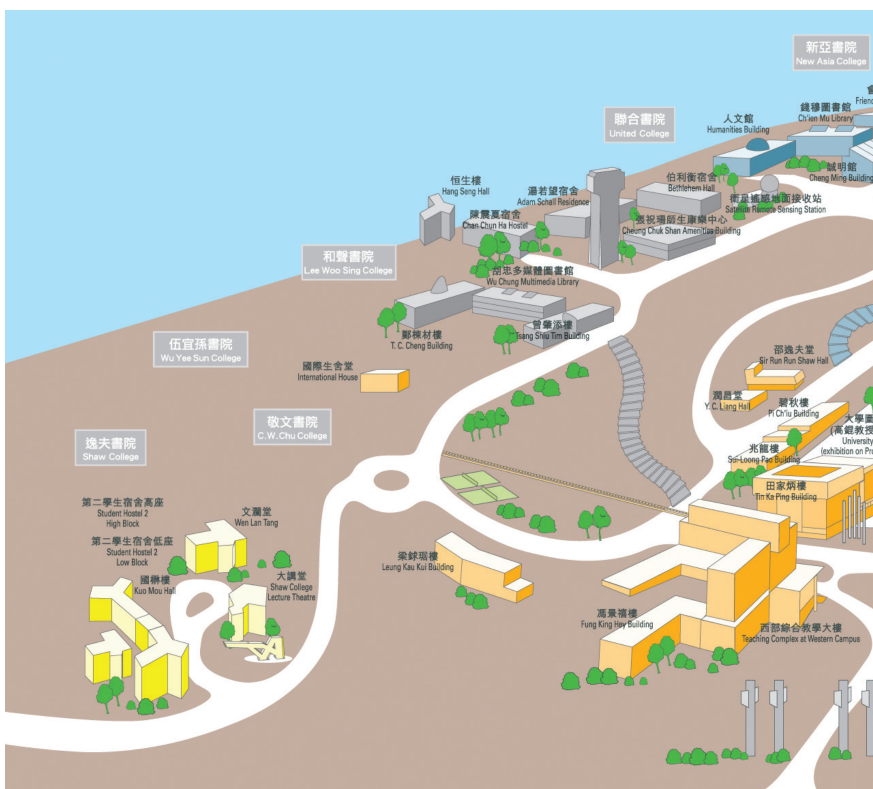
大學，並非一般公眾地方。學生在短短三數年間停留，是知識追尋與鑽研、檢視自身認清未來的提煉。校園環境不是純粹夠不夠用的功能盒子或多收幾個學生的硬件工具，它是塑造人文素養奠定學者風骨的地方，讓學生隨意逗留、沉思、交流、浸淫，或嬉鬧、建立友誼、爭辯吵架，及怡情養性的空間。可是，自大學彷彿無限擴充學額，工程此起彼落，坊間瘋傳會賺大錢的自負盈虧研究院課程吸納更多在職人士重返學院。山城，已不再是山城。插針式樓房堵塞呼吸的通道，新創立小得可憐的書院毫無個性地成為中大一員。逸夫科學大樓玻璃外牆色彩繽紛，卻耀眼得蓋過原中大的風貌；文物館新翼既典雅又新穎，但無法說服觀眾，新、舊大樓同是文物館

的範圍。難以消化的密集及不協調風景成為現時中大的特色。校友不是懷緬過去的老古董，我們尚記得中大合併書院創校的歷史；擴充、發展無傷大雅，只是，回歸後的規劃思維打碎了中大人的感情記憶。

1998年，新亞書院沒有公眾討論就在草坪樹立孔子像，假山假石惺惺作態。我們在不同的中國藝術史課或山水花鳥創作坊，認識的孔儒學說，總不能與眼前的造像接軌。後來，2009年唐君毅像出現，2011年李展輝光亮現代的雕塑贈予書院，草坪難道是尚有空間的貨倉，有空間就能放嗎？誠然，不少中大雕塑來自名家，文樓、朱達誠、劉小康及何兆基等，可是欠缺公共藝術概念與整體規劃，削弱了優秀作品應有的公共力量。

公共藝術，民眾參與

到底，每一件公共藝術的設置經過怎樣的程序，又是誰提供專業意見，最後定案？吳為山在2004至2009年前後，製作過錢穆像、李卓敏像、楊振寧像及高錕像，另一邊廂，逸夫書院邀請了香港壁畫學會設計及製作的類中學水平壁畫，2010年又在天涯海角的逸夫草坪安放複製的孫中山像。自傲與國際看齊的香港，並沒有台灣的「公共藝術設置辦法」法令，規定公營建築群的公共藝術所佔比率，及公開的徵集辦法。例如，2013年10月台灣大學依法徵集全校公共藝術第一期設置，指明「期望以此做為示範案，引動臺大校園教職員師生對於公共藝術不同的視野與想像」，除收集藝術家創作計劃書外，亦訂立公眾參與部分，冀能達至「具深度民眾參與



大埔公路　Tai Po Road

的公共藝術計劃」。公共藝術作品在中大校園裡一件又一件出現，誠如新式大樓落成的魅影，作品策劃好像跟我們沒有關係，那麼，歸屬感與身份認同又何以空穴來風地萌生？

2010年，新民主女神像事件鬧大，終在深宵時份二千多中大人護送下落戶中大，行動的確教人感動。不過，諷刺的是，中大人眾志成城熱血滿盈獻身擁護的卻是個劣質雕像。資深藝術評論人何慶基在報上撰文，深入淺出從藝術角度逐點分析該民女造形姿勢的問題，及製作人不理解原神像的象徵意味，更明言民女要立，但立的不是這個。現在，每逢從大學站進入中大，劣質民女就「篤眼篤鼻」昂首歡迎。

中港文化矛盾醞釀社會分化危機，我們不欲如國內城市財大氣粗在廣場商店空降龐然大物說是文化表徵，但香港人是否絕對文明進步？在公共藝術的策劃、構思與製作過程上，肯定要急起直追。那麼，中大人怎樣建立由我們共同建立的文化校園？按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天人合一論」思想及吐露港海景而設計的「合一亭」，絕妙地以建築視覺效果體現天命與人生的哲人智慧，打造讓人遠眺吐露冥思的人文環境，成為新時代公共藝術的代表。途徑馬料水一帶，環觀猶如變形金剛的山城，我們尚清晰看見一方一圓的水塔糾正矗立，見證中大數十年來的變遷。水塔在看，我們在做。



「中大文化徑／樂步健行校園」導遊團路線圖導遊團海報

中大五十．校園公共空間裡的藝術

位置	作品名稱	製作人	年份
本部			
正門	華表（榜木）	不詳	石圖則為1974
圖書館外	仲門（烽火台）	朱銘	1987
圖書館參考圖書館	饒宗頤像	吳為山	2009
圖書館參考圖書館	但丁像	意大利政府	不詳
中國文化研究所	李卓敏像	吳為山	2004
邵逸夫夫人樓天台花園	楊振寧像	吳為山	2007
邵逸夫堂	千年雲水、十載磨劍	劉小康	2001
校友園	校友園紀念座	不詳	2003
馮景禧樓	馮景禧像	不詳	不詳
何善衡工程學大樓外	高錕像	吳為山	2009
新亞書院			
水塔下	孔子像	不詳	1998
草坪	唐君毅像	朱達誠創作 余英時撰 李潤桓書	2009
草坪	萬象	李展輝	2011
知行及學思樓前	鐘樓	不詳	不詳
學思樓牆外	壁畫	不詳	不詳
錢穆圖書館地下	錢穆像	吳為山	2004
學思樓與知行樓之間	合一亭	設計不詳，李潤恒墨寶，唐錦騰印	1996
聯合書院			
雕塑園（草坪）	光輝聯合人	韓秉華	1989
雕塑園（草坪）	調	何兆基	1995
雕塑園（草坪）	終極秩序	何兆基	1995
雕塑園（草坪）	開放	文樓	1992
書院學生活動中心旁邊	明德壁	常宗豪書	1996
逸夫書院			
書院講堂外	逸夫台（女人腳）	不詳	約1987
書院講堂外	壁畫	香港壁畫，ADC贊助	不詳
草坪	孫中山像	孫穗芳	2010
崇基書院			
小橋樓水	椅子（已拆）	建築系學生	1998-1999
何添樓牆外	校徽圖誌	李僑華創作	不詳
利黃瑤璧平台	五十飛翔塑像	不詳	2003
校巴站對面	哲徑	不詳	1959
嶺南運動場	崇基（地標）	崇基校友	1983
眾志堂後草坪	勞動光榮	不詳	不詳
牟路思怡圖書館旁草地	「众」字雕塑	不詳	2003
許讓成樓地下	許讓成像	不詳	不詳
李慧珍樓	李冠替像	不詳	不詳
火車站廣場	民主女神像	陳維明	2011

抗議行動藝術拾遺
——記另一種中大藝術史

K

近年香港文藝跟公共空間的爭奪和政治抗議愈走愈近，如2010年一連串反高鐵的示威行動中，有二十六步一跪的「苦行」行列；2011年匿名的「塗鴉少女」在國金中心、星光大道等公共地方噴下「Who's afraid of Ai Wei Wei」的塗鴉，令警方出動重案組調查；2012年第十屆社會運動電影節選擇在中環匯豐銀行總行地下播放電影Money as Debt，放映中途遭到匯豐保安人員粗暴打壓。先不論藝術質素，這些事例或多或少也引起了社會迴響，擴闊了社會運動形式方面的界限，令喜歡投入藝術創作的人知道自己也有位置，能發揮所長；另一方面，藝術離開畫廊或藝文圈子共構的安全網，赤裸面對日常空間政治社會中，種種權力的操作和打壓、大眾的反響和美學，刺激泛藝術行動者反思自身。

這十年來，中大學生針對教學、校園規劃、基層勞工等議題的抗議行動當中，除了能看見一些傳統示威方法（聯署、集會、嗌咪、寫橫額等），其實也有類似的藝術行為，突襲校園的日常生活空間。正規地書寫文化藝術歷史，這類型的創作未必會有機會被記載，然而《中大五十年》則決定翻查一些舊資料，羅列部份例子，並嘗試以文藝的框架去理解，讓大家看看另一種「藝術」的可能：

2007 「巴・不得」行動：「抗議車票」和dem beat示威

2007年9月，中大新學期開始實施校巴新收費：未能出示有效的中大學生通或教職員證者，均被劃分為「校外人士」，在登車時須付車費3元。這不但使司機花時間檢查證件，校巴站長龍變得更長，也令所有非由中大直接聘請的員工，例如在地盤、飯堂、書店、百佳超級市場工作的，須繳付「校外人士」的車費，無疑增添基層員工的經濟負擔。一班不滿的同學於是發起「巴・不得」行動（Free Rider Action）抗議新措施。

「巴・不得」設計了一款黃色的「抗議車票」，在火車站派發，呼籲反對校方的人把它投進車費收集箱，巧妙地將付費的行為變成抗議的行動，令本來在火車站匆匆而過、或只被動地接收宣傳單張的中大人，有機會主動地選擇參與和表態。此外，他們也作了幾節示威

beat，向著行政樓表演dem beat：

你班高層齋講錢
員工受苦點算先
每日六蚊俾到癲
今日抵俾我哋片

啱啱行過火車站
同學等車等到喊
點解上車咁鬼慢
皆因check證好麻煩

校巴翳焗唔通風
車程不過五分鐘
來回六蚊肉都痛
外判工人點返工

中大專熔外判工
搭車要有中大通
步行校園無鬼用
行上行落腳都痛

大家都係中大人
點解你要焓基層
工友人工好鬼「un」
竟然仲要收三蚊

校長人工百幾萬
三蚊車費有幾閑
工友生活咁艱難
點解仲要同佢爭

交通安排好鬼摺
車費加左無津貼
亂咁加價好作孽
全無良心真係cheap

Dem beat是迎新營「片」人的遊戲、各系／書院細組的團結行為以及平時學生團體的宣傳工具，只會在大學校園出現，大家都知道dem beat的用字一定要是押韻和易上口，更重要的是，要夠「爆」；「巴・不得」就好好利用



2008/09年 烽火台的「膠樽怪獸」





2010年民女事件，抗議政治中立（寫圍板、塗白烽火台）

了dem　beat這個大家見慣見熟的表演形式，beat詞裡則填上了大家未必知道的學生和工友心聲。而且dem　beat跟叫口號不同，表演者除了要大聲叫喊，身體也要跟一個拍子做出誇張動作和猛力踏地，聲音響亮，有利於需要吸引盡量多途人注目的示威行動。

2008/2009 烽火台的「膠樽怪獸」

2008年末，校方被揭發以擴建中央校園的圖書館為由，計劃拆掉門前的烽火台，引來很多師生和校友反對，反對者於是組織了一連串抗議行動，當時在任的劉遵義校長就成為眾矢之的。那時烽火台可謂烽煙四起，各團體在那兒辦過電影會、大型集會、公開論壇、黃絲帶行動，台上黑色銅鑄雕塑《仲門》除了掛著手寫橫額，旁邊還有一個由同學做的大型膠樽怪物，攀附著莊嚴的《仲門》，名為「膠遵怪獸」。事源惹起烽火的劉校長有一個學生起的花名，叫「膠樽義」，論壇裡有同學就提出一個食字的「膠樽義務回收計劃」，公開收集大量膠樽，希望「一人一樽」抗議校長，指「膠樽回收，是義務的重提，是一份日常的堅持，是在校長劉遵義要丟棄歷史現場，要中大人忘掉社會參與、公共生活、大學價值之時，一個認真的宣告。」[1]同學們的這一份「認真」，最終製成這一件由竹枝、膠紙和幾百個七彩繽紛的膠樽組成的作品。

用廢物做藝術，早已不是新鮮事，但這「膠遵怪獸」的厲害之處，既在於製作過程，牽涉了很多同學的參與（「一人一樽」），能聚集同學發洩出來的怨

氣，也在於位置——它坐落於抗爭行動的核心地點，每一個經過百萬大道的人都會看到。而且這隻很不「正經」的怪獸，就在很正經的圖書館和很多校方高層出出入入的行政樓附近，可以想像它有多挑釁。2009年甚至有同學投了一篇藝評到學生報，花了近二千字分析它的當代藝術美學……[2]

2012 「血染星巴克」行為藝術

2012年10月，位於善衡書院餐廳、美心旗下的Petit Café正式開張，售賣星巴克（Starbucks）咖啡，中大學生會幹事會和學生報的成員表示關注並組成「反星巴克行動」，向同學派發〈星巴黑紀錄〉批評其營商手法及在善衡宿舍洗樓宣傳，希望同學在善衡學生會辦的公投裡投下反對票，令Petit Café的星巴克咖啡產品下架。當時關於公平貿易和學生會權力的爭議不斷，「反星巴克行動」最後並沒有得到很多善衡同學支持。

他們其中一個頗具爭議性的抗議行動，是在10月16日趁善衡的全宿共膳時段，於咖啡店前做了場「血染星巴克」行為藝術——四個同學穿著白色上衣，用白布蒙著雙眼，坐在地上用星巴克膠杯喝紅色飲料（甜醬），從口裡漏出來的「血」都染在白色上衣，同時旁邊有支援的同學派發反星巴克的刊物。辦這一場行為藝術的同學希望能形象化消費者的盲目，以及星巴克作為一間無良企業的暴力，反對企業剝削第三世界的農民。據有份參與表演的同學說，當時一些同學表示反感和受驚，有人甚至說害怕會有真血噴出來，同時有同學認為他們「太激進」和「阻礙同學吃飯」，此舉似乎真的不太受善衡同學歡迎。另一方面，反星巴克行動的成員則強調此行為藝術與社會現實的扣連：「其實我地無誇張到，飲Starbucks同飲農民啲血有咩分別啊？我地唔係淨係嘩眾取寵，係有野想同同學表達。同埋，其實啲血甜到嘔，做行為藝術嘅幾位同學仲要事先排練幾次，佢地做完之後話，個口麻痺左一日，食咩都無味。」[3]



2012年「血染星巴克」行為藝術

結語

上述的行為，基本上全都不屬於我們一般理解的、傳統高雅藝術的範疇。比起形式上美不美觀的問題，發起人更關心的，似乎是創作行為能否傳達訊息和引起觀者的即時反應。於是，在物料的考慮上，便宜的、能隨手拿來但能配合主題的物料就較合適，例如「膠遵怪獸」就是由很便宜很普通的膠樽推砌而成，

而非一般雕塑藝術用的銅、石膏和木材；而在表達方法上，同學就利用了流行文化的元素，例如「巴．不得」的示威dem beat就融入了校園環境，吸引平時會留意這類表演的同學駐足。

它們並非一個人在家／工作室裡創作，然後放進展覽廳展示就能完成的事，反之，它們需要創作者以外的群眾集體參與，希望有面對面的直接交流，選址因而非常重要——火車站、烽火台、善衡飯堂都是人流頗多的地方，是所有學校成員的日常生活空間，而非文物館、圖書館展廳、新亞許氏文化館等學校成員較少經過和停留的正規文藝展覽空間。至於「激進」、「不潔」、「很滋擾」之類的批評，既顯示一些觀眾不認同突如其來的表演行為，甚至不認同行動背後的理念，另一方面就反映出，創作者是想故意挑起不安，令原來很順眼的地方突然變得礙眼，暫時扭轉了空間的用途（如餐廳變成了表演場地），引人爭議。

文章裡橫跨五年的三個例子，採用了不同的媒介（文字、聲音、物件、身體等），以引人注目的藝術方式介入抗議行動，或許不算特別成熟，但這些同學的嘗試累積下來，就會讓我們見到更多表達異議的方法。一場抗議行動，總需各式各樣的工作相輔相成。充足的論述理據之外，文藝創作之角色，大概就是設置一些「引爆點」，生動地將某些不合理的權力關係形象化，讓群眾留意到該議題有多貼身。而在藝術、或純粹行動的角度，其意義除了外緣的效果外，也包括行動者踏出自己的框框，直接將身體、作品或想法，拋置於開放的公共場域，並從各方的反饋中，找到可能的刺激、力量，或自省的必要。

1 eg9515〈膠遵怪獸抗議拆烽火台〉，香港獨立媒體，2008年12月4日。

2 鬆弛熊〈【學生投稿】藝評「膠遵怪獸」〉，《中大學生報》。

3 南書〈訪問反星巴克行動〉，《中大學生報》。

2010年反大類招生（藝術不再新亞、畢業展抗議）




校園藝文地圖
中大藝術 (每年六月)
聯合國術會
聯合劇社
博群電影節 (戶外放映)
UC Band
深夜的百萬大道 有人臥躺觀星 也有人思辯哲理
① 草地音樂會
Shaw Band
逸夫劇社
③
書寫力量
吐露詩社
文宗節 (每年十月)
香港文學研究中心
香港文學特藏
中大青年文學獎協會
文化眾讀
香港國際詩歌之夜 ④
中大合唱團
中大攝影學會曾擁黑房，但自04年缺莊至今
Book Picnic ⑥
書店聯絡委員會
校門草地 風涼水冷 是晨運練習的好地方
Mcd Can出名之處 不在擁樓批，而在師傅用刀背在批上剔「十」字的一雙巧手
1
2
3
7
索引
戶外/公共雕塑 (詳見前文及附表)
1 - 7 大型場地、重點公共空間
① - ⑦ 編輯選按活動


末日重生
剩食嘉年華
本土藝術資料中心
新亞國術會
新亞合唱團
新亞國樂團
新亞劇社
03年一對小情侶，在孔子像下寫下山盟海誓，重新翻起新亞精神失落的爭論
中大劇坊
夜晚，MMW七樓的反光玻璃前，男男女女排戲練舞
博群大講堂
書節、劇場、講座等
冷血話比賽
藝術行政主任辦公室
電影學會
書院劇賽、各大歌唱比賽、午間音樂會等
動漫研
崇基劇社
Dan So
建築及視藝展覽
②
社運電影節
建築學圖書館
博群花節、音樂會
女工合作社
⑦
防止自責委員會
池畔音樂會
①
基督徒樂隊
崇基合唱團
⑤
民化空間藝術節
戲曲資料中心
崇基管樂團
崇基管弦樂團
崇基攝影學會

頹飯粗略考

henryporter

原刊於「無神論者的巴別塔」個人網誌，2006年11月7日

雖然早從思考口中聽到逸夫書院飯堂名正言順打著「頹飯餐」的消息，沒想到最後會成為新聞在蘋果直接刊登出來！不過一看附圖的餐牌，不禁想學《開心主流派》的曾志偉爆一句：「咁都叫頹飯？有無搞～錯！？」

每間大學都可能會有自己的「頹飯文化」，但在中文大學能稱之為「頹飯」，兩個共通條件是少不免的：一為價錢應為一眾飯類的便宜之冠；二為用料粗劣或欠特色，至於是否使用單手湯匙來進食，應不在條件之列。圖中所列的「頹飯餐」價錢竟達15元之譜，故除10元的魚香茄子飯以外全部可謂「不合格」；最諷刺的是下面的紙牌供購買「頹飯」的同學加3元換購紅豆冰或雜果涼粉冰——若進餐能享用如此奢侈的特飲，「頹飯」還能稱之為「頹飯」嗎？

「頹飯」之出現，是盡量以低成本來壓低售價的成品，為的是照顧一班貧困學生，故品質當然只會在「僅能入口」的水平；而「頹飯」的用膳者多為生活水平比貧窮線稍高（更低的連「頹飯」也吃不起，會轉攻杯麵和即食麵），進食只為填飽肚子而無甚要求，故一切省錢為上。而由於欠變化而味道不佳，長期進食就算不理營養問題，心理上也會間斷性出現沮喪、頹廢的感覺——若果菜色精緻得讓你擁有飽嚐美食的溫暖感覺，已不堪稱之為「頹」了。

回憶篇

未有認真考究中大「頹飯」的歷史，有人說此乃源自崇基眾志飯堂九元七角的餐肉雙旦飯，然而真實性存疑；以個人第一身經歷而言，90年代末期范克廉樓學生食堂（現已易手）的「中式快餐」和「西式快餐」（簡稱中快或西快）可謂頹飯的典型例子。雖然菜色花款算是略有變化，可是本座實在很佩服當時的飯堂負責人如何挑戰飲食極限：如栗米肉粒飯的難吃程度讓人賦予「栗米豬餿飯」之別名；「中快」「西快」雖具餐飲之名，但當你碰到「君子之交」可樂、「沙塵滾滾」豆漿和「壁壘分明」栗米湯（水歸水、栗米漿歸栗米漿）時，你會發覺有無這些附送其實差不了多少。每碟「中快」「西快」皆會夾些「時菜」給你，但自從親眼見到朋友那堆「時

菜」有甲由之後，本座已養成「唔該唔愛菜」的習慣。

崇基眾志飯堂和「范記」樓下的Snack Bar則為另一種類的「頹飯」。論食物水準，其實並不俗，但若光顧最平的10元飯餐又不要那些「頹炒飯」，材料上就只有餐肉、香腸、火腿和雙蛋之間的配搭作選擇，一天兩餐皆進食「頹飯」的話就只能在餐蛋、腸蛋、腿蛋、餐腸、餐腿、腸腿之間不停重複，本座稱之為「頹飯之地獄輪迴」。

「頹飯」三吊詭

有時食「頹飯」吃到人也頹掉，也會產生一些自毀傾向，如乾脆每天吃「四蛋飯」，吃到膽固醇過高爆血管死掉算了——但聽聞食堂方面的人是會拒絕「四蛋飯」的要求，而強迫學生必須配搭進食，但「四餐飯」、「四腸飯」則不在此限——難道因為煎蛋的成本較高？

Snack Bar 和崇基眾志飯堂同樣有「頹飯」供應，但不知為何， Snack Bar 的「頹飯」要比眾志的「頹飯」貴上五毛，令付錢時十分不便——難道Snack Bar的「頹飯」特別矜貴？

另外眾志餐牌上的「時菜蛋」飯是第三個吊詭：和「中快」「西快」一樣，眾志的「頹飯」是有「時菜」奉送的，而若要求「多菜」的話也會酌量加給你，但「時菜蛋」飯除了多一點菜以外，雞蛋卻仍維持兩隻，這不是明目張膽的「搵笨」嗎？但以本座所見，惠顧「時菜蛋」飯的卻大不乏人，不知原因為何？

頹飯之霸者

「頹飯」本來是最經濟實惠的選擇，可是還是有班「死不執輸」的人要將這十元八塊的功用發揮至極限：為滿足大食的同學，各中大飯堂通常都容許「多飯」，這樣的話吃「頹炒飯」當然有著數，但若吃「輪迴頹飯」則只能「乾哽」一大堆白飯，似自虐多過進食。於是有些面皮特厚的同學在領取「頹飯」的同時，便要求廚師「多飯多菜多汁」，一次過滿足三個願望，可謂「頹飯中的霸者」。

小結

既然「頹飯」那麼頹，為何還要堅持吃下去？雖說「頹飯」與「非頹飯」其實只是差個十元八塊而已，但從比例來說，卻是150%～200%之比！每當心想：「把香腸換成豬扒要加多一半價錢」、「一個客飯可以買兩客……不，差不多三客『頹飯』」的時候，很自然就會側向「頹」的一方——這就是「頹飯」魔力。

近年多往崇基眾志飯堂用膳，在收銀機前也曾幾次聽見有人公然說出「想買一個頹飯」之類的說話，而這時收銀員此時多會以「想食咩飯話？」以作回應，其實她們怎會不知「頹飯」的意思，不過只是想為食堂的食物保持最後的一點尊嚴罷了。

後話：說起「食在中大」，還沒提「夜光黃咖哩汁」、「新亞、聯合飯堂鼠患」，聽說回來的「新亞頑石焗飯」等等真的三天三夜說不完，看看遲點會否有時間再寫吧（通常寫得出呢句即係唔會再寫……），也歡迎各中大校友、大專界人士就「頹飯」歷史作出修訂或補完。

眾志堂「頹飯」的沉淪

henryporter

原刊於〈無神論者的巴別塔〉個人網誌，2007年9月22日

本年度眾志飯堂由君好海鮮酒家接手，花費一個暑假進行裝修後重開，駭然發覺過往眾志堂的「台柱」消失於餐牌中。後來幾經查察下才得知現在「頹飯」已成為學期間才推出的「季節性食品」，這明顯是逼在暑假仍須上班的中大員工「捱貴飯」……這使得本座想起了早前中大針對外判員工徵收車資事件：限制「頹飯」供應期，不正是對中大所有需要在暑假回校的非學生成員一種「歧視」嗎？

不過已「餓到出汁」的本座已沒有心情理會這個可能永無完結的論爭了，就趁今天直接殺去眾志堂來個「實地考察」。其實除了限制供應期，眾志堂新承辦商已惹了不少流言，例如故意不把「頹飯」和其他低於15元的飯款張貼於餐牌上，要顧客親自詢問才有，甚至有指原本新承辦商就乾脆取消頹飯，只是經不起學生與工友的質詢才勉為其難復再推出云云。

但持平點說，消息也不是一面倒負面的，好像前一兩天就從同學口中聽過「頹飯」出現了叫「五味飯」的花樣，合有餐、腸、腿、蛋、菜（街上又有一稱號謂「西洋四寶飯」）飯、汁，以前一直希望「柯打」卻怕被阿嬸的夢幻之飯，終於有機會一嚐了！今天特地去眾志，部份原因也是衝著這十元「五味飯」而來。

不過一到眾志堂立時要面對一個震怒的事實：「特價飯」政策又有更動，售價10元的「頹飯」就當天指定的一款，甚麼餐腸、餐蛋飯一律停售，不吃罷就！本座在收銀機台上詢問不果，心想「有無可能連餐肉火腿都會缺貨」，徑自走往廚房一看，發覺大堆餐腿蛋腸四寶依舊健在，就是不賣「頹飯」給你，吹咩！剩下沒有選擇的免牛飯，倒了一殼





有如西湖牛肉羹般稀的「潺」在飯上就算，就算你叫「多汁」，阿姐也只會面黑的加一啖給你，倒有點《監獄風雲》的風情。

記得上一手經營者的時代，除了「四寶雙併」頹飯外，還會附加兩三款「頹炒飯炒粉」供顧客「頹」得來也有點選擇；但現在呢？本座認為，這種「囚犯」級的待遇針對的，是新眾志今年推出的「扒飯餐」銷量不振的問題。價值15元的扒飯餐基本上和過去的「頹飯」是差不多的，分別只在於你可以牛扒、豬扒、魚柳等「高級配料」作為其中一種選擇。可是在學生眼中，兩塊餐肉和一塊牛扒的分別，難道會大得過10元和15元之比？平價飯既導致貴價飯沒人買，商家就只得不停拉遠兩者的質素，削減你的選擇，迫人放棄「頹飯」而轉投其他售價昂貴產品的懷抱。

或許寫到這裡，有些「憎人富貴厭人貧」的看倌就會發炮：「想食好野就比多D錢啦！而家百物騰貴，比得果10蚊，唔比垃圾你食已算俾面，我Office樓下XXYYZZ……」對於閣下餐廳的價錢和水準，本座其實沒有多大興趣，反而想問：「為何上一手能賣，新經營者不能？為何本部Snack Bar的『頹飯』仍然那麼好吃、好賣？」歸根究柢，原來又和我們偉大的中大校方政策有關。

話說崇基飯堂今年公開投標，中標者其中一項「偉大建設」，就是將眾志堂飯堂的牆壁全面翻新，再加上換椅、其他修繕和部件雜費，竟要花二百萬之多。不過這個好不容易奪得的經營權，卻在兩年後又會重新招標，換言之，若兩年後失去經營權，兩年間每月投入的平均資本仍可達10萬。為了迅速歸本（兼賺取鉅利），自不然要全力催谷每位顧客的平均消費，而這才是扼殺「頹飯」的真正原因！當明白若「頹飯」顧客放棄食頹飯而轉攻其他15元的產品，每位的毛利隨即激增50%——不要忘記，高價食品邊際利潤比頹飯可高出多少倍？

裝修後的眾志堂觀感是改善了，但當每一塊高級柚木牆面、那部只為播放餐單號碼與沒人看的崇基廣告的超豪42寸LCD電視，最後都會反映在餐牌價錢的時候，我們這班學生和工友，難道不能對此質疑一下？你若問可以怎辦，本座的答案是：「我只想要回舊的眾志飯堂。」

從現實考慮，學生飯堂的服務對象是學生和工友（教職員餐廳只屬位高者的玩意），免租政策也是希望經營者能將節省的成本，轉化成優惠讓他們享受，而平價的「頹飯」可謂這種德政的最佳作品。從精神層面來說，「頹飯」不單是

我們的集體回憶，更是中大一種儉樸精神的投映，一種把學術、追求知識放在首位的象徵，讓所有人知道中文大學不是一座商場、不是一個旅遊景點，更不是一間學店，而是一間大學。

可是崇基膳食委員那班只會在Staff Can飲茶、馬會百勝廳用膳的官僚，自然不會理會這些；對他們來說，一個裝潢漂亮、設備先進的飯堂，遠比用膳的最低消費由10元加至15元重要。一葉知秋，崇基「頹飯」的淪落，可讓各位了解中大官僚對中大校園發展的思維，其實早與群眾和現實脫節。

後記

臨走前遇到一班「搭檯」的工友，其中一位因想節省數元，不買「兩餸飯」而改要十多元的「單餸飯」，結果換來一碟只得兩小片蘿蔔、兩小塊牛腩，連小學生也不可能吃得飽的飯。那位可憐工友的同事不值飯堂的「侮辱性」行為，直接走去與當時負責「筆飯」的經理理論：

工友：「得果咁少飯同餸你叫人點食？」

經理：「公司規矩係咁。」

工友：「你叫你老闆同我講！」

經理：「我唔識我老闆。」

工友：「咁你叫個話得事既人黎！」

經理：「一係等我放工我搵佢同你慢慢傾。」

工友：「放工乜都食完啦！你係咪玩野！」

經理：「大家都響中大做野，比下面好喎。」

工友：「比下面係咪就唔駛比錢！我X你老X！」

經理：「……（屈服）……」

觀此情景，本座一面痛快於新經營者為求利潤最大化的貪心嘴臉（幾啖飯、幾件牛腩蘿蔔都要剝削！），一面卻痛恨自己不夠工友同事惡，向經理質詢不賣10蚊餐蛋飯的居心。如此想著想著，看回那兜本座只吃得下半碟的「滑蛋免牛潺」，不禁愈食愈頹，「頹飯」的真意，我體會到了……



中大體育 · 大學教育

李峻嶸

2012年，香港中文大學的本科課程恢復四年制。因應「三改四」，本科課程自然進行大幅度改革。主修科、通識科和語文的學分都有所增加，唯獨是體育科的必修學分仍然維持在兩分。談及此事時，中大體育部主任盧遠昌先生說體育部同事之間也有談過是否可借機增加體育課程的份量，但最後並沒有向校方正式提出建議：「中文又要加（學分）；英文又要加；通識又要加……已經加了很多學分……加上受制於場地等因素，我們因此也沒有提出要求」。

體育的尷尬地位

體育部在中大的尷尬地位除了體現在課程發展外，在近年大興土木的校園空間分佈中也可見一斑。乘大學改四年制之機，數年前體育部曾經正式提交建議書，希望在夏鼎基運動場側的位置興建一座Sports Complex（體育大樓），內裡除了會有活動室、健身室外，還有現時體育部最需要的室內泳池。現在中大只有室外泳池，所以下學期就不能編游泳課，對體育科的編排有很大影響。此外，中大泳隊要練習，在冬天也只能離校到康文署的公眾泳池訓練。不過這個被盧主任稱為「深思熟慮」的體育大樓大計暫時還未得到校方的正面回應，因此室內泳池的計劃也仍然是遙遙無期。

另外，現時在大學站附近有一個臨時停車場，該處在2008年奧運時曾是馬術比賽的候車處。盧主任說校方曾經兜兜轉轉問過體育部該地是否適合興建臨時的運動設施。不過，在體育部來得及回應前，他又收到消息說該地因不在校園範圍內，校方覺得學生到那兒做運動似乎不太好。於是，由被諮詢到得悉校方對該地的用途另有他想，當中都沒有甚麼正式的會議或者程序讓體育部發揮影響力。換言之，雖然場地無疑是大學運動發展至為關鍵的一環，但其實也沒有機制讓體育部能介入規劃校園運動設施的發展。

當然，說校方完全無視體育科也不公允。例如最近校方就為體育部興建了一幅攀石牆。但無論如何，相信校友和同學都會像盧主任一樣感到「大學都是比較注重學術科目」。

體育的教育功能

相信對不少中大的校友或者是在校生來說，體育部的處境並不奇怪。始終絕大多數人升讀中大都是求證書、求學問。體育科只佔兩學分，一般來說與自己的主修科關係不大，它不受重視好像是理所當然。然而，體育在教育上能扮演的角色，其實有十分豐富的潛力。在古希臘，柏拉圖就提出在教育中加入競技運動有助甄別出刻苦堅毅的學生。而在中國，春秋時代孔子的教學內容中也有射、御兩項，可見傳統儒家絕不如後世所理解那樣重文輕武。到十九世紀，現代運動在英國興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精英學校的主事者看中了競技運動在個性教育上的功能：團隊精神、服從、公平競技等等都是當時英國教育家希望藉競技運動提倡的東西。

盧主任本身也很清楚體育科的教育意義。他指出，體育科在大學教育的角色其實不單是要提升同學的運動技巧和建立終身運動的習慣，還包括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溝通、合作、解決困難、批判思考及創新能力）、增加學生的心理素質及自我管理能力（專注力、自省能力、抗壓／逆能力、決斷能力等）、培養學生的體育精神等幾項。說得簡單一點，體育科就是「全人教育」的一部分。

體育科和中大歷史

「全人教育」這概念，基本上是任何大學都會「講」的，但如何實踐（又或者是否真的實踐）當然往往是另一回事。中大體育必修科成為本科課程的一部分，其實源於中大獨特的歷史。眾所周知，原來的中大由崇基學院、新亞書院和聯合書院合組而成。三所院校未搬到馬料水校園前，已在各自的校舍有體育課。到1972年，三所院校進駐馬料水後，就順理成章成立了大學體育部，首任體育部主任為李小洛先生。盧主任憶述，李小洛以「全人教育」為基礎，向大學爭取將體育科列為必修課。該建議獲大學接納，於是在大學一年級上體育課就成為了所有中大本科生的必經階段，以訓練他們成為文武全才之輩。

由於體育課不是純粹的技巧訓練，因此在課程設計時也要經過一番心思。盧主任提到，除了必然要考量的因素如成本、場地、師資外，體育部還要思考該運動的運動量是否足夠（例如射箭就因為運動量不足而一直不被列為必修課程）、同學修過課程後是否能延續為終身運動、隊際項目是否能訓練團隊和合作精神。當然，同學是否對該項運動有興趣也很重要。體操課程就是因為不受歡迎而在九十年代取消。執筆之時，體育部亦打算增加瑜伽和舞蹈班以回應同學的興趣。

至於在組織校隊方面，原來跟中大的體育課是否設該項目沒有關係。盧主任解釋，組織校隊的先決條件是大專體育協會有舉辦該項目的比賽。而每位體育部導師都會負責一隊校隊。但某些項目如果體育部沒有適合人選任教，則會外聘教練。而就算同學是某運動項目的學會

中的活躍分子，要代表中大校隊的話，也一定要參加體育部轄下的校隊訓練。

進步體育課？

如果以一個較為批判的觀點看，現代運動與教育間的關係常被視為一套「維穩」的手段。體育課常強調服從教練、裁判、優勝劣敗等等訊息，某程度上與「民主」、「平等」等價值有矛盾。儘管當代大學難免複製既有社會制度，但大概還是有空間利用體育和運動來推動一些進步議程的。例如對於打破有關性別的保守和刻板觀念，體育課可擔當的角色其實絕不小。比方說，現在足球課程仍然只有男生班，如果有女生班的話，對改變主流意識對足球的理解和性別的標籤一定會有幫助。

另外，現時體育課仍然是分開男生班和女生班。正如盧主任所言，這安排的好處是能令同班同學之間的能力差異不會那麼大。這不能說不合理。然而，體育部也可以考慮推動合球、終極飛盤（Ultimate）等容許男女同隊的運動，以改變男女在運動場上總是分家的狀況。

中大使命與體育？

中文大學的使命是「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其實必修的體育科也可以在此發揮一些角色。例如在必修課的運動項目當中是否可以包括武術這項中國運動呢？盧主任認為將武術列為必修課的難題是門派眾多，在缺乏規範的情況下難以推動。即使太極算是較為標準化和規範化的國術，但盧主任亦擔心年青人對太極興趣不足，故體育部暫時未有將太極列為必修科的打算。

中大的體育必修科缺少了中國運動似乎正反映出一個有關中西文化交流的問題。到底我們用講求理性、標準、規範的西方現代準則來去推動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否可行呢？如果硬以在西方文化的框架去推動中國的傳統文化，當中又牽涉多少的妥協？

體育部作為大學正式部門之一，總會受到大學的一些規範所制肘。相反，學生的自發活動就較少這方面的煩惱。即使體育部較難在正規課程推廣武術，但書院的各個武術學會卻仍可令這項中國的傳統運動能在中大校園出現。這說明了體育運動作為文化的一種，不能只靠體育部推動，學生的自發性也十分重要。事實上，他們甚至因為比體育部較少顧慮而做得更多。

如果體育部在未來能將體育課的內容與社會平等或者中大使命結合起來，同時更多同學能明白運動不單是減肥、保持身段苗條的工具，而同時是反映某些價值的文化活動，現在體育運動在中大的尷尬地位就有改觀的可能性。即使香港的大專體育不像美國那樣可以成為吸引公眾眼球的活動，中大的體育科和運動文化也有可能成為中大的招牌之一。

鳴謝：感謝中大體育部主任盧遠昌先生，抱恙接受訪問。

唔講都唔知
——網上學習平台改革

◆ 松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11年2月號

對中大學生來說，一個很熟悉的習慣——於WebCT／Moodle／CU Forum下載所需的閱讀素材或講義——即將要改變了。在2010年，資訊科技服務處（ITSC）在資訊科技學術督導委員會（即Academic IT Steering Committee，簡稱AITSC）的主導下，進行了有關網上教學系統的檢討，它指出為了迎合新教育制度三三四使收生人數大幅上升的情況，以及改善師生的教學質素，而建議將 Blackboard Learn 取締以上原有的三個網上教學平台[1]。

從上年秋季開始，有關計劃已開始實行，包括Blackboard Learn的預覽和試行。而在今年八月，Blackboard Learn將正式取代WebCT[2]，明年八月時則連Moodle及CUForum亦都會消失；屆時，Blackboard Learn將會成為校內唯一的網上教學系統。

筆者訪問過對此比較熟悉的傳理系邱林川教授，以及聯絡資訊科技服務處網絡教學小組，以助加深對此事的認識和了解。

網上教學系統檢討

現時，在ITSC的網址上，能看到上文提及的2010年檢討以及以Blackboard Learn成為未來的網上學習系統的實施計劃，但據悉有關檢討報告只得校長及少數參與此事的人員得知，換言之此報告並無公佈。

後來，經筆者訪問ITSC，才得知轉變系統的來龍去脈。中大的網上教學系統將由多系統服務模式變為單一教學系統。現在三個教學系統並行，原意是為提高大學面對Blackboard公司時的議價能力，以及降低學校對單一系統的依賴。不過，有同學反映，同時在三個系統上尋找修讀課程的教學網站會為他們帶來困擾和混亂，浪費不少精力和時間；大學管理層亦認為這會導致資源重疊和浪費，降低ITSC在支援教學工作的效率，不便調配人力和財務上的資源。因此，為幫助同學們更高效更專注地投入知識學習中，故校方決定將網上教學系統改成單一系統。

在檢討的過程中，一個有關檢討工作的小組成立了。此小組是由學院代表、

圖書館、ITSC及學能提升研究中心（CLEAR）各找一至兩位代表而組成，代表們負責參與評估工作，包括對系統[3]評分和評論。至於評估時被測試的功能，則是根據2010年5月教職員使用網上教學系統問卷調查的結果挑選而出來，其功能包括網上課程授課、師生交流、同學間的合作、功課呈交和評估，以及課程管理等。於是，大學決定與Blackboard公司簽訂為期5年的合約，並確保5年間Blackboard服務收費維持穩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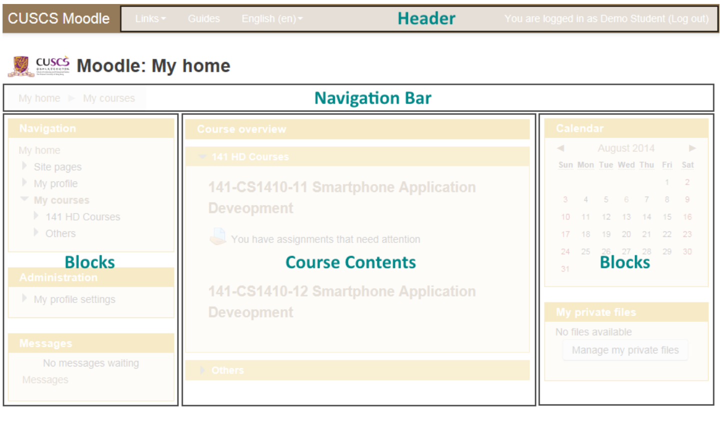
然而，更換系統代表校方需要以一筆為數不少的金錢購入系統，而且，當以上這些資訊的透明度低，只在小範圍裡公開，有師生反映對此仍不知情，屆時師生將難以適應突如其來的轉變，須再花費一定成本幫助師生適應新的系統。

教學系統之外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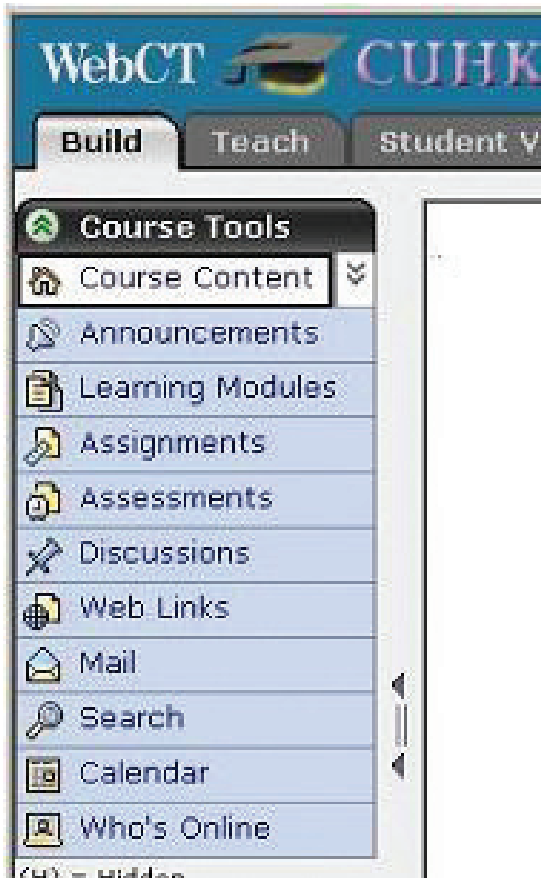
外判，指將承包合約委託給當事人以外的第三者，原意本為節省成本、善用資源和得到第三者所提供的專業服務。在網上教學系統變更一事中，學校將這系統外判給Blackboard公司。或許你會問，這又有何問題？的確，在效率導向的角度上，這無疑是最佳的做法，但從中衍生的問題卻可大可小。

且先看看看Moodle的例子。Moodle為開放源碼系統（open source），Black-board為私有軟體（proprietary software）。兩者的分別是後者須將原始碼（source code，又稱源代碼）保密，而前者將之開放，他人有改變系統功能的自主性。換句話說，使用開放源碼系統時，若師生等人發現使用時出現問題，或有更好的功能可作替改，例如設計一個漢化版Moodle或改善討論區的功能，則可由技術人員因應師生的需求而改變系統功能及使用介面。相反，若用私有軟體，則不能自行改進系統，須「聽產品公司支笛」，無自主性可言。

對此，ITSC則表示改動系統源碼有嚴格的規定及難度，過多修改會加重系統維護的複雜性。此外，如果以Moodle作為單一教學系統，則須聯絡Moodle服務供應商就系統的設計、配置來提供專業意見和提供支援服務，以確保系統的穩定可靠；惜Moodle服務供應商NetSpot的總部設於澳洲，在香港並無分部[4]，故在溝通及支援上存在困難，而所涉及的服務費亦不低。因此，校方並不考慮改用Moodle為單一網上教學系統。



不過，需留意的是，萬一將教學系統外判給學校以外的公司，則容易忽略自主地改變系統的重要性。以學生報的編輯過程打個比方，編輯們除寫文外，還須負責排版、校對和發行等事項，若然將寫文以外的工序外判給其他人士，則會使編輯們漸而忘記那些工序的重要性，例如排版會影響到文章內容能否有效地傳遞給讀者，從而破壞了各個工序之間層層扣連的整體性。若校方仍然堅決將有關系統的行政工作外判給Blackboard公司，往後師生雖然是系統的使用者，卻處於一個被動的位置，於系統功能上完全沒有權力改變，加上校方對此又無能為力時，屆時整個網上教學系統會變成一個純粹提供服務的工具，而我們卻不能參與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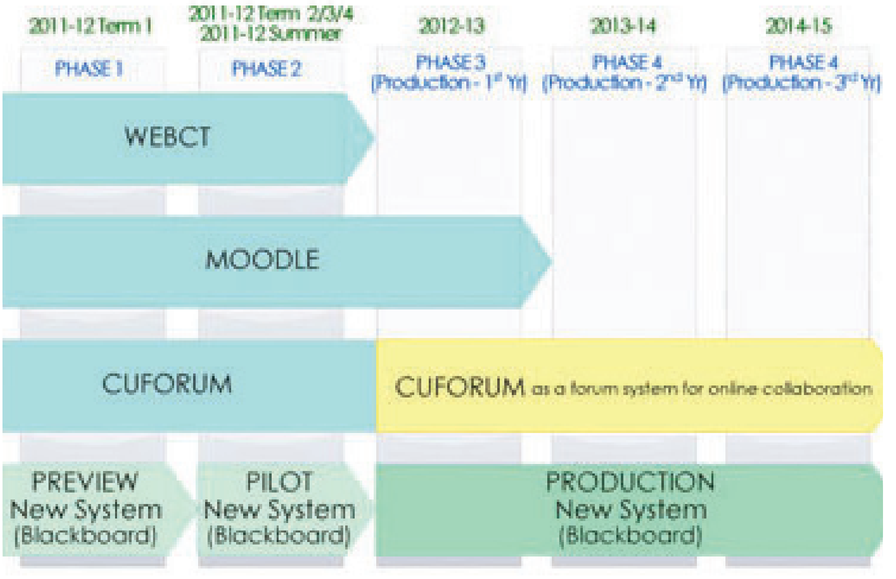


重新審視系統改革計劃

在整個網上教學系統改革計劃中，資訊不透明，校方決定倉卒，如閉門造車。校方理應公開系統的檢討報告，公開諮詢師生對此的意見，並重新為自己的網上學習系統定位，例如以使用開放資源為基本原則。雖然改革計劃的大勢似是難以逆轉，還望校方能夠重新審視系統改革計劃，及交代檢討報告的詳情，予師生們一個合理的交代。此外，作為系統主要使用者之一，同學們不妨向本報或校方反映大家對系統使用以至於整個改革方案的意見，共同參與是次系統改革計劃。重新審視系統改革計劃。

各大院校所使用的網上教學系統

Blackboard Learn	理大、教院、中大
Blackboard	城大
Moodle	浸大、港大



CUHK網上教學系統發展歷程

1999年　經ITSC內部研發的CUForum被推出，提供網上討論平台和課外延伸交流的機會。

2000年　比CUForum更為完善的網上教學系統WebCT被推出，方便老師自行建設課程網頁，並提供教材下載、功課收集、網上討論和網上測驗等功能。

2006年　適逢開放式源碼系統開始普及，Moodle平台被推出，作為積累自身對相關系統支援的經驗，以及提高大學面對Blackboard公司時的議價能力。[5]

2010年　ITSC在AITSC的支持下，組成網上教學系統檢討小組，以作重新檢討網上教學系統之用。

（資料來源：資訊科技服務處網絡發展小組）

1　CUHK learning systems review 2010：http://www.cuhk.edu.hk/eLearning/c_systems/elearn/implementation.html

2　2006年，WebCT被Blackboard公司收購。2010年，Blackboard公司整合了Blackboard和WebCT平台後推出了新系統Blackboard Learn，並宣佈於2013年停止對WebCT系統的支援服務。故在系統遷移的計劃中，以Blackboard來替代WebCT比較容易和方便。

3　在2010年7至8月進行的系統功能性及可用性測試（Functions and usability evaluation）時所使用的版本均為當時最新版本：即Blackboard Learn 9.1 Service Pack 4及Moodle 1.9.9。

4　ITSC對於Moodle服務供應商的說法並不準確。除NetSpot外，Pukunui亦是Moodle的服務供應商，在香港有其辦公室。

5　2006年，Blackboard公司收購WebCT，ITSC擔心有二。一為WebCT前景不明，而可能會被硬性轉用為Blackboard；二為Blackboard公司在無強大競爭對手的情況下會大幅加價。

好彩有CUTS
——訪問開發者Benson

◆ 奧奇特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11年2月號

咦！ RGS 冇左個 time-table planner！成日睇錯CUSIS個畸形時間表呀！不如夾下大家時間表吖！

CUTS 幫到你。

CUTS（CUHK Timetable System）是一個同學開發的上課時間表規劃器，由2007年開始開發，2008年正式上線，一年後登陸facebook，主要的伺服器由Oursky公司贊助[1]，至今廣受中大同學使用。究竟是誰開發這麼便利的系統呢？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構思？學生報找到CUTS的開發者Benson，原來整個系統僅由他一個人獨力開發。

CUTS整個系統的開發是由Benson入學不久便展開，他覺得大學每個人的上課時間表都不一樣，所以想知道朋友們的時間表相約午飯、做專題，於是便動手去編寫CUTS。最初是一人進行寫程式，到現在仍是一人去維護。Benson說當初編寫程序代碼的時候，寫得比較鬆散，若有人想加入一同開發，定會覺得難度很高，尤其是CUTS的規模越來越複雜。

現時CUTS有三個主要部分，包括時間表規劃器（Planner）、學科資料庫（Course DB）和處理個人時間表介面（My Timetable）。其中個人時間表介面現時是嵌入於facebook，CUTS利用facebook提供的朋友功能，讓同學們得知更多有用資訊如有哪些人會一起上同一個時段的課，也讓同學知道朋友會上哪些課。據Benson透露，有八成2010年入學的中大同學都使用過CUTS這個應用程式。時間表規劃器更成為了同學排時間表的必備工具，取代CUTS的時間表功能，同學只消輸入下學期欲修讀的所有course code，按數個鍵便能動態地「砌」好漂亮的上課時間表，可說是開

學的恩物。

一個學期有二千多三千班別，要如何把如此多的資料輸入到CUTS的課程資料庫呢？原來Benson是利用電腦程式，把RGS網頁上人人可得的資料，把學課的編號、教師資料、上課時間地點等等載入到CUTS系統。上年CUSIS啟用，理論上對資料的來源並無影響，但不巧地RGS在差不多時間更改了頁面，把載有學課資料的網頁由文字格式改為PDF的格式。那時正值八月，Benson身處內地，未能即時去調整程式去適應，其後花上數個晚上才可以讓CUTS重新投入服務。Benson的偉大系統令同學在熟識使用那個從Oracle用好多萬購下並作略略修改又不太對應中大的課程編排的CUSIS前，仍可安排自己的上課時間表。

如果有一直使用CUTS的同學可能會記得先前有進階版的時間表規劃器，但現時已隱藏起來，因為一個更完善的功能和介面正在開發中。進階版能聰明地按同學輸入的要求把所有時間表的可能性都顯示出來，並根據多特定規則[2]來排次序，務求令同學找到最「正」的時間表，這個功能對選擇一些有著多個時段的學課最為有用。此外，Benson更會加入個人學習歷程紀錄的功能，可以提示同學尚有甚麼課未修讀，CUSIS的Planner可以徹底取消了。不過，輸入資料需要人手操作，要花的時間比較長，因此仍未可以推出。[3]

至於CUTS的長遠命運，Benson坦言並沒有具體的計劃，隨著他快將畢業，才覺得要開始想想CUTS的去向。若沒有新人加入開發行列，Benson會繼續維護CUTS。他稱，CUTS全是由他的興趣所驅使，一心為大家服務，亦無意把它商業化。Benson打算聯絡ITSC，看看有沒有辦法把他的成果融合到現有中大的校內系統，令到更多同學得以方便地處理上課時間表。

有同學把自己的空餘時間貢獻出來開發一個系統，比大公司團隊做的更符合實際情況，我們若盲目信奉「大公司」的產品，很容易會忽略一堆更好的選擇。再說，CUSIS這個產品，看來是錯買了。不如退貨？

1 訪問Benson時透露，他曾在Oursky公司工作，當公司知道Benson有此系統，二話不說地為CUTS提供支援，Benson對此非常感激。CUTS這個系統獲得崇基學院的宋常康創意獎第二等。

2 FAQ第三條：http://apps.facebook.com/cuhk-cuts/faq.php。

3 有意協助Benson開發CUTS的同學可到Facebook專頁聯絡Benson。

數碼化的中途
—— 記中大圖書館十年發展

◆ Czior

大學傳播知識，除了有賴教職員口耳相傳外，書本便是最主要的來源。科技日新月異，書本也不再只是限於印刷，也變成了寄存於雲端之中的數碼資料，一直以來藏書空間不足的困境似乎終於有了出路。但隨著電子資源逐漸普及，圖書館也面臨著新一輪關於使用、分享、版權等等的問題有待解決。

千禧年後香港各大專院校紛紛把圖書館數碼化擺上日程，積極投入資源擴展電子資料庫，在這個電子資源與印刷資料交接的年代，重新認識中大圖書館的發展歷史，也有助於判斷中大圖書館發展願景的好處壞處。圖書館應該如何看待印刷書與電子書、圖書館擴建該擴充甚麼功能、電子資源的來源與機制借書條例更新、八大院校聯合組成書網等等，其實都是這十年來圖書館發展中，值得大家關心的事件。因此，筆者根據讀者及研習服務部門的主管劉麗芝女士，和研習支援組的李麗芳女士的訪問，以及中大公開的資料數據，嘗試簡略整理十年來大學圖書館的發展歷史。

電子資源早已「普及」

若單從數字出發，近十年來圖書館藏書量確實是增加不少，印刷本由2003年170多萬本增至2013年的240多萬本，十年間增幅近四成。各項改變中對同學最重要的，便是2009年更新的條例，包括借書數量、還書期限、續借次數等雙倍的調整，以及開放期刊的借閱，這些都大大提高了借閱的自由度。譬如現在本



科生最多可借出50冊書長達5個月；研究生則可借出80冊達10個月；教員更是可以借出120冊書和最長600天的還書期限。電子資料庫和電子書的數量也有成倍的增長，前者達632個，後者則增至450多萬本。若單以數量計算，十年後的今日，電子書的館藏數量已經遠遠超過印刷書，成為主流。

這些粗略的數字，一端既反映了圖書館在知識版圖上的擴張外，另一端亦是展示了長久下來圖書館的發展趨勢——數碼化的趨勢。早於九十年代已啟動的圖書館數碼化計劃——「道（Digital Access Online）」——將一些館內珍貴的印刷本和影音資料數碼化。在近年更是「兩條腿走路」，一邊數碼化陳舊資料，另一邊廂則主動購入已有的數據資料庫。從2012年中大策略性增購國外大型電子書數據庫，一下讓電子書館藏激增二百多萬本便可見一二。

中大數碼化主要根據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的指引，其中強調要善用數碼科技的潛力，使得資料的格式和地理不再成為限制，令各地人們可較易接觸；並推動圖書館、檔案庫和博物館多方合作，提供廣泛而完整的圖書館服務[1]。聯盟指出數碼化圖書館迎合了使用者的期望——提供免費即時的網上資料。可是，數碼化會否令圖書館使用率下降？據大學年報的數據計算，近三年圖書館使用者的平均進館次數相近，為一年四十多次，可見電子資源不一定與印刷書庫互相衝突。

另外，劉小姐在訪問中亦提及使用習慣的變化，即從單獨研習轉變為小組討論的模式。可以想像2012年落成啟用的大學圖書館新翼，其實也是循著這樣的思維去設計，現今的圖書館有更多空間安放桌椅和設置獨立討論間，與原有圖書館置滿書架，以借閱書籍為主要功能的安排有著清晰的區別。

臨界點與書商的銷售模式

引用〈2013至於2016年度大學圖書館系統策略計劃〉中所載的說法，中大圖書館「已臻從紙本邁向數碼館藏的『臨界點』」，指的是電子資源成為了常用的資源。並將圖書館的角色重新定位——「數碼學術（digital scholarship)、網絡科研（e-science）和社交網絡等技術將促使學術交流及出版迅速演變，圖書館在提供支援研究方面將有新的角色」[2]。這意味著大學圖書館除了擔當大學的知識庫外，亦扮演著連接不同知識庫的重要角色。

另外，書商的賣書策略相信也是圖書館數碼化的助力之一。劉女士憶述電子書／期刊早在九十年代已在市場上出現，但直到2003年左右才開始多了人使用電子資源。當時書商還是以印刷本銷售為主，慣常是以印刷本的5%售價出售電子書。可是隨著使用率上昇，卻反過來變成銷售電子書為主軸，加以若干優惠價則送印刷本。書商的邊際利潤

（marginal benefit）大幅增加，因此，數碼化的趨勢不止是圖書館發展的選擇，也是書商在利潤考量下的結果。

印刷與電子書的交接年代

不得不提的還有香港高校圖書聯網（俗稱「港書網」；HKALL）的成立。港書網是2004年港大、嶺大、城大合作的聯校試驗計劃，後來獲教資會撥款一千萬，遂拓展至八大高等院校的聯網，並於2005年底正式啟用，共享約500萬印刷藏書。書商售書模式的轉變，以及港書網的建立，都是數碼化得以順利進行的助力，令中大有能力一邊保持資料庫的擴充，同時避免大專院校藏書重複而導致浪費空間的問題。劉女士指出圖書館空間不足，既是由於他們並不會掉棄任何書籍資料，即使下架的館藏也只會移往遠端庫藏（remote storage）中存放，亦是缺乏教資會撥款審批擴建的問題。在這個情況下，數碼化和聯網的建立無疑都是巧妙的策略，克服了空間存放的困難而繼續豐富了館藏。

唯一美中不足的，便是現存的國外資料庫多集中在歐美地區，令電子書庫偏英輕中的情況愈趨嚴重。



結語

圖書館電子化不止是國際的潮流，同時圖書館定位、使用者習慣、購書機制、讀者期望等等各方面的轉變。現時印刷和數碼資源互不衝突，甚至成互補之勢，在這一連串轉變中，中大圖書館依然穩步發展，圖書館多年來的努力實在應記一功。可是，電子館藏使用規則的限制[3]，以及空間不足的問題仍有待解決。印刷資源會否因此而慢慢退出歷史舞台，被數碼資源取代，這將會是圖書館長遠必然需要面臨的抉擇。

1 "About Digital Libraries", ILFA. http://www.ifla.org/about-digital-libraries

2 〈2013至於2016年度大學圖書館系統策略計劃〉，中文大學圖書館。

3 譬如中大圖書館條款列明：「基於特許協議，此服務只涵蓋部份提供現有中大學生及教職員使用之資料庫，內容不一定是全文。」故繳付費用申請數碼圖書館服務（DLSA）的校友，卻不一定能夠使用某些電子館藏，而且2013年首年推出亦只限400個名額。

道德・身份



前言

◆ 杜振豪

「道德」在日常語用習慣中，通常被理解為關於生活方式的好壞標準。這些規範有時明顯，有時隱晦，有時可以說清楚理由，有時則說不清楚。無論如何，只要不觸犯法律或違反公眾利益，我們通常不會認為這些生活方式屬於「公共」範疇，即與政治無關。直至有人拒絕馴服於制度的安排，開始挑戰既有規範，才會掀起公共的爭議。

現代社會的教育時間不斷延長，「成人」的界線也不斷向後推移。大學生介乎於青少年與成年人之間，處境尤其尷尬。一方面，大學生被理解為處於學習階段，被假定為心智未完全成熟，容許有犯錯空間；另一方面，作為享用政府資源的社會精英，大學生似乎有責任成為青年人的道德楷模，不辜負社會大眾的期望。

於是，大學生這種身份，可說面臨雙重的道德壓力困境：他們是不完全的成年人，被矮化的主體。社會大眾很容易質疑他們的決定不理性或不成熟，然後理解他們為不懂事的小孩，因此他們的聲音特別容易被家長式論述收編；與此同時，因為背負沉重道德期許，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會被社會大眾所監視。傳媒非常熱衷於描繪大學生道德淪亡的社會圖像，為讀者提供將大學生拉下道德高地的快感。

只有在這個意義下，我們才能理解，2002年迎新營性騷擾案曝光後，何以傳媒年復年不成比例地關注大學迎新營如何「淫賤」和「鹹濕」，卻對處理性騷擾的投訴機制幾近不聞不問。主流道德論述的偽善，不僅在於經常出現的雙重標準，更在於嚴重收窄了道德思考本身。於是我們被教導如此理解：同性戀是道德問題，貧窮不是。婚前性行為是道德問題，民主不是。大學生性醜聞是道德問題，防止性騷擾不是。

在「道德・身份」文稿的編輯過程中，我們曾經希望重新界定「道德」的戰場，避免跌入主流道德論述的框架中打轉。無奈，限於篇幅及既有材料，最後我們希望優先記錄校園中關於言行生活規範的重要爭議，為未來重整道德論述留下思考資源。

〈從迎新營到性騷擾〉整理了2002年迎新營性騷擾事件的爭議，並與2010年的黃燕雲事件對照閱讀。從中可見，2002年校方處理性騷擾投訴的敷衍態度，並沒有隨處理投訴程序改進而改善。即使黃燕雲身為中大防止性騷擾委員會秘書多年，依然跌入制度的縫隙。處理此事的中大高層，不是嚴重缺乏性別敏感，或者不懂處理複雜的性騷擾求助，就是意圖隱瞞事件，打算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說到底，防止性騷擾不僅是處理投訴機制的問題，還牽涉整體校園文化的改變，尤其是校方管理層的性別意識及管治文化。

〈奪回宿舍性空間〉輯錄了《中大學生報》2009年針對中大新聞傳播學院刊物《大學線》的諷刺式回應，以及節錄了2011年爭取性別友善宿舍的「鬩湯石」行動的訪問報導。中大同學因「鴛鴦蛇」而被革令退宿的事件屢有所聞，但學生組織一直少有發聲。中大學生報情色版，雖然曾經遇到頗大爭議[1]，但在某程度上的確開拓了校園的性別討論空間。2009年底台灣連串「性別友善宿舍DIY」的行動，更直接啟發了關注此問題的同學。其後兩次爭取宿舍性空間的行動，雖然未有引起廣泛迴響，卻可說是校園中直接介入此議題的先鋒。

〈講粗口的學生報〉輯錄了2004年中大學生報粗口標題風波的論戰文章，以及十年後回望事件的一些思考。從今天看來，大學學生報出現粗口標題，可能只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但放在當年卻是爆炸性的新聞。道德界線的鬆綁，除了王邦華提到互聯網文化滲透主流媒體的因素，近年社會矛盾加深也是不可忽略的背景。從「poor guy」、「Delay No More」到「路姆西」、「D7689」，粗口愈來愈被認可為普通市民的抗爭語言。當社會上愈來愈多人捍衛粗口的正當性，從前被網民嘲笑的〈道德高地的虛妄〉，也慢慢成為了網路粗口文化的「經典」。[2]相對於此，當年部份仔細批評學生報、至今不失尖銳的聲音，卻是流傳不廣。我們期望這幾篇文章，能有助拓闊相關問題的討論空間。

〈健康生活・上進青年〉輯錄了四篇文章，各自討論不為社會主流價值觀認可的個人經驗。覃俊基細訴校園禁煙政策對煙民的壓迫；李智良詰難精神科治療於解救抑鬱之無用。無獨有偶，兩人在強大的醫學論述面前，均感到他們的處境被拒絕理解，甚至反而造成傷害。子僑憶述自己投入不了迎新營的遊戲，繼而勇敢地向組爸組媽吐露心聲；梁靜友回想大學時代沉迷打機的日子，在他眼中，沒有豐富社交生活便是「頹」和「摺」。雖然如此，他卻依然嚮往頹廢的生活，甚至慨嘆畢業後此情不再。表面上他們兩人怡然自得，但從字裡行間不難感受到他們對於旁人目光的戒慎恐懼。無意融入「正常」的社交生活，本來不會傷害任何人。也許需要改變的，不是「頹」或「摺」的生活選擇，而是否定這種生活選擇的社會價值？

1　詳見本書卷二「情色版事件」。
2　該文被「香港網絡大典」所輯錄，得到不少網民引用及談論。

求助無援的校園性騷擾——2002年迎新營事件

洪曉嫻

2002年書院迎新營的「四院互片」環節中，出現涉及性騷擾的口號，其中逸夫迎新營籌委會高舉「新亞桑拿」海報，影射新亞女學生，「互片」時的口號更涉嫌侮辱同性戀者、殘疾人士、綜援人士、新來港人士、少數族裔等。8月26日，中大學生會幹事、新亞書院學生丘梓蕙就此向中大性騷擾政策委員會投訴，兩日後學生會發表譴責聲明，隨後各大報章開始報導，引起廣泛回響。

暴力的官僚體系

根據校內的防止性騷擾政策，表明第一個程序為召集人接見受害人，嘗試調解的可能性，若然不果需展開調查程序。9月初，性騷擾政策委員會召集人劉明珠教授會見丘，劉教授在會上表示事態嚴重，一定會調查事件，然而劉教授同時武斷地指：「你咁堅強，唔洗心理輔導啦！」

經過三個月的調查，防止性騷擾政策委員會的負責人，只將兩封分別寫上「密件」的兩頁紙交予丘，而且內容空泛，未有提供足夠資料了解調查結果。翌年1月，丘致函予校長詢問調查報告事宜，新亞書院院長黃乃正教授會見丘時表示，要求公開報告是沒可能的事，大學最重視聲譽，「家醜不出外傳」是必然的，醜事當然讓它淡化過去。黃院長繼而表示校方重視事件，但校長亦有大量要事須處理——例如中大四十週年校慶——而校長已經是一位老人家，籌備校慶的工作已很繁重。他續說，作為晚輩，同學不應用「要求」這些字眼及要求校長於一星期內回覆，校長有自己的安排。

在申訴過程中，丘被校方各個部門召見超過十次，校方每次都拒絕透露會面的目的，只非常含糊地表示「傾下偈」，至於校方亦未有將完整的調查報告交予申訴人，其理由是：「尊重其他人的私隱」。

在欺凌的幽谷裡

丘梓蕙的投訴引起某些同學強烈反應，中大網上新聞組內的同學留言表示「賣校求榮丘梓蕙」、「過街老鼠丘梓蕙」、「丘梓蕙，一個字講哂，賤!」、「佢擺明玩野啦！」、「㖭度想出風頭，撈政治本錢！」等。有人甚至私下致電及

於公開場合辱罵她。事發後，她在宿舍內遭受同學歧視，感到強大心理壓力。丘試圖向校方申請調宿，然而性騷擾投訴小組將問題推給大學輔導長鄭振耀，後來又將此要求轉介至新亞書院輔導長，前後七次反覆提出要求，才得到答覆：下學期若有宿位便可調宿。

12月，丘梓蕙接受無線新聞訪問，講述被歧視的遭遇和對校方處理調宿問題的不滿。訪問播出後，丘在校內的處境不但沒有得到改善，反而受到更嚴重的攻擊，以致丘不敢回宿過夜。丘自8月起撰寫超過廿封信予不同部門交涉，反映在宿舍遭受歧視的問題，直至年底才成功調宿。

後續

其後，校方為大學迎新營輔導員舉辦工作坊，介紹大學的性騷擾政策，2003年製作「甚麼是性騷擾？」教育光碟，派發全校學生。往後迎新營「四院互片」的環節易名為「四院會師」。口號和標語依舊為抬高自己、貶低他人，但所謂「淫褻不雅」的口號經已收斂。然而，中大的性騷擾政策卻未有實質的進步，2005年中大校園電台在宣傳展版上寫上「任你上」，旁邊放著一個性用品女性吹氣公仔，3位女同學向委員會投訴。中大的發言人在調查小組未有判決前，已經對外宣稱這次事件不涉及性騷擾，並認為吹氣公仔就等如熊啤啤公仔一樣而已。「任你上」是否侮辱女性當可再討論，中大發言代替委員會判斷是否受理投訴，敷衍了事，卻是不爭的事實。

2002年迎新營事件曝光後，各界紛紛指責大學生道德淪亡，品味愈趨庸俗，然而坊間傳媒一般未有真正觸及迎新營中的核心問題——性傾向歧視、對性工作者的不尊重、性騷擾、性別意識等等。大學迎新營淪為大眾傳媒一年一度的焦點，每年翻炒舊聞，一面滿足批評者心理，一面塑造道德淪亡、江河日下的大學生形象。

於此事上可見，中大的防止性騷擾政策亦因著其官僚特質，以極之繁複的行政手段來消磨受害人的投訴意志，不曾提供適切的協助。中文大學作為首間制定防止性騷擾政策的高等學府，有政策而無處理方法，繁瑣、官僚、無止境的申訴過程，不只令受害人陷入焦慮無助，更令其他遭到性騷擾及性暴力事件的受害人不敢為自己的權益申訴，這方才是窒礙中大校園性別平等的最大阻力。

那年之後，當媒體遇上迎新營……

◆ 陸明敏

自從2002年8月迎新營事件（詳見前文）發生後，每到大專院校迎新營旺季七、八月份，迎新營便成為了各大主流媒體的攻擊對象：標題字眼從「意淫」、「遊戲不雅／變態」、「胸部下陰任撩」到2011年「玩死女生」，應有盡有，意淫至極。而報導中亦不乏翻炒舊聞，將該年迎新營與2002年迎新營相提並論，意圖延續自2002年來大眾對大學迎新營的謾罵，塑造大學生「世風日下，道德淪亡」的形象，引起話題。

販賣性想像 遮蔽性騷擾

2002年迎新營事件源自有同學不滿「四院互片」中的口號對女性、種族、傷殘人士等構成歧視，認為口號涉及「性騷擾」，而向中大性騷擾政策委員會投訴。及後事件被傳媒大肆報導，一時引發起大眾對性騷擾的討論。在往後每年的七、八月中，各大專院校的迎新營都被傳媒大肆報導。不過，在傳媒的報導中，卻鮮有觸及迎新營中的問題——性騷擾，反而只聚焦於當中是否有性意味的活動；更甚者，有報導更放大當中有肢體碰撞的活動，將肢體碰撞與性意味劃上等號，以此嘩眾取寵，作為賣點。

「毛毛蟲」本為傳統集體遊戲，參加者分成兩隊，每隊人數相約。同一隊伍參加者需以同一方向坐下，用雙腿緊扣前者雙腿，串連成一條毛毛蟲。兩條毛毛蟲各自移動，先奪得目標物品的一隊為勝出。不過，當「毛毛蟲」遇上媒體報導，卻變成「科大迎新喪玩撩陰」（《東方日報》，2012年8月10日）：

「香港科技大學工商學院日前率先舉行迎新營，逾百名大學生大玩『有味』遊戲『毛毛蟲』，男女梅花間竹而坐，後面的人用雙腳緊蹺前面的學生，女生雙腳放在男生性器官上，男生雙腳則觸碰女生的胸部及陰部。」

當然，我們無可否認迎新營或會有性意味的活動，不過性意味卻不一定等於性騷擾。因為是否性騷擾要視乎當時情境、對方意圖、言行內容及「受害者」的心理狀態而定。如果強行將性意味定型為性騷擾，則只會繼續妨礙大眾深入探討性騷擾，如大眾應該怎樣理解性騷擾、可以怎樣減少性騷擾個案、怎樣協助受害者，以減低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等等。

死不悔改的淫賤大學生

除了忽視性騷擾，誇大肢體碰撞的「性意味」，媒體亦會將含有性意味的遊戲描述為「低俗、淫賤、不雅、意淫、具不良意識、不道德」，例如，「大玩男女生互相脷疊脷等不雅動作」（《東方日報》，2004年8月29日）、「當中理工大學迎新營遊戲被批評為下賤及意識不良，要求學生模仿性交姿勢⋯⋯」（《星島日報》，2005年8月4日）、「迎新營的遊戲形式繁多，由『飲口水奶』、『下體撞柱』、到『模仿口交』都有，意識極之不良」（《東方日報》，2010年11月9日），當中大「收晒火」的時候，卻被報導為「乾淨迎新營無創意」（《頭條日報》，2007年8月28日），意謂沒有性意味活動的迎新營是乾淨、無新意的。媒體一方面責備參與有性意味活動的大學生「不雅、意淫、不道德」，但另一方面自身卻是最需要依賴性的語言去吸引大眾注意，由此可見媒體作為「道德審判者」的矛盾特質。

因此，就算想要認真及公開地探討性，媒體亦不會就此「輕易放過」。例如，2005年中大學生會舉辦了一名為「性別·大學生」的迎新營，主題是性別探討，讓同學了解更多有關同性戀、性工作等性別議題。活動內容為：一）探訪性工作者組織「紫藤」的工作人員；二）與同志組織「十分一會」的成員對談；三）研究中小學性教育如何製造性別定型；四）與「老鬼」夜話。其中一個到性工作者集中地砵蘭街的參觀環節最吸引傳媒注意，如「學生會再向『性』挑戰強調學術探討，中大出位迎新考察『鳳樓』」（《星島日報》，2005年8月4日）、「中大迎新營又涉意識不良」（《東方日報》，2005年8月3日）、「中大迎新參觀砵蘭街」（《蘋果日報》，2005年8月30日）。同時內文又再次將2002年迎新營事件相提並論，揶揄大學生「死不悔改、教而不善」。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大學生」能輕易成為大眾的焦點，因此大學生的一舉一動盡在媒體的監視之內。媒體在塑造大學生的形象之餘，亦擔任著「道德審判者」的角色，要求大學生服膺於某些規條下，符合某種大眾對大學生的期望。例如有報章評論認為「遊戲色情猥瑣，絕對不應在大學迎新營出現」[1]、「學生此舉是不雅當有趣，長遠勢令大學生質素續走下坡」[2]。

不過，媒體塑造出來的又是否合理？2011年《蘋果日報》便將某女生自殺的原因歸咎於剛參加完的迎新營：「中大迎新營玩死女生，作家之女留遺書跳樓亡」，內文更描述了以往的迎新營何等「荒淫無道」，以致今次終於「闖下彌天太禍」，將大學生打造成荒唐之極、任意妄為的一群。其後，經警方調查後發現兩者並無關連，香港記者協會執行委員會認為《蘋果日報》應向受報導影響的人士道歉[3]；中大學生亦發起罷看《蘋果日報》行動[4]。由此可見事實的真相未必是媒體所關心的，反而將大學生打造成「道德淪亡的大學生」才是其焦點所在。

綜觀上述媒體報導，我們發現各大媒體除了忽視迎新營中性騷擾的問題外，亦利用性作為禁忌的特質，塑造大學生的形象與身份，以此來製造話題，嘩眾取寵，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到底是否需要認同並符合媒體製造出來的對大學生的期望，並以此作為起點，思考大學生的身份應該是怎樣的。

---

1 〈玩蒙眼剝衫　理大三級迎新〉，《東方日報》，2006年8月23日。

2 〈中大迎新玩粗口諧音〉，《文匯報》，2007年8月25日。

3 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2011). *HKJA's Judgement on Complaint against Appledaily*. 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4 〈中大師生憤怒　罷看《蘋果日報》〉，《東方日報》，2011年8月19日。

還生者公道，讓死者安息
——中大性騷擾事件聯署聲明（節錄）

◆ 中大性別平等關注組

編按：中大秘書處職員黃燕雲兼任防止性騷擾委員會秘書多年，疑遭上司性騷擾後，卻未正式投訴，而得知此事的校方高層亦沒有能妥善處理事件，後來黃患上抑鬱，於 2010 年選擇了結生命。黃燕雲事件為一長時間的性騷擾事件，並可能涉及刑事的性侵犯行為。此為死因庭開審時，以校友為主臨時組成的中大性別平等關注組發表的聲明，整理黃燕雲事件經過，並指責校方處理不當。

近月媒體接連揭發中大校園性騷擾事件，先有中大前秘書長梁少光疑涉性騷擾，復有教育學院講座教授盧乃桂疑涉性騷擾，我們深感震驚及憤怒。原因不僅在於捲入性騷擾案諸君均為校方高層或資深教授，更在於事件反映處理性騷擾的校方管理層，完全缺乏應有的性別意識，不單沒有向投訴人提供足夠支援，甚至在處理過程中對事主造成二度傷害。目前兩次性騷擾事件仍存有不少疑點，亟待進一步調查，但從媒體報導及死因研訊庭可知，我們已發現中大連番失誤，清楚顯示中大防止性騷擾制度存在嚴重問題。

言論充斥性騷擾迷思

在黃燕雲事件中，當死者親屬知悉黃疑被性騷擾後，曾明確要求校長沈祖堯調查事件，沈祖堯查問梁少光後竟向死者親屬指，黃與梁「關係密切」，不便調查。黃燕雲生前已明確表示無法接受梁少光的行為，沈祖堯清楚此事，卻強指二人關係密切不便調查，是無異於以不相干甚至虛構的理由抹除調查性騷擾的正當性。

中大防止性騷擾委員會前主席馬麗莊的言論也備受關注。事主好友曾作供稱，當黃燕雲向馬麗莊表示自己在戲院被梁少光非禮時，馬竟向黃燕雲暗示戲院是公眾地方，但黃燕雲沒即時離開，也無明顯反抗，未必有足夠證據證明性騷擾。性侵犯罪行往往缺乏第三者目擊，事主因種種原因當場未有反抗也非罕見之事，兩者皆非性侵犯罪行是否成立的必要條件。若黃燕雲好友作供屬實，馬麗莊將被侵犯的責任歸諸黃未有明顯反抗，又以性騷擾迷思打消黃的追究意欲，絕對是嚴重過失，在事件中須負上極大責任。

處理求助不當

其次，校方處理黃燕雲的求助時，也出現極多問題，顯示中大高層完全缺乏處理性騷擾個案的認識。例如，黃燕雲在戲院事件後相當自責，認為被性騷擾是因為自己「有用」；當被問及是否願意投訴時，更曾表示擔心中大偏袒梁少光。為何死者會有這種想法？為何馬麗莊不向黃燕雲保証防止性騷擾委員會調查的獨立性？

又如，當副校長楊綱凱接獲死者投訴時，曾向死者建議正式書面投訴。但當死者表示不欲正式書面投訴時，楊綱凱卻選擇了一個現行政策上沒有任何根據的方法處理：合寫一份秘密紀錄放在人事處存檔。其實，即使投訴人不欲書面投訴，根據現行中大防止性騷擾政策，委員會也可作非正式調查，嘗試以調停方式解決爭端。楊綱凱沒向黃燕雲建議作非正式調查，反而選擇了設立秘密檔案，幫助不到黃燕雲問題，也對梁少光並不公平。而前任校長劉遵義及現任校長沈祖堯得悉事件及秘密檔案，卻對楊的處理手法不置一詞，顯然也須與楊綱凱負上同樣責任。

拒絕調查選擇私了

當黃燕雲親屬要求校長沈祖堯調查事件後，沈祖堯為此查問梁少光，梁否認性騷擾，但最後卻在沈祖堯施壓下提早離職。然後，又向死者親屬指，黃與梁「關係密切」，不便調查。沈祖堯拒絕正式調查事件，反而一面向梁少光施壓，一面以性騷擾迷思合理化不作調查的做法，私下了結掩埋醜聞。此舉置死者親屬要求於不顧，視防止性騷擾機制如無物，梁少光本人也失去抗辯機會。

總括而言，校方未有給予適當回應，多次錯過阻止慘劇發生的機會，令事主倍添困擾。事件反映中大校方處理性騷擾事件存在各種問題，涉事的校方高層不單缺乏處理性騷擾個案經驗，也缺乏性別意識，甚至試圖以各種方式淡化事件。令人深感嘆息和諷刺的是，死者黃燕雲本身便曾擔任中大防止性騷擾委員會秘書五年之久，但最後她本人也不相信委員會的獨立性，覺得中大會偏袒梁少光。中大防止性騷擾委員會能否真正支援性騷擾受害者，從此可知一二。

更令人憂慮的是，目前媒體報導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在校方淡化醜聞及消極應對投訴的態度下，究竟一直以來有多少性騷擾投訴人被冷待，或甚至乾脆放棄投訴？逝者已矣，來者可追。為了還生者公道，讓死者安息，此事必須得到公正處理。我們理解有人可能會因為擔心校譽有損而希望低調處理，但相對於虛妄的校譽，我們更擔心的是，類似事件一次又一次發生，校園性騷擾無日無之，師生職工被逼長年在性敵意的環境中工作和學習。

發起團體：中大性別平等關注組
2012年5月28日
原文連結：http://goo.gl/V16kaD

黃燕雲事件時序表

◆ 周松齡

2006年

年底，黃燕雲向好友陳玉兒透露被上司前秘書長梁少光性騷擾。

2007年

2月14日，黃於情人節收到梁少光的禮物，礙於驚慌不敢拆開。

3月中旬，時為秘書處助理主任的黃申請調職。

4月12日，黃獲批准調任至校長辦公室。

4月21日，黃於調職前請梁少光吃飯，飯後被要求同往看電影，據陳玉兒稱黃在戲院中疑遭到梁非禮。

4月22日，黃向校長辦公室主任梁其汝請辭並告知此事，梁其汝拒絕黃辭職的請求。

4月24日，黃向時任副校長楊綱凱要求辭職，表明不想啟動性騷擾投訴機制。楊按黃燕雲要求，除當時校長劉遵義得知此事外，楊會將事件以保密形式處理。

4月下旬，劉遵義致函挽留黃燕雲不要辭職，並承諾盡快安排黃於五月調職至校長辦公室。

5月，黃向中大防止性騷擾委員會前主席馬麗莊教授求助，馬一方面表示事件嚴重，但另一方面表示黃沒有明確反抗，暗示未有足夠證據證明梁性騷擾。

5月7日，楊綱凱接見黃燕雲，黃表示不願作正式投訴，楊就此做了三頁機密記錄。

5月9日，黃因失眠及抑鬱求診精神科。

7月，黃向陳玉兒透露於戲院中遭梁非禮。

8月7日，精神科報告指黃因性騷擾事件引致抑鬱症。

2008年

梁少光獲校董會續約。同年（未能確定為梁續約前或後），劉遵義將梁少光涉嫌性騷擾之事告知校董會主席鄭維健博士及候任校長沈祖堯教授，期間未有透露受害者黃燕雲身份。

2009年

5月，陳玉兒發現黃燕雲仍於梁少光附近工作，黃因害怕碰見梁少光而每天工作至很晚。

2010年

7月2日，沈祖堯正式上任的首個工作日。校長助理林恬在亦在此時兼任校長室主任，為黃燕雲上司。楊綱凱向沈報告性騷擾事件。

7月12日，黃燕雲突然被沈調職至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工作。疑因調職過於突然，黃反應過大，黃先後被送往急症室及精神科。醫生指黃有明確自殺傾向。黃亦向醫生埋怨沈的秘書林恬在要求苛刻。

9月，據死因庭證人稱，黃燕雲與林恬在單獨食飯，飯局後黃情緒低落。

10月27日，黃燕雲於中大教學酒店因過量服藥而自殺身亡。

12月，黃燕雲姊在黃遺物中發現楊綱凱的機密文件副本，因此電郵沈祖堯，不獲回覆。

2011年

2月5日，黃燕雲家屬就黃燕雲事件再電郵沈祖堯，沈才約見他們，沈指「（黃梁）二人關係密切，不便調查」。

3月，梁少光開始休假，梁指「為自己、中大同住（黃燕雲）聲譽，願意離任」，休假至7月底離任。

2012年

4月20日，死因庭開審。

5月，中大性別平等關注組發出題為〈就2007年黃燕雲遭遇性侵害事件——改善香港中文大學處理歧視及騷擾政策的建議〉聲明。

6月6日，死因庭陪審團以4對1裁定黃燕雲死於自殺。同月，黃燕雲姊黃燕媚寫下〈就2007年黃燕雲遭遇性侵害事件——改善香港中文大學處理歧視及騷擾政策的建議〉，其文可見於《中大學生報》網上版：http://cusp.hk/?p=3036

7月7日，校友評議會的2012週年會員大會中，通過「中大應貫徹執行對性騷擾零容忍的政策，並可主動調查性騷擾事件，並加強對處理性騷擾事件的人員的培訓」的議案。

莊耀洸專訪：評中大性騷擾政策

◆ 周松齡

編按：莊耀洸，中大校友，中大學生會老鬼，非執業律師，現任教於香港教育學院。持續關注性騷擾議題，經常出席關於大學性騷擾政策的論壇，也寫下不少相關文章。

「中大防止性騷擾政策往往都係有大單野發生，因為有壓力要做啲野，就改一改啲條文。」莊耀洸應新婦女協進會所託，自2009年中起，每年按64個項目的檢視清單比較八大院校防止性騷擾政策。根據2012年的統計數字，從各大學的比較中，中大在64項中有52項達標[1]，成績最好。

十年仍未達標

即使中大評分最高，過往十年仍有不少嚴重的性騷擾事件發生。莊說，只要政策改善的難度不高、不太複雜，大學就會改善相關政策。這同時意味著，防止性騷擾政策的修訂很多時都是小修小補。說到這十年仍未改善的地方，莊拿出厚厚的一疊文件，細說由迎新營事件後就一直在批評的問題。

政策方面[2]

	過往十年未達標[3]	改善建議
防止性騷擾委員會的組成	委員會缺乏有性別及基層視角的人士。	加入熟悉性別課題的人士，例如性別研究系教授，同時加入工會代表，將政策的宣傳、教育等傳達至基層職工。
主動調查權	大學在沒有收到正式（書面）投訴前都不會主動調查事件。	大學一旦得悉性騷擾事件，無論是否涉及大學高層或濫用權力[4]，即使是同學間的性騷擾，都應該展開主動調查。不應只從校譽出發，而是從維權及公義角度去改善問題。
性騷擾調停／投訴小組	只有教職員的參與。	全校參與，除教職員外，須加入學生代表及工會代表。
涉及校方高層的個案	未有特別處理涉及校方高層的個案。黃燕雲事件中，由於沒有正式展開調查，事件遂由沒有專業知識的校方高層處理。	調查小組內應包含不同人士，包括校外人士（如校董會委任校董或其他校外人士），以免官官相衛。另外，亦應確保處理性騷擾時不會對投訴人造成任何不利。
法律意見支援	不准許法律顧問直接參與內部調查程序。即使投訴人要求法律顧問陪同，委員會亦不批准。	大學應提供免費法律諮詢，以免投訴人因擔心證據不足而不願投訴，亦能向求助人提供相關的法律支援，以保障其權益。

一站式服務	投訴人求助後須自行處理煩瑣事務，例如：調職、要求調宿、向大學輔導處求助、要求分隔投訴雙方等，令投訴人疲於奔命。	一站式服務，有專責人士全程協助投訴人，又可做「跑腿」。
研究及教育工作	沒有系統地舉辦教育活動。大學未有投放資源或申請更多資源進行相關研究及教育工作。	大學應增撥資源組成研究小組，找出大學性騷擾問題的核心。開設關於平等機會及反暴力的必修課程。
真誠投訴	現行政策[5]過分強調投訴人有誣告或提供虛假資料的可能，使受害人不敢正式投訴。	確保投訴者不會因真誠投訴而遭到報復。

教育及宣傳方面

政策問題以外，在提高防範性騷擾的意識上，防止性騷擾委員會（下稱委員會）似乎在教育及宣傳方面下過工夫，效果卻未如理想。

莊認為問題主要有三：第一，委員會缺乏規劃。委員會所辦的教育活動都只是「走馬看花」，而無認真規劃。應先要知道性騷擾的原由是甚麼，例如可能是人們對性騷擾意識的不足，可能是性別敏感度不足，又或者完全不知道性騷擾的定義等，然後再針對性地去做宣傳、推廣。第二，學校撥款的資助不足，委員會的活動未能接觸大量群眾。第三，活動質素無保證，莊聽過有學生在迎新營裡的防止性騷擾環節中拿性來開玩笑。而且，也難以保證學生及教職員在出席防止性騷擾的講座後能吸收多少資訊。

那麼，如何滿足以上三個要求呢？其背後則涉及全校參與，甚至應和校外民間團體聯絡，否則沒有制衡、監察的機制，只是「自我感覺良好」，便難有真正的改善。

對此，筆者認為，最關鍵的是防止性騷擾委員會的資源匱乏。部分委員（如主席及秘書）是由校方委任。不同於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的主席及其他部分職員都是全職聘請，他們分別專門負責行政、調解、跟進個案及提供法律協助等工作。防止性騷擾委員會的委員則本已有原來職位的工作，例如一人要負責教書、寫論文、行政等等的工作，可想而知他們難以投放很大的心力在委員會上。現時委員會的工作大抵是按部就班，主要依據行政程序做事，如有正式投訴個案則去跟進，故未見有大進步，更遑論要推動營造性別友善環境的運動。故此，學校應該增撥資源給委員會，聘請全職人員，以重新檢討整個委員會的方向，能夠有心有力去妥善處理性騷擾事件。

重視校譽的心態

莊耀洸亦指出，若要妥善發揮委員會的作用，「一半制度，一半係人」。無論是委員會職員，還是校方高層，除了應得到充分的培訓，也應該對提高校內人士防範性騷擾的意識及妥善處理性騷擾事件負上責任。但事實上，學校始終緊張排名、校譽，並不將之放在優先次序。「任何野都係防禦式的。而家都係

爆大鑊果時，校內機制（校方）先黎處理，而唔係從根源去扭轉件事。」

對此，我們從校方處理黃燕雲事件的手法中可見一斑。黃於2010年疑因遭上司梁少光性騷擾而自殺身亡，當時學校沒有妥善處理此事，沒有主動調查事件，也沒有因此改善處理性騷擾政策。直至2012年死因庭開審時，同學們才從大眾媒體得知此事。面對廣泛的輿論壓力，學校成立「處理性騷擾事宜檢討委員會」，此委員會也沒有調查黃燕雲事件，而是抽空黃燕雲事件的事例，憑空討論如何改善防止及處理性騷擾的政策，難以回應黃燕雲事件中校方高層人為過失的問題。事實上，有很多性騷擾事件，同學都是從大眾媒體得知相關事件，難免令人認為學校為顧及校譽而隱瞞事件，直至在傳媒上曝光才正視。

莊認為，要處理這種根深柢固、結構性的問題，高層的意識是很重要的。另外民間亦應有具性別角度的社會運動，以達致內外改變。「呢個係互動，但係有權嘅人既政治意志係好關鍵，如果唔係好容易一曝十寒。要有咁既政治意志、決心同能力。」

對性的適當態度

觀乎委員會對性的態度保守，避免有身體接觸的遊戲，例如迎新營裡「毛毛蟲」等遊戲。莊稱之為「斬腳趾避沙蟲」。「如果任何活動有身體接觸，佢要抽水既話都制止唔到佢抽水……對大學黎講，最好冇身體接觸，掂得愈少愈好，咁就冇事啦。其實咁係另一個極端，唔掂就冇事啦，咁不如叫人唔好講野，唔講就冇事啦。」

人際交往並非如此的刻板極端，「斬腳趾」無助於改善問題。拍膊頭、握手可以接受，至於超出日常生活的接觸呢？莊說這則須詳細討論。「性騷擾或性別歧視，去到最後，係尊重人地同顧及人地嘅感受。」例如，迎新營應提供開放的環境，不應讓新生在壓力下「焗住玩」遊戲，要有真正的選擇參與還是退出，而不被他人白眼或歧視。這才是真正平等的校園。

總結

在黃燕雲事件中，黃本來是防止性騷擾委員會的秘書，但也不敢作出正式投訴。防止性騷擾委員會的處理程序固然有可改善之處，改善政策不乏重要性。但如沒有全職職員及未見校方「有心」來營造性別友善的環境，政策再好似乎也只是充撐場面，未能發揮最大的效用。總括而言，學校應增撥資源予委員會，仿效平機會開設全職職員，重新計劃委員會的工作方向。

另一方面，委員會也應嘗試推廣進步的性別意識，包括推廣我們應如何與他人接觸，並非一味排斥（可被詮釋成有）性意味的行為。問題在於，當大家對於涉及性的言談及身體接觸持有不同的界線時，我們應如何避免防止性騷擾發生而又不會矯枉過正。

1 中大有12項未能達標，包括：(1)鼓勵平等或反性騷擾的教學（包括正式課程）及研究；(2)性騷擾最嚴重的後果：終止僱傭合約（員工）；(3)性騷擾最嚴重的後果：開除學籍（學生）；(4)向受影響人士提供即時協助／初步程序決定是否需要停職；(5)分隔投訴人、被投訴人及證人的安排（如需分隔，清楚訂明應調走被投訴人而非投訴人或證人）；(6)在不同階段及有關程序後安排投訴雙方及證人重新投入工作／學習；(7)可容許被告人出席聆訊；(8)一站式服務；(9)在所有程序中均容許同事／同學、朋友、親戚或志願團體成員陪同當事人；(10)在所有程序中只容許律師陪同；(11)不會突出惡意投訴；(12)邀請學生及各級員工參與。以上資料來源：〈以檢視清單評鑑各大學性騷擾政策〉的「中大、城大及港大表現最佳」部分，莊耀洸著，輯於《教育的性別視角—課堂與教學實證研究》，陳潔華、蔡寶瓊編著，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頁170。

2 根據莊耀洸過往的文章及訪談內容，筆者整理了以下八項過往十年未達標的重要政策項目，並指出莊所提出的改善建議。

3 此處只列出部分重要的政策問題。

4 在第二次「處理性騷擾事宜檢討委員會諮詢論壇」中，委員會建議，即使投訴人不希望處理性騷擾事件，又或者收到匿名投訴，大學都有權主動展開調查，惟其條件是指控中牽涉一名大學高級教職員，及可能會牽涉嚴重濫用權力等。

5 有關政策條文為「如果有任何教職員或學生提出虛假的投訴，或在任何調停或投訴過程中故意提供虛假資料，大學對此保留紀律處分的權利。」

防止性騷擾委員會歷年大事

周松齡

1995年

立法局通過《性別歧視條例》，為香港第一條反歧視法例。基於性別、婚姻狀況及懷孕的歧視，以及性騷擾都屬違法。

「防止性騷擾委員會」（委員會）成立，成員包括教職員和學生代表。

委員會轄下的「教育及培訓工作小組」在校內透過不同渠道作宣傳及教育，如編印刊物、舉辦講座等。

1997年

一名逸夫書院女同學發現被同房男友偷拍半年，為全港首宗透過平等機會委員會法律協助而狀告的性騷擾。案件歷時兩年，1999年涉案男生被裁定違反《性別歧視條例》，賠償八萬元及支付堂費，並需向女事主道歉。

1998年

港大校內一名反性騷擾組織的女主席遭港大男生電郵恐嚇，恐嚇要殺掉她及偷拍她的裸照，犯案男生三項恐嚇罪名成立，判入獄半年，緩刑兩年。

2002年

書院迎新營的「四院互片」出現涉及性騷擾的口號，學生丘梓蕙向委員會投訴，引起廣泛迴響，丘亦因投訴一事而遭受同學排擠，後來委員會判此案構成性方面的敵意環境。

2005年

中大發言人繞過防止性騷擾委員會就丘梓蕙投訴事件發言，表示該案不是性騷擾。

2007年

委員會上載平機會所推出的，首個為各大專院校而設的，防止校園性騷擾網上培訓課程。

2008年

委員會長期開設「推廣活動資助計劃」，鼓勵教職員和學生團體舉辦活動以推廣防止性騷擾及性別平等的訊息。

2009年

委員會定期舉辦晚餐研討會，邀請大學和不同機構的專家和學者與學生研討性騷擾議題。

2010年

前委員會秘書黃燕雲疑遭上司多次性騷擾後自殺身亡。

2012年

中大女職員投訴教育學院教授盧乃桂，指去年遭盧三度強抱。經委員會調查後，被裁定性騷擾成立，時任校長沈祖堯只對盧作出書面警告。盧否認性騷擾。

「處理性騷擾事宜檢討委員會」就回應黃燕雲事件而成立，就防止及處理性騷擾的政策分別辦過兩次檢討會及公開論壇，卻沒有直接檢討黃燕雲事件。

2013年

校董會接納處理性騷擾事宜檢討委員會的報告書，並稱將交予防止性騷擾委員會以制訂實施細則。

回應《大學線》報導：宿生放肆食榴槤　難為了同房

◆ 洪曉嫻、陳玉峰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09年2月號

一月號《大學線》報導了大學生在宿舍房內與伴侶做愛，引起同房不滿。《中大學生報》進行了跟進調查，旋即發現，原來有不少同學，每日仍然啞忍同房的另一騷擾性行為：食榴槤！

同房長期食榴槤　趁其熟睡即有異樣

現為中文大學數學系三年級生阿光（化名），一年級時的宿舍生活異常「難忘」。同房一星期有六天會進食榴槤，開榴槤的水果刀和鋪枱用報紙長期放在房內。

宿舍成了同房的榴槤天地，同房更在阿光面前喝他媽煲的榴槤海底椰雞湯，其味道四溢令阿光非常困擾：「房間那麼小，無可避免會聞到，我根本不能集中精神做自己的事。」

同房吃榴槤製品屢見不鮮，但阿光料不到他會有更進一步的行動。

有一晚凌晨時分，他上床休息，奇怪同房總是盯著他，阿光便佯裝熟睡。未幾同房關燈，竟然開始睇《榴槤飄飄》！阿光對同房的行為非常氣憤：「我很驚訝他不尊重人可以到這個地步，真是可恥。要睇啲咁嘅戲可以去別處，不要在影響別人的地方睇。」

同房榴槤果味刺鼻　垃圾桶見榴槤殼

中大生物化學系三年級生阿仁（化名）的宿舍見聞同樣「精彩」，他曾在房內的垃圾桶發現食剩的榴槤殼：「那一刻忍不住『爆粗』，好驚訝！沒想到自己會發現同房在房食啲咁既野。」

每次回到宿舍，阿仁都要幾番掙扎才打開房門，有時見到同房在食榴槤，好大陣味：「這間房本來我也有份，現在卻變了他的世界……這樣很不公平，大家交一樣的宿費，住同一間房，為甚麼你可以為所欲為食榴槤？又騷擾到我！太自私了！」雖然阿仁曾要求同房在考試期間改食山竹，但對方表現激動，指只要把垃圾清理好，打開窗散下味就沒問題。但阿仁認為，不論有否打開窗，房內有陣榴槤味，始終不是一個好的溫習環境。

食皇帝蕉同惹不滿

在宿舍食榴槤固然造成不便，但食皇帝

蕉也會令人困擾。現就讀香港大學文學院的阿臣（化名），去年為宿舍樓主，一次阿臣要通知一位宿友出席活動，一開房門便見到宿生在床上抱住一梳皇帝蕉係咁食：「那一刻我們都發了呆，唯有扮無事發生。」

阿臣指該宿生幾乎每天都會食皇帝蕉：「仲會食埋西柚！房間經常傳出蕉味，宿友也覺得不滿。加上這些水果味道濃烈，有宿友以為有食物腐爛而嚇了一跳。」

宿舍食榴槤最方便　「食都是生活」

中大社工系阿雷（化名）指宿生要食榴槤，宿舍是首選，方便至極：「我差不多每天都要上堂，如果在宿舍，還要離開中大去食，會不會太麻煩啊？」他認為在宿舍食榴槤並無不可：「宿舍提供了一個生活環境給我，而食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食榴槤無錯　但不應「老奉」

因同房食榴槤而大受困擾的阿仁，指自己並非對宿舍食榴槤行為特別反感，他最不滿的是同房視食榴槤是「老奉」（理所當然），沒有想過會對他造成影響，也從沒有詢問他的意見：「你問我，起碼給我一個機會表達意願，表示你有考慮我的感受……」

同為受害者的阿光，亦認為問題在於同房沒有尊重他，他指食榴槤本身沒有錯，但若影響到別人便構成問題。

中大四所書院的宿舍規則，均沒有明文禁止學生在宿舍內食榴槤。

訪問同學：你介意同房在宿舍食榴槤嗎？

畢謹瑤（中大食品及營養科學二年級）：

「不介意。只要他事先告訴我，我便不會回宿舍。不過我會因自己房間放了昨晚食剩又未洗的碗而感到很不好意思。」

吳造德（中大法律系四年級）：

「不介意。想食生果是很平常的事，如果他只是找個地方開下榴槤，並沒有食埋個榴槤，我認為可以接受。」

舍監立場

伍宜孫舍監殷寶守：「宿生不應該在宿舍食榴槤，就算不影響其他人的情況下也不可以。宿舍不是家，不是一個完全私人的空間，不代表可以隨意在房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回應《大學線》報導：宿生自治　唔關性事

洪曉嫻、陳玉峰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09年2月號

一月號《大學線》以「大學生率性而為」作題，報導校園內的宿舍性生活。相比過往的報導手法，今期實在相當有進步，比如特別採訪了同性戀人的宿友以及舍監等。但細讀報導，卻仍然觀察到寫報導的同學頗受傳統道德規範，以致客觀效果只好結論為「做愛=騷擾到同房=唔好做」；而報導一出，中大更隨即再次嚴厲打蛇。

編輯視點的誤落

《大學線》過去多次報導性／別議題，稍經整理，將近年的報導臚列如下：

87期 出租女友　現身說法
81期 隨「性」有罪
81期 性教育　老師開不了口
77期 香港自由風氣　印傭同性戀者站起來
73期 為矯身形穿內衣　苦果嘗盡仍堅持
66期 淫褻禁書唾手可得　女生沈溺男同志漫畫
60期 未婚媽媽的抉擇

雖然《大學線》編輯同學每期不同，但幾乎所有相關報導都以對性極為恐懼負面的視野處理。以60期「未婚媽媽的抉擇」中，結尾就引述社工說「無論是墮胎、領養或是自行撫養，都會帶來不少問題……真正的安全措施是不發生性行為，年輕人急甚麼呢？」。報導不去處理社會對未婚媽媽缺乏支援的現實，甚至不屑教導同學重視安全性行為知識，還引述社工說：「尤其大學生，以為自己有知識去避孕，就可以有安全性行為，但事實未必是這樣。」；第73期「為矯身形穿內衣　苦果嘗盡仍堅持」全篇文幾乎只是透過穿著矯形內衣的女子自述苦果，去責備她們愚不可及，而竟然完全不討論男性的凝視眼光，才是造成女性急著要滿足他人對女體美觀要求的主因。這種報導手法無一不是在強化現時社會上的性別定型，甚至責難在霸權之下的受害者是有苦自招，這實在是編輯視野的嚴重誤落。

反而今期一月號的《大學線》卻比之前更平衡開放。是次報導較多角度，訪問不少持份者意見，包括有在宿舍進行性行為的宿生、他們的同房、一般同學、舍監以至同性戀宿生都包括在內，非常豐富。

儘管如此，細閱下仍可發現，《大學線》編採同學仍然未能擺脫傳統傳媒報導的影響，報導依然籠罩著對性的恐懼和污名。

將性「非正常化」　性事始終不脫污穢

報導訪問的同學幾乎都已表明自己不太

介意同房在宿舍做愛，重點是事前要溝通清楚。但報導仍然傾向結論同房不應帶伴侶回宿過夜，更不應該在宿舍內發生性行為，以免造成滋擾。

本篇報導嘗試將「食榴槤」置換原訪問中的性事字眼，效果變得荒謬好笑同時，是希望暴露《大學線》的處理實在是將性過份「非正常化」。將性變成異事，不斷強調性事的風險，以及放大討論它的騷擾性，無助於同學真正理解問題所在，反而鞏固了「做愛＝滋擾」的前設。問題已經很明顯：問題不是反對同房做愛，而是需要溝通；問題甚至是，為甚麼在性事的關口舍監會改口說「宿舍不是學生的家」。做愛何以一定具滋擾性？為甚麼似乎同性戀的性事又比異性戀的更為騷擾？大學為甚麼沒有正面回應同學的性需要？

宿舍的確不是純粹私人空間。但住宿學習的其一目標就是與人溝通。生活中還有種種擾人的事，例如：同房在房內進食、看電影時聲浪太大、煮食後不自行清潔廚房、溫習時燈光與打字聲擾人清夢……為甚麼只有性事是做不得，甚至要特別報導？我們時時說食色性也，但特地放大報導性行為，客觀效果上只是更加強禁忌，以致引起誤解，令性事始終不脫污穢。

《大學線》的同學或者會認為，作為傳媒須負上道德責任，因此才會在報導性／別議題時採取保守角度。但真正的傳媒道德難道不是要正面面對性，糾正多年來媒體對身體和慾望的扭曲，為性洗脫污名？

其實……是校園民主問題

據知《東方日報》隨即報導事件，更將大學生的日常性生活誇大成「荒淫」，中大校內各大宿舍隨即加強打蛇。報導的明顯效果，只是提醒了宿舍管理者：「上左報紙！要做野喇！」最終受到更大滋擾的只是各位同學，目前即使通宵傾PRO、做莊務，甚至晚上聊天，男女同學都只能「非法」進行。

由此推展開去，問題不應再留守在「做愛是否騷擾同房」，而是宿舍生活民主化的議題：明明我們知道男女同學有需要深夜留在宿舍，也深明大學生大部份活動例如傾Project、開會都要晚上進行，或者需要在宿舍進行，為甚麼宿舍仍硬性劃線十一點前要清場？這些宿規有沒有經過宿生的民主討論，研究是否切合同學的真正需要？目前仍保留這些規定是否合理？有否需要調整？值得問的其他問題實在太多。

無論是《中大學生報》還是《大學線》，作為校內媒體之一，性／別的議題不但無可避免，亦是同學關心的議題之一，從最根本的方法改變校內對性／別議題惶恐的風氣，是要加強分析這種氣氛的形成原因、引介不同流派對於性／別議題的看法，承認性事的重要與不可迴避，而非再鞏固日趨保守的校園。

輕石激漣漪——中大生「瞓湯石」行動（節錄）

李雨夢

原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2011年5月20日

編按：2011 年，中大生劉璧嘉（Lala，人類學）及羅恩賜（Andy，文化及宗教研究）為抗議宿規，爭取性別友善宿舍，發起「瞓湯石」及「爭取性別友善宿舍之巡迴瞓書院」的露宿行動，試圖引起同學討論及向校方表達訴求。

家長式管治

雖然早已留意到宿舍問題，但真正促使Lala及Andy行動，卻是源於一次很普通的日常經驗，有一次，Lala到了一個異性同學的宿舍做功課，第二天早上被工友發現了，最後收到警告及被要求寫悔過書。

現時聯合書院的宿規列明，同性非宿生可逗留到晚上11時，如要留宿，則須購買四十元的「蛇飛」；但異性非宿生卻只能逗留到晚上九時，而且不可購買「蛇飛」留宿。在罰則方面，同性和異性也相去甚遠：若發現同性屈蛇但沒買蛇飛，只需罰款數百元；但若發現異性屈蛇的後果則除了罰款外，還會被勒令退宿及交予紀律委員會處理。有同學說，個別宿舍甚至會翻看閉路電視記錄，作為打蛇的證據，有些宿舍工友發現垃圾桶有安全套，會在背後討論和猜想屬於何人。

雖然宿舍對宿生的監控無孔不入，但不同宿舍也會有鬆緊之分。在場參與者不諱言，不同宿舍長久以來已建立了不同規管文化，部份宿生早已懂得因應不同的規管文化，選擇適合自己的宿舍。這些潛規則讓宿生在制度的夾縫間遊走，但反過來卻也鞏固了整個制度的運作，令宿生心存僥倖得過且過，即使打蛇極為橫蠻，也無人反抗。

家長式宿舍教育體現在宿規的不同層面，「性」在其中正是令校方最恐懼。因此，Lala及Andy便決定打正「直視性慾」的旗號，參考2009年台大的爭取性別友善宿舍的行動，策劃第一次瞓湯石行動。

與書院高層對話

Lala及Andy以facebook為平台，發起第一次瞓湯石行動，行動的基本訴求是：「短期容許異性留宿，當然這與同性留宿一樣，需要先與同房協商；長期設

立性別友善宿舍，將部份宿舍或樓層改為男女同宿，供學生自由選擇。」所謂「性別友善宿舍」，是指打破嚴格的男女分宿空間設計，針對不同學生的需要提供不同的選擇：「性別友善宿舍是對性別差異的尊重。這種宿舍不只是為情侶，也是給普通的男性與女性。例如我是女性，我覺得與男性相處會更自然一點，我會希望能跟男性同住。即使男女同宿會發生性行為，但已是成年人了，不騷擾到人又有何干？另外，性別友善宿舍也會歡迎同性戀者入住，令性別少數可以在沒有歧視和敵意的環境下生活。」

直視性慾和奪回性空間這些主張，自然挑動了不少人的神經，除了引發網上辯論，書院也顯得十分慎重。行動當晚，竟有五位聯合書院高層前來商談。「那次行動高層很快便出現，我們希望討論是公開性的，因此打算錄影，可到來的高層卻連錄音也不行，可見他們其實並不打算作公開性的討論。」

據Lala及Andy的引述，他們的說法大約可歸納為幾類：「第一是認為香港文化仍然很保守，不會接受男女同宿；第二是家長會擔心女學生被男學生騷擾或造成種種不便，需要顧及家長的感受；第三是學生將來可能會因此影響尋找工作的機會（潛台詞是影響校譽）；餘下則是一些關於性的觀點，背後由大學生的去性化想像支撐，彷彿只因為你是大學生，所以便不應甚麼甚麼。」對於這些說法，她們如此反擊：「傳統文化不必然合理，當它對不同性別身份的人造成壓迫時，便不應順從，而是應該嘗試改變；其次，大學生已是成年人了，為何不容許大學生為自己的情慾當家作主？有些人擔心如果男女同宿，女性將會被男性騷擾，其實這種心態源於一種賺賠邏輯，彷彿女性總是弱勢，總會被男性睇蝕，實際上騷擾問題在同性間也會發生。」

直視性慾還是民主自治

或許正值學生考試與趕paper的季節，兩次矙湯石行動的參與人數不多，Lala及Andy期待考完試後，可以凝聚到更多人一起組織行動及論述，多寫文章讓更多人了解他們爭取的意義。Lala說，可以視他們為種子，現在所作的可為後來的人作一個source參考。作為種子的同時，他們亦打開了話匣子，從性／別維度拋出了宿舍性空間及宿舍民主化的問題，同時將性別友善宿舍的概念帶入公共討論。

與兩位發起人傾談期間，間或會發現她們的論據並不連貫，有時指向大學生的性權，有時則指向宿舍民主自治。宿舍管治的問題多種多樣，反抗也可以有不同理由。宿舍民主自治不保証必然維護宿舍性生活的權利，奪回性空間也不必然指向宿舍民主自治。兩者的關係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事實上，相對於第一次行動的主題（直視大學生性慾，奪回宿舍性空間），第二次行動的主題（爭取性別友善宿舍）在姿態上明顯溫和得多。或者這是首次行動遭遇一定反彈後

的策略調整？Lala並不否認對此感到迷惑，未來的運動方向和策略，仍有待與新加入成員一起商議。

另稿：「＿＿＿＿＿＿＿＿＿，中大宿舍遭縱火」

就著第一次行動，主流媒體也有報導，可是卻與中大宿舍被人縱火一事扣上關連。例如《蘋果日報》在5月7日報導此事的標題〈學生爭性空間 中大宿舍遭縱火〉，引起了facebook上一個「[百搭Key]＿＿＿＿＿＿＿＿＿中大宿舍遭縱火」的event，以指向該報把兩件沒有關連的事情連結起來作標題。活動吸引近1,500人參與，創作出數量龐大的金句。正當此活動如火如荼之時，《東方日報》又於5月9日刊出題為〈中大生怒吼罷看《蘋果》〉的報導，另一波「[百搭Key]中大生怒吼＿＿＿＿＿＿」的event因此而起。兩次百搭key事件起源於對主流傳媒報導的不滿，藉著一次集體創作以嬉笑怒罵形式作為抗議的姿態，以對照出主流媒體的荒謬。

寫在粗口・十年後

王邦華

這十年來，學生報有兩次成為公眾媒體的焦點。一次是2007年的情色版事件，一次就是2004年的粗口標題事件。其時學生報九月號出版了一篇題為〈講普選，你講咩撚野呀？——論普選理據，兼論代議政制〉的文章，被幾份香港報章以「粗口標題惹同學公憤」報導，掀起巨大爭議。現在回看，這完全是一場意料之外的風波。〈講〉文本身是一篇反駁功能組別、論說性強、甚至略嫌沉悶的政治哲學文章，可能正因為其內容，才會採用一個較搶眼的標題。豈料標題過於搶眼，反而喧賓奪主。筆者在輯錄文章時，翻查過去許多評論這篇文的文章，全部都集中講標題，而沒有一篇講普選。幸運的是，這意料之外的爭議，卻催生出許多有關粗口的討論，間接也令人反思講粗口的對錯問題，未嘗不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粗口事件後，許多評論固然是「大學生道德淪喪」、「學生報不代表我」等老生常談的說法，但其中也有關於在公共空間道德規範的深入討論。究竟公共空間的討論和寫作應否出現粗口？學生報於十一月出版了後續的討論文章〈道德高地的虛妄〉。其文指出粗口的侮辱性必須放在特定語境下才成立，而且探討了粗口和低下階層標籤、性禁忌的關係。前者解釋標題不旨在侮辱任何人、沒有破壞規範（嚴格來說，標題的粗口如果有任何指罵對象，那恐怕只有作者自己），後者則批判公共空間何以對粗口諱莫如深。

曾瑞明的〈對道德的兩種區分〉承認禁止粗口的公共禮儀有其重要性，但進一步詢問：這些禮儀是甚麼禮儀？是無根據的約定俗成？還是有理由的批判道德（critical morality）？是不是甚麼禮儀都值得遵守？有趣的是，學生報的〈道〉文也有嘗試分析這問題，揭示公共道德背後的權力結構。

然而為何〈道〉文始終得不到公眾同情和理解，而被人指為狡辯？當時有學者如黃念欣指出學生報的粗口標題忽略接收者的反應，導致信息傳遞失效。〈道〉文中儘管有嘗試解釋標題的語境，但卻收效甚微。鄧小樺的〈困難的話……〉則進一步解釋〈道〉文何以策略上失敗。粗口需要預設一定的友

誼關係才能互相理解，但〈道〉文卻營造出一種「隱然傲岸」、「劍拔弩張的氣氛」，置學生報和大眾於對抗的結構內。鄧文另一方面指出，許多人批評學生報時提出「粗口可以私人講，不可以在公共空間講」，然而這不過是被「馴化」的粗口。粗口之珍貴，正是在於它能衝擊我們對禮儀的模糊共識。如果這些批判完全絕跡，公共空間清潔無比時，又是否我們想要的情景？

十年後回望，這次粗口事件可說是當時學生報無心插柳下的一次對公共空間言論底線的挑戰。在〈講〉文出版前，編輯中沒人預料到會出現這麼大的迴響。但另一方面，粗口標題也不是完全偶然下的產物。當年傾莊時，許多莊員早已就粗口的禁忌和階級意義等作過不少討論。因此這場風波雖然突如其來，但其出現也和一些學生報內部蘊釀已久的想法有關。這也能解釋學生報為甚麼能短時間內立即撰長文解釋。

長文回應的策略和態度固然大有改進的空間，但學生報當時勇於回應質問而不是立即屈服於公眾壓力的態度，有力地挑戰了當時流行的「乖乖讀書、順服權威」的大學生想像。而學生報這種挑戰權威的批判態度，又在幾年後的情色版事件中更加發揚光大。在這兩件事件後，學生報「百無禁忌」的形象已經在大眾之間根深柢固。2013年中大學生報九月號的其中一個專欄名是〈恰鳩里小學 模擬試題〉，在中大校園和主流傳媒之間波瀾不興。這和九年前的粗口標題引起的軒然大波成強烈對比。

這或許也反映出社會對粗口的容忍度愈來愈高。粗口正字（撚、鳩等）雖然依然極少出現在公眾媒體上，但卻多了「金翅仆佳鳥」、「傻的嗎」、「Hi Hi」等粗口諧音和粗口代號。箇中原因甚多，但其中一個應是互聯網的興起。討論區、網上日記、Facebook等挑戰了傳統的公私空間分界。它既是私人的（用戶用以抒發自己個人意見），但又是公共的（任何人也可以瀏覽或加入）。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的分野遂變得模糊。許多人在這些網上空間都粗口橫飛，從而拓寬大眾對粗口的想像。其中一個衍生出來的次文化就是高登有名的粗口代號。

粗口借著代號化堂而皇之進入公共空間，甚至成為主流媒體的修辭之一。於是出現了一個相當奇怪的現象：TVB演員在黃金時段的劇集（My盛Lady）大講「傻的嗎」，扮作不是講粗口，但許多人一聽便知道這是粗口。和十年前相比，這也許是一種進步。粗口由接近完全被禁絕（劉德華1995年台慶講杏加橙，結果無線被廣管局罰款，劉德華也被雪藏），到今日成為主流話語的一部分而無人投訴——雖然是以一個掩耳盜鈴的方式。但另一方面，進步真的有出現嗎？這種粗口代號，無疑是一種被「馴化」的粗口，抗爭性削弱了不少。它們是提高了公眾對粗口的容忍程度？還是在維持粗口的階級觀的同時，又為被壓抑的公眾提供一個便宜又安穩的宣

洩途徑？如果粗口標題今日再在學生報出現，公眾會因為見過許多粗口代號而覺得這不是甚麼大問題？還是會因為粗口代號而覺得在公共空間使用代號是識大體、醒目、風趣的表現，而用正字是無禮、愚蠢、低俗的表現，從而對粗口標題更加口誅筆伐？

道德高地的虛妄
——答一眾對學生報粗口標題的詰難

◆ 中大學生報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04年11月號

10月27日，《明報》報導《中大學生報》中有粗口諧音標題，引起校內同學不滿，亦引述了一些社會人士對本報此舉的批評。我們基本上可以將這些責難歸納為五大類：

（一）粗口字眼帶有侮辱性（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
（二）粗口字眼不尊重（接受《明報》訪問的同學）
（三）粗口字眼有性騷擾的成分（中大新聞組的網上討論）
（四）可以有其他字眼代替（中大三年級曾同學）
（五）低俗粗鄙（可以預見的批評）

學生報基本上完全不同意以上的責難，也因此認為毋須道歉。現謹將理據闡述如下。

詞義須置於具體語境下理解

首三項的批評大致均是依循這樣的思路：

粗口字→粗口→不好（侮辱性、不尊重、性騷擾等等）

本報認為這種思路是錯誤的，因為字詞的意義有需要結合具體語境來理解。普遍來說，一個字或詞語在每一個別場合的語義至少決定於兩項基本因素：所謂本義——例如字典裡可翻查到的解釋（但字典作為標準語言的維護者，難免行使著極挑剔以至脫離現實的過濾機制），和語境——即上下文。某些字詞，如專業名詞，其語境對該字詞的影響會較少，基本上大部分場合以所謂本義解釋便可。但「撚」字所指涉的粗口字，其中一項重要解釋為無特定意義的情緒流露（這種用法雖然十分常見，但亦因相當「粗俗」，且全無經典性，中文字典難免拒絕承認），而此中之「無特定」，則正正待特定於語境。要澄清的是，我們無意否定所謂本義的基本解釋功能，我們一再強調的觀點，不過是其應用場合與方式必須同時考慮到上文下理；而一眾反對者的想法中流露的不辯自明的、一刀切的、唯本義式的解讀視角，正正就是我們於這場小風波裡嘗試提出挑戰、嚴正迎擊之處。

承上，所謂「粗口字」的其中一種用法，就是要表達某些情緒；而對於該字

的理解必須要透過其語境去理解。換言之，粗口字須在一定的語境下才能產生「侮辱性、不尊重、性騷擾」等意思。反過來說，一些普通的字詞在一定的語境下也可有嚴重的侮辱性。我們這裡試舉數個例子來說明。

（一）甲剛寫完了一篇很長的論文，又寫得很滿意，於是對天說了一聲：「屌！搞掂！」

（二）某人於遊覽期埃及其間，見到宏偉得令人驚歎的金字塔，讚嘆道：「估唔到以前啲埃及人咁撚勁！」

在第一個例子中，該粗口字旨在強調一種「終於完成了」的喜悅與滿足，而次例中的粗口則表達了他對古埃及人的敬佩，兩者都肯定沒有「侮辱性、不尊重、性騷擾」的意思。

同理，一些很普通的字眼在特定的情況下也可以表達侮辱或不尊重。例如攻擊別人身體上的缺陷，或是不理他人感受而強調他的一些弱點：

（三）某人帶著玩弄的態度在口吃的朋友前模仿其說話神態：「早…早…早…早晨！」

（四）一員戇直男生穿著新買的襯衣，手拿兩張入場券，盛意拳拳的邀請一位算有交情的女性朋友去一個聯校舞會，不料那女孩冷然奚落：「咪玩啦，好心你照下鏡先啦哥仔！」

可以想像，例三的說話對於一個口吃的人來說是相當侮辱的傷害，而例四中的女子無視朋友一番心意，直截地挖苦朋友的弱點，極盡不尊重之能事。

這些例子均說明：抽離語境來針對粗口字眼並聲稱「粗口字本身有甚麼意思」幾乎是沒有意思的。將我們的出版物不作任何遮掩、原標題掃描到報章上的傳媒，甚至必須回答：如果語境不必被考慮，那麼你們有甚麼理由把那「撚」字施施然的印在報章上，而又不須附以任何申辯或解釋呢？

話說回來，首三個批評，就是預設了粗口字本身就有這些「侮辱性、不尊重、性騷擾」等負面意思——無論語境如何仔細的表明對讀者的尊重，而語調又如何理性。現在，讓我們將「撚」字放回具體語境。究竟標題「講普選？你講咩撚野呀——論普選理據，兼論代議政制之問題」，和整篇文章放在一起看的時候，有沒有批評者所說的意思呢？

原文標題的含義

整篇文章，希望提出三個很重要的問題。第一，「普選」本身是甚麼意思？有功能組別還可以算是有普選嗎？有團體票的情況下可以是算是有普選嗎？這些問題於作者看來，是含混不清，有待說明的。第二，普選的理據在媒體上有深入的討論嗎？第三，為甚麼一定要選舉？代議政制本身是否就是最好的政制？這個問題更幾乎未有討論。

而在嘗試回答這三組問題的同時，回望文章分析的背景，我們大抵會發現，當下香港社會的情形，正正就是：很多人根本不曾真正明白普選為何這麼重要，也不明白普選背後的種種含義，甚至會認為要爭取的人均在「搞搞震」。試想想，對於一個不大清楚實際上是甚麼、又不大清楚其中理據、兼且又鬧得滿城風雨的東西——普選，這些人可以抱有甚麼態度呢？當然就是相當不耐煩而又覺得無聊。這個標題，就是希望去捕捉及模擬這些人的這種心態；而該「撚」字正正就是要準確地展現出這樣的情緒。

真的有「侮辱性、不尊重、性騷擾」？

那麼，這個標題有沒有帶有「侮辱性、不尊重、性騷擾」的意思呢？

從以上的闡釋中，我們可以大約理解此標題是在描述某些反對普選者的心態。那麼，這標題是在侮辱他們嗎？口吻是否有欠尊重？只要仔細思考，便會否定此說。結合正文，作者指出的是：假使沒有清楚解答以上三個問題的話，出現這種態度非常自然。放回真實的情況裡看——社會上流行的媒體中對這三個問題並無深入討論，某些朋友會反對普選絕對不足為奇；甚至進一步說，即使贊成普選的朋友也為數不少，可是如果對此三個問題沒有深思，也是枉然的、不值得高興的。實質言之，作者就是希望透過解決這三個問題來說明：選擇應否支持普選或代議政制時，我們唯有付出認真而知性的態度，才能瞭解普選的意義、需要性及其限制。

由是而觀，只要細心地去解讀，顧及整個語境，便會發現作者毫無侮辱或不尊重他們之意；反過來說，如果換上另一個情境——於一個演講中，李柱銘細說關於爭普選的理由，然後在發問環節，某人帶著相當不屑的語氣，說出像標題一般的說話的話，這就是侮辱，這就是不尊重。但此句子作為涉事文章的標題的話，則很明顯沒有侮辱的意味。而我們認為標題裡沒有性騷擾的意思，也是同理。

能否用其他字詞替代？關於第四點——即可以用別的詞彙代替「撚」字的提議——，假使如前所述：以上的三項批評站不住腳的話，此一「撚」字就根本沒有改變的需要。況且，作者由一開始便認為，沒有比這個標題更能表達那種神髓。「講普選，你講咩野呀」、「講普選，你講咩鬼野呀」、「講普選，你在說甚麼呀」……這些選擇在字面的意思上或許均與現在的標題差不多，但於展現那種不屑神髓的功能，卻顯然無法比擬。當然，不一定所有讀者都會認同作者的想法，畢竟各人的語文經驗繫於截然不同的成長境遇，同一個詞語在我們之間召喚出千差萬別的體會也是情理之常——這問題究竟迴避不了當中或多或少的主觀成分。但無論如何，在前述三項批評站不住腳的前提下，作者自然可以選擇最能表達其意思的修辭了。

低俗粗鄙？——其一：階層標籤

或許有人會說：「說到底，用這些詞彙都是低俗粗鄙！大學生是不應該如此的！」

粗鄙、低俗是兩個稍稍不同的概念，但也大體相近，現姑且放在一塊討論。究竟粗鄙、低俗是甚麼意思呢？為甚麼用某些詞彙就會有粗鄙、低俗的指向？我們認為至少可有兩個理由。

第一，多數使用這些詞彙的人都是所謂的「低下階層」，他們往往予人粗鄙的形象，而其常常使用的語言——如粗口——也會因而與粗鄙的意味連結。

大體而言，「低下階層」就是指那些接受教育較少，不了解或不考慮一些所謂高尚禮儀與品味的階層。從一個略粗糙的理論角度出發，縱然我們嘴裡經常掛著「人人平等」又或「職業無分貴賤」等令我們感覺良好的口號，但我們還是有很多根深蒂固的標籤式理解：例如我們會覺得律師大致是高尚的，而地盤工人則是粗鄙的。此方面的標籤之集合體就形成了一個文化層級的結構（cultural hierarchy），而所謂的「低下階層」就是從這樣的一個框架下去理解。

文化層級本身有著一套意味好壞的判準；低下階層常用的，很多時候便往往會被認定成粗鄙與負面。而若將此判準放在社會意義之下，我們至少還可再思考，比對這樣的兩組結構：一，法律條文或政府刊物的語言是高雅清潔的，粗口或廉價色情刊物的語言是粗鄙低俗的；二，李國能、余若薇、范太或殖民地時代高官的文化形象是高雅清潔的，地盤工人或貨車司機或賣魚旦阿姐的文化形象是粗鄙低俗的。而我們希望從此一比對提出的觀點則是：這兩種結構某程度上的平行，並非出於巧合。進一步說，將粗口的使用或使用者線性地直指為粗鄙低俗，正正就是其中一種鞏固我們社會中整個嚴重失衡的權力結構的支援操作，也正正就是對當中之典型標籤（stereotypification）所潛藏的暴力的默許。

為甚麼會說這是一個失衡的權力結構呢？因為在這個社會中，某些人比另外一些人不合理地獲得異常多的優勢與權力。在先天資質與經濟的不平等的因素，以及後天的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催化下，我們可以理解得到這種情況有多麼自然，而又多麼不合理。試想像一個天資聰敏、家庭環境又好的小明，相對於一個較笨拙而又生於窮困家庭的小強：小明可能只要付出相對地少很多的努力便可獲得不錯的成就。天資與經濟環境固然不能抹平，可是，即使撇除這些決定性的、無可改變的因素，文化層級的標籤卻在加劇這不合理的失衡。順延這個方向推測，小明最終可能會成為一位律師，而小強則也許會成為一名管理員。我們可以想像，小強是一個好好先生的機會，絕對不比小明低——幫助別人、為朋友兩脅插刀、愛護家人等等的美德絕對可以在小強身上實現。但不知為何，他的說話，縱然是頗有道理，

但在他人心目中就總是沒有甚麼分量，而小明卻隨便說些話便會有顯得很有說服力；小強由小至大喜歡打乒乓球，被人譏為「大細路」，但自小隨父親打網球、打哥爾夫球的小明則被視為高尚；小強所慣用的「粗言穢語」常被視為粗鄙，每當他提起便被人回以白眼，小明的一口英語卻換來別人的肯定……我們認為，這些對低下階層不公平的例子實在多到無法數清。這些對於「低下階層」文化一刀切式的藐視，實是對他們的自我認同，以及別人對他們的肯定都有莫大的影響，而因為身份的貶低會令到他們在為自己爭取支持及社會資源的時候處於一個頗不利的位置，例如小強在媒體面前表達自己對社會福利的意見，傳媒根本不會報導，就算會平常人可能也不甚重視；但假如是小明的話我們可以想像會是完全另一回事。如前所述，當我們依據文化層級的典型判準生活和相處時，所不得不面對的惡果，便是對低下階層的暴力的縱容與默許。真正反映個人修養的素質——就例如那些絕對有機會在小強身上體現的美德——就得不到其應有的判準意義。

從這裡出發，首先，我們希望描敍出這種典型標籤以外的風景，我們認為：我們的文化層級的背景不能決定我們的語言作風，這情形並非那種「在美國長大的人就講美國話，在澳門長大就講澳門話」那種決定論式的例子；我們，無論是曾經負笈遠洋的大律師，還是新移民來港的邊緣勞工，無論被標籤成高級或低下的人，都有選擇語言作風的能力與自由。無論擁有教育資源多寡，每一個人都可以既講粗口，又以所謂純潔的格調發言或寫作——說話謙遜優雅的「低下階層」無處不在，一若有時爛口爛到七彩的大學生或《中大學生報》編輯四散於「高等學府」之中——暴力的標籤與個別的表述風格之間，有一決定性之距離。

第二，以此反省角度，檢視某些認為「大學生應知書識禮、斯文大方，不應該講粗口」的觀點，我們便可明白，這些觀點正正就是上文所指出的、極其危險的標籤系統之下的產物。我們不獨拒絕認同此一僵化的理解方式，更希望指出這種理解方式的其中一個微妙的癥結在於：此一標籤系統也許肇因於種種複雜的、不易辯清的歷史發展，但呆在文化層級低處的「低下階層」，其實是極難反抗此標籤系統之壓迫的——一方面「低下階層」因為受教育機會較少而擁有較少資源去解拆其中問題，另一方面，就算「低下階層」可以越過此有限教育機會的障礙，意圖去影響社會，亦會因為典型標籤的貶抑而事倍工半；而考慮到我們大學生的身份、部分公眾對此身份的暴力的期望——如前述的「知書識禮、斯文大方」、整個暴力格式的困頓，在本報以至日常生活中以所謂粗口發言或書寫，實在是對此不動如山的文化層級、標籤系統及其暴力的，勉力為之的反抗與批判。

低俗粗鄙？——其二：性與禁忌

承上，第二個粗口會被部分人反射性地理解為粗鄙的理由是：這些字彙的本義都是與一些禁忌如性、排洩物等有關。性與禁忌帶給人的粗鄙低俗的印象，就此烙印在粗口之上。

關於性或排洩物為甚麼會發展成禁忌，或其牽繫的危機，因篇幅關係，容許我們於此處不贅。然而，我們亦希望至少提出兩種態度：首先，與「禁忌／禁忌以外」相連的「負面／正面」判準，頗有可質疑處，本報認為我們決不應馴順地全盤接受。第二，那怕我們最終選擇接受，也應用盡努力去維護別人拒絕接受這種判準的自由；而千萬不能以人云亦云、眾志成城的強大氛圍向特立獨行的小眾施壓。

關於第二種態度，持懷疑論者或會發問：一旦有人假借行使這種所謂自由之名，而行放肆撒野之實（例如當眾便溺／做愛），將他人感受拋諸腦後，那我們的社會秩序如何得維繫？我們如何安靜地生活下去？我們願意指出的是，此處所指之自由與我們甘之如貽的出版、言論、結社、信仰等自由一樣，是須與其他大家珍視的價值——例如對別人痛苦的同情——同時操作的。可是反過來說，這也絕非意味每有人對踰越禁忌的行止「表示反感」時，挑戰禁忌之舉便得被停止。很多言論本身就會惹人反感，而這些反感很多時都遠比觸碰禁忌所帶來的反感為大（如討論到一些信念問題），但我們都堅持所謂的言論自由——一方面我們認為不斷的討論是社會進步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我們認為人人都是平等的，每人都有表達、以及自己的一套表達方式表達的權利。我們無意將這自由無限制的放大，最終的判斷就如這裡上述提過的閱讀寫作的判斷方案類似：如何處理挑戰禁忌的自由（批判的鋒利）和信奉禁忌者之感受中間的張力（內化的、感官的脆弱），牽涉到個別情境的各種個別元素——但要指出的是表達的自由在具體的考慮中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比重。

因此，以今次「撚」字事件為例簡單說明：我們認為，挑戰這種禁忌的自由，不必為了相對輕微的反感而犧牲；值得考慮的環境元素如下：

（一）中大總流動人口約二萬，《中大學生報》的印數約三千，派發位置為中大本部，預設讀者主要是中大同學，其次為工友、老師和職員。

（二）粗口在年青人日常生活的使用情況普遍，而「撚」字則幾乎可說是最被廣泛利用的粗口字。

（三）在日常生活中完全不接受粗口的大學生為數不多，當中有一部分是「我唔介意你講甚至我想你講但我自己並唔係太識講」，剩下來自然也有對粗口反感的朋友，但反感程度往往只屬輕微，頂多只會偶然呻句，「乜你咁架！」更重要的是，這種「反感」意味的是奇怪、鄙夷或不屑而非困惱與痛苦——可

能比一次習作被打上低分的苦惱還要輕微。

（四）在公開發表的文化表述中寫作／閱讀粗口已有不少先例，大家從來不以為意的港產電影至少有《籠民》和《春光乍洩》；十年前的中大更有《小門報》、《西門報》等蔚然成風的獨立出版浪潮，如果粗口真是顧名思義地粗野，則這些刊物之辛辣文風幾可謂無堅不摧。而與之相較的話，本報的「撚」字及其作者屈機本人，簡直班門弄斧，連提鞋也不配。

（五）性在本地社會中依舊是禁忌，例如我們不會在繁忙時間的地鐵車廂內放聲討論自己或誰誰誰的自慰頻率或性交體位，例如無愛情關係的異性朋友間絕少會談及一己的性徵（如乳房的形狀或包皮的長短）——但也不是所有性的內容都與公共討論絕緣，例如初夜年齡、避孕方法的效率、今晚阿邊個會去阿邊個到「瞓」等等，年青人對此尤其不介意。

（六）在公開發表的文化表述中寫作及閱讀性已有不少先例，例如《蘋果》、《東方》、《太陽》均有色情專頁，小說專欄信箱廣告照片比比皆是。

（七）更重要的是，在該涉事文章的語境下，本報在題目中加插一個「撚」字幾乎完全沒有引發性的情味。

從上面七點說來，這次本報發表的作品以「撚」字為題一事，其實也許連踰越禁忌都談不上，更遑論對別人造成傷害了。

語義的流動

有些人或許會回應，那些粗口字詞很久以前的大部份用法都是負面的——如辱罵本義都是不雅的——如陽具，所以它們就是粗鄙。這種缺乏對語境考慮的想法固然站不住腳，但即使只關心其本義，此理解也頗有問題。隨著時移勢易，字詞會因具體應用而豐富了其意義（如「界」、gap），甚至該字詞的普遍用法及解釋亦會隨之而變化。如「風流」的日常解釋已是濫情濫慾，拈花惹草，不再意味「如風之飄，如水之流」的出塵氣質；「鹹濕」現已作好色甚至猥褻解，不再是指鹹與濕的食品（如話梅！）；「十下十下」現今亦不再解作「柒」，「大鑊」的「鑊」亦不再指強姦（原義資料出於一位網友）。而「撚」字所指涉的粗口字——以至所有港用粵語粗口詞彙——今天之引申義所觸及的範圍，亦遠遠超過了陽具的原義了（部分闡釋可參見本文首節）。忽略這些改變而執意視原初之用法為唯一合法的用法，實在是否認一個字詞的語義會隨時間改變此一確鑿事實。

本報認為，真正的粗鄙、低俗乃決定於文章本身。如果有讀者提出了合理充實的理據舉證本報文章嘩眾取寵、觀點沒有批判性、盲目向主流靠攏、力求政治正確等等，並因此而批評本報低俗的話，本報絕對會欣然接受。

結語

總括來說，本報對於社會一般上對於粗口字的評價相當質疑——這根本上就是迷思。硬要去指控粗口字本身必然包羅了「侮辱性、不尊重、性騷擾」這種種惡質，根本就忽略了將字詞的本義結合語境去理解文句語義的必要；將涉及禁忌的東西一棒打成負面、將粗口以不證自明的語調講成粗鄙低俗之物，更是相當野蠻的理解方式——後者還隱含著貶抑「低下階層」的想法，默許將典型標籤黏貼在低下階層的暴力。

岔開一筆要提的是：有反對聲音說《中大學生報》的同學仔私下無論講幾多粗口都可以，但用中大同學的錢，在《中大學生報》上刊登，就是「代表」中大同學，就是強姦民意，就是污蔑校譽，就是不對（！），云云。我們希望回應的是：本報一直以來也有不少應該批評、值得反省的地方，例如脫期，例如校對粗疏，例如反應遲鈍，例如文章或版面乏善可陳，例如表述介面十年如一日；但今次「粗口」事件，可卻自問是有料到的（！）。那怕是從最建制的角度來論證，我們今年春天得到千八位同學的支持，對我們及我們的政綱投下信任一票。因此，我們的政綱從千八張選票中得到了最起碼的建制基礎，而我們在政綱上寫上甚麼諾言呢？「……『思』則是指批判性思考，『三思』即指反復……批判……」、「析解文化現象……批判因循已久的固有觀念，破除迷思……」、「毫無保留接受這些文化……我們希望透過分析，批判……」本報在此事上的發言與討論——關於以粗口書寫的批判意義請參見前段——，正正就是兌現了一份合法的、有「代表性」的政綱上的期許。今次，算對得住學生報三十多年豐富鋒利的批判傳統，算對得住曾給予我們支持的同學啊。

其實，這場粗口論爭關係到的範疇幅員遼闊，且枝節複雜，本文即使字數長逾四千，亦不過水過鴨背，遺缺與未善之處不勝煩舉；部分刊登在報章上的所謂回應之局限更不問可知。若有朋友仔想繼續傾、狂傾、怒傾、齋傾，可逕上范克廉樓會室或與我們電聯。

最後，希望大家不會因為此事而忽略了該篇文章的內容：對代議政制的種種質疑與擁護的思辯。若然因為題目有爭議性而最終使人忘記了題目以下的正文——大概沒有比這更遺憾的事了。

對道德的兩個區分——借楊國榮及鄧小樺的觀點談學生報刊登粗口事件

◆ 曾瑞明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05年1月號

「如果優秀的年輕人以為，承認別人已承認的真理就是喪失了創造性，那麼他就大錯特錯了。」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筆者曾在學生報生活，但現在又近乎脫離。對於學生報刊登粗口的事件，說不上是很驚訝憤怒，也說不上是默默支持。但對於學生報的言行和做法，也會特別的關注，故希望能在此時此刻，就此事提出一些論點，就這件已經近乎close file的事件帶來一點活力。

在11月15日《明報》的論壇版看到楊國榮先生和鄧小樺小姐就這件事發表的文章。編輯用意很簡單，就是要有正反的觀點，但這種正反觀點之間往往存在了更多的觀點要考慮。而本人亦認為楊國榮先生和鄧小樺小姐在明報論壇版提出的論點，如果認真對待，其實有很大的偏頗。公平起見，本人願意相信這可能是論壇版的字數限制了他們最有利的去陳述自己的觀點。而現在，筆者希望指出他們該篇文章可見的缺失，正是沒有對「道德」一觀念作出重要的區分，見以下分析。

公眾道德和私人道德

鄧文說「粗口一直象徵『粗鄙』、『沒有教養』指向低下階層。但其實誰都知道，這世上存在著大群講粗口的大學生、OL、記者、教師、CEO、高官，餘不一一。不過我們這些成功人士知道，必須懂得在適當時顯得像個不講粗口的人（蔡國光也說私底下講沒有問題），才能穩保自己的成功。」因為「如果不戴上犬儒的溫文面具，不做一個精神分裂的人，我們自己就會一敗塗地成為低等人類。筆者無須否認這種情況的存在，但鄧氏的看法，只解釋了部份人不在公眾場合說粗口的原因（cause），就是因為他們虛偽。但是她沒有留意，我們不在公眾場合說粗口，其中一個理由（reason）正是因為那是公眾場合。

公眾的道德（public morality）和私人的道德（private morality）是不同的。例如在私人場所做愛並沒有問題，但在公眾場合則會被視作不雅，而且那是傷害了、侵犯了別人。同理，即使覃同學認為在私人場合說粗口沒有問題，但也不代表在公眾場域，即在學生報說粗口沒

有問題。除非鄧氏和覃同學能證明，這區分是不成立的。否則不可以用「精神分製」來充份理解那些反對在學生報說粗口的人。

現在，不見得有很多人要把粗口驅逐，起碼在私人場合在彼此的同意下，朋友之間用粗口互相對談，很多人不會認為那有問題，甚至認為那是賞心樂事。但是在公眾場域說粗口，便要考慮其他人的感受和反應，因為約定俗成之下，粗口本身是充滿侮辱性及與性有關的暴力—— 這似乎難以抹殺。當然，如學生報所說，約定俗成的意思可以在不同語境下改變。沒錯，在某種特定的語境，例如舞台上，當眾做愛便可以是一種藝術表現。所以最重要的是，學生報有沒有給予讀者提示這是甚麼語境？如果有，提示是否足夠，讓其他人把握這語境？但老實說，現在的效果不好，很多人都覺得不以為然，身為傳媒，發放訊息的學生報，好應再反省、再努力。

我想，很多人不滿學生報使用粗口，不是因為要趕絕粗口，而學生報也不用擔當捍衛粗口這個角色。另外，如果要捍衛粗口，那究竟捍衛甚麼呢？是粗口指向的低下階層還是粗口約定俗成的侮辱性和與性有關的暴力？這當然可以再深思，但筆者認為這件事的核心的問題是，學生報有沒有好的理由在公眾場域使用粗口。由是，如果《明報》論壇版編輯把鄧小樺這篇文章列為這件事具代表性立場的文章也是危險的，因為該文章並沒有就這核心問題提出立場和見解。

批判的道德和鸚鵡學舌式的道德

楊國榮先生文章的立場也是有相當危險性的。他說「禮是一個社會的共用符號。它是社會的黏合劑，讓人們生活在一個共同的符號世界裡，建立彼此從屬的感情。它也是人與人溝通的方式，不尊重這套符號，就是不尊重所有生活在符號系統中的人。在一個默哀儀式之中，你一個人大叫大跳，甚至只是一個人躲在一角擠眉弄眼，說沒有不尊重都是說不通的。默哀是一個禮儀，在那兒有所謂得體與不得體的行為。學生報的出版也是一個儀式，代表著校園的社會關懷和學術良心。二者同樣是嚴肅的事情，二者同樣需要處理得合禮。」

似乎楊文有一個含義是最終決定行為是否正確的標準是禮，但老土的都問一句，禮從哪裡來？是純粹約定俗成還是有理由支持？如是令筆者想起批判的道德（critical morality）和鸚鵡學舌式的區分。後者只是不加反思的接受社會的道德觀。而前者則是要反思的，給予理由的。如果只因社會大眾不喜歡粗口，而把有關粗口的討論禁絕，那是錯誤的，故筆者認為楊文有其危險的一面。但如楊文所言：「禮當然不可能一成不變。」要改變，可以靠輿論，可以靠暴力，但最好還是靠理由。故此，學生報當然可以在其刊物討論說粗口是否真的不合禮，或者是不是在所有情形下都不合禮，但最根本的，都是理由的提出。但觀學生報所刊登的《講普選》似乎是使用（use）粗口，而不是討論與粗口有關的問題。雖然學生報後來解釋了其

立場，這已難免給人魯莽和嘩眾取寵的觀感。學生報亦應明白，要改變社會對粗口的看法是需要漫長的討論和思考，不可一蹴而就。而且他們自己或許更要思考，對粗口的看法真的需要改變嗎？要改變的是甚麼？他們擔當的是甚麼角色？這角色適合他們嗎？

學生報無疑可以就社會的道德、文化各種前設提出質疑，這也是它可貴之處。但作為旁觀者，在今次事件，未免覺得學生報對於一些subtle的問題，太快下結論了；而且在整個過程中，也陷入一種學生報／同學＝啟蒙者／俗見者的對立之中。作為年青未成熟的學生報，作為過來人的我，深感這種對立絕不健康，也對學生報絕不有利——這也確令我這脫離了學生報的人傷心和擔心的。

困難的話（節錄）

◆ 鄧小樺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05年1月號

討論是這麼困難：實際上的情況總是，你沒有擁抱兩個壞選擇的其中之一，但別人堅持你有。如果你正面理會（先別論承認與否）這些邏輯，就很可能淹死在一大堆你不想回答的問題裡；如果你完全不理會，你又怎能肯定，自己真的與他們不同？至於你想說的話，它很可能是實際上沒有說出來——或更壞的，在意義上被取消了，即你說了你想說的話，但你已變成與你所攻擊的人同樣的人。這樣想著難免心情很壞，懷著這樣的壞心情面對論爭，怎麼能不變成「潔身自好的犬儒主義者」呢。

關於中大學生報的粗口標題事件，我數度與人討論而不得要領。我大概顯得十分同情學生報，總會有一堆人說「不用這麼幫著他們吧」、「要客觀」、「愛學生報的話就先教好他們」之類的話，結果我的論點就被「幫學生報」這個立場帽子遮蔽無餘。好吧，且讓大家看看我到底有多「幫著學生報」。以下3,000字謹獻給希望溫文而長篇地怒罵學生報的讀者：因為不斷被人將我的立場等同於學生報，我已累積了與你們相近份量的對學生報的怒火。

Part I：學生報，你不是沒有縫隙的

對外界針對粗口的抨擊，學生報有洋洋7,000字回應〈道德高地的虛妄〉（下稱〈虛妄〉）。不過最後被傳媒所引用的，無非是「認為用字無粗鄙之意，因此毋須道歉」的斬截立場。學生報之所以堅不道歉，其中最重要的理據來自「語境說」，我這樣說是因為在〈道德高地的虛妄〉中，學生報用了超過2,500字去分析粗口並非本質地具有侮辱性，同時釐清〈講普選，你講咩撚野呀——論普選理據，兼論代議政制之問題〉（下稱〈撚〉）的語境。學生報的論點在此不一一重複。〈虛妄〉出來之後，似乎沒有怎樣獲得普遍同學的同情；尤其因為這樣，學生報不可以放棄策略性地考慮其中所包含的各種因素，因為由始至終，學生報，必須面對同學。

多麼乞人憎的學生報啊！

大概在反對者看來，〈虛妄〉一文所提供的大量（接近轟炸）論據，無論多麼周詳，與〈撚〉事件所呈現的「實際狀況」，始終有著不可彌合的縫隙。〈虛妄〉一文不能彌合這種縫隙，因此才被覺得是「狡辯」，而且說得愈多愈像狡

辯。我認為，探索這縫隙的起點，是回想一下文字書寫與面對面交談的分別。在面對面交談時，我們擁有較多條件去肯定溝通的環境條件，因此語境會較明晰地呈現出來，意義能夠較清楚地被交談雙方把握。然而書寫（writing）是一種「不對等交流」，溝通雙方並不能即時釐清、修訂信息的內容，因此溝通過程會出現理解差異。我實在不願推出德里達或德曼式的結論（「語境是永遠不能絕對框定的」），因為我覺得學生報的問題不在於他們斗膽想框定自己所寫的東西的語境——即使問題與此密切相關。

學生報說，粗口字的意義必須透過語境去理解，只有某些語境之下才會表達不尊重或侮辱之意，我想這在常識上是很難反駁的。問題出現在〈虛妄〉一文嘗試框定〈撚〉的語境的環節上。〈虛妄〉稱，「你講咩撚野」意在表達反對普選者「相當不耐煩而又覺得無聊」的「不屑神髓」。一般而言，粗口在「轉述」語境之下通常都被允許，這種轉述包括文學作品中角色所說的話，像《紅樓夢》裡薛蟠唱「一根雞巴（音譯）往裡㸐」無損《紅樓夢》的文學地位，《書劍恩仇錄》裡蔣四根常說「丟那媽」而金庸還是文豪，而報章直接引述「你講咩撚野呀」仍然是作為天下公器的傳媒。大家都是轉述別人的話，偏偏〈撚〉就中招，最直接的解釋應該是，誰都看不出那是轉述語境（例如本人，始終讀不出該種不屑神髓，看過〈虛妄〉一文後仍讀不出）。〈虛妄〉一文有一句「回望文章分析的背景」堪稱全文的陰影部分——你所指涉的是此時此地的現象，虛構和模擬的是某種你所認為是典型而非個別存在的角色或形像，而連與你同處一時一地，教育程度相近的讀者都讀不出你在虛構角色、模擬講話（這麼常見的修辭技巧），你還要覺得是不可代替的表達方式，是不是過於一廂情願、自以為是？人家覺得你是狡辯，豈非正常？

由於〈虛妄〉沒有直面「修辭失效」這顯而易見的缺失，而逕自解釋自己的原意，就造成了一種「發言壟斷訊息之解釋」的感覺，而這種感覺在以書寫溝通這語境漂移不定的背景下，令前文所述同學眼中的〈虛妄〉與「實際狀況」的縫隙，更加顯化。此日的我們應該特別懂得，不應給「作者原意」太高的位置。廿三條和四十五條的爭拗餘波未了，政府旋風式推出「中學生基本法常識問答比賽」，林瑞麟當然會說這是為了增加對基本法的「認識」，中立、客觀、無害的認識；如果以「原意」為標準，我們有何立場說，在此時此地，結合問答比賽設有標準答案的模式，政府此舉實意在統戰而非認識？學生報應該清楚記住，在為自己辯解的同時，不可放棄批判林瑞麟等的理據，最好還明確地在各方面顯得與其截然不同。大講「原意」的還有前段時間來港的原基本法起草委員們呢。

當然，我不可以太隔岸觀火。作為事件的主角，作為肇事文章作者，學生報與

哲學系學生覃某（此名不穿鞋子通山跑又沉迷哲學書籍的可惡小子），解釋自己的原意是必要的。在我眼中，意圖既然不等於你做了甚麼，然則解釋原意無非是一種倫理姿態，即解釋「我並不意在侮辱你，你又何必生氣」，而平息對方感到自己受辱的忿懣。那麼這種倫理姿態為甚麼會失效？大概是因為，在日常情況中，誠懇的a向b解釋說「我並無意侮辱你」，下一句通常是「如果令你感到受侮辱，我向你道歉。」而學生報則說，「我無意侮辱你，所以我不道歉。」這難免被理解為傲岸。我完全無意設立一種現代禮教來判斷這種回應是錯是對（我更希望我和該類君子有著明確的區別），不過這種回應所提示我們的，是一種劍拔弩張的氣氛，像范太要長毛道歉，而長毛拒絕。

而我要強調的則是，同學與學生報的關係，絕非范太與長毛，這偏偏是〈撚〉文告訴我的。

<u>不是范太，不是長毛</u>

談到粗口，其實無法迴避最近在中港台三地都大紅大紫的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哲學家斯拉沃熱·齊澤克。齊澤克提到他在服兵役時，與一位阿爾巴尼亞士兵交誼甚厚。阿爾巴尼亞人對涉及自己最親密的家庭成員（母親與姊妹）的性污辱十分敏感，但齊澤克與他的阿族朋友竟用這種方式打招呼：

「是那位阿族人開風氣之先的。一天早晨，他給我打招呼，不過沒有說『你好！』，而是說『我x你媽！』我知道這是他發出的一個挑戰，我必須作出恰如其分的回應，所以我乾脆回應：『請便，歡迎，不過得等我和你妹妹完事之後。』這個對話很快失去了它表面的淫穢性或諷刺性特徵，而成為一種常規會話形式：過了沒幾個星期，我們倆就失去了說出完整句子的耐心。每天早晨一見面，他就會點著頭說：『你媽！』我也只是簡明扼要地回敬道：『你妹妹！』」

上述情形很接近在學生報編輯之間交換粗口的情況。我願意強調的，是齊澤克指出，只因在他和阿族士兵之間存在著預先假定的平等（a presupposed equality），二人之間才會有這樣的淫穢儀式。換言之，〈撚〉會逕直使用粗口字為標題，未嘗不是一種友誼心態的投射，該文作者假設讀者像他的朋友一樣信任和理解他（也許還包括遇分歧會理性地討論），像齊澤克一樣知道「這是他發出的一個挑戰」，懂得「作出恰如其分的回應」。對我而言這種假設的明顯性遠遠強於「不屑神髓」。現在大部分的反應都十分冷酷：「誰和你學生報是朋友呀」，遮蓋了另一個令人微帶感傷的說法──「學生報信錯了各位」。也許是因為處於論戰氣氛中，也許是因為在有人向傳媒報料的行動中發現了敵意，〈虛妄〉一文也放棄了這個美麗的「友誼假設」，使得其隱然傲岸的倫理姿態更難獲得同情。即使范太新寡楚楚可憐，長毛不可能向范太道歉，因為他們處於對抗的結構內，道歉會推翻前者所抗爭的價值。怎樣才能不置學生報與

同學於對抗的結構內？我甚至忍不住幻想，「對於那些願意接受粗口並不本質地帶有不尊重或侮辱意味的同學，尤其願意推翻粗口的階層標籤及禁忌意味的同學，學生報願意向你們道歉」，這個太過滑頭的說法會不會有好一點的結果。當發現我們所說的話都被結構決定的時候，或者就需要滑動。

其實另有一個對學生報更為不利的假設。假如學生報的態度是：無視校內外的各種反對聲音（要知道這些聲音的保守可能也是被學生報的兩篇文章所激化的）、無視這些行動的總和對於校園和作為組織的學生報到底有何效果，只單單覺得自己寫了一篇自己看來全面週到的回應文章就可贏晒收工大吉、得到了獻給理性之神的勝利，這就是超級的一廂情願和自我感覺良好，或會導致目前的支持者（包括我）倒戈。一廂情願這個詞在本文裡多次出現，因為這始終是我覺得自〈撚〉文以下一個無法抹去的陰影。即便粗口不是本質地具有負面意義，在標題中使用粗口字的影響應該是可以預見的；粗口字出現在一篇並不直接討論粗口的文章中，始終是把第一戰場讓出，讓傳媒和某些保守人士掌握了主動權，而學生報的回應則一如既往地不適合於傳媒發表，一再一再地讓出了社會性的戰場。這種策略比較接近行為藝術，多於〈虛妄〉一文所擺出的理性討論姿態及社會運動式目標。雖然，我比較傾向相信「撚」字出現是出於上段所言的錯誤而美麗的「友誼假設」，但我覺得學生報（以及覃某）還是應該更策略性地考慮整件粗口事件，起碼與上述的一廂情願自我感覺良好者劃出清楚距離。

[……]

Part III：從黃霑到校園，但仍在社會

黃霑@馴化

不文霑最近去世，大家少不免在對他的追思中，提到他常講粗口，一般都會評之為「真」、「講得好好聽」。這令我想起，有一次與一位相當疼愛我的前輩（他當然也偶而講點粗口）聊天，我爆了一句粗，他登時整個人一彈，說：「嘩乜你D粗口講得咁難聽架，講粗口都可以講得好聽架。」區區鄙人當然不能和黃霑相比，但值得思考的是，「好聽的粗口」到底是甚麼意思？

另一位文壇前輩素以好老師與好父親形象深入民心，他喝醉了酒就會講點粗口，這是眾所週知的一項奇觀。有一次他微醺之下爆個小粗，然後訕訕地向我解釋：「因為得你一個女仔（鄙人以粗鄙形象深入民心）喺度，我先咁樣講咋，第個喺度唔講架。」我一心助興，下句連出三個粗口字，他當下一震，竟席沒有再講一句粗口（酒是喝了不少），鄙人助興反成敗興。

「好聽的粗口」（它的另一面是「罵人不帶半個髒字」，古龍小說常對此讚譽有加）和醉後的粗口一樣，都是馴化了的粗口，所迴避的是粗口所帶有的濃烈的抗爭氣質。粗口不但以暴力語言的方

式時常出現於對抗性環境，它還是許多藝術工作者挑戰社會禁忌與意識型態的常用工具——這些挑戰往往被冠以「嘩眾取寵」的罪名，以取消其正當性。相反，私人朋友之間的粗口便較被允許 ，不但是因為所謂現代社會姿態上必須給予「個人」更多空間，同時也是因為，一旦承認「私人」、「個人」的性質，它的公共抗爭意味就大大減弱。因此，當我們不斷強調黃霑的粗口乃出於他的「我自求我道」，其實是同時馴化著黃霑：因為粗口是黃霑的「個人」嗜好，我們只須「欣賞」、而不必正面思考他所依靠的價值對主流價值的衝擊。到最後，黃霑的方方面面就被削減至剩下「與我們一起成長」（其實全球人類都和我們一起成長）的溫情一面；通過如此，我們就保衛了「我們」，混雜、搖擺、意識型態與掙脫意識型態的衝動糾結不斷的我們。

黃霑死後的悼念活動還令我想起一些事。就像八十年代參與學生組織的科大社會科學部助理教授馬嶽所說，中大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挑戰禁忌的事（他認為這是好現象）；以我所知，上一次是90年代中期的小報熱潮（有興趣者可參考《中大四十年》「小報」部分）。在我做學生報的本科生時代，有些昔日反對小報風格的老鬼自海外回歸，看到校園死寂一片，不禁為文慨嘆：昔日的小報雖然過激，到底當時的校園是眾聲喧嘩、大鳴大放的，總比現在的情況好一點。這個例子並不是要證明「反對粗口的人到最後都要贊成」，而是意在指出，對某些人來說，唯有通過感性懷舊的朦朧薄紗，e.g.「死後的馴化」，激進的挑戰性行為才能被接受。我們不禁要問，當今時今日中大校園發生類似的抗爭主流意識型態事件之時，這些緬懷小報風采的人士到哪裡去了呢（physically彼人是在中大）？會不會，等學生報也棄械投降化作繞指柔，再過數年，彼等才會走出來憑弔昔日冥頑不靈的骨氣？

「到底校園發生了甚麼事？」

這次粗口事件有一點出人意表的，是除了意料之中的明光社、教協等衛道組織之外，一些四十歲以下、畢業於中大、任教於學院不滿十年的青年學者，在大眾傳媒上為文抨擊學生報或「解釋」學生報與同學的「溝通失敗」。以前某些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會將我們的諸多怪行一笑置之，我當時還覺得不滿（因為這和蔡國威所說「明白大學生思想前衛」一樣，下一句可以是「普通人不可以有樣學樣」，差一點就是現在常見的微帶嘲諷的「藝術／前衛」標籤），原來今日尚有等而下之。

當年小報出現當然也挑起了反對聲音。主流媒體如常的獵奇式報導、以所謂的道德標準質疑：「大學生講粗口呀！仲講性添呀！」根據當事人的憶述，當時的校園討論並不理會這些「道德聲音」，討論的是更加細膩的學生組織、學運的概念問題——即當年反對小報和粗口的人都不屑與某些「道德聲音」為伍。而是次的粗口事件，校園裡對學生報的

反對聲音，卻十分貼近主流傳媒。我們不禁要學某老鬼的感性口吻問：到底校園發生了甚麼事？

我們妥協！—— 回應反對粗口的青年學者

而即使由青年學者發出的反對聲音中，也明顯存在著對某種模糊的「常識」／「禮」／「共識」的肯定——一邊說著「這些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標準」，又說不出其標準的具體細節或所以然，但那邊廂已舉著這些標準來批判學生報「不合標準」了。這是作反省狀的「當下即是、以我為準」。這些人士往往毫不猶疑地肯定，「常識」／「禮」／「共識」必須存在，因為它是我們社會的基礎，不管其內涵如何。那麼，「常識」／「禮」／「共識」其實不過是我們的想像結構中的一個空洞的神聖位置，可以換上任何內涵，但必須先設地視之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否則我們的精神結構以至社會結構就會崩潰。同樣，「粗口」所佔據的就是神聖的對立面，也是一個可以換上任何內涵的空洞位置，它的負面形象保衛著社會和整體人類（的幻覺）。好吧，這是我們的回答：如果以「常識」／「禮」／「共識」為標準而反對粗口的人士願意承認，我們的社會正是虛弱得要空洞位置來保障，粗口擔當代表負面空洞位置乃是我們的想像結構使然，而非粗口本身本質地具有侮辱性或甚麼負面元素；那麼我們這些粗口保衛者不介意接受，粗口理應遭到大肆鞭撻。

再提提你，學生報

上述青年學者的反對聲音，是在主流傳媒上發表的，其間並無與學生報討論；儘管作者都畢業於中大，聯絡學生報也並非難事。「戰場移至校園外」這個現象還顯示出，五四蔡元培諸等所劃出的校園地限或所謂「象牙塔」，今天已經日趨崩潰——如果不是已經徹底崩潰的話。我想補充的是，這也不是真的那麼壞。不過，學生報應該隨時有將戰場擴大、轉移的準備，應該更敏感於策略和手段，因為我們的終極目標從來都不只是學生，而是社會的變革。所謂「策略性」，首先就是不要認為把道理用自己的方式說清楚，就等於面對了同學；「道理」或信息不止是指說話的內容，也包括載體、姿態等等其他因素。如果視其他因素都是透明的，而訊息的「內容」就是一切、就能取得預期效果，這可說是一種「政治不敏感」（politic insensitive）。遠古的亞里士多德早已指出說服力的三元素：情感（pathos）、道德（ethos）、邏輯（logos）。我們是基於甚麼假設，才認為logos的力量可以蓋過一切？

這篇文章因為甚麼都想談談而迂迴得過份，而且比〈虛妄〉還長。在往日參與各式學生報的討論之時，我總是大力反對將「普通同學」假設為愚昧、保守、功利、非理性、不關心社會的統一體。我覺得這些論調都是出於精英心態，是製造一個稻草人以便顯得眾人皆醉我獨醒。因此，在有關粗口的爭論過程中，出現的「稻草人實體化」著實令我尷尬

不已。我可以想像以往與我爭論的對手這樣說：「反對將『普通同學』當作蒙昧大眾般來教化的又是這班人，在與『普通同學』有限的接觸中出現最多對峙的又是你這班人。你自己腹背受敵咋。」我若是迫害妄想狂就會想到他們在冷笑。我希望，參與事件的學生報同學仔，會認真地思考、秉持「粗口」中的反偽精英主義立場（參見〈虛妄〉一文「低俗粗鄙？——其一：階層標籤」一部分），反省無所不在的意識型態、階層標籤，無論面對千千萬萬實體化了的稻草人，也不會變成傲世而粗糙的教化論者。

我的吸煙大學生活

◆ 覃俊基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08年《迎新特刊》

如非必要，我實不欲寫下有關任何評價大學校園禁煙的文字。

那是2002年9月的事，開學前的數天。哲學系的師兄師姊似乎都有喝一杯的愛好，於是在所謂「開學飯」以外又加入了「開學酒」的環節。對於酒精，我也談不上愛或者不愛，只不過是覺得醉醺醺的感覺挺有趣而已，於是也就興沖沖的加入。

具體對談內容我已不大記得，但氣氛卻肯定是熾熱的。就在酒酣耳熱之際，我提出了希望嘗試香煙的要求。

一眾師兄師姊大聲叫好，就連一向看上去穩重的師姊也沒有說上半句反對的說話，只說認真想過就好。雖則如此，她／他們眼神之中還是有著猶豫的——我以為我明白的，倒是師兄K二話不說就從煙盒中拿了一枝給我。見到我拿起煙以後，另一位師兄P也就向我說明煙是怎麼抽的。結果對煙民來說是可以預期的。不是神之為奪的奇妙感受，而是嗆得出淚水來。我不斷的咳嗽，但仍堅持著抽完它。那是一根薄荷煙，其中的清涼本來就是用來沖淡煙草本來的苦澀味，但我還是無法想像怎麼會有人愛上這種感覺。

回想起來，大學生活的開始實在是我人生另一階段的開展。課程困難得使人焦躁，卻又有趣得過份；課外的活動亦只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都不是循規蹈矩的中學生活所能給予的。但與繁忙激盪相比，真正沉重的卻是孤獨與疏離。大學的時間表總是給予你真正的自由與空閒。就算你努力旁聽，一天也不過是上四至五小時的課，而且大多數情況也是支離破碎的，同學之間就不可能如中學般熟稔。入住宿舍的話夜裡就更顯寂聊。事實上，在任何時間，你想怎麼也可以，不會有甚麼真正的阻攔你。當選擇的權力切實地落入你手中，你就會發現其實真正值得選擇的東西少之又少。有太多的人選擇熱鬧，我亦嘗試投入，但在發現再多的熱鬧也不過是映襯這個無法逃避的狀態的時候，我便唯有不顧一切地選擇那些更令人焦慮的生活方式。艱澀的哲學文字也好，龐複的社會政治事務也好，一切都是那麼義無反顧，而不能回頭卻未必代表可以承受。

自由意味著選擇，選擇亦意味著可以放棄。不安、焦燥、孤獨、茫然，就在那無比遼闊的冬夜裡，我認真地抽了我的第一次煙。在那生澀至熟練的過程中，我慢慢理解到那苦澀與沉靜的味道，以及生活之中必定亦必須有它們的位置。

就這樣，吸煙正式成為我大學生活的一個不可割離的部份。初時只是間中的抽一枝，到了大一學期完結時，一包二十枝的香煙最多只能抽三天；大二的第二學期，每天就要撥出二十多元購買一包煙了。越抽越多，有人將之純粹歸咎於耐藥性的生理現象。在我看來，這未免過失之於科學還原主義。無論怎樣看，抽煙都是一項偏於精神的活動。會越抽越多，而只是長了見識。原來以為枯燥的，變得更加枯燥；曾以為困苦的卻變得單薄；以為可以盡情投入的又變得細碎；在沉靜之中我們變得更加敏感，然後乏力。廣義地說，生命並沒有變得更加沉重，而只是在靜默之中人越來看清這些事實。但香煙卻不會使人停下，在認清那教人驚懼現實的同時，苦澀又使我們越趨淡然，回過頭還是繼續的生活，繼續的抽。所不同的只是本來細小的水流已經變成縱橫交錯的水道，深深的進入生命的肌理。這是一點都不誇張的說法。常被人問及甚麼情況下會抽煙，這問題幾近沒有完整的答案，因為煙是甚麼時候都會抽的，它的角色本來就是如此的混沌。疲憊、焦慮、煩悶、甚至愉快都會抽——那是因為某些我們不能亦不願永遠投入，因而需要抽離、調節、重整節奏。

所以，無論怎麼說，抽煙都是非常私人的一件事。三年的大學生活裡，可以讓我獨處的地方我都幾近抽過煙：大學圖書館外那些角落、無數宿舍的天台、小橋流水的長椅，還有邵逸夫堂的背後。不過更加重要的，大概是以氣御劍的將所有空間都變成可獨處的空間。當然也是有多所謂的社交煙的時間：和朋友長談、聆聽別人的訴說、喝酒，這些都是在某個意義底下的公共。但無論怎樣公共還是有著抽離的欲望，抑或需要。哲學系的課堂一放小休，一眾吸煙的師兄弟姊妹與教授總是要抽煙。有些總會行上個三五十步自己一個兒抽，但大部份的人還是三五成群的。要延續課堂的，無論抽煙與否，總會聚在教授旁；提問立論有之、驚嘆嘲笑亦有之。但再多的溝通情緒，總有需要認真獨處思考的時間，才能繼續討論、聆聽、還是盡興。

我無意為抽煙述說太多。始終每個人都會對這活動有著個別的詮釋。呼吸之間那迷離的明晰，然後在力盡處找回力量，那就是我重複又重複的私人經驗。別的吸煙者或許有自己輕鬆愉快的故事，不過那就不是我能觸及的了。說到底，是否抽煙或是怎樣抽煙，都是個別經驗與選擇的結合。我也不是抱持存在主義的相對觀點，認為只要是自己選擇的就好。久不久就會有朋友勸我小心身體，直接點的就問我不害怕肺癌嗎，我每每都因為他們的善意而忍著嘲諷。身體自然要小心的，抽煙亦當然損害健康，肺癌的機會亦會提高——不是白癡都會知道這些事。但是多少？好像從來

都沒有人在意過這最為重要的問題。所謂選擇，從來都是一個取捨得失的問題。所以，就算推倒從來多少次，我還是會義無反顧的再次選擇抽煙，還有很多其他相連的東西。

時至今天，我亦變成了可以推薦別人吸煙的老兵了。至此，我才明白師兄師姊們猶豫的含義——不是因為害怕師弟被帶壞，而是抽煙與自身的生命如此交相糾纏，可以的話就最好不要介入——扶助就好。每當有別人問及時，我總是嘗試回憶著，然後遞上香煙，還有說明那獨特的呼吸方式。面對那些咳嗽的聲音，我還是將笑意埋在心底。這是一件莊嚴的事，就如昨天。

不難想像，我對於現時的禁煙措施，是感到無比憤恨。義理上固然說不過去：只要稍有腦子的人都想像到，室外二手煙對健康的影響根本無關痛癢；而稍為願意翻查一下疾病的研究的，亦會知道近二十年九成以上的報告都無法將二手煙與種種疾病連上。種種措施也不過是健康霸權的意識型態作祟。然而禁煙不只是純粹義理上站不住腳，它所做成的是對煙民最細致的壓迫，是毫無理由的進入、踐踏別人最私人的位置。大學範圍禁煙，不單是對所謂自由與獨立思考的根本嘲弄，更是對我個人歷史與成長徹頭徹尾的強暴。無論是那極致的荒謬感，還是那滔天恨意，都使我沒有解釋與溝通的意願。如非必要，我實無意與任何共謀者談及這些事。

哀痛之難

李智良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09年1月號

自殺是最強烈的抑鬱：我活不下去了，生命那麼醜惡，你們每一個還生活著的人是那麼醜惡。

自殺令我們每一個還活着的人羞慚：你說你說，你的生命有何價值，令你可以毫不羞愧的活下去。

我們還可以怎樣回答。

——黃碧雲〈無人相認〉

我從朋友發過來的電郵得悉M前幾天晚上跳樓自殺死了。

我不知道對於一個人的死，作為生者可以說甚麼。(不可能的！——是她。)

死者不是歷史人物，我不能帶著借古鑑今的眼光去評斷她或她在某個歷史時期的「位置」與社會學研究「意義」，或者說，如果「歷史現場」是還未宣佈成為過往的現在，時間因為記憶與想願而變成捲曲、折疊。死者與我不算相識，但也不算不相識，我無法以路人論者「無知」的位置理解她的死，也無法以親人朋友的悲傷去悼念。

死者算是我的讀者——那純粹是語言文法使然，一個作者不能擁有「他的讀者」的；「讀者」是指她讀過《房間》。她的死被說成某種典型：優才生、受不了課業壓力、壓抑情感、躁鬱症病患……典型與「真相」之間，情切之處頓然落空：Time is a joke we keep on telling the wrong way.

M來過七月的一場書會，我在二、三十人面前跟她吵了一場架，關於精神科「治療」演進和「病者」身份標籤的不同見解。她不是我的粉絲、也不是整天盯著肚臍眼覺得抑鬱很浪漫、很文藝的另外那種。她帶著問題來，帶著更多問題離去，又在網誌上寫了些反駁著我去讀，我沒有回話，我只是覺得她太急著想抓住一種說法，以處置自己正歷著的困擾。

當時。我覺得她突然發言頂撞，是在惹人注意，就像故意搗蛋的那種小女孩式撒嬌可是表情語調走了拍，我也對她很不客氣，而且精神科醫生會說的論調我聽了十二年，幾代「抗抑鬱藥」我和一些朋友都吃過，真的夠了！以社會功能障礙劃分「疾病」、用危險藥物長期轟擊大腦中樞神經作為「治療」，並沒有讓人對自己的人生更負責，僅成全了一

種制約(Conditioning)。到她轉頭說自己不只是醫科生、也是「同病相憐」的病者，我感覺很差、彷彿我的坦陳終究是為了被嘲弄、或僅是為了讓人「認同」……

我方才記起那天臨走的時候，我跟M握過手，輕輕的，大家都有點尷尬，但是大家都需要那一下輕輕握手。因為這種極其薄弱的體諒、或連繫感，我無法別過臉不去想，她後來的自殺。我彷彿看到的是醫科生與「躁鬱症」病患的雙重「身份」在她身上打架、無法疏導對自己的「精神病歷」的壓抑、怨、愧、反抗。我以為她會好起來的。我以為她能夠開始跟人談起這些，就會慢慢鬆開那無形的緊束衣和防衛機制。

後來我才知道她那麼年輕。我像她那個年紀的時候，一定比她還更「倔強」、「癡狂」、「離羣」。再回頭想，12、13年前，大學校園以至香港的社會氣氛，似乎比今天濶落、鬆動好些。

＊＊＊

我是自殺遺族、倖存者，我願意相信，她本來就不會自殺的——死是可以的。死前經歷的痛苦、冷漠、不流血暴力與割離並不。

死者趁深夜，大家在睡覺、在上網、看電視的時候，在一幢公屋的電梯大堂附近徘徊，遺下寫好的「遺書」，在一米多高的欄河前面，她看到甚麼？聽到甚麼？然後，她攀過那欄河，危立廿多層樓上面那一截石壆，她看到甚麼然後就合上眼踏空那一步？

我一直丟不開腦裡那個情景：許多幢幾十層高的大厦、許多家戶亮著白的、黃的電燈。汽車在馬路上行駛、車燈流動。晚歸的人在街上。

M最後一次看著這個「世界」，一定就是眼前有許多幢幾十層高的大厦、許多家戶亮著白的、黃的電燈，汽車在馬路上行駛、車燈流動，晚歸的人在街上；與昨天和明天沒有兩樣；然後她就伸出那一步、放空。生和死沒有分別，跳下去比活在這個「世界」要好一點。

＊＊＊

你想想看，二十歲女，大把青春。除了標籤、除了自殺，可以有那麼多可能、那麼多潛質。為甚麼偏偏就是標籤、又偏偏是以自殺終局？

對！「沒有人叫她去死的。」我們沒有。我們只是扼殺一個人的那麼多可能、那麼多潛質而已。扼殺：不容許、不容讓、不接納、不願意見到、不要聽、不想知道其他的可能。此消彼長。

我們竟還活著，不懂安慰，竟還在無恥的說死者：「……本周一還見她如常上課，卻想不到她突然自尋短見，對事件感到傷感和驚訝。」然後又說她一向「活躍開朗，經常笑臉迎人，懷疑她有心事只會往心裏藏，加上醫科功課壓力大，疑未有向人求助而自尋短見。」說完，無姓名標示的「知情者」則透露：死者「早前患上狂躁症及有抑鬱傾向，其同學發現她情緒受困擾及失控，更開始離群並與大學宿舍同學發生衝突。校方得悉其情況後與她聯絡，並提供輔

導。」竭力維護體制專業形象的精神科教授又揣透「病人」心理一樣說：「醫科三年級學生已被當作實習醫生，有精神病時求助會卻步，『好驚帶住能醫不自醫的感覺，介意俾人知道，接受醫治時唔會跟足指示。』」

我們站在一種言論位置，不斷重申「我們沒有甚麼可作的。當時沒有，一直沒有。」死者可沒有這個位置，她做或不做任何事都要算數。

我聽到的版本跟報章和討論區所載大有出入。死者一直有尋求專業介入、為了「病情所需」申請停學、調宿，也很努力去理解冠在自己額上的「病稱」；死者也跟人訴說過自己受不了壓力；死者死前一個月剛轉了藥物處方、正值藥物「斷癮癥狀」最猛烈的高危期。

——〈羅生門〉的教訓是，鬼魂要保護自己的名聲(Name)，也因此有了說謊的動機，身體沒有了，但身份與身份政治持續還在。只有死者知道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到底是甚麼一回事、甚麼一種「真實」；死者與生者所持的「真實」大相徑違。我們可是活在招魂乏術的時代裡。

＊＊＊

一個又一個人兒活的不快樂，自殺死了。我們還是無視現實，顧左右而言他。

小朋友都知道的事情：跌痛了的小朋友哭了，他的同伴會伸手扶他一把、抱他一下、親親他。我們首先卻說，「不干我事」，並且告誡自己的孩子，「不要亂跑」。

我們連小朋友懂得的事也不願意做；輕蔑死者「自尋短見」，見出我們的涼薄——相對於「自」的「他人」、相對於「短見」的「遠景」在哪？他人缺席、遠景未現，一個人所「尋」能有所獲、能有所覓見嗎？

死者經歷了甚麼落得如斯絕望？她的心事怎麼沒有人願意照顧？ 她不曾對「絕望」作出頑抗嗎？

一個人徹底絕望，來到一個地步，「世界」只餘那短短一截石壆不得駐足要掉下去了。這可以剝離她的生活情境與條件去考量，說她是「突然自尋短見」、對記者表示「很驚訝……很遺憾」開脫過去嗎？如果M真是「優才生」，她一直以來接受的「優才教育」給了她甚麼教育？醫學院和宿舍生活給了她甚麼體驗？如果M真是「患上狂躁症及有抑鬱傾向」，精神科和臨床心理治療給了她怎樣的康復條件？自殺者卻用自己的生命與未來的全部、用毀滅自己、用感情的最大傷害，對這一切作了否定。非常明確。

M的自殺不是獨例，將來還有的。死亡佔盡上風，而我們只有自己的平庸和不甘。

對唔住，我想……

子僑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10年《迎新特刊》

三唔識七猶知己

我不是一個很能玩的人，但兩年前，我還是決定參加兩個迎新營，因為我相信，在營裡總會有些人和我一樣，不那麼玩得，而我可以藉這個機會認識他們，然後，在日後的大學生活裡多點聯絡，多點相處，跟他們深交指日可待。

一如所料，在迎新營裡，我認識了好幾位也不太能玩的朋友，互相頗有好感。當然，我沒期望在短短四天裡，由互不相識一躍成為知己。畢竟中學的經驗告訴我，真正的友情是需要時間培養的。離營時，儘管我不太喜歡那種玩淹沒一切的氣氛，我仍是滿心歡喜，因為我知道，未來三年裡，我將不愁寂寞了。

五隻馬騮一隻蕉

抱著同樣的心情，懷著同樣的目標，我走進了大O的世界。記得一開始，是在邵逸夫堂教我們跟著大組的歌詞做動作。當時，組爸媽給我們示範了一次以後，便叫我們跟著他們做。不過，不知是由於跟不上，還是覺得那些動作太奇怪，大家都沒能反應，不知如何是好，只好站著看他們邊唱邊舞。結果組爸媽唱了兩句便沒再唱下去了。

他們好像早預計到會有這樣的情況，立即向我們陳述這樣做的作用。經過一輪溝通，七、八個人裡，已經有三、四位組員開始嘗試跟著他們的動作，而打後的每次示範，總多了一、兩個人放開了自己，加入了練習。

不久之後，沒有跟著做的便只剩下我一個了。我嘗試坐在離他們練習處稍遠的座位上，盡可能不影響大家練習的氣氛。組爸媽大概怕我寂寞或悶壞了，每隔幾分鐘，便會過來跟我談幾句，勸我一起練習。我堅持了五、六次以後，一來實在覺得不好意思，二來也有點擔心會被另眼相看，最後還是跟著大伙兒練習。

接著，有些遲來的組員，頭幾次看著我們練習，一臉愕然，沒跟著做。不過很快地，當他們發現每一個組員都在努力練習時，他們也加入一起練習了。

張良計與過牆梯

記得在第一天夜裡，大家玩「話事啤」，每次由一個人說一項懲罰，攤牌時，點

數最小的人便要接受懲罰。當時雖然大家都說懲罰不可以太過份，但我當然很清楚，甚麼謂之「過份」，本來就很主觀。即使大家不認為「過份」的，我也可能接受不了，畢竟我知道自己不是很玩得的那種人。於是，我也把話說在前面：頭兩回，如果我真的接受不了那些懲罰，那我可以選擇不玩。

遊戲開始了，記得自己排在第五、第六，頭兩回的懲罰還可以接受，例如做N下掌上壓；敲隔離組的房門，然後「呢」入其中一個衣櫃裡面一分鐘，期間不准說話。

一心以為還可以，誰知好戲才開始⋯⋯講一個黃色笑話（我：>.<）；伸隻腳入馬桶，然後沖水（我：／．＼）；舔一位異性的耳珠三下（我：⋯⋯）。

幸好上天眷顧，這些懲罰通通與我無緣，終於換我了：「呢次你地仲唔死！」不過還真麻煩，既不能太普通，自己又不能接受不了，畢竟擔心自食其果。想來想去，終於給我想到了一個人人都怕，唯我不怕的懲罰。話說我很喜歡踢足球，踢了三五七個小時之後，我的朋友來回換了七、八次，卻總換不著我。「輸了的人要由這一層（好像是三樓）跑樓梯到地下，再跑上來，來回十次！」說時豪氣干雲；說完風雲色變。瞥見眾人眼中突然放出異樣的光芒，我還哪敢造次：「咁五次啦！」話未說完，又聽到幾聲乾咳，夾雜半句粗口。我暗道不妙，正欲開口申辯：「我⋯⋯」沒料到一人後發先至，語帶關心，又似恐嚇：「你因住自己唔返，跑死你呀！」聽罷，我不禁眉頭一皺，心中暗暗咒罵：「我都未驚過，試下你跑十次，我跑廿次丫，你死我都未死呀！」

不過始終眾怒難犯，我只好裝作妥協：「三次囉。」霎時鴉雀無聲，空氣停頓了三秒。環顧四周，卻見大家眉頭深鎖，面有難色，似乎想對我說些甚麼。未幾，一位組媽終於忍不住為我說起情來：「你宜家咁罰既話，因間我地再罰勁啲架咋！」原來大家都不過擔心我接受不了之後的懲罰罷了。最後，也不知邊個同情邊個：「唉！咁一次算啦。」未幾，看著一位組員氣喘噓噓攙扶著牆壁進來，我還可以，還能說些甚麼呢？

迎新營與輔導營

第二天再通宵的時候，許多組員都捱不住，早早（凌晨兩、三點）睡去了。最後，只剩下我和幾位組爸組媽。我終於第一次直接跟他們說，我不喜歡dem beat，我不喜歡互片，我不喜歡黃色笑話，我不喜歡只有玩的迎新營。我所期望的迎新營，不只是大家熱熱鬧鬧、輕輕鬆鬆、痛痛快快地狂歡一番，還會認真地討論一下，未來這三年可以怎麼過得更好，更有意義，甚或人生有甚麼值得追求的理想和價值。

若問我四日三夜的迎新營裡，究竟要花多少時間讓大家去認認真真討論這些問題才算夠的話。坦白說，確確實實的比例，我不知道。不過，我可以肯定，

絕對不會是八比二、九比一，甚至十比零。

我知道，每一個有份籌備迎新營的人，都十分希望新生帶走的，是一段段愉快難忘的回憶，而不是一個「悶到抽筋」的迎新營的印象，所以大家都很害怕悶壞一眾新生。久而久之，認真或嚴肅的話題則成禁忌，可免則免。

兩年前的我，大概也是這麼想的。不過，這兩年間，經歷多了，體驗多了，想法亦有所不同，尤其是接觸到一位前輩的說話以後。

「曾有人畢業在即，才慨嘆三年大學生活如一陣風一樣逝去，留下的只有一紙文憑；面對著自己即將踏入社會工作，只感到茫茫然不知去向。」

我不相信這只是個別畢業同學的感受，其實在兩個迎新營裡，不少組爸媽都這樣提醒過我們。可惜的是，他們除了勸我們去思考外，似乎再沒法引導我們進一步去想清楚一點——我們究竟想要一個怎樣的大學生活，更別說一個怎樣的人生等問題了。

在偶然的機會下，翻看以前的迎新特刊，竟然發現很久很久以前，迎新營（或者應該叫輔導營）裡的師兄師姊原來會跟新生討論家、國、天下；談大學生的理想、抱負。假如你以為這樣的迎新營必定悶得不得了，那你便猜錯了。當年的迎新營裡，也有dem　beat、互片等等的環節，不同的只是搞手們都不會將這些環節當作主菜或是賣點。

此後，我似乎感到有些事情是必須去做的。此後，我相信前行者的親身經驗，哪怕只有一年或兩年，對任何一個一無所知（有的不過是道聽途說的模糊印象），兼且受了十幾年填鴨式教育的新生來說，都可以是很好的指引。此後，有人說「迎新營只要大家開開心心就好了，何必認認真真」，我再也不為所動了。

今天，雖然我不時仍會為這些複雜的問題而苦惱，但我心裡明白，我距離那些看似遙不可及的答案已經越來越接近了。只是，兩年前的一句話，始終徘徊我的記憶之中，揮之不去，至今難忘。當時的我，不知猶豫了多少個小時，或多少天，然後好不容易待其他組員都睡著了，才敢悄悄地跟其中兩個比較熟的組爸組媽說。

「對唔住，我想quit camp……」

後記

坦白說，當時我並不覺得自己做錯了甚麼。只不過，當人與周遭的環境不協調時，心裡就會感到不安。然後，為了消除這種不安的感覺，我們很多時會嘗試與周圍的環境協調。

因此，當我發現幾乎所有的人都清一色的掛著一副非常享受的模樣時，我也不禁對自己產生懷疑，不安的感覺亦隨之

而生：難道我對迎新營的全部不滿、所有的不喜歡、一切的不能接受，都竟是我一個人的問題而已？

最後，儘管我不認為自己做錯了，然而為了消除或減輕這種不安的感覺，我還是為我的決定道歉，只是更多的人會選擇完全融入於周遭的環境裡。迎新營裡的那種無形的壓力，遠比你和我想像中大得多。

兩年前，沒有人告訴我這些。所以今日，假如你一點也不喜歡你的迎新營，我可以肯定的告訴你：享受迎新營的人固然很多，但不能接受的也絕不只你一人！

笑甚麼？你也是頹學生！

◆ 梁靜友

是咁的，我是十年前的中大學生，大學生活過得一團糟。以當年的標準，很頹，用今日的眼光，就是很毒。

頹其實沒有明確的定義，我懷疑頹是大學生活的本質。包括我在內，身邊的同學都係頹，特別是住宿的一群，走堂已是常態，可以睡至日上三竿，整天都不離開房間；我們一群宿友，喜歡到common room 看漫畫、打機，我最記得一堆宿生霸著電視機打三國無雙或Winning Eleven，每晚玩至通宵達旦，連tutor都來玩，令其他人非常不滿。

不過我們最沉迷AOE，幾乎天天開戰，每打完一場，都會衝進其他人的房間，恥笑打敗仗的，不服輸的又會要求開多場。直到累了，就一起食宵夜，多數煮即食麵。這種生活實在很頹。

像我這些喜歡打機的，固然是頹；埋首學業的，也是頹，例如讀medic或某些神科的同學，每天schedule都很密，回到hall也是溫書，娛樂很少，十分頹。

而有些同學申請不到grant，又不想借loan，就會做一大堆兼職應付學費。他們很多都返馬會，或者當私人補習，在上課以外就是打工，以致沒有甚麼娛樂，也是很頹。

至於摺，可能是指完全沒朋友，只有相對，沒有絕對。有住hall的話，宿生會每月總有很多活動，會拍門叫你去，拉你出去，你沒可能認識不到宿友。當然有些人宿分很低，做了三年走讀生，享受不到宿舍生活，但他們也會玩大細O、系會或屬會，摺到冇朋友的真的不多。

另外，幾乎每位大學生都會上莊。中大有非常多的莊，系會已經有大有細，又有宿生會和屬會，頹莊更是爭宿分的主要戰場。有上莊就很難會摺。

但我在中大遇上不少怪人，他們很多都喜歡到中大newsgroup流連，每天都非常熱鬧。當年newsgroup有不少常客，有些筆名非常特別，我最記得的是「亡命小巴佬」、「巴士狂人」及「的士怒漢」，當然至今仍不知道他們的真實身分，只聞說他們是三位政政系學生（好

似係）。newsgroup也是吵架的地方，甚麼都可以嘈一餐，就像今天的高登。

但說到底，頹摺怪也是常態，只是每位大學生也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與今天的毒、宅這兩個負面標籤不同，沒有人會刻意脫頹、脫摺、脫怪。我至今仍嚮往一堆頹人到pantry煮頹飯，到common room頹食，嘻嘻哈哈又一日。這種頹廢的大學生活，畢業後就再沒機會享有，要面對殘酷的世界了。



運動・角力

前言

陳秉鳳

這十年間，中大校園內發生過大大小小的抗爭，不少學生亦投身參與社會運動，當中有許多值得記錄及讓往後的人參考的事件。

「運動．角力」這一部份，文章主要可分為兩大類。其一是記錄校園內抗爭事件的列表和文章。包括〈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中大十年抗爭史〉，簡介二十件抗爭事件，並概論引起抗爭的幾個主因及影響。〈基層勞工血與汗〉及〈也許只是冰山一角──十年勞工抗爭事件簿〉結構與前一篇文章類同，但主題是圍繞校園內的勞工抗爭事件。這些事件伴以兩篇文章閱讀，包括訪問中大員工總會創會理事吳曉真的〈任重而道遠──訪問員工總會理事吳曉真〉，談及該會成立十年來的各種困難與挑戰；〈中大女工合作社紀事〉則記述現已成為香港談及合作社運動時的重要例子的中大女工同心合作社，如何能持續十多年於中大經營。

第二類文章，為中大學生會三莊、中大代表會以及學聯的記述文章。中央學生組織，一直以來是傳承中大精神、堅持大學生應參與社會、關顧基層等理念的重要橋頭堡。〈中大學生會：十年評點〉中，李敏剛以「區議員化」作為論述這十年幹事會轉變的軸心，試總結在拉近學生與學生會距離中所花的努力，及論其成敗得失；〈中大學生報十年浮沉〉重點是發生於2006年的學生報改版，正正是為了扭轉早年頹敗的組織狀態；〈四代電台人〉中則著眼書寫電台游走在「主流娛樂」與「關社基進」兩條路線之間的歷史脈絡。而〈中大學生會代表會的制度問題──由零八年修章說起〉嘗試淺述學生會架構裡負責執法及監察的組織──代表會的制度問題。

最後說到學聯。在組織層面來說，學聯就像中大同學參與學運及社運的一扇重要窗口。學聯在這十年間亦經歷風風雨雨，包括在2005年發生的「摺八樓」事件，多年的秘書處出缺，組織行動力很低；至近幾年似乎開始中興，卻又面對「雨傘運動」後的「退聯」潮。〈從八樓之爭到退聯〉正是嘗試簡單疏理上述這段歷史。

本部份文章數量不多，卻動輒花上數千

字去整理各組織及抗爭的細節及因由。希望各位讀者能耐心閱讀，相信無論是希望在校園裡帶來變革，或者思考大學生參與社會運動的角色或定位，都可以從中找到有用的材料。編書過程期間，曾有一位編輯慨嘆，像有工友意外身亡這種事件，總比不上觸及「中大精神」的事件那樣多人關注，到底何時我們才能對各種不公義的事件，以相符的力度去回擊？在社會形勢急速轉變的今天，右翼民粹力量抬頭，過去幾年學生報及幹事會同學仍能正面回應及論辯，往後的日子，更艱難的時勢，是否仍能守住這一點？最後留下兩個問題，隔十年後再回看，希望能得出不辜負前人努力的答案。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中大十年抗爭史

Edward、陳秉鳳

編按：在本書卷三「理想・傳統」中，戴遠雄的文章〈大學的魔咒與解咒〉，提到「大學不是象牙塔，而是政治和社會經濟權力滲透其中的場所，吊詭的是，它同時孕育了反抗政治經濟權力宰制的人們。」

過去十年在中大內發生的抗爭，大抵也能印證這段話。以下十年抗爭事件清單，均由學生、教職員、校友等發起，至於校園內勞工抗爭，詳見後文。受資料紀錄整全度、篇幅及編輯視野所限，下列清單並非嘗試羅列所有曾發生過的抗爭事件，而是盡量選取有較完整紀錄相關爭議及結果的事件。

2004年

殺系事件

在2003年沙士後，香港經濟低迷。教資會要求大學接受2004/2005年度10%（約3億8千萬港元）的撥款減幅。校方因此計劃在2004/2005學年開始，取消或合併多個學系，主要集中於人文學科。不過由於事前並無任何討論，感到徬徨的同學師生批評校方黑箱作業，絕少諮詢師生的意見。有些學生擔心學系被殺而難以求職，亦有學生認為校方殺掉體育系和與科技相關的系，會減少香港體育教育工作者，亦與科技發展方向背道而馳。

校方回應計劃只是重組學系，殺系是誤解，應注意有新學系與新課程成立。校方同時亦強調課程重組可助節省每年6千萬元的經常性開支，紓緩財政負擔[1]。

學生會舉行「學系及課程整合交流會」，讓校方與學生討論事件。校長金耀基在會上遭學生狂轟黑箱作業和罔顧學術，校長離去時拒絕接收學生的請願信，在座駕中遭學生包圍，期間保安人員與學生推撞，多名學生跌倒地上。

不久，校方宣佈修改方案，指因為教資會突然通知會繼續資助課程，及某些學系有機會獲得機構捐助，因而能暫緩重組。校方否認因學生抗議而修改方案。

	原方案	更改後方案
日本研究系	把日本文化併入歷史及人類學系，日語與現代語言合併	暫緩執行，於2006至2007年度再檢討
現代語言及文化系	1. 現代語言部分納入新成立的語言學及現代語言學系 2. 文化研究部分納入宗教系，成為新成立的文化及宗教系	1. 現代語言及語言學的部份會獨立成為新的語言學系 2. 方案維持，但指明文化研究系和宗教系各自獨立收生
體育運動科學課程	2005至2006年度停辦	繼續收生
人類學系／歷史系	原擬於2005至2006年度合併	人類學系與歷史系組成聯合系務會，及共用資源，但雙方可以各自保留課程獨立名稱。
互聯網工程學課程	併入訊息工程系	維持原有方案
創新及設計工程學課程	併入自動化與計算機輔助工程系	維持原有方案
材料科學與工程課程	併入物理系	併入物理系，成為物理系的一個組別
應用化學及管理課程	停辦	維持原有方案

2005年

國際化事件

請參看卷二「國際化事件」。

保樹立人事件

請參看卷二「保樹立人事件」。

2006年

新書院事件

2005年，中大草擬未來十年大學的發展藍圖《中大策略計劃》，文件中提及2012年四改三的新學制，中大本科學生將會增加，並建議中大開設更多書院，應付學校人口增長。校董會接納計劃並於2006年2月正式公佈。

由於政府表明不會資助中大成立新書院，因此中大便對外籌款獲取成立新書院的經費（詳見下表）。另外，中大並沒有足夠土地成立一所規模如四間舊書院的新書院，所以新書院的規模將會較小。

校方公佈計劃後，立刻引來許多校友、學生的質疑，如選址、經費、學校人口增長、院校間的惡性競爭、理念等等。他們批評校方未有詳細研究就匆匆建議成立新書院，是只顧籌集經費，忽略中大的傳統理念。

4月底，中大校友在報章刊登聯署廣告，校友關注組和中大學生會在5月中召開聯合記者會，反對校方成立新書院。但是這些反對聲音都無法阻止新書院成立，五所新書院逐漸落成，現時中大共有九間書院。

	成立年份	學生人數
新亞書院	1949年	約3,400人
崇基學院	1951年	約3,500人
聯合書院	1956年	約3,400人
逸夫書院	1986年	約3,400人
晨興書院	2006年	300人
善衡書院	2006年	600人
敬文書院	2007年	300人
伍宜孫書院	2007年	1, 200人
和聲書院	2007年	1, 200人

（更多相關討論，請參看卷三「理想・傳統」。）

2007年

「情色版」事件

請參看卷二「情色版事件」。

學院院長委任制

自1963年中大成立以來，學院院長一直是各學系教師一人一票選舉產生。但在2006年12月，中大教務會通過新的學院院長產生方案，由教師選舉改為由校董會委任。2007年1月，校方就此問題向校董會提供報告書。

校方指改制後全職的院長有更清晰的權責，能夠專注領導和管理工作，有利學院長遠發展。委任又能避免選舉制引起的內部磨擦和分化，又能鼓勵校內外更多有志之士擔任院長之職。校方又指許多外國知名大學都實行院長委任制，未嘗聽聞對學術自由有任何傷害。

方案通過後，引來校內許多反對聲音。反對者指改制一事，大部分老師和同學被蒙在鼓裡，校方從未有就大學社群對委任制的看法作出正式的全面諮詢。整個改制過程倉卒、不透明，處處顯示校方對教師的不尊重和不信任。

校方指「院長遴選委員會的過半數成員將由學院院務委員互選產生」，不過由於院務委員成員只有極少部分是民選，教授級或以下成員意見的代表嚴重不足。推行委任制後，恐怕學人自治的理念將蕩然無存。

此外，新的院長並不獲終身教職，校方可以不續聘院長。欠缺這種保障下，院長為保職位可能要迎合校方的意願，違背學院的利益。

中大員工總會、教育關注組和中大學生會發起網上簽名抗議行動，要求就院長改制一事重新諮詢。結果校董會在2007年1月份暫緩通過有關建議。校方隨後2月進行了幾次諮詢會，但討論範圍只限於如何推行委任制，而非是否推行。最後，校董會在3月27日正式通過院長委任制。

巴不得事件

校方在2007年8月突然更改校巴收費，由原本在假日時向持證者[2]（指學生證、職員證）收取1元、非持證人士收5元或購買1元乘車券，改為持證者在所有日子免費、非持證者收取3元。校方解釋由於教資會的校巴服務撥款只應照顧同學及教職員，不包括校外人士。在教資會的壓力下，不得不向校外人士「收回成本」。

有學生認為收費不合理，指校內有數百

名外判工人（如建築工人、飯堂職工等）被歸為校外人士，這是歧視基層工人。另外，收費只是蠅頭小利，卻勞師動眾，逼乘客出示證件，在崇尚來去自由的校園開了審查身份的規矩，亦影響校巴的行駛效率。

反對者成立「巴·不得」校園交通關注組，發起聯署和在校巴投下「反對車票」的行動[3]，抵制收費計劃。他們亦趁諾貝爾得獎者到訪，在逸夫書院大講堂外示威。

後來，有同學在翻查資料後，發現中大校巴客運營業證屬學生服務（B01）及僱員服務（B02）類別，除本校學生或教員及中大僱員外，校巴不可接載任何人士以作取酬用途。除非有相應的客運營業證，否則收費是違法。校方隨後立刻停止收費，並對學生說不要強調法律問題，校方很想提供校巴服務，若「事情搞大了」，就沒法提供服務。

校方要求校內與非校內人士分開搭兩類校巴，以便蒐集數據，待日後決定如何收費。不過校方否認由於違反法律而暫停收費。校巴收費至今還未有改變，但據聞校方已經申請了收費牌照，或許某天校巴收費會捲土重來。

畢業禮事件：董建華

在2007年中大畢業禮，校方頒授榮譽法學博士給前特首董建華。有學生和校友不滿意董的施政，認為頒發學位給他是政治獻媚，反對校方頒發榮譽學位。

反對者當日派發紅絲帶，呼籲反對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予董建華的人，將紅絲帶繫於身上。而在負責主禮的特首曾蔭權向董頒授榮譽博士之際，部分學生衝入會場內打斷儀式和舉橫額抗議校方的政治獻媚。

劉遵義指反對者批判精神雖值得嘉許，但行動破壞莊嚴的畢業禮，影響其他參與者的權利。反對者則反駁劉的說法，指校方頒發學位給董才是真正侮辱了畢業禮，而且抗議行動都只是在董建華獲頒學位的環節時出現，其餘時間出席者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2008年

烽火台事件

請參看卷二「烽火台事件」。

教務會改組

中大教務會在2008年5月舉行特別會議，商討重組教務會。校長劉遵義在會上宣布成立由31人組成的「重組專責委員會」，研究如何將人數從200多人[4]縮減至50人左右。他指精簡架構能提高效能、加強問責，使教務會更能發揮其學術決策的作用。委員會在5月中成立，在6-7月兩個月中閉門討論，沒有進行公眾諮詢會。委員會於8月初完成報告初稿。

中大於2009年5月發出的新聞稿，教務會在重組後將有3名學生代表（原本有13名學生代表），本科生、研究生和全民代表各1名，同時中大學生會會長的

當然席位被削減。在改組後，學生代表的比例下降。

書院學生會和中大學生會發表聯合聲明，指校方的改組方案代表不足，諮詢工作草率了事。校友關注組指改組的首要原則在於保持廣泛代表性，否則教務會只不過是高層下達政令的一言堂，是否改組也分別不大。

學生會在2010年2月就「要求採納《教務會本科生委員產生方案》」進行全民投票，結果學生會提出的「四名本科生為教務會代表」[5]的方案獲得大比數支持。不過校方無視這次投票的結果，將改組方案擱置。後來校方提出新的改組方案，不過至今還沒有通過。

2009年

導師正名事件

請參看本部份文章〈也許只是冰山一角——十年來勞工抗爭事件簿〉。

畢業禮事件：唐英年

2009年，中大校方在大學畢業禮頒發榮譽法學博士學位給時為財政司司長唐英年，與2007年已退休的前行政長官董建華獲頒學位的畢業禮相比，這次事件引起社會更大的反應。有學生和校友認為唐英年任內毫無建樹，加劇社會的貧富懸殊和不公，並不配獲頒榮譽學位，校方頒發學位給唐英年是再次的政治獻媚。

學生會在畢業禮時向唐英年遞請願信。一些非學生會的反對者在頒發學位給唐英年時干擾其發言和舉牌示威，並有畢業生在唐受頒時起立背對頒獎台，以噓聲表示抗議。

校方指有保安員被示威者「武力脅持」而受傷，指責反對者不和平理性，並不尊重到場參與畢業禮的人。不過，校方拒絕讓受傷的保安接受傳媒採訪。事實上示威者主要由學生和校友組成，但校方誣指示威者全是社民連成員。校方報警求助，但並不獲受理。

反對者事後亦發表文章指學生也有受傷，說明為何反對唐英年，並反駁校方的「武力脅持」說法，指責校方抹黑示威者。

由2011年開始，校方將頒授學位典禮分開舉行，一天是頒授學士及碩士學位，另一天為博士及榮譽博士學位。

2010年

學系書院歸屬爭議

校方在2010年4月宣布，大學在2012年恢復四年制之後，文學院的收生制度將會變為以學院為本，本科生在第二年才決定主修課程。一些原本隸屬於特定書院的學系，如新亞書院的人類學系及藝術系和崇基學院的音樂系，將面臨被「拆散」的危機。

此決議令有關學系的學生、教師和校友非常憤怒，校方沒有作出任何公開諮詢，就打算「肢解」這些學系，完全無

視了他們的意願。校方的舉動無疑是獨斷霸道。他們質疑有關作法對教學並無好處，指斥校方的做法無異於破壞中大歷史悠久的「書院學系模式」，令中大的書院越趨單一化，將書院化為只提供「書通」和「宿舍」的地方。

這些學系在網上成立反對計劃的群組、發表聲明，音樂系學生更在崇基的周會環節時抗議。校方在壓力下，在6月提出暫緩實行而作諮詢。有關收生有限制的學系在2010/2011學年維持不變，直到現在亦如是。

大類招生

中大一直以來都以學系為本收生。2010年3月，校方開始向各學院推銷統一收生[6] 的方案，要求各學院開始討論、研究「大類招生」的可能性。

在諮詢學院期間，政治及行政學系的教師提出「各系交出20%學額作為大類招生，另外80%由學系自行收生」的方案，可是校方一直未明確回應。到了9月，校方拒絕政政系方案，並要求各學院在9月中決定是否加入計劃。雖則校方表示各學院能自行決定是否加入，不過校方明言若果不接受統一收生，社科院可能被削減資源。

大類招生方案問題重重，改變會涉及整個大學的教育理念及體制。在大類招生後可能有大量同學報讀某些熱門的學科，某些較冷門的學系可能收生不足，要面臨削資、殺系危機。同時，學系為招收更多學生，可能導致惡性競爭，令課程的質素下降。因此，有人擔心一些冷門課程受到淘汰。亦有人擔心改制會影響學系的文化、傳統，減弱學生的歸屬感。

中大學生會發信批評校方，在未有充分討論和分析前就急急推行新政，要求校方立即公開諮詢、公開文件，向師生校友交待清楚。

在10月，校方表示文學院、教育學院、醫學院及法律學院和某些學系[7]暫不考慮進行大類招生。另外，社會科學院除了社工系外，其餘七個學系均撥出20%的學額進行大類收生。

民主女神

請參看卷二「民主女神像事件」。

2011年

黃燕雲事件

請參看卷三「道德．身份」

性別友善宿舍

2011年5月，兩名三年級學生在聯合書院湯若望宿舍外的空地發起兩次「瞓湯石」行動，希望能引起同學關注宿舍性空間的問題。行動者短期內希望能廢除禁止「鴛鴦蛇」等過時、不合理、家長式管治的宿規，長期目標為成立性別友善宿舍，望能使性小眾可在沒有歧視和敵意的環境下生活。

聯合書院對事件非常關注，在第二次行動當晚有五位高層前來商談。行動者希望討論能錄影或錄音，可是高層都不願意，拒絕作公開討論。校方回應學生雖然同意他們的行動，但認為香港文化不接受男女同宿，擔心設立性別友善宿舍會影響校譽。

不過行動者反駁傳統文化不必然合理，當它造成壓迫時，便不應順從，而是應該嘗試改變。同時大學生是成年人，有權為自己的情慾作主。他們認為只要放下傳統性別想像，男女同宿絕不是甚麼驚世駭俗的事情。

（亦可參看卷三「道德・身份」。）

2012年

逸夫校巴事件

為配合三三四改制，校巴路線需要重新設計。校方在2013年9月公佈原本新逸夫幹線、循環線和崇基至逸夫的轉堂校巴均會取消。由於取消這些班次，學生將無法在本部、新亞、聯合和崇基乘車回逸夫，為逸夫學生帶來極大不便。所以一班逸夫學生組成逸夫書院校巴關注組，反對新方案，要求保留循環線校巴和重新審視方案，並舉行公開諮詢。

雖然校方亦與逸夫學生開會商談，但成效不大，引起一些逸夫學生不滿校方，於是在書院的牆和用粉筆在地上塗鴉，向校方表達訴求。

最後，校方同意保留循環線校巴、新逸夫幹線原有服務和由崇基開往逸夫的轉堂校巴。

中大書店

校方計劃在位於崇基書院的康本國際學術園開設一間約6千呎的書店，並對外公開招標書商。原本位於本部的辰衝書店和李惠珍樓的學術專業圖書中心在2012年約滿，並不獲校方續約。

一些學生覺得大學的書店不應該只著重謀利，更重要的是能藉著書本為學生提供交流的機會和推廣閱讀文化，所以組織了起來討論心目中的「理想書店」。他們舉行了讀書分享會與新書店構想會，後來成立了關注中大新大學書店群組，收集同學意見。

正當討論進行得如火如荼時，學生發現截標日期將至，於是向校方爭取延後。校方同意封標，讓師生詳細討論遴選準則、合約條件和學生對新書店的期望後，才拆閱標書，進行遴選程序。

商務印書館在5月成功中標，後學生開始與商務印書館討論有關新書店的設計。學生希望書店可以提供舉辦活動的空間、店內有坐位可供同學使用、增加書種種類等。商務印書館則認為不可行，因為預留場地給學生舉辦活動會減少了賣書的空間。

最後，商務願意開放千呎的多用途空間，平時用作擺放圖書，學生申請後可

用來舉辦活動。後來成立了由學生、教師和校友組成的書店構想會、書店聯絡委員會和書店管理委員會，負責處理活動構思和行政工作。

Starbucks進駐中大

2012年9月，善衡學生會幹事會就在善衡書院內即將開張的 Petit Café 出售Starbucks咖啡一事舉行意向調查。有266位善衡同學參與投票，當中大部份同學支持。10月，有善衡學生發現 Petit Café 內掛著星巴克餐牌及「we proudly brew starbucks coffee」字眼，証實店內將會出售Starbucks咖啡。

中大學生會批評Starbucks惡意競爭、打壓工會和壓榨咖啡農種種惡行令人不齒，於是發起杯葛善衡書院Starbucks咖啡店的行動，如「血染星巴克」的行為藝術，在中大校園舉行反星巴克遊行等。而善衡學生會幹事會否認Starbucks為無良企業，指它亦售賣公平貿易咖啡，並認為中大學生會是干預院政。不過反對出售Starbucks的學生反駁所謂的「公平貿易咖啡」不過是企業間自欺欺人的產物，根本稱不上是甚麼公平。

事件引起許多同學關注，善衡代表會為此事舉行諮詢，並在10月尾舉辦全民投票決定Starbucks的去留。參加投票有373人，當中約76%的善衡學生支持出售Starbucks咖啡。議案獲得通過，Petit Café 能繼續出售Starbucks咖啡。

2014年

宿費爭議

2005年以前，政府承擔全部宿舍維修費。在此以後，維修費由校方和政府各自負擔一半。而到了2012年，政府不會再分擔大學宿舍的維修費，建議學校和學生各自承擔。

2012年至2014年宿舍收費上升了20%，在2014年，校方甚至提出宿舍收費調整方案，令宿費跟通脹和維修儲備掛勾，五年一檢。校方指加宿費是為了應付通脹，以確保宿舍財政健全。又指近十年也沒有加過宿費，調整宿費是很合理。

學生對校方此舉感到非常憤怒，他們舉辦論壇及靜坐反對校方加宿費，亦在網上開設反對加宿費專頁和聯署，組織同學反對校方加宿費的決定。

學生指宿舍是非形式教育的一部份，並不是一件商品。增加宿費令原本要承擔學債的學生負擔加重，並會令貧窮學生失去接受教育的機會。另外，學生又指中大近年財政盈餘豐裕，如2012/2013年度盈餘高達25億元，校方是有能力承擔宿舍開支，減輕同學負擔。

結果，校方承諾將會全數承擔所有宿舍維修費，但日後會按宿舍的日常開支而修訂宿費，每年商討新宿費。

2009年至2013年

校友評議會

校友評議會一直被指與校方的關係密

切，為校方擔當護航角色。評議會跟高層是同氣連枝，其主要功能變為向「有地位」的校友聯繫籌款的地方，根本不起監察校政的作用。

評議會的議事方式亦一直被人批評為混亂、無能，遇到對有損校方聲譽的議題時，千方百計阻止討論，避免校方難做。此外，評議會的選舉亦常常出現問題，如候選人的合法性問題、投票程序混亂，在2010年週年大會的投票更要作廢，需在8個月後續會再投。

近年有年輕的校友將民主女神像、前校長劉遵義、中大深圳分校等各種問題帶到評議會討論，引起許多一心只想將評議會作為社交組織的校友不滿。

另外，在2009年之前每個人能接受50張沒有意向的委託票，即受委託人可以隨意幫50人投票。委託票制度一直為人咎病，有傳出校友受到上司壓力而交出委託票。不過，自2009年起，每名校友最多只能接受5張委託票。

校友評議會漸漸成為政治角力的地方，建制與非建制校友之間的火藥味日漸濃烈，不過由於建制派比改革派更有組織、手握更多資源和動員能力，故此評議會一直都是建制派壟斷，在系統以外的校友能選上常委只屬少數。近年亦有有年輕非建制校友參選評議會，不過大多大比數落敗。

這十年，中大有不少制度上重要的改變，都是因著UGC所做的《宋達能報告書》內，要以效率為主而降低民主程度的建議而來[8]，不少皆被指為民主大倒退，包括取消院長委任制、企圖取消學生會會長作為教務會當然學生委員資格、校董會改組初期計劃中亦沒有學生及教職員校董等。

另一類較大型的事件，多始於校方就著整體社會狀況而作出急速調整，或為「配合社會發展」而作出違背中大理想傳統的政策改動，包括2004年因UGC削資而生的「殺系事件」、因學制三改四而生的「新書院事件」、「烽火台事件」、以及因前任校長劉遵義「為提升中文大學國際水平」而生的「國際化事件」等等。

其他事件，多涉及不同範疇的議題，例如由「保樹立人」引起關於校園民主規劃的討論、各項與性別平等有關的事件、監察校方政治獻媚（如兩次「畢業禮事件」及「民主女神像事件」）、因著不同校園管理問題而生的較小型抗爭，如「巴不得事件」及「逸夫校巴事件」。

上述提到第一類事件，即由UGC政策引申的轉變，例如教務會改組，這類事件是較難引起注意的。這些對中大發展方向相當重要的制度改變，往往是資訊最封閉，一般學生最難接觸的，故雖有對這些改變的反對聲音，但卻很難成為校園內廣泛討論的事件，未能形成有力的

反對勢力。但若能配合議會適時提出有力意見，也能改變政策一部份，例如保留教務會學生會會長當然委員一席。

第二類事件之中，由於校方在沒有經過充分諮詢下，單方面宣佈很多政策，扭曲甚至扼殺反對方堅持的中大理想、歷史及價值，而引起巨大迴響，動輒過千人聯署反對。可是一時的力量未必能保証往後安寧，像「國際化事件」過後，校方成立的雙語政策委員會並無致力支持中文教學，不少學系均增加英語授課比例。[9]

同學能反應較快的，多是一些直接影響日常生活的事件，例如被刪減校巴班次，及「學系書院歸屬爭議」，同書院或同學系的同學們很快走在一起抗議。這類事件相對較易取得成果，迫使校方收回無理改動。其次能引起同學反應的，就是動搖「中大價值」的事件，像「烽火台事件」、「民女事件」及「國際化事件」，而前兩者都能改變校方做法與立場，但「國際化」則如上段提到，沒那麼容易推翻。而最難引起同學關注的，是既離同學日常生活很遠，又與中大價值似乎沒最直接關係的教務會改組或院長委任制事件，就只能得到少得可憐的關注。

校內會關心校園議題的，是以學生會為主的學生組織。而學生會既要兼顧校外議題，初上莊的同學對校內政策亦未熟悉，不時需要靠熱心關注校政的校友，透過不同渠道獲得消息，再與當屆學生會一同組織反抗。這十年間，在國際化後組成的「中文大學校友關注大學發展小組」（校友關注組）尤為重要，校友關注組內有不少七十至八十年代的老校友，他們人脈較廣，亦不乏與校內高層相熟者，能提供很多資訊及資源與在校學生。而他們亦對中大的歷史有深入認識，對中大的理念有極強堅持，成為一股很重要的力量。（例如在新書院事件中，主力發聲的反對聲音其實是校友關注組。）而較年輕的校友，亦會以參與校友評議會等途徑，嘗試改變既有保守親建制的管理層。近年亦較多一些學生自發的行動，如「新書店事件」中，學生自行組織收集同學意見，希望新書店能更符合同學的需要及期望，「逸夫校巴事件」中同學自發畫粉筆字行動，抗議校友削減校巴次。

最後，也想提一點，部分在校園內發生的爭議，亦會引起社會上廣泛討論，例如「情色版事件」及「畢業禮事件」。前者引起許多關於大學生談性或性本身的爭議，後者對學生應否衝擊「神聖的」畢業禮亦引起熾熱的討論。這些事件及行動，能衝擊社會上保守的道德聲音，為拆解部份施加於大學生身上的道德枷鎖，帶來一些正面的影響。

總括而言，在搜集資料的過程裡，我們發現過去十年於校內發生的抗爭事件，無論是形式或議題方面均是豐富多樣的。爭取的結果有勝有負，但整體來說，涉及較重大發展方向的事件，是難於使校方改變，例如語言政策、新書院

的建立及教務會與校董會的改組等。這狀況並非這十年獨有，若要說其轉變，則是在行政管治架構重整下，其權力更集中，反抗也許更難。而校方面對反對者的手段也有轉變，例如在2008年以前大量大規模抗爭事件，都是針對由前任校長劉遵義所推動的政策，其時校方形象差劣。及後沈祖堯「明星」上陣，明顯使校方形象提升，而如學生會幹事會這著名的反對組織，都轉行「又傾又砌」的方向[10]。

最後，善用不同的網上平台，似乎是未來聚合校內弱勢者的重要方向。有不少成功的小型抗爭，都有於網上動員及討論，如「逸夫校巴事件」及「學系書院歸屬爭議」，都在面書成立群組方便宣傳及聚合受影響的同學，同時間也能引起校友關注加入討論或提供協助。而這幾年有較進步校友出選校友評議會，亦多由網上校友群組宣傳及爭取支持。善用網上平台有助於社群的聚合及資訊交流，可以是未來努力的方向，亦有利於同學自發的行動。眼下站於權力下層的我們，仍未有足夠力量去改變既有的發展及治校模式，但願異議者的聲音於未來十年不會被掩蓋，甚至愈來愈響亮。

1 後來中大於2005年成立法學院，加上醫學院花費6百萬元資助拔尖學生全部學費，校方被指責犧牲「規模小、賺錢能力弱」的學系進行重組。

2 雖然當時有分開收費，但校方一般不會查乘客是否持有証件。

3 反對者在火車站派出「反對車票」，黃色紙片寫上反對字句，呼籲同學投入車費箱。

4 名義上為200多人，但實際上成員只有130人。

5 四名本科生代表為中大學生會會長，兩名書院代表和一名院務委員代表。

6 大類招生後，將改為以學院為本收生。即是新生在第一年不設主修，到第二年才選讀主修科。改制目的是為了讓三三四學制的學生能夠在深入了解各科後才選讀合適的主科。

7 理學院方面，中醫學、風險管理科學及數學精研課程會個別招生。

8 請參見卷三「社會．教育」中的文章〈不可忽視的有形之手：UGC如何改變中大〉。

9 關於雙語政策委員會的工作，請參見本書卷二「國際化事件」中杜振豪的文章〈貨不對辦的大學語委會〉。而關於部份學系增加英語授課比例，於2014年就在社會學系引起爭議。可參見黃漢彤，〈犧牲本科知識換來甚麼？ ——反對社會學系英語化〉，《中大學生報》，2014年9月號。

10 關於劉遵義及沈祖堯兩任校長的施政分析，可參見卷三「理想．傳統」中的文章〈一樣的軌跡，不同的治術〉，而有關學生會幹事會在沈祖堯上任後的轉變，請參見本部份文章〈中大學生會：十年評點〉。

基層勞工血與汗

陸明敏

「我們這些最底層的人比泥還賤。」某位EMO（物業管理處）工友如是說。

的確，縱觀這十年間發生過的勞工事件，校方與基層工友的權力差距幾近沒有改變過，校方依然是高高在上，而基層工友，如清潔工、保安，也許真的是連地底泥都不如——2003年肥上瘦下事件，最高層減薪2-3%，最基層減薪20-30%；2011年校方無視八成工友反對聲音，強逼室內清潔工調遷；還有更多……[1]

如果說中大直接聘請的工友猶如地底泥，外判工於校方而言肯定是隱形的：2011年七名善衡建築工罷工堵路追討兩個多月的欠薪，事後揭發工友曾向校方求助，但未獲受理；2009年，一名外判油漆工在中大工作時，因三米工作台翻側不幸身亡，判頭拖延恩恤安排，中大校方亦逃避責任。2012年，校方更打算外判七所圖書館清潔服務，把對勞工應負的責任也外判出去，幸因各方反對而擱置計劃。

基層勞工的處境

外判工友與學校基層員工不同，他們既與校方沒有直接勞資關係，亦沒有所屬工會，他人較難得知外判工友的工作實況。他們遇到嚴重事件如欠薪或工殤時，只能透過直接行動表達，以引起校方關注及回應。

校內基層工友算是有較多渠道解決問題，例如有關續約、無理解僱、工作待遇等，有專門的申訴渠道，但卻因其結構性問題，令工友經常不被公平對待。另外，校內有香港中文大學職員協會（職協）及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員總）兩個工會組織，也會處理工友遇到的不同勞工問題。惟以這些渠道，仍有不少問題未能解決，以致工友要找學生組織如中大學生會、中大學生報、基層關注組等協助處理。若不能以協商方式處理，就需要透過具體行動：發起聯署、示威行動等去迫校方回應及讓步。

遍閱一次這十年來的勞工抗爭事件，校方顯然不重視勞工權益。

只能由上而下的評核制度

一直以來，員工評核都是由校方向工友單方面進行，而評分項目也由工友的上司訂立。2003年，中大引入新的評核標準[2]，工友工作表上的評分項目就變得瑣碎，工作的每一部份都被仔細監察。然而，如此過份切割、細碎的工作評分項目，讓上司有更大權力和機會去整治不聽話的工友，直接影響工友加薪及轉長工的機會，而評核亦會影響工友會否被解僱。[3]

工友在七月評分時期，都會被上司召見查看評分，同時簽名表示承認評核分數。有工友不敢細看評分紙，怕看得慢上司不高興；而且評分項目眾多，字間密密麻麻，一時三刻也未必能看完，所以就算評分表是否合理，也是簽了再算。[4]工友很多時只以為簽名代表「已收到」、「已讀」的意思，但事實上工友在評核上簽名作實，若工友沒仔細看清楚，可能承認了一些自己沒犯過的錯，影響未來工作。

由上而下的評核未必公正，有工友表示，希望校園使用者也有份評核，可以降低因為上司與下屬關係不佳，而導致評分不公正。若工友認為評分不公正，也經常不敢投訴上司，原因是投訴機制也不能保障投訴人的權益。

投訴機制鼓勵非正式處理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僱主，中文大學致力提供一個和諧互助的工作環境……」這個和諧互助的工作環境到底是怎樣煉成的？僱員若對評核的結果有異議，是不可以申訴的，若僱員對大學整體政策和規例不滿，亦不構成申訴理由。除非是評核進行的程序有誤，才能構成申訴理由。而在提出正式申訴前，程序上亦得先嘗以非正式途徑解決，即找自己的直屬主管商討。換句話說，工友想投訴他的上司，亦得先和他的上司商討，這令工友壓力非常大，足夠令工友卻步。而且，工友認為即使投訴也沒有用。比方說，組長資歷深，管方倚重他們，工友再投訴，他們也頂多挨兩句罵，不會有甚麼後果。[5]

如果仍未能解決，在提出正式上訴後，仍有上訴到至校長及校董會兩個步驟，但問題是，每一個程序校方都會鼓勵工友以非正式途徑解決。工友同時面對繁複的申訴程序、校方處理投訴人員不停游說和解、當然還有自己的上司，都使工友很難為所遇到的不公平申冤。

學生的位置

在中大，工友們若面對重大困難，都有可能找上學生組織幫忙。學生組織如中大學生會、中大學生報、中大基層關注組等，一直有關心弱勢，以至挺身而出的傳統。而學生一起發聲，某程度上能讓工友們的訴求獲得更多支持。（這也許也是社會上的悲哀—— 為甚麼工人議題本身不能受到該有的關注？為甚麼「大學生」這身份能得到更多支持？）

而更諷刺的，或許是校方的取態。前校長劉遵義著名的「茶餐廳」比喻，以學

生為顧客身份，這不單單是一個比喻，更有其制度效力：在一份工友評核表中，其中一項指標是：「向客戶提供妥善服務並建立並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上司如此評價清潔工友：「對顧客的服務態度良好」。誰是樓宇的「顧客」？不就主要是教授或學生嗎？

校方對於學生的顧忌，在勞工抗爭事件中可見一斑。有被逼遷的工友曾說，「如果我們和校方正面交接，就會變成上司評價下屬的工作表現，但這是住屋問題，不是工作表現問題，是公道問題。如果有學生在場，就會變成是學生批評校方做得唔好，唔公道。」工友嘆道，學生在場時校方都是客客氣氣的，若只有工友在場，很快就會被校方打發走，「而我們要求的，起碼大家是有個共同、稍為平等的空間去傾。」

工友需要學生支持，才能與校方有稍為平等的權力。勞工抗爭的出現，正正是因為工友在建制上無法與校方進行對等談判、協商。

總結

在這十年間，校方與工友之間的權力差距幾乎沒有縮減過，一直都是「無公平」。基層工友幾乎沒有議價能力，而工友所面對的各種不公平待遇，不只是個別校園高層是否有良心的問題，更是得到制度的允許與維護：評核機制與投訴機制，兩者互惠互利，「成功地」使面對不公平待遇的工友噤聲。

然而，在這十年間，學生／學生組織的角色似乎也只是發揮著消費者力量──沒有令工友團結爭取應有權益的意識，以扭轉校方上── 工友下的結構關係，很多時候只是介入單一事件，比方說，2011年反調遷事件中也只是阻止調遷的發生，卻沒有辦法將整個運動趨勢轉向評核機制。這種力量也有其局限，比方說學生組織每年便會換莊，而莊與莊之間的傳承亦因各種原因有偏差。即便如此，學生也確實有介入、影響事件的身位及力量，也的確能以行動監察校方，阻止更荒謬的勞工事件發生。

---

1 詳見本文後〈也許只是冰山一角的── 十年來勞工抗爭事件簿〉。

2 〈二等公民，如何excellent？中大員工加薪之前之後〉，《中大學生報》2008年11月號。

3 如果評核成績不能達到「very good」或「excellent」，工友的薪級點就不能隨年資跳升（俗稱跳point）。合約工要轉做長工，除了必須做滿六年，同時亦須連續三年拿到「very good」或「excellent」。如果評核報告被評為「持續不符合大學標準」，過了三個月的觀察期還未有改善，就要被革職。

4 〈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從調動窺見的制度問題〉，《中大學生報》2011年9月號

5 同上。

也許只是冰山一角
——十年來勞工抗爭事件簿

◆ 陸明敏

校園裡勞工的聲音微弱，勞工的抗爭歷史更沒有正式記載，可供參考的僅有中大學生報的報導，中大員工總會的會訊，以及中大人間的口耳相傳。以下也許只是冰山一角，還有其他各種形形色色的勞工事件，例如不斷出現的無理解僱、嚴苛的工作環境等。

在此感激各前人的努力，讓這些珍貴的抗爭史不致被淹沒在時間的洪流中，亦希望後人能繼續關注並紀錄勞工事件，作歷史的見證人。

肥上瘦下事件——2003年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提出，大學員工的薪水與公務員脫鉤，不再如數撥款。中大擔憂日後慘遭削資，先自行節流，第一招是減人手，第二招是減薪，最高層減薪2-3%，最基層如清潔保安減薪20-30%。第三招是大規模外判，校方將整個物業管理處（EMO）以價低者得的方式外判予清潔公司。

在職工盟的幫助下，學生、師生、工友群起反抗，包括收集聯署、400多人打算在中大舉辦的國際校長會議中示威，後來示威行動因中大校方臨時「走佬」而「失敗」，改為於烽火台集會。經過一輪抗爭，外判的決定緊急煞車，校方亦承諾按照2003年的人手比例支薪，及恆常服務永不外判。其後事件中參與度較高的工友組成籌委會，在基關組及中大學生會的協助下，最後更成立中大員工總會。

然而，中大於2003年引入ISO 9002標準評核工作，工友的評核項目變得瑣碎及管理層有全權決定下屬的升遷。當時協理副校長許敬文對此的回應竟是「擦鞋文化係好嘅，可以加強上司下屬之間嘅關係」，並補充一句：「呢個世界無公平架！」

EMO清潔工友墮梯身亡——2007年7月

一位EMO陳姓清潔工友，於聯合書院對開之巴士站，清潔上蓋簷篷時，於8尺鐵梯上墮下，頭部重創，並在搶救5日後不治。

其後，同在EMO工作的妻子麥女士，手持丈夫遺照，於行政樓天台危坐企跳，最後由消防員救下送院。始揭發校方對

她丈夫的死和她的工作狀況，都漠不關心。而自陳工友過身後，校方一直未有向家屬交待事故因由及詳情，令死者死得不明不白。不單如此，麥女士竟經常被安排於其夫身故之地點工作，而此次事件的導火線，正是因麥女士在當日被指令於同一地點單獨進行工作。

巴·不得事件——2007年

中大校方曾在暑假期間打算向中大員工收取1元的校巴費，但在員工總會爭取下，成功獲豁免。其後校方向「訪客」收取每程3元的車費，「訪客」包括舊生及非由中大直接聘請的員工如建築工友、飯堂員工、超市員工、書店員工、學生會職員、女工同心合作社社員等。

八月中，中大同學發信中大交通組投訴，認為政策歧視外判工友，令基層工友生活百上加斤。惜無回音，遂發起「巴·不得」行動。具體的行為包括收集聯署反對收費措施和派發「反對車票」讓人投進校巴的收費箱作抗議等。後來學生揭發校方持校巴牌照收費違法，校方才停止所有收費措施。

導師正名運動——2009年12月

中大校董會擬向立法會提出修訂《香港中文大學條例》，其中一項為更改「教師」的定義。在新定義下，導師不包括在「教師」之列。員總及導師要求校方重新修訂「教師」的定義，然而，校董會不顧其反對聲音，一意孤行通過大學條例修訂，並提交立法會立法。不過其後立法會否決修訂，指出「教師」定義不包括導師是「明顯漏洞」，要求校方重新諮詢。

其後員總發起「為導師正名，為教學正名」聯署，校方成立「導師事宜專責小組」，向導師口頭公布初步建議。但導師認為建議保守，對改善導師的現況幫助不大，故雙方繼續磋商。2011年1月，時任校長沈祖堯對外宣布已經為中大「導師」正名為講師，其後，校方亦逐步回應有關升遷及起薪點的訴求。

油漆工工殤身亡——2009年1月

一名外判油漆工在中大工作時，因3米高工作台翻側而不幸身亡，判頭卻對恩恤安排一再拖延，最後只願付部分殮葬費，而不願付家屬生活費。再者，外判商竟欺騙死者家屬中大不准路祭，而跟校方和死者家屬會面時，更多次把工殤責任推在死者身上。

校方先後以「無預約」及「高層正在開會」為由拒絕接見家屬和同學。直到2月11日家屬及工會聯同聲援同學到烽火台抗議，校方才回應事件，並承諾墊支殮葬費和生活費。而負責監督外判商的EMO，在整件事當中處處偏幫外判商，負責跟進事件的EMO職員亦沒有盡力協助家屬處理死者的身後事。

建築工堵路追欠薪——2011年2月

7名負責善衡書院陳震夏館改建工程的建築工，過年前夕被外判商佳運工程的判頭拖糧兩個多月，在年廿九早上於大學道善衡書院對開，發起罷工堵路

行動，要求即日取回應有的薪金。工友和到場聲援的學生跟校方和佳運周旋了半天，最後晚上6時多佳運的支票才送到。校方無為此追究佳運，而且學生事後揭發，原來以前工友曾向校方求助，但未獲受理。

新亞飯堂剋扣員工飯鐘錢——2011年4月

最低工資實施後，報章報導負責經營新亞飯堂的生利集團在實施最低工資前夕，逼員工簽署同意書取消飯鐘錢（有薪用膳時間）。其後學生組成「中大飯堂關注組」到新亞飯堂舉牌抗議生利集團剝削工友，要求撤回安排，否則中大校方應拒絕與生利續約並補貼工人損失。經過關注組的抗議和新亞學生會的爭取，生利才承諾有飯鐘錢。而校方繼續對於校園內數外判飯堂百名員工的「飯鐘錢」問題不聞不問。

室內清潔工被逼調遷——2011年5至7月

物業管理處（EMO）屬下的室內清潔組組員的調遷一向遵從自願原則：工友若在自己的崗位工作得不愉快就可以申請調到其他組。

然而，5月底，室內清潔組助理經理通知各組長即將推行新制，透過抽籤強行將工友調組。這決定使希望「做生不如做熟」的工友壓力大增，更有工友因而出現幻聽。室內清潔組54名工友裡有43名因而聯署反對調動方案，當中最少有7成都是合約工。但室內清潔組主管完全漠視工友訴求，反而變本加厲，強制大部分工友一次過決定以後十年的調動。抗爭期間，工友除了承受不獲續約的風險，也受盡上層的壓力，如EMO強迫工友提早安排年假，強令組長負責風險評估，甚至騷擾個別員工。

中大學生會、中大學生報、基關組、左翼學會組成EMO工友關注組，與員總收集同學反對調遷的聯署，並聯同工友向沈祖堯校長遞信，校方才停止進行調遷。

校方外判所有圖書館清潔服務

——2012年6月

有工友向工會放風，圖書館清潔服務將在暑假期間被全面外判。5月7日，員總去信校方查問傳言，校方卻於個多月後才回覆確認，中大全數7所圖書館會以「提升管理效益」為由，於7月1日起外判所有圖書館清潔服務。是次中標公司為在勞工條件問題上一直惡名昭彰的惠康環境服務有限公司，校方此舉亦違反2003年校方永不外判恆常物業管理工作的承諾。

中大學生會、中大學生報、左翼學會和基關組同學得悉後組成「中大反外判戰線」，與員總發表反對外判聲明，並收集聯署。最終逼使校方取消與外判商擬定的清潔服務合約，而館內清潔服務將交由大學員工負責。其後，員總和反外判戰線要求校方增設良心約章，雙方就校內外判事宜商討，但未達成共識。過程持續至今。

娥姐事件——2012年7月

7月初，潤昌堂清潔工友娥姐因工作評核報告被評為「持續不符合大學標準」而被勒令離職。她不滿評核結果，除了尋求員總及人事處介入事件，亦向同學及教職員求助，希望能得到潤昌堂使用者的公正評價，而普遍使用者都認為潤昌堂的清潔狀況良好。經過同學與校方不斷交涉後，娥姐最終獲調任到龐萬倫學生中心工作。

中大工友被逼遷——2012年10月

10月20日，《東方日報》報導爆出住在中大山村徑職工宿舍的職工將於11月30日被校方強行遷出。基關組同學得悉後前往職工宿舍了解詳情，始發現，被逼遷工友早於5月已聯署去信沈祖堯校長表達搬遷困難，但校方指是行政事務委員會（AAC）的最終決定，不能推翻。

其後同學去信校長、副校長及其他行政部門，希望校方能於7天內與求助工友會面，共同商討解決方案，未果。基關組聯同學生會、學生報、電台於中大各處及網上發起聯署，五日內收到1,471個來自市民、教職員、學生的聯署。其後終獲得校方答應與學生、求助工友三方一同會面。

在商討期間，校方暗地裡使手段令工友承受極大壓力，務求令工友知難而退，例如要求與工友單對單會面；有工友收到上司暗示「再同啲學生搞搞震，小心冇得續約」。求助工友先後因抵受不住壓力離去。事件其後告一段落，但校方手法令人不齒。

任重而道遠
——訪問員工總會理事吳曉真

陳秉鳳

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簡稱「員總」），是職工盟的屬會，成立於2004年。當時大學削減開支，引起「肥上瘦下」的風波[1]，一班員工為抗議此事組織起來，後來並成立了工會。員總的主要工作是維護中大員工的權益，同時也會就各種中大政策發聲，例如反對院長委任制、反對取消教務會學生委員、反拆烽火台、支持情色版事件中被校方警告的學生等等。

吳曉真（Emily）由員工總會2004年成立至今，一直擔任理事（其中多年出任會長），她2013年時任職於中大通識教育部，跟進334改制後新的通識課程。相對中大原有的兩個工會（香港中文大學職員協會（職協）及香港中文大學教師協會（教協），員總是一個進步性及抗爭性較強的工會，亦不限制會員的工種。其兼有基層職工、白領與教職員的特性，亦使其為基層勞工發聲之餘，亦能關注其他與教學及大學政策有關的議題。今次訪問，希望Emily能就員總十年作出回顧，一同思考日後中大內員工組織的方向和重心。

組織的成長與限制

員總成立時人數只有73人，現時約有760人，是全中大員工的約十分之一。成立初期基層工友佔的比率較高，現在多了文職及教職員，除物業管理處（EMO）工友外亦有其他工友，如校巴司機及宿舍職工等。員總初期並不接納教職員做會員，後來在2005年修章改變這個規定，主要考慮是要結合不同工種及不同階級職工的看法，才能真正就校方的資源分配方針發聲，並不只為了爭取各自的利益。「例如在成立時面對的肥上瘦下事件，其實對長約工的影響較少，但有很多長約工都加入爭取合約工的利益，都是因為看不過眼不公義的事情。」Emily如此說。十年來理事會的人也有更替，大多是因為職工離職或覺得不適合擔任理事工作，Emily覺得換人是好事，能夠擴闊員總的接觸層面，這亦是她堅持今屆不再續任會長的原因，她覺得應該讓更多人嘗試承擔職務。

現時員總招收會員，主要是靠寄通訊這種較被動的方式，但有時寄入會表給新員工也未必做得足，都是因為人手問題。部份會員加入是靠定期的電郵通

訊，特別是有重要消息透過通訊發放時，如成功爭取加人工，就會比較多人回覆入會。EMO入會率高（300人中有200多人是會員）是因為容易接觸，很多時有同事新入職，已是會員／理事的同事就會招募他們入會。由於人手問題，處理日常事務已忙不過來，員總年度活動只有會員大會，春茗和旅行。Emily說他們也想多搞一些聯誼活動，只可惜人力所限。「文職職員常會覺得我們形象太『爛仔』，總是與學校拗數，令好多人不敢入會。其實應該透過這種較軟性的活動去做，但心力不足」。

跟個案與推議題的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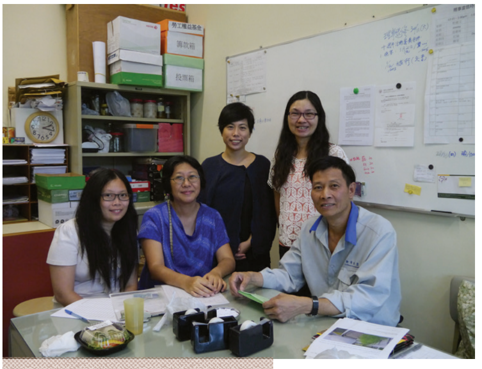
Emily表示，其實議題是有很多，但很難推動，因為大部份人力時間都花了在跟個案上。很多不同層級的職工都有工作環境及待遇問題（例如宿舍員工走時沒有校巴搭），推個案是很煩的事，學校很容易覺得你是「搞事」，本身想推一個問題，但又發覺制度不公平，就愈滾愈大，處理的問題愈複雜。

其實理事都是在中大要打份工，可以跟個案的時間不多。簡單的個案基層工友理事都可以跟進，但與文職和白領有關的問題就主要是Emily和另一位同事去跟，因為需要寫信及要較熟悉整個中大運作架構。「其實是很辛苦，有時也會很內疚覺得有些部份可以再做好些」Emily感嘆地說。近年有很多個案的事主都有很大情緒問題，亦導致他們與身邊的同事有更多磨擦，到三更半夜Emily都要聽電話疏解對方情緒。而這些情緒出現的原因，尤其是一些較長年資的職工，是源於對學校的歸屬感強，認為大學應該比較其他商業或公營機構重人情關係，亦認為自己是這個社區的一份子。而校方在對待這些有情緒問題的職工時，很容易就失去耐性，Emily覺得這樣是不對的。

推議題也不容易，例如不少職工都遇到評核制度不公平的情況，他們都會嘗試跟進，搞聯署，去向校方爭取，但問題改善的幅度可能很小。若議題影響層面不夠普及，聲音不夠大，校方又不會正視。有些個案問題，例如教師的升遷評核，他們未必想對外公開他們在評核裡遇到的問題，因為始終可能對前途構成影響。

與校方斡旋

自成立以來，員總每半年和學校開一次會，校方代表有副校長、人事處處長、副處長、財務長和秘書長。Emily感覺這個會效果愈來愈少，校方代表都只會說幫你反映意見，或者有一些小修補。要有比較大的改變，還是要動員會員施壓，加上輿論壓力，才可能推動。其實學校有個Joint Consultation Committee，是校方和工會（職協及教協）溝通的平台，員總成立時也想加入，但委員會馬上定了個很高的門檻，要有一定會員人數才能加入，員總一直未達到門檻，就沒法在這委員會發言，也不能派代表加入不同的諮詢委員會接



攝於員總會室。正中是Emily，旁邊為其他理事。

收資訊及提意見，現在他們在申請希望委員會能降低門檻讓員總加入。

而多年與校方斡旋，Emily認為校方是明白員總也是講道理的，只是員總提的問題和校方慣常處理的問題不同，例如工作間民主及公義的問題、情色版風波時譴責校方處理失當，這些會是校方覺得員總較難處理的地方。

Emily對這幾年校方的施政亦有擔憂，人治色彩仍然很重，制度不完善亦不能公平地解決問題，以致任何職級崗位的職工遇到問題，都會直接寫信給校長沈祖堯，這絕不是一個理想的狀態。

導師正名事件帶來的好影響

2009年底開始的導師正名運動[2]，在這幾年為員總帶來正面影響，首先是現時員總提的大部份要求校方都予以接納，導師現在能被正視為教學人員，也能加入系務會。其次，這件事發生後教職員加入員總的人數稍有增加。更有一班導師透過這次事件認識了，催生了一些教學相關的跨部門合作，亦在重要社會事件發生時自發參與，例如在2012年反對政府強推國民教育及2013年碼頭工人罷工事件中，他們都有搞論壇、二手書義賣，籌款等等支援運動。惟這班導師參與工會工作未算積極，Emily希望將來能使他們參與推動有關大學管治的議題。

Emily覺得，教職員／教授是很難組織的，「有時可以拉一些熟人（教授）傾議題，但每次傾完又是『唉』一聲說沒有時間搞」。她覺得常常講的「學人自治」（院校自治的前提），一定要院校內部人士去爭取，但現在遠遠做不到這樣的形勢。教授始終要忙研究，有些則比較活躍於社會議題，大學的問題優次較後。「但長遠要守護學校的一些價值，這班人好重要，不可只靠學生去發聲，始終學生未必能掌握有關大學管治問題的細節，關心的面向亦未必一樣」。

與學生關係的轉變

員總成立時，學生的角色很重，那班同學未畢業時也會與員總一同開會。往後幾年校友關注組成立，突出的校政問題很多，校友、員總和學生組織的交流也不少。

直到民女事件以後[3]，大家之間就少了交流。2011年至2012年發生了兩件矛盾比較大的事件，一次是EMO調遷事件[4]，另一次是宿舍迫遷事件[5]。受影響工友直接找學生求助，在員總的角度，認為不能只聽信部份工友的說辭。員總和學生

組織對事件和形勢的理解不盡相同，學生組織方面亦與員總有不同的意見和立場，因而產生磨擦和爭執。[6]

Emily認為，意見不同與身份不同有關，職工與學生面對的風險和後果不一樣，例如，員工要承受往後在職場可能出現的排擠或壓迫，亦有可能要面對秋後算賬，被解僱或不續約等風險，壓力較大。她覺得學生不是不能理解這些東西，但當時員總和學生組織意見有分歧，溝通亦不足，失去了互信基礎，使雙方未能站於同一陣線。

她認為與學生組織重新建立關係是重要的，在事件發生之後，亦有嘗試與學生組織方面重新接觸和溝通。筆者後來再向有關的同學了解，他們表示現時與員總的溝通和接觸依然不多，相信日後要重新建立互信關係，使到有問題出現時，兩方面能並肩作戰，仍需要更多的溝通和磨合才能達成。

未來路向

Emily說，現時員總追求的東西，其實和成立時一樣，就是大學作為一個社區，處理不同事情上要有公義，資源分配要公平。但她感到時間愈長，見到的問題愈多，與剛成立時不同，現在反而很難聚焦在一個問題上。

其實她很想員總可以處理大學的管治問題，2004年肥上瘦下，其實歸根究柢都是整個機構如何做決定，誰做決定的問題，但去到那些部份，老師不參與很難做到。好像2007年院長委任制，員總也曾經將問題拖延了一段時間，搞了聯署，但一到暑假教授們各有各忙又潰不成軍，結果校方還是通過了院長委任制。面對人手不足、組織力不夠強等等問題，員總未來的路，看來仍不易走。

後記

訪問初稿完成後，筆者帶著稿件到員總辦公室讓Emily查看，她讀稿後說，也許是因為她長期揹著太多個案，壓力不小，談的都好像有點令人灰心。我就藉著機會，向在午休時聚在員總辦公室一起午膳的理事們（包括EMO和文職人員）問問看，覺得有了員總有甚麼分別？其中一位EMO叔叔說，「以前只懂低頭做事，有不公平事時，上司也會把聲音按下，但有了員總後，知道了自己的權益」，幾個人七嘴八舌，說知道多很多資訊、每年傾工資，也有人代表自己、有些改變是細眉細眼，但也協助了很多個案。和其他理事在一起時，Emily表現得輕鬆很多。要使工人團結、充權，絕不是個人之事，希望員總能繼續壯大下去。

1 2003年底，當時政府出現嚴重財赤，教育局局長李國章與大學校長磋商削減大學開支，政府後來宣佈2004–2005度的大學資助需削減一成，約十一億，中大校方於是提出調整員工薪金，而當中基層員工減薪的百分比比高層的高許多，引發基層工友及其他不滿此「肥上瘦下」政策的職工、學生、校友抗議。

2 2009年底，中大校董會擬向立法會提出修訂《香港中文大學條例》，其中一項為更改「教師」的定義。在新的定義下，導師不包括在「教師」之列，這意味著較差的待遇和不穩定的職位。員總要求校方修訂教師的定義，但校董會在反對聲音下仍通過該修訂並提交立法會，幸而立法會指「教師」定義不包括導師是「明顯漏洞」，並要求校方重新諮詢。員總其後發起「導師正名運動」，成功爭取導師正名為講師。

3 請參見卷二「民主女神像事件」。

4 詳見本部份文章〈也許只是冰山一角——十年來勞工抗爭事件簿〉之附表。

5 同上。

6 在EMO事件中，員總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指控一名清潔工友會欺負低級的員工，並強迫員工聯署反對調遷方案。員總認為清潔工友的意向不清，認為不方便介入。不過學生組織就相信大部份清潔工友都反對調遷方案，大力地支持反對的清潔工友。

中大女工合作社紀事

◆ 陳正恒

開一間商鋪，利潤至上，凡有利於賺錢，員工流動再頻繁、人際關係再貧乏都可以接受——在這種主流之外，我們可有其他選擇？另類經濟模式的確存在，不過由於跨國資本與本地財團壟斷市場，發展空間往往被擠壓。然而在中文大學，有間已成立十幾年的合作社，一直踐行以人為本的理念。合作社由社員共同經營，實踐民主決策、集體共識、分擔勞動、互助權責等原則，社員集體決定包括工資、工時、分工、產品配置在內的所有事務；合作社還注重回饋社會，壯大基層運動，矢志為弱勢社群建立可持續發展經濟生活的參考楷模。

女工同心合作社小賣店，位於大學本部范克廉樓地下低層，於2001年11月由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女工會）組織創立。2000年，大學裝修范克廉樓，預留空位開設學生會爭取已久的便利店；與此同時，幾位中大學生會與基層關注組（基關組）的同學接觸合作社這一概念，萌生興趣，認為大學素有擁抱社會平等的精神，又享受優惠租金條例，是適於發展合作社的土壤。更重要的是，他們明白合作社實行工人自主、經濟民主，寄望合作社能抗衡壟斷。經過數月籌備，合作社正式開張。社員回憶道，從前的她們，成功開業已經很高興，未曾想到十幾年後合作社仍然屹立不倒。

婦女勞工　合作充權

這群來自基層的婦女，以前多是因香港經濟轉型、製造業遷離而失業的工人，或全職照顧子女的家庭主婦，她們如何組織起來，跰手跰足、創業守業？報名加入合作社的婦女，先要參加一系列工作坊，內容包括認識合作社原則和運作、處理分歧、開會流程等，還要實習、通過評估方能成為社員。對合作社的理解、是否願意及適合與大家長期共事，是評估的重點。曾有實習者只想打工，無心開會，因此退出。一連串訓練實非易事，社員卻說她們「唔可以隨時入來，但可以隨時出去」。既然招募新人不簡單，缺人手無法立即找替補，為何又能隨時離開？原來，合作社尊重個人自由，不強迫人為工作犧牲生活。若退出，能領回股金；若一年內打算回來，還會獲得接納。

當然，現實總比理念複雜得多。最初她們總遇到質疑：基層婦女也懂得管理嗎？「師奶」也能主外嗎？連社員自己亦半信半疑。雖說權責平等，但社員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掌握看鋪、訂貨、算賬等本領，總有能者多勞的狀況；社員性格各異，有人強勢、有人內斂，難免出現不合。最嚴重時，已共事幾年的社員也因對人際關係失望而離開。然而，平等的溝通仍然有助處理分歧，許多矛盾都靠互相遷就和磨合解決。決策亦然，沒有上下階層，每個人的意見都會被尊重。旁聽過例會的朋友便能見識到，社員需要討論小賣店運作、互相遊說，以爭取達成共識；少數服從多數的投票制只在長期未有共識時才採用。曾有同學建議賣撈麵，社員中的支持者認為要優先考慮同學願望，賣撈麵還可增加不少盈利，反對者指撈麵不健康，不符合同學營養需要；經反復商量，她們才開始販售，每一份皆搭配粟米，吃起來更健康。在商討中，原本較少出聲的社員發現，原來自己的聲音也能影響小賣店的發展，於是愈來愈有信心發表意見——向來在公共討論中失語的基層婦女，因此改變：「我哋長咗見識，表達能力都提升。」

成立初期物價低，賺錢相對容易，合作社兩三年間即還清賒賬，為之後加薪至最低工資、舉行義賣奠定基礎。近年，如同所有商鋪的境況，合作社也要承受進貨價上漲，水電煤雜費和地租日趨昂貴。社員不願定價太高對客人太不利，故財政壓力激增。儘管如此，她們靠開



2001年女工合作小賣店開幕。

源節流和勤懇勞作堅持下來，學期中賺的錢補貼假期的虧損，假期的空閒則用來接觸社會和學習技能。

扎根中大　貢獻社會

2006年合約到期，女工決定爭取續約。大學招標制度下，師生中心管理委員會、學生會、財務處的選擇決定結果。委員會中，較認識合作社的教授與學生會代表努力遊說各方，講解合作社存在的價值，希望大學貫徹人文精神、提供孕育另類制度實踐的環境。女工在委員會投票中險勝。校園使用者的看法影響著有權決定的委員，平時女工表現令師生滿意，關心女工的學生設計單張、落力宣傳，皆是她們得以留下的原因。2009年約滿，除了上述努力，基關組還與女工會合作出版特刊，講述合作社運動與社員故事。眾人支持，女工又一次獲得續約。

女工合作社不只有女工，同學亦時有參與營運。基關組不僅曾協助小賣店成立，亦在平時做問卷調查，將師生對小賣店的期望和意見告訴女工，助她們



2006年女工七一齊上街。


2005年發生南亞海嘯，女工舉行一日義賣。

改善。除意見反饋外，學生亦參與策劃合作社的空間使用，例如基關組曾在店面增添理念宣傳和社會運動的資訊。首次續約之後，有人建議女工通宵營業，社員與基關組商議後，認為午夜之後人流稀少，無必要開通宵，然而為盡量照顧同學需要，開設了星期一至五深夜的特更服務，由基關組招募同學在夜間義務當值。自此，女工合作社真正融入同學生活之中。每年，女工與學生會、基關組合作，在勞工週、公平貿易週等時機，向師生介紹勞工權利，傳播民主平等經濟理念。富有特色的女工夜話、池畔音樂會，都是學生協力女工開創的活動。

合作，還存在於女工與社會之間。婦女勞工協會時常組織會員討論時事，瞭解勞工法例、財政政策；每年五一、七一等遊行，女工相約走上街頭。一開始，社員只是在工會活動中亦步亦趨，隨著認識和參與漸多，她們逐漸意識到與眾多工人如命運共同體。她們覺得，合作社是進步的經濟模式，身為社員，知道工人自主的內涵後，應當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一份子：「對社會議題發聲嘅意識越來越強，會企出來貢獻力量。因為唔只係（事主）一個人嘅事情，而要靠集體嘅力量。」因此，她們反對大學外判校巴服務、清潔工作，也曾去觀塘擺街站、派單張，聲援被新鴻基外判剝削的APM清潔工。當大學有工殤意外，當紮鐵工人、碼頭工人發動罷工，以及當東南亞海嘯、地震等大災害發生，合作社皆舉行一日義賣，將收入捐給有需要的人。因為感受到合作社中日常的民主決策讓她們充權，所以女工一向關心政制民主、支持雙普選。她們不僅參與佔領中環商討日，2014年起還義賣「民主棍」、糯米糍為佔中運動籌款。

女工的社會參與，深入到政策倡議。法定最低工資實施之前幾年，合作社就已率先把時薪加到民間勞工組織建議的33元；加薪一年後，合作社沒被最低工資「搞垮」，證實合理提升員工待遇有益無害。校園以外，女工與綠慧、群芳等友好團體組成聯會，每年一度的合作社日前後都開設專題論壇聚首交流；女工加入社會經濟聯盟，一同約見官員、頒

佈社會經濟政策綱領（2012），建言香港經濟藍圖；女工還出席婦女政綱論壇，和議員討論婦女在政策制定中的位置。2012年是國際合作社年，女工於旺角西洋菜南街舉辦推廣日活動，向市民介紹她們獨特的經驗。

小店星火　燃點希望

中大女工合作社的成功，示範了一場社會實驗如何進行，啟發和指導了其他院校開設合作社：嶺南大學、城市大學、香港大學、香港專業進修學校、理工大學先後出現了由婦女組織承辦的小賣店、果汁店或飯堂。合作社是國際運動，女工會考察不同文化背景、政經制度下合作社的發展；中國內地、國外的組織也會來到中大女工合作社取經。

這些年，合作社改變良多：原本狹窄的店面擴張了，增加了水槽、雪櫃、儲物空間，添置了影印機；供應公平貿易認證的咖啡、朱古力，支持公平貿易合理對待生產者；身體力行使用環保洗潔精、洗手液，還販售友好團體手作的環保皂、環保唇膏，倡導綠色生活；親自考察農場，寄賣本地家庭有機農場出產的蔬菜……無疑，這些都是增加成本的舉措，也不是每次改變都效果顯著，然而她們正是在不斷摸索中吸取經驗，走一條本來沒有的路。

女工持續成長的同時，香港財閥壟斷變本加厲，少數人的利益支配多數人的生活，街道和商場變得千篇一律，人均工時常年領先全球。在扭曲的政經制度下，合作社這條出路更顯可貴。中文大學是香港院校中支持社會經濟的先鋒，若無中大引以為傲的人文精神、學運傳統，如土壤和空氣，滋養這場來自基層的社會實驗，小小的女工合作社怎能開出淡雅芳香的花。透過女工，我們看到美好社會的可能圖景，那是我們本應擁有的生活體驗。願這點星火燃燒下去，改變的希望在人心中不滅。

參考資料：

1　林曦華，〈攜手創未來　女工同心合作社九週年紀事〉，《中大學生報》，2009年9月號

2　Tracy，Ivy，〈女工合作社知多少？〉　，《中大基層關注組2012年迎新特刊》

2012年女工與同學分享經驗。



*本文所用照片均由中大基層關注組提供。

中大學生會：十年評點[1]

李敏剛

這十年來學生會各方面的成敗得失，並不易一概而論，更非筆者的意見、分析、評價足以定論。本文希望點出一些這十年來學生會有趣的轉變，並做一點相關的歷史梳理，以留下一點歷史紀錄。筆者曾為第38屆（2008–2009年）和39屆（2009–2010年）學生會幹事；我的觀點自難免偏頗，但相信應能大體捕捉到這十年來學生會值得留意、反思和爭辯的一些轉變。

近年來學生會最值得一提的轉變，我會將之概括為「區議員化」。但這個轉變有意識形態上的脈絡，其中的過程和得失，也得有更多的社會大氣候、以及當然少不了的偶發事故的影響作為背景，才足以作公平的評價。以下便會跟從這個次序談「區議員化」的背景、內容、得失：意識形態包袱的轉變、何謂「區議員化」，以及區議員化下「地區工作」成果受到的限制。意識形態轉變作為變遷的主要因素，這方面的交代會不合比例地長，但考慮到這段變遷歷史頗為重要，我因此不避繁瑣累贅，只求盡量清晰。

意識形態變遷

這十年來學生會的意識形態包袱逐漸變得輕省。這是指：（一）學生會內閣內部的意識形態衝突愈來愈不尖銳；（二）政綱的內容趨同，尤其在社會面向方面；（三）學生會各屆內閣（大同小異的）意識形態與社會／學生主流的衝突愈趨不尖銳。這幾個轉變的客觀效果，就是學生會相對來說愈來愈能空出心思與時間做一些較為軟性、拉近和學生距離的，卻相對「非政治化」的福利工作。為何會有這個轉變？其中社會大氣候轉變是一大原因，但也有偶然的因素。而這可以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做一個分水嶺。

甲、中國認同／與內地生的磨擦

2009年以前，學生會其中一個矛盾最尖銳的意識形態爭議，是中國認同。這有時代背景：2004年，港大學生會發表「七一救港宣言」，稱憂慮泛民主派對普選「盲目的追求」，擔心這會令「社會在政改議題上走向兩極化」，主張應和中央「雙向溝通」；2006年，學聯代表與曾蔭權閉門會面，商討政改；一時間和解溝通的氣氛甚濃，於是對中共的態

度就常成為傾莊和學生會爭議的焦點。

2007年，第37屆學生會便曾就是否參與當年港大學生會牽頭的訪京團，內部出現激烈爭議，最後決定不參與訪京[2]。但對中共的態度應該如何？對內地由中共控制的中央政府應該有何態度？是否承認中共是內地的合法政權？對藏獨、台獨問題又應有甚麼取態？這些都成為了當時學生會傾莊、學生會內閣出聲明考慮字眼措辭時常要考慮的問題。這些問題並不是庸人自擾——因為學生會對中國認同的取態，將直接影響到和在中大就讀的內地生的關係。

近十年、尤其是2009年以前，學生會傾莊常會有內地生參與，而最尖銳的爭論往往就是圍繞對中共的態度。應公平地說：會來學生會傾莊的內地生，一般都是關心社會問題的有心人，談到內地的貪腐問題之類，會站在批判當權者的立場，甚至談到六四，不少內地生也認為中共鎮壓學生有錯。他們和傾莊的香港學生的分歧在於：他們一般大都承認中共控制下的中央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而香港學生（當年）都一般只會稱之為「中共政權」，稱九七年香港回歸為「主權移交」，不接受中共的合法性；其次，內地生一般強烈反對藏獨和台獨，主張維護中國領土完整，香港學生則傾向接受當地人民自決。於是問題就來了：學生會應如何面對這些內地生？如果學生會的政治立場令內地生反感，等於自絕於這班值得爭取的內地生的支持，這樣是否值得？

2008年西藏的「三一四事件」則是這個矛盾的最大爆發。2008年3月，藏人發起集體抗議，及後演變成騷亂，大批解放軍入藏彈壓。中大學生會隨即發表了措辭強硬的聲明，批評中共武力鎮壓藏民；這份聲明令內地生十分反感，認為學生會不明事件真相，就代表中大學生發表聲明；學生會收到過百封表達不滿的電郵，亦有不少內地生親身到學生會會室理論；及後學生會再發表長篇回應，亦在網上引來了激烈罵戰[3]。這次對抗令學生會和內地生的關係決裂，此後幾乎是處在不瞅不睬的狀態[4]。

平心而論，有關西藏、台灣，乃至國族認同的問題，學生會歷屆內閣都並沒有真正討論過，遑論有甚麼有意義的立場；捨去平反六四、對內地的維權及部分社會問題（如勞工問題）的關注之外，對中國的進一步分析（甚至認識）基本上都是交白卷。內地生批評學生會人云亦云倉促表達立場，其實不無道理。進一步來說，學生會動不動就會對政治事件發表聲明，幾乎已經變成了慣性動作，而到底應對甚麼事發聲、甚麼事不發聲，則近乎漫無標準（不公義的事每天都在世界每個角落發生，學生會是否也要一一發表聲明呢？），到底學生會對政治社會事件，應有甚麼角色？聲明的重要性又在哪？

這些都是值得反思的問題。但幸或不幸，社會氣氛轉向，這些反思未及開展，轉眼就失去了迫切性。

中大學生會幹事會會室。（攝於2015年）



<u>乙、分水嶺：六四二十周年與社會（青年）激進化</u>

2009年是六四二十周年，港大學生會會長陳一諤公開質疑在八九民運中，中共暴力清場是否真的「屠城」，指中共已將暴力減至最低，其決定未必錯誤。中大學生會立即發表聲明批評，指陳的言論是為劊子手開脫；港大學生會亦發表聲明和陳劃清界線。社會輿論嘩然之餘，亦一面倒批評陳的言論冷血、意圖為中共翻案、放大學生運動領袖的過失、無視中共屠殺學生之惡等等，陳亦旋即被港大學生罷免。事後看來，這次爭議其實是香港社會氣氛的分水嶺：除了進一步確認要求平反六四、追究屠城責任是香港的社會共識之外，和中央妥協溝通的氣氛亦轉淡。之後相繼爆發了反高鐵運動（2009年末2010年初）、五區公投運動、民主女神像入中大（2010年），社會上，尤其是年青人對特區政府、對中共的抗爭氣息漸變得強烈。

在內地生退出校園政治爭議、社會抗拒中共意識上升的情勢之下，學生會有關中國的政治認同方面的壓力大大減輕，至少沒有人會要求學生會就台獨、藏獨、中共合法性之類問題表態。學生會即使退回最基本的平反六四、支持維權、關心社會基層的立場，也不會出大問題；同時，社會抗爭氣氛日漸濃厚，學生會就政治議題發表批判性的聲明，重申一些如支持民主、自由、人權、公義等的價值，也不會引起太大的反對（或注意），甚至做一些對抗性的行動，受到的批評亦大減（例子：2007年畢業禮學生衝擊來主禮的董建華，受到輿輪一致批評；到了2009年學生在畢業禮衝擊唐英年，受到的批評已經大減，甚且有支持的聲音）[5]。

此外，學聯的政治意識變得激進（這也許也是社會尤其年青人激進化的影響所及），也令學生會的理論化其立場的壓力大減；既然有跨院校的學聯就政治議題發表評論和組織行動，中大學生會也不太需要別樹一幟提出自己的政治議程。在反高鐵運動和五區公投運動之中，學聯和各院校學生會空前團結，在五區公投之中尤其全力參與[6]。此後，爭取普選、社會公義成為了學聯的基本政治立場：2012年9月，學聯在中大百萬大道組織大罷課，反對特區政府在中小學推行國民教育，有八千人參與；2013年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公民抗命爭取普選，各大院校學生會亦全力支援。早幾年院校之間就和中央溝通還是抗爭到底的擺盪煙消雲散，中大學生會在政治立場上亦可安心「跟大隊」。

<u>丙、內因：就政治與社會的共識</u>

除了這些外在因素，學生會意識形態包

袱減輕也有內在的原因，這就是近幾屆學生會內閣，似乎對香港的社會政治分析有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框架；大體而言，就是以左翼自由主義的視角來批判香港現況[7]。這其實也是學生會幹事們就意識形態努力經營的一個成果。雖然整體上而言學生會面對的意識形態壓力漸減，卻不代表他們在這方面毫無建樹。

2009年的七一遊行前夕，學生會發表了中大版的長篇「七一宣言」《為我們社會的未來建言》，提出了諸如爭取政治自由、批判自由市場、打擊地產霸權、恢復遺產稅、增加利得稅、反對高等教育市場化、民主規劃社區、開放大氣電波等訴求，是社會上較早提出打擊地產霸權論述的一篇文章；宣言發表之後，頗有迴響[8]。

更重要的是，這篇宣言以大體而言接近左翼自由主義的視角，結合一些對香港、內地，乃至世界經濟發展的分析（當年恰為金融海嘯之後，宣言便用了大篇幅批判金融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論者），相對完整地總攬了當時一籃子社會抗爭議程，因而成為了往後數屆學生會傾莊的共同文本：無論同意與否、同意多少，前任學生會既然提出了如此有份量的講法，作為「下莊」多少要有點回應。而就事實上看來，比較往後幾屆學生會的政綱和他們的實際行動，大體上也不脫離宣言的思路和框架；當然，外在因素亦重要，畢竟重視社會公義、爭取普選，同時也是社會抗爭、尤其學界（學聯）的共識。

之所以多花筆墨交代學生會走向「區議員化」的意識形態背景，是因為如果沒有這個脈絡，我們就很難對「區議員化」作公平的評價：學生會之所以能夠投放更多心力去辦福利工作，並不簡單地因為學生會投放到社會抗爭的心力減少了，或社會意識降低了。當然，也是這些轉變，本身也有值得紀錄的歷史意義。

「區議員化」：成果

學生會意識形態包袱減輕的客觀效果，就是空出了更多心力時間處理其他問題，而最終這個演變的結果，就是「區議員化」。甚麼是「區議員化」？這除了前述的福利工作之外，還有兩個面向：一方面是對校政問題的持續關注，以及爭取在體制內解決問題；另一方面，政治動員和宣傳的手法，也和政黨在地區宣傳和動員的手法趨同，而在近一兩年，學生會的網上動員和形象工程也甚為成功。重視相對非政治化的福利工作、重視校園（地區）問題、貼近政黨地區工作的辦事方法，這幾點我通稱之為「區議員化」。

「區議員化」是否新現象？即使僅以這十年為限，也不易一概而論：如從建制渠道影響校政和提供福利，其實第35屆學生會（2005至2006年）都有相當成果，但此後幾屆（第36屆至38屆）學生會都難以為繼，至2009年起第39屆學生會才能重新有系統地跟進校政和福利工作，但在網絡動員和宣傳手法方面卻是近年創新。至於盡力貼近學生切身利益、追求更多同學認同的意識，則其

實每一屆學生會都會，問題只是當屆可以抽出多少人力物力來推進這方面的工作。

學生會近年做得尤其成功的福利工作，有實體二手書買賣（2005年前在福利品部闢出一角擺賣、自2007年改為買賣均只有網上平台、2009年起才又再回復在福利品部擺賣）、福利品部的貨源更新（譬如賣發泡膠板、泳帽）、設計有中大／中大學生會特色的T恤、書包布袋、學生會記事簿、筆友活動等。在2009年以前的學生會，這些活動無論是其規模及其精緻程度，都是難以想像的——這是因為根本騰不出足夠人手和心力去經營。隨著意識形態（也就是政治）的包袱（或內部／與外部張力）減輕，這些比較細緻的團結學生、拉近與學生距離的工作，才有落實的條件——當然，意識形態張力軟化、投入更多福利工作令學生會的形象變得較為軟性，也是吸引更多善於籌劃福利工作的同學成為幹事／協助學生會工作的原因。

除了提供福利之外，學生會亦有爭取較平等的校園制度，及政策參與的權利；而運用制度的有利位置來爭取學生權益，則是近幾年的趨勢。

在2009年以前，學生會和校方的對抗氣息極重：自劉遵義2004年出任中大校長以來，先是2005年「哭中大」反對校方將課程英語化的爭議；隨後2006年校方推出校園發展計劃，學生會發表「齊來保衛我們的山城」聲明，反對校方過度發展、濫伐樹木、破壞自然環境，有三千人聯署，及後即觸發「保樹立人」運動；2008年底又有拆卸烽火台的爭議。同時，自2006年起連續幾屆學生會都缺乏人手處理校政（也是把校政的優次放得較低），校政議題跟進不足，很多時會直接訴諸公開行動（如聲明）而非先在建制內爭取談判。因為這兩大原因，學生會和校方之間，即使是和個別的部門（如作為對口單位的學生事務處），都沒有互信，也談不上合作。

2009年，新上任的學生輔導長尋求修補和學生會的關係，當屆（第39屆）學生會亦有意扭轉這種互不信任的關係；當年六月，學生事務處準備清理范克廉樓的學生活動海報，學生會提交建議書，建議增設水松板供學生張貼海報，交由學生會寬鬆管理（校內團體基本上可以自由張貼），得到採納，是幾年來首次由學生會遞交正式文件和校方部門磋商政策；對上一次的相類似的磋商，已經是2005年：當屆（第35屆）學生會提交改善文化廣場的建議書（建議最終得到落實，現時文廣的設計即為當年學生會的計劃），以及接手手提電腦合作計劃起草招標條款了。

這種重視制度改革和建制內溝通的操作，及後由福利工作推展至其他校政，譬如校董會教務會改組，第39、40屆學生會都提交詳盡的建議書，同時往後各屆學生會會長亦盡力出席各次會議。再後來的如爭取改善CUSIS選課系統、爭取龐萬倫師生中心通宵開放等大大小

小的校政細務，學生會都在建制內頗為盡力跟進，這（無論是在對校政的關注程度，還是在建制內跟進的程度）亦是2008年以前幾屆學生會所難以想像的——例子：2008年教務會改組小組會議，當屆學生會會長作為成員，竟缺席數次，備受內外批評。

重視建制溝通不等於沒有抗爭。譬如校董會教務會改組，學生會也有發表強硬公開聲明；2011年初善衡書院外判建築工人堵路，學生會亦有聲援，同年亦有和基層關注組合作的校園勞工調查，抨擊校方的外判制度。總的來說，近幾年來，學生會和校方的關係是「又傾又砌」，既有對抗也有合作——這樣需要耗費的心力遠比單純和校方對抗要多，這其實是學生會更趨踏實處理校政問題的表現[9]。

除了福利工作更具規模、更善於運用建制位置爭取學生權益外，近年來學生會的宣傳工作，乃至形象工程，都比以前（至少2008年以前）做得更到位；自2009年開始，學生會幾乎做到每月均向同學（在網上）發佈工作報告（比較：2008年以前則連代表會要求的中期報告都沒有準時提交），這一方面固然是宣傳手法，另一方面其實也是向同學發佈更多資訊、向同學問責。除了正式的工作報告，學生會亦不時會掛橫額，或用壁佈板，向同學報告自己「成功爭取」了些甚麼。

此外，學生會在運用社交網站Facebook做信息發佈、宣傳、動員、和同學溝通方面，都頗有成效；譬如說前述的CUSIS選課系統出問題，令很多同學選不了課，有些同學在Facebook開了「CUSIS老母」帳戶與大家同樂，一起咒罵CUSIS，學生會迅速和那些同學取得聯絡和互動，同時亦掌握了同學對CUSIS的意見，這是很成功的一次嘗試。在網絡以外，學生會亦陸續購買了摺檯、旗幡、大聲公等物資，隨時可以如區議員在地區宣傳般開「街站」；購置和運用這些工具雖然細碎，卻是表明學生會更重視校外的宣傳和校內的動員，至少開始關注到這些實務工作需要有的物質條件。

這些「區議員化」的動作並不容易評價：它既有純粹提供福利，也有學生會形象工程、關注校政、善用建制渠道、重視動員的實務工作的面向。這些工作自然有它們進步的一面，但實踐之中也不乏過了火位，而和學生會一貫批判社會批判建制的議程有張力的做法——如協助校外商戶做宣傳、又或者和校方高層私下談判、閉門談判之類；箇中得失應如何取捨，仍待探索。

「地區工作」的限制：中央——書院關係

「區議員化」之下，學生會雖然以關注校園、貼近一般學生來定位，但「地區工作」的成效也不應高估；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限制，就是中大的書院制之下，中央學生會和書院學生會之間的張力。

相對於中大學生會，這十年來書院學生會的政治氣氛和抗爭氣息較淡[10]，而書院學生會因為負責籌辦書院迎新營，和宿生會亦有直接的工作關係，因此和一般學生關係較密切。由於中大學生會和書院學生會沒有直接的從屬關係（以歷史而言，三書院的學生會早於中大學生會成立；學生會代表會亦由書院代表構成，監察學生會），亦沒有仔細分工[11]，中央學生會和書院學生會便常會有矛盾，其中的關係不易理順。

譬如說，2012年善衡書院咖啡閣將引入星巴克咖啡。中大學生會一直反對連鎖咖啡店進駐中大，而星巴克咖啡亦以賤價剝削農民著名，因此隨即表示反對。另一邊廂，善衡書院學生會卻批評學生會干涉書院內政，及後發動公投，善衡學生大比數支持善衡賣星巴克咖啡。到底在尊重書院獨立性和推廣進步理念之間，應該如何平衡？書院制之下，學生（尤其是書院學生組織的學生）大多對書院很有歸屬感，如何理順和書院學生、書院學生會的關係，關係到學生會是否能爭取同學的認同。在這方面，學生會似乎仍未能有完善的應對方法。

當然，這十年之中也有學生會和書院學生會關係較好的時候，但這主要是建基於偶然的私交——這固然重要，但沒有恆常的工作制度來建立互信，始終令兩者常有張力。例如聯合學生會曾經和中大學生會關係友好，但2013年的迎新日，聯合學生會不同意中大學生會迎新刊物中對聯合書院的描述，雙方關係大壞。事件之後演變成書院聯手譴責學生會（和學生報）不尊重書院（因為學生報迎新刊物也有對其他書院的失實報導），更是近年學生會和書院學生會的一大衝突。

結語：有待改善的民主

「區議員化」的最大動因，是追尋提高學生會在同學之間的認受性。認受性不足是這十年來一直困擾學生會的難題：如選舉投票率偏低（會章規定只需要有六分一學生投票，選舉已有效）；近年學生會選舉投票率約三成，候選內閣一般得到九成以上的支持票、學生沒有細讀政綱就投票、候選內閣諮詢大會極少人出席等問題。即使近年學生會投放不少心機拉近和同學距離，其動員能力也只是由約略三四人提升至三、四十人，在一萬人的校園之中，這個動員能力仍難令人滿意。

學生會近年來雖然著力拉近和學生的距離，但這無論和現存的代議民主，還是和學生會經常倡議的參與式民主比較，都仍相去甚遠；如何能進一步增強學生會的認受性，同時能堅持一定的理念和持續的社會參與，目前都未有簡單而充分的答案。這仍待往後的各屆學生會的探索。

後記：好打得、摺、老鬼

前文較少觸及，但其實不能迴避的事實是：「學生會真係得好少人做野」。更準確的說法是：學生會上莊已經人少，更常會有莊員莊期中途就不顧而去，或

低度參與，即所謂的「摺埋」。以實際運作人數來衡量的話，由第34（2004-2005）至第38屆（2008-2009）學生會，可以稱為低潮期，往往到了莊期後半，十位莊員之中便只剩下大約兩三人還在「運作」。

不諳熟中大學生組織常態的讀者，可能會對此很驚訝，但細心的讀者可能已發現：這個所謂的低潮期，其實恰恰和前面所說意識形態張力很大的一段時期重疊。少人上莊、多人摺、意識形態張力大，箇中有何因果關係，實在一言難盡。

我想談的反而是另外兩點：（一）表面上抗爭不絕和人丁單薄的關係；（二）所謂「摺」（可以）是怎麼的一回事。

2004至2008年的中大學生會，往往會被人覺得很激進很抗爭「好打得」，2005年有「哭中大」，2006年有保衛山城保樹立人、2007年有衝擊畢業禮、2008年底有烽火台事件，還未計校外的社會抗爭。學生會事實上人丁單薄，卻運動多多，到底是甚麼一回事呢？

首先，這些抗爭其實很多是「假手於人」或有「外援」。或許是一些和學生會相熟的熱心同學，或許是學生報莊員發起／參與。因此如果仔細留意那段時期學生會的「聲明」，很多的下款都是中大學生會某某小組或關注組；外界不會在意這小轉折，因此往往都會歸入中大學生會名下。此外，人手緊張，後果自是策劃不周，因此亦多混亂場面，自然吸引輿論眼球（在畢業禮衝擊董建華就是一例），然後受到批評便要回應，人少少也是寫文比行動容易—— 中大學生會「乜都衝一餐乜都拗一餐」的形象，也由此成形。

那麼，所謂「摺」，又還有甚麼可以說呢？做到半路就走不就是不負責任嗎？何必多言？

這種說法忽略的是：因為香港所謂的學運傳統，學生會往往有很重的政治（意識形態）包袱，既免不了要和「政治世界」打交道（例如中大學生會是支聯會和民間人權陣線的成員團體），又似乎有著為社會爭取公義的角色，但又要顧及不要和一般同學距離太遠，同時那邊廂又要和大學高層劍拔弩張地談判（甚至對抗）；作出的決定隨時影響深遠—— 也隨時令自己身敗名裂，受同儕及社會責難；還有權力的誘惑，還有鎂光燈帶來的亢奮（和恐懼）—— 這一切對那些才二十出頭、可能才剛進大學的大學生（好幾屆學生會會長都是一年級生），是否過於嚴酷？這樣的成長和學習環境，是否過於扭曲？我們不能忽略的是，學生會除了代表學生、服務學生之外，幹事們也在其中學習和成長—— 學生會的存在，其實也是廣義大學教育的一環。幹事在任期內惶惑、迷失、軟弱、怯懦、逃避，最後決定「摺埋」，這其中的掙扎，又真的一句「不負責任」可以說得清嗎？其中（成長和學習）的價值，又真的一句「不負責任」可以說得完嗎？

這裡無意為學生會沒有盡責開脫，只是希望點出除了簡單一句「不負責任」，摺埋，還可以有其他的解讀，難以一概而論。

最後，也談談所謂「老鬼」。

學生會幹事落莊交接之後，往往就各散東西。除非當屆幹事邀請，絕少回去幫忙和給意見，更別說「老鬼干政」。所謂「老鬼」的網絡，其實更像一個各個年代的學生會幹事（當然包括當屆）互相砥礪、持續學習、互通聲氣，然後在各自的領域推動社會變革的平台。在學生會成長了的幹事，把學生會的理念帶到自己的事業裡去—— 為了社會公義的抗爭，並不會隨著「落莊」結束（這亦是學生會的「教育」價值之一）；當屆幹事如需要幫忙，大部分「老鬼」也不會推托，但支援很多只是資料和經驗上的分享，不會干涉指點當屆學生會的決定，平等相待—— 學生會向來重視平權重視尊重，這也許是這理念在組織關係的一個延伸吧。

這些零星片段，對理解學生會變遷，甚至學生會的性質，其實也重要，但如果在正文交代來龍去脈，大抵讀者只會覺得更混亂、更難把握學生會的形象，是以放在後記之中。歷史所以值得我們思考，也許正因為它從來都是千頭萬緒，而非條理分明[12]。

1 這裡用「中大學生會」而不用法理上更為準確的「學生會幹事會」，是因為一般人們提起中大學生會，譬如「中大學生會發表聲明」，指涉的其實都是幹事會，而不是作為法理架構的「中大學生會」（按照學生會會章，中大學生會的最高權力機關為全民投票，然後權力機關的位階依次為全民大會、三莊暨代表會之聯席會議、代表會、然後是平行的三莊：幹事會、學生報出版委員會及校園電台，其中幹事會會長對外代表中大學生會，即「中大學生會會長」），用「學生會幹事會」或「幹事會」反而會使行文顯得混亂和累贅。

2 事實上，學生會每年均會收到中共國慶酒會的邀請函，惟各屆學生會均拒絕出席。

3 學生會的聲明和回應，以及隨後罵戰，可見當時學生會為此事架設的網站：http://tibetcusu.wordpress.com/

4 直至2008年末，都依然有內地生來傾莊，但之後幾屆的學生會傾莊，都不再有內地生。此後當然還有零星的和內地生的交流 —— 畢竟「內地生」不是鐵板一塊的整體。但總的來說此後學生會似乎並沒有特別重視內地生。

5 2011年以後，中港矛盾磨擦加劇，社會上甚至出現了稱內地雙非孕婦、自遊行遊客乃至內地人為「蝗蟲」的聲音；陳雲推出了《城邦論》，本土城邦論述大行，對內地（人）的不滿和排斥只有日增，這會不會引起學生會另一次的有關「中國認同」的意識形態壓力，仍有待觀察；但執筆之時，當屆學生會對中港矛盾仍未有積極介入，校園亦未形成足以要學生會表態的同學壓力。

6 事實上，當時出選的「大專2012」就是學聯班底。

7 左翼自由主義即大體上認同每位公民都是自由而平等的個體，應享有廣泛的基本人權和自由、政府而由民主選舉選出並受到公民權利的限制、並支持較為平等的財富分配（如支持累進稅、限制資本擴充等）。

8 如潘慧嫻在其2010年出版的暢銷書《地產霸權》中文版的序言中，也有引用這篇宣言。宣言全文可見學生會為宣言架設的網誌：http://hkdeclaration.blogspot.com/

9 2009年，當時的校長候選人沈祖堯答應會見同學。這是中大學生會及書院學生會多次爭取的成果－雖然本來是要求遴選委員會要有學生代表。不過在遴選階段已能要求候選人接受同學質詢，已是爭取同學權益和校政參與的一大進步。

10 當然個別屆數有比較活躍的，譬如說2005至2006年的聯合學生會。

11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章，學生會幹事會有專有事權，總綱第三條：本會之專有事權乃由各成員書院學生會共同授予者，其為參加香港專上

學生聯會，對外委派一切代表，對外發表一切聲明，收集會費。文中指分工不清楚，是指上述條文外的工作分工。

12 感謝鄭斌彬、林朝暉、楊政賢、范長豐、王海平為本文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和意見，以及其他多位學生會前幹事在資料和文字上的幫忙，也感謝他們對筆者的鼓勵。後記的意念來自陳日東的建議，他亦對正文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歷史資料和意見，在此一併致謝。當然，本文所有紕漏，責任全然在我。

中大學生報十年浮沉

◆ 劉子僑（第38、40屆編輯）、羅奕媚（第37–38屆編輯）

《中大學生報》大概是這十年來校內最具爭議的刊物。自詡為監察校政的學生組織，報社向來不怕得罪校方，於是據說每逢出版，大學裡某些部門主管都要拿一份，看看有沒有自己部門的不利報道；作為具批判性的學生媒體，近三、四年《迎新特刊》出版，最關心的莫過於一眾書院迎新營的搞手，他們總能在「書院介紹」裡發現錯誤，然後連同批評書院制的文章，一同鬧上代表會，而代表會也難得地需要討論一下編輯自主的問題。

不過，無論誰是誰非，可以肯定的是，假如《學生報》沒有影響力的話，這一切都不會發生。而2005年底的改版，可說是這一切發生的關鍵，也是《學生報》這十年裡最大的改變。

改版前的《中大學生報》

這段時期的《學生報》，已經會出版很多立場鮮明的批評文章。這類文章的出版，難免會遇到讀者的反彈，被主流媒體所批評。讓負責該文章的編輯承擔一切是一種做法，不過報社採取的是另一種方法，每篇文章原則上需要每位編輯同意才能出版，畢竟文章一旦出事，對整本刊物的影響，並不是個別編輯可以承擔得來的。在集體負責制底下，編輯必須花更多的時間討論每篇文章，以致出版需時甚鉅，一年大約只能出版三至四期，且也沒有固定的出版週期。

此外，每期的印量雖達三千份，但基本上只會放在本部的范克廉樓大堂，只能接觸到經常出入本部的同學，而不穩定的出版週期也令《學生報》無法如六點半新聞般可以被預期，故當時《學生報》的讀者很少，而知道這本刊物的同學也不多。

出版物不為同學所知，除了局限了自身的影響力外，更引致傳承接莊的問題。儘管比以往加強了宣傳，但2004、2005連續兩年來傾莊的同學都明顯減少。2005年更曾試過到了11月底傾莊，仍只有兩位同學恆常出席。（有別於普遍學生組織的三次傾莊，報社的傾莊往往持續兩至三個月，故11月底是報社成莊的關鍵時期。）

內容方面，這段時期的《學生報》以報導校園新聞為主，相關內容每每佔全刊一半以上，而每期均有一個校園專題，大篇幅深入報導特定題材，如代表會、學聯、學生會選舉等。此外，當時的



報社會室（攝於2007年）

《學生報》亦有不少有關同學的投訴的報導，如宿舍設備、課檢、迎新營收費等等。

改版初期

為了扭轉青黃不接及影響力不足的局面，2006年底《學生報》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改版：確立每月一期的出版，現時黃色報架上「每月五號　全年毋休」便是從這個時候定下的；在校園版和社會版以外，增設了文藝、情色、體育等版面。這些新增的版面固然有基本的理念，但增版最主要的目的則為了吸引不同興趣的讀者，讓刊物接近讀者多一點。這可是《學生報》首次將自己定位為年青人（不單是中大同學）刊物，首次視各種免費潮流刊物為競爭對象，開始重視外觀和文章篇幅（以往編輯鮮會關心文章過長，一般讀者難以進入的問題）。發行方面，為配合找廣告，將印數增加至一萬份，除了在中大增設擺放位置外，同時亦會發行至各大專院校、書店、Cafe、青年中心等，改版初期更會到地鐵站派發。此後各莊基本上沿用以上出版模式，只在細節上有所調整。

由於改版後工作量大增，然而莊員的人數與投入程度卻年年不同，為了維持出版的穩定，於是開始聘請兩個全職及兩個半職職員協助出版，一位全職編輯助理、一位全職廣告主任，以及一位半職平面設計師。聘請編輯助理的目的，除了傳授編輯技巧，確保刊物如期出版外，更重要的是傳承報社一直秉承的基本理念——親基層，對主流論述保持距離和批判以及反權威等。至於廣告主任，則主要是為了幫補改版的龐大開支，同時亦會讓出空間（免費或友誼價）讓友好團體宣傳各自的活動。要與街外的消費雜誌爭取讀者，必須增加雜誌吸引力，故亦聘請了一位平面設計師負責刊物一部分的排版工作。

內容方面，《學生報》在改版以後也有

了比較大的改變，重心由校園為主逐漸轉移到了校園以外（社會版）為主，再加上文藝、情色、體育等新版面，以及定期專欄的設立下，校園版佔全書的比重明顯下降，約只佔全書四分之一。專題報導雖然並未消失，但大部分題材已不如過去那麼「校園」，這段時期的專題主題有大學三改四、醫療融資、高鐵、立法會、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無良企業、以巴衝突等等。

《學生報》的轉變雖然翻天覆地，但其於改版初期的存在感仍不高，直到經歷2007年情色版事件。

2007年3月，《學生報》2月號及3月號的情色版被人向多家報館投訴，指其內容淫穢不雅。報道一出，全城群起攻之（在此不贅，詳細可看本書卷二「情色版事件」）。受爭議的期數是第36屆編委之出版，可當時適逢換屆，第37屆編委甫上任就得應付校內外的圍攻。在內校方為劃清界線，急發警告信予第37屆編委（而非第36屆）。在外各保守團體和媒體更是窮追不捨，給一眾莊員巨大壓力。

經此一役後，《學生報》可謂「聲名大噪」，內部卻元氣大傷。部分莊員因不堪壓力而離去；應付輿論戰亦消耗留下來的莊員大量時間和精力，日常的出版工作大受影響，更間接影響了其後的傾莊。此後兩年，雖然未有缺莊，但投入報社工作的現莊人數只維持在二至四人，莊員的工作量變相大增。即使在職員和部分老鬼的協助下，也只能勉強維持恆常的出版工作。

改版成熟期

直至第40屆以後，莊員人數開始回穩，情況始有改善。這段時期的報社運作相對穩定，出版亦趨穩定，且有固定的讀者群，實體發行幾乎一本不剩，而每月一期的出版模式基本上未有太大改變，內容方面亦沒有很大變化，仍是以校園版和社會版為主。不過隨著網上媒體越來越流行，報社亦開始注意開拓網上世界的必要，除了在中大學生報的facebook公佈新一期的出版，還將實體版製成網上版上載到網頁。另外，在這時段學生報已沒有再聘請廣告主任，廣告的邀約和聯絡轉由編委負責，到第41屆已能轉虧為盈。在組織方面，每年來傾莊的人數開始較以往穩定，終於沒有缺莊之憂，且在中大迎來三三四的第一年之際，組成了近十年來人數最多的20人的一屆莊。

十年總結

雖然改版後《學生報》的內容均沒有大變動，但風雨不改的是每屆編委都堅持保留情色版。這場風波雖然令報社進入小低潮，但及後的編委在傾莊討論後都認為有必要留住這能開放地討論性的版面，故繼續經營。

另外，這十年的編委都有出版《迎新特刊》和《六四特刊》（由六四21周年開始，特刊改名為「八九民運特刊」）。他們其實基本上沒有經歷過八九民

運，經討論後仍堅持出版，雖然特刊內容焦點不盡相同（詳見本書卷三「中國‧香港」：〈淺談《中大學生報》六四特刊之轉變與不變〉），但對中國民主化的追求仍然熱切。另外，後改版時期正值中港矛盾激烈之時，社會上亦明顯分裂成不同路線，除了全盤抗拒中國的所謂「本土派」成形以外，主張與內地人民連結左翼的旗幟亦開始鮮明。至於報社，近十年大致都是稍稍左傾的自由派，偶有更左傾的主張，但都只屬偶然。而自運動格局改變後，學生報有明顯的左傾跡象，評論文章的方向始與主流論述有所距離，如比起政制民主更關心經濟民主，又或如在評論反國教運動或「雨傘運動」時，均不會持那種對中國避之則吉，獨善其身即可的「本土」主張。

學生報一直都非常著重傳承，無論改版前後，報社上下均認同編輯工作都不只是當屆編委的責任，每屆都會有老鬼在落莊後留下來幫忙，尤其是在編輯趕出版時幫忙領頭傾莊。另外，不少老鬼在畢業後會投身民間組織（如勞工、環保組織和政黨），一些會從事文化與媒體界，由於向心力強，大多都願意跟報社同學分享資訊和經歷。相較很多常提防「老鬼干政」的學生組織，報社傾向視老鬼為資源而不是包袱。

最後，改版後的《中大學生報》存在感與影響力大增無容置疑，不過是花了不少人力時間換來的，而且有得必有失。改版前的學生報編輯，除了報道事件外，會較主動去推動校政，例如語言政策和監察前校長劉遵義的施政；在校外亦會投入運動，如2005年的反世貿事件。但改版後，學生報的角色就只有作媒體報道，鮮有編委有心力投入到運動當中。每月出版的壓縮日程使編委無暇兼顧出版工作以外的崗位，令一些編委就算願意亦只能在落莊以後才能參與或認真跟進。改版至今已近十年，大概也是時候檢討一下一直沿用的工作模式了。

四代電台人
—— 記中大校園電台十五年歷史

◆ 區諾軒（第37屆校園電台外務副台長）

數算年頭，中大校園電台於1999年成立，成為中大學生會第三支莊，已經有15年的歷史。我經常在想，它成立於網絡電台方興未艾的年代，更比一般網台有學生組織的財政支援，但當今天網台百花齊放，校園電台甚或是所有大專電台竟仍寂寂無聞（甚至懷疑在同學間有多大影響力）。而且電台成立之初既然有「開放大氣電波」之宏願，如果當初成立是為了推展甚麼，這肯定不是成功的嘗試。本來，我沒有想過為校園電台寫史，但近年我察覺電台已經出現斷層，所以才接下這個寫作邀請。不過，大學作為同學參與、歷練的地方，沒有人期望這裡做的嘗試一定要成功，更重要的是如何總結經驗[1]。

校園電台的歷史，大概可分為四代人的歷史。

第一代（1999至2004）

校園電台的成立，始自1997年幹事會「綠野仙蹤」的政綱，他們成立了非常設的「校園電台籌備委員會」，籌委會在1998年的藝墟招募了一班志願同學，組成了節目製作小組，並於9月和突破青年合辦DJ訓練班。經過兩年的時間，最終中大代表會於1999年2月28日委任了臨政委員，以范克廉樓308室作為會室和錄音室，並購置錄音器材[2]。

關於校園電台初期運作的資料不多，連莊員名單也無法尋回，只能從莊員訪問和幹事會政綱中得知，校園電台最初創立有兩個功能：1.透過電台宣傳校園活動，作為同學充權（empowerment）的過程；2.爭取開放大氣電波[3]。當時的校園電台，理念和幹事會、學生報較為一致，從政綱、行動資料亦可見很多行動都同氣連枝。

<u>爭取開放大氣電波的嘗試</u>

最初校園電台只能從校內經VPN接駁收聽，侷限了廣播渠道，收聽率亦很低[4]。為了實現無線廣播，當時的籌備小組以至及後的電台，大多從兩方面著手。其一是在製作節目上盡力追上一般電台的廣播水平，希望政府允許電台佔用大氣頻譜。最初，籌委會曾去信電訊管理局查詢申請無線電牌照事宜，當局很快便以「不符合廣播定義」為由拒絕。後來聽說首幾屆同學曾與電訊管理局溝通，

電訊管理局要求電台應該逢星期一至日24小時均有節目廣播，這對於學生電台而言，是不可能實現的事。儘管如此，為了終有一日令局方接納其製作水準，首幾屆的校園電台參照了香港電台的廣播守則，以此規範製作節目的內容。

廣播守則雖然沒有為校園電台帶來大氣頻譜，卻自此成為校園電台製作節目的依據。而這份守則，反而成為了電台節目出現問題時的擋箭牌。曾經在2000至2001年新舊莊交接期間，新莊（即「留聲群」）曾圍繞「四院互片」為題製作新聞報導，內容大概是覺得互片十分無聊，直接引述粗口諧音「跳狗里」，引來 CU Forum（當時電台的廣播渠道）同學強烈不滿，現莊為了息事寧人，唯有祭出廣播守則曾言粗口若是為了帶出事件經過，而又不屬低俗的話，是可以接受而且可以引述；又有一次是有節目談及中大 Med Can（醫學院餐廳）鬼故：「為甚麼 Med Can 的叉燒特別好吃？那……是用醫學院停屍間的人肉做的……」惹來Newsgroup（網絡興起初期常用的討論媒介）的醫學院同學群起聲討，最後又以廣播守則註明「如有雷同，實屬巧合」等字眼平息事件。

另一實現大氣電波廣播的嘗試，是同學曾成立研究小組，探討在中大實現無線電廣播的可能。可是，據研究小組憶述，小組同學經過一連串研究後，發現在中大根本沒辦法透過FM頻道廣播，唯一能夠實現廣播的便只有AM頻道，但AM的廣播成本，遠比FM高，結果大家很早便對於實現無線廣播打消了念頭。不過研究小組成員之一的黃世澤曾下過一個註腳：校園電台應該等待數碼廣播實現，再爭取於數碼頻譜廣播。

當然大家都知道，數碼廣播出現了，但此後的校園電台，已經忘記了初年的「遺願」。

<u>與范克廉樓分離</u>

在1999年尾，創台不久的校園電台，便因為范克廉樓改建而需要遷到崇基學院的李慧珍樓。很多人歸咎這次的遷移為校園電台與幹事會、報社分道揚鑣的禍根。的確三莊同在范克廉樓，互動一定多很多。電台的遷移或許減少了三莊交流，但分歧要來便來，有否遷移，不過是某種象徵。

電台歷年上莊的，多數不外乎幾類人，一類是對電台工作有憧憬，甚或是覺得上電台莊與他日從事新聞工作有關，他們可能以往是903、港台第二台的忠實聽眾，來到電台，或為圓「DJ夢」，或至少對電台工作有興趣；一類是技術專才，他們很多是工程學院學生，對於電腦、panel知識較為在行，來到電台就成為幕後製作的骨幹。

據千禧年入讀中大的前輩憶述，校園關心社會氛圍薄弱，也是社運低潮，何況大氣電波問題？校園電台的社會視野銷聲匿跡，並非不可預期之事。有些初代的電台成員強調，當時電台並非後人想像那樣政治化，只不過當時他們訂立了

「時事六成、娛樂四成」的比例，希望秉持學生媒體應有的責任而已。他們也有很多製作時事與娛樂節目的取捨與內部討論，這種關心社會與娛樂化的衝突，很早便植根電台。

第一代的校園電台，對學生的影響力未必很大，但很多電台往後的傳承，均自此而來，當然包括一些重複而無法解決的問題。

第二代（2004 至 2007）

理念分歧到「任你上」事件

CUPortal（2004年莊）是校園電台全面轉型的轉捩點，他們與以往的電台完全不同，基本上是全面走向主流化、娛樂化。當中包括邀請明星擔任活動及電台節目嘉賓，邀請電台DJ到中大分享，這些改變吸引了很多中大同學收聽（其次是明星的歌迷會），當時的情況是平日直播只有5至10人收聽，當有名人出席節目時，收聽率會忽然飆升至2-300，但同時亦令他們受到不少學生會、報社和老鬼的反對與壓力，使電台與幹事會、報社開始敵視，走上截然不同的路。

中立與不偏不倚

這屆莊與學生組織的裂痕，在傾莊、競選期間已經出現。當時的老鬼帶傾莊時，已經質疑CUPortal對於傳媒報導中立與不偏不倚的理解。新莊認為，傳媒作為公器，不應該把一己的觀點強加於事情身上，應當平衡報導，以求客觀，不需與學生會一樣參與抗爭、示威；上莊及老鬼不敢苟同，認為報導中立不等於沒有觀點，更不等如個別觀點不能刊登，不偏不倚更加是指在報導時不受權貴影響，有自己的編採自主，不是為平衡報導而「各打五十大板」，也不是迴避真相的藉口。

最終，當時的老鬼決定張貼大字報，呼籲同學小心選擇新莊，成為決裂的導火線。嫌隙蔓延至學生會三莊的關係，幹事會、報社批評電台作為學生組織，不改變現狀之餘，還要迎合主流，亦有形容指電台成為更保守、更去政治的新世代學生組織[5]。而「任你上」事件的處理手法，令雙方關係更加惡劣。當時校園電台在范克廉樓擺了一個女性吹氣公仔，旁邊的壁報板貼了「任你上」，當時的學生會幹事胡浩堂向傳媒表示校園電台利用這種意識不良的宣傳手法，極為不當，也反映電台負責人沒有尊重女性的意識[6]。這次事件不但反映電台迎合主流的宣傳手法，學生會公開批評，可見他們的關係已跌到新低點。

走向娛樂化

CUPortal那一屆正值2004-2005年，四十五條關注組在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剛剛成立，該屆幹事曾表示，有一段時間他們向校園電台借用校園電台的錄音室，錄製《Radio45》的電台節目。起初彼此相安無事，但後來據說四十五條關注組要求每星期可否借用一節時段錄音，電台卻不能過問錄製的過程與內容，令彼此無法達成共識，最後校園電台拒絕借用錄音室。此外Interlive（2006年莊）時代，邀請明星已經成為每屆慣

例，甚至有個別公關顧問開始代理邀請明星。經年累月，該名人士亦取得電台成員一定程度的信任，但有天卻突然要求校園電台能否給予他顧問的身分，最終亦被校園電台拒絕。

無疑，在校園電台轉營全面娛樂化後，電台除了接觸聽眾面更廣，亦使一般學生聯想校園電台便等如「請明星」一樣。有人關注，便證明自己存在，第二代的校園電台，確實開拓了一定的知名度。不同人士開始找上門要求合作，如李慧珍的鄰居動漫研究社在某年開始恆常地在電台主持動漫節目。

第二代的校園電台，從吸引聽眾角度來看，的確有相當的貢獻。CU Portal往後幾屆，基本上也是循著其範式走下去，電台走主流化導致與學生會的關係惡劣，使往後多年，學生組織乃至代表會成員經常念茲在茲一句：「不如執__左電台佢。」覺得每年要花一筆學生會會費給電台，結果只請明星來中大宣傳，卻無社會承擔，報導亦不見得有人文關懷……不論以上評價正確與否，這筆賬，結果落得後面幾屆電台也要承受。

第一代的意識形態無法傳承到第二代的電台人：從CU Forum搬到獨立伺服器架設網頁，歷屆名單再沒有CU Portal以前的資料；每年傾莊也是把第二代電台的想法繼續傳承，預備諮詢又如臨大敵般要提防「赤腳大仙」（當年報社好幾個不穿鞋的老鬼），成為新莊員諮詢攻防戰的妖魔。

第三代（2007至2011）

我把自己上莊的一年到往後幾屆（也就是2007年莊），視作第三代電台人。對於我們來說，第二代電台的營運模式，仍然深深的模塑我們的處事手法，迷信編採中立、追求click rate，至於第一代電台的歷史，基本上已經全無認識。事後回想，我們是被餵食的一代，找明星，就依賴上述提及的某公關，找DJ，就依賴一位在商台做監製的上莊（Amber，即現在903的主持急急子）。

至於問我們這幾年和第二代有甚麼分別，主要是有三件事，令我們走回關注校園議題、社會事件與娛樂並重的路線。

<u>情色・發展・版權</u>

第一件事是上莊不久就發生的學生報情色版事件[7]，2007年5月，學生報收到投訴指其情色版內容不道德，事件很快便昇溫至全港層次。當時電台、報社、幹事會關係沒之前幾年那麼壞，恰巧其時幾名莊員和報社、幹事會一直恆常交流，事情發生後傳媒一面倒批判，三莊遂一同商量如何反擊。結果，三莊決定於旺角西洋菜街舉辦論壇「性，我們如何表述」，校園電台首次擔當校外廣播角色，當時竟也有400多人同時在線收聽。

第二件事是校園發展帶來的氛圍，第三代電台正值是劉遵義時代，其時提倡的校園發展計劃不但令校友、學生相當關注，劉氏「大學就像茶餐廳」之類的發言不時也挑動學生組織的神經。這令校園電台傾向關心校內議題，其後引入部

分校園節目，又邀請幹事會、校友關注組成員參與節目，某程度是這些氛圍下的產物。

第三件事是在在莊期後段，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CASH）向各大專院校電台發信，指不同院校的電台節目，均有涉嫌侵權的行為，要求收取四至五位數字的版權費。以往大專院校播放版權歌曲，其實頗為隨意，其時正值各大專院校製作聯校廣播劇，大家閒話家常時發現大家也收到CASH的通知，遂決定聯合起來與CASH談判，這亦成為日後組織大專聯校廣播協會（JUBO）的起點。

談判初期，有數間大專電台一開始便表明會費每年只有數千元，僅夠開支，根本沒可能支付版權費[8]。中大雖然相對來說資金較充裕，但認為版權制度過度維護版權持有人利益，希望與大專院校共同進退。最初眾電台堅持在現有版權條例下，電台節目具備教育目的，而且沒有牟利，理應受到豁免[9]。CASH則認為電台把節目上載於網上，由於無法確保下載者是校內人士，故不能定義聽眾主要為校內人士。各電台態度很快便軟化了，改為爭取象徵式收費，CASH亦斷言拒絕。事件經過幾次毫無結果的會面便告終，各電台亦無意力爭下去，只好以後不再播放版權歌曲，免生事端。

無論校園電台在這些事件上做到多少，它至少令往後幾年的新莊，也要對這些議題有一定的認識，多了一定程度的理念承傳。

校園節目與廣播問題

這幾年校園電台的另一特色，是開始注重經營中大為本的聽眾群。除了開展圍繞校園的節目外，亦嘗試開拓「最緊要識揀」系列節目。最初這節目是為了讓JUPAS同學認識中大不同學系而訪問不同學系師生的節目，往後幾年更轉而介紹怎樣揀選宿舍、書院等。透過電台莊員不斷在各大論壇推帖、勾結版主介紹等，成功進佔一定程度的聽眾群，甚至後來《學友社》的高考通訊也轉載節目。這些嘗試，算是把電台的聽眾真正開拓到網上去。

除了路線的轉型，2009年中旬，范克廉樓準備翻新，按照數屆電台莊員所述，當時校園電台對於翻新有兩點要求，第一是希望藉翻新工程，於范克廉樓加裝廣播校園電台節目的設施，第二是考慮將會室搬回范克廉樓。當時學生事務處曾承諾於范克廉樓到中菜廳中間的空地增添一套廣播系統，供校園電台直播。雖然2013年校園電台的確重回范克廉樓，但學生事務處仍未添置廣播系統。

小結

說到底，我並不認為我們第三代的電台人做得很好，我們理應既受惠於第二代電台帶來的娛樂路線帶來的知名度，又因為上小節提及的幾件事重拾學生組織應有的視野。可是，幾年下來，技術和理念的傳承亦出現斷層。到了聽實、留聲兩莊，諮詢老鬼人數減少，有2008至2009年的老鬼觀察：「有次L番去探現莊，話就話做live，但節監唔識

推panel，所謂live就係播錄音，最後個台都hang埋，要呀L自己搞番掂，嚇死佢。」到了2011年，Netsil因為提名名單出錯而導致無法成莊，標誌著一代電台人的終結。

第四代（2011 至？）

容許我把臨政後的電台，定性為「第四代校園電台」。由於近年我已經沒多大接觸電台，以下內容大多轉述近年莊員的觀點。

首先必須強調的是，第四代的校園電台並非不濟。按照近幾屆莊員表示，他們製作節目仍然是有心的，但造成的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Recho（2012年莊）一屆嘗試為招攬新莊而舉辦電台迎新營，有二十多人參加Soundsation（2013年莊）有幾位莊員製作節目十分認真，開設facebook和youtube專頁，擴闊社交媒體傳播平台。然而若以規模而言，不知從何時開始電台的營運規模已經相當萎縮了。但最大的分別是近年邀請明星的網絡應該已經完全斷裂，政治參與亦不見得具體，過了很多年仍然重複著介紹學系的節目「最緊要識揀」。相對於香港大學校園電視頻密追訪校園新聞，並於校內設置電視播放，已經有相當明顯的差別。有莊員表示電台「好像沒有存在感一樣」。

<u>被遺忘的歷史</u>

若要準確點描述第四代電台的核心問題，大概有點像由原始時代重新開始，過去的電台也好像被封印的黑歷史，沒有人向當屆莊員提起，只有他們偶爾在過去的文件櫃發掘，才略知一二。聞說有人發現一本相簿，是第一代莊員採訪遊行，結果他們便採訪學生組織遊行；又聞說他們碰巧找回某年的上莊政綱，才約略知道電台曾經有過甚麼節目，個別莊員又碰巧在突破的青年中心做過社區電台，才得以順著路走下去。

他們對廣播技術的了解是：插好的東西，他們便懂得用，有些零散硬件，某年從某角落找到出來，才知道有這些零件的存在，而且不懂怎樣裝嵌。有人曾表示知道以往電台曾嘗試開發Phone-in系統，但已經不知如何著手。Recho（2012年）中期，電台的伺服器壞了，不懂得如何修理，直至Sounsation（2013年）、聲空（2014年）兩屆莊期，網站還未修好。結果三屆莊期，所有節目唯有錄播到Youtube頻道。

你可以在Youtube頻道，看到聲空上載的節目為數不少。受訪的同學對我說，他們有行動力，只是一切在摸索，有時不太知道應該怎樣做。

<u>傳承失敗是致命傷</u>

這就是為甚麼我把問題歸咎於傳承失敗。校園電台走到第四代，與幹事會、報社的最大分別是，已經完全沒有所謂的老鬼傳承出現，以電台角度來說，理念可以爭辯，編採、行事可以各有風格，每屆有權走他們想走的路，但沒有傳承邀請嘉賓的網絡、校園部門的交手經歷，與基本的使用器材技術，是

致命傷，連路也不能走。當然老鬼傳承未必好，因為過火了，就會被批評老鬼干政，但校園電台示範了沒有老鬼傳承可以怎樣使學生組織衰退下去。近年我終於有機會出席學生會三莊諮詢，綜合部分同學的理解是，每次有同學詢問校園電台問題，不是莊員臨時商討怎樣回答，便是高度依賴一、兩名莊員憑個人判斷朦混過去，那很明顯是缺乏準備，為了回應強充自己懂得，更是無謂，但除了現莊本身，當中又有幾多因素是基於傳承問題而使電台廢弛呢？修改本文之際，得知電台新莊斷莊（2015年），理由是莊員「覺得自己理念唔夠強、唔適合上一支學生會莊」，不禁唏噓[10]。

反思：期待哲人王出現？

回顧十五年的電台歷史，即使中間曾經為了應否娛樂化的問題有所論爭，第二代電台人覺得以往太政治化、不夠「客觀中立」；第一代反指向來娛樂時事互相平衡，反而包容共濟，埋沒應說的觀點才是失格。對錯也好，他們至少自己活出一條自己的路出來。路線分歧，向來在學生組織常見，大學貴乎獨立思考，從學生成長過程看未必一定是壞事，可是，容我這老鬼不客氣說，近年的電台已是莊不成莊，理念缺乏，走不出自己的路；更大的問題是連基礎運作也沒有傳承好，引致電台規模萎縮，自然更難談怎樣做，我覺得是最為可惜的事。

或許某天代表會的「摺埋電台」大計得逞，或許電台還會繼續衰頹下去，我可以做的，就是把歷史寫下來。唯有寄望某天有哲人王的出現，挽電台於狂瀾。娛樂化、學生會化，甚麼都無所謂，最怕是出版《中大六十年》時，再看不到校園電台的名字。

---

1 寫史最難莫過於評斷史料，而校園電台長時間以來，定位、想法無不與幹事會、報社南轅北轍、衝突連年。作為一名歷經電台、幹事會的過來人，我對於電台的評價，必然有自己的想法，而這想法，料想不會討好任何人。我只能透過考證資料，向歷屆莊員求證，以求資料公允準確，以求稍為對得住「直筆」兩個字。

2 原載錄於維基百科，但後來專頁已被刪除。

3 綠野仙蹤政綱：「同學可透過大氣電波暢所欲言，……激發討論。此外，各學會屬會也可以透過電台宣傳各項活動。電台也可以成為校方與同學溝通的渠道。」

4 學生宿舍網絡（ResNet），是資訊科技服務處(ITSC聯同本校校園發展處以及物業管理組，在校內所有學生宿舍提供的上網服務。請參考黃世澤，〈代表會主席在網上的日子〉，《中大四十年》。

5 Tam Daniel，〈忘記王維基，要求真正的權力開放── 關於免費電視牌照〉，《香港獨立媒體》，2013年4月1日。

6 〈擺放吹氣公仔 被指不尊重女性 中大校園電台不文宣傳捱轟〉，《蘋果日報》，2005年1月4日。

7 請參見本書卷二「情色版事件」。

8 例如《大學線》引述浸大電台表示：「傳理學院學生於入學時繳交的數十元會費，每年只有四千元，只僅僅夠他們開支，CASH要求的四位數字版權費對於浸大傳理電台，實在難以負擔。」〈校園內外：追收版權費　大專電台無力負擔〉，《大學線》第82期，2008年1月。

9 根據教育局《使用版權作品作教學用途常見問題集》，「假如該點唱活動是為教學或接受教學的目的而舉行，而聽眾主要為教師、學生、學生家長或監護人以及與該教育機構的活動有直接關連的人，《版權條例》第43條下的版權豁免將適用。」

10 以下是斷莊同學的交代原文：「各位電台老鬼，好對唔住我地最後唔能夠上莊。係第四次pre諮後，聽左各位老鬼同上莊既意見，我地好多莊員都覺得自己理念唔夠強，甚至對政治觸覺低，根本唔適合上一支學生會莊。或者你地係pre諮時都已經感覺得到。我地好多人當初都係抱住希望做節目既心態上莊，無考慮過理念，同中央莊既目的，所以最後會同老鬼們既expectation差咁遠。[……]」

中大學生會代表會的制度問題
——由零八年修章說起

◆ 吳銘基（第38屆中大學生會代表會主席）

中大學生會代表會（下稱「代表會」），對很多中大學生來說是一個陌生的名詞。

一般的同學也許只會在上莊的時候聽過要reg soc（社團註冊），要交一大堆不明就裡的文件。然後過了不知多久，就會有一個自稱代表會屬委的人來電，說在這裡那裡有問題，又要再交。這次沒簽名，下次又數字不對，總是在雞蛋裡挑骨頭，用一個字形容——煩。誰叫組織能否得到學生事務處資助就全看那張登記證書。除此以外還能想到甚麼？ 中大學生會代表會可以說是中大學生組織的最高常設權力機構，代表會的權力包括監察及指導學生會中央組織（三莊，即幹事會、報社及校園電台）及屬下團體、修訂章則及其附例、對違反章則的團體施加制裁，集行政、司法、立法於一身。

筆者想借本文憶述一下筆者在代表會中的二三事，順道帶出一些願景。一般的同學對代表會無認識，可能是因為代表會無宣傳，無傾莊，無人知道（或理會）代表會的工作。實際上，對代表會有認識的圈子裡，也有不少人認為代表會「做唔到野」、「無料到」。所以這個並不單是表面的問題，而是一個架構性問題。

代表會的架構問題

筆者在任代表會主席在2008年，當年代表會是由書院派出的代表所組成，每個書院有十個議席，包括兩名當然代表，即書院學生會代表會主席和學生會會長，餘下八名均為「民選」代表。除了書院代表之外，還有去屆代表會主席及學生會會長為當然代表。

這個制度看似民主，其實暗藏玄機。因為如果書院民選代表不足八名，則書院代表會就可以委任任何同學成為代表，而委任代表的法定地位與民選代表無異。如果可以委任，誰會出來選舉？何況選舉還有機會敗下陣來。故此，近年書院代表均以委任為主。筆者曾經向書院代表會申請要透過選舉晉身代表會，可惜書院代表會說要筆者等委任，畢竟選舉也要耗費代表會資源。

筆者在任代表會主席時，遇上的其中一

個問題是代表的出席率偏低，有不少代表是出席了第一次會議後就無影無踪。代表會會議的法定人數是全體代表的三分之二，故此當三分之一以上代表不出席就得流會，經常流會的代表會根本沒可能完成工作。故此，筆者召開聯席會議將大部份代表罷免，使代表會恢復正常運作。聯席會議是學生會僅次於會員大會的非常設機構，由全體代表會代表、幹事會幹事、學生報民選編委及校園電台的民選委員組成。雖然聯席會議有高於代表會及中央組織的權力，但由聯席會議罷免出席率欠佳的代表，並無先例可尋。當時的代表會附則列明，「缺席會議四次以上者，須罷免之。」這裡罷免行動的主體，按上文下理為代表會，但條文並無規定當代表會因此而無法運作時之安排。故此，聯席會議同時修訂該條文，可「自動罷免」相關代表。

修章之難

為了解決這些結構性的問題，筆者連同當時的代表會成員草擬了新的學生會章則，新章則亦涵蓋其他範疇的內容，包括改組聯席會議及幹事會、解決財政相關的問題。

在新的章則下，代表會分成兩個議會，以書院當然代表所組成的當然議會及由民選代表所組成的民選議會構成新的代表會。原來由書院學生會籌辦的選舉，改為由代表會選舉委員會以書院作選區集中舉辦選舉，同時減少議席數量，減少資源耗費。另一方面，專注書院事務的書院當然代表可以選擇在關鍵議題上發言、議決，惟在當然代表不足法定人數時，民選議院可在較嚴謹的條件下通過相關議案。既保障書院的代表性，亦可使民選代表發揮他們應有的影響力。

改組幹事會亦是這份修章的其中一個重點。這部份雖已獲校董會通過，但實行上仍與修章時的原意有距離，故借此機會憶述。幹事會的架構多年未曾修訂，幹事的職銜與其工作無關，實有檢討必要。故此，新章則取消了除了正副會長、外務副會長、內外財務秘書及福利幹事以外幹事之固定職銜，原意是讓幹事會候選內閣自行設定職銜以符合其需要。同時，在會章設立委任幹事的機制，以給予有意參與部份學生會工作又不欲參選之同學法定的職位。設立常設及非常設委員會，委任幹事只需出席及參與與其相關之委員會工作，希望吸納社運學運以外的同學參與幹事會日常運作，算是其他院校「部委制」的一種化身。

該修章議案雖通過全民投票，奈何在校方干預下只有部份得以施行。這反映了另一個制度上的問題，當時大學秘書處主張根據大學條例及會章的原文，除了會章第一次通過生效當時以外，及後的會章修訂都必須由校董會通過才能生效。但事實上是秘書處在收到會章的英文譯本後，根本就沒有將會章修訂的內容提上校董會討論表決，反而通知代表會說某部分內容不會接受，故此要求學生會方面再行修訂。這事件確實影響後

來章則的內容，有部份經全民投票通過的內容不翼而飛，包括上面提到的代表會兩院制，及有關學生會財務的兩條條文（財政使用須收支平衡及會費按消費物價指數調整）均沒有通過。

還看今朝

今天回看代表會網頁，風格多少承襲當年，筆者感到欣慰。可惜的是，又看到流會的消息。細看新的會章，民選代表八人減至四人，委任代表的人數限為一人。此舉固然有助使代表「湊足數」。但沒有兩院制，當然代表的人數佔全體代表的三分之一以上（新書院的代表人數為三人或以下），似乎流會難以避免。

看到今天的章則全集，就會慨嘆代表會幾乎無傳承可言。新的章則修訂附加了新的註腳，卻失卻了原來通過的生效條文。部份章則甚至沒有上載，筆者明白不一定是現屆代表會的問題，而是歷年的代表會欠缺了的溝通和文件保存的基準。文件放在網頁上，帳戶忘了續期就可能被ITSC給刪掉。另一方面，與其他中央組織比較，代表會沒有「傾莊」，代表們幾乎沒有除了會議以外的交流，與熟知問題的「老鬼」沒有連絡的渠道。結果可能是重複前人的錯誤或多行了不少冤枉路。

代表會主要的職能是監察各中央組織及屬下團體，代表會的正常運作不是目標，而是達成目標的最根本、必要的前提，筆者除希望各代表自律尊重，校方尊重學生自主，不要干預修章，亦希望透過溝通，分享經驗以避免重蹈覆轍。

編輯後記

向吳銘基邀稿，是2013年9月的事情，文中所言的「今天」，指2013年時吳所找到的代表會相關資訊。值得補充兩點，第一，至2008年修章後，一直到2013年，代表會才再一次修章，內容較重要的是兩點，第一是修改代表會組成，當時主要的修改動力是源於三三四後新書院增加，為免代表過多窒礙運作，除現任書院代表會主席及現任書院學生會會長為當然委員外，每書院以人數比例計算，再有2–4名代表，必須是民選產生，若民選代表人數不足時，方可委任最多一個代表；另外，亦重提上調學生會會費修訂，均獲通過。第二，在最後完稿期間，見本屆代表會（第45屆）在行政工作及與學生溝通方面有改進，在代表會面書專頁上能見到每次會議議程，亦能看到每次會議各代表的出席情況，還望往後各屆能繼續努力。

從八樓之爭到退聯

Glen

近年社會運動形勢瞬息萬變，作為學生運動重要一員的學聯也在近十年經歷了數次巨變。當初議定稿題之時，編輯們仍在大嘆學聯近一兩年聲名大噪，日漸重拾學運領袖的地位；到筆者今日執筆修改，原有八間成員院校已有四間通過公投退出學聯，未來發展岌岌可危。

編輯團隊訪問了兩位相差數年，來自中大的前學聯核心成員：在學聯活躍於2007-2010年的黃永志和在2011-2013年活躍的陳倩瑩，加上幾位編輯團隊成員的經驗，嘗試在此整理一下學聯這十年內的重大轉變。

「搯八樓」爭議

十餘年前學聯常被詬病官僚、脫離群眾、不認識社會運動等等。其時學聯除了參與六四、七一和政改等社運「基本盤」外，鮮有支持其他行動，又或只是發聲明表態而沒有具體參與，甚至其行政核心秘書處亦長期出缺。事實上，在北京著力滲透各院校學生會下，不時有院校對這些「基本盤」的立場有所保留，要經過長時間討論後才達成基本共識，以學聯名義參與行動[1]。

而學聯下設的「社運資源中心」（簡稱「八樓」[2]），則傾向貼近社會運動、關注小眾議題，更容許非學生的社運人士參與其管治，與學聯常委屢有爭端。路線不同，每年換人的常委大都難以理解八樓的營運方式，加上長時間磨擦造成的人事糾紛，終在2005-2006年度爆發了所謂「搯八樓」的爭議。

當時社運和學運人士對學聯的批評，除了學聯脫離運動，更多在於常委和代表在學聯會議上的不民主表現。以鄧小樺所撰的〈強烈建議各大專院校脫離學聯〉為例，便批評他們官僚主義、玩弄議事規則、不重視討論、抹殺反對聲音、欠缺獨立思考、迴避價值問題等。

那邊廂，學聯在1995年成立八樓，目標正在於透過直接支持本地社會運動，加強學界與社運團體的聯繫和加強學生對社會事務的認識和參與。其時常委的批評，主要是他們未能把關注的議題連結院校的同學、運作「不受監察」（尤其是常委會和代表會）等等，進而要求修改章程，把八樓的管理權由管理委員會收回，改成秘書處旗下的委員會。當時

的社運常客，包括學聯的「老鬼」大都站在八樓的一方，支持八樓維持原有的方式運作。

這場爭議持續超過一年，經歷不少網上網下的辯論以至罵戰[3]，最終學聯代表會在2006年初通過修改章程，而八樓則拒絕在不民主的決策下被管理而宣佈「自治」[4]。這時期可說是學聯與其他社會運動團體最為割裂的日子，而學聯和八樓的關係亦在好幾年之後才漸漸緩和，但八樓目前仍以「自治八樓」的名義運作。

傳統泛民「義務幹事」主導

另一場近十年學聯的重要路線紛爭，則是有關長期留在學聯決策層，深受民主黨／支聯會／教協系統影響的「義工」爭議。

「摺八樓」爭議過後數年，常委會成員依然每年按學生會換屆輪替，但學聯的領導結構卻出現了兩個重大轉變：其一是出缺多年的秘書長一職，由2007年起李耀基參選開始重新有人出任；其二是一些已離任學聯常委會和秘書處的「老鬼」仍然留在學聯的決策核心，逐漸出現了以2001-2003年學聯副秘書長盧偉明為首，與民主黨、支聯會和教協等傳統泛民關係密切的學聯老鬼以「義工」方式（後來改稱「義務幹事」）長期參與，有時甚至主導了學聯的決策。李耀基卸任秘書長後，亦加入了「義工」的行列[5]。

這幾年是港人對北京信任程度的高峰[6]，同時當局亦著力統戰各大學學生會；當中又以在港大的滲透尤為嚴重，不時有親北京的學生出任學生會幹事，包括2005-2006年度由劉迺強之子劉方擔任學生會會長及2009年的陳一諤等[7]。由是觀之，傳統泛民陣營積極影響學聯，也是意料中事。事實上，有賴這些在學聯較有經驗，亦與傳統泛民陣營關係密切的「義工」指導，某程度上幫助了學運在基本立場上的傳承，學聯這幾年在路線上亦算是力保不失[8]。

不過這幾位「義工」的存在，卻衍生了兩個問題：第一是學聯關注的議題往往受他們影響，因此行動往往局限於傳統泛民當時關心的議題，關心其他議題（例如2009年反高鐵運動）的動力較低，路線上亦彷彿變成了他們的附庸。雖然形式上仍然開放討論，但在經驗和人脈的差距下，決策仍往往受這些「義工」影響，學生的自主性大減。第二是這些義工緊握學聯的資源，例如要求各成員學生會除開會、活動時間外不應在會室逗留，並限制持有會室鑰匙的人數；而學聯的財政狀況亦在他們的掌握之中，常委對具體收支、程序無甚理解，很大程度上只是形式上作出批款[9]。

及至2010年，部份學聯常委會成員，包括黃永志、周澄、郭永健等開始認為學聯的運作不應由這些「義工」主導。周澄在卸任秘書長的週年大會上，提出週年報告，指出學聯由「義工」主導造成的問題。在黃永志等人的協助下，新一

屆的學聯常委在週年大會後，自他們手上拿回了學聯的財政、鑰匙等資源的主導權，此後亦較少受這些傳統泛民「老鬼」左右。

其後，學聯漸漸較多開放會室，例如借予左翼21、學民思潮等其他社運團體開會或舉行活動，常委會成員亦不時在此留宿。學聯的政治路線亦逐步與傳統泛民有了一些距離[10]。

由復興到退聯

經過數年內部糾紛，到2011年前後工作總算可從內部的分歧轉向發揮其社會影響力。誠然，培訓較少經驗和對社會議題較少思考的同學，以及凝聚內部共識，仍是學聯重要的工作。不過，隨著社會氣氛的改變，普遍市民和學生對政府的反感日漸成為主流，不少政治議題，例如平反六四、爭取普選等，在學生組織之間已不用再像數年前般諸多爭議，而成為了學界的共識；因此，在主流政治議題外，學聯的身影亦漸見於反國民教育、反對東北發展、碼頭罷工等其他社會運動之中。

尤其是在爭取普選的運動上，傳統泛民除了因屢次在立場上作出退讓而被視為「出賣市民」外，其保守的行動取向（即所謂的「和理非非」）亦與整體社運的激進化取向背道而馳，結果日漸不被大眾信任。而學聯和學民思潮則成為了重要的領導，不再緊跟傳統泛民，反而隱然是有力「夾實泛民」的勢力之一。

可惜的是好景不常。自從雨傘運動一役失敗後，學聯被不少市民以至學生視為與主流泛民同等的「大台」、「左膠」，其號召力可謂「一鋪清袋」。在學生中甚至出現了院校學生會退出學聯的呼聲，不少院校在熱烈訴求下舉行了「退聯公投」，執筆之時已有四間院校通過退出學聯。

也許正如陳倩瑩在訪問中所說，學生響應學聯的行動，與其說是受學聯號召，倒不如說是整體社會氣氛的影響。我們這幾年所見學聯的號召力，或許只是表象。

1 學聯常委會傳統上採用「共識制」，雖然有投票的機制，但一般只會在所有院校代表同意的前提下以學聯名義發起或參與行動。

2 學聯的架構中以週年大會和代表會為最高權力機構，下轄由院校會長或外務副會長組成的常委會，秘書處則是常委會下設的執行機構；社運資源中心則由直接向代表會交代的管理委員會管轄。社運資源中心設在旺角金輪大廈八樓，故被稱為「八樓」；與之相對，設在旺角威特商業大廈九樓的學聯本部則被稱為「九樓」。

3 有關討論可參見以下數篇文章：
學聯：〈第44屆學聯秘書處工作報告〉，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554
鄧小樺：〈強烈建議各大專院校脫離學聯〉，http://www.inmediahk.net/node/16713
阿野：〈一地的落差和錯位〉，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494

4 詳情可見自治八樓憲章附錄，於宣佈「自治」時發表的〈八樓自治聲明〉：http://smrc8a.org/2015/579/

5 盧偉明長期出任支聯會常委，並在教協、民主發展網絡等任職多年，現為教協副總幹事；李耀基亦曾出任支聯會常委，一度被視為司徒華的「門生」，並在2011、2012年代表民主黨參選區議會及立法會，後來於2015年初退出民主黨。兩人在學聯以「義工」或「義務幹事」身份參與學聯期間，已卸任學聯的常委會和秘書處職務，但仍為學生身份，亦有出任學聯一些委員會的職務。

6 參見港大民調的圖表〈市民對北京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半年結）〉：http://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trust/trustchigov/halfyr/trustchigov_halfyr_chart.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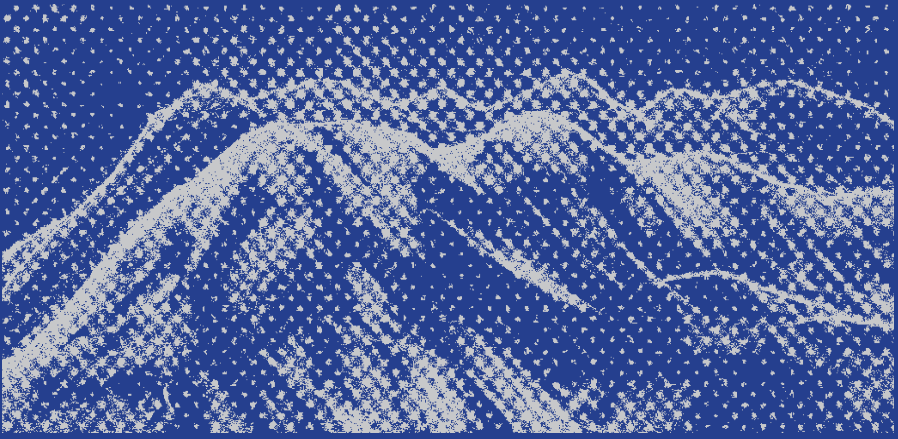
7 劉迺強為全國政協委員，劉方在任內曾以學聯立場過激為由提出退出學聯；陳一諤以「一人幹事會」當選港大學生會，後來因坦護中共六四鎮壓的言論而被港大學生公投罷免。

8 有關這數年「義工」的參與，除了黃永志外，筆者亦曾向盧偉明求證，其回應節錄如下：「學運的承傳方式，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模式，例如早年會透過成立不同的議題小組，吸納有經驗的成員參與討論；近年則較多以成立一些友好組織，就特定議題作較深入及長期的跟進，以輔助學聯及學生會轉屆的不足，而文中提及的『義工』或義務幹事，亦只是百花齊放下的一種模式。縱使模式不同，但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這些模式均為當時學聯及學生會成員所接納，認為有助學運承傳及發展的形態，一般均能從學聯秘書處、常務委員會、代表會及周年大會的各項工作報告中提到，並曾作正式的討論及通過，直至有新的同學新的模式出現所更替。」

9 盧偉明對此的看法是：「文中提及的所謂議題選取及資源運用的兩個問題，都只是範式轉移前後的不穩定期，新的成員對一直過去獲學聯秘書處、常務委員會（共識機制）、代表會及周年大會通過的做法有所批判，是正常不過的事，這就是學運的特性，但將不同的枝節爭議拼湊起來，並歸咎於所謂的一個（群）人身上，當然是最方便的做法，但卻漠視了當時香港的社經背景、成員及組織的形態及局限等。
學聯的財政狀況以至銀行戶口，從來都掌握在同學手上，而根據學聯會章，銀行戶口的簽票人，從來都只有學生，因此動用學聯會款從來都只有學生才行。反之，自『黃永志、周澄、郭永健等拿回了學聯的銀行戶口』後，學聯或出現未能依時完成財務報告的情況，及至最近的退聯事件期間，未能及時公布學聯最新的核數報告。」

10 盧偉明對「義工」淡出學聯後的影響有不同看法：「學聯會室長期開放予不同學生組織（學生會劇社及辯論隊等）及公民社會團體（民陣、同志團體、居留權組織、外傭團體等），幾近年終無休，當然會有淡旺季的分別，至於文中提及的左翼21及學民思潮，均為新近成立的團體，學聯會室開放給新成立的團體，不足為奇。
畢業後，黃永志加入社民連，郭永健加入工黨等，他們等對於學聯的承傳及發展，有沒有正面或其他方面的影響，或許是學聯下一輪範式轉移時值得深思的課題。」
不過以筆者和部分編輯團隊的經驗，2010年以前除非是與學聯有具體組織關係的團體，例如成員學生會、或是民陣或支聯會（學聯為兩者的成員團體）的成員，借用學聯的會室非常困難；2010年之後的轉變相當明顯。

地方・規劃



前言

◆ 羅奕媚

中大這十年的校園面貌的改變可謂翻天覆地。為了應付2012年第一批三三四改制入學的學生，中大開展了龐大的校園發展計劃（下稱計劃），而要敍述這十年的改變，則不得不由此計劃說起。

校園發展計劃

2006年保樹立人運動數個月後，協理副校長許敬文透露將開展校園發展計劃。消息傳出後，校方一直都沒有諮詢員生。一年後，校方公布中大未來十年的校園發展計劃，更聲稱已在一年前招標，並已收到四間公司投標。

這個消息傳出後，剛因保樹立人而奮起的學生與校友迅速回應。有學生組成「校園民主規劃小組」，向同學推廣民主規劃的重要。同期因興建新書院的消息，一些擔心書院精神淪喪的校友成立了「中大校友關注大學發展小組」（下稱「關注組」），密切關注事件。不過，這一切都無阻校方推展已定下來的計劃——2012三三四改制的限期將至，計劃勢在必行。

這段翻天覆地的時期正值惡名昭彰的劉遵義任中大校長之時——反過來說，中大正是為了應付這巨變，才把劉請過來當校長。中大於2003年已提出計劃，但因沒有高層人員接手落實，規劃才進入真空期，劉遵義上任後不久就把龐大的計劃全速推進，至2012年趕上；中大2006年才公布要興建新書院，劉用一年時間就找到資金來源，更完成成立五所新書院的目標。雖然訂立計劃和建新書院過程中幾乎沒有民主成份，但如只從實行的角度來看，劉可謂「快、狠、準」。

當然，這涉及大學應該如何發展的問



校園發展計劃未來鳥瞰圖
(Press Releases of the CUHK,15 April 2009)

題，正是當時關注組和一些校友的主要質疑。總而言之，要評價這十年中大發展的功過得失，我們實在需要更多的線索，這部分亦由此開展。

〈中大校園發展計劃簡介〉精簡地介紹了計劃的目標和原則，並按官方文件把各新建或改建的建築物標示於地圖上，令未見過校園新貌的讀者較易理解。另外，〈中大2012驚爆內幕〉一文為同學參與官方所辦的校園規劃分享會後的一些疑惑或批評，頗能總結當時員生對計劃的關注點。

民主規劃作為教育資源的可能

校方的做法固然沒考慮民主規劃，但關心校園規劃的同學也著實很少。2006年校方公布計劃之後，為回應各種質疑連忙於幾個月內舉辦了一堆研討會、交流會、工作坊和論壇等，參與的同學不多，校方亦只收集到佔校園人數不足1%的問卷就了事。

然而，正是因為一直以來都沒有民主參與的機制，校方才可以改制匆忙為由推說不能做民主規劃，而同學的冷漠也是因從來沒有參與的土壤所致。〈談空間規劃—— 關於我地的規劃〉嘗試整理計劃這十年來的資料，包括各種的官方報告及數據，再加上關於當時的報導，以盡量展現計劃的來龍去脈。文中並指出校方在過程中的各種失誤，進而提出校方其實一直放棄以民主規劃作為教育資源的可能，以致「校園整體發展」永遠先於「使用者需要」。而要在發展與使用者中間取得平衡，必須要由擁有資源的校方，主動作溝通協調，才能培養共同參與規劃的校園文化。永遠推說「傳統上不會公開諮詢」，矛盾將永遠存在。

書寫地方，重拾關係

雖然計劃乏人問津，但這十年每當校方欲拆毀舊物，如保樹立人及烽火台事件，都成功得到員生校友廣泛關注，最終都能促使校方讓步。可以想象，規劃龐大而遙遠於是難以把捉，但校園景貌的轉變卻直接影響員生的生活而容易令人關注。我們往往都會忽略，校園景貌的變遷正是計劃推行的結果。〈那些我今天才知道已經變成這個模樣的中大路邊風景〉的作者在學時期乃計劃進行得如火如荼之時，畢業回校重遊已是另一番景象。除了介紹建築物的增減，文章還談到這些改變如何影響使用者的經驗和互動，如校方為大力推廣「步行校園」而建的扶手電梯之用家評語，和池旁路安裝欄杆後同學的幽默回應。

規劃影響校園景貌，繼而影響人的生活，我們大可藉由書寫地方，展現地方與生活的關係，繼而連成關注校園規劃及投入參與的伏線。〈校園地方誌〉由編輯團隊以外不同年份和學系的同學校友，書寫他們與地方——大至整個中大校園，小至一塊小農地——的親密關係。這部分難免主觀而沒有所謂代表性，但卻開放了所有個體述說自身經歷與地方情感的機會，進而成為關注校園規劃的起點。

一所大學得以順利運作，除了學生，還有賴老師、行政人員及基層工友的努力，〈如果我們能連結——訪問中大不同的持份者〉追訪了校園不同持份者的日常生活、難忘經歷和對中大未來發展的期許，將各自零碎的生活片段集合起來，拼湊出一個更加豐富的中大校園圖像，作為思考如何改善中大校園的開端。



十年
校園規劃事件簿

整理：彭枺棡、羅奕媚

校園發展計劃
新書院
宿舍
教學樓
其他設施
交通、馬路

2003年

4月，校方計劃拆卸李達三樓並在原址新建一座教學大樓，並決定建天橋連接田家炳樓及聯合書院。 **教學樓**

大學圖書館及新亞圖書館進行裝修。大學圖書館除作裝修外，同時亦改善了抽風系統。而新亞圖書館則改變了原來入口、重組及翻新流通處及流通處辦公室，及新增三間研討室等等。 **其他設施**

新亞獲教資會撥款1,500萬，為知行樓大規模裝修，但基本設施出現很多問題，例如熱水爐水溫太低、房間沒有風扇等等，並沒有實質改善了宿生的生活。故有學生發起行動，要求學生可以參與宿舍的管理事宜。 **宿舍**

2004年

李達三樓重建工程開始。 **教學樓**

校方獲教資會撥款進行火車站改善工程，於3月改善火車站外馬路的「人車爭路」問題、增設足夠的指引設施及增加同學聚集及休憩的地方。 **其他設施**

2006年

3月初有中大同學發現由大學火車站廣場到何添樓十字路口一段池旁路，十幾廿棵樹被包上「危險」封條，始得悉校方的池旁路擴闊路面工程。及後中大學生會發起「齊來保護我們的山城聯署」希望校方停止斬樹，有超過1,300位中大師生教職員參與。保樹立人運動由此展開。 **交通、馬路**

4月，校方撤回池旁路斬樹的決定[1]。 **交通、馬路**

5月校董會通過成立兩所新書院，分別命名為晨興書院及善衡書院，新書院將興建在大學體育中心附近，五旬節會樓低座（五低）外面。為興建新書院，校方不單清拆在五低外的網球場及營修樓，更要將大學保健處後斜坡鏟平及大量砍伐樹木。受影響的教職員及學生先前對新書院事宜毫不知情。 **新書院**

年中，協理副校長許敬文透露將開展校園發展計劃，學生會要求加入校園發展計劃督導委員會被拒。 **校園發展計劃**

9月督導委員會成立，負責確立大學擴張指標，包括將全校建築物樓面面積在15年內增加300萬平方呎，大學人口由目前17,000人增至3萬人。負責選定最終設計的委員會裏面並沒有學生、校友、教職員或書院代表。 **校園發展計劃**

2007年

繼保樹立人運動後，中大校友師生組成「校園民主規劃小組」，就中大未來的校園發展計劃進行不同的倡議和行動，希望更加多的師生可以理解到校園民主規劃的重要性。 **校園發展計劃**

2月，校方表示正考慮重新裝修文化廣場（文廣），包括將天井密封、加設儲物房供舉辦書展的同學及學會專用、將上蓋向外延伸、加裝Plasma電視24小時不停播放新聞等。同時，校方亦計劃將文廣的天井位置劃為鋪位，引入咖啡店如Pacific Coffee。學生會幹事會表示反對，指招標條件對大財團有利，且會影響女工小賣店的生意。文廣最終沒有Plasma電視，也沒有Pacific Coffee。 **其他設施**

9月，校方在事前沒有諮詢員生的情況下公佈了未來十年期（2011-2021）的中大校園發展計劃。校方於1年前招標，共4間顧問公司向中大提供發展建議。 **校園發展計劃**

大學要求所有非中大學生、職員的校外人士，乘搭校巴一律須繳付3元。有同學其後組成「巴．不得」行動要求校方擱置校巴收費計劃。行動成員曾先後遞信給保安組、印製傳單並塞入校巴錢箱以向校方示威。最後校方於10月份取消收費。 **交通、馬路**

2008年

3月，新亞擬建新宿舍，設計方案受質疑。書院數年前原計劃以樂群館梁雄姬樓對出的停車場作為建宿選址，卻有同學認為影響書院整體景觀及校園的空間感，故是次建議選址於新亞網球場。 **宿舍**

10月，校園規劃第二階段概念性建議書指出將清拆松竹柏苑職工宿舍， **校園發展計劃**

並改建為綜合教學大樓。

因著校園發展計劃的需要，校方表示需於工程期間把烽火台拆走。《蘋果日報》報導中大計劃拆卸烽火台及「門」後，中大師生及校友才得悉事件。關注烽火台聯席「烽煙四起」於翌週舉辦論壇，近300人出席，反對清拆的聯署亦近3,000人[2]。 **校園發展計劃**

12月，泳池工程將原有跳水板拆除，並將深水區填淺，以節省用水。同時在看台加建了玻璃幕牆。 **其他設施**

2009年

1月，「烽煙四起」舉辦了「逸夫宿生設施需求調查」，報告指出同學普遍認為自修室、健身設施及課室設施不足，半數宿生認為宿舍設施不足。時任逸夫書院院長的沈祖堯教授指，雖然身為院長，但不在校政決策架構的權力中心，不知道「自己把聲可以有幾大」。同期校方已開展圖書館擴建項目[3]。 **校園發展計劃**

2月，在校園發展計劃第三階段，校方邀請顧問公司主持計劃研討會，但顧問公司指一切只屬建議性質，並無約束力，最終決定權全在校方和書院。而在這計劃之前規劃的項目，均未作諮詢便已開始動工，例如圖書館新翼、康本國際學術園、伍何曼原樓等。 **校園發展計劃**

2010年

3至4月，崇基透過電郵向同學宣佈其與烏溪沙青年新村的合作計劃，打算租用該營地某兩棟大樓作為崇基校外宿舍，增加崇基宿位的供應。但由於入住學生需繳付高於中大宿費2至3倍的費用，加上遠離中大，最終該計劃兩年來都沒有同學申請而終告失敗。 **宿舍**

6月4日，維園六四集會完結後，過千市民與一眾校友、師生護送民主女神像到中大。當晚於火車站廣場有集會及校友分享[4]。 **其他設施**

9月，校方發出公開信表明接受新民主女神像繼續於中大擺放，惟建議地點由火車站改為文廣。中大學生會幹事會不認同校方建議，故舉行公開論壇，校方沒有代表出席。 **其他設施**

7月，火車站凱悅酒店旁的「澤祥街教學大樓」（BA塔）正式啟用，商學院各學系的辦公室遷往該處。該大樓主要作酒店管理系及商學院同學上課之用，另外，商學院的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系及市場學課程，以及一些由商學院開辦的大學通識課程都會在BA塔上課。 **教學樓**

10月，學生會幹事會經歷多年商討，終於向學生事務處成功爭取於文廣裝建新的民主牆。 **其他設施**

本部往范克廉樓之樓梯（俗稱PK梯）重建完成。PK梯因圖書館擴建工程而重建。 **其他設施**

校巴路線進行改組，但校方在8月尾舉行的兩場諮詢會都只邀請學生代表參與。最後馮通教授同意承諾會繼續舉行公開諮詢會。 **交通、馬路**

環迴路將建設一條單車徑由火車站直達39區。 **交通、馬路**

2011年

1月，經過學生會的爭取，范克廉樓地庫學生活動中心（俗稱玻璃房）正式通宵開放。 **其他設施**

由於經歷多宗跳樓自殺事件，蒙民偉樓天台加裝了圍欄。 **其他設施**

澤祥街大樓（CCS）正式易名為「鄭裕彤樓」，西部教學大樓（TCW）則易名為「李兆基樓」。 **教學樓**

4月，蒙民偉樓旁的三座職工宿舍的其中一幢動工改成國際生舍堂第三座，於該學年供敬文書院學生暫時入住。11月，校方要求剩下兩座宿舍的工友於一年內搬走。12月，財務處的商務組宿舍委員會　（管理中大內的宿舍事宜）第一次約見住戶，要求職工宿舍住戶立即簽署一份搬遷文件，部分工友表示反對[5]。 **宿舍**

4月，有中大同學被打蛇，遂於聯合草地紮營露宿抗議，藉以對抗宿規制定的不民主與當中所隱含的性別歧視成份[6]。 **宿舍**

敬文書院因無法解決斜坡問題而改變選址，由伍宜孫書院與和聲書院中間，改為近39區（即校園最北處）附近（見下一篇文章〈中大校園發展計劃簡介〉附圖）。新址涉及逸夫用地，故校方在與逸夫書院洽商後，最後將原屬於逸夫的兩個網球場拆毀以興建新書院，而附近的兩個教職員網球場則批予逸夫書院管理以作補償。 **新書院**

9月，晨興書院、善衡書院正式啟用。 **新書院**

10月，因著新書院增加，在田家炳樓側的四（四書院）加一（中大）旗桿變成九（九書院）加一，共十支。 **新書院**

11月，崇基新聖堂取得入伙紙，標誌著聖堂快將落成。新聖堂早於1967年已有計劃興建，但直至近年始動工。 **其他設施**

2012年

池旁路由雙程路改為單行道。 校園發展計劃

1月，校方為鼓勵「步行校園」，將花圃路一帶劃為「行人專用區」，配合電梯及升降機，讓同學較以往容易步行往本部。 校園發展計劃

隨著校巴路線改組開展，以往的五低（五旬節學生舍堂低座）校巴站及夏鼎基運動場站合併成為「善衡書院」站。 交通、馬路

1月始，逸夫同學抗議新校巴路線中，途經逸夫的校巴班次大幅削減，遂在書院範圍內的宿舍、馬路和校巴站等地方用粉筆字畫上 「還我校巴」等字句以表不滿，最後校方同意在方案加循環線校巴，以及將新學年服務逸夫的3號線更改為現行新逸夫幹線的路線。 交通、馬路

2月，第一書店（辰衝Swindon）及第二書店（學術專業圖書中心A&P）約滿，校方決定不續約，並設7,000呎新書店，於崇基新教學樓中單一招標。有學生向校方建議將書店分拆為數間小書店，以加強競爭及增加不同書種。惟校方最後仍決定單一招標。最終書店由商務印書館成功投得。 其他設施

龐萬倫學生中心正式啟用。 其他設施

3月新亞校方擬於MMW旁的網球場興建新宿舍，遭師生及校友強烈反對，指新宿舍可能把新亞水塔的景觀遮擋。新亞學生會遂成立 「新亞書院第五宿關注小組」跟進此事。最終決定仍是建於網球場，但設計上會盡量不破壞景觀。 宿舍 其他設施

崇基一名助理舍監要求宿生會向同學表達書院必須於宿舍內加裝閉路電視。後來同學認為程序不合理，在宿舍集體與舍監洽商後，擱置安裝計劃。但除了該宿舍外，其他崇基宿舍卻已被強制加裝了閉路電視於宿舍不同地方，包括大門、升降機等等。 宿舍

4月，被迫遷工友去信校長表達憂慮，如租金貴，工友難以搬出，但音訊全無。職工協會表示學生宿舍不足夠，校方一早有長遠計劃，不能推翻此決定。另指出工作合約內無指明員工有房屋福利[7]。 宿舍

7月，由於教資會削減資助大學宿舍維修費用的撥款，在所有書院宿費綑綁制下，因為新書院及某些傳統書院的財政儲備不足以應付日後定期維修宿舍的龐大開支，故需調高宿費以作儲備，預計每年增加8%。惟宿費早於2009年開始已每年遞增。 宿舍

9月，和聲書院校園正式啟用。啟用以後，院方以其他書院曾發生失竊案為由，向同學表示需要加強書院的保安，先後安裝入閘機及於全書院所有宿舍房間增設「和聲卡」拍卡系統，所有書院同學進入各房間（包括廁所）均須拍卡，引來極大的爭議，擔心書院將會以此系統監控學生生活。

宿舍

11月12日起，大學圖書館新翼進學園及綜合教學大樓建築學圖書館24小時開放。新翼主要為自修、電腦使用和討論而設。

教學樓
其他設施

2013年

1月，物業管理處（EMO）於崇基三岔路位（信和樓、許讓成樓、何添樓交界）增設大量圍欄以防學生走出馬路。此舉卻使大量學生瓞過圍欄。有同學見此，成立「中大防止自責委員會」，在該圍欄貼上「請在此跳出」，以諷刺中大工程漠視學生的使用習慣與需要。最後該位置被更改為斑馬線，並拆除圍欄。

交通、馬路

3月4日，許敬文副校長、馮通副校長及其他校方代表再次與受迫遷的工友及學生會面，就最後一名工友的去留及工作情況商討。該名工友一直承受很大壓力，最後在會議後約一個星期，答應與校方和解，在月底遷出。

宿舍

2月，康本國際學術園開幕。

教學樓

1 詳見本書卷二「保樹立人事件」。
2 詳見本書卷二「烽火台事件」。
3 同上。
4 詳見本書卷二「民主女神像事件」。
5 詳見本書卷三「運動・角力」文章：〈也許只是冰山一角——十年來勞工抗爭事件簿〉。
6 詳見本書卷三「道德・身份」中，「奪回宿舍性空間」部份。
7 同5。

中大校園發展計劃簡介

◆ 整理：周松齡、吳嘉倫

因應中文大學預期「334學制」改革及未來的擴張，校方在2007年9月宣佈就大學的發展進行「校園發展計劃」。計劃自2008年2月起分四階段進行，顧問公司在2009年4月提交校園發展計劃《報告書概要》予大學校董會通過，最終報告則在2011年提交。規劃以中大需要擴張並發展成國際一流大學為前提，並預計中大2021年學生人數將增至約20,000人，連同教職員則約為27,000人。

雖然規劃在2008年開始，但校方已訂定了2008-2012數年間的發展項目，故這次發展計劃只限於2012-2021年之間。

規劃目標和原則

顧問公司為校園發展計劃制定的主要目標為：

(1)找出大學校園可作發展的空間，考慮各種局限和關鍵問題，範圍及至校園整體，亦牽涉成員書院及未來的新書院；

(2)確定具生態價值、景色優美和文化意義深厚的地方，以便保育和優化；以及

(3)評估校園內運輸流通情況及模式，俾能減低汽車交通流量，以及營造安步當車的環境。規劃藍圖亦按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擬訂一套設計準則，並建議執行策略。

由此，顧問公司訂立了六項校園規劃的原則，並按此進行規劃：

(1)規劃教學研究設施

把各學院和研究設施安排成群組，以節省資源和減少校內交通。法律學院和文學院在校園中西部；商學院、教育學院和社會科學院在校園南部，以及工程學院、醫學院和理學院在校園中東部。研究設施則主要安排在校園的北部和東部。

(2)提升書院生活

透過共享設施、增設社交空間及改善行人通道，加強書院之間的聯繫。

(3)倡導健步文化

以新建築物及特快電梯連接行人路，鼓勵步行以減少校巴的需求。此外，報告亦有改善現有道路、調節校巴路線及增設單車徑的建議。

(4)保育具價值的地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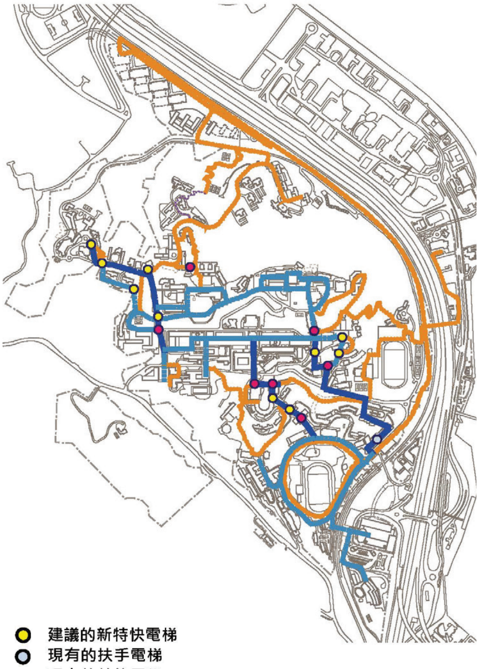
以歷史價值、身份認同價值、紀念價值和建築價值作為鑒別的準則，保留具價值的建築物和地方。

(5)優化校園景色

保護並加強校園的綠色環境，改善校園景觀。報告把綠化區域分為四類（野生林木、障景／緩衝林木、風景林木和觀賞植物），並就各類區域設計相應的綠化策略。

(6)建構可持續校園

以各種方法減低校園碳排放量，包括：改善建築物遮光、利用自然通風、屋頂種植、節能措施、減少汽車交通、優化用水管理等。



發展用地（見右圖）

按照校園發展計劃的原則，報告列出了中大校內已計劃在2008-2012年間發展及可供即時、中期和長期發展的用地。

已計劃發展（全部已經落成）

1 晨興書院

2 善衡書院

3 敬文書院*

4 伍宜孫書院

5 和聲書院

6 龐萬倫學生活動中心

7 康本國際學術園

8 伍何萬原樓

9 綜合教學大樓（建築學院）

10 圖書館擴建大樓

11 羅桂祥綜合生物醫學大樓

12 神學樓小聖堂

13 鄭裕彤樓

* 敬文書院原定建於伍宜孫書院及和聲書院之間，但由於無法解決整地問題，改為建於現址。

即時發展

14 逸夫書院對出空地

15 39區新研究設施及宿舍

16 馮景禧樓（重建或擴建）

17 新職員宿舍

中期發展

18 教研樓一座（重建）

19 大學站空地

長遠發展

20 夏鼎基運動場鐵皮屋（重建）

21 富爾敦樓外停車場

22 山村徑

有關發展計劃的詳情，可瀏覽校方設立的校園發展計劃網站：http://www.cuhk.edu.hk/cmp/e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P

中大2012驚爆內幕（節錄）

◆ 怕你西條毛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10年12月號，編輯稍作增修

編按：前文簡單介紹了校園發展計劃的官方版本，本文作者則以用家身分稍作評論，寫於2010年一場「校園發展分享會」之後。何謂「分享會」，即在校園發展網頁所展示的「反映持份者對校園規劃之觀點及作出適當的修正」和「完成校園發展計劃」，一切都塵埃落定之後才與員生分享。文中提出的「內幕」，不少已在及後的數年陸續完成，例如「兩座綜合教學大樓」（TITB，即現時的「康本國際學術園」與「伍何曼原樓」）和「學生活動中心」（即現時的「龐萬倫學生活動中心」）已啟用，而文學院亦已完成搬遷。

有人問你中大「校園發展」近況的話，唔知你會點答呢？除左PK梯開返、烽火台解封之外，你仲會答啲咩野呢？其實校方在11月9日舉辦咗一個公開嘅「校園發展分享會」，裡面交代中大「十大基建」工程進度之餘，亦透露咗校方對中大發展走向嘅睇法。今次「分享會」有別於以往只有副校長報告的作風，由物業管理處（EMO）和校園發展處（CDO）的工程師現身講解，內容尚算豐富。遺憾當日數埋數埋都只係得四、五十人，仲要有廿個係校方高層，校友、老師加埋又十幾個，得返零丁幾個係學生。既然咁少人聽過，我無理由唔爆下佢講乜架，係咪？

崇基大爆炸

劉去沈來的皇朝更替、三三四的來臨，是否預示著一個時代的告終？中大的校園發展似乎印證了這一點。正在興建中的建築，有一半是位於崇基的，包括：應林旁邊兩座綜合教學大樓（Two Integrated Teaching Buildings, TITB），位於眾志堂和牟lib中間的學生活動中心，以及五低旁邊兩座快將竣工的新書院——善衡和晨興。上校網的話，你更會發現火車軌旁第三座教學大樓的規劃——不過當日未有提及。

新建築的落成將令人流增加，比如TITB就有7個講堂、50多個班房、10多個實驗室，可同時容納3,000人上課；人流增加時，就不得不考慮相應的配套設施如飯堂等。未來眾志堂的業務會擴展至二樓，新建的學生活動中心亦會有一所餐廳——校方講明是不賣碟頭飯、近似李慧珍風格的餐廳，價格水平相信大家

都猜到一二吧。儘管用膳設施已增加，但仍遠遠追不上崇基暴增的人口，未知校方會否考慮在TITB加建飯堂？

在山腳大興土木固然是因為崇基有地有空間發展，不過當中亦不無校方的戰略部署。會上校方表示三三四後大部份一年級同學早上都會在TITB上通識或者學院要求的Faculty Package；校方更表示就「大學站月台北面加建出口」跟港鐵已有「初步協議」，此後出閘三分鐘直達TITB。「人人說崇基在腳下」唔緊要，最緊要交通方便課室夠多，咁中大就可以搞更多校外課程增加收入啦。

缺乏拆卸與改建名單，員生難以提出意見

根據校方的規劃，未來各學系的基地和上課地點將大兜亂，大量辦公室和教室將易手。舊的建築即使不用清拆，其內部裝修會有如何翻天覆地的變化都無人知曉。例如大學賓館原址，將會成為伍宜孫書院的一部分。在裝修改建的過程中，校方有否考慮保留原有房間間隔、門框、窗戶乃至樓梯設計等建築特色？當中的判斷準則又為何？在校方不公佈「拆卸名單」或者「改建名單」的情況下，有心關注的校友、同學根本很難提出意見，更遑論參與討論如何改建。

梁球琚樓化身商場？中環價值橫行中大

另一個熱烈討論的項目是文學院樞紐（Humanities Hub）。三三四後文學院各系將盡量被安排在一處，但音樂系、人類學系、藝術系不用搬遷；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日本研究系、翻譯系則會移至「馮景禧——梁球琚」文學院樞紐，成為中文系、哲學系等的鄰居。整個文學院樞紐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交流廳的設計，兩座建築進行裝修時，將在走廊旁加建三個「交流廳」，馮景禧樓一個，梁球琚樓兩個。據聞這是文學院主動提出的，旨在促進不同學系教師、員工交流。三個交流廳各有「主題」，分別為「中國人文文化廳」、「西方文明廳」及「跨學科交流廳」，這些主題將體現於其設計風格。

大家看過這幅「跨學科交流廳」的預想圖後，會否和我有同感——點解咁似商場嘅？唔知交流廳嘅空間使用會否如商場一樣受嚴格限制？唔同嘅員工又能否共同管理這片空間？馮梁二樓沒太多教室，「交流廳」頂多是教員休息室，對同學影響不大，但這些微細設計亦滲透某些價值取向。當我們回到更大的圖像，很難不質疑整個校園的佈局：為何文學院要被調上山，商學院則要遷到交通最發達的位置？澤祥街教學大樓和新學生活動中心的餐廳，為何要走高檔路線？當中校方的價值取態，可謂昭然若揭。

非常可持續發展的黑箱作業

同學知否校方早前聘請了一間外國公司，為校園未來十年的發展規劃設計？今次分享會校方亦報告了這個校園發展計劃（Campus Master Plan）的最新進展：原來計劃的最後報告已於網上公佈，由校方高層和專家壟斷的「校園發展計劃督導委員會」亦告解散，被新成

立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取代，跟進校園發展計劃的落實。可持續委員會由校方高層、教師、退休高官校友、工程部門主管及兩名「學生代表」組成。

會上有校友問及兩名學生代表的產生辦法、有否透過學生會協助安排等，校方的回答是「覺得應該由學生事務處（OSA）物色一啲真係對校園發展有興趣的同學，所以無叫學生會幫手」。可是校方在校園發展網頁上卻指，該會學生代表是由地資系及建築學院提名。儘管口供不一致，當中揀選的準則和過程無疑都是黑箱處理。

再退後一步，為甚麼校方（準確地說是行政及規劃委員會）只委任跟建築、工程等科目有關的員生？既然委員會中已有EMO和CDO的主管提供專業意見，員生代表人選能否再闊一點？其實現時校方有不少校政委員會也有學生代表，我有位唸精算的朋友是保健服務委員會的委員，小弟是醫學院同學卻參加了大學設施收費諮詢委員會，看來好像跟我們的專業剛好對調了，但這不是正好能反映更多不同的聲音嗎？

小結

今次分享會校方算係做足功課，講足兩個鐘都未講得晒預備左嘅資料。反過來說可能係資料太多，變咗「分享」會只係校方義務式嘅報告，而無咩雙向嘅交流。真正嘅交流係咪只係與會者提出一啲關注點，校方聲稱會跟進云云就算數？假若校方真係有心促進員生討論，其實應該每場安排少啲內容，寧願搞多幾場，多啲人參與到之餘又可以有多啲討論。會上馮通副校長透露來年一月將再公開舉辦一場「校園交通交流會」，有興趣嘅同學記住留意mass mail啦。

［……］

談空間規劃
——關於我地的規劃

◆ 譚焜

2004年教統局宣佈學制改革，三三四學制成了各大專院校眼前的目標，也是重擔。為應付新制的學生增長，李達三樓清拆重建、大學圖書館擴建、五間新書院陸續落成啟用、大學賓館遷址、澤祥街大樓的落成、崇基舊職工宿舍清拆改建為教學大樓……各項工程排上日程，綠幕與棚架隨處可見。

乘著改制的大方向，中大在2003年提出校園發展計劃（Campus Master Plan, CMP）[1]的初步框架，於2005年敲定，並於2006年正式提出十年發展規劃，籌劃2012年至2021年的校園發展藍圖，以配合大學校董會於同年2月制定的十年策略計劃[2]。2006年保樹立人事件後，要求民主規劃的聲音四起，於是在2007年校方公佈已委託四間顧問公司設計規劃時，引起不少校友員生的非議。有說校方黑箱作業，有些工程在諮詢前早已開始動工，而整個計劃實際亦只有三個月的諮詢期。校方網頁則強調計劃由專業的顧問團隊研究，分階段制定發展計劃的內容。

要討論這件已橫跨十年的事件，實有必要提供更多歷史線索。筆者翻查及整理校方公佈的文件、網頁內容，以及來自校友師生的文章，嘗試整合出校園發展規劃的來龍去脈，以及提出校園發展規劃的不足之處。

發展的歷史

根據校方網頁，由1963年建校至1991年的校園發展，主要按照名建築師司徒惠提供的發展計劃進行。校園在八十年代末迅速擴展，包括北部逸夫書院的成立，東部增加填海土地，以及崇基舊建築物重新發展。

1991年到2003年間，校園發展計劃工作小組（Ad Hoc Working Group）曾展開規劃研究，內容涵蓋校園環境、區域發展、人流交通、保育等等不同面向。千禧年前後，建築系Prof. Jack Sidener以及劉宇揚教授，亦分別率領相關的規劃小組，向校園發展計劃委員會提交研究報告，正式確立校園未來發展的大方向。其中劉教授於2003年在校刊訪問中提出校園規劃的構思，分別是融合「田園式」、「書院式」及「都會式」等設計特色[3]。

2003年劉教授提交報告後，校園發展計劃工作小組亦正式成立。可是，校園規劃卻貌似在之後陷入停滯期，校方再沒有公佈過任何消息或計劃。對此，劉宇楊教授在後來「保樹立人」事件中受訪時亦有回應：「金耀基教授卸任後，再沒有高層人員接手落實Master Plan，校園規劃進入一個真空期」[4]。直到2006年，校方才突然推出配合十年願景的校園發展規劃（Campus Master Plan）。

2006年校方公佈籌劃校園發展規劃，並廣邀建築師事務所、規劃設計公司以及環境顧問公司投標。2007年3月中大經過預審後選出四家建築顧問公司草擬計劃書，同年8月四家公司呈交初步建議書，9至10月舉辦三場簡介會，並設置展覽供中大師生參考，為期五個月。2008年3月10日，校方委任其中一家顧問公司，並展開首階段活動。

人數評估出錯

校園發展處處長林泗維先生在《中文大學校刊》訪問中解釋，校園發展計劃之所以一直未有一套「詳細、完整和可供校方依循的校園規劃大綱」，是由於「政府未能讓大學明確將來的發展路向及擴充前景，令大學難以設定目標規模，評估學生增幅」，又言「學生人數估計，是規劃發展的重要數據」[5]。

下表取自程伯中教授在簡介會當中的簡報，當中人數並未包括為數約7千的自資研究生[6]：

年度	本科生	研究生	博士生	職員	總數
2007-2008	約10, 500	約2, 000	約1, 000	約6, 000	約19, 500
2012-2013	13, 500（因改制而上升）	2, 400（上升約20%）	1, 000	6, 500（上升約8%）	23, 400
2021-2022	15, 200（每3年上升約4%）	4, 000（每3年上升約20%）	1, 000	7, 000（上升約8%）	27, 200

筆者翻查校方當年提出的人數預算（見上表），2012-2013學年中大將有23,400名員生，可是比對《香港中文大學覽及統計資料2013》，2012-2013學年員生總數已有接近26,000人。換言之，校方預計2021-2022學年度的校園人口早已達到，若再算上程伯中教授提出的自資研究生數字，2012-2013學年的校園人口已有近33,000人。

我們無法判斷這超過10%的誤算到底是否情有可原，但對建立在這數字之上的規劃藍圖，造成的影響實在不小。

急就章的發展步伐

人數失算，時間倉卒，校方更想瞞天過海地向公眾「證明」規劃有充分的持份者參與。中大在被批黑箱作業之後的匆匆數個月內，舉辦了兩場研討會、十場交流會、七場工作坊、三場論壇，最終卻只收集到連校園人數1%都未夠的問卷調查（共211份）[7]—— 這就是顧問公司與中大校方的「共同努力」，亦即所謂「持份者參與計劃」的成果。持份者低度參與的結果，難免造成規劃不善，也減弱了規劃本身的公信力。

為何大學仍要繼續這樣急就章的進程？最大的動力還是來自三三四改制。當學制改革的消息傳出時，教學配套不足是各大院校的首要問題。儘管各大院校有心平衡，資源分配上都會傾斜在興建教學大樓和提升師資上，宿舍和其他校園設施無可奈何排在較次要的位置。追溯劉遵義校長當年於短短兩年內突然成立五間新書院的舉措，在管理層面看來十分合理：以書院制之光環籌募資金以應付擴張，將管理學生、籌辦書院活動、興建宿舍等規劃的責任和所需資金，一併「外判」予新書院，簡直一了百了。

校方雖然揚言「四年二宿」[8]的目標，但近十年中大宿額增長主要來自新書院——「5間新書院一共收生3,600人，當中有2,400個宿位，即是三分之二的新書院同學有宿；但四大書院的學生人數將增加2,000人，但宿位不變，四大書院有宿的同學人數其實不足四成」[9]。由此可見新書院成立的主要目的是應付宿位問題[10]，亦道出四大書院的宿額問題根本沒有解決，只有愈見緊拙。

懶理持份者意見

校園整體規劃的種種紕漏，其實並不是偶然的失誤，而是規劃過程的封閉所致。就像劉遵義校長當年明言清拆重建事宜「傳統上不會公開諮詢」[11]，到《大學線》訪問時又說規劃文件「比你地睇都睇唔明」，甚至以「督導委員會是專業的，我也沒有參與」拒絕學生派代表加入委員會。這些「金句」其實反映了管理層與顧問公司外的人，從來不被鼓勵和接納去參與校園整體的規劃，成了知識和權力上都沒有「資格」發言的局外人。其時活躍的校園民主規劃小組和校友亦有撰文指出這樣的情況：

「當顧問公司在工作坊上向參與者提問『你認為中大缺少甚麼設施？』『你認為甚麼地方最適合興建宿舍？』『中大應新增甚麼教研設施？』等等，參與者確實感到自己的意見很被尊重。但其實校方已規劃好2012年前的所有東西，參與者在工作坊上的討論，永遠都不會進入真正的議程。所謂的諮詢，只是一場極度接近真實的虛擬遊戲，真正的『校園發展計劃』已經在別處進行中。」[12]

上述記事也突顯了一般員生與校方的衝突點：生活在中大是否就擁有對中大規劃的發言權？校方的取態明顯是想避免共同參與。因此，縱使新書院成立、建築物改建、鼓勵步行疏導交通、把新學制學生的上課地點集中在崇基新教學樓，以至計劃將八個學院重組成三個學院群（譬如工商管理學院於校址南部、理學院和醫學院則集中在東部）……這些政策措施明明對中大所有人的校園生活都影響甚大，最後都變成猶如餐廳裝修改餐牌那樣，與「客人」無關。

校方以委員會和顧問公司為主，員生為次的思維邏輯，衍生了一種公關式的行政手法：持份者的參與權被簡化為使用者意見的表述權。雖然參與者會有自由表達意見，但意見往往難以影響決策和計劃本身，更易於被打上「不專業」的標籤而不被理會。

民主參與的作用

退一萬步說，即便校方把員生當客人和僱員，也不應輕視他們的經驗和感受。在「保樹立人」事件後，其時積極推動參與式規劃的科大教授陳允中也在一個訪問中說：

「參與規劃的精神是讓使用者及持份者決定將來影響他們的空間規劃。作為使用者，他們可能沒有足夠的『專業知識』，但他們有『使用者的知識』，對好品質的空間是有想法的。這種insider

knowledge，是任何好的規劃最重要的知識來源。因此，參與不只是把決策權下放，建立共同體，也是要tap into這些重要的使用者知識，把這些知識跟專業知識結合在一起，使最好的空間規劃更符合使用者的需要，所謂user friendly。參與規劃的使用者一般對最後的成果都有強的ownership，會更加珍惜與認同。」[13]

因此，強調「民主參與」的意義有二：一是陳允中教授所提及的部份，即好的規劃必然不能缺乏不同使用者的意見，亦即民主參與的正面果效；二是如果要令各方使用者的意見得以平等表述和討論，就必然需要結合制度上的民主才能達到，員生不只應該有表達意見的自由，亦應該能夠實質參與影響決策。

空間作為教育資源

「學生不應參與校政和規劃」這樣的印象，正是從校方長年累月的「不應該」、「不專業」、「不夠資格」等回應當中產生，並植根一代代同學心中。「空間」議題好像只是學術研究的題目，大學管理層又避免與各持分者更平等地商討交流。這種校園文化又豈能夠讓員生關心和反思周遭事物呢？

如果我們認為大學是個能讓人學習反思和理性思考的地方，那麼我們得明白，這些思考資源都源自悠久的歷史，它們的意義殘留在文字、口述、以及建築物當中，成為一種非形式的教育資源。人在地方上的活動編織了歷史，而地方上滙聚的事物、思想和記憶反過來也同樣影響著人的思考。譬如「保樹立人」和「烽火台事件」也是出於對自然環境和地標景觀的堅持，這些觀點開闢了其時師生的反思空間，讓不少同學開始學習思考人與空間的關係。如果生活在內的人跟周遭環境疏離，無法將之與日常生活扣連的話，我們又能憑藉甚麼作出反思呢？

在這種意義下，筆者認為校園環境並非只是單純的客觀事物，而是混雜了不同事件和經驗的公共空間。這樣公共的空間理應可以容許使用者帶來改變，而非像如今決策者傾向的封閉和墨守成規。所謂的民主參與，從來不是何等高不可攀的事情，只是讓員生重拾應有權利，使發展恰如其份，以及令教育理念不致流於門面的最基本要求，僅此而已。

總結

教資會在制定三三四改制的過程中缺少民主參與，以致大學方面也只能遵從其所有下達的指令。不過其後的種種失誤校方都難辭其咎——不單錯估校園人數，更讓校園規劃在2003至2005年期間處於真空期，以致後來因為時間倉卒而硬推計劃，無視校園民主的重要。

對於校方假諮詢、新建築風格格格不入、欠缺考慮對自然環境的破壞等等的指責其實早在九十年代已出現，但是這些指責到如今仍然適用，可見校方一直沒有正視及處理：

「回顧中大的發展，在整個校園規劃上沒有一個整體性及一致性的考慮，通常的做法是當有人捐錢時，便倉卒地設計、興建。而在設計時，又常忽視了和環境的配合及同學的需要，只以功能為設計的原則。因此，每座建築物都是在按建築師的喜愛個別設計，在一座古樸的建築物旁，可能會是一座充滿現代氣氛的高樓大廈，往往不能給人一種和諧、協調的感覺。例如新建的圖書館及許讓成樓，新教學樓等。」[14]

回顧過去大大小小的反對聲音，一如前文所載那些抗爭事件，又或是不同持分者的經驗，核心往往指向民主參與的訴求，嘗試介入校方與顧問公司的規劃圈子中，讓員生從某一個發展模式當中跳出來，發掘更多未來的可能性。

在所謂的「校園整體發展」與一個符合使用者需要的校園環境中間取得平衡，不可能是校方單方面「深思熟慮」的結果。這個平衡必須由擁有最多資源的校方，主動花費心力和時間去溝通協調，以至培養共同參與規劃的校園文化，令員生重視校園民主，進而主動關心才能達到。校方一直以來規劃的誤區，其實從九十年代的批評當中已可窺見一二，在過去十年不過是換湯不換藥：急促的擴張以及封閉的決策圈子正導致規劃失當，扼殺校園空間內在產生批判和教育意義的可能性。

1 詳見前文〈中大校園發展計劃簡介〉。
2 〈策略計劃〉，香港中文大學，2006年2月1日。
3 劉宇楊教授2004年在《中文大學校刊》提出的校園藍圖，指出大學東部沿吐露港一帶，可以發展為田園區，以低密度和小規模的方式興建，以免損害自然景觀；都會區則帶出中大「獨特大學城氣息」，使火車站至王福元樓一帶成為「購物與散步區」；書院式則強調要保留及強化書院的庭院式建築，限制樓高並營造更大的庭院空間。劉亦特別強調步行文化，建造校園徑讓使用者可以步行代替校巴。
4 阿藹，〈構思與現實的落差：走訪中大建築系劉宇揚教授〉，《香港獨立媒體網》，2006年3月18日。
5 〈近期發展動態〉，《中文大學校刊》2004年春·夏。
6 校園發展計劃網頁，首階段開展工作及收集詳盡資料，「簡介會── 程伯中教授」簡報檔案。
7 第一階段問卷有118人參與，學生佔80%，教職員6.8%，校友12%，有88人指出自己未曾參與第一階段活動；第二階段有61人參與，學生佔44%，教員16.4%，校友25%，有分別7成及6成人指自己未曾參與前兩階段的活動。另外，第二階段有共163份由中大評議會收集的網上問卷調查，不過當中超過9成半的人沒有參與第二階段的活動。第三階段有32人參與，學生只佔22%，教員與校友則各佔33%，而且有分別8成、6成、4成人指自己未曾參與三個階段的活動。詳見校園發展計劃網頁。
8 資料源自《香港中文大學對教育統籌局有關實施六年中學及四年大學學制諮詢文件的回應》。
9 花花，〈宿舍新政你要知〉，《中大學生報》，2012年4月號。
10 〈港大欠千九宿位　中大供應足〉，《蘋果日報》，2012年4月24日。原文為「中文大學發言人稱，為應對三三四學制造成對宿位需求增加，中大正新建5間新學院連宿舍，令大學宿位由去年中的5,800個增至明年底的8,200個以上。
11 朱凱迪，〈我所知的拆烽火台計劃來龍去脈〉，全文請參見卷二「烽火台事件」。
12 eg9515，〈公然說謊的高等學府的故事〉，《香港獨立媒體網》，2008年4月14日。
13 朱凱迪，〈參與規劃是校政民主化的起步點—訪科大陳允中老師〉，《香港獨立媒體網》，2007年10月19日。
14 〈從校園整體規劃看教育── 走訪張燦輝博士，郭少棠博士〉，《中大學生》，1993年88期。

那些我今天才知道
已經變成這個模樣的中大路邊風景

◆ 德

遵義末年，即2009年，我入學讀工商管理，那時覺得中大很大。後來習慣總是到數個地方上課、到某幾間飯堂進餐、來回報社與位於逸夫的宿舍，我的中大竟是可以這樣細。直至學生會三莊選舉宣傳期，才有需要走出那個狹窄的圈子。再過沒多久，看到很多預早計劃了的工程陸續展開，校園很多地方都變成了工地，又有很多路封起來，帶來各種不便，累積不少埋怨。以下的小小紀錄，是我待在中大的幾年裡以及畢業後再回中大的所見所感，希望讀者能感受這幾年裡的變化，或有所啟發。

5 龐萬倫學生活動中心升降機

有了升降機代步，從新舊賤到 CC Can 可以很直接、快捷，很受中大人歡迎——這是在學的人告訴我的。他們說這升降機不是24小時開放的，不開放時，就算是在學的人（一些系會的莊員例外），絕大部分也跟我這校外人士在非教學日回中大一樣，只能望門興嘆，乖乖去走四層高的室外樓梯。

龐萬倫學生活動中心前身是個停車場，現在盡收地底，騰出來的空地估計有數千呎，鋪滿肉色磚。不過，那裡空曠無遮蓋，不利人停留。例如沒有座椅，沒法子坐下休息，想坐在地上，卻發覺地面被曬得很熱，結果這只能是讓人直行直走的超闊行人路。話說回來，既然暫時沒有計劃，不如放些座椅、太陽傘比較妥當呢。



2 池旁路

民主女神像對出的一段池旁路，如月般彎的斜路，行人上上落落，車也上上落落。最近一兩年，行人依舊上上落落，車呢？只有上呀上呀上的份兒。全條池旁路現在單程行車，所以靠近利黃瑤璧樓的那邊也修築行人路。

畢業後有一次經過，那兒已經安裝了活動鐵鏈欄杆——究竟中大有多喜歡欄杆啊？其實校方已經不是第一次裝這些以為安全的欄，學生組織了「中大防止自責委員會」[1]，認為何添樓對開的行人路欄杆多餘，貼了張標語叫路人跳過欄杆，幽校方一默，惹來不少人關注。此舉或許提醒了道路設計者，不久之後便把護欄拆掉了。

眾所周知那條路很窄，中大人很喜歡走到馬路上加速超越前面的人群。司機幾乎都很耐心並跟隨馬路上的行人慢駛，很少聽到焦躁的響安，是十分和諧的畫面。其實就算沒有欄杆，大家都相安無事。

4 單車徑

環迴路的單車徑最初只有200米，大家都笑那可能是最短的單車徑。相比本身有數公里長的環迴路，完全不成比例。事隔兩年，已經不只200米而是駁長至可以踏至逸夫書院。在建築系的新大樓附近加設了停泊單車的欄位，觀察所得，使用率也很高，看來單車停泊位置相當有需求。



3 康本國際學術園扶手電梯

扶手電梯在其他地方覺得普通不過，但當知道中大會建扶手電梯是很驚訝的，一口氣在室外安裝七條，不禁疑惑：在這年輕人居多的校園有必要裝扶手電梯？安裝和維護扶手電梯的費用很便宜的嗎？直至搭過一次到何草，感覺是舒服的，舒服在於不必行走斜坡、在於免卻逼校巴。（年紀大……）

此處盡見校方實行「步行校園」的決心，不惜工本分流乘坐校巴的人。



1 火車站外的鄭裕彤樓

（戲稱BA塔）自我入學已經存在，在我第二學年開始成為商學院的基地，學系辦公室由梁球琚樓搬到BA塔。每當要傾專題報告、做分組功課，很多商管學系的學生都喜歡到那裡的電腦室聚首，因為能方便走讀生打道回府。

BA塔在火車路軌外面的澤祥街，路上有人派傳單、炒栗子、煨番薯、等交通燈……可是，來往BA塔的一段路，作為商科生的我，並沒有甚麼好的回憶，每逢學期之初的選課，玩過CUSIS後，一些連必修的課也未能選上的人要到六樓學系做人手增選。看著其他人在火車站、小巴站、巴士站離開，自己卻還要在中大辦手續，這些煩躁的日子至少持續一星期。就算火車站來回BA塔不用五分鐘，也不禁抱怨為何沒有校巴由本部駛到BA塔呢？





7 「賤橋」

「賤橋」在「步行校園」有著重要的位置，它和「賤build」內的升降機把人提升一個層次，來往山腳的崇基校園和山腰的本部。「賤橋」多年來變化不大，除了多了個出口至七彩的逸夫科學大樓，還有就是在「舊賤」五樓的平台豎立了高錕像。畢業季節，會看到畢業生跟高錕合照。有一年臨近聖誕，不知誰人給高錕像戴上了一頂聖誕帽，然後大家就著照片說起高錕當中大校長時的往事——高錕除了是成就超然的科學家，還是一個很寬容的校長。以後，我每次經過「賤橋」都會看一看高錕像有沒有被人掛上其他飾物。

9 李兆基樓天橋和聯合路的一段斜路

猶想當年O Camp，組爸說住逸夫的BA人，上堂很方便，只要預準時間，即使二十分才從宿舍出門，也能搭上校巴，第一個站下車，行這天橋便能到李兆基樓。天橋全年開放，在李兆基樓給鎖上的非教學時間，三樓大堂快速升降機依然運作。雖然有了升降機和天橋的組合，但也非一步登頂，李兆基樓天橋的出口開在聯合路的半路，離聯合書院還有一段斜路。這段斜路在我進中大的初時，經常險象橫生，校巴下坡時往往要在彎位急煞減速，預留足夠位置讓上行的校巴前行，有時閃躲行人路上的人。在我第二學年，校方肯擴闊那裡的行人路，改善後的寬度可以容納三人並行。在安全的層面上，加建欄杆只能治標，擴闊路面才能治本吧。





8 新亞飯堂的外側梯級

新裝潢的新亞飯堂用上落地玻璃，包著建築物至兩層高，儼如一個大水族箱。偶爾一次在周日回中大，飯堂沒有營業，想重嚐新亞飯堂的下午茶的計劃沒能實現，沒法體驗在玻璃箱裡吃東西會否自在些、食物會否美味些。

飯堂取代了近蒙民偉樓位置的燒烤爐和一些茶座椅。原有的石板磚，不再停在飯堂門前，在繞過玻璃幕旁的狹窄地方（窄得不預期有人會通過似的），有另一段用石砌成的梯級緩緩伸延再上一層，接著一條人行出來沒草的平坦泥路，那兒樹葉還會低垂到人頭的水平。在這時尚玻璃幕建築的旁邊卻會如此親近泥土，錢穆大概想也沒想過吧。



6 「辮子路」

我原本不知道「辮子路」除了環迴路外，還有另一個版本——龐萬倫學生活動中心最高那個平台連著的那條路也是「辮子路」。崇基人朋友說這「辮子路」是不少宿生上週會必經之路，在週會快要開始時，總有些人在這兒怒奔。只是燈壞了沒人維修，加上附近有一幢像是鬼屋的舊職工宿舍，不流傳鬼故才怪。

我記得這「辮子路」在晚上很昏暗，路燈相隔很遠。有一次在燈光照不到的彎位，看到一張白色的人臉在移動，原來是在用電話的人類，真是心血少點就會被嚇倒！隨著龐萬倫學生活動中心啟用，「辮子路」的路燈終再受關顧，有了他們光亮地照耀著，大家經過時不用提心吊膽了。

10 街邊的路燈

大三的時候，記得有一次開完會已夜幕低垂，沿大學道馬路下坡，拖著身心俱累的身軀回家，眼皮像掛上百斤重物，周圍的景物只剩下眼前一線……突然覺得很不對勁，馬路竟然這麼皎潔，這麼光，不自然的光。勉強抬起頭，只見很光亮，那不是記憶中橙黃色的鈉氣燈。

在日間再次經過路燈的街道，燈給關掉了，在燈柱下仰頭去看。是街燈換了。換上了一組LED燈，發射出冷冷的光線。不過，那裡有多少顆LED才能發出這麼強的光？用細粒一點的燈泡不行嗎？

1 中大防止自責委員會，〈中大防止自責委員會調查報告〉，http://omoikane00.wordpress.com/2013/01/27/cu_true_dontblameme_committee_report/

校園地方誌

過客、抑或歸人——中大行路誌

◆ 謝欣然，2011年入學，中文系

不是個喜歡走動的人，怕熱，怕累，怕麻煩，著實討厭，長髮被汗水黏濕得卷亂甚至纏頸，冤鬼索命般。得知大學有校巴往返時，真安樂了好一陣子。而竟開始會以步易車，是因為沒車。

學期初，學生報的傾莊總在凌晨一兩點才完結——校巴在十一時半便已停止服務。宿居逸夫的我唯有乘著會議中討論的餘熱獨自走上馮景禧，經過網球場，走下兩個半的斜坡，拜會女人腳，然後回房就寢。準莊員們每次對議題都有雀躍的討論，要不是明天還要上課，我們都不願在此休止。

傾莊算是陽光底下的事，是為了遷就下課時間才進行到深宵。有些「不見得光」的事，不得不在無人之夜才出動。九月中，為抗議替補機制諮詢即將無聲無色地結束，我聯同幾位同志，在人煙幾淨的凌晨走遍各間書院乃至火車站，把反惡法街招貼滿整個校園。由崇基行上新亞，再落山集合，驚覺行完一轉都不過花了兩個多小時，大學，也不是那麼大。「不如搞個夜遊中大啊。」啜著朱奶的同志提議。除了預計在十五年後才能回答的哲學系同志，我們都舉奶贊成。

儘管如同許多床事過後的承諾，我們的夜遊並沒實現，不過，我對行路的溫室恐懼已被多次的實踐所消卻。

下課後，遇著不毒的太陽，便會選擇行路。校巴雖然方便，但路上的風景，在車廂內必然會被錯過。後來行路多了，便知道路不止那麼幾條。往聯合伯宿，其實在新亞站下車，經情人路行到宿更便捷。住逸夫要外出，其實不一定要趕上廿分鐘一班的校巴，赤泥坪的大門一直為你而開。再後來，更不甘於只行那幾條別人鋪好的路。地盤，暗角，山徑，那是自己行出來的路。有時會行錯路，但有時會有意外驚喜。如果沒有行過，恐怕就不會發現，夜裡在花圃路——抬頭的一刹，天與地彷彿沒有界限，星的光芒伸手可觸——漆黑本是絕佳的觀星環境。

一年過去，莊已被我上了，對行路由抗拒轉而為嘗試甚至狂熱，到現在，在搬至本部的會室居住及莊務繁重的藉口下，已很少如以前般媾行了。可是，這所大學已被我以腳步記下，以我觀察和觸碰到的模樣和質感存記於腦海中。

築動人心——綜合教學大樓

◆ 吳倩婷，2011年入學，建築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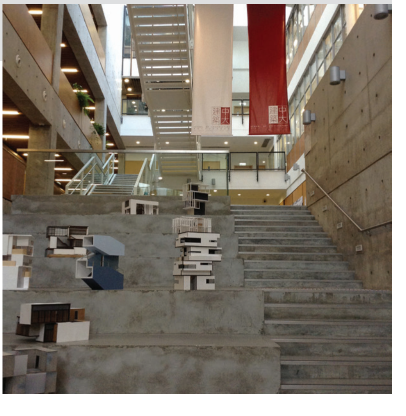
2012年9月，建築學院從王福元樓遷到新建成的綜合教學大樓。

一般人或許認為建築學院大樓應該是奇形怪狀、裝飾華麗的，但新大樓卻不然。它擁有中大建築一貫的樸實：直線條的方正設計、白色和灰色的配搭和沒有多作修飾的外牆。新大樓使用了現代建築流的清水混凝土，故意不加塗料或飾面，以普通的混凝土弄成平整、一致的牆壁表面，更能表達材料本身的美感，讓人更加注意建築結構而非形狀。建築的其中一種精神，正是透過結構創造舒適的空間，讓合適的人和事自然發生。

新大樓座落火車站旁，自成一角。其中一個明顯變化，是對內的聯繫多了，對外則變得獨立了。從前在王福元樓的建築學院，是與中醫、地資、心理和社會學系共用的。那時我們的工作室位於四、五樓，偶爾出入也會碰到其他學系的朋友，一起到珍can吃飯；或者會在升降機裡聽到其他學系的一些八卦消息與活動。而現在新大樓雖然名字稱為「綜合」，實際上可說是讓建築系獨佔全地，有自己的一片天。好處是地方大了，空間運用可以更切合我們的需要。雖然偶爾會想念珍can的薯條，但現在cafe330的芝士蛋糕，也很好吃。

六層樓的綜合教學大樓，由上至下，有平台花園、教授的辦公室、建築系圖書館、我們的工作室和開放全校使用的課室。設施聚在一起，感覺內部聯繫更加緊密，忙的時候，我們根本可以整天不出大樓一步。我尤其欣賞中庭的平台和樓梯，那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地方。你可以碰到不同年級的同學，聊聊摺studio的苦況，再回到自己的工作裡。偶爾在走廊望向寬敞的中庭，是一件很放鬆的事。透過工作室的玻璃看著埋頭苦幹的同學，想到下一刻我又要跟他們一樣通宵工作，忽然百般滋味在心頭。

然而，新大樓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建築學生最需要的文具店消失了。或許有人會知道，從前在王福元四樓，有一間專屬建築系的小型文具店，面積不到半個課室，各式材料卻應有盡有，別系的同學、莊員不時也會在這裡找到弄宣傳的東西。老闆娘徐太甚具商業頭腦，每逢我們趕死線前，必定延長營業時間，讓同學們買到所需的模型材料。這家店從建築學院坐落王福元開始就生存至今，現在卻不能在新大樓延續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位於YIA（康本國際學術園）的商務，不方便之餘，材料選擇也少了，實在是建築學院搬遷中遺憾的一筆。



隔絕——UC草地

◆ 熊貓仔，2008年入學，政政系

我在政政系讀了六年書，每次上敝系的課堂，也幾乎會經過UC草。六年過去，有些風景還是沒有改變。譬如說，國際生在曬日光浴、學生老師在上導修課、畢業生穿著袍用木棉花堆一些圖案⋯⋯

或許你會覺得上述的景象很浪漫，很「大學生」。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在那裡上導修課並非是一個享受。在春夏季，日光總會照得你完全不能集中；在秋冬季，強風總會吹走授課用的材料。此外，每位同學都要花很大的氣力去說話，讓其他同學聽到。而在我快畢業的時候，UC草地還加裝了自動灑水系統。自那天起，我就常在想，總有一天會有教授和學生「中招」。

UC草之於我，最深刻的莫過於是一張禁煙海報。海報裡頭，四名大學生坐在UC草地上嘻笑（有一位還是我認識的師兄），當然還有大大的禁煙標誌。校方彷彿是警告著大家，綠油油的草地和大學生，是必須要和煙草隔絕的。它總是貼在校園不同的角落，尤其是隱密的「煲煙位」。

我常在想，假若有一天校園解除禁煙令，我就不須再偷偷摸摸在UC草的角落抽煙，再不須以為海報上的同學總在監視著我。這個幻想／卑微的自由對我來說，其實是挺浪漫的。



一路之隔——白石角

◆ Glen，2008年畢業，文化研究系

敝人不好運動，緩步跑算是會偶一為之的例外。

那時會從本部附近的宿舍出發，沿校巴路跑到夏鼎基，轉向環迴東路（好像已改名海旁路的樣子），再在研究生宿舍附近的出口橫越吐露港公路。先是穿過數棟從未涉足的中大研究中心，然後就到達海傍。從這裡起便似是到了另一個空間：左首是偌大而人煙稀少的科學園，建築極盡科幻，甚至有疑似UFO的不明建築；右首則是交通不便無人到訪的白石角海濱長廊，走簡約路線，據說像是北歐風格。科學園盡頭是當時還在興建中的地產項目，現在似乎已經開售了。到了那兒，就差不多沒氣再跑下去了。



結緣——珍can

胡雪婷，2011年入學，社會學系

每個人在這校園都有一個故事，而我的故事就發生在信和樓的三樓——珍can。

2011-12那年的下學期，我和朋友聽聞中大不再與珍can的營運公司續約了，將由一間上海菜館接手，於是，我們特意在幾個下午到珍can吃我們最愛吃的薯條與熱狗，且為以後不能再吃到而感到可惜。

我和珍can的緣分可以追溯到聯招放榜前。那一次我到ELB面試，由於等候的時間很長，我問職員附近有沒有canteen，那職員介紹我去珍can，那是我第一次去珍can。那一次，我已經愛上了這個地方，價錢不是很貴，雖然食物不是特別的好吃，但舒適的環境令人不期然地放鬆下來。靠窗的那一排座位更是在珍can吃下午茶的最佳位置：享受著冷氣送來的陣陣涼風，卻又能看到窗外的一片陽光明媚，那時我就想：如果我真的能考進中大，那就好了，那我就可以經常到珍can吃東西了。

後來，我果然與珍can結緣了，我不但可以在中大讀書，而且學系還在珍can的上一層！有時下課後，即使不是很餓，但在忙碌的課業中，和朋友一邊享受著下午茶，一邊聊天，也是件很愜意的事，倍能感覺到大學悠閒生活的可貴；有時在四樓上課，趁短暫的休息時間「竄」下來，然後帶著可口的熱狗或薯條回課室吃，好像已經成為我們學系學生的習慣。

我和珍can漸漸建立了感情，所以，當我聽聞珍can要結業時，心裡有些不捨。幸好消息在學期尾時得到了證實：珍can不但沒有結業，而且會擴大面積！我當時心裡消除了那份疑慮，同時，也為自己當初的行為笑了出來。

雖然白石角和中大只有吐露港公路一路之隔，兩地卻似乎無甚關連。雖說港府把科學園建在中大之側有效法矽谷與史丹福之意，但頂多也只偶有聽說工科的同學在科學園實習。中大並沒有往來科學院的校內交通，要往科學園只能到火車站乘九巴272K或是步行過去。尤其是步行路途遙遠，氣氛陰森，更缺乏路牌指引，完全沒有連結兩地的配套。中大也沒多加利用近在咫尺的吐露港公路，途經那邊入口附近的巴士路線只有往返科學園的特別班次。若然有三兩條巴士路線行經中大，大概也可改變現時火車站獨大的交通異況，讓環迴路那邊多少興旺一些。

二、三事——范克廉樓3樓

◆ V某，2009年畢業，前學生報編輯

屈指一算，我因學生報的關係，由2006年始已在范克廉樓流連了5年，要數一些關於此地的小事，簡直是信手拈來。篇幅所限，在此僅略說一二。

1

2007年上莊期間，在找陳年舊相時聽老鬼說范記（不知道幾多年前）曾經發生火警，之後就得大裝修，當時的范記內外是白配深綠。然後2011年，學生休息室（玻璃房）又裝修，陳舊的紅豆色地氈換成光滑地板，從此，o camp pre camp的時段，三樓都會如地震、如雷鳴。

不過其實我最想說的是，兩次裝修都沒有把裝在腳邊的冷氣換到上邊去，繼續如謎地違反小學生也明白的冷空氣向下沉之物理常識。



2

玻璃房以前放有幾張長方形的勞作大檯，還有一堆櫈，日間人來人往，食飯吹水彈結他唱歌，嘈到我都覺得煩，但總算大家都在使用。晚上人潮散去，報社同志把檯泊在一起，還可以打乒乓。裝修之後OSA把大檯丟棄，換來的是幾張精緻的四方檯，還配上幾張單人梳化，敞大的地方只能坐十個八個人，鬍鳩非常。由於玻璃房冇人用，會室地方不足且環境不甚好的報社人將開會範圍擴大，實行霸埋隔籬。

3

學生報會室硬件上好像沒有甚麼大變，不過近兩年公用電腦大致收皮兼冇人理，大家都用手提電腦出版玩樂，而衛生情況則隨著轉莊的人事變化，在「僅能接受」到「……」中間上落不停。不變的是，一年兩次，日上三竿仍在瞓的報社人會被Shaw Band嘈醒，一定至少有一位歌者走擨晒音，然後……

屌聲四起。





依靠——許讓成樓

◆ 王靖婷，2012年入學，社會科學院

機緣巧合下，我成為社會科學院大類收生學生會幹事之一。因為加入系會，十四個完全不熟悉的同學開始互相了解，由單單從名字上的認識，發展到處事方式、人生態度、甚至對將來的期望的深一步相處。而我們的家就是許讓成樓407室的臨時學生會會室。原本這間會室只有兩張長沙發和一套桌椅，凋凋零零，半點雜物也沒有。為籌備活動，十四個人幾乎每天都聚在會室，埋頭苦幹。時間久了，雜物一點一滴增加：軟綿綿的坐墊、老少皆宜的遊戲玩具和亂中有序的活動物資。最妙的是，有人提議將十數個紅綠色的膠櫈作為裝飾，一排飲料塑膠瓶整齊地排列窗台前，紅綠相間，顏色配搭妙極了。

我最迷戀窗外未圓湖的景色。偶而晚上開會至深宵，身心俱疲，抬頭望出窗外：黑濛濛中隱約透出樹木的輪廓，湖水閃閃發光，映著拱橋的倒影。有時候我在黑暗中從會室眺望校園，窗外是寧靜而優雅的，一抹淡淡燈光為植物加添一層薄紗，校園失去了跳脫卻多一分恬靜，別有一番感覺。會室內沸沸揚揚的氣氛調和了靜寂的中大，再孤清自高的夜也有一班人守在會室，不願散去。從外面街道望入許讓成樓，四樓總亮著一盞光亮的燈。一間房間擺放的不僅是普通家具，更重要的是這會室讓這十四顆心都有地方好好安放。

為了有生命的土地——UC小農社區

吉秋爽，2010年入學，中大農業發展組成員[1]

在中大，鳥是多的，樹是多的，花花草草也是多的，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懂得怎樣與自然好好生活在一起；也未曾想過，這片土地的生命是怎樣與我們連接。

UC小農社區開始於2013年初春，作為基礎的五小塊耕地是農發組以團體名義向聯合書院申請，位於湯宿後面。首期為半年，至2013年5月底止，及後獲批續耕一年。「耕種社區」的概念取自「社區農業」，意指在同一個社區生活的人們在同一片土地上進行耕種活動，由社區成員自發組織管理田地，共同耕耘，共用所得。至今（2013），社區的成員包括十幾位同學仔、五塊田周邊農友們、田裡的農作物花草果樹蟲鳥、提供廚餘枯葉做堆肥原料的工友職員等等等等。

將堆埋建築廢料的場地變身為農地，我們明顯覺得很吃力。耕種之前，我們花了大半日時間清理那些夾雜在泥地裡的碎石塊和塑膠垃圾，這是往日人們在土地上留下的粗暴痕跡。以後的日子，我們與土地，將通過耕作共同還原土地的溫厚與生機，它以它的堅韌，我們以我們的癡情。

菜園的特別之處還在於，對於菜園來說，一切都是可用之物、值得珍視之寶。然而，搬運被遺棄的舊椅子、大木板、玻璃樽，還有大袋的落葉等等，從新亞百萬大道或校園的任何可能的角落到菜園，我們每一趟都走得很辛苦。瓜蔓搭架所需的木條或木棍、農地邊的休息凳、擺放工具和堆肥的發泡膠箱、堆肥用枯葉雜草廚餘等等，來自中大餐廳，還有中大垃圾站清潔工友的細心幫忙[2]……菜園這片地方，是要盡可能容納被遺忘受忽略的事物，包括以前未曾發現的自我與不同的生命狀態之可能；且為了這些被遺忘受忽略之事物，我們正在並將會永遠地守護菜園。

---

1 中大農業發展組（簡稱農發組）於2012年秋由一班熱愛土地熱愛農耕的中大學生正式成立，為香港中文大學學生組織。

2 可是小農社區並非能夠無限消化廢物，社區小農及所有社區成員也並非有無限精力，整個校園的不可持續之瘋狂，小農社區再承受不了了！

如果我們能連結
——訪問中大不同的持份者

陸明敏

編按：不同校園持份者在中大都有不同的生活經驗，正是由於形形色色的人生活其中，具體的人與人和人與地方之間的互動，一點一點地活出了中大的模樣。但即使是共同生活，這些生活經驗卻似乎是各不相關的。比方說，位於山村徑的職工宿舍被改建成第三座國際生舍堂，也許學生會認為有更多宿位是一件可喜的事，但卻沒想過住在職工宿舍內需要隨時候命的工友的生活及工作安排。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大現在這個模樣真的是最好嗎？真的能滿足在中大生活的人的需要嗎？

這次，我們編輯小組主動訪問各種不同類型的校園持份者，包括工友、教授、學生、校方管理層，希望把這些零碎的生活片段集合、組織起來，試圖從他們的中大生活經驗中，拼湊出一個更加豐富而又活生生的中大校園圖像。也許限於篇幅，這些例子並不特別具有「代表性」，但這些訪問，這些人的生活經驗，可以作為我們思考如何改善中大校園的開端。

一、退而不休的洗車伯伯——彭叔

在我和另一位編輯正愁如何找到不同的中大人的時候，我們就遇見了一位正在梁球琚樓前洗車的伯伯。在說明了我們的來意後，他就開懷地叫我們叫他彭叔。彭叔在1981年入行，先後做過中大建築處（即物業管理處前身）及物業管理處，2004年退休。曾住在教授宿舍底層的管理員宿舍，住了十幾廿年，住到退休。為何退休後仍要工作？他解釋：「因為我之前做嘢勤力，啲教授想我幫佢地洗車，而且我又想繼續服務中大，所以咪一直做囉！」

眼見年約七十的他仍以單車代步，細問之下，原來他未退休前的工作範圍以聯合及崇基書院為主。退休轉職洗車後，每星期回來中大五至六日，每天中午在元朗搭車到中大，在中大踏單車到崇基、新亞、本部、39區等，每天路線不定，因未必每個教授都需要每天洗車。而他洗到大約傍晚就會乘車回家。

不過中大的路那麼斜，會不會不方便？他直言最希望「中大能擴建馬路、單車徑，方便踏單車人士。」不過，到現在

他仍然在中大做，除了是責任心使然，還因為覺得「中大是我家」：「最喜歡中大的工作環境，因為自然環境好，空氣清新，地方空曠，又自成一角，遠離城市繁囂。基本上整個中大都喜歡，所以沒有甚麼『特別喜歡』。」最後他說：「我希望中大能繼續不斷發展，培養人才，和多建學生宿舍、教授宿舍、休憩空間。」

二、25年服務獎得主——玲姐

然後我們跑上了聯合，找到一位聯合伯利衡宿舍宿工玲姐。她在這裡做了近28年，剛拿了聯合書院的25年服務獎。她一整天的工作行程幾乎都在宿舍中，工作時間約是8小時，45分鐘食飯。

一天的工作時間中，她約有兩個鐘時間坐counter（但如同事放假的話就會不只兩個鐘），處理借房匙、洗衣機問題、登記等，其餘時間會去做清潔，包括洗廁所、隔日清理房內垃圾筒等，星期日會拖全宿舍的地，包括宿生房間內。

不過，暑假時，就會比平時做得辛苦，因為宿舍會租給其他團體，「例如有個團體12點退營，另一個團體3點入營，就要好快手洗被單、床單、掃地、抹書架、抹書櫃頂、洗冷氣隔塵網。以前床單會拎出去洗，但依家要自己洗。試過因為要做野做得好快，整爛兩隻錶，但都冇計，因為要睇住時間做野。好彩去年不用再鋪床，只需摺好讓宿生自己鋪就得。」

不過她認為雖然如此，但已比10年前好多了，「10年前冇粒、冇微波爐、煲水又煩，倒垃圾時要拎個膠袋拖住落黎倒。」

她在宿舍最難忘的是煲粥俾病了的宿生食，但又試過因入房內清潔經常會被宿生鬧，所以將垃圾筒放在門外，但宿舍認為「唔好睇」，所以擺番入房。

不過，當被問到宿舍或者中大最大的變化，她認為以前的宿舍比較溫馨，「好耐以前宿舍冇冷氣，全部宿生會打開房門，似係宿舍，依家個個關門，覺得似係酒店，以前比較開心。」

現時的宿規亦有所改變：「幾年前，好多時一個宿生都會帶一班朋友黎宿舍玩。只要宿工認得，那些朋友就不必宿生陪同，不過就唔會俾生面口的人進入。但有一次，宿工同舍監都認得某個宿生會同學的朋友，於是俾佢入去，但之後該宿生會同學向舍監投訴，咁就變成今日一定要有宿生陪同先可以進入，但走就唔一定要有宿生陪同。」

她又指出，「依家中大好多位都改建做學生宿舍，例如原本依度只有雙人房，都改建做三人房，原本一層頭尾有兩個浴室、廁所，其中一個都改做房；改得的都改左。而其他宿舍已經冇宿工住了，只有呢度仍有宿工住。」

被問及最喜歡的中大地方，她說：「最喜歡崇基未圓湖和眾志隔籬種椰子樹嘅

地方，有空時去散步好舒服。」整體而言，她都很喜歡這份工作，除了因為工時穩定、假期較多外，更重要的是「可以成日同學生傾偈，感覺自己很後生。」

三、廿年中大生涯——社會學系導師劉紹麟

劉紹麟，社會學系導師，已在中大逗留廿多年：1987年讀本科，1991年畢業；1993年完成哲學碩士課程；2003年讀博士課程。2006-2007年兼職任教，之後轉全職工作至今。

當被問及這些年來他在中大的活動地點有否變化時，他謂：「大有變化。本科至讀碩士時，主要活動範圍都在本部，當時社會系在馮景禧樓，我住過新亞宿舍及研宿（五旬節會樓），而甚少在崇基。不過，現在主要都在崇基活動，少上本部，也極少上新亞聯合。」

那麼，有沒有甚麼地方是最難忘呢？「最難忘是在馮景禧助教房通宵趕論文，地方基本上沒變化，只是不再是社會系而已。」

當談到中大的變化時，他認為中大一直都在進步中。「例如以前校巴一小時兩班，現在好密；以前 U lib（即大學圖書館）好嘈好多人傾偈，現在改善了；以前圖書館『冇料到』（意謂館藏不夠豐富），現在又改善了。」

最後，他認為中大應該變得更加「本土」，應該有一個本土發展的議題，而並非只追求排名，去討好國際學術社群，令到中大對香港社會沒有貢獻。

四、見證中大四十載——副校長許敬文

我們通過電郵訪問了現任副校長的許敬文。他在1976-1980年唸中大新亞書院本科生，其後於1980-1982年任市場及國際企業學系助教；1996年至今任市場學系副教授，由2004年開始兼任大學中央行政工作；見證著中大過去40年的發展。

他平常一天的行程都幾乎是圍繞著工作和授課地點：鄭裕彤樓辦公室、行政樓和校內各單位的會議室、崇基和鄭裕彤樓的課室、范克廉樓飯堂和新亞雲起軒。他說：「近年因較多參與行政工作的關係，已較少出現在課室，而且亦因年紀的關係，很少利用大學的體育設施，特別是壁球場和足球場。」他又認為比起創校早期（約四千學生），今天的校園多了很多人（約二萬四千學生）、車和建築物，少了一份鄉郊泥土味。

當被問到最難忘的中大地方時，他更滔滔不絕地細數。如當年他曾入住的宿舍新亞知行樓。「特別懷念當年的宿舍生活，晚上外望窗外繁星和吐露港的漁火，與宿友們細說人生理想，家事、國事和天下事無所不談。建築物外貌幾十年如一，但內部經過翻新後予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又如他作為中大學生上第一節課的新亞人文館115講室。「很喜歡建築物的名字。大一沒有宿舍，加上路途遙遠，又不太熟悉校園，結果第一次在中大上課就遲到了半個小時。聽

說115室到今天還是新亞最具規模的講室之一」；還有新亞錢穆圖書館，「一個我在學生年代度過不知多少個日與夜的地方。圖書館外觀與四周環境改變不大，內部則比以前提供更多集體和個人的學習空間，更具時代和文化氣息。」

除了新亞書院外，他又談到當年的大學站以及旁邊的碼頭和小商店。他說：「追趕火車所帶來的希望和失望，在碼頭垂釣，在吐露港泛舟甚至在小商店內搓麻雀的種種片段，到今天還是歷歷在目。」此外，他亦提到新的中大建築物：「善衡書院，特別是飯堂，感受到中大書院制能夠發揚光大；康本國際學術園和伍何曼原樓，親身參與整個項目的前期工作，就項目與大學不同單位和群體交流意見。」

他認為，校園內最美和最具特色的建築物是中國文化研究所，「外觀一直保持原貌，內部天井位經過修飾之後變得更美觀更具文化氣息。常常問自己，今天在天井魚池暢泳的錦鯉，是否還是當年的那一群，還是它們的曾曾曾……孫。」

他最後寄語中大人：「多一點求真，少一點功利；希望校園內能做到真正包容不同文化和價值觀；中大每位教授和員工都能在其工作崗位上發揮所長，工作愉快，同學在『求學』和『做人』能真的齊頭並進；每位中大成員都致力保護校園環境，身體力行，以實際行動支持中大的持續發展。」

五、希望中大能更照顧到行動不便人士——X

X，一名當助教的身體行動不便人士，在中大讀本科，現正於中大讀研究院及當助教，前後在中大約讀了五年書，斷斷續續的工作了兩年。

他在讀書的時候會去多些不同的地方，例如朋友的宿舍，到走讀生舍堂看漫畫和打機。現在工作，就只有上班、下班和回家，「當然也會到不同的飯堂吃飯，抖抖氣。」他又指出，「現在在學校工作，除了上堂，是不可離開辦公室的。」他說，中大這幾年好的變化是有較多設有升降機的新型大樓連接校園，「讓我比較舒適的從一個地方去到另一地方。」

他在中大最難忘的地方是以前住的宿舍房間，每天能跟同學在房間耍樂，互相取笑，現在最常聯絡的還是以前的房友。不過，現在因宿舍裝修，房間消失了。

他認為中大對於坐輪椅的同學應更留心，例如「有些行人路的地磚很不平坦，例如由火車站上崇基那一段，輪椅走在上面顛顛簸簸的，受不了的話便只能在馬路上行走，但這就有點危險。可以換上平滑一點的地磚就好了。」另外就是和聲書院，「它現在的設計是必須有看更陪同，穿過保安閘才能乘升降機到飯堂的，我每次使用都有點麻煩人的感覺。我想將來有新書院，可不可以所有的開放地方，都可讓坐輪椅的自己去

到，不用其他人協助。」

對於未來校園的規劃，他希望：「中大不要再起些古怪的大樓出來。而且中大亦應找些有點人文修養的人來管理。」他認為「這種人一不只求排名和他自己定義的狹隘效益，二不罔顧正義，文過飾非。」

他最後寄語中大同學：「繼續懷有道德感。即便說出來的理據一開始或有不足，或被人嘲笑，但這種知識上的瑕疵在學習上不難補足。可是道德感缺乏，上再多的堂也徒勞。」

六、理想中的中大應有更濃厚的人文氣息——Javier

Javier，2009-2012年唸本科，現唸研究院。就讀本科期間，活躍於參與課外活動，有一年曾上六支莊，冠絕中大。曾為中大學生會、中大學生報和青年公民社會成員。

他在讀本科的時候經常通山走，「因為我好鐘意Sit堂，所以會經常在新亞、聯合、崇基出現。」他經常開會開到半夜三更，約3、4點，然後返宿舍沖涼訓覺，但都堅持上八半堂，「通常八半都喺崇基嘅，咁上完崇基就通常趕轉堂巴上新亞，以前我個年代啲校巴無依家咁複雜，望到『新亞』、『逸夫』就識得上，家陣又6又7號，我試過趕住上新亞帶導修，唔識搭校巴而問同學仔，但係啲同學仔又唔多識，最後都係望住個路線牌一齊研究研究。」夜晚的話，在不同日子有不同活動，例如在四院劇社比賽時段，他就會經常上新亞幫手，有時又會去新亞國樂會，到大約夜晚10時就會去范克廉樓開會。

講到最難忘的地方，他認為莫過於生活得最耐的地方——宿舍。而最叫他難忘的是將近quit宿的時候，「夜游未圜湖！無錯，係『游』而唔係『遊』。果陣啲老鬼買晒水泡啊、浮床啊，叫埋班夠膽玩嘅宿生一齊落去未圓湖夜賞池色。」他說，即使現在唸研究院，仍不時想念以往的宿舍生活。

談到轉變，他覺得以前的中大好好。「同其他院校比較，中大的一景一物似乎都能自然融入到整個大學校園當中。」但他覺得現在的中大「變得同其他大學無甚分別」，因為「家陣啲新建築樓，好似TITB啊，CCS啊，TCW果啲[1]，就好似將啲商場搬晒入黎咁，而且內部裝修大而無當，就算有空間都好，似乎都唔係俾我地一班人聚嘅地方，搞到有時想一班人搵個地方坐、吹水都無。」

那麼，理想中的中大到底應該是怎樣的呢？「我理想中的中大係一個鳥語花香嘅地方，而且唔係中大人自成一角，而係社會上不同人士都可以共享我地呢個美麗校園。校園入面嘅一草一木，一間餐廳一種食物都希望有著中大嘅味道，呢種味道唔係真係好唔好食果啲，而係有一種人文氣息的浸泡，公平貿易、合作社、不同NGO等等承包左中大大部份的『業務』，學生唔使下下都要為抵抗

大財團、連鎖大集團進駐而不斷抗爭。而公共空間則係一種真正可以俾『人』去使用嘅地方，唔係連一個中大人想喺火車站附近空曠嘅地方仰臥片刻都被管理處驅趕。有心嘅老師同學生可以靈活咁使用中大嘅空間，舉辦唔同活動，例如論壇、沙龍、XX會、YY會等等俾中大人同社會人士參與，唔會因為行政同管理嘅問題而變得困難。」

最後，他寄語中大管理層：「能多聆聽師生聲音，唔好只從專業、資源分配等角度出發管理大學，而係從一個人性化的管理出發。雖然對於官僚體制龐大的中大行政架構而言有點困難，但知易行難未嘗不是一種大學的風骨。」

---

1 TITB為康本國際教學大樓及伍何曼原樓；CCS為鄭裕彤樓；TCW為李兆基樓

人像・群體



前言

◆ 陳秉鳳

本書第三卷首八個部份嘗試以議題區分，述說中大過去十年的發展及轉變。而「人像・群體」這部份的存在，是要追溯一些在整體論述之中，或未能仔細談及的際遇或因果。在這部份裡，我們撰寫及輯錄不同人物的訪問與描寫，希望為抽象的「中大人」形象，下一個與本書理念相符的註腳。

本部份一開始，是紀念已離世的周錫輝及逸夫怪婆婆的文章。前者在火紅年代入讀中大，一生春風化雨，直至逝世前幾年仍為著捍衛中大的理想和價值而奮鬥；後者晚年於中大浪跡，她特立獨行的一生，也見証著這片空間如何容讓與別不同的人，在此處默默追尋學問。

由於我們的能力與篇幅所限，並非所有符合揀選方針的中大人，也能收錄書中。我們希望能超越主流價值，如收生分數、畢業生薪酬、能否置業等等普遍的量度標準，故揀選出來的，大部份並非一般而言的「成功校友」。我們希望能展現各種值得參考的人生軌跡：這些人們帶著怎樣的態度去追尋學問？如何以身作則守住自己相信的中大精神？如何反思精英身份、應用所學，或思考社會公義、或走在基層身邊？他們的經驗，很多能呼應前八個分類裡面討論的不同議題，而訪問之間亦能相互比對，得出對同一問題的不同思考。

閱讀朱凱迪與葉宇堃的訪問，我們看到兩種不同的人生軌跡，前者於中大時吸取人文學科知識，享受校園環境；後者在學時參與學生報，讀過政治哲學。兩人後來一位成了社運人士，一位回到自己專長的電腦工程專業，赴美發展。二人都發掘到志向所在，一往無前，可是軌跡卻截然不同。接下來的兩位：歐陽達初及黃嘉靈，各有所專注的社會議題，亦是處於社會上的邊緣或偏鋒。達初於大學開始關顧基層、畢業後於關注綜援檢討聯盟工作，與社會上極受歧視的一群一起爭取權益；嘉靈於社會學系畢業，於鄉師自然學校任教，嘗試開創與主流學校全然不同的教育模式。而在活化廳幾位搞手的訪問裡面，讀者可以看到他們如何時常叩問自己於藝術系所學，與在活化廳這個「社區藝術中心」裡不斷摸索，且戰且走的過程。

大學斷然不應只是一個生產精英，使他們能向社會上層流動的地方，若不好好思考自身與社會的關係，畢業生最終只會成為建制的一部份，或壓迫基層的共謀。本部份的最後一篇文章，是楊穎仁所寫的〈CU始終有你〉，楊於文中一面寫下與一位中大清潔工的些許對話，一面不斷詰問大學生與基層的關係，為何勞動者得不到應有的尊嚴。以此作結，希望能使讀者再一次反思，攀過大學這個階梯，「中大人」們，到底應該走向一個怎樣的世界，成為一個怎樣的「自己」。

追憶我和阿輝的交往

雷競璇

原刊於《新亞生活》，2011 年 9 月

在 6 月 8 日晚上周錫輝的喪禮上，有一個追思環節，我準備了講稿，但當時由於時間不足加上參加喪禮的人為數眾多，不宜發言過久，結果我只讀出了一小部份。之後我將原來講稿略加整理，現發表如下，作為我對這位相交相知四十年的友人的懷念。

在今天的喪禮上，我要發言追憶和阿輝的交往，既心情沉重，思緒亦無比複雜，感到千言萬語也說不清心裡的話，但仔細思量，又覺得不知從何說起。我相信，在座諸位多少亦有同感。

我和阿輝認識，始於四十一年前，也就是 1970 年，在這一年，我們一同進入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阿輝在社會系，我在歷史系，當時的校舍在土瓜灣農圃道，規模細小，學生只有七百左右，同屆同學之間，很快互相認識，阿輝和我除了讀書之外，也關心社會，有不甘沉默、訴諸行動的性格，交往因而特別頻密。之後，只有 1975 至 1985 這十年之間由於我不在香港而只能魚雁往還，其餘時間我們都緊密聯繫，共同經歷了大大小小的各種社會運動。雖然稱不上事事共同進退，但在嚮往進步、追求公義方面，我們的確見解接近，互相扶持，達到李白詩句所謂的「相見情已深，未語可知心」的境地。現在人天相隔，而我又思緒凌亂，實在無法系統地總結這幾十年的相知相交，只能對一些零碎的片斷，略作回憶。

七 · 七保釣大示威

我們在大學就讀的幾年，也是香港學生運動開始蓬勃發展的幾年，經歷比較早的一次，是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而歷時較長、動員比較廣泛的，是保衛釣魚台運動。在今天的喪禮上，有一本紀念特刊，內裡有一篇麥洛新的文章，當中提及的一個情節，重新引起我的回憶。保釣運動在香港的一次重要事件，是「七七示威」，主要由專上學生聯會發動，日期是 1971 年的 7 月 7 日，借抗戰爆發的紀念發起行動，地點是維多利亞公園，這正是阿輝和我在大學的第一個暑假。當時法例禁止三個人以上的公開集會，所以這次示威屬於非法行動，警方事前警告，聲言必定嚴厲對付，各院校學生因而要想辦法避開警方阻擾，進入維園，否則示威無法舉行。阿輝和

我等一班新亞學生經過仔細商量部署，在當日黃昏，從新亞校舍的後門離開，避過在正門監視的警察，經由九龍城碼頭坐船到灣仔，再步行到維園，從其中一個側門將我們負責攜帶的橫額、標語牌等物品運入公園之內，示威行動因而得以展開。結果一如所料，警方強力鎮壓，不少人被打得頭破血流，記憶中有二十多人被捕，但阿輝和我都沒有被拘控。之後是警方對被捕者的起訴，審訊期甚長，阿輝和我每天到法庭聲援，其中有一天記不起是甚麼緣故，我們被拒諸門外，不能入庭聽審，到了中午時份，依然不能入內，阿輝和我開始忍不住，商量後弄來一罐餅乾，向守在門口的警察說要向庭內的人送食物，企圖衝進去，結果被一個洋警司連同幾個警員將我們兩人推出來。當時我其實有些膽怯，但由於和阿輝一起，才有勇氣作此行動。回顧在大學的幾年，類似的抗爭還有不少，但時日遠去，印象逐漸模糊，現在難以一一憶述。最近一兩年我隱約有個想法，希望通過檢索當年的報章、學生報和學生會等記錄，整理一下自己那幾年經歷過的學運，如果真的進行此項工作，阿輝是極好的伙伴，可惜現在是無法合作了。

入台被拒

1973 年，我擔任中大學生會會長，阿輝擔任新亞學生會外務副會長，當時學生會的工作，主要圍繞所謂「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這幾條主線。在這一年的暑假，我們組織了一個團準備到台灣，在當地的參觀訪問由國民黨的青年反共救國團作出安排，我作為團長。在申請期間，我收到一個電話，是台灣派來的人要查詢一些情況，約我在某日到大會堂旁邊的花園內的某張石凳見面。我抵步時發現是一個黑黑瘦瘦的中年男子，能說廣東話，但有口音，直覺上覺得是個退役軍人。他其實主要問一個問題，就是我有沒有去過中國大陸。我微笑著對他說，我明白他的用意，但不想說謊，向他說：當時的大學生，沒有幾個是不曾去過大陸的。而事實也的確如此，當年雖然還在文革期間，但有那麼幾年內地比較寬鬆，入境容易，旅費便宜，而大專學生對內地又非常好奇，每每趁假期回內地到處跑。結果我們這個台灣團在出發前夕，我這個團長被拒入境，由阿輝代為擔任團長。說真話要付出代價，對我來說，這一次是很好的體會。阿輝從台灣回來後告訴我，旅途中凡遇上官方，他們都提出抗議，他也告訴我，由於國語說得不流利，沿途也鬧了不少笑話。

兩次壯遊

不過，到台灣去的這一次共同出訪雖然沒有成功，過了三十多年，我們有了兩次一起壯遊的機會。首先是在 2005 年，我們參加一個人數很少、有歷險性質的團，到達新疆，從南到北穿越羅布泊，中間遊歷了樓蘭古城。當時是十二月，非常寒冷，我們又要在野外露宿，阿輝和我冒著零下二十多度的氣溫，瑟縮在一個單薄的帳篷裡，兩人都不敢入睡，怕睡著了會被凍僵，從此不再醒來。第二天天一亮，阿輝就爬起來在野外打太

極，然後跟我說覺得渾身暖和。對我來說，這一次遊歷是難得的體驗，相信阿輝也是難以忘懷。我這兩天得到上水喇沙中學贈送的一本建校四十周年特刊，2006 年出版，阿輝在這所學校任教了近三十年，當中十一年擔任校長，因為不幸遇上學生欺淩事件，在 2004 年請辭後退休，在這本特刊裡，有一篇阿輝以前任校長身份撰寫的文章，題目是《羅布泊 · 校慶 · 聯想》，文內用在羅布泊見到的胡楊木勉勵學生。我由是明白到，這一次遊歷在我們兩人心中，留下同樣難忘的回憶。可惜我們拍攝的照片不多，這是由於天氣太寒冷，我們帶去的照相機常常不能運作。我本來想找出一張和阿輝合照的相片，結果沒有找到，這裡提供的是阿輝在羅布泊湖心的留影。羅布泊古代是個浩瀚的大湖，由於各種原因在七、八十年代乾沽了，湖心就是最後一灘水蒸發掉的地方。

然後是 2007 年的夏天，我和阿輝還有幾個朋友，租了兩輛四驅車到內蒙古闖蕩，從包頭出發，向西走，穿過鄂爾多斯草原，到達河套，參觀完黃河中間的胡楊島後折返包頭。在喪禮上派發給大家的紀念特刊，有一張阿輝在鄂爾多斯草原打太極的照片，我非常喜歡這張照片，覺得很能體現阿輝的氣質。中國的西北地區和我們南方不同，歷來有所謂「北人質樸雄偉，南人文彩綺麗」的說法，我覺得阿輝能夠將兩種氣質糅合，既有赤子之心，又有大丈夫氣慨。這兩次的壯遊，現在成了我珍貴的回憶。

批評校政

最近這幾年，阿輝和我合作得比較多的，是對中文大學的倒行逆施，進行嚴厲的批評。大約從 2005、2006 年開始，這些倒行逆施，連綿不絕，首先是借發展校園為名，濫伐樹木，然後又以重建書院制度為藉口，設立幾間新書院，目的看來主要是借此向富豪和大企業籌款，以及結合學制三改四的機會，盲目擴充；最令人不能接受的，是以國際化為名，改變中大歷來的教學傳統，放棄以中文作為主要授課語言。我們一群不同時期畢業的校友，覺得情況嚴重，於是組成一個關注小組，提出抗議，阿輝從小組一開始就是主要成員，擔任發言人，出力最多，也因此成為了令中大高層感到頭痛的人物，紀念特刊內收錄了兩篇阿輝的文章，都屬於此一時期的寫作，很好地反映了他和小組其他成員的意見。我們在青年時代都因為有中文大學的存在而得到培育，對中大懷有深厚的感情，不希望這所在我們心目中本來有志氣、有使命感的大學，淪為政府的尾巴、財閥的附庸。幾年下來，我們的據理力爭得到甚麼成績，實在不知道，也不敢心存僥倖，因為畢竟大氣候、小氣候對我們都非常不利，但有一件事我倒是比較肯定，這就是透過阿輝的熱誠參與和積極活動，令到和他有所接觸的年青校友以至在校同學，體會到中大學生歷來引以為榮的不平則鳴、不畏權勢、敢於抗爭是甚麼樣的傳統。教育是薪火相傳的事業，我覺得阿輝的言行舉止是薪火相傳的極佳示範。

探訪羅湖

今年四月初，阿輝邀請我們夫婦到羅湖探訪，這是我們雙方說了不知多少年之後，我們第一次到他羅湖的家，他引領我們參觀他不久前重修好的祖屋，又帶我們參觀屋旁的沙嶺墳場，沿途和老幼鄉親打招呼，當時是暮春，山頭上幾株宮粉羊蹄甲開花開得很燦爛，遠處還有幾株高大的木棉樹，也是開了滿樹紅花。沒有想到，這是我和阿輝最後一次見面，冥冥中的事情，真是說也說不清。阿輝經常往來羅湖和馬鞍山，我住在大埔，剛好在兩地中間，他不時在途中經過我處，往往在門口大聲呼喚，我開門出來，大家聊上幾句，或交換點甚麼東西。他離去後，此情此景，不會再出現，我感到無比失落。死亡是大家共同的歸宿，只是誰也想不到，阿輝走得這麼早，成為同輩朋友中最先辭世的一個。天意難測，天心難逆，真是無可奈何。最後，我想朗讀一首北島的詩，作為發言的結束。我並不特別喜歡新詩，但北島這首早年寫成的詩，很能表達我心底的惆悵無奈，以及理也理不清的思緒。詩的題目是「一切」。



攝於 2008 年保留烽火台集會。

一切

一切都是命運
一切都是煙雲
一切都是沒有結局的開始
一切都是稍縱即逝的追尋
一切歡樂都沒有微笑
一切苦難都沒有淚痕
一切語言都是重複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一切愛情都在心裡
一切往事都在夢中
一切希望都帶有注釋
一切信仰都帶有呻吟
一切爆發都有片刻的寧靜
一切死亡都有冗長的回聲

（2011 年 7 月 8 日再修改）

校園的流浪學人：中大怪婆婆

◆ 莊耀洸、譚棨禧

本文大部分內容主要參考中大校友莊耀洸於《教協報》兩篇專欄〈中大五十年一人物〉（2013 年 11 月 4 日）及〈中大南海十三婆〉（2014 年 4 月 7 日）。

中文大學五十年，芸芸員生之中，除了名流與高官，還有遺世獨立的人物，例如怪婆婆，後來又稱逸夫婆婆。她在中大浪蕩數十年，在校園飄泊終身。她出席各大小研討會、旁聽無數課堂。在山城不同角落，也見到她的身影，她早已成為中大名人。

2011 年 7 月 17 日，婆婆在九龍殯儀館出殯。從此，她只能成為中大人的集體回憶。婆婆雖然名不見經傳，但其實衣著講究，顏色鮮豔，配搭大膽，引人注目，連青年也望塵莫及。婆婆居於赤泥坪村，有同學首次遇到她是夜闌人靜的幽暗山頭，被婆婆嚇得魂飛魄散。

她為人低調，不曾聽過她透露半點身世，亦不肯讓人拍照，但她很樂意在研討會後大合照。她是迎新營中組長常介紹的人物，一些報刊或八卦雜誌想追訪她，她總是避開。她隨身左一袋，右一袋，一不留神，她這些行裝會被工友當垃圾丟掉。這多少反映她在一些朋友心中，是個校園拾荒者，亦偶有不識相的部門主管欲阻止她參加研討會，以為她只是「鑊飲鑊食」的窮人。

范克廉樓學生組織的朋友，偶然也能跟與她相處。她對大家說，她叫阿 May。原來她是秦茂端（1929-2011 年），後來叫秦孝嬰。其父秦更年（1885-1956 年）為同盟會成員，其入會證書見諸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既是銀行界中人，也是藏書家、印壇名宿和詩人，部分藏書為南開大學所獲。秦茂端在 1944 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1950 年取得美國印弟安那大學的科學教育碩士。1956-1958 年在崇基學院教授數學，1957-1958 年同時是新亞書院統計學講師。錢穆在 1958 年亦為秦茂端赴美教書而寫推薦信，從 2013 年底啟用的新亞校史館網頁，可在早期教師名錄中找到她的名字，在 1959 年及 1960 年的《新亞生活》中，亦可見她參與校園生活點滴。

校園傳聞她被丈夫拋棄後，便在中大流浪。但經多方打探，未聞她曾結婚，相信

這是謠言。她選擇後來特立獨行的個人生活，未知是否與她母親逝世有關。五十年代，秦母打算暫居香港而以難民身分移民美國。秦茂端為母親移民多番奔走，一切努力，隨秦母逝世而付諸流水，或許秦茂端的生活，因而從此改變。

其實阿 May 不是流浪者。除了數學，她還曾在大學的校外進修學院講授《易經》；參與研討會，是她的興趣，是她對知性的追求。

2011 年初她患癌病重，身上的膿瘡徐徐發出惡臭。《中大學生報》的同學為她找來輪椅，陪伴她來回中大和赤泥坪，甚至致電校長沈祖堯求助。沈校長亦願意幫忙，只是婆婆不領情。據悉梁秉中教授也出馬勸她，成功令她自願入院，但她未及做手術，身體已支撐不住，終在 6 月 9 日早上於北區醫院逝世。

中大校友在面書發起悼念婆婆專頁，短時間有 1,500 人加入，送別這位既熟悉又陌生的婆婆。阿 May 是上世紀不落俗套、在艱難的世道裡，靜靜劃出天地的中大人物。有云小隱隱於野，這也說明過去的中大多少是與世道無爭的山林。她的身故，象徵著那個中大草創時代的，默默的終結。這篇紀念文章不一定得到真正低調的阿 May 歡心，但在歷史化為灰燼之前，我們希望說明，她從來不是怪客，而是這座茂密的山林裡，涓涓流水中的一點一滴。至少，曾經，這所大學有著容納不平凡的生命的胸襟。

宅男的怒吼

◆ 訪問、整理：陳秉鳳

朱凱廸（阿廸）受訪無數次，但訪問中有提及他在中大時的事的，其實不多。他不是學生組織成員，可是本書卷三收錄的重要事件中，有兩件事阿廸都有份發起及推動，那到底是為甚麼？仔細問及他大學的時光，就發現，那段時光很難敍述，不易總結。

阿廸 1996 年入讀中大，主修英文，副修中文。1999 年畢業後，在報館做了幾年國際版編輯，其後去伊朗學波斯文，回來後開始加入社會運動，2006 年中大保樹立人、2006-2007 年保衛天星、皇后碼頭，2008 年回中大反拆烽火台，2009 年反高鐵保菜園村運動，至今他仍在關注新界各處的大型規劃、迫遷事件及有機農業發展等等。

運動員 · 教會 · 孤僻的大學生活

「中學時，我本來是想做運動員。那個年代興一種運動，叫『運動攀登』，剛剛那時，鍾建民和湛易佳登珠穆朗瑪峰……」這和他喜歡大自然的性格相當吻合。他中學時，就沉迷在攀石、行山、露營等活動之中。

但我們都知道，他並沒有當上運動員。高中時，阿廸進了一個基督教會，完全改變了他的生活。除了放棄當運動員，本來讀理科的他，因為考慮到將來可能要讀神學、走傳道人的路，亦放棄了選讀環境科學相關科目，進了英文系。

教會生活，在他大學生活頭兩年佔了很重位置。當時他的教會希望發展在中大的佈道隊，他也很熱切地參與其中。即使在英文系裡，他最熟稔的朋友，也是基督徒小組裡的組員。教會這一塊，若要深入講下去，恐怕就離題了，我亦沒多問。但這一塊可提醒我們的，是阿廸這個人，一想做甚麼，就一頭栽進去，非要到「沉迷」的地步不可。

「我有另一面是孤僻……熱愛文學，想浸淫在文史哲之中。」他的大學生活，還有另一塊最主要的，就是學習。理科出身，文學底子差，相比其他同學會感到自己膚淺，但他非常享受在英文系讀書的過程。他副修中文，也旁聽哲學系的課。在選讀老派教授的課時，像中文系的佘汝豐老師，是令他頭暈轉向，又非常仰望的：「他們是中大特有的生物，

他們的學問系統與現在那種（要寫論文那些）是無關的，佘生教韓愈文、柳宗元文，像是他要寫出那種文章。」

他說他和中大的關係，三年只是開始。他以自己的經驗，領悟出一種中大精神：「在香港這個甚麼地方都充滿嚴密管理和規矩的城市，中大還剩下一點外面難得的寬容。畢業後多年我還可以繼續在這個地方生活、工作、讀書、聽課，還會碰上不少和自己差不多的怪人。」

畢業後在報館工作那幾年間，放假日子多半不是紅日，他常常選擇自己一人回中大泡圖書館及繼續旁聽。「會留意到一些人好像我一樣，總是會回來，佈道隊也有朋友，畢業十年，但在中大流連，住赤泥坪，過他的一種中大生活。」在他眼中，這些人的狀態，亦是中大承傳的一部份。「像一個容器，容得下這樣的群體。像老教授，不出文，用他們的方法做學問，很受尊重。中大是一個寬容的地方，因為有這種寬容，如果我有很多時間，有條件，我可以一輩子在這裡追尋學問。」

那種精神，與中大的環境也有關。「有很多不為人知的角落，可以躺著不與人接觸。中大和我喜歡的環境是很接近，高山、荒野、一個人去露營，面對風雲變色。」

踏上社會運動之路

阿迪的人生軌跡，有一種規律，他說：「我有某些追求，而我覺得我是永遠追不到的。」於是想做運動員時，嚮往世界第一高峰；入教會，覺得要成為終身志業；讀書，也永遠讀不夠，離校幾年，在開始參與社運前，不斷回中大，上未上完的課。畢業後在報館做國際版，一直躲在報館中翻譯全世界的新聞，卻覺得離世界愈來愈遠，於是辭職後決定去伊朗，去看看那個充滿紛爭的真實世界。

大學三年級後，他離開了教會組織，大概是讀過幾年書，以及經歷不同際遇與思考，對人生的路向有了不同選擇。到了後來，為甚麼又會走上社運之路？

阿迪在中大時，沒有參與任何學生組織，也和傳統學運扯不上關係。他說他當時也關心時事，個人而言也會參加遊行。不過那起點在更早，在八九六四，與家人一起去遊行。對他來說，參與遊行政治性不強，算是平常事。沒有參與學生組織，他說一來因佈道隊的工作，不能抽身，二來也覺得要自己和別人溝通辯論是很困難的事。反四改三、金禧事件那種火紅學運，在他的中大經驗裡，是沒甚麼位置，亦感受不深的。而當時的社會氣氛，因剛剛九七回歸，他覺得大家都在一股迷惘當中，既不是八九時的熱情，也未到零三七一時的憤怒，夾了在中間。

「（2005 年）在伊朗回來，想重新參與學生會、社運那些東西。這可能是個長久以來的願望，以前一來覺得自己距離好遠，二來覺得自己一個宅男入去好奇怪。人大了，我比較能去調整我自己內心的糾結。我覺得應該要做一些事，很基本

的，一個人在社會上生存，就應該做一些事。而那在我的想法裡，就是參與政治，參與社會運動。」

他主動去找機會，先去了社會運動電影節的放映，認識了一些社運朋友，幫手做一些翻譯工作，亦參與了2005年時世貿部長級會議期間的抗爭。後來中大國際化事件時，他也有參與一些講座，認識了林藹雲等關心中大事的朋友。及後就加入了香港獨立媒體編輯部。

保樹立人　宅男的怒吼

「保樹立人，其實是一個宅男的怒吼。」2006年保樹立人事件發生前一段時間，他說他以「宅男的敏銳眼光」，看到校園開始改變。先是崇基圖書館旁邊的閱讀室，廁所裡本來有些很特別的尿兜，全被拆了。接著全間圖書館裝修，他很深刻的一個畫面，是在圖書館周邊，全都堆滿了準備棄置的枱椅。「我很不開心，覺得好浪費，其實那些東西是寶，大英圖書館都會留著從前馬克思個位！那些坐過的枱椅是不能丟的！」我說，那是不是好像宅男的手辦公仔，全被丟出街外？他大笑著點頭。

「我為此做了兩件事，一是執了兩三張椅回家，第二是決定我一定要報仇！」之後事件就去到當時的學生會發起「齊來保護我們的山城」聯署，當中披露了校方將為擴闊池旁路，斬掉許多樹。「枱椅你都丟了，還要斬樹？」他的心情，大概就是這樣的。他覺得要做些事，於是找了當時的學生會會長施城威，也聯合之前認識的校友，一起反對中大斬樹。

他說，那時候常有人以為他是學生會系統出來的人。他算是一個例外，廿幾歲，工作中，卻在搞另類的「學生運動」。非學生會體系出身，對他來說也有些好處。他覺得學生會有一套慣常的做事方式，與一般傳統壓力團體相若，即開記招和示威之類，同時間學生會要介入的議題很廣泛，就像一個小政府，甚麼都要有立場。他不用跟循這些傳統，可以從自己對中大的情感出發揀選議題，亦能嘗試以不同方式去推動改變。

「但我個人的經驗，很容易被忽視和摧毀，所以我才會爆發，然後我要把道理說出來。」他開始寫新聞，掌握事件的資訊，與校方人員對質。當時他所寫的報導，動輒數千字，亦在獨立媒體網站上嘗試做網絡動員。「（保樹立人）雖不算是一件大事，但嘗試了這套方法，對往後其他事會有啓發性。」

珍惜中大這個社群

他參與的兩次事件，都成功阻止了校方原先的計劃，池旁路的樹當時沒有斬，後來烽火台也不用遷移，反而是校方修改了圖書館新翼的設計。「我是很滿足的。其實我很感謝中大，你是很容易贏的，那種贏，是一種交流／對話。對話後有回應，有個結果與真實的校園相關，那是很重要的過程。那個進學園（圖書館新翼），現在的設計可能未必是最好，但在學校社群來說是很美好的事。」



「這些好的經驗，一兩次，足夠我捱很多年。那種能量，滿足感，能頂住之後十年的不愉快不成功。我是微不足道，但對一個微不足道的人來說，那是很重要的。」對他來說，民女事件也是一樣，「香港有個中大這樣的地方多好，我們做一件『蘟居』的事，擺一個這麼核突的東西在火車站。作為一個社群，能有這種事發生，是一間大學，需要傳承的重要寶物。」

校方在後來也有搞些規劃工作坊，吸納反對意見，但去參與過就知道沒甚麼意思，因為所謂參與規劃，其實都是經校方操縱（manipulate）的過程。「但校方在面對抵抗時的做法，會允許保留一些東西，中大這種累積的歷史，在其他地方很少有這種機會。其他地方很容易讓這些事過去，一棵樹被斬，在別的地方不會受這樣的質疑。」

「一個群體的互相感應和默契，是對環境敏感，價值觀也會透過環境而傳承下來，所以到環境被侵害時，就會有人覺得不妥，做一些事去反應，而這種敏銳度，和我們看社會事亦是有一定相關性的。」他說。等如他看到周錫輝師兄等老校友，反對中大建新書院時的激動，就知道那裡有另一種情感在發生作用。對他而言書院並不重要，但他可以明白老校友們的執著。

在烽火台事件後，他又似乎沒再關心中大的事。「後尾我覺得自己超齡，無再

繼續參與，但無參與，不會阻礙我覺得我仍是這個群體的一部份，我現在回來這裡仍是覺得很輕鬆。」不過他也說:「其實很多東西我都看不到，如外判制。我若可以重來一次，我會希望和在這裡工作的人有多點交流。」

大學應該是先鋒

最後我問到阿迪，對現在中大的感覺。他認為正因為大學是一個較為寬容的空間，所以應當是一個能實驗怎樣解決問題的地方。他提到關於現時香港甚囂塵上的中港問題，大學裡有不少內地生，在這個空間裡面，是否可嘗試用一些不同的方法，解決中港間的矛盾對立？「現在香港社會為這個問題在爭拗，在互相攻擊。大學就應該，像保樹立人一樣，在大學保一棵樹，才懂得在香港裡保樹。我們應做社會的先鋒，去產生一些新的講法去回應社會問題。」

回看阿迪在中大的經歷，其實不過和很多同學一樣，埋首讀書，覺得學生會、學運那種東西離自己很遠。那時候他雖然未準備好參與其中，但一切仍看在眼裡，並對中大的人文價值、自然環境、歷史、建築等有他自己的體會。在他當過記者，遊歷伊朗後，才開始身體力行去介入，去維護中大的環境，以及相對整個香港社會而言，他感到包容性較大的這個社區。現在也許很多人看到電視上的「社運人士朱凱迪」，都會覺得「像他那種人，當然能搞政治，我就不行了」。但其實他在訪問中，開口閉口說自己是一個宅男，喜歡一個人獨處，有些戀物怪癖，而非甚麼奇人異士。我們能在他身上學習的，可能是那種致命的認真，以在困難重重的情況下，仍要保護珍惜事物的勇氣。

不為威風

◆ 湯映彤

「要不是我想要威風，我今日斷沒可能行到這一步。正正是我想要威，我才會毅然離鄉別井，到美國適應新生活，努力多年，不辭勞苦，犧牲髮線，成為別人眼中所謂的 high-achiever。亦正因為我個款像個 high-achiever，科技公司才會對我有興趣而招我入伍，我才會得到今日的工作。可是，很吊詭地，到此時此刻，我卻要反其道而行，為了令自己不要氣餒，我要學習如何不要為威風而工作。」

——葉宇堃，〈要擁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1]

Justin（葉宇堃）是我在學生報同屆的莊員，2002 年一同入讀中大政政系。記得在報社的時候，有位老鬼常稱他為「少爺仔」，靚仔之餘數口精，又有點招積。Year3 他轉讀自己最擅長的 Computer Science（計算機科學），2006 年畢業，2007 年隻身到美國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後任職美國最大科技公司之一 Google 的 software engineer，年薪過十萬美元，在經濟主導的主流定義下，可謂跟「成功人士」沾上了邊。

電腦白痴的我，越洋電話訪問的第一句，問到底 Software Engineer 實質上是幹啥？「寫 programme，就是『老點』好多部電腦一齊幫你做嘢。」Justin 說基本的工作是不斷設計新的程式，為用戶配對適合的廣告，令「看的人開心，客戶更開心」。除了要遷就時差，跟全球各地的同事開會外，工作時間算有彈性。在大公司工作當然很「爽」，可以「閒閒地叫一千部電腦幫你 run 嘢，而做的事又好似對世界很有影響」。除了薪高糧準、穩穩定定之外，大公司亦為員工提供了大部份生活所需，包括一日三餐、做 gym 洗衫，「整間公司的設計就是盡量方便你，提升你的生產力」。

做自己想做的事

人在異鄉，錯過了很多熟悉的人和事，沒有親朋戚友、交際應酬，「好處是可以很專心的做好一件事，或學好一件事」。工餘時間多，Justin 近年開始炒股票，亦嘗試設計自己的程式，計算股票的升跌，用真金白銀考驗自己的頭腦眼光。程式未盡完善，累他賠錢，他說：「因為工作時有很多自己控制不來的事，Google 每年賺二千多億，大部份來自廣

告，所以很多人看著你做的事，不可以亂來，犯一個錯就會令公司蝕很多錢。想做自己可以控制的事，唯有寫自己的 programme，也包括選擇去輸錢。」

靠自己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事，Justin 說這是九龍華仁書院放任式教育的成果。中學時期參加電腦比賽得過很多獎項，「係，係好 Q 多，但學校一啲表示都冇，起初好唔慣，後來讀完大學先諗通咗，發覺我做好多野，都係因為自己好想做，而唔係因為人地叫我去。我想達成目標，就會去做，最多咪仆街，冇乜大不了。」而中大對 Justin 來說，也是一個「可以容許人躲起來，做自己的事」的地方。隸屬逸夫書院，宿舍地理偏遠，「入了去就不會出來」，而轉讀 CS 的兩年，「很多時是全晚躲在 lab 工作，天光吃早飯，然後回去睡，睡醒又繼續做。發現這樣去做好一件事，對我來說是很有趣的。」

「中大的 engine building 也給人『生人勿近』的感覺，彷彿讀電腦的，全都是不懂說話的怪人。」香港的尖子，往往對金融商科趨之若鶩，誠心選讀 CS 的人其實不多，「電腦不易讀，如果純為搵錢，對寫 programme 沒有興趣，很難會成功。」Justin 說在美國，engineer 是一個很受尊重的工作，「你甚至會覺得自己是整間公司的中心，這裡可以 collaborate 的人，可以 make 的 impact 實在相差太遠，在香港很難會有這樣的環境氣氛。」

無力與僥倖

雖然時常感覺到香港那種「家的呼喚」，但實際上甚麼時候回流，卻無任何計劃；而即使從頭再揀，他也會選擇到美國去。「在香港，做 IT 只是一些輔助的工作，被人說是宅男」。人在美國，綠咭申請仍未成功，交了很多稅，但大部份福利都無法享受，「就當是買這裡的清新空氣，我唯有這樣對自己說。」不喜歡城市，他說在美國「空氣好、環境好、天空大」，但社會上每日發生的大小不平事，卻不會很上心，「好像在看 Friends（美國經典肥皂劇），只會覺得美國人硬膠。」

反而遠在香港的事，如梁振英上台、日益嚴重的政治檢控等等，卻往往牽動著他的心情。「會很擔心，一個我生活很久、很喜歡的地方，居然變成這樣。我不懂形容怎樣才是理想的狀態，但會希望它不是現在這樣。」話雖如此，他的心情其實卻很矛盾，「一方面慶幸，自己可以選擇不在這裡；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能為這個地方做到點事」，隔著萬重山，說到底也是覺得很無力。

名校出身、家境寬裕，讓他可以選擇去美國、選擇自己喜歡的工作、選擇過自己想過的生活，我問 Justin 有否覺得自己很 privileged？「最 privileged 的地方是，我生於這個年代。我記性很差，說話也不流利，而我擁有的能力就是寫 programme。如果在一百年前，我也不知可找甚麼工作；竟然，一百年後，地

球出現 programmer 這份工作，叫人千萬不要記著過去的東西，因為 google 一兩下就可以搵得到。」

顛覆和成功

回想在中大，讓 Justin 看到兩個極端：他一方面參加扶青團（有錢佬搞社團之大學生版）、到 Morgan Stanley 去實習，見識到「原來哩個世界啲人，可以咁 Q 有錢」；另一方面在報社和政政系，卻令他意識到「原來資本主義又有幾 X 邪惡，原來我地一直都不知不覺地被資本家剝削，靠壓搾工人的剩餘價值來獲取利潤」。記得當年曾一起上過 SY（馬樹人教授）的課，讀過權力和制度，對知識和人的操控，「佢堂堂都講『顛覆』，我都好想顛覆一啲野。」

我問他現在怎樣理解顛覆？「嘗試做一些全新的、世界上沒有的東西，例如 Steve Jobs 推出 iPhone，那一刻對世界的影響真的很大，電話變得多用途，也佔據了生活的更大部份；Google 也是一個很厲害的發明，顛覆了你對 email、search engine 的想像。」科技的發明，可能最後也服膺全球市場運作，鞏固資本權力的固有秩序。掌握著科技的生產技術，所以 Justin 說他不太介意。對他來說，建制和權力的存在，是大家都想顛覆、又顛覆不到的結果。「在報社和 SY 的課堂裡，常說要顛覆／要挑戰常規，但一踏出課室和范克廉樓，就無人會理會／明白我所做的事，我就發現『顛覆』其實談何容易。」

Justin 說 SY 的課讓他學到的「是會去想，為甚麼一個人在他本身的位置，會去做某個選擇。現在遇到很勁的人、同事，也學會要去調整自己的心理。」在美國研究院四年，終於博士畢業，姓葉的英文 Y 字頭，等了成個鐘，都未輪到他上台。「那刻，我才明白，黃子華所講《茄哩啡的一生》意義就係咁。我一直以為自己好重要，以為自己好勤力所以想得到所有，但其實同一時候，地球上嘅好多人，都係一直同一樣咁努力。我諗到嘅野，好多人都一樣諗到。」在既有的價值結構內，總覺得比上不足。讀理論，從權力的角度去理解世界，若沒能顛覆自己對價值的想像，理論就只會是切入現實的某一種觀點，除非主動思考，怎樣創造另一個現實。

「我會羨慕一些人，有膽量離開自己的 comfort zone，去 build 一樣東西，哪管它是甚麼。十年後回頭，(那過程和經驗）成為了值得回味的故事，這就是我想要的成功。」行文之際，看到 Justin 博客上的新文章，說他已辭職準備加入「菌型」start-up 公司，放棄大公司的高薪和穩定，一腳踏上賊船，意味著將要面對傳說中 near-death 的壓力、如過山車的經歷。 文中說，他希望「無論成功失敗，埋單時總有個屬於令自己回味無窮的故事[2]」。發明和創新，若不問意義、沒有動搖既有的秩序，那麼，顛覆和成功之間，看來其實也不矛盾。靠個人的膽量和能力，創造傳奇，到底是否為了威風？或許只有自己才知道。

重要的是……？

帶著時差做訪問，說了兩個多鐘，他那邊已近半夜。臨收線，他奇怪我沒問關於報社，「如果中大只讓我揀一件事去做，我會選報社。」嘩！咁誇？剛起床的我反應有點過大。「從搵錢、或學術研究的角度，在報社所遇到的事真係冇乜用。正正因為咁，在報社認識的人、見識到的事，是我這輩子也沒有其他機會碰到的。因此，好重要。」

重要的，是作為個人的回憶匣子裡，其中一件收藏？或是改變自己和現實的開始？評論別人之前，也讓我先想到自己走過、截然不同但曾經相交的路。有用還是無用，也許每個人在自己的路上，繼續走下去才會知道。踏入三字頭，「不怕別人覺得自己蠢，如果做到這點，就已經自由了很多。」

不為威風，關乎自己在既定的社會位置上，怎樣看待別人。若顛覆是為了自由，但只把別人看成競爭對象、會覺得自己蠢的心理包袱，或許就只能在金權至上的既有結構內，消極地掙扎；若能積極地，把別人看成改變的力量、自主的靠依，或許，我們才可在資本壟斷和控制的罅隙中，找到自由的可能。

1　葉宇堃，〈要擁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香港經濟日報》，2013年6月9日。

2　葉宇堃，〈一天清一天風雨飄〉，http://yipjustin.wordpress.com/ ，2014年2月16日。

其實我地欠左佢地
——訪關綜聯組織幹事歐陽達初

Kelvin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12年迎新特刊

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所做的統計，目前香港貧窮人口已達到 120 萬人，情況極為嚴重[1]。我們這個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社會裡，衣食住行愈來愈昂貴、工作工時極長、退休沒有保障、愈來愈多公營業務被私有化(如領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而所謂「基層」，就是最缺乏社會資源、最身受其害的一群。

歐陽達初所屬的關注綜援檢討聯盟（下簡稱「關綜聯」）的辦公室，跟我所認識的一些基層民間團體一樣，只租了舊大廈的單位，工作空間比較狹小，貼在牆上的 schedule 排得滿滿的。關綜聯一直抱著「助人自助帶來希望，據理力爭帶來公義」的信念，致力組織不同地區的基層街坊，共同關心社會不公的狀況，爭取一個更合理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2]。

達初加入關綜聯至今，已有 7 年。他中大社工系畢業後，大可選擇當社署的社工或到大型社福機構工作，卻偏偏選擇留在關綜聯，在狹小的單位裡每天聽基層街坊心聲，跟他們一起踏上爭取社會公義的漫漫長路。究竟是甚麼讓他堅定不移地，投身推動社會平等的基層運動？

在基關組找到新道路

2003 年，非典型肺炎（SARS）奪去數百條人命、50 萬人上街反對 23 條……當年深受社會氣氛衝擊，就讀社工系的達初，基本上完成了本科的課程，雖讀書時已有接觸基層議題，卻有感知識和實踐的不足。解決了家庭的經濟問題後，他就決定在大學多留一年。

他既讀了一些社會學系和文化研究等非本科的課程，充實自己的理論知識，也加入了中大基層關注組（基關組）:「真正開始關注基層並感到很有使命要投身基層運動，是大學第四年的時候。那年誤打誤撞加入了基關組，得以用另一個角度去理解和回應基層問題。」他明白到，只靠一般主流社會服務常說的，針對個體的「扶貧」，而不改變整個社會體制，是無法解決基層問題的。他不認同一種傳統社工個案式、施與受的「你好慘我黎救你」的工作思維，認為基層運動應有理論支持，而且要將矛頭指向牽涉到社會整體的、導致貧富不均的資本主義體制。

知難而進

他的大學第四年，當時社會在爭取最低工資，他曾跟隨基關組到屋邨做清潔工組織工作——探訪清潔工、做問卷調查了解他們的處境，連結不同工友支持最低工資，因而接觸到一班外判清潔工：「基本上他們是邊緣勞工之中的邊緣。即使他們受壓迫，很多工友都未必認同，我們這些大學生跟他們說：『喂你都比老闆剝削緊啦，不如一齊起來抗爭吧！』」工友的反應不太理想，使他開始明白基層組織工作的路有多難走。他記得，對他影響深遠、曾是「基層大學」[3]職員的蘇耀昌當時跟他說過：「我們（大學生）之所以要投身基層運動，唔係因為佢有得搞，其實基層運動好難搞。」

他指出，基層運動一直都不是處於歷史舞台的最前面，尤其是這十年間，可能有其他運動（例如爭取普選）更吸引、更波瀾壯闊。「基層運動也許走一步退兩步，始終我們處於很弱勢的位置，在社會沒甚麼發言權，短期內也許做不到革命性的工作，例如組織工友佔據馬路去推翻一些東西。」他知道，若要推翻不公的、讓富人橫行無忌的體制，就很需要跟社會最無權無勢者走在一起，透過長期的互相了解、支持，做細水長流的組織工作，慢慢壯大成足以徹底改變社會的力量。

但他為何不選擇工作相對上容易、生活較安定的社福機構工作，而要投身基層組織工作？他固然也有實際考慮：「坦白講，如果這些基層團結如果唔能夠令我維持到生活，咁都的而且確係好難揀。」大學最後一年，熟悉貧窮議題的社工系教授黃洪就介紹他到關綜聯幫忙，他接觸過關綜聯後，就知道這種團體其實也能讓他維持基本生活，「生活是你選擇的。人人要買樓，你可以不買。」能夠維持生計，加上對社工這個身份的執著，以及基於知識和經驗的、對基層組織工作的理想，使他開始有長期投身基層運動的決心。

「我唔係要批評唔喺呢啲團體工作就唔係社工，只係對我黎講，我地喺呢啲地方，先搵得到自己嘅存在價值。」

基層與大學生

另一個使達初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原因，是覺得自己對基層、對社會有所虧欠，「簡單啲黎講，我地其實欠左佢地。我們作為中大學生，可能讀書好『叻』，但其實之前踩住好多基層青年上去；我們每年得到的社會資源，比基層街坊、工友、領取綜援的人多很多。」很多基層家庭也因缺乏社會資源，子女少了一些補習、上興趣班等在現今教育制度下得到優勢的機會，有些甚至要在放學後做兼職幫補家計，或要花時間照顧其他兄弟姊妹。加上考試制度本身也有不公和考運氣的成分，我們這些中大學生之所以能夠有現在的位置，其實牽涉到社會整體資源分配及教育制度上的種種問題。但既然我們已得到做大學生的優勢，不用被迫投入勞動市場，其實就有身位促進社會公義。

他稍稍停頓，然後笑說：「但我們其實沒有對社會實質生產作出甚麼大貢獻，又沒有做甚麼實質勞動幫助社會……既然有一個機會讓我們投身這些組織，我希望用我的歲月參與基層運動。」

他亦清楚自己不算是狹義上的基層，「不過我可以有基層意識。我選擇（畢業後）不要做社會的精英。不做專業人士、不去不斷向上爬，係唔洗死的吧。」因為對一級踩一級的社會現況感到不滿，他反對大學生認為自己高人一等：「有些大學生覺得，自己畢業後的待遇理所當然地要比基層好。記得去年實施最低工資後，一個訪問裡面有大學生說，覺得自己跟基層的薪金差距太少，因為一個大學畢業生可能只找到薪金一萬元的工作，但做保安都可以有八九千元，很不公平。但我們其實太習慣，這社會容忍甚至歡迎這種貧富差距。其他很多這種差距較小的地方，社會可以更平等更團結。」可見他不認同個人主義，希望人人都可以追求社會整體的改革。

重複　但刻骨銘心

基於以上種種原因，達初畢業後便全身投入關綜聯，與基層市民一起打拼。在關綜聯工作的七年間，達初認為最深刻的，是一種重複。有別於很多政黨、商業機構和社福機構，他們接觸的人和事不會很新鮮。例如，他們習慣每當政府發表財政預算或施政報告，他們就要做一些行動去回應，平時則要持續落區為基層市民搞組織、搞小組、搞學習班。年復年，日復日。「雖然工作重複，但其實不會令人很厭倦。因為，我開始覺得重複或有點悶的時候，當一些工友或街坊有血有肉的生命歷程放在我面前，使我看到資本主義對人、家庭關係和社區所造成的異化和剝削有多大，這些故事就會刺激我重新走下去。」

即使如此，他也直言自己沒有從這種工作得到特別大的滿足感，既因基層團體想爭取的東西，可能做很長的時間都未見成果，也因他們的工作不是如反高鐵般「決一死戰」，容易動員很多人參與。唯一推動他們繼續投入下去的，是工人和街坊受壓迫的傷痕和反抗壓迫的力量。「街坊都知道，這種工作的目標未必一朝一夕就可以達到，而且他們付出的東西比我們多很多。我們是受薪的，可以有假期，但有些街坊和工友沒甚麼機會放假，如一個基層母親要照顧小朋友，根本不會有停下來的時候。而且一起開會傾政策，其實是頗精英的工作，跟他們的生活經驗有一段距離，但他們都願意來參與組織工作。若我們不繼續做下去、不回應他們，或不在他們面前表現謙卑，是說不通的。」說到這裡，他特別咬牙切齒。

不可分割的理論和實踐

這七年間他在關綜聯的工作，與一般社福機構很不一樣。除了做長期組織基層的工作，他還致力結合理論與實踐。「理論和意識形態可以幫你定位，思考運動的方向。在基層團體裡固然很需要理論支持，但就算是只作為一個人或一個大學生，有能力和機會接觸理論，就

很應該思考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理想社會，以及要以甚麼方法達到這個理想。」活在右翼（主張個人利益最大化）思想當道、充滿荒謬及不公的社會，就更需要理論去支持社會改革，把矛頭指向資本主義體制。「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很多左翼理論讓我們看到，很多事看似不可能，但其實是可能的。這刻我們並非理論的發明者，但我們是理論的使用者，需要理論去指導我們的工作。」筆者於訪問之前，就讀了他最近發表的一篇政經評論文章，名為〈新階級　新形勢　新抗爭〉。他從自身基層工作經驗（如他參與過的最低工資運動）出發，以左翼理論分析香港的階級政治，勾勒香港「工人階級」所面對的處境，最後提出將福利運動與勞工運動聯合起來的基進社會運動方向[4]。

談及將來，他也不太肯定，只說自己有機會再去讀書，然後回來繼續做基層團體的工作。

「但我想，作為左翼知識份子，要清楚知道，就算去學院搞論述搞理論，目標都是為了改變世界，而非解釋世界，要確保自己理論是建基於群眾，或能夠真正協助群眾運動。」由始至終，他心裡都把群眾放在第一位，把個人放在後一點的位置。

結語：社會其實寡情薄倖

相比起每天辛勞工作但仍朝不保夕的基層，我們有很多資源，很多選擇。我們可以只關心玩樂、成績和個人發展，但也可選擇付出一些時間，令社會——你和其他人的生活——變得更好。現在大學生的精英光環漸漸消失，畢業後未必找到保證生活安枕無憂的工作。

但這正如達初所言，正正是我們與基層同行的理由：「當現在你都不能夠確保自己畢業之後，能否過比較好的生活，這就代表，這世界並不如你想像般優待大學生——你其實同其他人一樣，今日社會話事係資本家，佢地覺得你有地位你就有地位，但聽日佢就可以話唔要你。社會就是那麼寡情薄倖。很多人都覺得你是準中產，但當你知道你都不能夠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命運，你會選擇脫離基層，還是做多些事，趁最有條件的時候參與公共事務？」

1　社聯，〈社聯回應2012/13年度財政預算案〉，2012年2月1日。

2　有關關綜聯的詳細理念和工作，可瀏覽http://www.cssa-alliance.org

3　成立於2001年，成員主要是大專同學、基層團體成員，以「蓋搭基層與學界橋樑，鼓勵同學關心基層、參與基層工作；開闢討論園地，交流基層文化、基層自主、基層運動的看法」為目標的組織，當年與中大基層關注組交往甚密。

4　詳見左翼民間團體左翼21出版的季刊《左岸》7月號。

抱著問題　成為自己

◆ 湯映彤

「沙灘上的蟹洞，石頭上的螺、貝、蠔，水裡的蝦、魚、海膽、海葵等等，立刻把大家的注意力吸住了，所有人都埋著頭，觀察、捕捉、賞玩、與那些生命打招呼。」[1] 訪問黃嘉靈之前，她借了很多與綠色、自主教學相關的資料給我，其中包括她寫的一篇〈龍尾拾荒〉，記述她任教的鄉師自然學校，師生齊去大尾篤龍尾灘上的一次戶外學習課。

鄉師自然學校[2]（下稱「自校」）是由幾位村校老師，爭取超過十多年，努力創立的一所「敬仰自然、尊重孩子的綠色小學」[3]。在龍尾灘戶外學習課當日，老師提到政府將要用一億三千萬在那裡鋪上白沙，建一個人工沙灘，「大小朋友安靜下來，為這裡無法出聲抗議的動植物朋友祝禱」[4]。

除了記事，那次也讓嘉靈想起廿多年前的自己。「我住的地方附近就有海灘，我常到海灘玩，周末爸爸會帶我們到樹林捉蟬、游水、摸蜆……」從小接近大自然，令嘉靈喜歡科學，成為一個問題小女孩，常希望知道宇宙有多大？人從哪裡來？世界到底有沒有神？她說五年級時的志願是做考古學家，因為想發掘出人類和宇宙的起源。但這些問題也給她帶來困惱，因為沒有人能回答她，甚至當她是傻子，同齡的朋友都沒有人會與她討論這些問題，整個小學階段也覺得很孤獨。到了中三、四，問題越來越多，但也無人能回答。中五畢業時，有位老師說每個同學可問他任何一條問題，他會盡力回答，嘉靈當時想了很久，就問他：「人生的意義是甚麼？」

從微分子到大社會

入中大的第一年，嘉靈選讀了生物化學系，「最初是想做基因改造，因為很多人沒有飯吃、有病沒藥醫，所以覺得自己要做這方面的研究。但第一年就發覺，根本不是因為沒有藥，或食物不足，而是社會狀態的不公平，即使研究到新的藥物，有需要的人也未必買得起，所以就覺得我不需要再讀。」讀生物化學，常要長時間在實驗室，入了 lab 就不見天日，「有一次我做完實驗，坐在百萬大道看到日落，發現自己入中大以來第一次看到日落，原來這麼美麗。我想，如果我繼續讀下去，也許永遠不會欣賞到，就覺得自己必須離開這狀態。」

於是，嘉靈在大學二年級毅然轉讀社會學系，其中一個原因是加入報社，參與第三世界週、綠色版、中國版等編採工作，覺得社會學的理論很合用，也聽了不少老鬼們的意見。另外的原因，還有中大通識科的規定，讓理科出身的嘉靈，有機會修讀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理論。她說曾看 Peter Burger 的文章說甚麼人適合讀社會學：當你站在山上，看著萬家燈火，你會想像每一個窗中都有一個故事，如果你很好奇想知道當中的每一個故事，你就適合讀社會學了。「這正正是我所想的。當我看著對面的大廈時，也會想這家人在看電視、那家人又在做甚麼，我都很想知道，所以就覺得自己適合。」

轉系之後的第一個學期，「我上完第一堂後就覺得好慘，(課堂)過得真快，只剩下十二堂了」。社會學的理論讓嘉靈大開眼界，陳海文老師的經典社會學、李靜君老師的性別社會學等都讓她覺得獲益良多，其中環境相關的學科，亦自然最吸引她。她印象深刻的是，文思慧老師在環境道德課說核電，「核電廠或支持核電者，常聲稱意外率為 0.00000...X%，但文思慧老師說，時間是無限的—— 即是機率多小也沒有意思，意外必然會發生。」

讓學生成為自己

嘉靈提到中大很多的好老師，都能刺激學生思考。「我們常說，希望學生學會批判思考、懂得反省，但一個人無端端怎會開始懂得反省呢？他到底怎樣檢視自己？原來也有方法，可以有一些依據，例如提出一些問題，問得學生呆了，然後他就會開始思考，老師某程度上就是提供這些啟發，這樣學生才能慢慢培養出反思和自我檢討的能力。」



嘉靈說自校也是在不斷尋找的過程當中，如設生活會議時間，讓全校一起討論，共同制定學校的校規。但一個小朋友怎知道自己想要甚麼？怎去想需要有甚麼校規？例如有同學會說小息越長越好，但若把問題再拆細，問他為甚麼想有長小息？可能他希望做某件事，再討論下去發現該事其實也可在其他時間做。過程主要讓學生學習表達自己、知道自己有甚麼想表達。有人喜歡小息，也有人喜歡上課，開會時大膽舉手的就自然多發言，沒出聲的其實有甚麼意見？嘉靈說老師們都要好好準備去應對，例如先進行小組討論，讓同學在自己班內，或相熟的同學間找到共識。「我們都會說這就是民主的基礎，但大家意見很不同，到底如何討論？如何去綜合意見？怎樣一起尋找共同生活的界線？這些都很花時間，而且需要一齊去work。」

「最理想的是『讓學生成為自己』，但一個人如何知道自己要成為怎樣的人，連我自己也一直思考這問題，到底這個狀態怎樣出現？怎樣學會作出選擇？其實也跟留白——即讓人『發吽逗』的時間和空間有關」。現在家長為了考試、入名校、上大學，催谷小朋友放學也要去補習、上興趣班，一星期學七種東西。校長海星的文章〈思考的空間〉中，提到一次在校外辦數學工作坊，有位樂而忘返的小朋友跟他說：「在這裡，我有一小時的時間慢慢去想，學校則要在三十五分鐘內，做好多數學題目，有時不明白又沒有時間，就放棄了。」「原來當老師以為學生應多練習，掌握計算技巧時，卻沒有滿足學生思考的需要。……今天的教育不是我們給的不夠多，而是『留白』的空間太少。學生的需要其實只是這麼簡單，就是擁有自由『思考的空間』，給予太多卻造成思考的障礙[5]。」



自校對學生的自由活動沒有太多干擾，更嘗試在時間表上撥出更多「留白」的空間，如設「生活閒情時間」，即讓老師和同學做自己喜歡的事，譬如有老師喜歡喝茶，在走廊擺好茶具享受其中，同學看到好奇會走過來問，來一起學、一起喝；同學也可自己找樂子、找麻煩，也會碰釘、思考、解決、轉化。張穎珊（2009年5月）的研究報告[6]中引錄受訪自校老師的說話：「不帶學習目的的生活，如發呆，睡覺，玩（遊戲），食飯……等等，其實很重要」、「生活本身是充滿樂趣和意義，經驗生活的細節即是學習」（自校教學理念）。

知行合一的示範

對嘉靈來說，執起教鞭並不是計劃以內的事，卻又自然而然，與自身的關注和經驗緊連。她很早就在抗爭行動中認識校長海星，知道他因為參與社運的經驗，發覺想改變社會應由教育開始，所以當他決心辦學，嘉靈就投身參與籌備工作，開校後也就嘗試任教。「我做學生報的時候，覺得對我來說感覺最強烈的是綠色運動、和生態有關的東西。我加入自校，最初不是從自主學習，或教學的角度出發；吸引我的是綠色生活、與大自然的關係，覺得這些理念很值得支持，也認同應嘗試以教育推廣開去。」

加入自校之前，嘉靈曾在不同社區組織或非牟利團體工作，亦一直關注環境相關的議題，如在社區中心開辦的婦女組中，推廣綠色生活和消費等。「自校的團隊吸引我的地方，是他們強調『知行合一』。很多團體的理念很好，但同事本身的生活選擇和實踐上，卻可能距離理念很遠。」她舉例說知道有環保團體工作的人，放工後其實都只關心化妝品；她以前的同事也會幫襯麥當勞、午飯時也吃外賣飯盒。「他們覺得這些細節不重要，或要求太高，雖然吃個飯盒不是十惡不赦，但既然有一小時午飯，何不外出堂吃，減少浪費一個外賣飯盒？但在自然學校，大家能做的都會盡量做。」

雖對現時教育制度有不同意的地方，但辦校又不能完全脫離現有體制，要尋找另類實踐的空間，往往知易行難。「開始的時候是希望想打破一些框架和制度，但現在又好像在重新建立一套規矩和制度。註冊成學校要向教育署交代，有很多不可不做的事、很多恆常的工作必須要應付。例如老師準備怎樣去帶領一個生活會議要花很多時間，其實現在沒有太多空間去做；或如生活閒情時間，現在的情況多數是同學自己去玩，老師就要把握這空閒改簿、開會……」

嘉靈覺得自校仍有很多地方仍做得不夠，但其珍貴的地方是作為一個示範，讓人知道在香港也有這樣的可能性。說到效用，以教育作為方法，要產生改變可能很漫長，而且一個學生往後的成長，也未必完全能在預期之內。不過嘉靈說，自校影響的社群也包括學生的家庭，如舊生家長們也會組織起來，平時一起露營聚會，也會集體訂購有機菜、共同購買而不光顧超級市場等。雖然最初幾屆收生較少，至今牽涉只數十個家庭，但

慢慢累積下來，或許也能成一股力量。

後記

訪問之前，嘉靈邀請我到自然學校參觀，那天正好是試後活動——講故事比賽。一個夏日燦爛的上午，低年級和高年級的同學，分別朗讀在圖書館挑選的故事書、或自己撰寫的講辭或故事。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封擬人化地以龍尾灘管海馬的角度出發，寫給環境局局長的信。信裡寫管海馬在龍尾灘裡自由自在的生活、與其他海馬及來訪的小朋友嬉玩，最後帶出希望局長不要「活埋」龍尾灘。

聽著十歲左右的小女孩，以淡定的聲線，在記事與抒情之間，自悟出的道理；看著高矮肥瘦的小朋友們，在沒有冷氣的校園，大汗淋漓的跑跑跳跳，我想，即便他們或來自較寬裕的家庭，或是少數獲得基金助學的幸運兒，但經過這六年的自校生活，到底會使他們各自走出一條怎麼的人生路？

「人生的意義是甚麼？」——不知嘉靈現在會怎樣回答她的學生？教與學、成長和處世，或許都是無法回頭的實驗。抱著問題，學習去檢視生活的每一步，大概是「成為自己」，同時與別人、與大自然互相依存，以至改變和創造的開始。

1　黃嘉靈，〈龍尾拾荒〉，2012，未出版。
2　鄉師自然學校網頁：http://www.gaiaschool.edu.hk/index.html
3　陳曉蕾，〈自然學校創校記〉，http://leilafeature.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2083086，2009年11月13日。
4　同1。
5　海星，〈思考的空間〉。《放手自然教出好孩子》，香港：青桐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年。
6　張穎珊，〈自主學習」教育理念實踐之個案研究——一間本地另類小學的經驗初探〉，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香港教育研究所，2009年。



藝術不藝術

◆ 湯映彤

華欣（區華欣）、Roland（葉浩麟）、阿峰（李俊峰），和我不同年份入學，但同於 2007 年藝術系畢業。同窗幾年，時值中大反國際化、情色版事件，校園外反世貿、天星皇后；畢業後搞 p-at-riot、反高鐵，散了又再碰頭。華欣說入中大前，已關注社會事，也常會「搵啲屎棍搞下」。直至 Roland 和阿峰加入，這類人多了，但其餘大部份同學都「有點太乖，爆句粗都覺得好大件事」。

「我們在系裡都不是主流……」華欣說。Susan（陳素珊）就笑著接口：「但聲浪很大！」Susan 和 Jaspar（劉建華）是我們的學妹／學兄，不算是爆粗族，但亦各有謙遜、批判和熱情。五位系友，都不是很「藝術家」，卻在近年社會、文化、藝術圈的風風火火之中，用各自的文化資源和技術、眼光和諗頭，去「不按本子辦事」。

不按本子　學以致用

讀藝術，畢業後租工作室、販賣創作、跑展覽，近年成了當藝術家的「本子」。幸運的，蜚聲國際，政商霸權都要招手；更多的，踩著變成「文創推土機」的界，連年浮沉的「散打王」。按不按本子，可能是不由自主的性格、天賦和機緣，或是主動的拒絕、思慮後的選擇。

說起中大經驗，除了在誠明「蒲」、課後看戲、夾 band、談情、通宵留夜，大家都提到大大小小「不正經的正經事」，例如：情色版事件聯系記招中的 art action、反世貿示威寫 banner 遊行等等。問到參與的原因：「因為趕 paper 好悶，有人話要搞啲嘢，咪一齊去」、「也跟新媒體有關，如 inmedia、blog」、「有舊生積極參與，帶頭，也有找我們幫手」、「大家朝見口晚見面、多傾談，自然說到較闊層面的事」、「或者跟性格有關」……七嘴八舌都說不清。

常被朋友戲稱「社運書法家」的 Roland 說：「自從黃生[1]那次之後，就正式（為大小示威運動）寫 banner。我小一就學書法，到那一刻才發現，書法不只可抄唐詩三百首、在大會堂展覽，原來都可以寫這些，覺得終於可以學以致用。」Susan 自反高鐵開始，負責很多文宣設計，她沒覺得自己與別不同，說只在做正常人該做的事。「我很怕做了堆廢



紙，常處於覺得自己幫不了忙的狀態。」六四廿周年，她畫的「天安門是世界上最清潔的廣場」海報，至今仍貼在不少校園裡、家門口，「我見到也很驚訝，覺得自己做的東西原來都有點用。」

藝術　意義是最重要

今日走進商場、公園、地鐵、政府大樓，甚至屋苑，都不難見到「藝術」。動用數百億公帑興建的西九豪宅後花園獲拍板，帶動全民「忽然藝術」。曾遭漠視、經歷資源匱乏年代的前輩都會慨嘆：現在搞藝術真好環境！但在這人人也是藝術家、看似自由的當下，卻掩藏資本與權力，對藝術定義、文化地位的你爭我奪。

「越來越多人說文化、說創意，我越想走開。一旦參與其中，牽涉資源分配，甚至說到西九——這藝術圈的原罪——怎可以面對當中的矛盾？我自己解決不了，所以我選擇不再提文化、藝術，越說只會越多人誤會……」Roland 說。華欣正好相反，「正因為西九的雪球越滾越大，作為藝術創作、或教育的人，就更要去推動、和說清楚甚麼是自己認為好的藝術。」

甚麼是好的藝術？單從個人欣賞的層面看，可能是令人「個心揪一揪」的感動，但若宏觀地、面對藝術圈說這個題目，「好，在於意義是甚麼；而意義，就是一場政治的戰爭」Jaspar 說。「我關心是 avant garde——未能被藝術包融在內、在原有規則中的超越和突破。正因為甚麼都可以是藝術，那就可用藝術圈的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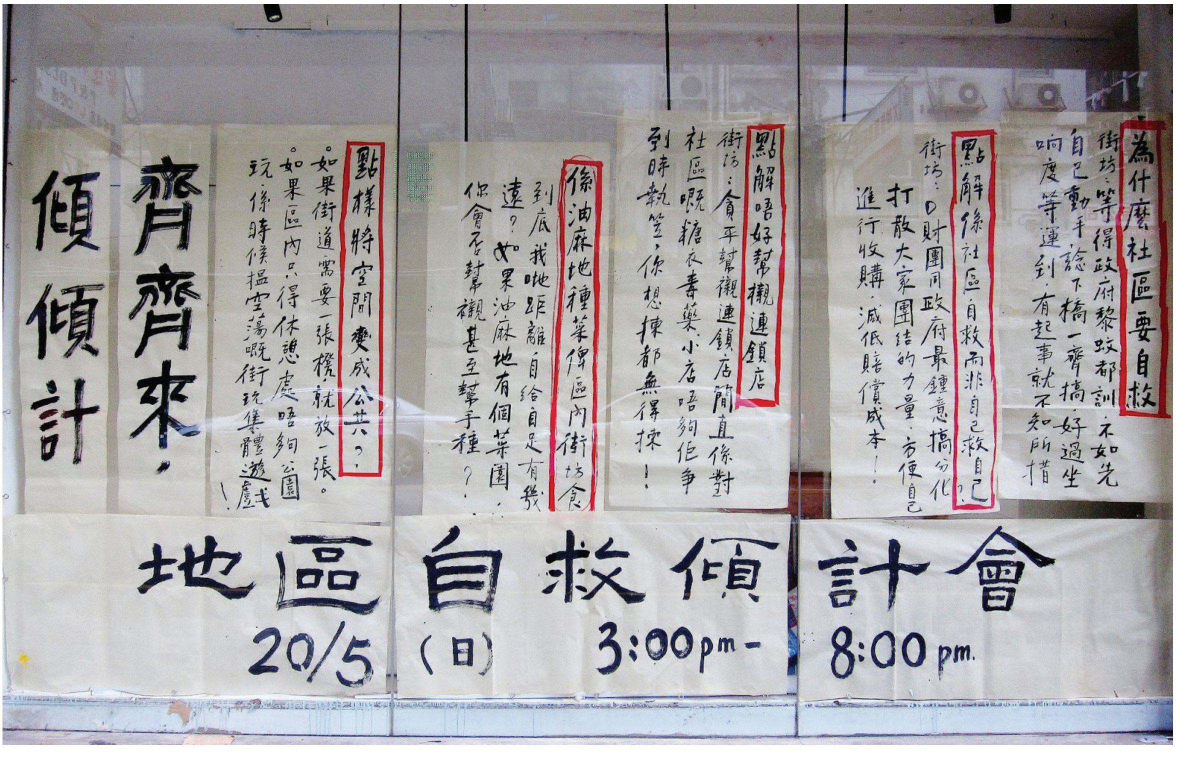
源，搞一些不是藝術的東西，將我認為有意義的事放進這個平台裡。」

所謂意義，包括對人、社區、土地等的價值判斷和關係建立。阿峰以程展緯、龐一鳴的消費者運動等為例，「革命可能很遙遠，但正正是身體力行，就是感染其他身邊的人去做，就變成一個運動，真正做到實實在在的改變。」創作人運用各自的技能和敏感，真誠地回應自己身處的環境人事，第一步或許是要「從自溺的中心出走」[2]。當藝術家走進社區，仍想著怎樣完成自己的作品，而非過程，結果社區就會變成被消費的對象。阿峰說他覺得要「用藝術家的身份來生活，不再分是來做作品，還是來傾偈……」

活化廳　街坊的文化平台

在活化廳內訪談幾個鐘，五人一邊在摺「活化報」，準備派給附近的街坊；一邊有附近住的朋友來打牙骹、有街坊帶來剩食。活化廳 2009 年開始進駐油麻地上海街視藝空間，五位先後加入，參與籌辦各種奇形怪狀的社區／藝術／政治／文化／抗爭活動，用 Jaspar 的說法，就是一種資源再分配，「用藝術圈的資源，去搞 avant garde 的、未被納入藝術圈內的東西」[3]。

近年打著「社區藝術」旗號的各類活動多不勝數，有的以和諧穩定為前提，重複「獅子山下」的口號式偽社區論述；有的以日漸消失的傳統美學作招徠，打造消費性的懷舊文化旅遊；有的以社會抗爭為目的，嘗試另類的宣傳和動員方法；有的以藝術推廣和教育為基礎，著重提升社區對藝術的參與。在這個龐雜的光譜之中，大家彷彿分享著相同的語



彙，但其實各有所指。

「我不會說是社區藝術，但又離不開藝術。我會用經濟去形容，好像日本松本哉的社區回收店，是自然而然、與社區共生的東西[4]。例如搞活化報，是希望可以滲透，其他人也有呼應，大家也會想派信箱、親手派給街坊，這屆的搞手很自然就會有這樣的想法，大家都有興趣想跟街坊建立關係。」阿峰說。

Roland 說活化廳不像一個菜檔，文化藝術未必是街坊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搞手們本身不是生活於這個社區，很多時只能由重建、舊舖遭淘汰、排檔規管等較即時性的議題切入。然而，活化廳座落上海街與咸美頓街交界：兩面玻璃櫥窗中，感覺熟悉，又可能經過轉化／詮釋／改造的展品，向街大電視間中播放的社區影像，都會吸引附近街坊駐目；擺放於路口的長凳，早午晚各有不同的坐客；打開門，廳內開放從容的佈局，讓人很易進入和親近；不分街坊、義工、長期擁躉、駐場師傅和搞手，一同有講有笑的氣氛，都令不同人事也得以聚合發酵。

訪問前數周，活化廳為街坊鄭生的黑膠唱片珍藏舉辦展覽，期間鄭生幾乎每天親自坐陣，老友粉絲們都來捧場。阿峰說，鄭生之前也不是很熱衷要辦展覽，不過大家熟絡後慢慢談起來，事情才一步步發生。「這需要天時地利和機緣，不是時常可以配合。但如果沒有這空間，這些就不會發生。」

「街坊應該有自己的文化權，和屬於他們的平台。」Jaspar 說。

溝通的美學

除了展覽之外，活化廳也辦過一系列「你肯學，我敢教」工作坊，例如阿牛（曾建成）的紙皮坦克工作坊，打開有關六四的對話；巴基斯坦街坊教沖家鄉奶茶和小食、花牌師傅黃生新春教手造風車等，讓附近街坊、藝術家和參加者，互相交流生活上的知識和技能[5]。現職視藝科老師的華欣，近兩年來主要負責籌劃工作坊。「這跟自己本身的教學理念很接近。每次來跟街坊傾偈、做 workshop 都很愉快，也會給自己力量。另一方面，我也想向學校的學生介紹（這些體驗），所以必須自己親身參與」華欣說。

2012 巴基斯坦茶餐工作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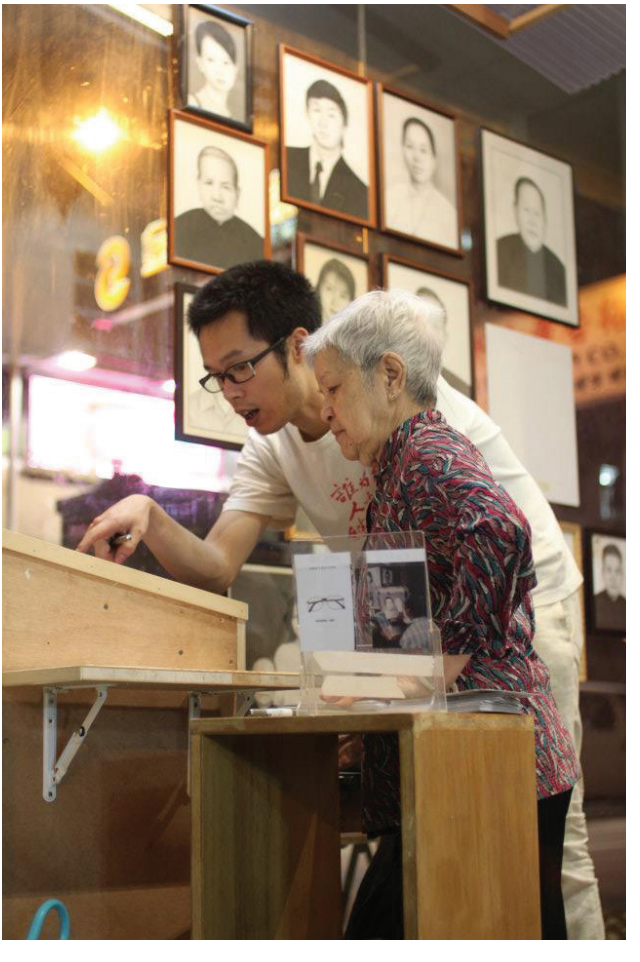


研究社區藝術的理論家說，要離開藝術家的本位，不要空降，也不是純粹服務，首要是「打開自己的心思，把別人的經驗容納進來」[6]，建立一種連結的、感通（connected）的關係，進而成為互相改變、共同行動的力量。「書或理論看過不少，但沒甚麼意思。」在荃灣某社區中心，見過社工開組，與街坊定期碰面、討論時事，「發現要令一個人關心政治不容易，自己必須要有長期的思考。這離我們的能力範圍很遠，因為我們在學科中從沒這樣的訓練。」Jaspar 說。

「溝通，可以透過一些有趣的方法，不一定是藝術。這裡（活化廳）是一個很好的實驗場地，因為面向街坊，要重新學習另一種簡單、直接的語言，和他們溝通。」Roland 說。

但每個人的性情不同，Susan 說自己不適合做社區工作，因為自己比較慢熱、不擅長跟所有人溝通。「但社區藝術，不一定只有一個崗位，有時候也需要後勤的工作。例如派飯團[7]，我就可以留下來洗碗。要自己親身在場，才會找到自己可參與的位置。如果躲在家憑空幻想，我就不會來參與派飯團；但當有了實際經驗，就會知道有其他 support 的事可做。」

溝通、參與、親身經驗，是改變自己和他人的開始。在藝術、社區組織和運動之間，活化廳似乎踩在各方邊界上，不停推撞、詰問，例如中秋革命月餅，由藝術家設計餅模、附近餅店製作、在社區裡義賣，為抗爭被捕的示威者籌旗打官司[8]；「殺到油麻地」計劃，面對區內的重建和壟斷，除展示藝術家和街坊對抗盲目發展的生活示範、追尋「被消失」的手工藝，還有收集街坊良策的「地區自救傾計會」[9] 等等。研究者馮耀中在〈與活化廳對話後的回響〉一文中說，活化廳在『關係美學』上的實踐，恰巧成功掀動社區內人民對自身及環境的覺察。這份藝術能量驅使一些被遺忘、被士紳化排斥的平常生活，重新獲得肯定及認同。」[10]



後記

在農圃道時新亞書院成立藝術系，五十七年來訓練出很多傑出的本地藝術家，但不走「正途」的人，當然也不只五個。藝術（或者當代藝術），本來就是教人不按本子去辦事，Susan 說在藝術系交功課時，陳生（陳育強教授）說過最有用的一句：「不用符合 standard，沒有 standard 這回事」。但或許更重要的，是我們在處身的環境、經歷中，主動地思考、創造，而令我們成為一個怎樣的人，作出怎樣的選擇——在身為／不身為一個藝術家之前。

五位參與在活化廳當中，因著各自的性情取向，及對社區與連結、藝術與意義的理解不同，也各有不同的分工和選擇。訪問後過了數月，藝發局公佈上海街視藝空間每兩年一次的招標結果，活化廳不獲續約[11]。然而，四年來在社區和美學方面的想像、累積下來的人脈和連結，不會輕易散斷；同行與合作無論結果如何，都並非終站，有關溝通和參與、抵抗和創造等，仍需要持續的反思和嘗試。

回想訪問時，華欣說最初在藝術系，志同道合的同學不多，但她卻說：「有些人自己專心創作，作品很好，我不會說他不關心社會，其實他們未必如你想像般缺乏思考，只不過他們是用另一種方法。」Susan 說在活化廳的參與，令自己對實際社區、對街坊的責任大了，「即使我將來會躲起來，也是本著同一個信念，兩者只是行為上的不同。」

1 花牌師傅黃生，深水埗K20-23重建區最後一位留守者，為了街坊和日後受重建影響的人，甘欲與房協對簿公堂，力控政府沒依足規定，在收地前進行「社區影響評估」。2009年7月13日，黃生正向高院申請上訴期間，房協派員清場，幾十街坊朋友到場聲援（包括Roland）。後來，黃生輾轉到活化廳任駐場藝術家，詳見：http://wongnaichung.blogspot.hk

2 廖億美，〈從自溺的中心出走—社群藝術及其台灣實踐圖像〉，2008年9月9日，http://www.ncafroc.org.tw/abc/newpoint-content.asp?ser_no=194

3 活化廳網頁：http://wooferten.blogspot.hk

4 詳見松本哉，《素人之亂：日本抗議天王寫給22K崩世代的生存祕笈！》，台灣：推手文化，2012年。

5 「你肯學，我敢教」工作坊系列：http://wwworkshop.blogspot.hk/

6 瑪麗 貝蘭克等著，蔡美玲譯，《對抗生命衝擊的女人》，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7 2011年活化廳搞「白色平安夜 White ChRICEmas」，自家出品飯糰200個，送給區內有需要的人。2012年初，熱心街坊Fred媽自籌兩千元，資助活化廳再搞「新春派飯團」，得網絡群組「oh! yes it's free」成員快速響應，自組團隊合力完成。

8 詳見〈革命月餅為社運官司籌旗〉，《主場新聞》，2012年9月24日。

9 詳見：http://ymtselfrescue.blogspot.hk/

10 馮耀中，〈與活化廳對話後的回響〉，《主場新聞》，2013年8月17日。

11 搞手們不滿藝發局對社區藝術長遠發展欠缺承擔，評審程序欠缺透明度，也沒包括社區街坊的聲音。阿峰、Roland和另一位成員Vangi決定留守，截稿前正面臨藝發局採取法律行動的警告；華欣、Susan和Jaspar則因為著眼點、溝通和處事手法的分歧，而選擇離開。作為不遠不近的局外人，旁觀著五人不同的選擇，感覺彼此之間仍是有某種相近的氣息，令大家曾經走近；而同行的實驗，從不代表天荒地老的誓言，但回想起來，相信也會是每個人生命中重要的一章。

CU 始終有你——獻給全中大的工友

◆ 天同巨門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08年迎新特刊

通宵工作過後，餓腸轆轆，走進 canteen 吃早餐。八時未到，裡面已經人來人往，但都不是年青學子，也不是一身恤衫西褲的教職員。呷著熱騰騰的好立克，耳畔傳來鄰桌精神爽利的寒喧。「你今日去邊度當更？」「佢發配邊疆呀！」「我今日要過堆填區個邊。」「 曬都曬死！食埋個菠蘿油先算啦。」

原來是中大的工友，應該是交通組或者保安組罷。

對於校園的想像，經常將整個校園最早起床的一群拋諸腦後，只記得教師與學生。尤其是大學， 在這個炮製「晉身中產」幻覺的夢工場，彷彿我們都是奉旨讓人侍候的公子哥兒千金小姐，工友純屬保持課室乾淨的吸塵機，連伴讀書僮也算不上。

教育是分數和試卷，鋼琴和芭蕾舞，不是地拖掃帚和螺絲批士巴拿。這是從小就有的認知。黃子華在棟篤笑裡模仿叫菲傭爬出十八樓抹窗的幼稚園生，唱了一首歌：

Clean the window, go outside.
You so stupid, can't you fly?
Clean the window, go outside.
You so stupid, tell me why!

唱完，叉腰瞪眼。

不想被人叉腰瞪眼，就唸好書找好工，日後向別人叉腰瞪眼。大學是叉腰瞪眼的預演場地，沒有哪個同學打算畢業後做倒垃圾。據說，校內某些行人路重鋪地磚，為的是避免穿高跟鞋的師生摔倒。

好立克喝光，回報社繼續趕稿。途中碰見在附近做清潔的阿姐 —— 她要求匿名 —— 回來開工，聊起樓下的廁所有多髒，清潔泳池更衣室時有多像焗桑拿，薪水怎樣遲遲未加，中大百佳的白豬仔午餐肉怎樣由八個幾加價加到十八個幾。瑣碎的生活牢騷，很熟悉。談到同學把東西亂放，熟悉感漲至最高點，「唏，無辦法架，咪當幫你地執野好似幫仔女咁執囉」。

青春年代渴望逃離的家庭關係，以奇特的方式在大學轉世回歸。隨著九十年代

學額擴張，大學平民化——意即香港學位貶值，有錢人多送子女放洋留學。借grant loan者恆河沙數，校園裡十個有七個是勞工子弟，工友的煩惱，是我們不少人的父母的煩惱。

數年前中大高層醞釀將EMO（物業管理處）外判，阿姐面臨減薪裁員危機，靜悄悄的在員工總會的反外判聯署簽名，不敢聲張。「我唔搞事嘅」，她笑笑。萬一搞得成外判，丟了工作那怎麼辦？「幾十歲，出到去都冇人會請啦，咪返屋企囉。」平日你在後樓梯休息，不悶熱嗎？有沒有想過申請一間小休息室？「冇用嘅，佢地唔會俾。」

順帶一提，阿姐要求匿名，也是出於擔心事後遭到管工以及工作環境更差的工友白眼。

作為一個有尊嚴的人，她的容忍讓我不解；作為大學的工友，她的容忍卻是那麼自然。我們的父母，在大學的場景裡就是如此卑微。這種貌似理所當然的卑微，其實一點也不易容忍，它驅使我們的父母這樣驅使他們的子女：辛辛苦苦捱到你戴過四方帽，西裝革履上班去，我就可以安心了。

安心的意思是，終於可以脫離卑微的職場生涯而又不用餓死。「讀好書＝孝順」的公式至此成立。在個人層面，大學是應許「你和你的一家必得救」的偶像；在社會層面，大學是倒模複制勞動者悲歌的工廠。

我搞不懂，為甚麼公屋的清潔工月薪只有五、六千，那些指他們「低技術」的高學歷專業人士，大抵沒有那種「技術」推得動等閒負重一噸的垃圾車。我也搞不懂，為甚麼從來只聽過「師生共治」，卻沒聽過誰提倡工友同樣是大學的持份者，同樣有參與校政的權利。再漂亮的皇宮也少不了廁所，脫離塵世的大學教育想像，必然無視大學教育裡的塵世。與活在同一個校園的工友隔絕，這種教育灌輸了怎樣的階級觀念？

萬事都互相效力，社會如是，大學如是。CU，始終有你。